

目录

[八月炮火 7](#_Toc55141393)

[理想國譯叢序 9](#_Toc55141394)

[導讀 “我是個作家，只是以歷史為題材而已” 11](#_Toc55141395)

[自 序 15](#_Toc55141396)

[作者的話 18](#_Toc55141397)

[引子　葬禮 19](#_Toc55141398)

[第一部分　計劃 28](#_Toc55141399)

[第1章　“讓右翼末梢袖拂海峽” 28](#_Toc55141400)

[第2章　色當的陰影 34](#_Toc55141401)

[第3章　“只需英國大兵一人……” 43](#_Toc55141402)

[第4章　俄國壓路機 50](#_Toc55141403)

[第二部分　爆發 59](#_Toc55141404)

[第5章　8月1日：柏林 59](#_Toc55141405)

[第6章　8月1日：巴黎和倫敦 66](#_Toc55141406)

[第7章　布魯塞爾：德國的最后通牒 74](#_Toc55141407)

[第8章　“葉落之前凱旋” 81](#_Toc55141408)

[第三部分　激戰 93](#_Toc55141409)

[第9章　“當時在逃的敵艦‘格本’號” 93](#_Toc55141410)

[第10章　列日和阿爾薩斯 106](#_Toc55141411)

[第11章　英國遠征軍開往大陸 123](#_Toc55141412)

[第12章　桑布爾河和默茲河 130](#_Toc55141413)

[第13章　在洛林、阿登、沙勒魯瓦、蒙斯等地的潰退 143](#_Toc55141414)

[第14章　“哥薩克來啦！” 159](#_Toc55141415)

[第15章　坦嫩貝格戰役 172](#_Toc55141416)

[第16章　火燒盧萬 182](#_Toc55141417)

[第17章　大海、封鎖、強大的中立國 190](#_Toc55141418)

[第18章　撤退 199](#_Toc55141419)

[第19章　巴黎是前線 215](#_Toc55141420)

[第20章　馮·克盧克的轉向 227](#_Toc55141421)

[第21章　“先生們，讓我們在馬恩河戰斗吧” 238](#_Toc55141422)

[后記 251](#_Toc55141423)

[譯名對照表 255](#_Toc55141424)

[譯者說明 273](#_Toc55141425)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 著　張岱云 等譯

# 八月炮火

上海三聯書店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凡與戰爭有關的一切事物，莫不源出于人心。”

——德·薩克斯元帥《兵法隨想錄》（序言），1732年

“一個個可怕的假設，全都湊到一起來了。”

——溫斯頓·丘吉爾《世界危機》，第一卷第十一章

# 導讀 “我是個作家，只是以歷史為題材而已”

羅伯特·馬西（Robert K. Massie）

1962年1月的最后一個星期，約翰·格倫（John Glenn）在三次延期后終于乘著火箭一舉沖上外層空間，成為美國環繞地球軌道的第一人；紐約揚基隊老練的一壘手比爾·“穆斯”·斯考倫（Bill “Moose” Skowren）因前一年表現杰出（創下打數561、全壘打28支以及打點89分的佳績），風光獲得3000美元加薪，年薪漲到35000美元；《弗蘭妮與祖伊》（Franny ＆ Zooey）一書雄踞暢銷小說類排行榜的榜首，第二名是《殺死一只知更鳥》（To Kill a Mockingbird）；非虛構類的暢銷冠軍是路易斯·奈澤（Louis Nizer）的《我的法庭生涯》（My Life in Court）；就在同一個星期，一個生于我們這個世紀的美國人撰寫的最好的歷史作品也在此時印行上市。

《八月炮火》推出后立即洛陽紙貴，空前成功，書評爭相推介，口碑迅速傳開，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讀者一睹為快。肯尼迪（Kennedy）總統特別訂了一本送給當時的英國首相麥克米倫（Macmillan），他的閱讀心得是：當代政治家必須盡可能避免陷入1914年8月大戰的陷阱。普利策獎捐款人已立下規章禁止頒發歷史類獎項給主題與美國無關的著作，但是委員會還是找到名目，頒給作者塔奇曼“非虛構類獎”。《八月炮火》讓作者一舉成名，她的作品深入人心且文筆流暢優雅，但是大部分的讀者只需要知道這本新書的作者是“巴巴拉·塔奇曼”這塊金字招牌。

這部本質上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頭一個月戰況的軍事歷史研究作品，究竟好在什么地方，竟能享有如此盛譽？本書有四個突出的特點：細節豐富，描述生動，讀者有如親臨事件現場見證歷史；以散文敘事風格寫作，文字剔透、清晰、慧黠、練達且詼諧；冷靜地跳過道德判斷——塔奇曼從不說教或使用苛責的語調，她為文保持開放懷疑態度卻不帶憤世嫉俗的嘲諷，讀者在讀到人類所犯錯誤而感到荒唐悲哀的同時，也不致因人類的卑劣行為而太過激憤。這三個特點在塔奇曼的所有著作中處處可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八月炮火》一書讓讀者一旦捧讀后便幾乎再難釋手的第四個特點，在于塔奇曼說服讀者先吊吊自己的胃口，不先設想有什么大事即將發生。她先以敘述包括3個集團軍、16個軍、37個師的70萬德國大軍浩浩蕩蕩越過比利時直搗巴黎的場景拉開全書序幕。成千上萬的人車馬炮如潮水般一波波涌現在法國北部塵土飛揚的路上，挾著毫無妥協、銳不可當的氣勢，德軍朝著占領巴黎城，依德皇諸將領們計劃的在六周內結束西線戰事的目標勇猛邁進。看到德國大軍挺進這部分地區時，讀者可能已經知道這批人馬最后并沒有如愿攻進巴黎；克盧克將軍率部閃開以避戰，且在馬恩河一役后，雙方的百萬大軍跌跌撞撞退入戰壕，開始打起四年殺戮慘烈的持久戰。但是，塔奇曼就有本事讓讀者忘了他們已知道的史實。讀者浸淫在書中槍聲如雷四起、刺刀攻閃交錯的氛圍中，儼然成為置身戰場的參與者，也跟著關心起兵困馬乏的德軍會不會再回擊？被逼入絕境的英法兩國能否撐得住？巴黎會不會失陷？塔奇曼書中描述1914年8月戰事的手法懸疑性十足，讓讀者一如親歷其中的人對后來戰情發展無比好奇，是她引人入勝之處。

《八月炮火》問世之初，媒體如此形容巴巴拉·塔奇曼：一個50歲的家庭主婦、三個女孩的母親，以及紐約一個著名醫生的太太。但事實更為復雜有趣。她出身于紐約城兩個書香門第的猶太商人世家，外祖父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Sr.）在一次大戰時出使土耳其，舅舅小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出任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的財政部長逾12年，塔奇曼的父親沃特海姆（Maurice Wertheim）創建了一個投資銀行集團。她童年的住所是位于上東區的一棟五層樓棕石洋房，家里為她聘請的一個法文女家教就在這棟房子內每天給她朗誦法語作品，從拉辛（Racine）到高乃依（Corneille）的劇本，她無一不讀。在康涅狄格州，她的家族還有一棟附設谷倉和馬廄的鄉間大屋。在用晚餐時，她的父親常常禁止家人提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名字。有一天，正值青春期的女兒言談誤涉禁區，父親不悅命她離席，巴巴拉坐在椅上腰桿挺得筆直說：“我已經夠大了，不要隨意叫我離開餐桌！”父親不可置信地瞪著她，但巴巴拉則兀自留在原位不動。

自哈佛大學女子學院畢業時，剛巧外祖父代表美國率團赴倫敦參加世界貨幣經濟會議，她放棄畢業典禮陪伴外祖父前往。后來她被聘為太平洋關系學會的研究助理，在東京住了一年，接著成為《國家》雜志（The Nation）的新進記者。該報一度瀕臨破產，多虧她父親花錢買下。二十四歲時，她便被派往西班牙采訪內戰新聞。

1940年希特勒揮軍攻進巴黎那天，她下嫁紐約城的萊斯特·塔奇曼（Lester Tuchman）醫生。臨將遠赴歐陸戰場的塔奇曼醫生相信在當時那樣的世道下，實在不適合生養小孩，巴巴拉則回道：“如果我們只是坐等情況改善，可能要永遠等下去。但假使我們真想要一個小孩，不要管希特勒，現在就應該生！”九個月后他們的長女出世。在1940年代、1950年代期間，塔奇曼忙著養育女兒的同時，也巧心挪出時間撰寫她的第一本書Bible and Sword，這本關于以色列建國的著作在1954年付梓發行。接著《齊默爾曼電報》（The Zimmermann Telegram）也在1958年出爐。后者主要描寫德國外相在1917年以收回得克薩斯州、新墨西哥州、亞利桑那州和加州等土地為誘餌，企圖說動墨西哥對美宣戰，全文風格高雅、幽默，趣味橫生，確是引領風潮的高品位之作。

《八月炮火》以及《驕傲之塔》（The Proud Tower）、《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1911-45）、《遠方之鏡》（A Distant Mirror）、《愚政進行曲》（The March of Folly）、《第一聲禮炮》（The First Salute）等著作相繼問世，塔奇曼聲譽日隆，幾乎被當成國寶。大家心里都納悶她怎么那么厲害？塔奇曼在無數的演講和文章［后來結集編印成名為《歷史的技藝》（Practicing History）一書］中透露，寫史第一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必須“深愛你所要撰寫的主題”。她憶起她在哈佛的一個教授對13世紀英國頒訂的《大憲章》（Magna Carta）癡迷不已，一討論到它時，教授的藍眼珠就閃閃發亮，連坐在椅子邊的她也感染了他那股熱力。塔奇曼提到多年后她遇到一個學生在撰寫論文時被迫選擇一個他完全不感興趣的題目，只因他的系所認定這是一個缺乏研究的題目，她為他感到不平：“如果連你自己都不感興趣，又如何能吸引其他人呢？”她寫的都是她覺得很有意思的人或事，一開始是有些好玩的東西吸引住她的目光，接著她探究這個題材是冷僻還是為人熟知，如果她發現自己在這上面的好奇心一天天增長，便繼續走下去，每個題材最后總是能帶出新的事實、新的觀點、新的生命和新的意義。她從這個特別的8月發現，“1914年有種不尋常的氣氛，能讓感受到這段史實可能對人類帶來的意義的人心悸顫”。她的作品散發著一股魅力，讀者一旦被她筆下的熱情和技巧吸住，最后絕難逃出她文字的魔掌。

她通常是先著手作研究，亦即搜集史實。她畢生博覽群籍，但一旦開始她就把自己丟進那個時空和歷史事件當中，埋首投身其中各種人物的生活。舉凡信件、電報、日記、回憶錄、內閣檔案文件、戰爭令、密碼甚至情書，她無一不讀。她以圖書館為家，經常流連于紐約公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圖書館、英國檔案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耶魯大學的斯特林圖書館（Sterling Library）、哈佛大學的懷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她自述當學生的時候，懷德納圖書館的書架簡直是她的“阿基米德浴缸”、“摩西面前的燃燒的荊棘”、“發現自己的青霉菌的培養皿”……沉溺在成堆的典籍中，她樂而忘我，像一頭放養在遍地苜蓿田野的乳牛，即便被整晚關在里面也毫不介意。）

動手寫《八月炮火》之前，她找了一個夏天，開著租來的雷諾小車跑遍比利時和法國古戰場。“我看到了被昔日裝甲部隊鐵蹄蹂躪的田野，如今谷穗成熟累累，我在列日（Liège）丈量默茲河（Meuse）寬度，遙想當年法軍是以何種心情站在孚日（Vosges）高地往下眺望他們的阿爾薩斯（Alsace）失土。”無論在圖書館、書桌前，或踏足古戰場，她一心追求的是活生生的具體史實，希望筆下呈現的人或事的特質能深印在讀者心中。

以下是幾個例子：

——德皇：“全歐洲最口無遮攔的人”。

——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他高大肥碩，身著緊身胸衣，頭盔上綠色羽翎招展，是未來悲劇的根源”。

——施利芬（von Schlieffen）：德國戰爭計劃的軍師。“普魯士軍官有兩類——頸粗如牛和腰細若蜂，而他屬于后者”。

——霞飛（Joffre）：法國元帥。“身軀魁偉，大腹便便，穿著寬肥的軍服；面容豐腴，點綴著已近霜白的濃濃髭須和天生匹配的兩道粗眉；膚色白嫩，兩眼碧藍安詳，目光誠摯恬靜；霞飛的模樣活像個圣誕老人，叫人一見便有慈祥樸直之感——這兩個品質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覺的。”

——蘇霍姆利諾夫（Sukhomlinov）：俄國陸軍大臣。“因其輕浮佻而顯得狡黠機靈，也就失去了他的混沌純樸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細皮白肉，生就一張貓兒臉，蓄著一把整齊雪白的胡須，全身媚態十足，近乎奸詐”，“迷上了一個外省省長的23歲夫人。他千方百計栽贓誣陷，策劃離婚，甩掉那個丈夫，娶了這個絕色尤物做他的第四任夫人”。

巴巴拉·塔奇曼研究的更大的目的是要挖掘歷史真相，她也盡其所能去探討當時的人對那些事件的真實感受。她鮮少采用歷史的體系和分類。我在這里套用《泰晤士報文學評論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一個書評家的話：“一個史家如果將體系列為第一優先，他就很難掙脫只篩選最合于自己架構的史實的窠臼。”塔奇曼建議以事實作前導，她說：“發現歷史真相在起始階段已經足夠。”“不要太急著去發掘歷史發生的原因，我相信這部分留到你不僅搜集了全部的史料，且把它們依序編成系列，正確地說是落筆寫成文句、段落和章節之后，再來單獨處理會比較安全。在將搜集到的人物性格、日期、槍彈口徑、演講稿等材料轉化成文字的過程中，事件發生的原因最終自然會浮出水面。”

知道何時住手當然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個問題，她的忠告是：“你必須在完成之前停下，否則你將永遠不會罷手，也不可能完成。”她解釋說：“歷史研究是沒完沒了的誘惑，但是寫作卻是一件苦差事。走到一個階段，終究要開始進行挑選、精煉并結合史實所謂剪刀糨糊的工作，并且梳理出一套模式，進而建立敘事形式，簡言之，就是開始撰寫。”“撰寫是一個勞心費時且痛苦不堪的過程，有時會令人不禁氣餒。過程中可能需要重整、修改、增訂、刪減或重寫。但是也會給你帶來激動、狂喜的快感，好像站上奧林波斯山峰的那一剎那。”令人訝異的是，塔奇曼自己是經過多年磨煉才發展出她著名的敘事風格。她在哈佛的畢業論文只得到“了無特色”的評價。她的第一本書Bible and Sword遭到退稿30次后才有出版公司愿意幫她出書。她一路走來努力不懈，最后終于得出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公式：“下苦功，多聽多想，持續不斷地實踐。”

塔奇曼特別看重我們大家都可以自由掌控運用的偉大的工具力量，亦即英文這種語言。的確，這個信念使她經常在歷史研究題材以及應以何種工具適切表達之間徘徊掙扎。“重要的是，我是個作家，只是以歷史為題材而已。”她說道，“我對寫作藝術的興趣與對歷史的興趣不相上下……文字發出的聲息以及文字聲息與其代表的意義之間的互動深深令我著迷。”覺得自己想出了絕妙好辭或琢磨出佳句時，她忍不住立即想與別人分享，于是拿起電話一字一句念給她的編輯聽。她覺得精準、典雅的文字是賦予歷史美妙聲音的樂器。讀者打開書后會一頁頁翻下去，是她寫作的最大目標。

在一個大眾文化普及化以及庸俗化的時代，她無疑是個精英主義者。對她來說，高質量有兩個基本標準：下的功夫要深，以及目的要純正。其間的差別不僅只是藝術技巧而已，也在于意念。“你要做到別人都說好；要不然就只有流于半吊子。”

塔奇曼與學術界和評論家維持戒慎恐懼的關系。她沒有博士學位，“我想這反而救了我！”她相信傳統學術生涯的要求會讓想象力失去空間，窒息寫作熱情并扼殺文體風格。她說：“學院派的史學家始終有被迫的讀者，先是論文指導教授，再者是教室里的聽眾，讓讀者看得下去并非他們的主要關注點。”有人建議她或許可以去教書，“我為什么該去教書？”她如此強烈地回應，“我是一個作家，不想誤人子弟！我即使想教，也做不來。”對她來說，作家就應該駐足圖書館或在田野實地調查，或埋首案前寫作。她強調，希羅多德、吉本、修昔底德、麥考萊和帕克曼不也都沒有博士學位？

有些評論家，尤其是學院派評論家，將塔奇曼的作品列為通俗歷史而嗤之以鼻，隱含只因作品太過暢銷，一定達不到他們自己所設標準的意味。這種貶抑的評論刺傷了她。大部分作家對負面評價采取默不作聲政策，因為若作出回應只會激怒對方，給自己帶來更多傷害。然而，塔奇曼卻正面回擊。她寫信給《紐約時報》說：我注意到那些迫不及待指出作者漏東漏西的評論家，自己反而沒有全部看完他所評論的作品。而且“非虛構類的作者都了解那些評論家非得要挑出一些毛病才能凸顯他們的博學多聞，我們也等著看他們到底能從雞蛋里挑出什么骨頭”。塔奇曼最后多能打敗那些評論家，至少他們不敢再與她正面沖突。這些年來她陸續應邀到很多名校演講、獲頒榮譽學位，并兩次贏得普利策獎，她也當選為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成立80年來的首位女性院長。

盡管她具有好戰的職業性格，但她作品中卻有一種罕見的容忍。她用極為人性的筆法描述筆下虛榮、自大、貪婪、愚蠢和懦弱的人物，也盡量假設他們并非生來如此。舉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分析脾氣火爆的前駐法英國遠征軍指揮官約翰·弗倫奇（John French）爵士不愿派軍隊上戰場的原因時，她寫道：這是基欽納強調保持實力，囑咐不要冒“死亡和損耗”風險的指示所致？還是因為他頓然察覺到英國遠征軍沒有訓練有素的預備役部隊為繼？還是因為登上大陸以后，強敵當前，近在咫尺，勢在必戰，因而感到責任重大？還是因為豪言壯語后面的那種膽識，已失其元氣于無形？還是因為抱有作戰異國，為人作嫁，責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歷其境、身當其職的人是不能判斷的。

塔奇曼寫歷史目的是要呈現人類的掙扎、成功、挫折和失敗的全貌，但她并不作道德判斷。盡管如此，《八月炮火》一書仍含有歷史的教訓。愚不可及的帝王、政客和將領錯誤地踏進一場沒有人希望發生的戰爭，這場大決戰如同一出典型的希臘悲劇般，一步步冷酷地邁向毀滅卻無可挽回。塔奇曼在書中寫道：1914年的8月，有一種東西在逼近，不可逃避，無所不包，籠罩著每一個人。完美的計劃和易犯錯的人之間的可怕矛盾直讓人戰栗，仿佛嗅到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味道。塔奇曼希望讀她書的人能從中記取警示，避免重蹈覆轍且日有所進。正是作者的這份誠心和書中隱含的教訓，使上至總統首相、下至上百萬的普通讀者都對這本書愛不釋手。

家庭和工作占據了塔奇曼的生活，她最大的樂趣就是坐在桌前寫作，工作時她絕不容許自己分心。成名之后，有一次女兒阿爾瑪（Alma）對她說，簡·方達（Jane Fonda）和巴巴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想請她寫電影劇本。她搖手表示不要，阿爾瑪不死心地問：“但是，媽，難道你不想見見簡·方達本人嗎？”塔奇曼仍回說：“不想，我正在工作，沒有時間！”她的第一份原稿是先手寫在黃色拍紙簿上，“滿是修改涂抹的痕跡”，然后再照手稿打字，每一行間固定空三行，方便日后重整文句時剪貼之用。她通常一口氣工作四五個鐘頭，中間不打岔。她的另一個女兒杰西卡（Jessica）回憶說：“《八月炮火》完稿的那個夏天，有一天我母親進度落后急著想要趕上，為了遠離電話的干擾，她在一間老舊的擠奶棚內架了一張牌桌和椅子——那里即便夏天也寒氣逼人，而隔壁就連著馬廄。她早上7點半就起床工作，我的任務是在12點半時為她送午餐，午餐托盤上通常就是一個三明治、一瓶V-8牌瓶裝果汁和一份水果。我每天悄然無聲地走近，踏著馬廄外的一地松針，發現她總是同一個坐姿，那么的全神貫注。5點或稍晚她才收工。”

塔奇曼那年夏天為了一段文字，反復推敲了八個小時。后來那段文字成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經典佳句，這就是《八月炮火》的開場白：“1910年5月的一個上午……多么宏偉的一個場面！……”還沒有與這本書相會的幸運兒現在可以開始翻開下頁展讀了。

# 自 序

本書的緣起可溯至我早先寫的兩部主題皆為一次世界大戰的著作。第一部是Bible and Sword，內容描述英軍在中東與土耳其打得如火如荼之際，在1917年開進耶路撒冷前夕，英國發表《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來龍去脈。耶路撒冷是猶太——基督教，也剛巧是伊斯蘭教（雖然當時這一點沒有今天那么受到重視）的發源地和宗教中心，奪取圣城因而被視為一個劃時代的舉動，需伴以重要的宣示動作，并賦予其合適的道德正當性。一份承認巴勒斯坦是原住民族祖國的官方聲明，正合乎這個需求。這并非一個親猶太主義思維下的產物，而是基于兩個其他因素：《圣經》，尤其是《舊約》對英國文化的影響，以及《曼徹斯特衛報》所說的“蘇伊士運河兩岸軍事形勢的迫切邏輯”。簡言之，就是“圣經與利劍”。

在《八月炮火》前的第二本書是《齊默爾曼電報》，這本書寫的是當時德國外交大臣阿瑟·齊默爾曼（Arthur Zimmermann）企圖說服墨西哥和日本加入德國同盟，在美洲向美國宣戰的計劃，并以收復墨西哥原有的得克薩斯、新墨西哥和亞利桑那等土地作為報酬。齊默爾曼這個聰明的構想旨在把美軍困在自己的本土戰場，使其無暇顧及歐洲戰事。然而，結果卻適得其反。記載計劃詳情的無線電文在傳給墨西哥總統途中，被英軍攔截解碼，立即轉交給美國政府，華盛頓隨后公布電報內容。齊默爾曼的計劃在美國國內引起公憤，反而推動了美國加入歐洲戰場。

在與歷史打交道這么多年后，我一直認為時鐘在1914那年卡住不動了，也就是說，就在那一年，19世紀才真正結束，開始邁入我們的年代——丘吉爾所宣稱的“可怕的20世紀”。在尋找寫書題材的過程中，我感覺1914年絕對是個好題目。但是，我并不知道應該從什么地方入手或采用什么架構。當我還在踉踉蹌蹌尋找正確的切入點的當口，一個小小的奇跡出現了。我的經紀人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個編輯想請我寫一本關于1914年的書，問我要不要與他談談。我當場愣住了，但還沒有到說不出話來的地步。我當然一口應允。盡管我很高興這個編輯慧眼獨具找到我這個正確人選，但想到原來其他人也有類似我的構想，不免令我有些悵然不安。

他是麥克米倫（Macmillan）公司的出版商，名叫塞西爾·斯科特（Cecil Scott），很不幸他今天已不在人世。我們后來見面時，他告訴我他想要的是一本探討英國遠征軍在蒙斯（Mons）一役中發生的真實故事。這是英國遠征軍1914年在海外首次遭遇的戰事。英軍在這場戰役中有點奇跡般地挺了過來，并對德軍產生牽制作用，但英軍獲得神助的傳說也鬧得滿天飛。與斯科特見完面之后的那個星期，我正好要去滑雪，于是雪橇裝備之外，我還帶了一箱子的書去了佛蒙特。

滑完雪回到家時，我已有一個以德國戰艦“格本”（Goeben）號海上逃亡為主題的寫作計劃。“格本”號不僅逃過英軍巡洋艦在地中海的追捕，并且在安然駛抵君士坦丁堡后，將土耳其連同雄霸中東的整個奧斯曼帝國卷入大戰。這個事件決定了那個地區的歷史進程，影響直至今日。選擇“格本”號下手對我來說似乎再自然也不過了，因為它已成為我們家人，包括當時只有兩歲的我親眼見證的一部家族史。事件發生時，我們也正搭船橫渡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探望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外祖父。當時我們如何從郵輪看到急于追捕敵船的英國巡洋艦上開炮射擊，“格本”號如何加速逃走，以及一抵達君士坦丁堡，我們如何成為第一批向土耳其首都的官員和外交官報告這場海上追逐戰的人士等等，都是我們家族圈事后常津津樂道的故事。我母親事后描述她當時如何在來不及上岸與她父親打招呼之前，就被德國大使詳細盤問，形成我對德國人辦事風格的第一印象，這幾乎可以說是第一手資料。

事發將近30年后，我從佛蒙特滑雪回來告訴斯科特先生這就是我要寫的故事，但他說那不是他要的，他還是鎖定蒙斯戰役：英國遠征軍如何擊退德軍，是否英軍真的看到幻象或有一個天使飛在戰場上空？蒙斯一役固然后來對西線戰事十分重要，但天使傳說的根據是什么呢？坦白說，我還是對“格本”號比較感興趣，但是一個出版商準備要出一本有關1914年的書，比我倆觀點互有出入來得重要。

整個戰爭對我來說是太大塊的文章，遠非我能力所及。但斯科特先生不斷地說我寫這本書沒有問題。后來我縮小范圍擬訂了一個集中探討戰爭第一個月的寫作計劃，這一個月份涵蓋了所有大戰的根源，包括“格本”號和蒙斯戰役。如此一來雙方皆大歡喜，而此書也開始看起來有些眉目了。

深陷在以羅馬數字編號的各軍種以及左、右翼等復雜用語的泥淖，我很快發現自己所學的不足，覺得在動手寫這類著作之前，應該先去參謀指揮學院念個十年。尤其是在嘗試說明處在防守地位的法軍最初如何收復阿爾薩斯時，我因無法真正理解而備感吃力，但后來我還是成功地迂回交織講出一套故事。這是撰寫歷史過程中學到的技巧——即當你無法知道全貌時，只好以稍為模糊的手法來描述事實，吉本也曾使用漂亮相稱的詞句如法炮制，但認真分析起來卻沒有多少意義，而你可能因驚嘆它們結構的完美而沒有注意到。我沒有吉本的功力，但是我學到深入尚未開發的領域探險的價值，我并沒有走回對素材來源以及所有人物、情況已有充分掌握的研究老路線。后者做起來當然容易多了，可是畢竟少了那種發現新大陸的驚奇感，這也就是我喜歡在寫書時另辟新題材的原因。盡管評論家可能對此無法贊同，我卻樂此不疲。《八月炮火》發行之初，書評界幾乎沒有人認識我，自然也沒有什么名氣讓他們任意糟蹋，結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熱烈回響。克利夫頓·法迪曼（Clifton Fadiman）在“每月一書俱樂部”的會刊中寫道：“大話不能隨便說，但是我認為《八月炮火》還是有相當機會可以成為一部歷史經典。它的優點幾乎是修昔底德派標榜的知性、簡潔、輕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書的題材，處理一次大戰爆發前后這段時間歷史這樣的題材，其層次遠超過單以文字敘事的有限境界。這本字字珠璣的著作記錄了塑成今天我們這個時代的重要歷史時刻，它提供了一個長遠的觀點來為我們所處令人憂心的時代加以定位。假設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燒化成原子，那么從長遠視角來看，這可以被看作是由1914年8月打響的炮火開啟的。這個說法也許有過分簡化之嫌，但它貼切地說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論。她深信這個可怕8月的僵局，決定了其后戰爭的進程和達成和平的條件，并推動后來兩次大戰間情勢的演變，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接著法迪曼特別挑出我書中幾個比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比利時國王阿爾貝（Albert）、霞飛、福煦（Foch）將軍，對他們描述了一番。他說，優秀史家的另一個高明之處是能預測人類的行為和事件的演變。這些人物在我筆下表現出來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傳達給讀者的，我感覺自己在這方面算是成功的。法迪曼能體會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動萬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論了。聽到他的贊美，我發現自己竟然熱淚盈眶，這是我過去不曾有過的反應，畢竟能獲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許只有一次。

有關是否要推出本書的周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的意義和價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書中的每一個段落章節，我都不想更動。

開篇對英王愛德華七世（Edward VII）喪禮場景的描述可能是書中最為人熟知的情節，而后記中的最后一段替本書或應該說本書的主題，闡明了大戰對我們歷史的意義。雖然這么講可能不夠謙虛，但是這段文字足以媲美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概要。

除了法迪曼的贊賞，有“出版界《圣經》”之稱的《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也作出大膽驚人的預測，宣稱《八月炮火》將穩居整個冬季非虛構類暢銷排行榜的冠軍寶座。《出版人周刊》夸張得有點沖過頭，竟然下了這么奇怪的評語：“這本書將會讓龐大的美國讀者群對那屬于歷史忽略的一章的激情時刻產生一種狂熱……”我不會選擇“激情時刻”或“狂熱”這種字眼來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我也認為沒有理由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稱為“歷史忽略的一章”，因為你可以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書架上找到一長串與這個戰爭有關的書名。盡管如此，對于該刊由衷的歡迎，我還是覺得很高興。在寫作過程中我曾有過沮喪到寫不下去的時候，我對斯科特抱怨說：“有誰會看這本書啊？”他回答說：“至少有兩個人，你跟我。”這樣的回答實在說不上鼓勵，唯其如此，《出版人周刊》的評語更加讓我訝異，后來結果證明該刊的預測完全正確。《八月炮火》上市以來氣勢如虹，有如一匹脫韁的野馬，我把版稅收入和國外版權指定給我的三個女兒，她們已陸續收到不少支票。雖然她們三人平分下來可能金額不多，但是知道在出版26年后，本書還能吸引新的讀者的感覺真的很好。

現在新版本發行上市，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被介紹給新的一代讀者，希望這本書在走到其生命中年期時不會失去它原有的魅力，或者應該說是趣味吧！

巴巴拉·W. 塔奇曼

# 作者的話

本書之成，主要得感謝麥克米倫公司的塞西爾·斯科特先生。其忠告，其勉勵，其有關知識，對本書克底于成，始終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堅實可靠的支持。我還有幸取得丹寧·米勒（Denning Miller）先生的協作，他以推究入微的高見，為我澄清了寫作上、闡述上的許多問題，使本書得以改進良多。他的惠助，我將永志不忘。

我要感激紐約公共圖書館提供的非富資源；同時希望我出生的城市有朝一日能設法使圖書館給學者的方便，堪與它無比豐富的資料媲美。我也感謝紐約社會圖書館，殷勤備至，始終如一，為我看書大開方便之門，為我寫作提供安靜的環境；感謝斯坦福的胡佛圖書館的阿格尼絲·F. 彼得森（Agnes F. Peterson）夫人，惠借有關布里埃一地失守的《調查錄》，并應詢查明了許多疑點；感謝倫敦帝國戰爭博物館的R. E. B. 庫姆（R. E. B. Coombe）小姐，承她提供許多圖片說明；感謝巴黎當代國際文獻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承他們供給原始資料；還感謝美國軍械協會的亨利·薩克斯（Henry Sachs）先生，給我以技術指導并彌補了我德語的不足。

必須向讀者說明，奧匈、塞爾維亞、俄奧以及塞奧戰線，本書均略而未談，這并非完全出于主觀武斷。巴爾干半島問題了無窮盡，它自然而然地有別于這次大戰的其他問題。此外，奧地利戰線的行動在戰爭的第一個月中純屬準備性工作，其發展以及對整個戰事的影響直到對俄的倫貝格（Lemberg）戰役和對塞的德里納（Drina）戰役才達到高潮。而這兩役發生在9月8日至17日之間，超出了本書覆蓋的時間范圍。不把它們列入其中，我看倒也完整統一，包括進來反而會冗長生厭。

在終日埋首戰爭回憶錄一段時間后，我曾想摒棄不用羅馬數字番號，但結果是習慣勢力強大，勝過善良的意圖。這種數字，像同陸軍結下了不解之緣，分割不得，我只好徒喚奈何。[[1]](#_1__Yi_Wen_Zhong_Yi_Gai_Wei_Yong)然而，可以奉獻讀者一個有用的判別左右的法則：江河以面對下游的方向為準；軍隊，即使中途改換方向乃至向后撤退，仍視為面向其出發的方向，也就是其左其右始終不變。

本書的敘事所本和引文出處，都列于書末注釋。我竭力避免牽強附會以及歷史著作中像“拿破侖眺望著法國海岸線消失天際之時，他必然想起很久以前……”的那種“他必然如何如何”的文風。書中有關氣候狀況、思想感情，以及公眾輿情、個人見解，都有所本，凡屬必要之處，注釋中均有依據可循。

注釋

[[1]](#_1) 譯文中一概未用羅馬數字番號。——譯注

# 引子　葬禮

1910年5月的一個上午，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出殯，騎著馬在隊伍中前進的有九位帝王，多么宏偉的一個場面！穿著喪服，肅穆佇候的人群，都不禁驚嘆不已。這些君主，服色斑斕，嫣紅姹紫，寶藍翠綠，三騎一排聯轡出了重重宮門，在陽光照耀下，羽翎頭盔，金絲衣鑲，緋色綬帶，嵌著珠寶的勛章閃閃發光。他們后面是五位王儲，四十多位皇室貴胄，七位皇后——未亡人四，執政者三——以及為數不多的來自非帝制國家的特派大使。他們總共代表70個國家。王公貴族，達官顯貴，在類似場合云集一起，這是盛況空前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靈柩離開王宮時，議會塔尖沉悶的鐘聲報時九下，但在歷史的時鐘上則是日薄西山的時刻。舊世界的太陽正在西墜，雖日華燦燦，但已奄奄一息，行將一去不復返了。

前排居中一騎，是新登基的英王喬治五世，他左側是康諾特公爵（Duke of Connaught），故王唯一的在世兄弟，右面的一位人物，是《泰晤士報》認為“屬于所有前來吊唁的外國人士中的翹楚”，是一位“甚至在關系最緊張的時期，也從沒有失掉他在我們中間的聲望”的人物，他就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Ⅱ）。這位皇帝，騎著青灰馬，穿著嫣紅的英國陸軍元帥服，手執元帥杖，在他舉世聞名的翹胡子的臉上，顯現著一種“嚴肅甚至嚴酷”的神色。他百感叢生，心緒激動，思潮澎湃，波痕浪跡，在他的信中斑斑可見。在母后故居溫莎堡的寓所度過一夜之后，他寫信回去說：“這個地方，稱它為家，這個皇室，以它為族，我引以為榮。”他悲喜交集：和英國親戚在一起的這些黯然神傷的喪禮時日，使他不禁情意纏綿、懷舊思故；冠蓋云集，唯他獨尊，他又不禁倨傲自得，他舅父從歐洲舞臺上消失殞沒了，他更是感到個中的不盡滋味。他是前來埋葬他的心頭禍患愛德華的；威廉認為愛德華是策劃包圍德國的元兇；愛德華，他的這位舅父，是他既不能嚇倒，也無法討好的；他這位舅父的肥碩身軀，在德國和太陽之間投下了陰影。“他是個魔王，你們想象不到他是怎樣的一個魔王！”

對愛德華的這個論斷，是德皇1907年在柏林招待300名賓客的午宴上宣布的，是愛德華懷著昭然若揭的包圍德國的惡毒陰謀的一次大陸之行惹起的。愛德華在巴黎花了一周時間，從事煽動挑撥，并且莫名其妙地訪問了（同他侄女結婚不久的）西班牙國王；最后還訪問了意大利國王，顯然是想誘使他脫離跟德、奧的三國同盟。而這位德皇是全歐洲最口無遮攔的人，他登基以來的二十年間，每過一些時候總要發表一通議論，叫那些外交家們極度神經衰弱；這次，他越說越激動，收尾時又瘋狂地發表了這樣一通議論。

所幸，主張包圍他的這個人現在溘然長逝了，而接位的喬治（George），按德皇在葬禮前幾天對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說法，則是“一個聽話的小伙子”（四十五歲，比德皇小六歲）。“他是個道道地地的英國人，他恨所有的外國人，不過這在我倒并不介意，只要他對德國人不比對其他外國人更恨些就行。”威廉正躊躇滿志地同喬治并騎而行，經過他任名譽上校團長的第一皇家龍騎兵團的時候向團旗行著軍禮。有一次，他曾分送穿著龍騎兵軍服的本人照片，在他的簽名上面寫了一句詭秘莫測的話：“吾守吾時。”（I bide my time.）今天，他的時機到來了；他成了歐洲的至尊。

策馬跟在他后面的是寡后亞歷山德拉（Queen Alexandra）的兩個兄弟——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King Frederic of Denmark）和希臘國王喬治（King George of the Hellenes），她的侄兒挪威國王哈康（King Haakon of Norway），以及三位后來遜位的國王：西班牙的阿方索（Alfonso of Spain），葡萄牙的曼努埃爾（Manuel of Portugal）和纏著穆斯林絲頭巾的保加利亞國王費迪南德（King Ferdinand of Bulgaria）。費迪南德此人，自稱沙皇，并且在箱子里藏著從戲裝商人那里弄來的拜占庭大帝的全副王權標幟，以備有朝一日把拜占庭的版圖重集在他御杖之下的時候穿戴。這就使得和他同為九五之尊的其他君主不免耿耿于懷。

給那些為《泰晤士報》稱作“御轡執鞭，英姿颯爽的王孫公子”弄得眼花繚亂的觀眾，很少有人注意第九位國王，而他卻是他們中間后來立下豐功偉績，不失為頂天立地大丈夫的唯一王孫。雖然他極其魁偉軒昂，并且善于騎術，但是這位并不喜愛這種皇家禮儀浮華排場的比利時國王阿爾貝（Albert），在這行列里，總是顯得局促不安又心不在焉。這時候，他才三十五歲，登基僅一年。日后，他的容貌成了英雄主義和悲劇的象征而聞名于世，可仍然還是那副茫然若失的樣子，似若另有所思。

阿爾貝右側一騎，是老奧皇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f）的繼承人——奧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他高大肥碩，身著緊身胸衣，頭盔上綠色羽翎招展，是未來悲劇的根源。阿爾貝左側是永遠登不上王位的另一個王裔——優素福（Yussuf）王子，土耳其蘇丹的繼承人。繼帝王之后是皇室貴胄：日本天皇的兄弟伏見（Fushimi）親王；俄國沙皇的兄弟米哈伊爾（Michael）大公；意大利國王的兄弟，穿著天藍衣裳、戴著翠綠羽翎頭盔的奧斯塔（Aosta）公爵；瑞典國王的兄弟卡爾（Carl）親王；荷蘭女皇的丈夫亨利（Henry）親王；再就是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黑山的王儲們。最后一名是達尼洛（Danilo）親王，“一個和藹可親、俊秀非凡、舉止悅人的翩翩公子”，他并非徒有“風流寡婦情侶”之名，而是確實如是。他上一夜到達時伴同他一齊來的竟是一個“姿色傾城、艷麗嫵媚的妙齡淑女”，他向人介紹說是他夫人的一個侍女，到倫敦來采購一些東西的。英國官吏無不為之目瞪口呆。

再后面是一隊德國的次等皇族：梅克倫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瓦爾代克―皮爾蒙特（Waldeck-Pyrmont）、薩克森―科堡―哥達（SaxeCoburg Gotha）的大公們，薩克森（Saxony）、黑森（Hesse）、符騰堡（Württemberg）、巴登（Baden）和巴伐利亞（Bavaria）的大公們。最后的這位大公——魯普雷希特（Rupprecht）王儲，不久就將率領一支德軍轉戰沙場。此外有暹羅的一個親王，波斯的一個親王，前法國奧爾良皇族的五個親王，戴著金流蘇土耳其帽的埃及總督的兄弟，穿著淺藍繡花長袍、其古老王朝只剩兩年壽命的中國載濤親王，還有代表德國海軍的海軍總司令、德皇兄弟、普魯士的亨利親王。在這絢麗壯觀的行列中有三個穿著便裝的人士：瑞士的加斯東―卡蘭（Gaston-Carlin）先生，法國外交部長畢盛（Pichon）先生，以及美國的特使、前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愛德華，這個各國首腦盛況空前地為之云集的人物，素有“歐洲之伯”的尊稱。從歐洲統治家族這方面來說，這個頭銜可說是名副其實的。他不僅是德皇威廉的舅父，而且由于其妻的姊妹俄國瑪麗皇太后的關系，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姨父。他的侄女亞歷山德拉是沙皇的皇后；他女兒莫德是挪威的王后；另一個侄女埃納是西班牙的王后；第三個侄女瑪麗，也即將成為羅馬尼亞的王后。他妻后的王族，除據有丹麥王位外，還為俄國生養了沙皇，為希臘和挪威提供了國王。其他的親戚，維多利亞女王子女九人各支的后裔，則充斥歐洲宮廷。

他駕崩后，前來哀悼吊唁者勢如潮涌，非始料所及。這不僅出于家族之情，也不在于他的突然逝世，噩耗頓傳——公眾知道他只病了一天，第二天就與世長辭了。事實上，這反映了他的善于結交。他縱橫捭闔，對國家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在位短短九年期間，英國的“光榮孤立”，在壓力之下業已放棄，讓位于同兩個宿敵法國和俄國以及一個正在崛起的新強國日本達成的一系列“諒解”和友好關系；雖然英國不喜歡對事情過于肯定，同它們并不是真正的結盟，但結果是均勢為之改變，波及整個世界，且影響了各國之間的關系。愛德華既不創立也不左右英國的政策，但政策之得以改變，他個人的外交手腕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童年被帶往法國訪問時，曾對拿破侖三世說：“您有一個美麗的國家，我愿做您的兒子。”他的偏愛法國事物，同他母后的偏愛德國事物顯然是志趣殊異，但也可能是對她的分庭抗禮。他的這種偏愛，歷久不變，在他母后崩殂后且付諸行動。德國1900年的海軍計劃，對英國包藏挑釁之心，英國日益惴惴不安，于是決心彌合跟法國的舊隙，愛德華的魅力為此鋪平了道路。1903年，他不顧進行正式國事訪問將會遭到冷遇的忠告，徑往巴黎。到達時，群眾面帶慍色，默不作聲，有人還奚落性地叫喊了幾聲“布爾人萬歲！”和“法紹達[[1]](#_1__Fa_Shao_Da__Fashoda__Su_Dan)萬歲！”但這位國王毫不介意。憂心忡忡的副官嘟囔著說：“法國人不喜歡我們。”他回答說：“憑什么他們該喜歡我們？”他繼續從馬車上向群眾點頭微笑。

他拋頭露面四天。在萬森檢閱了軍隊，在隆尚觀看了賽馬，參加了歌劇院的特別演出盛會，出席了愛麗舍宮的國宴和外交部的午餐會。他在劇院幕間休息時間同觀眾打成一片，并在休息室里向一位著名的女演員用法語表示祝賀，使冷漠的氣氛化為笑臉相迎。他所到之處都發表演說，講得謙和有禮，機智圓通。他談論著對法國人，對他們的“光榮傳統”，對他們的“美麗城市”的情誼和仰慕。他表白說“很多愉快的記憶加深了”他對這些方面的眷戀之情，而他對這次訪問的“由衷喜悅”，他對舊隙的“欣然冰釋，不復介懷”，對法英的彼此繁榮、唇齒相依的深信不疑，以及對兩國的友好在他的心目中“常居首要地位”的信心，也無不增強了他的這種眷戀之情。他離開巴黎時，群眾山呼“吾王萬歲！”。一個比利時外交官報告說：“這個國家所出現的這種180度的態度轉變是少見的。他贏得了所有法國人的心。”德國大使認為英王的訪問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認為英法的言歸于好是出于一種“對德國的普遍反感”。不出一年，經過排難解紛的大臣、部長們的艱苦努力，重新和好終于變成了《英法協約》，并于1904年4月簽字生效。

倘不是德國領導人懷疑英國動機不正，先于1899年，繼之又于1901年斷然拒絕了英國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的建議，德國本也可以跟英國締結一份協約的。至于他們懷疑英國什么，這不論是幕后操縱德國對外事務的影子人物荷爾斯泰因（Holstein），或是風度翩翩、博學宏通的首相比洛（Bülow）親王，或是德皇本人，都頭緒不清；但是，他們都肯定其中必有奸詐。德皇又總是希望在既能到手而看來又似無心于此的情況下同英國達成協議。一次，在參加維多利亞女王葬禮時，在英國環境和家族情誼的感召之下，他曾情不自禁地向愛德華傾吐了他的這種心愿。“沒有我們的首肯，在歐洲一只耗子也不能亂動一下”，他就是這樣設想英德同盟的。可是，英國人一表示有意的時候，他和大臣們又立即改變主意，懷疑其中有什么陰謀詭計。他們擔心在會議桌上為人所乘，寧愿干脆避而遠之，而憑借日益強大的海軍來嚇唬英國人就范。

俾斯麥（Bismarck）曾告誡德國要以陸上力量為滿足，但是他的那些繼承人，不論就他們個人或是就整體而言，都不能與俾斯麥相提并論。俾斯麥所追求的目標，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而他們則海闊天空到處伸手，究竟想要什么又無定見。荷爾斯泰因是個馬基雅維里[[2]](#_2__Ma_Ji_Ya_Wei_Li__Machiavelli)式的人物，沒有一定的政策，賴以行事的唯一原則是懷疑一切。比洛則根本沒有什么原則；他非常油滑，他的同僚蒂爾皮茨（Tirpitz）海軍上將曾為他哀嘆，說泥鰍比起他來還不過是條水蛭。而鋒芒畢露、反復無常、一貫見異思遷的德皇，則是一時一個目標，玩弄外交手腕，猶如搞永恒運動的練習。

他們誰都不信英國會和法國和解，所有有關的警告，荷爾斯泰因全都置之不理，斥之為“幼稚”，甚至對于他派駐倫敦的使節埃克哈德斯泰因（Eckhardstein）男爵明確不過的警告也是如此。1902年，在莫爾伯勒大廈的一次宴會上，埃克哈德斯泰因曾注意到法國大使保羅·康邦（Paul Cambon）和約瑟夫·張伯倫消失在彈子房里，他們在里面興致勃勃地交談了28分鐘之久。他所能偶爾聽到的只是“埃及”和“摩洛哥”這幾個詞（這位男爵的回憶錄中沒有說明彈子房的門是開著的，還是他從鑰匙孔里竊聽到的）。后來，他奉召去英王書齋，愛德華敬他一支1888年的厄普曼雪茄，告訴他英國即將同法國達成一項解決所有殖民地爭端的協約。

協約成了事實，威廉怒不可遏。這里面，使他更為撕心裂肺的是愛德華在巴黎的勝利的舊痛。這位向以出行頻繁著稱的“旅游皇帝”，對儀式隆重地進入外國首都，常甘之如飴，可是他最向往的巴黎卻可望而不可即。他走遍各地，甚至去過耶路撒冷，在那里，為了讓他騎馬入城，曾不得不砍削雅法城門；然而巴黎，這個無美不備，無不令人神往，柏林無一可與之同日而語的中心，他卻始終不得其門而入。他想享受巴黎人的歡呼，他想獲得法國榮譽勛章，他曾兩次讓法國知道他的這個心愿，但邀請久盼不至。他可以到阿爾薩斯發表演說，頌揚1870年的勝利；他可以率領游行隊伍穿過洛林（Lorraine）的梅斯（Metz）；可是這位德皇活了八十二歲，至死也沒有看到巴黎，這也許是帝王命運中最為辛酸的一個史話。

對于立國較久的國家懷有嫉妒，這種心情咬嚙著他。他向西奧多·羅斯福埋怨英國的達官顯貴，說他們訪問歐陸時從不光臨柏林，而老是前往巴黎。他感到不為人所賞識。“我在位多少年以來，”他對意大利國王說，“我的同仁們，歐洲的那些君主，總是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要不了多久，有我偉大的海軍做后盾，我的話就會有人洗耳恭聽了。”這樣的情緒，遍及他的整個國家。他們同他們的皇上一樣，全都迫切需要得到認可。他們血氣方剛，野心勃勃，他們意識到自己實力的強大，他們是尼采和特賴奇克[[3]](#_3__Te_Lai_Qi_Ke__Heinrich_Gotth)之道哺育起來的。因而，他們認為理應稱王稱霸，他們感到為人所負，世界沒有承認他們為盟主。軍國主義的發言人弗里德里希·馮·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寫道：“我們必須在整個地球上為德國的民族性和德國的精神贏得崇敬，這是我們應得的……可是迄今未給我們。”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他直言不諱，只容許采用一種辦法；從德皇以降的一些小伯恩哈迪們，于是力圖使用威脅和顯示力量的辦法來取得他們夢寐以求的尊敬。他們揮著“包著鐵甲的拳頭”，要求獲得“日光下的地盤”，他們歌頌“鐵與血”和“閃閃發光的甲胄”，宣揚刀劍的功德。羅斯福先生當時關于跟鄰國和諧相處的格言已被條頓化為“提高嗓門，揮舞大槍”。當德國人揮舞大槍，當德皇吩咐軍隊為義和團之亂開往中國像阿提拉率領的匈人（Huns of Attila）那樣行事（把匈人作為德國人的榜樣是他自己選擇的），當泛德意志同盟和海軍聯盟紛紛建立，集會要求別國承認它們擴張的“合理訴求”時，別的國家便以結盟相報了；而當這些國家結成同盟的時候，德國便嚎叫“這是包圍”！“全德國被包圍啦”這句副歌給咬牙切齒地唱了整整十年。

愛德華的出國訪問照常行事，去羅馬，去維也納，去里斯本，去馬德里，且不僅限于拜訪王室。他每年都去馬林巴德（Marienbad）溫泉療養，并在那里與“法國之虎”[[4]](#_4__Zhi_Wai_Hao__Lao_Hu__De_Fa_G)交談，互抒己見。此人與他同庚，在他在位期間任總理四年。愛德華生平有兩個癖好，一尚衣著得體，一愛與異端為伍。但他不計較前一個癖好而敬仰克列孟梭（Clemenceau）先生。這位“老虎”跟拿破侖所見略同，認為普魯士是“炮彈里孵出來的”，并且看到這個炮彈正迎面飛來。“德國貪求權力……已把消滅法國作為定策”是他的主導思想，在這種思想的籠罩下，他運籌帷幄，縱橫捭闔。他對愛德華說，有朝一日法國需要幫助的時候，靠英國的海上力量是不夠的，他提請愛德華注意，拿破侖是在滑鐵盧被打敗的，而不是在特拉法爾加角（Trafalgar）受挫。

1908年，愛德華乘御用游艇去雷維爾[[5]](#_5__Lei_Wei_Er__Reval__Xian_Ming)作國事訪問，會見沙皇，英國臣民不以為然。英國的帝國派認為俄國是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宿敵，新近又是虎視印度的覬覦者；而在自由黨和工黨看來，俄國是鞭笞苛刑、屠殺猶太人和1905年大批殘殺革命黨人之鄉。至于沙皇，按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先生的說法，則是個“殺人犯”。這種厭惡是相互的。俄國人痛惡英國同日本結盟，憎恨它是使俄國對君士坦丁堡和海峽地區歷史性的覬覦不能得逞的列強。尼古拉二世一次曾把他最樂道的兩個偏見并為簡單的一句話：“英國人是猶太人。”

但是，舊的敵對情緒畢竟沒有新的壓力那么強烈。同時法國人也殷切希望他們的兩個盟國能言歸于好，就在法國的敦促下，雙方于1907年締結了《英俄協定》。愛德華認為，為了去除可能還縈回腦際的疑念，進行王室的個人友好接觸事屬必要，于是登舟前往雷維爾。他同俄國外交大臣伊茲沃利斯基（Isvolsky）進行了長談，同皇后在《風流寡婦》（Merry Widow）的舞曲旋律中跳起了華爾茲舞，收效之大，居然使她嫣然一笑。自這位郁郁寡歡的婦人戴上羅曼諾夫王朝的王冠以來，完成這一成就的，他還是第一人。這個成就，看起來仿佛微不足道，其實不然。沙皇治理俄國，雖很難說是名實相符，但他畢竟一面統治國家，儼然是一個專制君主，一面卻受制于他那才識淺薄但意志堅強的老婆。她美麗，她歇斯底里，她病態性地多疑，她憎惡每個人，只有直系親屬和一群癲狂怪誕的江湖騙子除外，這些騙子撫慰著她絕望的心靈。而這位沙皇既天稟不厚，又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在德皇看來，他“只配住在鄉下草房子里種種蘿卜”。

德皇認為這位沙皇屬于他的影響范圍，企圖施用妙計，誘使他脫離與法國的同盟。這個同盟原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的。威廉把俾斯麥的準則“與俄國為友”以及貫徹這個準則的《再保險條約》（Reinsurance Treaty），連同俾斯麥一并拋到九霄云外，鑄成了他在位期間第一個也是最糟糕的大錯。昔日的那個魁偉而嚴峻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立即改弦易轍，于1892年同共和政體的法國結成了同盟，甚至不惜對《馬賽曲》肅立致敬。而且，他很瞧不起威廉，認為他是個“沒有教養的家伙”，同他談話時也總是把臉別向一旁。自尼古拉登基以來，威廉一直想設法彌補他所鑄成的大錯，他給這位年輕的沙皇（用英文）寫了許多封長信，有忠告，有閑談，有政治性的長篇大論，稱他為“最親愛的尼基”，自己則署名“你親愛的朋友威利”。他對沙皇說，一個玷污著幾位君主鮮血的、漠視宗教的共和國不適合做他的伙伴。“尼基，請您相信我，上帝的詛咒已叫那個民族萬世遭劫。”威利還對他說，尼基您的真正的利害關系在于締結三皇同盟，即俄、奧、德三國皇帝的同盟。老沙皇冷淡輕蔑的態度他記憶猶新，然而，他又不禁居高臨下地關懷老沙皇的兒子。他會拍拍尼古拉的肩膀對他說：“我對您的忠告是多發表演說，多舉行閱兵，多多演說，多多閱兵。”他表示愿意派遣德國軍隊去保護他，防范亂臣賊子。可是他的這個建議卻激怒了沙皇皇后。她憎恨威廉，每互訪一次，她就多恨他三分。

在這樣的情況下，德皇沒有得逞，沒有能使俄國斷絕同法國的關系。他于是擬了一個巧妙的條約，約定俄德雙方在一方受到攻擊時有義務相互支持。這項條約在沙皇簽字以后要通知法國，并邀請法國參加。德皇是在俄國同日本作戰慘敗（他曾竭力慫恿俄國與日本開戰），繼而革命興起，沙皇政權處于最低潮之時，邀請尼古拉在芬蘭灣的比約克島（Björkö），在沒有大臣隨從之下進行秘密會談的。德皇非常清楚，俄國不可能接受他的條約而不背盟失信于法國；但是，他認為，只消雙方君主簽字，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尼古拉簽了字。

威廉欣喜若狂。他彌補了致命的失誤，使德國的后門安全牢靠了，包圍圈打破了。他寫信給比洛說，“我熱淚盈眶”，他深信他的祖父（威廉一世，臨終時猶嘀咕著兩線作戰問題）正從天國注視著他。他認為他的這份條約是德國外交上的一個杰作。要不是存在權限問題的缺陷，這倒確實是或者本可以成為一個杰作的。沙皇將條約帶回俄國，大臣們一看之下驚恐萬狀，向他剖析指出，在一場可能爆發的戰事中承諾參加德方，那他就拋棄了與法國的同盟，這個細節，“無疑是在威廉皇帝口若懸河、巧舌如簧的情形下，逃過了陛下的注意”。于是這份《比約克條約》只不過曇花一現，就壽終正寢了。

現在是愛德華到雷維爾來同沙皇親切交談了。關于他們會晤的情況，德國大使報稱愛德華真正有心和平。德皇閱后，不禁怒氣沖沖地在頁邊揮筆批道：“這是謊言，他要的是戰爭。但是我得發動戰爭，好讓他不致沾有臭名。”

這一年終了時，德皇發表了他生平最具有爆炸性、最為失檢的談話。他接見了《每日電訊報》記者，談了他當時對于誰將同誰打仗的見解。這一次可不僅使得他的一些鄰國神經緊張，也弄得他自己的國人坐立不安。公眾的非難直言不諱，以致德皇臥床不起，一病三個星期，而且在以后一段時間里也比較寡言慎行了。

此后沒有爆發什么新的驚人事件。那十年中的最后兩年是最太平的兩年。歐洲享受著午后的悠閑，富足安樂。1910年是平靜的，繁榮的。摩洛哥的第二輪危機和巴爾干戰爭還沒有到來。諾曼·安吉爾[[6]](#_6__Nuo_Man__An_Ji_Er__Norman_An)的一本新著《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剛剛出版，它力圖證明戰爭已經變得徒勞。他以令人信服的例證和顛撲不破的立論，說明在當時各國財政經濟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勝者和敗者都將同樣遭殃，所以，戰爭已無利可圖；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發動一場戰爭。這本書經譯成十一國文字，成了崇拜的偶像。在曼徹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工業城市的一些大學，忠實信徒組織了四十多個研究小組，致力于宣傳該書的教義。安吉爾的一位最熱忱的門徒是伊舍（Esher）子爵，一個對軍事政策頗具影響的人物，英王的朋友和顧問，陸軍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受命對布爾戰爭中作戰受挫后的英國陸軍進行改造。這位勛爵在劍橋大學和巴黎大學講授《大幻想》，他在那里闡明“新的經濟因素一清二楚地證明侵略戰爭是荒唐愚蠢的”。他說，一場20世紀的戰爭，其規模之大當使“商業遭劫，財政崩潰，人民遭殃”。這些不可避免的后果，將“包含著克制力量”，使戰爭毫無可能。他在總參謀長約翰·弗倫奇爵士任主席的三軍俱樂部里，向聽講的軍官們說，由于各國利害關系相互交織，戰爭“已成為日益困難和不可能的了”。

至于德國，伊舍勛爵很有把握地說，“是和大不列顛同樣接受諾曼·安吉爾的學說的”。他曾奉贈給德皇和王儲幾本《大幻想》，或者是他設法給他們的，但不論怎樣，他們對學說的接受程度如何，則無報道。也沒有證據可資說明他也曾贈送馮·伯恩哈迪將軍一本。這位將軍在1910年正埋首寫作《德國與下一次戰爭》（Germany and the Next War），該書于第二年出版，和安吉爾的書具有同樣巨大的影響，不過是出自相反的觀點。“發動戰爭的權利”、“發動戰爭的義務”和“或為世界強權，或是沒落”，這三章的標題概括了全書的論點。

伯恩哈迪，1870年是個年方二十一歲的騎兵軍官，是德軍進入巴黎時第一個乘騎突入凱旋門的德國人。自此以后，軍旗和榮譽，已不再像他在另一章“德國的歷史使命”中所運用的有關戰爭的理論、哲學和科學那樣使他感興趣了。他曾任總參謀部軍事史部門的負責人，是這個苦思苦干的組織中的智囊之一，是一部關于騎兵的經典著作的作者。爾后，他集畢生精力從事研究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特賴奇克和達爾文，并將研究所得傾注到后來使他的名字等同戰神的這本書里。

他說，戰爭“是生物的需要”，戰爭是“自然界一切法則所依存的自然法則亦即生存競爭法則”在人類社會的體現。他說，各個國家，不是發展就是衰退，“不可能有靜止狀態”。德國必須選擇，“或為世界強權，或是沒落”。在各國之中，德國“在社會政治方面，居所有文明進步國家之冠”；但是，它卻“被擠壓在狹窄的、非自然的境域之內”。沒有日益強大的政治權力，沒有一個擴大的勢力范圍，沒有新的領土，它就不可能達到它的“偉大的道義目的”。這種權力的增強“是同我們的重要性相稱的”，“是我們有權要求的”，是一種“政治需要”和“國家的首要任務”。他宣稱，“凡我們現在所希望達到的，均必須力爭”，他自己把“力爭”二字寫成斜體字。由此，他馳筆歸結：“征服遂成為一條必要的法則（a law of necessity）。”

既證明了“必要”（這是德國軍事思想家愛用的詞兒），伯恩哈迪便進而談論手段問題。發動戰爭的義務一經確認下來，使戰爭勝利這第二項義務便隨之而來了。而要取得勝利，一個國家必須在它自己選擇的“最有利時刻”發動戰爭；它有“公認的權利……掌握發揮這種主動性的可貴特權”。進攻戰于是成了另一個“必要”，再一個結論也就免不了是：“采取攻勢和打出第一槍，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德皇對于附在侵略者身上的“臭名”還有所顧忌，伯恩哈迪則毫無此感，并且在這一槍將打向何處的問題上，也毫不閃爍其詞。他寫道，以為德、法總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它們的問題的想法，是“不可思議的”。“法國必須化為齏粉，使它再也不能越我雷池一步”；“必須予以毀滅性的打擊，使之永不復為列強”。

愛德華國王未能看到伯恩哈迪的這本書就逝世了。1910年1月，在前往馬林巴德溫泉和比亞里茨（Biarritz）以前，他向德皇致以一年一度的生日祝賀，并送了他一根手杖作為賀儀。幾個月后他逝世了。

伊茲沃利斯基得此噩耗，便說：“我們失去了我們外交政策的支柱。”這可說得過分了些。對于形成新的聯盟格局，愛德華不過是一個工具，而不是一個建筑師。在法國，據《費加羅報》的報道，英王逝世引起了“深切的哀痛”和“真心的惶恐不安”。該報說，巴黎失去了一位“偉大的朋友”，像倫敦一樣感到深切悲痛。和平大街的燈柱和店家的櫥窗，同倫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樣披著黑紗；馬車夫在鞭子上都系著黑縐紗蝴蝶結；甚至在外省城鎮，也像悼念法國的偉大公民逝世一樣，可以看到掛著黑紗的英國故王相片。在東京，不忘英日同盟之功，家家戶戶掛著兩國國旗，在旗桿上纏著黑紗。在德國，不論感情如何，是按常規辦事的。陸、海軍全體軍官奉命服喪八天，在領海內的艦隊鳴炮致哀并下半旗，帝國國會全體肅立諦聽議長宣讀唁電，德皇親自去英國大使館吊唁，拜會了大使，歷時一小時又半。

在倫敦，王室在英王逝世后的整個一周里都忙著在維多利亞車站迎接前來的王公貴族。德皇是乘坐“霍亨索倫”號（Hohenzollern）游艇，在四艘英國驅逐艦護送下前來的。他將船停泊在泰晤士河口，到倫敦的最后一段路程改乘了火車，同一般的王公貴族一樣來到維多利亞車站。月臺上鋪著紫紅地毯，在停放他乘坐的馬車的地方還放著紫紅地毯覆蓋的踏腳。鐘報正午，火車入站，德皇為人熟悉的身軀走下車來，受到他表弟英王喬治的歡迎，他吻了喬治的雙頰。午飯后，他們一齊來到停放愛德華遺體供人瞻仰的威斯敏斯特大廳。上一夜的雷暴雨和整個早晨的傾盆大雨，沒有阻礙得了愛德華的子民們成群結隊肅穆耐心地等待著穿過大廳。這一天是5月19日，星期四，隊伍綿延，長達五英里。這一天，地球合該通過哈雷彗星的尾部。彗星的出現，總叫人想起歷來是災難的預兆——它不是曾預兆過諾曼人的征服嗎——并使報界感慨系之，文藝欄的編輯們刊印了《尤利烏斯·愷撒》中的詩句：

乞丐死了的時候，天上不會有彗星出現；

君主們的凋殞才會上感天象。

寬敞的大廳里，停放著靈床，一片莊嚴肅穆。靈床周圍擺著王冠、王徽和御杖。靈床四角由四個軍官守護著，他們來自帝國不同的部隊，按傳統致哀儀態站在那里，低著頭，戴著白手套，兩手相交按在劍柄上。德皇以同是帝王的切身興趣注意著帝王殯殮的全部禮儀。他印象深刻，多少年后，對這“令人嘆為觀止的中世紀情景”的場面，猶能一一道其細節。他看到狹長的哥特式的窗戶透進來的一道道陽光使王冠上的珠寶光芒四射；他觀察著靈床四角警衛的換崗儀式，四個新警衛舉著劍正步走來，到達崗位的時候將劍頭掉轉向下，換崗下來的警衛則緩慢而又悄悄地從隱在暗處看不見的出口處消失了。他將紫白兩色的花圈放在靈柩上，隨即同英王喬治跪下默默祈禱。他站起身來，緊緊抓住這位表弟的手，有力而深表同情地握著。這個姿態，得到廣泛的報道，博得了很好的評價。

他在公開場合，舉止得體，無懈可擊；但在私下，見到玩弄新陰謀有機可乘時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當英王在白金漢宮設宴招待前來吊唁的70位王公貴族和特使時，他在宴會上老是纏著法國的畢盛先生談個不休，并向他提出一旦德國在一場沖突中處于同英國對立的地位，法國就該支持德國。鑒于當時的場合和地點，這位皇上新發作的這次心血來潮，引起了和以往同樣無謂的紛擾。前此，英國那位被同樣糾纏過的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Edward Grey）爵士曾一度深有感觸地說過：“別的君主們要安靜得多。”德皇后來矢口否認，說他根本沒有講過這類話。他聲稱只談了摩洛哥問題和“其他一些政治問題”。畢盛先生也小心策略地說德皇當時的言語是“友善的、溫和的”。

第二天上午，在置身送葬行列不能開口的當兒，威廉的舉止堪為楷模。他緊勒韁繩，走在喬治國王一肩之后。他在這次葬禮的專訪記者柯南·道爾眼中，顯得“如此崇高，要是英國今天再不把他摟回自己的懷抱，就不免有損于它固有的仁慈之心”。送葬隊伍到了威斯敏斯特大廳，他第一個跳下馬來，在亞歷山德拉王后的馬車走近的時刻，“他奔向車門，敏捷非常，趕在王室侍從前面到了”，不過看到王后正準備從另一邊下車。威廉又矯捷如燕，轉奔過去，仍然趕在侍從前面第一個到達車門，伸手把這位寡后攙扶下來。他吻著她，充滿著外甥痛傷舅父的悲痛激情。幸好喬治國王這時趕來為他母后解圍，親自護送了她。她之嫌惡德皇，既出于對他本人的憎恨，也為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緣故。盡管德國奪取丹麥那些公國的時候，德皇年僅八歲，但她從沒有饒恕過他和他的國家。當她的兒子1890年訪問柏林被授予普魯士某團名譽上校團長的時候，她寫信給他說：“這樣吾兒喬治就成了一個活生生的穿著令人作嘔的藍軍服，戴著尖頂頭盔的德國兵了！！！唉！我從沒有想到我活著的時候竟看到這個！但是，不要介意……這是你的不幸，而不是你的過錯。”

鼓聲低沉，笛聲泣訴，靈柩裹著王旗，由二十名身穿藍衫、頭戴草帽的水兵抬出大廳。陽光下突然閃爍著一片劍光，騎兵在立正致敬。四聲刺耳的哨音信號一發，水兵將靈柩抬上紫、紅、白間飾的炮車。兩面是密層層黑壓壓的人群，鴉雀無聲；阻攔人群的擲彈兵禁衛團警戒線，紋絲未動。送葬的行列就在這兩堵紅墻似的警戒線之間徐徐前移。倫敦從沒有這樣傾城傾巷，從沒有這樣萬籟俱寂。靈車由皇家馬拉炮兵曳著，伴隨靈車和在車后走著的是已故陛下的六十三名侍從副官，不是陸軍上校就是海軍上校，并且全部都是貴族，其中有五位公爵、四位侯爵和十三位伯爵。英國的三位陸軍元帥——基欽納（Kitchener）勛爵、羅伯茨（Roberts）勛爵和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爵士并騎前行。他們后面是六位海軍元帥，再后是獨自一人行走著的約翰·費希爾（John Fisher）爵士——前任第一海務大臣，愛德華的摯友，此人不僅脾氣急躁，性情怪僻，而且有著一副非英國人所有的那種官氣十足而古怪的面孔。來自各方面的著名部隊的特遣隊，云集一起，有科爾德斯特里姆禁衛團、戈登高地人團、王室騎兵團和一般騎兵團、禁衛騎兵團、槍騎兵和皇家燧發槍團，有愛德華曾任名譽官長的德國、俄國、奧國顯赫的輕騎兵和龍騎兵及其他國家的騎兵部隊，還有德國海軍的將軍們——這個軍事場面，在一些不以為然的觀眾看來，對于一個有“和平締造者”之稱的人的葬禮來說，未免過于龐大了。

故王的坐騎，由兩個馬夫牽著，鞍在人不在，馬鐙上馬靴倒置；故王的鬃毛獵犬愷撒躑躅在后面，更增添了睹物思人的傷感。后面走來的是英國的盛大隊伍：穿著中世紀紋章戰袍的傳令官們，銀杖侍從，白官仗侍從隊，王室侍從武官，蘇格蘭弓箭衛隊，假發黑袍的法官們，深紅法衣的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紫色長袍的主教們，黑絲絨禮帽和伊麗莎白式飾邊衣領的王室衛隊，以及一隊隨行的號手。接著就是帝王的隊伍。他們后面是一輛玻璃車廂的馬車，載著新寡的王后和她的姊妹俄國皇太后，再后是十二輛馬車，載著各國的王后、貴婦以及東方各國的王公顯貴。

沿著白廳、林蔭大街、皮卡迪利大街和海德公園一直到帕丁頓火車站——遺體要從那里用火車送往溫莎安葬——長長的出殯隊伍緩緩而行。皇家禁衛騎兵的樂隊奏著《掃羅王》清唱劇中的送葬曲。人們在哀樂聲中緩慢前進，感到曲終永訣的肅穆。葬禮之后，伊舍勛爵在日記中寫道：“如此煙消云散，前所未有，所有指示我們生活航向的老航標似乎都被席卷而去了。”

注釋

[[1]](#_1_1) 法紹達（Fashoda），蘇丹地名，位于白尼羅河左岸，現名科多克（Kodok），1898年英、法兩國為爭奪非洲殖民地在此發生沖突。——譯注

[[2]](#_2) 馬基雅維里（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兼歷史學家；馬基雅維里式是指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譯注

[[3]](#_3) 特賴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1834—1896），德國歷史學家和政論家，普魯士學派著名成員之一，曾任柏林大學等校教授，著有《19世紀德國史》等。1886年起成為普魯士史官。反對社會主義，鼓吹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力主對外擴張。——譯注

[[4]](#_4) 指外號“老虎”的法國總理克列孟梭。——譯注

[[5]](#_5) 雷維爾（Reval），現名塔林，愛沙尼亞共和國首都。——譯注

[[6]](#_6) 諾曼·安吉爾（Norman Angell，1872—1967），英國人，經濟學家、和平主義者、新聞工作者和作家。曾任倫敦《每日郵報》巴黎版總編輯（1905—1912）、《外交事務》編輯（1928—1931）、工黨議員（1929—1931），193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譯注

Accounts of the funeral, besides those in the daily press and in memoirs of the period, appear in The Queen, The Sphere, and The Graphic for May 21, 1910; “The Meeting of Nine Kings” by William Bayard Hale in World's Work for July 1910; “An Impression of the King's Funeral” by Mary King Waddington in Scribner's for October 1910; Theodore Roosevelt to David Grey, October 5, 1911, Letters, ed. E. E. Morison (Harvard U.P., 1951–54), VII, 409–13.

“嚴肅甚至嚴酷”：The Times, May 21, 1910.

“這個地方，稱它為家”：to Bülow, qtd. Ludwig, 427.

“他是個魔王”：Zedlitz-Trützschler, 177–8. The German press also represented Edward's tour as “having the sole object of forming an alliance against Germany.” Lascelles to Grey, April 19, 1907, BD, VI, No. 15.

“一個聽話的小伙子”：Roosevelt to Trevelyan, October 1, 1911, Letters, VII, 397.

“吾守吾時”：Lee, I, 477–8.

保加利亞國王費迪南德引起其他君主耿耿于懷：Roosevelt to Grey, op. cit., 409–10. His Byzantine regalia: Sazonov, 230.

達尼洛親王和他的女伴：Cust, 111, 249.

“您有一個美麗的國家”：qtd. Maurois, 44.

英王愛德華的巴黎之行及比利時和德國外交官的報告：Lee, II, 241–2.

“一只耗子也不能亂動一下”：Lee, II, 11.

泥鰍比起比洛來還不過是條水蛭：qtd. Maurois, 177.

荷爾斯泰因將警告斥為“幼稚”：Eckhardstein, 249.

埃克哈德斯泰因偶然聽到的對話：ibid., 230.

德皇渴望受邀訪問巴黎：Paléologue, Un Prélude, 494–5.

德皇向西奧多·羅斯福埋怨英國的達官顯貴：Roosevelt to Trevelyan, Letters, VII, 396.

對意大利國王：Bülow, II, 355; Benson, 248.

伯恩哈迪：“我們必須……”：Bernhardi, 81.

阿提拉率領的匈人：Bülow, I, 418.

“合理訴求”：Hans Delbruck,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Germany's leading military historian, qtd. 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119–22.

“全德國被包圍啦”：Neue Freie Presse, April 15, 1907, qtd. Lee, II, 542.

克列孟梭稱“德國貪求權力”：qtd. Bruun, 116.

克列孟梭與愛德華的交談：Goschen to Grey, August 29, 1908, BD, VI, No. 100; Steed, I, 287.

沙皇是個“殺人犯”：Lee, II, 587.

“英國人是猶太人”：Witte, 189.

愛德華與俄國皇后跳華爾茲：Fisher, Memories, 234.

沙皇“只配住在鄉下草房子里種種蘿卜”：The Kaiser expressed this opinion to the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Lord Lansdowne, at Queen Victoria's funeral, qtd. Newton, 199.

“沒有教養的家伙”：Benson, 45.

“尼基，請您相信我”：October 25, 1895, Willy-Nicky Letters, 23.

“多多演說，多多閱兵”：Botkin, 103.

這個細節“逃過了陛下的注意”：qtd. Ludwig, 263.

“這是謊言，他要的是戰爭”：qtd. Maurois, 256.

德皇臥床不起：Crown Prince, 98–100.

伊舍子爵講授《大幻想》：“Modern War and Peace” and “La guerre et la paix” in Esher, Essays, 211–28 and 229–61.

德國“同樣接受”《大幻想》的學說：bid., 224. Esher gave copies to the Kaiser, ibid., 55.

伯恩哈迪第一個突入凱旋門：Hindenburg, 59. Quotations for Bernhardi's book are from Chapters I, II, IV, V, IX, and X.

愛德華國王逝世：quotations from Isvolsky and Le Figaro and details of mourning in Paris, Tokyo, and Berlin are from The Times, May 8, 1910.

德皇到達維多利亞車站：The Times, May 20, 1910.

德皇對愛德華的殯殮禮儀印象深刻：Kaiser's Memoirs, 129.

德皇向畢盛提出法國應支持德國：Arthur, George V, 125.

“別的君主們要安靜得多”：Trevelyan, 172.

德皇否認與畢盛的談話：Kaiser's Memoirs, 131.

“友善的、溫和的”：The Times, May 21, 1910.

柯南·道爾的記述：ibid.

亞歷山德拉王后嫌惡德皇：Arthur, George V, 126. Her letter to George: Nicolson, George V, 40.

“如此煙消云散，前所未有”：Esher, Journals, III, 4.

# 第一部分　計劃

## 第1章　“讓右翼末梢袖拂海峽”

1891年至1906年期間的德國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跟所有的德國軍官一樣，是深受克勞塞維茨“法國的心窩在巴黎和布魯塞爾之間”這一訓示熏陶的。但這句名言令人掃興。它指引的那條路，由于比利時的中立，是條涉足不得的禁途。何況比利時的中立，又是德國同另外四個歐洲大國所永遠保證的。既深信戰爭必不可免，又認為德國必須在最有利的情形下開戰，施利芬于是決心不容這個比利時的難題成為德國的路障。普魯士軍官有兩類——頸粗如牛和腰細若蜂，而他屬于后者。戴著單片眼鏡，老態龍鐘，冷漠難近。他專心致志于職務，唯工作之需要是想，甚至在東普魯士一次通宵野外參謀見習結束后，旭日東升，朝陽下普雷格爾河波光閃耀，景色絢麗，一個副官指給他看的時候，他注目一瞥便回答說：“一個不足道的障礙。”比利時的中立，他認定，也是這么一回事。

一個中立的、獨立的比利時，是英國的杰作，或者可說是它那個雄才大略的外交大臣帕默斯頓（Palmerston）勛爵一手創建的。比利時的海岸是英國的邊境；在比利時平原上，威靈頓[[1]](#_1__Wei_Ling_Dun__Arthur_Wellesl)曾挫敗自有無敵艦隊以來英國遇到的最大威脅。嗣后，英國便決心把這塊敞開無阻、容易跨越的彈丸之地變成一個中立地帶，并且根據維也納會議解決拿破侖戰后問題的決定，征得其他列強的同意，將比利時劃歸了尼德蘭王國。比利時人滿腔憤怒，反對跟一個新教統治的國家合并，他們群情激昂，充滿著熾烈的19世紀的民族主義狂熱，在1830年初起而反抗，并就此引起一場國際爭奪。荷蘭人力爭保持他們的屬地；法國人急于重新吞并他們一度統治過的地方，也插手進來；至于俄、普、奧這些一心想把歐洲始終置于維也納會議鉗制下的專制君主制國家，則是磨刀霍霍，準備哪里有反抗跡象初露就殺向哪里。

帕默斯頓勛爵運籌帷幄，智勝了各國。他懂得，一塊屬地總是這個、那個鄰國垂涎的目標；他懂得，只有成為一個堅決維護其完整的獨立國家，才能生存，才能成為一個安全地區。經過九年剛柔相濟和矢志不渝的努力，以及必要時的不惜動用海軍，他終于擺布了逐鹿比利時的各國，并促成一份國際條約，保證比利時成為一個“獨立和永遠中立的國家”。這項條約由英、法、俄、普、奧五國于1839年簽字生效。

1892年，法俄結成軍事同盟。此后的局面顯然將是上述五國中的四個自然而然地以二對二的形式參加施利芬為之策劃的戰爭。歐洲成了好似撤棒游戲中疊得盤根錯節的木棒，抽動一根就不能不牽動其余。根據德奧同盟的條款，在奧俄的任何沖突中，德國負有支持奧國的義務；按照法俄同盟的條款，任何一方卷入對德“防御戰爭”時，雙方均有義務對德采取行動。這些規定將不可避免地使德國在它從事的任何戰爭中不得不同法俄兩面作戰。

英國將扮演什么角色，并無定準。它可能保持中立；如果師出有名，它也可能參與對德作戰。比利時有可能成為事因，已不是什么秘密。1870年普法戰爭時，德國還是個崛起中的國家，所以俾斯麥一得到英國的示意，便欣然重申比利時的不可侵犯。格萊斯頓（Gladstone）曾從交戰國雙方爭取到一項條約，規定倘若交戰國任何一方破壞比利時的中立，英國就將與另一方合作，及至協同保衛比利時，不過，將不參與全面作戰。這條格萊斯頓公式最后拖的這句尾巴雖不無不切實際之處，但德國沒有理由可以認為制定這個公式的動機，在1914年不如在1870年那么起作用。然而施利芬卻作出決定，一旦發生戰爭，將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

他的理由是“軍事需要”。他寫道，在兩面作戰的戰爭中，“整個德國必須撲在一個敵人身上，撲在最強大、最有力、最危險的那個敵人身上，而這個敵人只能是法國”。施利芬在1906年他退休之年完成的那份計劃中，分配八分之七的兵力以六周時間擊潰法國，而以八分之一兵力守衛東部國境抗擊俄國，直至大部分軍隊可以調過來迎擊這個居于第二位的敵人。他之選擇法國作為打擊的第一個敵人，是由于俄國有廣無窮盡的縱深，只要不斷后撤，讓德國人像拿破侖那樣陷入一個漫無止境的戰役，就可使德國的速戰速決之計不能得逞。何況法國近在咫尺，動員起來又較為迅速。德國和法國都只需兩周時間就可動員完畢，在第十五天就可發動大規模的攻勢。而俄國，按德國的算術，它四面八方相距甚遠，軍隊眾多，鐵道窳陋，得要六周時間才能發動大規模的攻勢，但到那時法國大概已被打敗了。

讓東普魯士這個容克（Junker）地主邦國和霍亨索倫家族的老家只用九個師來守衛，是個難于承受的風險。但是，腓特烈大帝曾說過：“寧失一省之地，而不分散賴以取勝之兵。”所以，沒有什么能像這位偉大的、已經物故的將軍的箴言能如此寬慰軍心。只有在西線投入最大的兵力，才能使法國迅速完蛋。按施利芬的意見，只有采用包抄戰略，利用比利時作為過道，德國才能攻略法國。他的論證，從純軍事觀點來看是無可非議的。

當時德國準備用以進攻法國的軍隊達150萬之眾，六倍于1870年，在行動上需要縱深。1870年以后法國沿阿爾薩斯和洛林邊境構筑的要塞，使德國無法越過共同邊境作正面進攻。只要法軍通向后方的道路暢通無阻，長期圍攻就提供不了將敵人迅速網入殲滅戰的戰機。只有采用包抄戰略，才能從背面襲取法軍，一舉殲滅。可是法國防線不論哪端都是中立國家的地界，一是比利時地界，一是瑞士地界。既要繞到法軍背后，又要不出法國國境，這對為數巨大的德軍就沒有足夠的空間。德國人在1870年確曾繞到法軍背后而又未越出法境一步，但當時雙方軍隊都為數很少，而今則是調動一支成百萬的軍隊包抄另一支成百萬的軍隊的戰爭。地盤、公路和鐵路都必不可少，而平坦的佛蘭德（Flanders）平原則無一不備。比利時既有施利芬克敵制勝方案（側翼包抄運動）所需的空間，也有規避他視為自取滅亡方案（正面進攻）的途徑。

德國軍事思想的先知克勞塞維茨曾規定，以“決戰”迅速取勝是進攻戰的要旨。占領敵人領土和掌握敵人資源均屬次要，盡快早日決戰定局事屬至要。時間重于一切，拖延戰爭的任何情事，均遭克勞塞維茨的譴責。“逐步削弱”敵人和消耗戰，他都畏如地獄。這是他在滑鐵盧之戰那個十年里的論述，其著作自此被奉為兵法上的“圣經”。

為了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施利芬決定采用得自漢尼拔坎尼之戰的戰略。這位使他入迷的將軍早已是一抔黃土。自漢尼拔在坎尼對羅馬人采取著名的兩面包抄戰略以來，已時過兩千年。野戰炮、機關槍已替代了弓箭和投石器，但施利芬寫道：“可是戰略原則不變。敵人的正面不是目標所在。至要的是粉碎敵人的側翼……以攻其后方完成消滅敵人。”在施利芬的思想指導下，包抄成了德國總參謀部崇拜的神術，正面進攻淪為可鄙的邪道。

施利芬侵犯比利時的第一個計劃制訂于1899年。該計劃要求橫切默茲河以東的比利時一角。這個面積以后逐年擴大，及至1905年，已擴展成很大一片右翼包抄區域，德軍將經此穿越比利時，從列日奔向布魯塞爾，然后揮戈南下，利用佛蘭德曠野直搗法國。一切決定于同法國的速戰速決，雖經佛蘭德作長途繞道，但畢竟較包圍共同邊界對面的要塞為快。

施利芬沒有足夠兵力可資用以對法國采取坎尼式的兩面包抄。為此，他改用右翼重兵包抄的方式，從默茲河兩岸鋪天蓋地越過整個比利時，像一把可怕的大草耙那樣橫耙全境，而后沿整個比法交界線進入法國，再循瓦茲（Oise）河谷直下巴黎。德國大軍將插入首都與調回應戰的法軍之間。這些法軍離開它們的防御工事，就會在決定性的殲滅戰中被吃掉。特意在左翼阿爾薩斯―洛林一線部署較弱兵力，在施利芬計劃中是個要著，這會誘使該地區的法軍進入梅斯和孚日山脈之間的“口袋”。法國人一心想收復失地，預料他們會在這里發動進攻；要是他們果真進攻，德國人認為，對于他們的計劃的大功告成，是再好不過的，因為可由左翼把他們捆在口袋里，而由右翼從他們背后取得決定性勝利。施利芬的思想深處，總是隱隱約約地希望在戰役展開以后，也可以由左翼發動反攻，實現一個地道的兩面包抄——他夢寐以求的“龐大的坎尼之戰”。但他為右翼保留最大實力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因而他在計劃中沒有遷就這躍躍欲試的野心。可是左翼這方面的引誘卻依然吸引著他的那些繼任者。

就這樣，德國人來到了比利時。決戰決定了采用包抄戰略，包抄決定了使用比利時國土。德國總參謀部聲稱這是軍事需要；德皇和首相也或多或少地安然接受了下來。至于它是否可取，就其對世界輿論，特別是對中立輿論可能產生的影響而論又是否得計，都被視為不相干的問題。判斷的唯一標準在于看上去是否為德軍的克敵制勝所需。德國人從1870年普法戰爭中取得經驗，認為德國之偉大，武力和戰爭是其唯一源泉。他們從陸軍元帥戈爾茨（von der Goltz）的著作《武裝的國家》（The Nation in Arms）一書中得到的教誨是：“我們是以刀劍的銳利，而不是以思想的銳利贏得我們的地位的。”破壞比利時中立的決定遂不難隨之產生了。

希臘人認為性格決定命運。破壞比利時中立的這個決定，孕育著自我毀滅的種子；而作出這一決定，則是百年來的德國哲學造成的。這個決定，言出施利芬之口，但事出費希特（Fichte）之手，他認為德國人是蒼天選來在宇宙史上居于最高地位的驕子；也是事出黑格爾之手，他認為他們是領導世界走向德國文明勢必普及的光輝前程的使者；也是事出尼采之手，他告訴他們超人不受制于常人；也是事出特賴奇克之手，他將擴大權力作為國家最高道義責任；還事出整個德國人民之手，他們把自己的世俗君主稱為“至尊”。促成施利芬計劃的不是克勞塞維茨，不是坎尼之戰，而是日積月累起來的唯我主義的整體，它哺育了德國人民，創建了一個民族國家，一個由“自詡是絕對意志的極端幻覺”喂養成長的民族國家。

決戰這個目標，是1866年和1870年戰勝奧、法的產物。這些已成史跡的戰役，像已逝的將軍一樣，死死地纏住軍人的頭腦。德國人，也同其他民族一樣，準備作一決雌雄的一戰。他們仿效漢尼拔那樣將一切賭注都押在決戰上。可是，甚至漢尼拔的幽靈可能也會提醒施利芬，迦太基雖贏得了坎尼之戰，但是羅馬卻贏得了整個戰爭。

陸軍元帥老毛奇在1890年曾預見下次戰爭有可能得打七年乃至三十年之久，因為現代國家資源巨大，絕不會由于僅僅一次軍事失利而認輸罷休。他的同名侄兒，接替施利芬任總參謀長的小毛奇也曾有見于此。小毛奇在1906年，在他對克勞塞維茨離經叛道的那個片刻，曾向德皇陳言：“這將是一場全國性的戰爭。這場戰爭不是跟一個國家通過一場決戰可以解決的，必須同它進行長期艱苦地搏斗，而這個國家在其舉國力量崩潰之前是征服不了的。這場戰爭且將是縱然勝利也將耗盡我國人民全部精力的一場戰爭。”然而，要將自己預言的哲理貫徹下去，那是違背人類本性的，而且有違總參謀部的本性。長期戰爭，在概念上，既難以名狀又漫無邊際，既不像正統的、可預卜的、簡單的一戰定局的那種結束戰爭的辦法，也不像短期戰爭，它是無法預為科學計劃的。小毛奇發表他的預見時已身為總參謀長，可是無論是他或是他的參謀部，還是其他國家的參謀部，都從沒有作過任何努力來計劃一次長期戰爭。除了一個已經物故、一個意志不堅的這兩位毛奇以外，別的國家的某些戰略家也曾預感到長期戰爭的可能。但是他們跟銀行家、實業家們如出一轍，全都偏于相信一場歐洲大戰會由于經濟生活的失調而不可能支持三四個月以上。1914年各種因素中的那個不變因素，同任何時代一樣，是所有人都不傾向于為更其棘手的可能預為綢繆，都不傾向于按他們疑為真實的情況行事。

施利芬既抱定“決戰”戰略，遂將德國的命運拴在這個戰略上面。他預料德國一經陳兵比境暴露了戰略意圖，法國就會立即入侵比利時，因此他策劃德國應搶先下手。他的立論是：“比利時的中立必將為這方或那方所破壞，誰先到那里，占領布魯塞爾和征收十億法郎左右的軍費，誰就居于上風”。

賠款是克勞塞維茨訂下的第二個目標。這可使一個國家不用自己解囊而由敵人承擔戰費進行戰爭。他的第三個目標是爭取公眾輿論，通過“取得巨大勝利和占領敵人首都”以竟其成。爭取到公眾輿論就會有助于結束抵抗。他懂得物質上的勝利將會如何贏得公眾輿論，但他卻忘了道義上的失敗將會怎樣失去公眾輿論，而這也可能成為從事戰爭的一種風險。

這種風險法國人可從沒有忽視。正鑒于此，他們作出了同施利芬的預料相反的結論。比利時也是他們進攻的過道，縱不是路經佛蘭德平原也是借道阿登（Ardennes）山區的通途；可是他們的作戰計劃禁止他們的軍隊在德國侵犯比利時之先使用比境。問題的邏輯在他們是清楚的：比利時不論朝哪一方向都是敞開的通途；是德國利用它還是法國利用它，取決于兩者之中誰更需要戰爭。一位法國將軍說得好：“誰更決心要戰爭，誰就勢必要破壞比利時的中立。”

施利芬及其參謀部認為比利時不會作戰，不會以它的六個師為法軍增添力量。1904年，比洛首相同施利芬討論問題時曾提醒他注意俾斯麥的警告：為反德力量添上又一個與我為敵的對手，那是違反“簡單的普通常識的”。施利芬習慣性地把單片眼鏡在眼圈上轉動了幾下說：“當然，從那時以來，我們并沒有變得更蠢些。”接著他又說，不過比利時是不會用武力相抗的，它只會抗議了事。

德國人之深信這一點，是由于他們過分地看重了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Ⅱ）——施利芬在世時的比利時國王——臭名昭著的貪得無厭。他身材高大，長著一把黑黑的鐵鍬似的大胡子，滿身一股由情婦、金錢、在剛果的暴戾恣睢以及其他種種可恥行為交織成的歪風邪氣，在奧皇弗朗茨·約瑟夫看來，是個“徹頭徹尾的壞蛋”。奧皇說，可以這樣形容的人不多，比王就是其中之一。因為利奧波德的貪婪成性是他的種種罪惡之尤，而德皇又認為貪婪會使人利令智昏，所以他設想了一條妙計——給他一份法國領土，誘他結盟。德皇每當對一個方案入迷的時候，總想把它立即付諸實施，要是行不通，則又往往愕然失色，懊傷不已。1904年，他請利奧波德前來柏林，他以“世界上最溫存的方式”同他談論他尊貴的祖先勃艮第公爵，并表示愿意為他在阿圖瓦（Artois）和法國的佛蘭德與阿登山區這些土地上重建老勃艮第原有的公爵領地。利奧波德聽了不禁“張大著嘴”，兩眼直瞪。他企圖一笑了之，提醒德皇說，15世紀以來已情況大變，他的大臣和國會無論怎樣也不會考慮這種建議的。

這下可說錯了，德皇大發了有數的一次雷霆，痛斥比王尊重國會和大臣勝過尊重上帝的意志（威廉往往把自己與上帝混為一談）。“我告訴他，”威廉后來對比洛首相說，“我不是好欺的，誰要是在歐戰里不站在我一邊，誰就是反對我。”他聲稱他是拿破侖和腓特烈大帝學校里的丘八，他們都是搶在敵人前面發動戰爭的，“所以，如果比利時不站到我這邊來，我只好唯戰略考慮是從了”。

這個說出了口的意圖，這個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撕毀中立協定的威脅，把利奧波德國王嚇得目瞪口呆。他乘車去火車站時遮陽帽竟前后錯戴，他直瞪著他的隨行副官，“好像受了一場什么驚嚇似的”。

德皇的計謀雖告失敗，但他仍然認為利奧波德會接受一筆交易，以比利時的中立來換取200萬英鎊。戰后，一個德國軍官把這個數目告訴了一個法國情報官，后者對出手如此大方大為吃驚，不過德國軍官提醒他說：“這筆錢原本是要法國人付的。”施利芬的后繼人，甚至在利奧波德于1909年被和他品質截然不同的侄兒阿爾貝接替之后，依然預料比利時的抵抗將只是一種形式而已。一個德國外交人員在1911年就曾認為比利時的抵抗也許會以“將它的軍隊在德軍借道之處沿途列隊”的方式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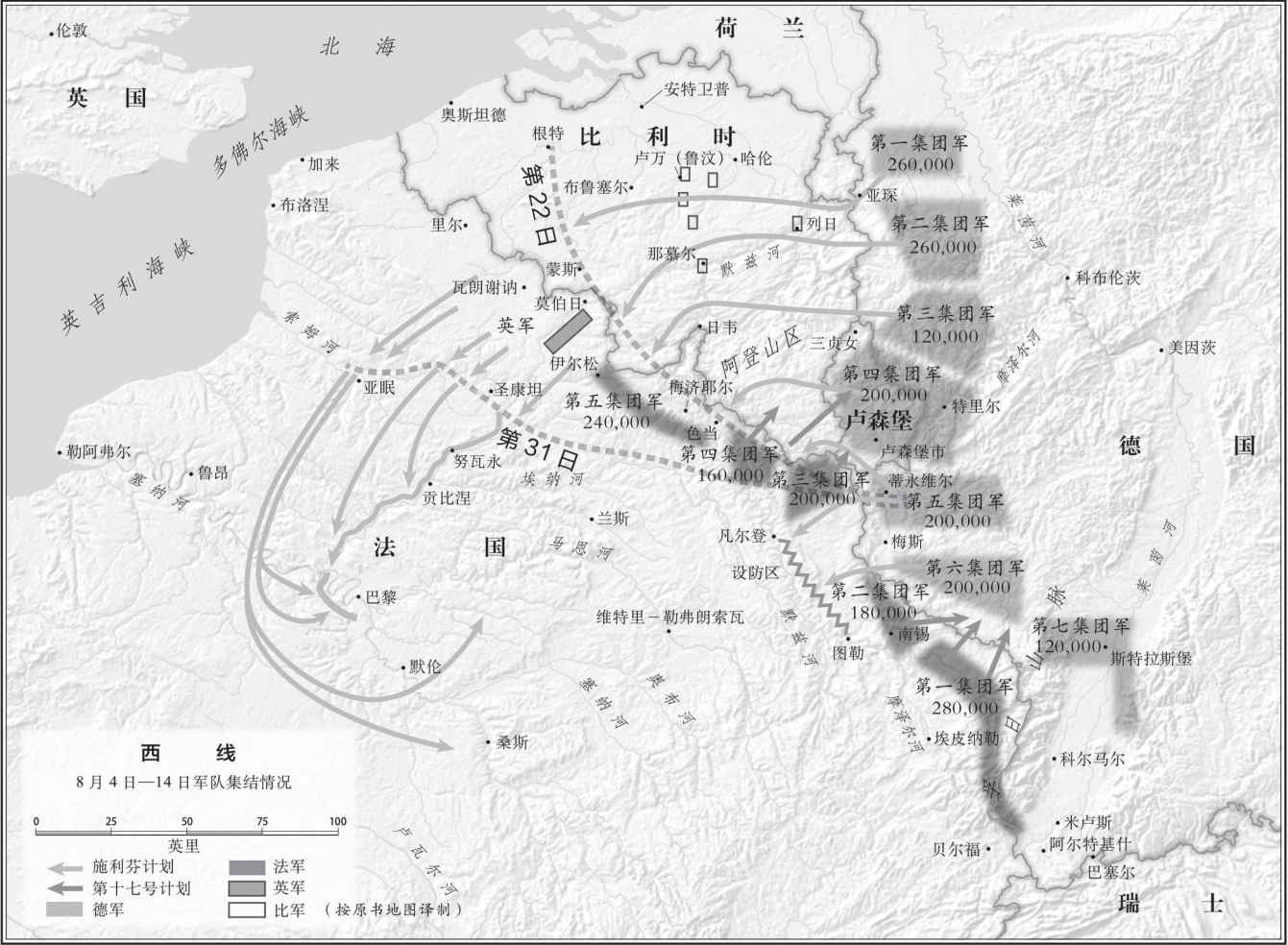
施利芬指派34個師借道比利時。比利時的6個師要是決意抵抗，就在進軍途中把它們干掉，不過在德國人看來它們是不會抵抗的。德國人也確實急切希望比軍不抵抗，因為抵抗意味著破壞鐵路、橋梁，意味著最終打亂德國參謀部所熱衷的時間表。反之，倘若比利時能默然置之，不僅會使德國避免將幾個師的兵力拴在圍攻比利時的要塞上，而且會消除公眾對德國行徑不滿的輿論。為了勸說比利時不作無謂的抵抗，施利芬部署在入侵之前，讓比利時面對一份最后通牒，責令它交出“所有要塞、鐵路和部隊”，否則就要它眼看著自己的設防城市遭到炮擊。重炮已準備就緒，必要時就將炮擊的威脅變為現實。施利芬在1912年寫道，這些大炮日后在這場戰役中不論怎樣都是需要的，“例如，里爾（Lille）這個工業大城市就是可供炮擊的一個極好目標”。

施利芬為了完成對法國的包圍，要他的右翼向西延伸遠及里爾。“你向法國進軍時，”他說，“讓右翼末梢袖拂海峽。”而且，由于估計到英國的參戰，他想廣張羅網，好將英國遠征軍和法軍一網打盡。他對英國海上封鎖的潛在力量要比對英國陸軍更為重視。所以，他決心迅速戰勝法、英地面部隊，趕在英國敵對行動還未產生經濟方面的后果之前就使戰爭早日定局。為此，一切力量都必須投入右翼，壯大右翼。他一定得使右翼人眾勢大，因為每一英里的士兵密度決定著所能控制的領土幅度。

僅僅使用現役部隊，他不可能有足夠兵力既防御俄國人突破東部國境，又達到他迅速取勝所必需的超過法軍的優勢。但他的解決辦法很簡單，也許還是個創新。他決定在前線使用后備軍。按照當時的軍事學說，只有最年輕而剛經過營房和練兵場艱苦生活與嚴格訓練的人才適合作戰；后備役軍人，已結束他們的義務兵役回到了平民生活，被認為是軟弱的，戰場上用不上的。除了那些二十六歲以下的將編入現役部隊以外，所有后備役軍人將被組成他們自己的師旅，用以作為占領軍和承擔其他的后方任務。施利芬改變了這一切。他將二十個左右的后備師（這個數目隨著每年計劃的改變而有不同）加入到五十或五十多個現役師進軍的行列。數字上有了這一增加，他縈繞于懷的包抄戰略便成為可能了。

他于1906年退休。以后在其有生之年，他依然致力于坎尼之戰的著述，改進他的計劃，編寫指導他的后來人的備忘錄。他死于1913年，終年八十歲，臨終時猶喃喃地念叨著：“必有一戰，務使右翼強大。”

他的繼承人，憂郁怏悒的毛奇將軍，多少是個悲觀主義者，他沒有施利芬集中全力于一役的果斷精神。如果說施利芬的座右銘是“要膽大，要膽大”，那他的則是“可別過于膽大”。他既擔心他的左翼力量軟弱不能抗擊法國人，又唯恐剩下來防守東普魯士的兵力單薄，不能抵御俄國人。他甚至跟他的參謀人員辯論了同法國打一場防御戰是否可取的問題，只是由于這種主張排除了“在敵人國土上打敵人”的一切可能才作罷論。在入侵比利時問題上，參謀部的意見是一致的，認為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因為這場戰事將是“保衛德國和為了德國生存”的一戰。施利芬計劃于是保存下來了。毛奇在1913年曾說：“我們必須撇開關于侵略者責任問題的一切庸人之見。……只要勝利就師出有名。”這也正是他聊以自慰的想法。但是為了萬無一失起見，他每年都要向施利芬的臨終囑咐開刀，從右翼借兵增強左翼。



毛奇計劃在左翼安排8個軍，約32萬人，守衛梅斯以南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的陣地；中路安排11個軍，約40萬人，借道盧森堡和阿登山區入侵法國；右翼安排16個軍，約70萬人，借道比利時進攻，先粉碎扼守默茲河通道的著名的列日和那慕爾（Namur）要塞，然后飛渡默茲河進入曠野地區，直抵河另一邊的直線公路。進軍的日程已預作安排。預料比利時人不會抵抗，如果抵抗，德軍突擊猛攻的威力可望懾服他們很快投降。日程表要求動員第12日前打開列日通道，第19日拿下布魯塞爾，第22日進入法境，第31日到達蒂永維爾（Thionville）至圣康坦（St. Quentin）一線，第39日攻克巴黎，取得決定性勝利。

這一戰爭計劃，其嚴格，其完整，猶如戰艦的一紙藍圖。克勞塞維茨曾告誡說，軍事計劃倘不留有余地以防不測，將會導致災難。因而德國人謹慎備至，對可能發生的意外事項，均一一作了準備。他們的參謀人員，在野外演習中，在軍校課桌上，受過對特定情況作出正確決策的訓練，料定他們對任何不測均可應付裕如。對各種難以捉摸而又充滿危機的復雜情況，都已一一采取了萬全措施；可是全則全矣，唯獨缺一，即缺少靈活性。

盡最大力量打擊法國的計劃確定下來了，這時候毛奇對俄國的擔心也已逐漸減少，因為他的總參謀部在仔細計算俄國鐵路里程之后，得出一個信條，認為俄國不會在1916年以前備戰“就緒”。德國間諜關于俄國人有“1916年將有大事肇始”之說的情報，使德國人在思想深處肯定了這個信條。

1914年，兩件大事使德國人的作戰意愿到了摩拳擦掌一觸即發的程度。一是4月份英國開始了跟俄國人的海軍談判，一是6月份德國完成了基爾運河（Kiel Canal）的加寬工程，它新造的無畏級戰艦就此可以從北海通過該運河直接開往波羅的海。毛奇在5月間訪問奧國總參謀長弗朗茨·康拉德·馮·赫岑多夫（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期間，得悉英俄談判消息后曾對他說：“任何延遲都會造成我們勝利機會的減少。”兩星期后的6月1日，他對埃克哈德斯泰因男爵說：“我們已準備就緒，在我們是越快越好。”

注釋

[[1]](#_1_2) 威靈頓（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1769—1852），英國統帥和政治家。在1815年滑鐵盧會戰中曾同普魯士的布呂歇爾一起擊敗拿破侖。——譯注

“法國的心窩”：qtd. Buchan, I, 118.

“一個不足道的障礙”：Goerlitz, 129.

“整個德國必須撲在一個敵人身上”：Schlieffen's Memorandum of 1912, Ritter, 172.

施利芬計劃：Schlieffen's Memoranda for 1892 and 1912 in Ritter; Schlieffen's Cannae, Kuhl's Generalstab, Förster.

“寧失一省之地”：qtd. by Schlieffen, Ritter, 172.

“戰略原則不變”：Schlieffen, Cannae, 4.

戈爾茨：“我們是以刀劍的銳利”：qtd. 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222.

“絕對意志的極端幻覺”：Santayana, 69.

老毛奇預見到長期戰爭：Foerster, 21.

小毛奇：“這將是一場全國性的戰爭”：Erinnerungen.

“比利時的中立必將為這方或那方所破壞”：General von Hahnke's notes on Schlieffen's Memorandum of 1912, Ritter, 186.

“取得巨大勝利”：Clausewitz, III, 209–10.

“誰更決心要戰爭”：General Percin in article in Ere Nouvelle, January 1925, qtd. Ponsonby, 55–6.

比洛同施利芬的討論：Bülow, II, 88.

利奧波德二世是個“徹頭徹尾的壞蛋”：Roosevelt to Trevelyan, October 1, 1911, Letters, VII, 369.

德皇向利奧波德二世提出的方案及利奧波德的反應：Bülow, II, 82–85; Cammaerts, 108–9.

200萬英鎊：J. V. Bredt, Die Belgische Neutralität und der Schlieffensche Feldzugsplan, qtd. AQ, July, 1929, 289.

“這筆錢原本是要法國人付的”：Dupont, 23.

“將它的軍隊在德軍借道之處沿途列隊”：the diplomat was Richard von Kuhlmann, then counselor of the German Embassy in London, later, in 1917, Foreign Secretary, qtd. Cammaerts, 134.

“所有要塞、鐵路和部隊”：Memorandum of 1912, Ritter, 175.

“里爾是可供炮擊的一個極好目標”：ibid.

“讓右翼末梢袖拂海峽”：qtd. Rosinsky, 137.

施利芬估計到英國參戰：Ritter, 161–4.

在前線使用后備軍：Isaac, Reserves, 335; Foerster, 71.

“務使右翼強大”：Foerster, 70.

“在敵人國土上打敵人”：Erinnerungen.

“完全合理的，完全必要的”：Tappen, 92.

“我們必須撇開關于侵略者責任問題的一切庸人之見”：Cambon (French ambassador in Berlin) to Foreign Minister Pichon, May 6, 1913, French Yellow Book No. 3.

德國間諜關于俄國的情報：Tirpitz, I, 343.

毛奇對奧國總參謀長康拉德說的話：Conrad, III, 670.

“我們已準備就緒，在我們是越快越好”：Eckhardstein, Lebenserinnerungen, Vol. III, Die Isolierung Deutschlands, Leipzig, 1921, 184.

## 第2章　色當的陰影

1913年的一天，里爾市軍事長官勒巴（Lebas）將軍來到陸軍部求見法國副總參謀長德卡斯泰爾諾（de Castelnau）將軍，對總參謀部所作的不擬在里爾設防固守的決定提出異議。里爾距比利時邊界10英里，離海峽40英里，如果入侵軍隊取道佛蘭德來犯，它便緊挨在進軍路線的一側。德卡斯泰爾諾將軍在聽了勒巴將軍請求設防的理由后，攤開地圖，用尺量了從德國邊界穿越比利時國境直抵里爾的距離。他提請這位來訪者注意，要發動一場強有力攻勢的話，標準的兵員密度是每米五至六人。他指出，如果德國人把戰線向西一直拉到里爾，他們的力量就會分散到每米只有兩人。

“我們會把他們攔腰切斷！”他說道。然后又解釋說，德國的現役軍隊，可用于西線的兵力是25個軍，約100萬人。“這兒，你自己來算一下吧。”他一面說，一面把尺遞給勒巴。“如果他們真到得了里爾，”他語含譏諷而洋洋自得地重復了一遍，“對我方更有利。”

法國的戰略并不曾把德軍實行右翼包抄的威脅置之度外。相反，法國總參謀部認為，德國人在他們的右翼投入的兵力越大，他們在左翼和中路的兵力就要相應地減弱，法軍就可以計劃在這一帶突破。法國的戰略是背靠比利時邊界面對萊茵河。只要德國人遠道迂回包抄法軍翼側，法國就計劃發動鉗形攻勢，在德軍設防的梅斯地區的兩側突破德軍中路和左翼，并乘勝切斷德軍右翼和它的基地的聯系，使其無法出擊。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其源蓋出于一個意愿——這一意愿是因法國從色當（Sedan）之敗的奇恥大辱中恢復元氣而產生出來的。

1871年，法國在凡爾賽唯德國之命是從訂立了城下之盟，備受國土肢解、賠償軍費以及敵軍占領的苦楚。在被迫接受的條款中，甚至還規定了德軍要舉行勝利閱兵儀式，在香榭麗舍大街雄視闊步，耀武揚威。儀式進行之際，大街上觀者絕跡，闃無聲息，黑紗低垂。在波爾多（Bordeaux），當法國國民議會批準和約之際，阿爾薩斯和洛林兩省的議員們淚流滿面，步出大廳，留下了他們強有力的聲明：“我們宣告，阿爾薩斯人和洛林人，千秋萬代都要保留作為法蘭西民族一分子的權利。我們為我們自己發誓，為我們的選民發誓，為我們的兒女發誓，也為我們的子子孫孫發誓，要采取一切手段在篡奪者面前永遠堅持這一權利。”

并吞這塊領土，是出于老毛奇和他的總參謀部的要求，而為俾斯麥所反對，他說，這會成為新德意志帝國的致命隱患。老毛奇和總參謀部堅決主張，并且也使皇帝陛下相信，這兩個邊境省份，連同梅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以及孚日山脈的崇山峻嶺，都必須從法國一刀砍掉，使法國在地理上永遠只能處于守勢。他們還進而要法國償付一筆五十億法郎的不堪負荷的賠款，其用心是要在一代人的年頭里捆住法國的手腳，同時還要在法國駐扎一支占領軍，直至賠款償清為止。法國人作出驚人的努力，在三年內籌足款子付清了賠款，于是便開始恢復元氣。

色當之敗縈繞腦際，在法國人的意識中，它是一個歷久恒在的黑影。“你們不要放在嘴邊，而要銘記心間。”這是甘必大（Gambetta）的一句忠告。四十多年來，防止“往事重演”是法國政策中獨一無二的最根本的因素。1870年以后的初期階段，戰敗者的本能和孱弱的軍力迫使它執行筑壘防御的戰略。法蘭西倚為屏障的是一個壕塹縱橫、深溝壁壘的防御系統。從貝爾福到埃皮納勒（Belfort-Epinal）和從圖勒到凡爾登（Toul-Verdun）的兩條防線衛護著東部邊界，還有一條從莫伯日經瓦朗謝訥到里爾（MaubeugeValenciennes-Lille）的防線保衛著比利時邊界的西半段；這兩條防線之間的缺口便是故意留給入侵部隊的通道。

維克托·雨果寫出了他最為慷慨激昂的心聲，主張借助這一道屏障：“法蘭西將萬眾一心：重建力量，養精蓄銳，毋忘國恥，喚起青年一代組成一支全民的軍隊，發憤圖強，永不懈怠，研究敵國的方略和技術，以便重整旗鼓，再成為偉大的法蘭西，即1792年的法蘭西，亦即胸懷理想、利劍在握的法蘭西。到那時，它定會所向無敵，定會光復阿爾薩斯和洛林。”

經歷了繁榮的再現和帝國的擴張，經歷了年復一年的內部紛爭——保皇派、布朗熱[[1]](#_1__Bu_Lang_Re__Georges_Ernest_B)派、教權派、工人罷工，以及空前激烈、創巨痛深的德雷福斯（Dreyfus）案件——民族仇恨依然在心頭燃燒，特別是在軍隊里面。不論是保守派還是共和派，不論是耶穌會會士還是共濟會成員，把他們團結起來的，便是那阿爾薩斯的奧秘。人人都凝視著孚日山脈的那一片蒼翠。一位步兵上尉在1912年便已直認不諱，他常把他的一連人分成三兩人的秘密巡邏隊，帶領他們穿過幽深的松林，潛上山頂，凝神遙望科爾馬爾（Colmar）。“經過這種私下的出巡，歸來之后，我們的隊伍便與以前完全兩樣，全連都心潮激蕩，哽咽無語。”

阿爾薩斯原先既非德國屬地，亦非法國所有，德法兩家你爭我奪，反復易手，直到路易十四當朝，才由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reaty of Westphalia）確定歸屬法國。1870年德國并吞阿爾薩斯以及洛林的一部分后，俾斯麥便建議盡可能給當地居民以最大限度的自治權，并對他們的地方主義進行鼓勵。他說，他們多想到自己是阿爾薩斯人，就會少想到自己是法國人。他的后繼諸公卻見不及此，未把這批新添的黎民的愿望放在心上，不去爭取他們，而把這兩個省份當作“帝國領土”（Reichsland）來治理。派去的德國官員，其施政方針幾乎跟對待非洲的殖民地無異，他們唯一的政績是激起了這兩處人民的憤怒，離心離德，直到1911年才恩賜給他們一紙憲法，但已為時過晚。德國的統治在1913年的扎本（Zabern）事件中原形畢露。事件的起因是市民和駐軍之間的口角，一個德國軍官用軍刀刺傷一個跛腳的鞋匠。這場風波的結果是：徹底暴露了德國對這塊帝國領土的政策，世界輿論掀起一陣反德浪潮，同時軍國主義也在柏林高奏凱歌，扎本的軍官成了譽滿京華的英雄，受到王儲的嘉獎祝賀。

對德國來說，1870年的勝利還不能算是最后的解決。德國人認為，當他們在凡爾賽宮鏡廳里宣告德意志帝國成立之際，德國主宰歐洲的日子已開始出現，可是，這一日子卻始終未到。法蘭西并未成為齏粉，法蘭西帝國實際上還在北非和印度支那開疆拓土；世界上崇尚藝術和美感的人們，追求奢華時尚的人們，仍然拜倒在巴黎腳下。德國人對這個已經被他們征服了的國家依然是妒意難消，隱痛在胸。“法蘭西的富貴豪華有如仙境”，是德國人的一句俗話。同時他們又認為法蘭西的文化已經腐朽，民主政治已經使它軟弱無力。“一個在四十三年中任命過四十二任陸軍部長的國家，是不可能有效地作戰的。”德國的史學泰斗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教授曾如此聲言。德國人深信，他們自己的心靈、實力、能量、勤勞，以及民族品德，都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們感到歐洲的盟主非我莫屬，色當大業必須事竟其成。

生存在德國人這項未竟大業的陰影下的法蘭西，隨著精神和實力的恢復，對于年復一年的保持防備警戒，對于領袖們年復一年關于自救圖存的告誡，也就滋長了厭倦情緒。隨著新舊世紀的交替，法蘭西精神便針對三十年來的困處守勢，以及這種守勢所隱含的自卑，起而造反了。法國自知體質不及德國。它人口較少，出生率較低。它需要有一種德國所缺少的武器，使自己有信心發奮圖存。“胸懷理想，利劍在握”，滿足了這一需要。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話來說，這便叫做“生命的沖動”（élan vital），也就是無攻不克、無堅不摧的意志。法蘭西篤信這種意志法力無邊，從而也就深信不疑，人的精神畢竟無須對天意所歸的進化勢力俯首帖耳，雖然叔本華和黑格爾都曾聲稱進化的勢力是不可抗拒的。法蘭西的精神可以成為制勝因素。它的必勝的意志，它的沖動，足以使法蘭西挫敗強敵。它特異的稟賦在于它的精神——崇尚榮耀的精神，1792年的精神，無與倫比的《馬賽曲》的精神，馬格里特（Margueritte）將軍在色當戰役中率領的騎兵部隊英勇沖鋒的精神，這種精神，甚至連當時親臨觀戰的威廉一世也不禁為之高呼：“啊，多勇敢的人們！”

相信法蘭西的熱血沸騰，相信高盧人的同仇敵愾，這就在1870年以后的一代人的時間里復活了法蘭西對它自己的信心。就是這股激情，使它的軍旗高高飄揚，它的軍號激越嘹亮，它的戰士斗志高昂；如果“往事重演”的日子一旦來臨，這股激情便會指引法蘭西走向勝利。

柏格森的“生命的沖動”經轉譯成軍事術語，便成了進攻的理論。隨著防御戰略讓位給攻勢戰略，對于比利時邊界的注意也就相應地日趨淡薄，取代它的則是重心步步東移，一直移到法國人可以發動進攻，實行突破，直趨萊茵河的地點為止。對德國人說來，取道佛蘭德的迂回路線可以通向巴黎；對法國人說來，這條路線卻哪兒也到達不了，他們只能選一條最短的路線前往柏林。法國總參謀部的思路越是向進攻戰靠攏，它集中在出擊點的兵力就越大，留下來防守比利時邊界一線的兵力就越少。

進攻派的學說源出陸軍大學。這一學府乃是法國軍界的英彥駿驥薈萃之所，校長費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將軍是法國軍事理論的一代宗師。他的頭腦仿佛是一顆心臟，有著兩幅瓣膜：其一專供把精神注入戰略之用；另一則司常人識見的流通出入。一方面，福煦傳布一種關于意志的奧秘的說教，這可見于他的兩句名言：一是“克敵制勝的意志是勝利的首要條件”，或者說得言簡意賅一點，“勝利即意志”；一是“一場勝仗就是一次絕不服輸的戰斗”。

在實際運用中，這就成了他日后那道蜚聲一時的馬恩河（Marne）的進攻令，而當時的形勢要求則是撤退。當年在他身旁的軍官們都還記得，他一面勃然作色，攘臂奮拳，咆哮如雷地吼叫：“進攻！進攻！”一面像通了電似的一會兒東、一會兒西地沖來沖去。后來有人問他，為什么在按照陳規說來已吃敗仗的時候還要在馬恩河戰線上向前進攻？“為什么？我不清楚。為的是我部下的士兵，為了我有一個意志。再加上——還有一個上帝。”

盡管福煦對于克勞塞維茨的學說造詣很深，但他卻不像克勞塞維茨的德國后輩那樣崇信一份事先制訂的萬無一失的作戰時間表。他倒是諄諄教導人家，必須不斷根據情況隨機應變，當機立斷。他常說：“操典條令在操練時確是再好不過的，但在危急關頭就沒有多大用處……你們必須學會思索。”思索的意思是要讓主觀能動性有縱橫馳騁的天地，要讓那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去制服物質的因素，要讓意志有用武之地，去制服環境條件。

但是福煦也提出警告，認為那種光憑士氣便能克敵制勝的想法乃是一種“幼稚的見解”。在他的講演里，以及在他的戰前的《戰爭原理》和《作戰指導》這兩本著作中，他都會從玄學的凌空翱翔中急轉直下，降落到戰術的地面上來，細敘前衛部隊的布置，安全措施或警戒部署之必要，火力諸要素，服從與紀律之必需，等等。他所傳授的軍事學中有關現實情況的那一半，可以用戰爭期間傳誦一時的他的一句名言予以概括：“問題的實質何在？”

盡管福煦講起戰術問題來也是娓娓動聽，但是最使門墻桃李醉心傾慕的卻是他所啟示的意志的奧秘。早在1908年福煦還在擔任教授的時期，克列孟梭有意要他出長陸軍大學，曾經派了一個私人代表前去聽課，此人聽后大惑不解，匯報說：“這位軍官講授的抽象空論，真是叫人如墮五里霧中，簡直要把學生變成白癡。”克列孟梭聽了這樣的報告還是起用了福煦，不過，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報告倒也是言之不妄。福煦所宣講的原理，不是由于它過于玄妙深奧，而是由于它過于引人入勝，便使法蘭西入其彀中。身任第三處即作戰處處長的格朗邁松（Grandmaison）上校，“一位心腸火熱、才華出眾的軍官”，則尤其如癡似狂地信奉他的那些原理。1911年，他在陸軍大學所作的兩次講演起了使其奧秘具體化的作用。

然而，格朗邁松上校所掌握的只是福煦的軍事原理的頂巔而不是基礎。他所大談特談的是沖動，而對安全卻只字未提；他所闡述的軍事哲學，好似電流，觸動了聽眾的心弦，使之激動，使之傾倒。他在眼花繚亂的聽眾面前祭起了“胸懷理想，利劍在握”的法寶，向他們指明法蘭西的制勝之道。它的精義在于“殊死進攻”（offensive à outrance）。唯有這樣的攻勢才能成為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決戰，把決戰“進行到底便是戰爭的根本任務”，這樣的決戰“一經交火，就不容三心二意，而必須全力以赴，死拼到底，把人的耐力發揮到極限”。奪取主動乃是必要條件。對敵人的意向武斷地作出判斷，并據此預作戰略安排，實屬冒失。要取得行動自由，全靠強使敵人接受我方意圖。“一切指揮上的決斷都必須來自奪取主動和掌握主動的意志。”防御戰略已被忘懷，已被放棄，已被扔到九霄云外；唯一可能容它立足之處，是有時“要在某些地點節省兵力以供增強進攻力量之用”。

這套理論在總參謀部產生的作用果然非同凡響，不出兩年，便體現在用作指導實戰的新頒《野戰條例》之內，體現在1913年5月通過的名為“第十七號計劃”的新的作戰計劃之內。格朗邁松講演后沒有幾個月，共和國總統法利埃（Fallières）先生便宣布：“唯有進攻才與法國將士的氣質相稱。……我們的決心已定，要一往直前，迎戰敵軍，毫不猶豫。”

法國政府在1913年10月頒布的新《野戰條例》，是法國陸軍訓練和指揮的圭臬。這部條例一開頭便是豪言壯語，氣概不凡：“法國陸軍，現已恢復其傳統，自今而后，除進攻外，不知其他律令。”然后開列八條軍令，刀光劍影，殺氣騰騰：“決戰”，“銳意進攻，毫不猶豫”，“勇猛兇狠，堅忍不拔”，“摧垮敵方斗志”，“無情追擊，不顧疲勞”。條例把防御戰踩在腳下，不屑一顧，其熱切的心情實不亞于正教會之要把異端邪說一舉除盡。它宣布：“唯有進攻戰才能達到積極的戰果。”條例的執筆人還給第七條軍令用上了斜體字以便醒目，條文說：“軍心士氣重于一切，一切戰爭都是軍心士氣的較量。一旦失去征服敵人的希望，失敗便不可免。勝利并不歸于蒙受傷亡最少的一方，而是歸于意志最堅強、士氣最旺盛的一方。”

全部八條軍令，沒有一處述及物資、火力，也沒有一處述及福煦所說的安全。整個條例的要旨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法國軍官們所津津樂道的一詞——勇敢，或者說得不那么文雅——有種。青年人出發攀登山頂，都是高擎一面大旗，上寫：“更上一層！”1914年的法國軍隊則是在“勇敢”的大旗下開赴戰場。

這數年間，盡管法國的軍事哲學已經改弦易轍，法國的地理卻依然如故。國境線上的地理態勢仍舊維持著1870年德國一手安排的原狀。威廉一世向對他提出抗議的歐仁妮（Eugénie）皇后[[2]](#_2__Fa_Huang_Na_Po_Lun_San_Shi_Z)解釋說，德國的領土要求，“只不過是把法國軍隊今后可以用來進攻我們的出發點向后推移而已，別無其他目的”。不過這樣也就同時把德國可以用來進攻法國的出發點向前推進了。盡管進入本世紀以來，法國的歷史和法國的發展都使它全神貫注于打進攻戰，其地理形勢卻仍然需要采取防御戰略。

1911年，也就是格朗邁松上校發表講演的那一年，有人在最高軍事委員會上作過一次最后的努力，要使法國遵循一條防御的戰略。力主此議者是身居要職、內定要出任總司令的米歇爾（Michel）將軍。他是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如果發生戰爭，也就是總司令的當然人選，因而在那時，他是陸軍中地位最高的一人。他在一篇把施利芬意圖反映得一清二楚的報告中，提出他對德軍可能采取的進攻路線的估計，并且提出他的反擊方案。由于德法共同邊界的地形陡峭，加之法國在邊界沿線布有防御工事，他堅決認為，德國人如在洛林作戰，無法取得速戰速決的勝利。取道盧森堡和默茲河以東貼近盧森堡的一小塊比利時領土，也不能給他們所偏愛的包抄戰略提供充分空間。他說，唯有借助“比利時全境”，德國人才能搞成那么一場“即刻的、無情的、決定性的”進攻戰，德國人必須趕在法國的盟軍開始行動之前就發動那樣一場攻勢。他指出，德國人對比利時的大港口安特衛普早已垂涎欲滴，這就使他們取道佛蘭德的進攻又多了一條理由。他建議要在凡爾登―那慕爾―安特衛普一線布列百萬法軍迎擊德國人，法軍的左翼——跟施利芬的右翼一樣——必須把衣袖拂及海峽。

米歇爾將軍的計劃不僅屬于防御性質，而且取決于一項他的袍澤強烈譴責的建議之能否實現。米歇爾將軍為了對應他所估計的德國人將要通過比利時入侵法國的兵力，要給每個現役團配備一個后備團，從而把法國第一線的有生力量增加一倍。如果他要建議把名噪一時的女藝人米斯坦格特推舉為法蘭西科學院的院士，也不見得會比這個配備后備團的建議惹起更大的風波和受到更多的唾罵。

“后備役不頂用！”這是法國軍官們的傳統見解。凡是根據義務兵役制受畢軍訓而年在二十三歲到三十四歲之間的男子，都被列為后備役。動員令頒布后，最年輕的幾屆便被編入正規陸軍部隊，使之達到戰時編制的實力；其余人員一律根據他們所在地區的情況組成后備團、后備旅乃至后備師。這些后備部隊都被視為只宜擔負后方勤務，或者充任要塞守備，而沒有資格配屬作戰部隊，因為他們缺少訓練有素的軍官和士官。正規軍蔑視后備部隊是右翼政黨所同聲附和的，而對于“全民皆兵”原則的憎惡又助長了這種看法。把后備部隊和現役師混合編組，那就不啻是給陸軍的戰斗銳氣潑冷水。他們相信，保衛國土只能依仗現役陸軍。

另一方面，對于那位昂首馬背的布朗熱將軍仍然心有余悸的左翼各黨，頭腦里都把陸軍和政變牽連在一起，并且認為唯有“全民皆兵”的原則才是共和國的安全保障。他們都主張，短短數月的訓練就足夠使任何一個公民成為合格的戰士，他們也都死命地反對把服役期延長到三年。延長服役期是軍方要求在1913年實行的改革，這不僅是為了要和德國陸軍的延長服役期相頡頏，也是為了隨時有更多的服役受訓兵員，可以減少對于后備部隊的倚重。經過一場大動肝火的辯論——這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裂痕——三年兵役法于1913年8月生效。

關于進攻戰的新理論使后備兵員受到的鄙夷有增無已。這種進攻戰的思想，被認為是只能正規地灌輸給現役部隊。打好以白刃戰為象征的使敵人無法抵御的猛烈的短促突擊，基本的素質乃是沖動，而沖動是不能求之于已經過上平民生活而有家室之累的那些男子的。后備兵員和現役部隊混在一起只會搞成“士氣低落的隊伍”，不可能有征服敵人的意志。

聽說在萊茵河彼岸有人也有同感。“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線”，眾口一詞都把這句話說成是德皇陛下的上諭。德國人不會把后備部隊和現役部隊混在一起，這是法國總參謀部的一個信條，這一信條又導致他們相信，德國人在前線要同時顧兩頭，即既要在右翼派出一支大軍取道比利時向默茲河以西大舉進攻，又要在他們的中路和左翼保持充分兵力，以阻止法軍向萊茵河突破，它的兵力是不足的。

米歇爾將軍呈交這份計劃之后，陸軍部長梅西米（Messimy）把它當作“有如癡人說夢”。身為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他不但準備扼殺它，并且馬上找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其他大員商議，罷免米歇爾是否適宜。

梅西米是個生氣勃勃、精力過人而近乎粗野的漢子。他長得脖粗腦圓，一雙農民的眼睛雖戴著眼鏡而依然炯炯有神，說話聲如洪鐘，原先也是一名職業軍官。1899年他是輕騎兵里的一名三十歲的上尉，為了陸軍拒絕重新審判德雷福斯一案，憤而辭職以示抗議。在那個群情激昂的年代，軍官團作為一個整體，堅決主張德雷福斯既已被定罪，再承認他有無罪的可能，就會使陸軍的崇高威望和一貫正確的名聲毀于一旦。梅西米既不能把他對陸軍的一片赤膽忠心凌駕于公正原則之上，便決心改行從政，并且公開宣布，他的目的是要“使陸軍和國民消除嫌隙，言歸于好”。他扶搖直上，懷著一腔要補偏救弊、除舊布新的熱忱進入陸軍部。他發覺有一些將軍，“別說率領不了他們的部隊，就連跟也跟不上”。于是效法西奧多·羅斯福的故伎，下令所有將軍都得騎馬指揮軍事演習。此舉招來了各方非議，說這樣老將勢必被迫引退。梅西米答道，這正是他的目的。他被任命為陸軍部長是在1911年6月30日，在此以前的四個月中，這個部長職位已經四易其人。他上任第二天便碰到阿加迪爾港（Agadir）跳出一艘德國“豹”號炮艦的事件，釀成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值此動員令隨時都會頒發的關頭，梅西米發現即將肩負總司令重任的米歇爾將軍竟然是個“踟躕不前，優柔寡斷，不堪勝任那頃刻間就要加委給他的重任之輩”。梅西米認為，這么一個人處在這樣的位置上，乃是“國家的危險”。米歇爾的這份“癡人說夢”的計劃，正好提供了一個除掉他的口實。

可是，米歇爾卻不肯馬上就走，他要先向最高軍事委員會提出他的計劃。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有著法蘭西的第一流將領：加利埃尼（Gallieni），是位在殖民地功勛卓著的將軍；波（Pau），是個親身經歷1870年之戰的獨臂老將；霞飛，是個沉默寡言的工程兵宿將；迪巴伊（Dubail），豪俠的典型，歪戴的陸軍平頂帽遮沒一只眼睛，不減第二帝國時代的“俊俏”模樣。這幾位將軍，1914年時都統率重兵，效命疆場，其中兩位還成為法蘭西的元帥。他們誰都沒有支持米歇爾的計劃。有一位出席會議的陸軍部軍官說道：“討論這份計劃是毫無意義的。米歇爾將軍神志不清。”

且不說這一裁決是否代表全體與會者的看法——米歇爾后來聲稱，本來是有人跟他看法相同的，迪巴伊將軍就是一個——梅西米卻是毫不掩飾他的敵意，并且一手左右了整個會議。命運的捉弄安排了性格倔強的是梅西米而不是米歇爾。正確的東西被否決掉，這對那些處于決策地位的人來說是不能原諒的，米歇爾為了他的洞察力付出了十足的代價。他被解除職務以后，被任命為巴黎軍事長官，在行將到來的大考驗的關鍵時刻，他又被證實了果真是“踟躕不前，優柔寡斷”。

梅西米狂熱地扼殺了米歇爾主張打防御戰的“異端邪說”之后，便運用他陸軍部長的職權為打贏進攻戰盡力裝備陸軍。但是這一回卻輪到他碰壁了，他未能使他最殷切盼望的事情——改革法國軍裝——得到實現。英國人在布爾戰爭（Boer War）過后便已采用黃卡其軍服，德國人正在打算把普魯士藍改成土灰色。但是1912年的法國兵卻仍然是1830年的穿戴——藍色軍上裝、紅軍帽、紅軍褲，1830年的步槍火力只有200步射程，軍隊都在近距離交戰，根本用不著隱蔽。梅西米曾在1912年前往巴爾干前線觀戰，看到保加利亞人因為他們的軍裝顏色暗淡而獲益匪淺，所以他回國后便決心要使法國兵不再穿戴得那么顯眼。他提出一個方案，要把軍服改成藍灰色或青灰色，但立即惹起了一陣來勢洶洶的抗議。事關陸軍榮譽，他們在換下紅軍褲這件事上寸步不讓，就跟要他們采用重炮一樣。陸軍的威望看來又一次岌岌可危了。陸軍的捍衛者們宣布，給法國兵穿上不光彩的泥巴一樣顏色的軍裝，那就實現了德雷福斯分子和共濟會分子夢寐以求的愿望。《巴黎回聲報》寫文章說，取消掉“一切鮮明的色彩，一切使士兵儀容生氣勃勃的條件，是違背法國人的審美和軍隊職能的”。梅西米指出，這兩者未必具有同等意義，但是他的反對派表明絕不動搖。一位前任陸軍部長艾蒂安（Etienne）先生在議會聽證會上便以法蘭西的名義說話。

“取消紅褲子？”他大聲疾呼，“絕對不行。紅褲子便是法蘭西！”

梅西米后來寫道：“那么盲目、那么愚蠢地死抱住一種顏色，又是所有顏色中最顯眼的一種，這自當招來慘痛的后果。”

此時，阿加迪爾危機尚未過去，他需要物色一位可以接替米歇爾出任未來總司令的人選。他打算使這一職位具有更大的權力，把它跟總參謀長的職務合并起來，同時還撤銷陸軍部的參謀長編制，當時任此職務的是迪巴伊將軍。這樣，米歇爾的繼任者將是個大權集于一身的人物。

梅西米首先選中的是戴一副夾鼻眼鏡、老成持重、勛業彪炳的老將加利埃尼，可是他辭謝了這一重任，因為他參與罷免了米歇爾，再要由他取而代之，不免有所顧慮。況且，到他六十四歲退休的年齡，也只有兩年好干了。此外他還認為，任命一個“殖民地”將軍將會招來法國本土陸軍的反感——“有個徽章問題”，他拍拍他的軍徽說道。接下來第二個人選是波將軍，但他提出一個條件：凡是擔任較高級指揮職務的將軍都要由他本人遴選提名。由于他的觀點反動是人所共知的，這樣一來，剛剛平靜下來的右派軍隊和共和主義的國民之間的長期不和就有重被挑起的危險。政府敬佩他的開誠布公，但是礙難接受他的條件。梅西米再向加利埃尼就教，后者推薦了他從前在馬達加斯加島的一個部下，說此人“處事冷靜，有條不紊，頭腦清晰，準確不誤”。因此，這一重任便托付給約瑟夫―雅克―塞澤爾·霞飛將軍（GeneralJoseph-Jacques-Césaire Joffre）了，這時他五十九歲，曾經做過工程兵總司令，此時的職務是后方勤務總司令。

身軀魁偉，大腹便便，穿著寬肥的軍服；面容豐腴，點綴著已近霜白的濃濃髭須和天生匹配的兩道粗眉；膚色白嫩，兩眼碧藍安詳，目光誠摯恬靜；霞飛的模樣活像個圣誕老人，叫人一見便有慈祥樸直之感——這兩個品質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覺的。他并非出身于縉紳之家，也不是圣西爾軍校的畢業生（而是不那么貴族化，然而卻更富有科學精神的綜合工科學校的畢業生），并且也不曾受過更高一級的陸軍大學的訓練。他的身份是工程兵軍官，軍界中的這一行不過是搞搞防御工事和修筑鐵路之類毫無浪漫色彩的事情，他所從屬的兵種不是產生將帥之才的地方。他的父親是法國比利牛斯山區（Pyrénées）的一個薄有資財的酒桶制造商，共有子女十一人，以他居長。他以往的軍事生涯的特色便是他在每一崗位上都是不聲不響地恪盡職守，干練有為；他在中國臺灣和印度支那當連長，在蘇丹和廷巴克圖（Timbuktu）當少校，在陸軍部的鐵道處當參謀，在炮兵學校當教官，1900年到1905年間在加利埃尼的部下擔任馬達加斯加島上的構筑防御工事的軍官，1905年當師長，1908年當軍長，以及在1910年以來當后方勤務總司令和最高軍事委員會委員時，都是如此。

在他的交往中，沒有聽說過有什么教權主義分子、君權主義分子，或者別的令人不能放心的人物；德雷福斯事件期間他不在國內；他有一個優秀的共和派分子的好名聲，就跟他的精心修剪的指甲一樣，沒有什么可以挑剔的；他為人穩重沉著，絲毫不動感情。他的性格的突出之處是習慣成自然的木訥少言，換在他人身上，這樣的性格不免會顯得妄自菲薄，然而它卻像是霞飛龐大安詳的軀體上散發出來的靈氣一樣，令人一見便會信心倍增。他還得再過五年才到退休年齡。

霞飛自知有一條短處：他未受過參謀業務這門深奧學問的訓練。7月里的一個大熱天，圣多米尼克街的陸軍部里，各處房門洞開，官員們瞥見門外波將軍拉住霞飛軍服上的一粒紐子。“聽我的話，親愛的朋友，”他說，“我們會把德卡斯泰爾諾給你。他對參謀工作無所不知，萬事不用你操心。”

德卡斯泰爾諾是從圣西爾軍校到陸軍大學的正途出身，他跟達達尼昂[[3]](#_3__Da_Da_Ni_Ang__Charles_de_Baa)一樣，也是加斯科涅（Gascony）人，據說那一帶地方是火熱心腸又兼冰冷頭腦的智勇雙全的人物輩出之處。他的家族與一位侯爵有瓜葛，他自己則跟耶穌會教士相往來，并且篤信天主教教義，身體力行，以至于在戰爭期間為他贏來了穿馬靴的托缽僧的雅號，這一切都使他受累不淺。他在總參謀部里卻是一個老手。霞飛倒本想選任福煦的，但是他知道梅西米對福煦抱有原因不明的偏見。因此他便一本故習，傾聽了波將軍的進言而不吭一聲，并當即采納了。

霞飛提出要德卡斯泰爾諾出任他的副手。“哎呀！”梅西米抱怨說，“你會掀起左翼各黨的一場風暴，還要給你自己結下一批政敵。”總統同意了，總理也同意了。總理對此是“面有難色”的，不過還是同意了，兩起任命便同時通過。一位袍澤，為了個人目的而鉤心斗角，向霞飛提出警告，說德卡斯泰爾諾會攆他下臺。“把我攆走！德卡斯泰爾諾絕不會。”霞飛如此作答，心中毫不介意，“我要用他六個月；然后派他去當軍長。”后來的事實證明，他認為德卡斯泰爾諾確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將才，因而戰爭爆發后他就任他為集團軍司令，而不是一個軍長。

霞飛有著無比的自信心，第二年的一件事情表明了這一點，他的副官亞歷山大少校問他，據他看來戰爭的爆發是否近在咫尺。

“我認為這毫無疑問，”霞飛回答說，“我一向是這樣看的。戰爭是要來的。我要指揮作戰，我要取得勝利。不論干什么，我都克竟其成，就像我在蘇丹那樣。這一次也會如此。”

“要是那樣，你就會有一支元帥杖了。”副官說，同時，對此前景有些肅然起敬。

“對！”霞飛承認前景確是如此，措辭簡潔，語氣沉著。

總參謀部托庇于這位巍然屹立、不怕風吹浪打的人物，從1911年以后便全力修訂《野戰條例》，用新條例的精神重新訓練部隊，并制訂新的作戰計劃，以取代現已陳舊過時的第十六號計劃。參謀人員奉為導師的福煦已離開陸軍大學，晉級升遷，在野戰部隊任職，現在坐鎮南錫（Nancy）。如他所說，南錫，這段1870年的國境線，“宛如劃在我國胸膛上的一道刀疤”。他統率第二十軍守衛著這一帶國界，不久，他就使該軍名聲大著。不過，他也給總參謀部留下一批“門徒”——法國陸軍是如此稱呼派系的，這批人便構成了霞飛的左右親信；他還留下一份戰略方案，這份方案也成了第十七號計劃的輪廓。計劃于1913年4月制訂完成，未經討論，也未經征求意見，最高軍事委員會便于5月份把它和新的《野戰條例》一并通過。接下來的八個月便是用來在這個計劃的基礎上改編陸軍，用來準備與動員、運輸、補給，以及部署集結地區與時間表有關的全部指示和命令。到1914年2月，這計劃便已安排就緒，可以按不同情況分別下達給組成法國全部陸軍的五個集團軍的司令，每個集團軍的司令拿到的只是和他本人有關的部分。

計劃的主旨，如福煦所說，在于“我們必須通過美因茨（Mainz）到達柏林”，也就是說，必須經由南錫東北130英里的美因茨渡過萊茵河。這一目標只不過是個設想。第十七號計劃跟施利芬計劃不同，它沒有一個見之于文字的總目標，也沒有一個作戰時間表。它不是一個作戰計劃，而是一個兵力部署計劃，指示每一個集團軍根據具體情況可以采取哪幾條進攻路線，但是并沒有提出確定的目標。因為它實質上是一個對德國的進攻作出反應，實行迅速回擊的計劃。德國的進攻路線法國人是無法事先確知的，所以它不得不如霞飛所說的那樣，是個“后發制人，相機行事”的應變計劃。它的意圖是堅定不移的：進攻。除此以外，一切安排都是機動靈活的。

有一份簡單的、只有五句話的總指示，列為機密文件，這是負責執行這個計劃的各位將軍所僅能共同見到的，并且是不得相互議論的文件。事實上，指示本身也沒有多少可供議論之處。它跟《野戰條例》一樣，開頭是一句鏗鏘有力、鼓舞人心的話：“在任何情況下，總司令都要求我全軍將士奮勇前進，齊心協力，對德軍發動攻擊。”總指示的其余部分，僅說明法國的行動由兩方面的重大攻勢組成，即由對梅斯至蒂永維爾一線德軍筑壘地區的左側和右側的攻勢組成。右翼，即梅斯以南地帶的攻勢，要直接向東進擊，越過舊日的洛林邊界，同時在阿爾薩斯發動輔攻，以便使法軍右翼立足萊茵河畔。梅斯左面的攻勢，也就是其北面的攻勢，或向北進攻，或在敵人侵犯中立國領土的情況下，向東北方進攻，穿越盧森堡和比利時的阿登山區，但這一行動“只能由總司令發出命令”方可實施。其總的意圖，雖然未見載明，但顯然是要向萊茵河挺進，同時把進犯的德軍右翼從后方予以切斷，使之孤立。

為此目的，第十七號計劃把法國的五個集團軍部署在從阿爾薩斯舊省的貝爾福直到伊爾松（Hirson）一帶的國境線上，法比邊界的三分之一是在這道防線內。其余三分之二，從伊爾松到海邊一段，則不予設防。米歇爾將軍原來的計劃是要在這一地帶捍衛法蘭西。這份計劃，霞飛是在接米歇爾任之后在辦公室的保險箱里發現的。它把法軍的重心集結在整個防線的外左翼，而霞飛在這里卻沒有布下一兵一卒。這純粹是一份防御計劃，它根本不想奪取主動，霞飛細心研究之后，認定這份計劃“愚不可及”。

法國總參謀部雖然收到所屬第二處——又稱軍事情報處——搜集的許多情況，表明德國人要用強大的兵力實行右翼包抄，但是該部仍然深信，否定如此用兵的論據要比證實如此用兵的證據有力得多。他們對于德軍行將橫掃佛蘭德的情報未予置信，雖然早在1904年就有過一個德國總參謀部的軍官將施利芬計劃的初期樣本泄露給他們。說起這番經過，還很有點戲劇味道。此人和一個法國情報軍官先后在布魯塞爾、巴黎和尼斯秘密會面三次，他出現的時候頭部完全用繃帶包扎起來，只露出一撮灰色的髭須和一雙犀利的眼睛。他索取了一筆相當大的代價才交出的這份文件表明，德國人計劃取道列日、那慕爾和沙勒魯瓦（Charleroi）一線穿過比利時的國土，經由瓦茲河流域的吉斯（Guise）、努瓦永（Noyon）和貢比涅（Compiegne）一線侵入法國。這條路線果真便是1914年作戰時的入侵路線，文件完全真實可靠。當時的法國總參謀長龐德扎克（Pendezac）將軍認為這份情報“完全符合主張必須采取大規模包抄戰的德國戰略的當前趨勢”，但是他的許多袍澤都持懷疑態度。他們不相信德國能動員足夠的兵力來策動這樣一場大規模的行動，他們疑心這份情報是一個疑兵之計，為的是把法軍從他們要真正進攻的地區調開。種種無法確定的因素使法國的計劃工作受到阻礙，其中最大的一個便是比利時。法國人的頭腦是講究邏輯的，在他們看來，如果德國人侵犯比利時，向安特衛普發動進攻，那就顯然要把英國卷進來反對他們。德國人有可能會自找麻煩嗎？或者，他們寧愿讓比利時不受侵犯，而重新采用老毛奇的計劃，在動作遲緩的俄國人完成他們的動員之前首先進攻俄國，這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呢？

對于德國戰略，有著若干種假設，為了要使第十七號計劃與其中一種假設相吻合，霞飛和德卡斯泰爾諾都認為，最為接近真實的一種假設便是敵軍向洛林高原大舉進犯。他們預計敵人會侵犯比利時的默茲河以東一角。他們估計敵人在無須動員后備役兵員的情況下可以投入西線的兵力為26個軍。以這一點兵力而要把戰線延伸到默茲河的彼岸去，德卡斯泰爾諾斷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同樣看法”，霞飛表示贊同。

大名鼎鼎的社會黨領袖讓·饒勒斯（Jean Jaurès）卻另有見解。他領導了反對三年兵役法的斗爭，他在演講中和在他的《新軍隊》（L’Armée nouvelle）一書中都堅信未來的戰爭將是一場動員每一個公民參加的投入大批部隊的戰爭，他堅信德國人正在準備的便是這樣一場戰爭。他還認為，二十五歲到三十三歲的后備役人員在體力上正處于頂峰狀態，他們比起沒有家庭負擔的年紀小些的人更肯打仗，他還說法蘭西若不把全體后備役人員送上前線，就會遭受“滅頂之災”。

在贊同第十七號計劃的那幫人之外，仍然有一些軍事評論家為防御戰略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格魯阿爾（Grouard）上校在他1913年出版的《可能的戰爭》（La Guerre éventuelle）一書中寫道：“我們首先要集中注意的是德國發動借道比利時的攻勢。我方的戰役發動之后，必然的后果將會如何？就我們的預見所及而言，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我們在開始時即取攻勢則我們必敗無疑。”但是如果法國做好準備，對德軍的右翼迅予回擊，“我方當可穩操勝券”。

第二處在1913年搜集到的大量情報，充分證實了德方將使用后備役兵員充當作戰部隊，這就使法國總參謀部對于這一重大因素不能再予忽視。毛奇為1913年的德國大演習寫的一篇述評落入了法國人手中，這份文件表明后備役兵員將被如此使用。比利時駐柏林武官梅洛特（Melotte）少校注意到德國人在1913年異乎尋常地征召了大量后備役兵員，并據此斷言他們將為每個現役軍征編一個后備軍，少校為此寫了報告。但是制定第十七號計劃的那些人還是不肯聽信。雖有證據表明他們仍以采取守勢為宜，但是，他們對此一概置之不顧，因為他們的全副心思和全部希望，如同他們的訓練和戰略一樣，都是定在打進攻戰上。他們深信，德國人動用后備部隊只是為了守衛交通線和“戰場中處于守勢的幾條戰線”，以及充當守軍和占領軍。他們斷然決定不防守法比邊界，他們堅決認為，如果德國人把他們的右翼延伸到佛蘭德，他們中路的兵力就會異常單薄，用德卡斯泰爾諾的話說，法國人就可以“把他們攔腰切斷”。德軍如果在右翼投入大量兵力，法國對德軍的中路和左翼就會具有優勢兵力，并會因此得益。德卡斯泰爾諾的名言，“對我方更有利！”就是這個意思。

那天，當勒巴將軍離開圣多米尼克街時，他對陪同他前去的里爾市的議會代表說：“我的袖子上是兩顆星，而他有三顆。我怎能和他辯呢？”

注釋

[[1]](#_1_3) 布朗熱（Georges Ernest Boulanger，1837—1891），法國政治冒險家。1856年參加鎮壓阿爾及利亞起義。1886—1887年任陸軍部長。曾周旋于激進派、保皇黨和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之間，提出修改憲法、解散議會和對德復仇等煽惑性綱領，旨在爭取實力，發動政變，推翻共和，建立波拿巴式的軍事獨裁。一度取得大量民眾的支持，造成共和制度的嚴重危機。1889年，陰謀被揭穿后，逃亡比利時，后自殺。他所鼓吹的沙文主義運動，通稱布朗熱主義。——譯注

[[2]](#_2_1) 法皇拿破侖三世之后。——譯注

[[3]](#_3_1) 達達尼昂（Charles de Baatz，seigneur d'Artagnan，約1611—1673），路易十四的火槍手隊的軍官，因大仲馬所寫的小說《三個火槍手》以他為主角而出名。——譯注

Official sources for Plan 17 and its predecessors are AF, Tome I, Vol. I, Chaps. 1 and 2 and Joffre, 45–112. Text of the general directive and of the deployment orders to the several armies is No. 8 in Annexes to AF, I, I. The leading critics of the Plan are Engerand, General Grouard, and General Percin; the last, being blamed for the evacuation of Lille in August 1914, had a personal ax to grind.

勒巴將軍與德卡斯泰爾諾的會面：Briey, session of May 23, evidence of M. Vendame, deputy of Lille, who accompanied Lebas; session of July 4, evidence of General Lebas.

發動有效攻勢的標準兵員密度：Col. Grandmaison had worked it out at 6 to 8 km. per army corps. Engerand, 431.

“我們宣告，阿爾薩斯人和洛林人，千秋萬代都要保留作為法蘭西民族一分子的權利”：Alexandre Zevaes, Histoire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1926, 41.

甘必大：“你們不要放在嘴邊，而要銘記心間。”：Huddleston, 36.

雨果：“法蘭西將萬眾一心”：Zevaes, op. cit., 41.

秘密巡邏隊遙望科爾馬爾：Monteil, 38.

“四十三年中任命過四十二任陸軍部長”：qtd. Craig, in Earle's Modern Strategy, 276.

“啊，多勇敢的人們！”：Pierre de la Gorce, Histoire du Second Empire, VII, 343.

福煦的進攻戰略：the quotations and episode of Clemenceau and Foch are from “Du Picq and Foch” by Stefan T. Possony and Etienne Manteux, Chap. 9 in Earle's Modern Strategy.

格朗邁松的講演：Lanrezac, 138, n. 1; Messimy, 72; John Bowditch, “The Concept of Elan Vital,” in Earle's Modern France, 39–43.

法利埃：“唯有進攻才與法國將士的氣質相稱”：Joffre, 30.

1913年頒布的新《野戰條例》：Drafted by a committee of which General Pau was chairman and which included Hély d'Oissel, later Chief of Staff of the Fifth Army, and Berthelot, later deputy chief of staff under Joffre at GQG. Published as a decree signed by Poincaré on October 28, 1913. Text in Engerand, 445–7.

威廉一世對歐仁妮皇后的回應：Engerand, 592.

米歇爾將軍在1911年提出的計劃：AF, I, I, 13–14; text of his report is in Annexes to this volume, No. 3, 7–11. Discussion of use of reserves in the front line from Proceedings of the Supreme War Council, July 19, 1911, is Annexe No. 4, 12–17.

“后備役不頂用！”：Spears, 218.

“有家室的男子不上前線”被認為是德皇上諭：Joffre, 61.

“有如癡人說夢”：Percin, 206.

“使陸軍和國民消除嫌隙，言歸于好”：Messimy, 15. “Incapable of leading their troops”: ibid., 93. “Hesitant, indecisive”: ibid., 75.

米歇爾的計劃和最高軍事委員會的回應：Briey, May 13, 23, and 30, evidence of Michel, Percin, and Messimy; Messimy, Souvenirs, 76–8; AF, I, I, 13–14.

第二帝國時代的“俊俏”模樣：In 1870 the Turco regiments under the command of General Charles Bourbaki inspired a marching song with these words:

Le chic exquis

Dont les cœurs sont conquis

Ils le doivent à qui?

A Charles Bourbaki.

　qtd. De Gaulle, 162.

“米歇爾將軍神志不清”：Briey, May 13, evidence of General Michel.

對更換鮮艷軍裝的反對言論：qtd. Messimy, 118–20.

“有個徽章問題”：Percin, 208.

“處事冷靜，有條不紊”：Messimy, 77.

“聽我的話，親愛的朋友”：Briey, May 23, evidence of Percin.

霞飛本想選任福煦：Joffre, 12.

“你會掀起左翼各黨的一場風暴”：Messimy, 78.

“把我攆走！”：Briey, May 23, evidence of Percin.

霞飛與副官亞歷山大少校的對話：Demazes, 65.

“宛如劃在我國胸膛上的一道刀疤”：Foch, Memoirs, lxii.

“我們必須通過美因茨到達柏林”：qtd. Grouard, 5, n. 2.

“后發制人，相機行事”：Joffre, 69.

“愚不可及”：Joffre, 17.

1904年施利芬計劃的泄露：Paléologue, Un Prélude, 486–88.

龐德扎克將軍：ibid., 514.

“完全不可能”：Joffre, 63.

霞飛和德卡斯泰爾諾對德軍進軍路線的猜測：Giraud, 25–29.

德卡斯泰爾諾斷定是“不可能的”，霞飛表示贊同：Joffre, 64.

法軍總參謀部知曉德方將使用后備役兵員充當作戰部隊：“It was known that the German plan of mobilization predicated that ‘troops of the reserve will be used as active troops,' ” AF, I, I, 39. The critique by Moltke is from Isaac, Reserves, 335, who also states that a French analysis made in May 1914 of the German mobilization plan for that year showed the role of reserves as identical with that of the active units. This is confirmed by Joffre in his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145–7. Major Melotte's report is from Galet, 22. Joffre (61) is the authority for the belief that the Germans would use reserves only as second-line troops.

“我的袖子上是兩顆星”：Briey, May 23, evidence of Vendame.

## 第3章　“只需英國大兵一人……”

英國和法國的聯合軍事計劃是1905年誕生的，那一年俄國在遙遠的戰場上敗于日本人之手，它在軍事上的積弱無能已公諸天下，歐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國政府都在同一瞬間突然意識到，不論哪一國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時機開啟戰端，法國勢必要在一無盟國的情況下單獨作戰。德國政府立即抓住這一時機檢驗一番。1905年俄國兵敗盛京（今沈陽）之后只過了三個星期，德皇即于3月31日御駕親臨丹吉爾（Tangier），舉世為之轟動，此行不啻是給法國下了一紙戰書。在法國人看來，這等于說德國在窺測時機，以便“舊事重演”，而且它是會找到時機的，即使現在尚非其時，為時當也不遠。“我跟大家一樣，是那天上午9時來到巴黎的。”夏爾·貝璣（Charles Péguy）如此寫道。他是詩人、編輯、神秘論者和反社會黨的社會主義者和反天主教會的天主教徒，他的話在很大程度上表達了法蘭西的心聲。“我跟大家一樣，在11時30分知道了就在那兩小時中間，我個人的一生，我國的歷史，世界的歷史，都已開始了一個新時期。”

就他自己的生平而言，貝璣的這些話確是言之不虛。1914年8月，他以四十又一之年志愿從軍，并于9月7日在馬恩河戰役陣亡。

英國也同樣對丹吉爾的挑戰作出反應。它的軍事體制當時正由伊舍勛爵主持的委員會進行全面刷新。這個委員會除他本人外，還有那位生性暴躁的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希爾爵士，他已經接二連三地大發雷霆，對海軍進行整頓；此外還有一位陸軍軍官喬治·克拉克（George Clarke）爵士，因對帝國戰略見解新穎而著名。“伊舍三巨頭”建立了一個帝國國防委員會，其職責是主管有關軍事政策，伊舍擔任常務委員，克拉克任秘書，并給陸軍新設了一個總參謀部。正當德皇提心吊膽地騎著一匹白色悍馬在丹吉爾的大街上走過的時候，英國總參謀部正在地圖上研究一場假想性的模擬戰爭，它設想德軍借道比利時在馬恩河以西和以北進行大幅度的翼側行動。這一圖上戰術作業，向作戰處長格里爾森（Grierson）將軍和他的副手羅伯遜（Robertson）將軍表明，如果英軍不能“迅速到達戰場并具有充分實力”的話，就難有堵截德國人的機會。

那時候，英國人所考慮的是獨自在比利時作戰。保守黨首相貝爾福當即吩咐給他提交一份報告，說明德國一旦入侵比利時，英方至少要多少時間才能動員起四個師的兵力并在比利時登陸。但就在此次摩洛哥危機聲中，格里爾森和羅伯遜這兩位將軍還在大陸上沿法比邊界觀察地形之時，貝爾福的政府便告倒臺了。

各方面人士神經都極度緊張，擔心德國會利用俄國正經歷著一場大難的時機，而在當年夏天挑起戰端。這時英法兩國還未訂出一份共同作戰計劃。英國的局面因為大選而動蕩不定，各部大臣都分散在全國各地奔走競選，法國人只得進行非正式的接觸。他們駐倫敦的武官于蓋（Huguet）少校接觸了一位積極主動而求成心切的中間人雷平頓（Repington）上校。上校是《泰晤士報》的軍事記者，他經伊舍和克拉克首肯之后，便開始談判。雷平頓上校在遞給法國政府的一份備忘錄中問道：“我們是否可以認為這是一條原則：除非在德國首先侵犯了比利時領土而迫不得已時，法國將不會侵犯比利時領土？”

“當然是這樣。”法國人答復說。

“法國方面是否知道，”上校問道，“任何侵犯比利時中立的行動都要自動地招致我方參戰以捍衛我們的條約義務？”上校此問，既意在警告，又是為了預先表明態度。有史以來還不曾有過一屆英國政府自行承擔責任要對某一事件“自動地”采取行動，但是這位上校卻置一切約束于不顧，任性馳騁，遠遠越出了雷池。

“法國一向是這樣看的，”對方深感愕然地答復說，“但是從未得到一個正式的保證。”

上校在作了一些誘導性的提問之后，便證實法國并不認為英國在比利時獨力作戰是上策，他還相信統一指揮——法國負陸上指揮之責，英國負海上指揮之責——乃屬“絕對必要”。

與此同時，自由黨人當選執政。他們歷來反對戰爭，反對在國外冒險，他們也有信心可以用他們的一片善心去維護和平。新政府的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上任一月便遭喪偶之痛。新任陸軍大臣是個律師，名叫理查德·霍爾丹（Richard Haldane），此人狂熱崇拜德國哲學，防務委員會里的一些軍人問他打算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時，他答稱：“一支黑格爾式的軍隊”。“交談就此中止”，他在記錄中這樣寫道。

法國人小心謹慎地與格雷接觸。格雷表示凡是他的前任已經向法國作出的保證，他都無意“收回”。他就職后的第一個星期就碰上一次重大危機，于是問霍爾丹是否有過什么安排，要求英國人在遇到緊急情況時跟法國人并肩作戰。霍爾丹查閱了檔案，沒有找到這樣的文件。但是通過他的這番查詢，發現要把四個師送到大陸得要兩個月時間。

格雷提出，兩國總參謀部之間現在是否可以舉行會談，作為“軍事上未雨綢繆之計”，而同時又無須使英國承擔責任。霍爾丹請示了首相亨利·坎貝爾―班納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首相雖然是個自由黨人，但就本人愛好而言，對于法國的事物卻是無不衷心喜愛，他有時還會搭乘渡輪往返海峽作一日之游，為的是在加來（Calais）吃一頓午飯。他同意兩國總參謀部舉行會談，但是對以“聯合準備工作”作為會談重點則不免有所顧慮。他覺得那樣一來就“非常接近于一項需要尊重的諒解”——而事實也確是如此——使協約國之間不即不離的美好現狀有遭受破壞之虞。為了避免造成這種不愉快的后果，霍爾丹作了布置，由格里爾森將軍和于蓋少校會同簽署一封信，言明雙方的會談不代表英國作出任何承諾。他安排妥帖這么一個格局之后便授權開始會談。他和格雷以及首相本人，都未將此事告知內閣其他大臣，而讓它作為一樁“部內事務”交由軍方掌握其今后的發展。

從此總參謀部就接管了這項工作。英國軍官參觀了那一年夏天的法國軍事演習，約翰·弗倫奇爵士也是其中一員，他是一位騎兵將軍，曾在布爾戰爭中一鳴驚人。格里爾森和羅伯遜在于蓋少校陪同下，重訪了法比邊界。他們征求了法國總參謀部的意見，選定了幾處登陸基地，并在沿沙勒魯瓦到那慕爾一帶的正面以及進入阿登山區的地方選定了幾處中間整備區域，因為他們估計德軍會通過比利時入侵法國。

然而，“伊舍三巨頭”根本不贊同把英國陸軍只作為法軍的一支偏師使用，所以，在摩洛哥危機的緊張局面趨于緩和之后，1905年開始的聯合計劃的制訂工作也就沒有進展。格里爾森將軍的職務已由他人接替。以伊舍勛爵為代表的居于主導地位的意見，主張在比利時采取獨立行動，不受法軍總部的節制，認為掌握安特衛普及其附近一帶海岸乃是英國的直接利益所在。而約翰·費希爾爵士則強烈主張英國必須以海軍作戰為主。他信不過法國的軍事能力，算準了德國人將在陸戰中打敗他們，所以認為把英國陸軍送過海峽去一同吃敗仗是無謂之舉。他所贊成的唯一的陸上行動是在德國的背后來一次大膽的強攻，他還選定了一個精確的地點——東普魯士沿波羅的海海岸的一段“沙土堅實的十英里長灘”。這地方離柏林不過90英里，是從海路抵達德國首都的最近地點，由海軍送去登陸的英軍部隊可以奪取這塊地方并建立一個作戰基地，“使百萬德軍無暇他顧”。此外，陸軍的作戰必須“絕對限于……對沿海一帶的突然襲擊，收復黑爾戈蘭島（Heligoland），并駐守安特衛普”。費希爾認為，陸軍在法國作戰的計劃是“自取滅亡的愚蠢行動”，陸軍部的不知戰爭為何物是出奇的，陸軍應當作為“海軍的配屬部隊”來支配。1910年初，費希爾于六十九歲時被授予爵位，同時被解除了海軍部的職務，但是他對國家的作用卻遠未告終。

1905—1906年的緊急狀態過去后，和法國的聯合軍事計劃在此后數年間進展甚微。但在這段間歇期中，有兩位人士締結了跨越海峽的友誼，這一友誼后來成了締造友誼之橋的第一條鐵索。

當時的英國參謀學院院長是亨利·威爾遜（Henry Wilson）準將，他是個身材瘦長、熱情奔放的英國血統的愛爾蘭人。他的一副尊容，據他自己認為，堪與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經常處于思潮澎湃、談吐幽默、熱情奔放、想象豐富的狀態中，特別是精力尤其旺盛。他早年在陸軍部供職時，慣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園跑步鍛煉身體，隨身帶去晨報，只要減速到慢步的時候，便邊走邊看。把他帶大的幾個保姆都是法國人，所以他能說一口流利的法語；對于德語，則不那么感興趣。1909年1月，施利芬在《德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沒有署名的文章，對他的繼任者毛奇給他的計劃所作的某些改動表示異議。他為包抄法國和英國陸軍所準備的“龐大的坎尼之戰”，在文章中雖未露細節，但基本輪廓已暴露無遺；與此同時，文章的作者是誰也不言而喻。參謀學院的一名學員將這篇文章送給院長過目，威爾遜在歸還的時候只是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爾遜將軍心血來潮，要去拜訪他的法國同仁——法國陸軍大學校長福煦將軍。他旁聽了四節講授課和一節討論課，福煦將軍優禮相待，請他吃了茶點。主人雖然因為每有貴賓來訪就得中斷工作而感到不勝其煩，不過還是認為對這位英國同行應該待之以禮。威爾遜將軍對此間所見所聞興致勃勃，坐下來一談便是三小時。當福煦終于能夠把客人送到門口，以為這下子總算可以最后道別的時候，誰知威爾遜意興仍濃，當下宣布他第二天還要再來敘談，并要再看看這里的課程。福煦不能不由衷地欽佩英國客人的這種勇氣，并為他的關切感到高興。兩人再度晤談時便肝膽相見了。不出一月，威爾遜又重臨巴黎再次聚首商談。福煦還接受了他的邀請，來春去倫敦訪問，威爾遜也同意夏天再來，觀摩法國的參謀野戰實習。

福煦來到倫敦，威爾遜介紹他與霍爾丹和陸軍部的其他人員相見。威爾遜一頭撞進一位袍澤的房間，張口就說：“我請來了一位法國將軍，就在外面，是福煦將軍。你聽著，大戰到來的時候，這家伙就會是盟國聯軍的司令。”此時此地的威爾遜，不僅已經接受了統一指揮的原則，并且定下了司令的人選，不過他的預言要見諸事實還得再經過四年苦戰，經過戰局瀕臨敗北的危境之后。

由于1909年以后的頻繁往還，兩位院校首長結成莫逆之交，威爾遜甚至成了福煦將軍家庭的座上客，還被邀請參加他愛女的婚禮。福煦跟他的朋友“亨利”一碰面就是幾小時，據一位目擊者說，所談的都是“聳人聽聞”的閑話。他們經常換戴軍帽，一高一矮，并肩散步，有時熱烈爭論，有時諧謔談笑。在威爾遜印象之中，最為深刻難忘的是陸軍大學的學習方式，既緊張活躍，又大膽果敢。教官不斷地要求當學員的軍官“快，快！”或者“干，干！”。這種緊張快速的方法一經英國參謀學院采用，便立即被命名為威爾遜氏的“‘干’的行動”（allez operation）。

威爾遜在1910年1月第二次訪法期間，曾向福煦提出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句話，但它充分表達了法國人對于跟英國結盟的看法。

“英國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對你們有所幫助？”威爾遜問道。

福煦的答復好像是利劍射出的一道寒光——“只需英國大兵一人——不過我們一定要看到他戰死沙場”。

威爾遜也一心要使英國作出承諾。他深信對德戰爭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他也竭力把自己心頭的迫切之感灌注給他的袍澤和學員，而他自己，對于這件大事則是全神貫注。1910年8月，他的機會來了。他被任命為作戰處處長，格里爾森將軍先前就是以這個身份同法國方面開始兩國總參謀部的會談的。于蓋少校立即前來拜見新任處長，當他嘆息英法軍事合作這一重大問題自1906年以來毫無進展時，威爾遜回答說：“重大問題！而且是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再也沒有別的問題比得上它了。”

聯合計劃的工作當即有了起色。除了法蘭西和比利時，威爾遜什么都不想去看，哪里都不想去。1909年首次訪法期間，他就曾坐火車、騎自行車，走訪了從瓦朗謝訥到貝爾福之間的法比邊界和法德邊界。他那時就覺察到，福煦“對于德國通過比利時進軍的重視跟我的看法一模一樣，從凡爾登到那慕爾之間是重要的一線”，換句話說，也就是默茲河以東的一線。此后四年間，他每年都要去三四次，每次都要騎自行車或駕駛汽車遍游1870年的戰場舊地，以及預計會成為未來戰場的洛林和阿登山區。每次來訪，他都要和福煦會商，在福煦調離以后，便和霞飛、德卡斯泰爾諾、迪巴伊，以及法國總參謀部的其他人員會商。

陸軍部的威爾遜辦公室里，有一整面墻的大幅比利時地圖，圖上每一條他認為德軍有可能通過的道路都用濃墨涂得黑黑的。威爾遜到陸軍部履新之后就覺察到，經過素有“將軍中的叔本華”之稱的霍爾丹的一番整頓，正規陸軍在新體制下業已進行了周詳嚴密的訓練、準備和組織工作，一旦有事，立即可以成為一支遠征勁旅，并且已經做好一切安排，動員令下之日，即可達到戰時定員。但是有關橫渡海峽的運輸問題、宿營問題、給養問題、到達法國后的集結地區問題，以及和法國軍隊共同建立防線問題的計劃，卻還一個都沒有。

威爾遜覺得總參謀部在這些問題上顯得顢頇因循，他也因此陷于周期性發作的憤懣之中，他在日記中寫道：“……令人很不滿意……沒有鐵路方面的安排……沒有馬匹供應方面的安排……情況糟不可言！……沒有安排通往港口的火車，沒有安排港口工作人員，沒有安排海軍……壓根兒未作醫療救護方面的安排……馬匹的困難尚未解決……萬事未備，真是糟不可言！……這樣毫無準備真是丟臉……馬匹問題處于叫人丟臉的狀態！”然而，到了1911年3月，他便在這樣毫無安排——以及毫無馬匹——的情況下拿出了一份動員時間表，規定好“全部六個步兵師在動員的第四天上船，騎兵在第七天上船，炮兵在第九天上船”。

時間表來得正是時候。1911年7月1日，德國“豹”號炮艦駛抵阿加迪爾。全歐洲各國的首相府或總理署，竊竊私議的都是一個詞：“戰爭”。威爾遜急忙趕往巴黎，也就在這個月里，法國最高軍事委員會撤掉了米歇爾將軍的職務，從此將防御戰略拋到九霄云外。威爾遜和迪巴伊將軍共同起草了一份備忘錄，寫明英國一旦出兵介入，出動的兵力將為六個正規師和一個騎兵師。威爾遜和迪巴伊于7月20日簽署的文件，明確規定從動員第四天至第十二天，總數為15萬人和6.7萬匹馬的兵力將在勒阿弗爾（Havre）、布洛涅（Boulogne）以及溯河而上在魯昂（Rouen）登陸，改乘火車開赴莫伯日地區的指定地點集結，而在第十三日即可投入戰斗。

迪巴伊——威爾遜協議，就其實效而言，已將英國陸軍在戰爭到來和英國參戰之時配屬于法國陸軍，那時英國軍隊部署的地區將是法軍防線的延伸地區，擔負警戒法軍翼側的任務，防范敵方的包抄。這就等于說——于蓋少校也是如此欣然記載的——法國人已經說服威爾遜和英國總參謀部不要去另搞一個“次要戰場”，而應在“主要戰場，也就是在法國戰場”上共同作戰。事實上，對于這個決定，英國海軍所要負的責任并不比法國人小，因為它對能否在多佛爾——加來（Dover-Calais）一線以北的港口登陸不肯擔保，因此排除了在距離比利時更近的或在比利時境內的港口登陸的可能性。

威爾遜返抵倫敦時，據他在日記里所寫，面臨的突出問題乃是德國是否會向“法國和我國”開戰。所以，當格雷和霍爾丹兩人在午餐桌上征詢他的意見時，他便提出了一個加強語氣的三點計劃：“第一，我們必須和法國聯合；第二，我們必須和法國人在同一天動員；第三，我們必須把六個師全部派去。”

這兩位文官對局勢的理解使他“深感失望”，不過他立即得到一個天賜良機，給政府上了一堂有關戰爭真情實況的講解課。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他自1908年起接替坎貝爾―班納曼擔任首相）于8月23日召開了一次帝國國防委員會的秘密特別會議，確定戰爭爆發時的英國戰略問題。會議開了一整天，上午由威爾遜將軍闡述陸軍的意見，下午則由費希爾的后任、海軍上將阿瑟·威爾遜（Arthur Wilson）爵士提出海軍的意見。出席會議的除阿斯奎斯、格雷和霍爾丹外，還有三位內閣成員：財政大臣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海軍大臣麥克納（Mckenna），還有一位是內政大臣。這位大臣年紀不大，才三十七歲，卻是個不可等閑視之的人物，他在危機期間便已越俎代庖，曾就海軍和軍事戰略問題接連不斷地向首相提出許多意見。他的陳言全是真知灼見，對未來的戰爭進程所作預斷準確無誤，令人驚服，對需要采取怎樣的措施，毫不含糊。這位內政大臣便是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威爾遜在這批被他稱為“無知的人們”面前，在他的一位袍澤和日后的首長，“對所談問題一竅不通”的約翰·弗倫奇爵士的幫助下，將他那幅比利時大地圖在墻上釘好，然后作了兩小時的講解。他對德國將如何利用俄國的動員遲緩而將它的主力派去對付法國人，而在兵力上取得對法軍的優勢問題，作了詳細的說明。他這一講驅散了許多幻想。他正確地陳述了德國將實行右翼包抄的進攻計劃，但是由于他深受法國理論的熏陶，把德軍直下默茲河以西的兵力估計為不會超過四個師。他聲言，如果在戰爭爆發時將英軍六個師全部派到法軍戰線左翼，則頂住德軍的攻勢便大有希望。

等到下午由海軍上將發言時，那幾位聽得出神的文官們不禁大吃一驚。他們發現海軍的計劃和陸軍的計劃竟無共同之處。他所建議的遠征軍登陸地點不在法國，而在普魯士北方海邊的一段“沙土堅實的十英里長灘”上，在那里登陸的英軍將會把“比它自身大幾十倍的德軍調離其正面作戰的前線”。他的論據受到兩位陸軍將軍的猛烈攻擊。費希爾勛爵未在場，這就給阿斯奎斯以勇氣來拒絕它，陸軍成了這次交鋒的勝利者。從此以后，費希爾的厭惡之情每隔一段時間便要咆哮發作一次。“英國海軍，所向無敵……乃是牽制德軍不使其攻進巴黎的唯一依靠。”他在數月后給友人的信中說，“咱們的士兵對于戰爭有著莫名其妙的想法，真是荒誕不經，不過，幸好他們都是無權之輩。我們將要奪取的是安特衛普，而不是在孚日山脈邊境上去做傻事。”在奪取安特衛普的想法中，有著某種不可避免的邏輯性，直至1914年戰爭到來之前的最后一分鐘，甚至在那以后，這種邏輯性還在不斷地給英國的軍事計劃拖后腿。

1911年的8月會議，跟數周前清除米歇爾將軍的那次法國最高軍事委員會一樣，既對英國的戰略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產生了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副產品。發布命令，對制定海軍政策的人選進行調整，報國心切的內政大臣欣然奉調擔任海軍大臣，到1914年，他將被證明是擔負這一重任的不可缺少的人才。

帝國國防委員會的秘密會議引起的反響，激怒了那些被關在門外的內閣大臣和黨內主張恪守和平的那一派。亨利·威爾遜聽說他本人已被看作這次會上的大壞蛋，聽說人家“都要我的腦袋”。以此為開端的內閣分裂行將在關鍵性的最后時日里演變成為異常危急的局面。政府始終保持著一種言不由衷的態度，聲言有關軍事問題的“談話”，用霍爾丹的話來說，“不過是我們與法國親密友誼的一種自然而非正式的結果”。說是自然的結果，也許是對的；說是非正式的，卻不見得。伊舍勛爵對首相說過的話并非空談，他說兩國總參謀部共同作出的計劃“不論內閣歡喜與否，顯然已使我們承擔了參戰責任”。

阿斯奎斯是怎樣答復的，或者對于如此重大的問題，他的內心深處究竟有何看法，現在都無記錄可查，何況內心深處的事情，即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也是難以探索的。

下一年，1912年，英國跟法國締結了一項海軍協定，這是一個負有重大使命的代表團——但不是前往法國而是前往柏林——所取得的結果。為了盡力勸阻德國人不要通過新的海軍法案去擴充艦隊，霍爾丹銜命前去和德皇、貝特曼―霍爾韋格（Bethmann-Hollweg）、蒂爾皮茨海軍上將以及其他領導人會談。這是英德雙方謀求在一個共同的基礎上達成諒解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但這次努力同樣失敗了。德國人對于要他們的艦隊繼續屈居英國之后提出了一個交換條件，要求英國答應在德法一旦開戰時保持中立。英國人拒不答應這一要求。霍爾丹此行歸來，便已深信德國野心勃勃，覬覦歐洲霸主地位，遲早非要抵抗不可：“我對德國總參謀部作了一番研究，我認為，一旦德國的主戰派掌權，這場大戰就不僅僅是要打倒法國和俄國而已，而且是要主宰世界。”這一結論既然出自霍爾丹之口，對于自由黨的思想和計劃的影響也就非同小可。它的第一個結果是和法國訂立海軍協定，規定在出現戰爭威脅時由英國人保護海峽和法國海岸的安全，防范敵艦攻擊，使法國艦隊得以不受牽制而專注于地中海方面。法國艦隊所作的安排是出于協定的規定，否則它絕不會如此安排的，因而這一協定也就給英國定下了一個明確的義務。

協定的內容沒有讓內閣全體知道，盡管如此，不安之感卻已不脛而走，普遍認為事情搞過了頭。反戰派不以“不承擔責任”的說法為滿足，堅決要求把它見之于書面。愛德華·格雷爵士采取了給法國大使康邦先生去一封信的形式以滿足它的要求。此信由內閣起草并予通過，算得上是一篇故弄玄虛的杰作。信中說：兩國的軍事談判容許雙方可以在今后任何時間自行決定“是否用武力相互支援”；海軍協定“并非以約定戰時進行合作為基礎”；在遇到戰爭威脅時，雙方將對兩國總參謀部的計劃“給予考慮”，“然后作出決定，應該賦予該計劃以怎樣的效力”。

這份古怪的文件使大家都感滿意：法國人滿意，因為整個英國內閣政府現在算是正式承認聯合計劃的存在了；反戰派滿意，因為文件上說了，英國并未“做出承諾”；格雷感到滿意，那是因為他的一番苦心推敲出來的一套說法，既保全了計劃，又使反對者無話可說。他說，如果當初聽從了某些方面對他的敦勸，用明白宣布跟法國結盟來代替這套說法，那就會使“內閣解散”。

阿加迪爾事件之后，每年夏天要鬧一場危機，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勢日趨緊迫，兩國總參謀部的協同工作也更形緊張。亨利·威爾遜爵士的出國旅行愈益頻繁。他已經看出，新任法國總參謀長霞飛將軍是一位“品質超群、器宇軒昂、冷靜沉著的軍人，有著堅強的性格和堅定的意志”，而德卡斯泰爾諾則是“非常聰明，富有才智”。他繼續對比利時邊界進行實地觀察，騎了車子往返于那一帶的大小道路，經常來到梅斯附近的馬斯拉圖爾（Mars-la-Tour），憑吊他具有特別愛好的1870年的戰場。他每次看見那座紀念當年鏖戰的“法蘭西”雕像，心頭便是一陣痛楚。據他自己的記載，有一次去看望雕像的時候，“我把隨身帶著的一小張地圖攤在她的腳下，地圖上標明了英國軍隊在她土地上的集結地區”。

1912年，他對德國新建的鐵路作了一番研究，所有這些線路都匯集到亞琛（Aachen）和比利時的邊界。那一年2月，英法聯合計劃的進展程度已經可以使霞飛告訴最高軍事委員會，他有把握指望英國人派來六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外加兩個騎兵旅，總數達14500人。這位法國將軍把這支英國部隊稱為“W”部隊，以示對威爾遜的崇敬。該部隊將在布洛涅、勒阿弗爾和魯昂登陸，在伊爾松―莫伯日地區集結，動員第十五天即可投入戰斗。后來，威爾遜又和霞飛、德卡斯泰爾諾以及俄國的尼古拉大公一起觀看了1912年的法軍秋季演習，然后前往俄國，同俄國總參謀部會談。1913年，他每隔一月總要去巴黎同法國總參謀部首腦人士會商，并參加防守邊界的福煦的第二十軍的演習。

正當威爾遜在步步加緊和日益完善他跟法國人的安排時，英國的新任帝國總參謀長約翰·弗倫奇爵士，卻是時至1912年還在想重彈在比利時獨立作戰的舊調。只是事經駐布魯塞爾的英國武官謹慎小心地作了幾次探詢，方才不了了之。他們發現，比利時人態度堅如鐵石，恪守中立地位。英國武官問起，在德國侵犯在先的前提下，是否可以作出聯合安排，讓英軍在比登陸。他得到的回答是，英國還是必須等到向它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時方可安排登陸。英國公使本人也作了探詢，而告訴他的結果是，如果英國部隊在德國入侵之前或未經比利時提出正式要求即行登陸，比利時人便要開火。

比利時的守身如玉，證實了英國人所不厭其煩向法國人反復申說的一點——一切都取決于德國人首先破壞比利時的中立。伊舍勛爵在1911年就已鄭重告誡于蓋少校：“不論你們有怎樣的口實，都絕對不要讓法國的將軍們首先越過比利時的邊界！”如果法國首先越過邊界，英國就絕不和它站在一邊；如果德國人首先越過邊界，那就要挑起英國去與他們為敵。法國駐倫敦大使康邦先生從另一方面表達了這一條件；他發回了許多函電，一個中心主題便是唯有德國侵犯了比利時，法國才有把握得到英國的支持。

到了1914年春天，法英兩國總參謀部的聯合計劃大功告成，每一個營最后的宿營地，甚至每一個營要上哪兒去喝咖啡都已計劃停當。需要調撥的法國火車車廂的數目，口譯人員的指派，密碼的準備，軍馬飼料的征集，這些事項或者已經安排妥當，或者可望于7月底前完成。威爾遜和他的參謀人員不斷和法國人互通消息一事，是必須嚴格保密的。一切有關兩國總參謀部稱之為“W計劃”的工作，即關于遠征軍行動計劃的工作，都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完成的，接觸這一機密的僅限于六名軍官，甚至連打字、歸檔以及一般文書工作都由他們承擔。就在軍事人員預先部署戰線時，英國的政治領袖們卻還在用“不做承諾”的毯子蒙住自己的腦袋，堅決采取眼不見為凈的態度。

注釋

貝璣：“我跟大家一樣”：from his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October 22, 1905, reprinted in his Notre Patrie, Paris, 1915, 117–18.

英國總參謀部1905年的模擬戰爭：Robertson, Private to Field Marshal, 140; Soldiers and Statesmen, I, 24.

于蓋—雷平頓備忘錄：Repington, 6–10.

“一支黑格爾式的軍隊”：Haldane, 198.

格雷、霍爾丹與1906年危機：Grey, I, 72–88; Haldane, 203–04; Before the War, 186; BD, III, 212.

坎貝爾―班納曼爵士去加來吃午飯：Maurois, 129.

“一項需要尊重的諒解”：Grey, I, 85.

霍爾丹批準會談：Grey, I, 76.

“部內事務”：Campbell-Bannerman's phrase, qtd. Repington, 10.

格里爾森和羅伯遜的方案：Tyler, John E.,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Continent, 1904–14, London, 1938, 46.

伊舍勛爵主張在比利時采取獨立行動：Esher, Journals, I, 375–6.

費希爾爵士，在東普魯士海岸登陸：Letters, III, 47; opinions of army strategy: Bacon, II, 182–3.

威爾遜去海德公園跑步：Wilson, 51; spoke French: ibid., 2.

“很有意思”：qtd. AQ, July 1929, 287.

威爾遜拜訪福煦：Wilson, 78.

“我請來了一位法國將軍”：ibid., 79–80.

“聳人聽聞”的閑話：Aston, Foch, 129.

威爾遜式的“‘干’的行動”：Wilson, 79.

“只需英國大兵一人”：ibid., 78.

“重大問題！”：Huguet, 21.

福煦“跟我的看法一模一樣”：Liddell Hart, Foch, 51: in a letter to the British military attaché, Colonel Fairholme, Foch stated his belief that the principal front would be Epinal to Namur, BD, VI, No. 460.

威爾遜在日記中的評論：Wilson, 97–8.

威爾遜和迪巴伊的備忘錄：AF, I, I, 17–18; BD, VII, No. 640.

“次要戰場”，“主要戰場”：Huguet, 8.

威爾遜與格雷、霍爾丹的會談：Wilson, 99.

帝國國防委員會的秘密會議：Wilson, 99–102; Churchill, 55–9; Haldane, 226.

“英國海軍，所向無敵”：letter of April 28, 1912, Letters, II, 456.

“都要我的腦袋”：Wilson, 106.

“自然而非正式的結果”：Haldane, Before the War, 183.

“顯然已使我們承擔了參戰責任”：Esher, Journals, III, 61.

霍爾丹代表團訪問柏林：254–262, 292; Before the War, 72–86.

和法國訂立海軍協定：Churchill, 115–16.

格雷爵士給康邦的信：Grey, I, 97–8.

“內閣解散”：Wilson, 113.

威爾遜對霞飛和德卡斯泰爾諾的評價：ibid., 105; Wilson laid a piece of map: ibid.

霞飛指望英國人派來六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Joffre, 50. Haldane put the total number at 160,000: Before the War, 189.

英國軍方與比利時的會談：BD, III, No. 217ff; Bridges (then military attaché in Brussels), 62–63.

伊舍勛爵告誡于蓋少校：Huguet, 18; Joffre, 54. Cambon's condition: Dupont, 25.

“W計劃”秘密進行：Wilson, 149.

## 第4章　俄國壓路機

俄國巨人像具有魔力似的迷惑著歐洲。在軍事計劃的棋盤上面，俄國以其地大人多而被視為龐然大物。盡管它在對日一戰中丟臉出丑，但是只要想起俄國“壓路機”，法國和英國就感到心寬膽壯；而德國人因害怕在他們背后的斯拉夫人而提心吊膽，寢食難安。

雖然俄國陸軍積弊甚多，聲名狼藉；雖然把拿破侖趕出莫斯科的是俄國的嚴冬而不是俄國的陸軍；雖然在克里米亞之戰中，俄國陸軍曾在自家土地上吃了法、英兩國的敗仗；雖然土耳其在1877年的普列文防御戰（Siege of Plevna）中已經挫敗俄軍，只是后來因為眾寡懸殊而告失利；雖然日本已在滿洲打敗了俄軍；但是俄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仍然流傳一時。哥薩克騎兵沖鋒，殺聲震天，兇悍殘忍，在歐洲已深入人心，所以報刊的藝術家們在1914年8月能夠置身俄國戰線千里之外而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工細筆刻畫出這樣的畫面。人們對俄國軍隊已形成一個概念，那就是哥薩克加上不虞耗盡的數以百萬計的身強力壯、馴服聽命、視死如歸的莊稼漢（mujiks）。俄國陸軍為數之大，令人咋舌：平時兵力為142.3萬人；一經動員征召，便可再增加311.5萬人；此外還有一支200萬人的地方軍和可以征召入伍的后備力量；因此可供使用的兵員總額達650萬人。

在人們的腦海中，俄國軍隊是個龐然大物，開始時不免臃腫遲鈍，但是一旦充分動員起來投入行動，它一浪接一浪永無窮盡的人海波濤，不論傷亡多大，都會不屈不撓，前仆后繼，滾滾向前。自從對日作戰以來，軍隊里便開始進行整頓，肅清其顢頇無能、營私舞弊的現象，并且據信業已取得成效。法國政界，“對俄國日益強大的實力，驚人的資源、潛力和財富，具有非同尋常的印象”。愛德華·格雷爵士于1914年4月前往巴黎和俄國人談判海軍協定時，便注意到這一點并抱有同感。他對普恩加萊（Poincaré）總統說：“俄國的資源非常富足，就是我們不去支援俄國，時間一長，德國人也要山窮水盡的。”

在法國人看來，第十七號計劃能否勝利，向萊茵河進軍能否所向披靡，將是他們民族存亡所系的大事，也是歐洲史上的關鍵時刻之一。為了保證他們能突破德軍中路，他們的既定目標是要俄國人牽制住一部分同他們對壘的德軍。問題在于要使俄國人在德、法兩國各自在西線發動攻勢的同時，在德軍后方發動攻勢，也就是說，盡可能在接近動員第十五天行動。法國人跟別人一樣深知要俄國在十五天之內完成動員和集結部隊，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要求它于動員第十五天以手頭已有的力量開始作戰。他們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叫德國人從一開頭就得兩面作戰，以削弱他們所面臨的德軍優勢兵力。

1911年，當時身任陸軍部參謀長的迪巴伊將軍奉派前往俄國，去給俄國的總參謀部灌輸必須奪取主動的作戰思想。在一場歐洲大戰中，一半的俄國軍隊得集中用于對付奧地利，而用于對德作戰的部隊，在動員第十五天也只有半數可以準備就緒，盡管如此，圣彼得堡在精神上卻是雄心勃勃、躍躍欲試。俄國人正因他們的軍隊蒙垢而急于重振軍威，同時對計劃的全部細節又抱著一種船到橋頭自會直的態度，所以便同意跟法國人同時發動攻勢，這自然是大膽有余而細心不足。迪巴伊得到了俄國人的承諾，一俟俄國的前線部隊進入陣地，不等全軍集結完畢，就在動員第十六天發動進攻，越過東普魯士的邊界。“我們應該對準德國的心臟打擊，”沙皇在雙方簽字的協議上聲言，“我們兩國的共同目標必須是柏林。”

要求俄國盡早發動攻勢的協議經過兩國總參謀部之間一年一度的會談而愈形牢固加強，這種總參謀部之間的會談正是法俄同盟的一個特色。1912年，俄國總參謀長日林斯基（Jilinsky）來到巴黎；1913年，霞飛將軍前往俄國。到這時，俄國人已經完全受制于沖動的魔力。自從兵敗滿洲以來，他們確也需要一雪出師敗績的恥辱，因軍力孱弱而自慚形穢的心情當然也需要謀求振作之道。格朗邁松上校的演講集譯成了俄文，備受歡迎。俄國總參謀部因為領受了光華熠熠的“殊死進攻”的理論而神采飛揚，所以其諾言也就一再加碼。1912年，日林斯基將軍承諾將用于德國前線的80萬人在動員第十五天全部送達，而不顧俄國的鐵路與此項任務顯然不相適應。1913年，他又把進攻的日子提前兩天，不顧俄國兵工廠的炮彈生產能力不到估計需求量的三分之二，而步槍子彈生產能力還不到一半。

盟國并不因俄國軍事上的弱點而牽腸掛肚，雖然英國派到日本軍中的軍事觀察員伊恩·漢密爾頓（Ian Hamilton）早在滿洲時就曾對這些弱點寫過不留情面的報告。這些弱點表現為：情報工作很差，部隊不知隱蔽，不知保密，也不講求行動的敏捷，缺少斗志和主動性，缺少良好的將才。每周為《泰晤士報》撰文評論日俄戰局的雷平頓上校，由于他在評論中所形成的看法，把他的專欄文章匯編成書獻給了日本天皇。盡管如此，英法兩國的總參謀部卻仍然認為，它們需要關心的只是促使俄羅斯巨人行動起來，而無須考慮他如何發揮作用。但這談何容易。在動員期間平均每一個俄國兵的輸送里程是700英里，為德國兵的4倍，而當時俄國每平方公里的鐵路只及德國的十分之一。作為防范入侵的國防措施，俄國的鐵路軌距有心造得比德國為寬，法國人提供巨額貸款資助增建的鐵路又未告成，所以要俄國人達到同樣的動員速度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俄國人答應派往德國前線的80萬人在動員第十五天只有半數能進入陣地向東普魯士猛撲過去，不論其軍事組織如何之糟，預計都會對戰局造成極大的影響。

派出大軍在敵國境內打一場現代戰爭，乃是一種充滿危險而又萬分復雜的行動，需要作一番嘔心瀝血的精心組織，在鐵路軌距寬窄互異的不利條件下，尤其如此。但在俄國陸軍的特點中，井井有條、一絲不茍，并不顯著。

由于耆齡老將過多，軍官團形成了頭重腳輕的局面，他們最鍛煉腦力的工作是斗紙牌。不顧體力條件而讓他們忝居現役軍職，為的是要保全他們在宮廷里的恩寵和權勢。軍官的任命和擢升，主要依仗有社會地位或是有錢的靠山。他們當中固然不乏英勇干練的軍人，但是那個制度卻不利于把最優秀的人才推上最高層。他們對于戶外運動的“怠惰和不感興趣”使得一位英國武官為之愕然。他訪問過阿富汗邊境附近的一處俄國邊防軍的駐地，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里居然連“一個網球場也沒有”。經過日俄戰爭以后的大清洗，大批將校不是呈請辭職便是被迫離職，清洗的目的是為了拂除凝聚在上層的陳年積垢。一年之間，因為不稱職而退役的將官達341人，這個數目接近法國陸軍的將官總額，而作同樣處理的上校也有400人。盡管在俸金和晉升方面有所改進，但1913年軍官缺員仍達3000名之多。日俄戰爭以后，雖然在清除陸軍中的積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無奈俄國的政體還是那個政體。

“這是個愚不可及的政體，”其最精明能干的捍衛者，1903年至1906年間出任首相的維特（Witte）伯爵便是這樣稱呼它的，“它是集怯懦、盲目、狡詐、愚蠢于一體的大雜燴。”這個政體的統治者是個高高在上的君主，他在施政用人上只存一個念頭，即把他的父皇傳給他的專制皇權妥加維護，勿使缺損。此人一無才智，精力也不充沛，又未受過負此重任的訓練，他依靠的是一批朝貴幸臣，他心血來潮，執拗成性，還有那輕率浮躁的專制君主的奇思異想。他的父皇亞歷山大三世別出心裁地故意讓這個兒子在三十歲以前得不到一點親政治民的教育，不幸的是老皇未能算準他自身的陽壽，死的那年尼古拉才二十六歲。新沙皇如今四十六歲了，這段時間里他什么東西也沒有學到手，他給人的那種冷靜沉著的印象，究其實不過是麻木不仁的表現——頭腦過于淺薄，思維毫無深度。報告俄國艦隊在對馬（Tsushima）海峽全軍覆沒的急電送到他的手中，他看過后便往口袋里一塞，繼續打他的網球。1913年11月，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訪問柏林歸來，前來覲見報告德國的備戰情況，尼古拉跟往常一樣全神貫注，目不轉睛，“直視我的兩眼”。首相報告完畢，相對無語好久，“他才如夢方醒，神情嚴肅地說了句，‘愿神的旨意能完成！’”。科科夫佐夫終于曉得，其實他是聽得不耐煩了。

這個政體賴以支撐的底部乃是一支遍布國內的秘密警察，京城的各部局，外省的大小衙門，他們都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弄得連維特伯爵也不得不把他自己寫回憶錄所需的筆記和記錄逐年寄存在法國一家銀行的保管庫里，以策萬全。還有一位首相斯托雷平（Stolypin）在1911年遇刺身死，后來查出，兇犯竟是秘密警察，他們故意下此毒手，制造事端，好嫁禍于革命派。

在沙皇與秘密警察之間，充當這個政權的支柱的是一大批文官（Tchinovniki），他們是一個出身于貴族世家的官僚與官員的階級，實際上行使政府職權的便是這批人。他們無須向憲政機構負責，只有沙皇的獨斷獨行可以撤換他們，宮廷里鉤心斗角成風，皇后又猜忌多疑，沙皇聽從讒言，也就動輒罷官削職。大局如此，英彥俊碩都難以久安于位，有一個托詞“體弱多病”而辭官不就的人引起了他的同僚喟然興嘆，“在這年頭，人人都體弱多病”。

民怨接近沸點，終尼古拉二世一朝的俄羅斯，國無寧日：災禍頻仍，屠戮不絕，出師屢敗，民不聊生而相繼舉義，終致釀成1905年的革命。維特伯爵當時曾向沙皇進諫，若不俯順民心，畀予憲法，就須厲行軍事專政，以恢復秩序。沙皇迫不得已而忍氣吞聲，采納了前者，這純粹是因為擔任圣彼得堡軍區司令的先皇的堂兄弟尼古拉大公拒不承擔軍事專政的責任的緣故。大公這一次坐失機宜，從此便永遠得不到那些極端保守的皇權主義分子的寬宥，同樣得不到那些波羅的海地區的具有德國血統和傾心德國的王公大人，那些黑色百人團——“右翼無政府主義分子”——以及作為專制政權頑固堡壘中堅的其他反動集團的寬宥。他們覺得，曾經一度結成三皇同盟的三個帝制國家之間的共同利益，比起西歐的民主國家來，德國更其是俄國的當然盟國。許多德國人也是這樣想的，就是德皇本人有時也是這樣想的。俄國的反動派別把國內的自由派看成他們的頭號敵人，他們寧要德皇而不要杜馬，這種態度跟日后的法國右派如出一轍，他們寧要希特勒而不要萊昂·布盧姆（Léon Blum）。只是由于戰前二十年間德國自身咄咄逼人的氣焰愈演愈烈，這才促使沙皇俄國一反初衷去跟共和政體的法蘭西結盟。到了最后關頭，德國的威脅甚至還把它跟英國結成一伙，但就是這個英國，使俄國對君士坦丁堡可望而不可即已達一個世紀之久。當今沙皇的一位皇叔——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Vladimir Alexandrovich）大公曾于1898年說過這樣的話：“我希望活到能聽見英國臨終時的咽氣聲。我每天向上帝熱切禱告祈求的就是這個！”

弗拉基米爾一流人物主宰了這個完全保留著尼祿[[1]](#_1__Ni_Lu__Nero_37__68__Gu_Luo_M)遺風的宮廷，朝廷命婦都從一個無知的拉斯普京[[2]](#_2__La_Si_Pu_Jing__Rasputin_1872)主持的午后降神會（séances）的刺激中恣意作樂。但是俄羅斯也自有其一批杜馬中的民主派和自由派；自有其虛無主義者巴枯寧（Bakunin）；自有其皈依無政府主義的克魯泡特金（Kropotkin）王子；自有其“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關于這個階層，沙皇曾經說過，“我最討厭這個詞！我但愿下一道詔令，讓科學院把這個詞從俄語詞典里刪掉”；俄羅斯也自有其一批列文[[3]](#_3__Lie_Wen__Levin__E_Guo_Lie_Fu)，為自己的靈魂，為社會主義，并且也為俄羅斯的土地，內心備受煎熬，此恨綿綿無盡期；自有其一批絕望的萬尼亞舅舅[[4]](#_4__Wan_Ni_Ya_Jiu_Jiu__Uncle_Van)；自有其獨特氣質，促使一位英國外交官得出結論，認為“在俄羅斯，人人都有點兒瘋瘋癲癲”的，就是這氣質，一種叫做“斯拉夫魅力”（le charme slav）的氣質，半是無所用心，半是無所事事，一種19世紀末的頹廢氣氛（fin de siècle），這種氣氛有如一片薄霧籠罩著涅瓦河畔的那座城市，世人只知它是圣彼得堡，而不知它是“櫻桃園”[[5]](#_5____Ying_Tao_Yuan_____CherryOr)。

就備戰的情況而言，只消舉出一個人來便可以代表這個政權的全貌了，此人乃是陸軍大臣蘇霍姆利諾夫將軍。他是一個年逾六旬的矮胖子，詭計多端，游手好閑，尋歡作樂，他的同僚、外交大臣薩佐諾夫（Sazonov）對他有個評語：“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可是要他說句老實話那就簡直難如上青天。”1877年對土耳其的一仗中，蘇霍姆利諾夫是一員驍勇的年輕騎兵軍官，榮獲圣喬治十字勛章，所以他深信不疑，那次戰役中學到的軍事知識都是永恒真理。他曾以陸軍大臣的身份出席一次參謀學院教官的集會，會上居然有人對諸如火力要素對馬刀、長矛、刺刀沖鋒的不利影響之類的“新花樣”有興趣，他對此斥責了一通。他毫不在意地說道，他聽不得“現代戰爭”這個詞兒。“過去的戰爭是這樣，現在的戰爭也還是這樣……這種種玩意兒都不過是邪門歪道的新花樣。拿我本人來說，二十五年來我就沒有看過一本軍事手冊。”1913年，他把參謀學院的五名教官撤職，為的是他們都堅持宣揚什么“射擊的組織與實施”的異端邪說。

蘇霍姆利諾夫的智慧，因其輕浮佻而顯得狡黠機靈，也就失去了他的混沌純樸的本色。他身材不高，細皮白肉，生就一張貓兒臉，蓄著一把整齊雪白的胡須，全身媚態十足，近乎奸詐，他既要存心巴結沙皇那樣的人物，這些人也就無不入其彀中。在旁人眼中，例如在法國大使帕萊奧洛格（Paléologue）眼中，他的形象“使人一見便會產生不可信任的感覺”。內閣大臣的任免，全憑沙皇的一時興致，蘇霍姆利諾夫之所以能得寵而不衰，靠的是一套諂媚迎合和曲意承歡的功夫，說點兒湊趣討好的故事，來幾下滑稽逗趣的動作，小心不去議論正經大事或不快意的話題，再加上小心侍候那位當時的“御友”拉斯普京。因此緣故，事實表明，什么營私舞弊和尸位素餐的罪名，什么鬧得滿城風雨的離婚丑聞，甚至連轟動一時的間諜丑聞，也都對他的地位毫無影響，他仍好官我自為之。

1906年，蘇霍姆利諾夫迷上了一個外省省長的二十三歲夫人。他千方百計栽贓誣陷，策劃離婚，甩掉那個丈夫，娶了這個絕色尤物做他的第四任夫人。他生來是個懶坯，從此以后便越來越把公事推給下屬去辦，用那位法國大使的話來說，“把他自己的全部精力專門用來跟一位比他年輕三十二歲的夫人盡享魚水之歡”。蘇霍姆利諾夫夫人喜歡向巴黎定購時裝，出入豪華的酒樓飯館，舉行盛大的筵宴舞會。為了滿足她揮霍浪費之需，蘇霍姆利諾夫及早施展了虛報開支之術而財運亨通。他按每天24俄里騎馬視察的費用向公家報銷旅費，實際上他的出巡都是乘坐火車。他的貪污所得，數字已屬不小，加上他對股票市場的行情又能得到幕后消息而增辟了一個財源，六年之間他在銀行里存入了702737盧布，而他這六年的俸金一共是270000盧布。他的生財之道還包括他的左右親信給他的孝敬，只要他簽發幾張軍事通行證，送幾張參觀演習的請柬，或者其他形式的材料，那些人便會借給他款予以報答他的盛情。其中有一個奧地利人，名叫阿爾特席勒（Altschiller），蘇霍姆利諾夫夫人離婚所需的證據便是此人供給的，他以摯友的身份出入陸軍大臣的府邸和辦公室，在這兩處地方，文件都是四下亂攤的。1914年1月，此人離境之后，真相暴露，他原來是奧地利派來俄國的間諜頭子。還有一個更為聲名狼藉的米亞索耶捷夫（Myasoedev）上校，盛傳他是蘇霍姆利諾夫夫人的情夫，此人不過是邊境上一個鐵路警務處長，居然擁有五枚德國勛章，并蒙德皇邀往離邊界不遠的羅明滕森林（Rominten）皇帝行獵別館赴宴。毫不足奇，米亞索耶捷夫有從事間諜活動的嫌疑。他在1912年被捕受審，但是由于蘇霍姆利諾夫親自干預而宣布無罪并得官復原職，直至戰爭開始后一年。1915年，由于他的庇護人終于因俄國的屢戰屢敗而被罷官，他又再次被捕定罪，以間諜罪被處絞刑。

蘇霍姆利諾夫在1914年以后的運道頗不平常。他先前之所以能夠與米亞索耶捷夫上校同時幸免被起訴判刑，純系沙皇和皇后的庇護；最后，到了1917年8月，沙皇業已遜位，臨時政府淪于土崩瓦解的境地，他也墮入法網。在當時千瘡百孔、一片混亂的局面下，他的案子名義上雖是叛國罪，而審訊的內容卻大都是舊政權的種種罪惡。檢察官概述案由，把這種種罪惡歸納成為一條：俄國老百姓被迫作戰，既無槍炮又無彈藥，對政府完全喪失信心，這種絕望心情散布蔓延，無異瘟疫，“后果極為嚴重”。經過一個月轟動一時的聽證，他貪贓舞弊、荒淫縱欲的具體情節都真相大白，蘇霍姆利諾夫的叛國罪是洗刷掉了，但是他“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罪無可逭。他被判處終身苦役，只過了幾個月就被布爾什維克黨人釋放，隨即前往柏林定居，直至1926年病故。1924年他在柏林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并題字獻給德國的廢帝。他在序言里聲稱，俄國和德國這兩大君主政體由于在戰爭中互為仇敵而同歸于盡，只有兩國言歸于好才能使兩國的君主復位親政。這個見解使那個流亡在外的霍亨索倫皇室的廢帝感觸至深，他便寫了一個題獻，把他自己的回憶錄回敬給蘇霍姆利諾夫，顯然是由于受到勸阻，這個題獻在公開出版的本子上并未刊用。

從1908年到1914年擔任俄國陸軍大臣的便是這么一個人物。他代表了反動派別的意見，并得到反動派別的擁護，對德備戰工作該是陸軍部的主要任務，但在他主持下并不是那么一心一意搞的。日俄戰爭的奇恥大辱之后開始的陸軍改革運動，已經取得進展，他卻立即把它草草收場。總參謀部本來已被授予獨立建制，以開展現代軍事科學研究，可是1908年以后又重新隸屬于陸軍大臣的管轄，而且只有大臣一人能覲見沙皇。總參謀部被削去了自主的權力，從此便得不到一個能有作為的領導人，甚至也沒有一個第二流角色能有始有終地領導下去。1914年以前的六年間，一共換了六個總參謀長，影響所及，作戰計劃也就休想是系統周密的了。

蘇霍姆利諾夫雖說把工作全部推諉給屬下去辦，卻容不得別人有什么主張。死抱住那一套陳腐過時的理論，忘不掉年代久遠的戰功榮譽，他一口咬定俄國過去的失敗，只是由于司令官的錯誤，而不是由于訓練、準備和供應各方面的不足。他頑固不化，堅信刺刀勝過子彈，所以根本不肯花費氣力去興建工廠，增產炮彈、步槍和子彈。沒有一個國家在軍需品上是準備充分的，這是各國軍事批評家們毫無例外地事后得出的結論。如英國的缺少炮彈后來竟成了一樁有損國家聲譽的丑聞；法國從重炮直到軍靴的不足，在戰爭開始前就已是丑聞。但是，在俄國，蘇霍姆利諾夫甚至連政府專供生產軍火的撥款也沒有用完。俄國在開戰時每門大炮只攤到850發炮彈，對比起來，西方國家每門大炮則有2000到3000發炮彈的儲備，而蘇霍姆利諾夫本人也曾在1912年同意過一個折中辦法，給每門大炮儲備1500發炮彈。俄國的一個步兵師有7個野戰炮連，德國的步兵師卻有14個。整個俄國陸軍有60個重炮連，而德國陸軍則有381個。戰爭主要取決于雙方火力的較量，而蘇霍姆利諾夫對于這類告誡則一概嗤之以鼻。

他厭惡“射擊的組織與實施”，但他更為反感的，就是那位比他年輕八歲，又是代表軍隊中革新傾向的尼古拉大公了。大公身長1米98，體態挺秀，相貌英俊，山羊胡子，穿的一雙靴子高及馬的下腹，算得上是風度翩翩，儀表堂堂。對日戰爭以后，他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主席，負責改組陸軍。該委員會的宗旨和布爾戰爭之后的伊舍委員會一樣，不過跟它的英國樣板有不同之處，它問世不久便落入了官老爺們的手中，淪于死氣沉沉的境地。反動派別對這位大公又恨又怕，恨的是他插手了那篇憲政宣言，怕的是他深得人心，所以到1908年便把國防委員會撤銷了事。他是一個職業軍官，在日俄戰爭中曾任騎兵總監，全軍現職軍官，他幾乎無不熟識，因為他身為圣彼得堡軍區司令，他們奉命履新時都例須向他報到，他便成了軍中最受欽佩的人。他之受欽佩，主要倒不是出于他的特殊勛績，而是由于他的身材、儀表和風度，是這些喚起了士兵的信仰和敬畏，是這些在他的袍澤中贏得了傾心敬慕，但也引起了嫉妒憎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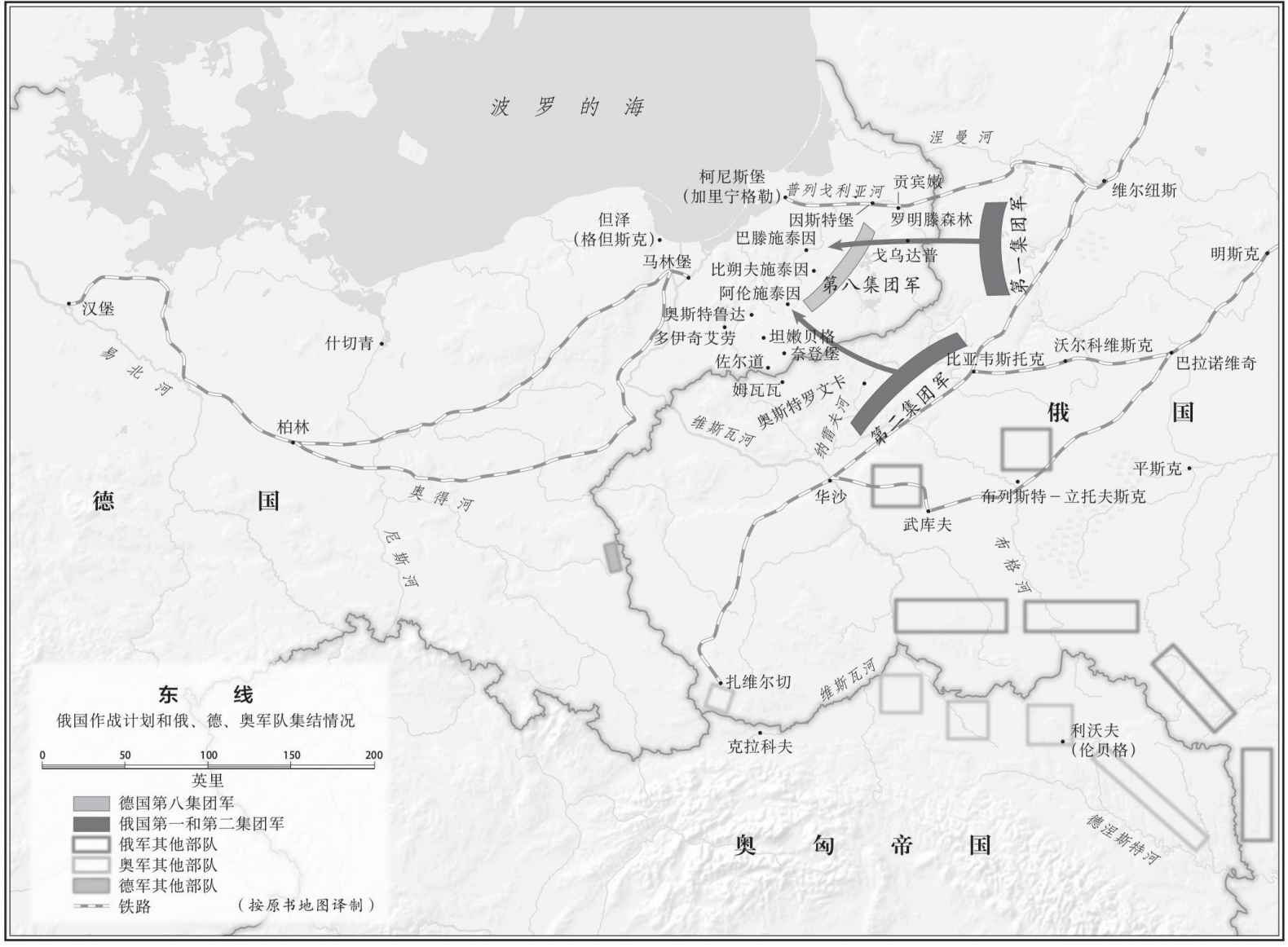
他對待部下，不假辭色，甚至粗暴，不論軍官小兵，他都是這樣，宮廷圈子外面的人都把他看作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漢”。從未見過他的農家出身的士兵，都津津樂道關于他的傳聞軼事，把他說得神乎其神，成了一個專與“德國幫”和朝廷里的壞人壞事作斗爭的神圣俄羅斯的捍衛者。這種輿情，此響彼應，但絲毫無補于他在宮廷內的人緣，尤其是在皇后面前，她本來就因為他鄙視拉斯普京而恨透了“那個尼古拉”。“我對他絕不信任，”她寫給沙皇的信中說，“我看穿了他根本不是聰明人，他連侍奉上帝的人都要反對，可見他做的事情得不到上天的保佑，他出的主意也好不了。”她還無休無止地數說他搞陰謀詭計，要迫使沙皇遜位，并且憑借他在軍隊方面的深得人心，由他自己登上皇位。

沙皇對他心懷疑懼，使他在對日作戰期間未能成為總司令，因此也成全了他事后沒有遭受譴責。今后再有戰爭，勢必非要讓他出馬不可，戰前制訂的計劃中就已內定由他出任對德作戰的前線司令，沙皇本人預期將親自擔任總司令，而由一位總參謀長指揮作戰。大公曾經數次前往法國參觀演習，并且深受福煦的影響，他也跟福煦一樣懷有必勝信念；他還受到盛宴款待，究其原因，除了人所共知的他的仇德情緒之外，同樣也是由于他的雍容豪邁的風度，使人一見就有此人是俄國威力的象征之感。法國人都津津樂道大公的隨從科茨布（Kotzebue）伯爵的一番議論，這位伯爵說過，他的首長認為，只有把德國徹底粉碎，并把它重新分割為一個個小邦國，讓它們各有一個小朝廷去快快活活過日子，才能使全世界有希望在和平中生活。大公的夫人阿納斯塔西婭（Anastasia），和嫁給大公的弟弟彼得的她的妹妹米莉姹（Militza），對法國的熱忱也是毫不遜色。她們兩位同是黑山國王尼基塔（Nikita）的公主，她們對法國的愛慕是和她們天生的對奧地利的仇恨成正比例的。1914年7月下旬，在一次皇室的野餐會上，帕萊奧洛格稱之為“黑山的夜鶯”的這兩位大公夫人，過來與帕萊奧洛格聚在一起，絮叨起這場危機。“戰爭要打起來了……奧地利要輸個精光……你們將收復阿爾薩斯―洛林……我們兩國的軍隊要在柏林會師。”姊妹倆一個給大使看了一只鑲寶石的小匣，里面盛的是洛林的泥土，另一個告訴大使她在自己的花園里種上了洛林的大薊花。

俄國總參謀部未雨綢繆，制訂了兩份作戰計劃，待最后視德國如何行動而擇定使用。如果德國以主力攻打法國，俄國就要用主力攻打奧地利。在這種情況下，用四個集團軍投入奧地利戰場，用兩個集團軍投入德國戰場。

對德作戰計劃規定了以俄國的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向東普魯士發動鉗形攻勢，第一集團軍向北路進軍，第二集團軍向南路進軍，從南面繞過馬祖里湖泊地帶（Masurian Lakes）的天然障礙。第一集團軍的集結地區在維爾紐斯（Vilna），所以又名維爾紐斯軍，它有一條直達的鐵路線可通，可以首先出發。它將比第二集團軍即華沙軍先兩天向德軍前進，“其任務為盡可能把最大量的德軍兵力吸引過來”。與此同時，第二集團軍將從南面繞過湖泊地帶的障礙，插入德軍背后，切斷其向維斯瓦河（Vistula River）的退路。鉗形運動的成功取決于時間配合的準確，不使德軍與任何一翼單獨交鋒。務必使敵軍“不論何時何地，一經遭遇，就要受到有力的、堅決的打擊”。一俟德軍被圍殲之后，第二步就是向距離維斯瓦河150英里的柏林進軍。

德國的作戰計劃并不打算把東普魯士拱手讓人。在這片國土上，農莊富庶，牧場廣闊，荷爾斯泰因種的牛群隨處放牧，豬群和雞群在石頭圍墻的場院里東奔西突，著名的特拉克嫩（Trakehnen）種馬為德國陸軍繁育著源源不斷的戰馬。那兒的大莊園都歸容克貴族所有，一個容克老爺雇用的一個英國女管家曾經大驚失色地目睹他們騎在馬背上胡亂射殺狐貍，而不是正正經經地打獵。再朝東去，接近俄國，那兒便是“水波不興、林木茂密”之鄉，湖泊四布，水邊菰蒲叢生，森林遍野，松樹白樺相間，一處處沼澤，一道道溪流。這里最知名的勝地便是貼近俄國邊界的羅明滕森林，它是霍亨索倫皇室的禁苑，方圓9萬英畝。德皇每年都來行獵，他下身穿一條長到膝蓋的燈籠褲，頭戴一頂有羽飾的帽子，捕獵野豬和鹿，有時也會有一只俄國麋鹿天真爛漫地踱過國界送上門來做皇帝陛下的槍靶子。雖然他的百姓都不是條頓族，而是斯拉夫族，但這個地區自從條頓騎士團于1225年盤踞以來，七百年間除了波蘭人的幾度統治以外，一直是德國人管轄的。盡管條頓騎士團于1410年在一處名叫坦嫩貝格[[6]](#_6__Tan_Nen_Bei_Ge__Tannenberg)的村子與波蘭人、立陶宛人大戰一場吃了敗仗，但他們依然在這一帶安居樂業，并且演變——也許是衰落——成為容克地主貴族。1701年，霍亨索倫皇室的第一位君主便是在這一區域的首府柯尼斯堡（Königsberg）加冕登上普魯士王位的。



在東普魯士，波羅的海的水波拍打著它的岸邊，普魯士的歷代君主加冕登基之地的“國王城”便在它的境內，德國人豈肯輕易將它放棄。沿安格拉普河（Angerapp River），一直穿過因斯特堡峽口（Insterburg Gap），都已精心修筑了防御工事；在東部沼澤地區，道路都建成高出地面的堤道，因此可以將敵人約束在高于平地的狹窄堤上。此外，整個東普魯士鐵路網縱橫交錯，守軍便于運動，可以從一條戰線迅速轉移到另一條戰線，迎擊敵軍的任何一翼。

當初通過施利芬計劃的時候，對于東普魯士還無須如此擔心，因為當時估計，俄國勢須在遠東保持巨大兵力以防日本。德國的外交雖說有過失敗的記錄，但還是被寄予克服英日條約的障礙，使日本保持中立，叫俄國無法擺脫后顧之憂的希望，因為在德國看來，英日結盟是反常的。

德國總參謀部里的俄國事務專家是馬克斯·霍夫曼（Max Hoffmann）中校，他的工作是研究俄國在對德作戰時會采用怎樣的作戰計劃。霍夫曼年方四十開外，身材魁梧粗壯，腦袋又大又圓，普魯士式短頭發，短得快要露出頭皮，使他顯得像是禿頭。他神態隨和，但絕非茍且。他戴一副黑邊眼鏡，兩道烏黑的眉毛捻得左右卷翹。對于小巧的雙手和褲子上無瑕可擊的熨燙折痕，他都同樣地細心護持而引以自豪。他雖好逸惡勞，但卻善于隨機應變；他雖拙于騎術，擊劍更其糟糕，外加貪吃愛喝，但卻多謀善斷。他稟性和順，遇事都能天從人愿，卻敏銳精明，誰都不放在眼里。戰前他在團部執行帶兵任務期間，常去軍官俱樂部通宵飲酒、大吃香腸，直至清晨7時帶隊出操，收操后回到俱樂部還得再來點香腸之類的小吃，喝上兩夸脫無果味的摩澤爾白酒，然后才吃早飯。

1898年霍夫曼從參謀學院畢業后，曾奉派到俄國擔任譯員六個月，接著在施利芬任內的總參謀部的俄國科干了五年，然后在日俄戰爭中出任德國的軍事觀察員。一位日本將軍不準他登上一座小山就近觀戰，這時，軍人的禮貌便被德國人的天性沖垮了，而這種天性的流露往往使他們難以和別人親近。“你這個黃皮家伙；要是不讓我上那山頭去，你就不是個文明人！”霍夫曼沖著那位將軍咆哮，當時在場的還有其他外國武官，以及至少一名記者。這位將軍所屬的種族，其妄自尊大比起德國人來毫不遜色，他也大聲回敬：“這兒的軍事情報是我們日本人用自己的鮮血換來的，我們不打算跟別人分享！”出現了這么一個場面，那就什么禮節都談不上了。

霍夫曼回到毛奇掌管的總參謀部后，重理舊業，研究俄國的作戰計劃。俄國總參謀部的一個上校曾于1902年以高價賣出了一份本國的作戰計劃，那是個早先的文本，據霍夫曼所寫的并非全都認真可信的回憶錄所說，從那以后，價格扶搖直上，不是德國的軍事情報機關分攤到的微薄的經費所能問津的了。東普魯士的地形既然如此，俄國攻勢的大致模樣也就不問可知：它勢必沿著馬祖里湖泊地帶兩側發動鉗形攻勢。霍夫曼研究了俄國陸軍，研究了制約著它動員和運輸的各種因素，德國人也就得以判斷俄國發動攻勢的時間。這樣，德國軍隊在兵力上雖處于劣勢，但就此可以在下列兩種辦法中擇其一，以對付一支分成兩路向它進逼的優勢兵力：它可以后撤，也可以首先攻其一路，兩路中哪一路提供了最有利的機會就先攻哪一路。施利芬定下了一條嚴格的軍令，“投入全部兵力，對首先進入我軍射程的一路俄軍”予以痛殲。

注釋

[[1]](#_1_4) 尼祿（Nero，37—68），古羅馬帝王，該王朝以暴虐、揮霍、放蕩出名。——譯注

[[2]](#_2_2) 拉斯普京（Rasputin，1872—1916），活躍于俄皇尼古拉二世宮廷中，曾自詡為“預言家”和“神醫”而進入宮廷，并對國家大事起很大影響。拉斯普京于1916年12月為保皇黨集團所殺。——譯注

[[3]](#_3_2) 列文（Levin），俄國列夫·托爾斯泰所寫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之一。他是貴族地主，想在宗法制社會基礎上改善地主和農民的關系，結果幻想破滅。——譯注

[[4]](#_4_1) 萬尼亞舅舅（Uncle Vanya），系俄國契訶夫所寫劇本《萬尼亞舅舅》的主人公之一。他沒有理想，沒有遠大的目的，卻把理想寄托在別人身上。為了那個人，他忘我地勞動，浪費了自己的青春，結果發覺那個人原來是個庸俗、渺小、毫無遠大理想的人。他絕望，想服毒自殺，最后還是聽從命運的安排，安下心來仍舊為偶像勞動，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死后的天堂。——譯注

[[5]](#_5_1) 《櫻桃園》（CherryOrchard），契訶夫所寫的劇本名。通過沒落地主朗涅夫斯卡婭把櫻桃園拍賣給商人陸伯興以及他的女兒安妮亞開始獨立生活等情節，展示了俄國1905年革命前夕社會情況和思想意識的變化。作者在劇本中嘲笑沒落貴族寄生生活的空虛，并對未來寄予希望。——譯注

[[6]](#_6_1) 坦嫩貝格（Tannenberg），一譯坦能堡；現屬波蘭，名“斯泰巴爾克”（Stebark）。——譯注

德國人害怕斯拉夫人：When a German regiment in 1914 learned it was going to the western not the eastern front, there was “general rejoicing. For some indefinable reason the very thought of Russia gave one a shudder.” Bloem, 20. The same thought moved a German army doctor to complain to the Duchess of Sutherland (49) how wicked it was of England to join the alliance against Germany “and leave us to those devilish Russians.”

俄軍人數：these and other figures about men and matériel in this chapter are from Golovin's Army unless otherwise noted.

格雷評論俄國實力：Grey to Sir F. Bertie, May 1, 1914, BD, X, Part 2, No. 541.

俄法參謀部的會談及俄軍的動員：Messimy, 179–81; Kokovtsov, 370–72; Joffre, 55–60; Golovin, Campaign, Chapter III, 45–73.

“我們應該對準德國的心臟打擊”：Joffre, 23.

格朗邁松在俄國備受歡迎：Golovin, Campaign, 61.

1912—1913年日林斯基將軍的承諾：Agourtine, 25.

伊恩·漢密爾頓的報告：Hamilton, General Sir Ian, A Staff Officer's Scrap Book, London, 1907, II, 381.

“一個網球場也沒有”：Knox, xxvii.

“這是個愚不可及的政體”：Witte, 270, 247.

尼古拉二世未受到執政培訓：A few days before his 22nd birthday, on April 28, 1890, Nicholas wrote in his diary, “Today I finished definitely and forever my education.” qtd. Radziwill, Nicholas II, 210.

科科夫佐夫向沙皇報告德國的備戰情況：Kokovtsov, 456.

斯托雷平被秘密警察刺殺：Wrangel, 208.

“在這年頭，人人都體弱多病”：Witte, 319.

“我希望活到能聽見英國臨終時的咽氣聲”：Paléologue, Intimate Journal of the Dreyfus Case, New York, 1957, 180.

“我最討厭這個詞！”：Witte, 190.

英國外交官：Sir Arthur Nicolson, British ambassador to Russia, 1906–10. Nicolson, Diplomatist, 180.

“要他干工作固然很不容易”：Sazonov, 286.

“邪門歪道的新花樣”：Golovin, Campaign, 31, 34.

蘇霍姆利諾夫“使人一見便會產生不可信任的感覺”：Paléologue, 83; Poincaré (III, 163) had the same reaction.

蘇霍姆利諾夫的妻子、花銷和朋黨：Agourtine, 18–22; Vladimir Gurko, 552–3; Knox, 222; Sir Bernard Pares,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1953, 472–77.

蘇霍姆利諾夫被定罪：Agourtine, 56–9.

“后果極為嚴重”：qtd. Agourtine, 59.

德皇給蘇霍姆利諾夫的題獻：a facsimile of the autograph of the Kaiser is reproduced in Ludwig, 508.

蘇霍姆利諾夫應為俄國缺少炮彈承擔的責任：Knox, obituary of Sukhomlinov in Slavonic Review, 1926, Vol. 5, 148; also Golovin, Army, 12, 32, 43.

蘇霍姆利諾夫厭惡尼古拉大公：Danilov, 150; Golovin, Campaign, 35.

尼古拉大公被看作皇族宗室里唯一的“男子漢”：Introduction to Letters of Tsaritsa, xxi.

“我對他絕不信任”：Letters to Tsar, June 16, 1915, 97.

大公深受福煦的影響：Esher, Tragedy, 19.

科茨布伯爵的一番議論：Danilov, 43.

“黑山的夜鶯”：Paléologue, 22–23.

俄國的兩份作戰計劃：Ironside, 31–6.

向柏林進軍：according to Danilov, Deputy Chief of Staff (130), this was the fundamental idea and goal of the Russian High Command throughout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war.

容克貴族胡亂射殺狐貍：Ellen M. Pain. My Impressions of East Prussia, London, 1915.

德皇射殺俄國麋鹿：Topham, 254. Her Chapter XIII, “Rominten,” is brilliant reporting of the Imperial habits.

德國希望日本保持中立：Hoffmann, War of Lost Opportunities, 5.

霍夫曼的性格和習慣：K. F. Nowak, Introduction to Hoffmann's War Diaries, I, 10, 18.

“你這個黃皮家伙”：recorded by the American correspondent Frederick Palmer, qtd. De Weerd, 71.

俄國上校出售本國作戰計劃：Hoffmann, War of Lost Opportunities, 4.

“投入全部兵力”：qtd. Hoffmann, Diaries, II, 241.

# 第二部分　爆發

“巴爾干地區的蠢事兒”，會點燃下次的戰火，俾斯麥早已言之在先。1914年6月28日，奧地利的王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分子刺殺，正符合了他所預言的條件。奧匈帝國出于老邁帝國的輕率好斗，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吞并塞爾維亞，就跟它在1909年吞并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一樣。但1909年的俄國，經過對日戰爭元氣已經大傷，面對德國發出的最后通牒，加上德皇身穿“閃閃發光的甲胄”——如他自己所說——支持他的盟邦奧地利，也就只好忍氣吞聲地默許了。為了一雪前恥，為了保持其作為斯拉夫大國的體面，俄國現在打算自己穿上閃閃發光的甲胄了。7月5日，德國向奧地利保證，如果奧地利因對塞爾維亞采取懲罰行動而使它卷入跟俄國沖突的話，它可以指望得到德國的“忠實支持”。這是一個釋放了事態發展的洪流的信號。奧地利于7月23日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后通牒，7月26日拒絕了塞爾維亞的復文（盡管當時緊張不安的德皇也承認這篇復文“把發動戰爭的每一條理由都消除”），7月28日對塞爾維亞宣戰，7月29日炮轟了貝爾格萊德。那一天，俄國在它與奧地利接壤的邊界一線實行動員，7月30日，奧、俄兩國都頒布了總動員令。7月31日，德國向俄國發出最后通牒，限令它十二小時內撤銷動員并“向我們明白宣布業已照辦”。

邊界上戰云壓境。各國政府驚恐不已，掙扎著力求避免戰爭。但一切都是枉然。國境線上的情報人員把每一支騎兵巡邏小隊都當作搶在動員令前布防的隊伍進行上報。各國總參謀部都為它們無情的時間表所驅使，拍著桌子要求及早發出開拔的命令，生怕對手取得一小時的先機。各國首腦面對承擔國家命運的責任，都試圖退縮規避，但是軍事行動的時間表還是把他們推向前去。

注釋

“巴爾干地區的蠢事兒”：recalled by Albert Ballin, who quoted it to Churchill (207) in July 1914 when Ballin was sent to London by the Kaiser to persuade the British to stay neutral.

德皇身穿“閃閃發光的甲胄”所做的演說：in the Vienna Town Hall, September 21, 1910, qtd. Stanley Shaw, William of Germany, New York, Macmillan, 1913, 329.

德國的“忠實支持”：Bethmann-Hollweg to von Tschirschky (German ambassador in Vienna), Kautsky, No. 15; Kaiser to Emperor Franz Joseph, Kautsky, No. 26.

“把發動戰爭的每一條理由都消除”：Kaiser's marginal note on copy of Austria's ultimatum to Serbia, Kautsky, No. 271.

“向我們明白宣布業已照辦”：Bethmann-Hollweg to Pourtales, Kautsky, No. 490.

## 第5章　8月1日：柏林

8月1日星期六正午，德國給俄國的最后通牒限期截止，俄國沒有答復。不出一小時，一份電報發給了駐圣彼得堡的德國大使，令他于當天下午5時宣戰。5時整，德皇頒發了總動員令，但一些先遣部隊在前一天根據“面臨戰爭危險”公告已提前動員。5時30分，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手里拿著一份文件，整個心思沉浸在這份文件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Jagow）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臺階，招呼了一輛普通出租汽車，向皇宮疾駛而去。不多久，憂郁怏悒的總參謀長毛奇將軍，口袋里帶著德皇簽署的動員令，在返回總參謀部途中，座車突然被攔住，乘著另一輛車子帶著皇宮緊急命令的信使趕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宮，聆聽德皇作最后一分鐘鋌而走險的建議。這個建議弄得毛奇潸然淚下，這個建議也幾乎改變了20世紀的歷史進程。

盡管參謀部保證在俄國完成全面動員之前，尚有六周時間的回旋余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丟失東普魯士的風險的時刻現已到來。他曾向一位奧地利軍官承認：“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這樣做是一種罪惡，我們不應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還是要恨他們。”不管怎樣，圣彼得堡的罷工、騷動，暴徒搗毀窗戶以及“警察和革命黨人之間的激烈巷戰”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消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駐俄七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萊斯（Pourtalès）伯爵斷定，并一再向政府保證：俄國畏懼革命，不會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復要到1916年才會備戰就緒之說的信條，及至俄國已經開始動員，他還報稱俄國計劃的“不是采取頑強攻勢，而是像1812年[[1]](#_1__Zhi_1812Nian_Na_Po_Lun_Lu_Ju)那樣逐步退卻”。在德國外交官愛犯錯誤的問題上，這些判斷開創了紀錄。這些判斷鼓舞了德皇，所以時至7月31日，根據使節們提供的跡象，他還寫了一份“指導”參謀部的手諭，猶得意洋洋地嘲笑籠罩著俄國宮廷和軍隊的情緒，有如“患病的雄貓”。

8月1日，柏林街頭人群擾攘，皇宮前哄聚了成千上萬的人。他們焦慮不安，情緒緊張，心境沉重。柏林多數工人承認，社會主義在他們思想上，還比不上他們對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懼和仇恨那樣深刻。前一天晚上德皇在陽臺上宣布進入“面臨戰爭危險”狀態的演說中已曉諭他們“我們已被迫拿起武器”，不過他們仍抱著最后一線希望，等待俄國答復。最后通牒的截止時間過去了。人群中一位新聞記者感到氣氛緊張，“謠傳四起。人們奔走相告，說俄國已要求延長時間。證券交易所則驚恐萬狀，人心惶惶。整個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無法忍受的憂慮焦急中度過的”。貝特曼——霍爾韋格發表的一項聲明結尾說：“如果鐵骰子滾動了，愿上帝保佑我們。”5時整，一名警察出現在皇宮門口，向人群宣讀了動員令，人們便開始恭敬地唱起了國歌：“讓我們大家感謝上帝吧！”站滿著軍官的車輛沿著椴樹下街飛馳而去，他們揮舞著手帕，高呼著“動員起來！”。人們頓時從馬克思變成了馬爾斯[[2]](#_2__Ma_Er_Si__Mars__Ji_Zhan_Shen)，他們歡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沖向那些有俄國間諜嫌疑的人去泄憤去了。之后的幾天中，有數名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腳踢，死于非命。

動員的電鈕一經按動，征召、裝備和運送200萬人員的龐大機器便整個自動地運轉起來了。后備役軍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領取制服、裝備和武器，先編成連，再編成營，然后加上騎兵、自行車兵、炮兵、醫療隊、炊事車、修理車以及郵車，按預定的鐵路時刻表，被送到鄰近國境的集結地點。在那里，他們再編成師，再由師編成軍，由軍而集團軍，待命出征。單是調運一個軍——德軍共有40個軍——軍官就需要火車車廂170節，步兵965節，騎兵2960節，炮兵和給養車1915節，總共需要6010節，分別組成140列列車，同時還需要同等數量的列車運送軍需品。從命令下達那一時刻起，一切都在按預定時間表規定的時間運行，時間表訂得非常精細，甚至對于多少對火車輪子將在什么時候通過什么橋梁，都作了具體規定。

副總參謀長瓦德西（Waldersee）將軍對他這宏偉不凡的組織系統滿懷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機開始時也沒有返回柏林，只是寫了一封信給雅戈說：“我將留此準備猛攻，我們的總參謀部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現時我們在那里將無所事事。”這是從老毛奇或“大”毛奇繼承下來的光榮傳統。1870年動員那天，老毛奇還躺在沙發上閱讀《奧德利夫人的秘密》（LadyAudley’s Secret）呢。

但老毛奇的這種令人景仰的鎮定自若，今天并不見之于皇宮。兩面作戰已不再是幽靈般使人憂懼，而已成為現實。面對這種情況，德皇也同樣接近陷入他認為俄國人已接近陷入的那種“病貓”情緒。他比起地道的普魯士人，更見識廣博也更膽怯。他從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權力、更高的聲望，尤其是要德國在國際事務中具有更多的權威，而且只想用恐嚇別國而不是攻略別國的手段以遂其圖。他想不戰斗而獲得斗士的獎賞。所以每當到了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刻，就像阿耳赫西拉斯（Algeciras）和阿加迪爾事件爆發時那樣，他就畏縮不前了。

當危機終于到達沸點時刻，他在電文上的批語愈來愈激動：“哈！恬不知恥的欺騙！”“胡說！”“他撒謊！”“格雷先生是條騙人的狗！”“廢話！”“這個無賴不是瘋子就是白癡！”俄國動員了，他突然間沖口發表了預感大難臨頭的激動的長篇大論，他不是針對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遺恨于他念念不忘的那個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說：“全世界將卷入極為可怕的戰爭漩渦，這些戰爭的最終目的是想毀滅德國。英國、法國和俄國狼狽為奸，圖謀消滅我們……這就是愛德華七世慢條斯理、踏踏實實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圍德國終于成為事實。我們已把腦袋伸進絞索……愛德華已死，但比我這個活人還強！”

一想到死去的愛德華的影子，任何可以擺脫要與俄、法兩國，以及與在法國背后至今尚未公開露面然而已隱約可見的英國交戰的出路，德皇總是歡迎的。

就在最后時刻，一條計策獻上來了。貝特曼的一個同僚，前來懇請他盡可能設法使德國不致陷于兩線作戰境地，并向他提出一個辦法。幾年來，對于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將阿爾薩斯作為德意志帝國的一個聯邦國的問題，一直在進行討論。這個辦法如果提出來并為阿爾薩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國收復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腳。近在7月16日，法國社會黨大會還公開宣布贊成這一辦法。但德國軍方始終堅持這些省份必須駐防，其政治權利必須服從“軍事需要”，所以，直到1911年，既未準予制定憲法，自治更無從談起。貝特曼的同僚現在敦請他立即公開正式建議召開會議討論阿爾薩斯自治問題。這種會議可以讓它一無結果地拖延下去，但在道義上它的影響將可迫使法國不得進攻阿爾薩斯，至少使它在考慮這一建議期間有所克制。德國就此可以在西線保持平靜無事，并使英國置身局外，從而贏得時間將兵力調過去對付俄國。

提這一建議的人，至今姓名不詳，也許是個偽托，但這無關緊要。這種機會本來是存在的，首相本人也是可以設想到的。但要抓住這個時機得要有膽略，而貝特曼，盡管器宇軒昂、目光深沉、髭須整潔，但如西奧多·羅斯福對塔夫脫（Taft）的看法那樣，“是個軟弱的好人”。德國政府非但不向法國投之以餌，誘它中立，反而在向俄國遞交最后通牒的同時也向它遞交了最后通牒。他們要求法國在十八小時內答復它在俄德戰爭中是否保持中立，并說如果法國保持中立的話，德國“要求將圖勒和凡爾登兩地要塞交由我方占領作為保持中立的保證，待戰爭結束后歸還”。——換句話說，就是要法國把大門的鑰匙交出來。

德國駐巴黎大使馮·舍恩（von Schoen）男爵感到難以遞交這份“蠻橫”的要求。在他看來，此時此刻的法國如果保持中立，對德國具有莫大好處，本國政府大可以為此主動付出酬謝而不應采取懲罰手段。他遞交了要法國聲明中立的要求，而沒有提出對要塞的要挾。但法國人截獲并破譯了給他的指示，對實情還是清楚的。所以當舍恩于8月1日上午11時要求法國答復時，他得到的回答是法國“將按自身利益行事”。

在柏林，5時剛過，外交部的電話鈴響了，副外交大臣齊默爾曼（Zimmermann）接了電話，隨即轉身對坐在他辦公桌旁的《柏林日報》編輯說：“毛奇想知道可否開始行動。”可在這時，剛譯好的一份倫敦來電，一下子打亂了計劃部署。它帶來了希望，如能立即停止對法國的行動，德國就可以安全地一面作戰。貝特曼和雅戈就是帶著這份電報乘上出租汽車奔向皇宮的。

這份電報是由駐倫敦大使利希諾夫斯基（Lichnowsky）親王發來的，匯報英國的一份提議。據利希諾夫斯基的理解，這個提議是說“如果我們不進攻法國，英國將保持中立，并保證法國也保持中立”。

這位大使，在德國屬于講英語，模仿英國人的舉止、消遣方式、服飾，千方百計要成為英國式紳士的那類人物。與他同儕的貴族，如普萊斯親王（Prince of Pless）、布呂歇爾（Blücher）親王和明斯特爾（Münster）親王，都娶了英國夫人。1911年，一位英國將軍在柏林為他舉行的宴會上發現在座的四十位德國人，包括貝特曼―霍爾韋格和海軍上將蒂爾皮茨在內，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感到驚訝。利希諾夫斯基還跟他的那類人物不同，他不僅在舉止上，而且在內心世界也是一個誠摯的親英派。他是決心到倫敦來使自己、使祖國都博得英國人的歡心的。英國社會是個恣情鄉間歡度周末的社會。對這位大使來說，最大的悲劇莫過于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鐘愛之邦發生戰爭，所以他抓住一切時機避免兩國兵戎相見。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在內閣會議休息時間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出于自己的迫切愿望，將格雷的話理解為英國的提議，即如果德國答應不進攻法國的話，英國愿在俄德戰爭中保持中立并使法國也保持中立。

事實上，格雷根本沒有那么說。他說話一向簡略而含糊，他所表示的不過是：如果德國答應對法國和俄國保持中立，就是說對兩國都不發動戰爭，靜待各方為解決塞爾維亞事件努力的結果，英國將答應使法國保持中立。格雷在比洛稱之為慢性病的“波斯尼亞問題”時期做了八年外交大臣之后，已把他那種極盡迂回模糊的說話方式錘煉得爐火純青；據他的一位同僚說，他那種回避直截了當的說話方式，幾乎已成為一種方法。那天被即將來臨的悲劇弄得暈頭轉向的利希諾夫斯基，在電話中也就不難誤解他的話了。

德皇緊緊抓住利希諾夫斯基的這個通向一面作戰的通行證。現在是分秒必爭的時候。已經大軍輻輳，在無情地開赴法國邊境。盧森堡的中立是由德國在內的五大國保證的，而第一個敵對行動就是奪取它的一個鐵路樞紐站，并將按照預定時間表于一小時內開始行動。這必須停止，必須立即停止。但如何著手？毛奇又在哪里？毛奇已離開皇宮。于是派了一名副官，乘著汽車一路上響著刺耳的報警器，將他半途找回來。毛奇被找回來了。

德皇恢復了常態，這個塵世的至尊、軍閥又心花怒放，有了一個新的設想，又籌劃，又擬議，又安排。他給毛奇念了電報，并且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們可以只同俄國作戰了。我們干脆全軍揮戈東進！”

毛奇想到他神奇的動員機器將要倒車逆轉，不禁愕然失色，他斷然抗旨。毛奇這十年來，先是施利芬的助手，隨后又是施利芬的繼承人，他的工作一直就是計劃這一天的到來，為這一天，已把德國的全部力量集中起來了，在這一天，要開始向最終主宰歐洲進軍。這是個壓得他喘不過氣來，幾乎難以肩負的重任。

他身材高大，魁偉，禿頂，現年六十六歲。他常常愁眉苦臉，使得德皇總是稱他為“憂郁的愷撒”（der traurige Julius，也可稱為“憂郁的古斯”，實際上他的名字是赫爾穆特，Helmuth）。他健康狀況不佳，每年都得去卡爾斯巴德（Carlsbad）治療，以及他偉大的伯父的影子，也許是他憂郁的原因。從坐落在國王廣場上的總參謀部紅磚大樓——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的窗外望去，他每天可以看到1870年的英雄，與俾斯麥同是德意志帝國奠基人的與他同名的老毛奇的躍馬塑像。而他這個侄兒，則是個不高明的騎手，在參謀人員乘騎進行戰術作業時，常從馬背上摔下來。更糟的是，他是個主張信仰療法的基督教科學派信徒，此外，對于人智主義和其他一些迷信也感有興趣。身為一個普魯士軍人，有了這些不相稱的弱點，也就被認為是“軟弱的人”，更有甚者，他繪畫，拉大提琴，口袋里常帶著歌德的《浮士德》，而且還在著手翻譯梅特林克[[3]](#_3__Mei_Te_Lin_Ke__Maurice_Maete)的《卑麗亞與梅麗桑德》。

他善于反省，又是個生性多疑的人。1906年就任時，他曾稟告德皇：“一旦發生戰爭，我不知道將如何是好。我對自己很不滿意。”不過不論在個性上或在政治上，他都不是個懦夫。

1911年，他深惡德國在阿加迪爾危機時的退縮，寫信給康拉德·馮·赫岑多夫說，如果事態惡化的話，他就辭職，建議解散軍隊，“并把我們置身于日本保護之下；這樣我們就可以太平無事地去掙錢，索性做無能之輩”。他曾毫不猶豫地犯顏極諫，1900年他曾“相當蠻橫地”對德皇說，他的遠征北京之舉是個“瘋狂的冒險”。當被提名為總參謀長時，他問德皇是否奢望“一張彩票中兩次頭獎”——這種想法肯定影響了德皇的選擇。他拒不任職，除非德皇丟棄凡進行軍事演習都想得勝使演習成為兒戲的惡習。出乎意外，德皇竟順從了。

現在在這8月1日深夜，毛奇不愿再讓德皇干預重大軍務和任何既定安排。把部署到西線的百萬大軍，在開拔的關鍵時刻一百八十度地轉過頭來調運到東線，需要更大的、遠非毛奇力所能及的鐵的毅力。他腦海中浮起一個幻影——整個部署垮了，一片混亂：這里是軍需給養，那里是士兵，中間是丟失的彈藥，連隊沒有軍官，師部沒有參謀，那些都作了精確安排的每隔十分鐘將通過某條指定軌道的11000列火車，則是紊亂不堪；有史以來計劃得最完善的軍事行動就此荒謬地毀于一旦。

“皇帝陛下，”毛奇這時進諫說，“這不可能辦到。成百萬大軍的調動部署是不可能臨時急就的。如果陛下堅持要把全軍帶往東線，那這支軍隊將不再是一支枕戈待旦的軍隊，而將是一群帶槍而沒有給養供應的烏合之眾。單單安排他們的那些給養，就花了整整一年艱巨復雜的勞動才完成的。”毛奇的最后一句話則更為僵硬：“凡事一經決定，就不能變動。”這句話是德國每次犯大錯誤的根源。正是由于這句話，發動了對比利時的入侵，發動了對美國的潛艇戰，這句話在軍事計劃支配政策的時代，是必不可免的。

其實是可以變動的。德國總參謀部雖自1905年以來就在從事擬訂首先攻打法國的計劃，但在它的檔案里卻另有一份所有列車東進攻打俄國的計劃。這份計劃在1913年以前還年年修訂。

“不要再筑要塞了，要多鋪設鐵路。”老毛奇下令說。他把戰略部署放在鐵路分布圖上，并為后人留下了鐵道是戰爭勝負關鍵的教條。德國的鐵路系統是軍方控制的，每條線路都派有一名參謀；不經總參謀部許可，不得鋪設或改變任何線路。每年的戰事動員演習，使鐵路官員經常受到訓練，并考驗了他們根據線路被切斷、橋梁被毀壞的電報隨機應變，更動運輸線路的能力。據說軍事學院培養出來的腦子最靈的人，都被送到鐵路部門工作，最后在瘋人院歸天。

毛奇“這不可能辦到”的話，在戰后見載于他的回憶錄之后，鐵道部門負責人馮·施塔布（von Staab）將軍認為這是對他主管的路局的譴責，非常氣憤，特為此寫了一本書，證明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他以大量篇幅的圖表和圖解，說明他如果在8月1日得到通知，可以在七個集團軍中留下三個集團軍守衛西線，把余下的四個集團軍于8月15日前調運到東線。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Matthias Erzberger），這位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和天主教中央黨領袖，提出了另一個證明。他說，在事發后半年里，毛奇本人曾向他承認，一開始就襲擊法國是個錯誤，“應該先將我軍大部分兵力派到東線粉碎那部俄國壓路機，而把西線的軍事行動限于擊退向我國境進犯的敵人”。

8月1日夜，毛奇缺乏必要的勇氣，死死抱住既定計劃不放。“你的伯父肯定會給我一個不同的回答。”德皇無可奈何地對他說。這一譴責“深深地刺傷了我”，毛奇后來這樣寫道：“我從沒有自命可同這位老元帥相提并論。”但他當時還是繼續抗命。“我堅決認為德法兩國既然都已動員，要維持兩國之間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但我這異議沒有收到效果。大家愈來愈激動，只有我孑然一人堅持己見。”

最后，毛奇終于說服了德皇，動員計劃不能變動，由貝特曼和雅戈參加的小組起草了一份給英國的電報，表示了歉意，說德軍開向法國邊境的行動已“無法改變”，但提出一個保證，在8月3日下午7時前將不越過邊境線。這對德國是毫無損失的，因為時間表上并未安排在這時間以前越境。雅戈還趕緊給駐巴黎大使發了一份電報——巴黎已在4時頒發了動員令——指示他助一臂之力，請他“務必暫時穩住法國不動”。德皇還加發了一封給英王喬治的私人電報，對他說，因“技術原因”，要撤回動員令已為時過晚，但“如法國向我表示保持中立，我自當勒馬不進攻法國，而將軍隊用于別處，但英國必須以海陸軍為它擔保。深望法國不必緊張”。

現在離第十六師向盧森堡挺進的規定時間7時只有幾分鐘了。貝特曼很激動，堅持在等候英國答復時，不管怎樣都不得進入盧森堡。德皇沒有征詢毛奇意見，也立即命令副官用電話和電報通知設在特里爾（Trier）的第十六師司令部取消這一行動。毛奇又一次看到計劃破產。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盧森堡的鐵路事關至要。“那時，”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想我將五內俱裂。”

德皇對他的請求無動于衷，寸步不讓，反而在給英王喬治的電報末尾加了一句“正在用電報電話命令我國境線上的部隊停止行動，不使越境進入法國”。這里，對事實真相玩了一個微小但重要的手法，這是因為德皇不能向英王承認他所企圖的和正在阻止的是侵犯一個中立國的行為。而且那也會流露他侵犯比利時的企圖，而這會成為英國參戰的原因，何況英國當時尚未打定主意。

“完啦！”毛奇在該是他的事業登峰造極的這一天，不禁自我哀嘆，并在回到總參謀部后，“凄慘失望之淚奪眶而出”。當他的副官將取消盧森堡行動的命令拿來要他簽署的時候，“我把鋼筆扔到桌上，拒絕簽字”。這是動員令后的第一道命令，他知道一旦簽署了這道會使精心準備的一切工作化為烏有的命令，將被認作“猶豫不決和優柔寡斷”的證據。“這份電報你愛怎么辦就怎么辦罷，”他對副官說，“我是不會簽字的。”

晚上11時了，他還在苦苦思索，這時皇宮又來召見。德皇在宮中的臥室接見了他。皇帝在睡衣外面罩了一件軍大衣，是特地為這次接見穿的。原來是利希諾夫斯基的電報來了。他和格雷進一步交談之后，發現自己錯了，現在傷心地來電說，“英國的積極建議已基本無望”。

“現在你可以為所欲為啦。”德皇說完就去睡了。毛奇，這位現時勢必要指揮一場決定德國命運的戰爭的總司令，從此就永遠心緒不寧。“這是我對戰爭的第一個感受，”他事后寫道，“我一直沒有從這次事件的震動中恢復過來。我的機體一定有所失靈，從此以后與過去就判若兩人。”

他還可以加上這么一句——整個世界也是如此。德皇給特里爾的電話命令還未及時到達。7時正，部隊按預定時間在這次戰爭中首次越過國境，這個榮譽屬于一個叫費爾德曼（Feldmann）的中尉所率領的六十九團的一個步兵連。在盧森堡境內不遠，離比利時的巴斯托涅（Bastogne）僅約12英里的阿登山脈的山坡上，有一個德國人稱為烏爾弗林根（Ulflingen）的小鎮。它周圍的山坡草地，是奶牛牧場；斜坡上的鵝卵石小街，即使在8月的收獲季節，也不容許有一小捆干草失落在地，否則就有違這個大公國嚴格的市政清潔條例。小鎮下面是個車站和一個與德國、比利時電報線路銜接的電報局。這就是德國的目標，費爾德曼中尉的那個連駕著摩托車按時占領了這個地方。

德國人對付不圓通的人有著毫不留情的才能，他們選中了一個當地名稱和正式名稱都叫做“三貞女”（Trois Vierges）的地方入侵盧森堡。“三貞女”實際上代表著忠信、希望和仁愛，但是歷史以其切合實際的聯系，為這時機作了安排，使這“三貞女”在人們心目中代表了盧森堡、比利時和法國。

7時30分，第二批士兵乘著摩托車來了——他們也許是接到德皇的通知而來的——他們命令第一批人撤走，他們說：“犯了一個錯誤。”在這期間，盧森堡的國務大臣艾申（Eyschen）已將消息電告倫敦、巴黎和布魯塞爾，并向柏林提出了抗議。“三貞女”已經表明了她們的立場。午夜以前，毛奇糾正了撤出的命令，及至第二天即8月2日終了時，按照德國動員第一天的預定計劃，占領了這個大公國的全境。

倘若德國人在1914年出擊東線，而對法國采取守勢，那會是什么樣的結局？從那時起，史學年刊上對這一問題總是糾纏不休。馮·斯塔布將軍表示，掉轉頭來攻打俄國在技術上是可能的。至于在“那一天”已經到來的時刻，德國人能否在精神上克制自己而不進攻法國，則是另一回事了。

7時整，就在德國人進入盧森堡的同時，在圣彼得堡，普塔萊斯大使水汪汪的藍眼睛眼眶發紅，花白的山羊胡子顫動著，兩手哆哆嗦嗦地向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遞交了德國的宣戰書。

“全世界將咒罵你們！”薩佐諾夫大聲嚷著。

“我們是為了維護我們的榮譽。”德國大使回答說。

“這與你們的榮譽無關。上天自有公道。”

“是呀！”普塔萊斯喃喃自語，“上天自有公道，上天自有公道。”他蹣跚走向窗口，倚著窗，不禁潸然淚下。“好啦，我的使命到此結束了。”說到這里，他就再也說不下去了。薩佐諾夫拍著他的肩膀，相互擁抱。普塔萊斯踉蹌地走向門邊，顫抖著的手好容易才把門拉開，出去的時候，低聲地道著：“再見，再見。”

這一幕動人的場面是薩佐諾夫的記錄留給我們的，但有著法國大使帕萊奧洛格的藝術加工之處，那很可能是薩佐諾夫告訴他的。因為普塔萊斯的報告只是說，他曾三次要求對最后通牒作出答復，在三次遭到薩佐諾夫否定的回答之后，“我就按指示遞交了照會”。

為何一定得要遞交宣戰書呢？海軍大臣蒂爾皮茨海軍上將在前夜起草宣戰書的時候就曾憂心忡忡地問起這個問題。他想知道，如果德國不打算入侵俄國，是不是有必要宣戰和擔當戰爭發動者的惡名？他說，這些話他是“從直覺而不是從理智出發的”。這個問題是極其中肯的，因為德國的目的就是想把發動戰爭的罪責加在俄國人身上，好使德國人民相信他們確實是在為自衛而戰，而且這樣做更可以使意大利同其在三國同盟中應承擔的義務緊密地聯系起來。

意大利只是在防衛戰爭中才有參與其盟國作戰的義務，并且早已動搖，存有離心，一般都認為它一有空子可鉆，就會溜之大吉。貝特曼頗為這個問題所苦。他警告說，如果奧地利在塞爾維亞問題上拒不讓步，“那就難以把引起歐洲大戰的罪責加在俄國人身上”，而且會“使我們在本國人心目中處于無法立足的境地”。可是，沒有人聽從他的警告。動員令下達那天，按德國外事工作規定，需要正式宣戰。據蒂爾皮茨說，外交部的法學家們堅稱：這樣做在法律上是正確的。“在德國之外，”他黯然神傷地說，“絕不會有人欣賞這種想法。”

然而在法國，對這種想法的欣賞卻比他所知道的要強烈得多。

注釋

[[1]](#_1_5) 指1812年拿破侖率軍50萬攻入俄境的戰爭。

[[2]](#_2_3) 馬爾斯（Mars），即戰神。——譯注

[[3]](#_3_3) 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時象征主義代表作家，1911年諾貝爾獎得主。寫過詩，主要成就在戲劇方面。前期作品如《瑪蘭公主》、《盲人》、《卑麗亞與梅麗桑德》，充滿宿命論思想。后期作品如《青鳥》等，雖出現樂觀的因素，但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譯注

The central episode in this chapter, General Moltke's traumatic experience with the Kaiser on the night of August 1, is based on Moltke's memoirs, 19–23. All quotations from the Kaiser and Moltke himself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incident are from this source. An English version was published by Living Age, January 20, 1923, 131–34.

德駐俄大使得到命令向俄宣戰：Kautsky, No. 542.

5時30分，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和外交大臣雅戈：The American correspondent, Frederic William Wile, on his way to the Foreign Office, saw the two ministers as they came out: Assault, 82.

“我憎恨斯拉夫人”：Sturgkh, 232.

普塔萊斯和埃格林的報告：Kautsky, Nos. 474 and 521. Eggeling's insistence up to the last moment that Russia could not fight because of artillery and transport deficiencies is reported by Kuhl, 31.

“患病的雄貓”：Kautsky, No. 474.

人群中的新聞記者：Wile, Assault, 81–2; the Belgian ambassador also describes the scene: Beyens, II, 266.

“如果鐵骰子滾動了”：Kautsky, No. 553.

軍官揮舞手帕：Wolff, 504.

有俄國間諜嫌疑的人被打：Hanssen, 22–23.

運送一個軍所需的火車數量：Reichsarchiv, Das Deutsche Feldeisenbahnwesen, Band I, Die Eisenbahnen zu Kriegsbeginn, qtd. AQ, April 1928, 96–101.

老毛奇躺在沙發上：Fisher, Memories, 230.

德皇在電文上的批語愈來愈激動：Kautsky, Nos. 368 and 596.

“愛德華已死”：Written on margin of Pourtales's dispatch, received July 30 at 7:00 A.M. reporting that Russian mobilization could not be canceled, Kautsky, No. 401, English version, Ludwig, 448.

阿爾薩斯自治：The alleged proposal by an anonymous “close associate” of Bethmann's is reported by Radziwill, Sovereigns, 70, a not too reliable source.

德國給法國的最后通牒：Schoen, 192, 197; Messimy, 149.

法國破譯德國政府與德駐法大使的電報：Poincaré, III, 251.

“毛奇想知道”：Wolff, 504.

利希諾夫斯基的電報：Kautsky, No. 562.

1911年在柏林舉行的宴會：Given by Sir E. Goschen, the British ambassador, in honor of Major-General Wilson, Wilson, 94.

格雷對利希諾夫斯基的提議：Lichnowsky, 73–74; Grey to Goschen, British Blue Book, No. 123; Grey, II, Appendix F, “The Suggestions of August 1, 1914.”

“憂郁的愷撒”：Sturgkh, 24.

毛奇的性格和習慣：Freytag-Loringhoven, 135–7; Bauer, 33; Goerlitz, 143; General Sir Edmund Ironside, “Two Chiefs of General Staff,”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February 1926; Wile, NYT, October 6, 1914, 2:6.

“我對自己很不滿意”：Erinnerungen, 307; “Place ourselves under Japan”: qtd. Ironside, op. cit., 229; “Quite brutally” about Peking: Eninnerungen, 308; “Win the big prize twice”: ibid.

“要多鋪設鐵路”：Neame, 2. Elder Moltke's use of railroads, Rosinski, 129.

腦子最靈的人都在瘋人院歸天：AQ, April 1928, 96.

馮·施塔布將軍：His book, Aufmarsch nach zwei Fronten, is analyzed by Commandant Koeltz, “La Concentration allemande et l'incident du premier Août, 1914,” Revue d'Histoire de la Guerre, 1926, 117–130.

埃茨貝格爾的證明：Erzberger's Erlebnisse, qtd. AQ, April, 1922, 80.

發給英國的電報：Kautsky, Nos. 578 and 579; to Paris: No. 587; to King George: No. 575.

利希諾夫斯基的第二份電報：Kautsky, No. 603. King George's reply to the Kaiser saying “There must be some mistake,” No. 612.

入侵“三貞女”：Luxembourg Minister of State Eyschen to Jagow, Kautsky, No. 602; Buch, German minister to Luxembourg, to Foreign Office, No. 619; Bethmann-Hollweg to Government of Luxembourg, No. 640.

普塔萊斯與薩佐諾夫的會面：Sazonov, 213; Paléologue, 48; Pourtalès's report, Kautsky, No. 588.

蒂爾皮茨關于宣戰的看法：Tirpitz, I, 363–5. The scene is also described by Bülow (III, 187) as told him by Albert Ballin, who was present. Bethmann was pacing up and down while Geheimrat Kriege, a conscientious jurist of the Foreign Office, was searching through all the lawbooks for a model. “From time to time the agitated Bethmann would ask him, ‘Is that declaration of war on Russia ready yet? I must have my declaration at once!’ Ballin asked, ‘Why such haste to declare war on Russia, Your Excellency?’ and Bethmann answered, ‘If I don't, we shan't get the Socialists to fight.' ”

把發動戰爭的罪責加在俄國人身上：Bethmann to Tschirschky, marked “Urgent,” Kautsky, No. 441.

## 第6章　8月1日：巴黎和倫敦

主宰法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打仗要有英國作盟邦。要保證做到這一點，就要使它的英國朋友能夠克服他們內閣和國內的不肯打仗和因循茍安的習性，法國務必要把誰是被進攻者、誰是進攻者弄得一清二楚，叫人沒有任何懷疑。侵略的實際行動，侵略所招致的義憤，都必須讓德國去做，去承擔。法國政府期望德國會履行它的職責，而又唯恐法國的巡邏隊或邊境部隊會過分情急而踩過界線，于是采取了一個大膽而異乎尋常的步驟。7月30日，法國政府下令在瑞士和盧森堡之間沿德國邊境的所有部隊后撤十公里。

勒內·維維亞尼（René Viviani）總理是一位口若懸河的社會黨雄辯家。他過去關心的主要是福利和勞工，而這次后撤便是他的主張。他是法國政界一位少見的人物，一位從未做過總理的總理，此刻還兼代外交部長的職務。他上任只不過六個星期，在下令前一天，7月29日，他和普恩加萊總統剛從俄國進行國事訪問歸來。奧地利是等到他們兩人行舟海上后才發出給塞爾維亞的最后通牒的。他們得到這個消息，便立即取消了預定對哥本哈根的訪問，匆匆回國。

在巴黎，他們獲悉德國邊防部隊已在離邊境幾百米處布防，但對俄國和奧地利的動員還一無所聞。通過談判謀求解決辦法仍屬大有希望。維維亞尼“則是驚魂未定，生怕一簇樹叢、兩隊巡邏兵的相遇、一個威脅姿態……一個不友好的眼神、一句粗話、一聲槍響，都可能爆發成為戰爭”。由于還有不動干戈而和平解決危機的一線希望，同時也為了萬一戰爭爆發可以完全免沾侵略之嫌，法國內閣同意后撤十公里。命令用電報發給了各軍司令，告訴他們此舉的用意是為了“保證取得英國鄰邦的合作”。電告英國和實行撤退，是在同時進行的。就在敵軍入侵的大門口實行撤兵，這是故意在軍事上走的一著險棋，目的是為了取得政治效果。維維亞尼聲稱，如此冒險是“史無前例的”，也許他還應該加上一句，像西拉諾[[1]](#_1__Xi_La_Nuo__Cyrano_de_Bergera)說的那樣：“啊，這是何等氣概！”

法軍總司令是一位深受進攻理論熏陶的將軍，他除了進攻不知其他。現在要他撤退，誠是痛心之舉。這件事何嘗不可以使霞飛將軍從此一蹶不振，就像毛奇在戰爭中的第一個遭遇就使他一蹶不振那樣，然而霞飛將軍卻不曾因此心灰意懶。

從總統和總理返抵國門時起，霞飛將軍便催政府下令動員，要不然至少也得采取一些準備措施：召回休假軍人——許多人被準假回去收割莊稼——以及在邊境一帶部署掩護部隊。他把紛至沓來的有關德國已經采取動員前措施的情報一件件地全都轉報給政府。他在這屆新內閣面前，儼然是個權威人物。這次組閣是五年內的第十次，上屆內閣的壽命只有三天。眼下的內閣之所以令人矚目，主要是它把法國大多數的強有力的人物都摒于內閣之外，白里安（Briand）、克列孟梭、卡約（Caillaux）這三位前任總理現在都是反對派。維維亞尼，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時處于“惶恐不安，緊張異常”的狀態。據再次出長陸軍部的梅西米說，這種狀態“在整個8月份一直如此”。那位海軍部長戈捷（Gauthier）博士是位醫學博士，他是因為前任部長被一場政治丑聞攆下臺去才給推上這個海軍職位的。他被接踵而來的事件壓得透不過氣來，連下令艦隊駛進海峽都“忘了”，因此也就不得不當下讓位由教育部長來接替。

然而，總統身上倒是具備著智謀、經驗和堅強的意志，雖然根據憲法他未必具有權力。普恩加萊是一位律師、經濟學家，又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擔任過財政部長，1912年曾出任總理兼外交部長，1913年1月被選為總統。性格產生權力，危急關頭尤其如此，所以這個沒有經過風雨的內閣便甘心情愿地仰賴這位在憲法上無足輕重的人物的才干和堅強意志了。普恩加萊生于洛林，他還記得他在十歲那年，戴著尖頂頭盔的長長的德軍行列經過他的故鄉巴勒迪克（Bar-le-Duc）市鎮的情景。德國人說他最為好戰，這是因為他在阿加迪爾事件期間擔任總理時態度強硬，也因為他在1913年以總統身份施加影響，不顧社會黨的猛烈反對通過了三年兵役法。這種情況，再加上他舉止淡漠，不知嘩眾取寵，不會見風使舵，使他在國內也難以博取人心。選舉的進程對政府不利，三年兵役法幾乎遭到否決，勞工事件此起彼伏，農民的不滿情緒比比皆是，7月的天氣酷熱多雨，風暴屢作，夏雷震耳，令人心悸。卡約夫人因槍殺《費加羅報》的主編在因謀殺罪受審[[2]](#_2____Fei_Jia_Luo_Bao____De_Zhu)。每天的審訊，對財界、新聞界、法庭和政府種種不體面的弊端都有新的披露。

法國人一日清晨醒來，不期而然地發現有關卡約夫人的審訊報道退到了第二版，而突如其來的則是法國正面臨戰爭的噩耗。于是乎在那政治上易動感情又好吵吵嚷嚷的國家里，頓時便為一種感情所主宰了。訪俄歸來的普恩加萊和維維亞尼驅車進入巴黎時，一片經久不息的呼喊聲，反復地呼喊著“法蘭西萬歲！”。

霞飛告訴政府，若不授命他集結五個軍的陸軍和騎兵的掩護部隊運往邊境，德國人便會“不費一彈進入法國”。他之同意把已駐守在邊界的部隊后撤十公里，倒不是出于他對文官政府的順從——霞飛與愷撒一樣，都是天生不甘心順從的人——而是由于他另有打算，想在掩護部隊問題上全力相爭。此時，外交上的討價還價還在電報往來，和平解決危機還有一線希望，所以政府只同意給霞飛一個“打了折扣”的方案，也就是說，不征召后備役兵員。

第二天，7月31日凌晨4時30分，梅西米的一位阿姆斯特丹的銀行界朋友打電話告訴他德國發布了“面臨戰爭危險”公告的消息。一小時后，來自柏林的報告正式證實了這一消息。梅西米氣沖沖地告訴內閣，這是“變相的動員令”。他那位在阿姆斯特丹的朋友說，仗是必打無疑的了，“整個德國，上自皇帝下到每個百姓”，全已做好準備。接踵而來的是駐倫敦的法國大使保羅·康邦的來電，報稱英國的態度“半冷不熱”。康邦擔任此職十六年來，每天為之操心的目的便是要保證到時候英國會積極支持，然而，此時此刻他卻不得不來電說明英國政府似乎尚有所待，還在看看會有什么新的發展。此次爭端到目前為止“尚未為英國關注”。

霞飛一到，帶來一份關于德軍行動的新備忘錄，堅持要實行動員。他奉準可以發出全面的“布防命令”，但也僅此而已，因為這時候已得到沙皇向德皇發出最后呼吁的消息。內閣繼續開會，按照“綠臺毯程序”（green baize routine）的規定，每位部長必須依次發言。梅西米焦急異常，已經不耐煩了。

當晚7時，馮·舍恩男爵來到外交部，這是他七天里的第十一次來訪。他提出德國想知道法國意欲采取何種方針的要求，并聲言次日1時再來聽取答復。內閣會議仍然在對財政措施、議會復會、宣布戒嚴等等問題爭論不休，而整個巴黎都已在惴惴不安地佇候消息。一個狂熱的青年忍受不了這樣的煎熬，失去了控制，朝一家咖啡館的玻璃窗開槍，射殺了讓·饒勒斯。由于饒勒斯在國際社會主義的領袖地位以及在反對三年兵役法的斗爭中的領導作用，在那些過分愛國的人們心目中，他成了和平主義的象征。

9時，一個臉色嚇得發白的副官闖進內閣，報告了這個消息。讓·饒勒斯遇刺殞命！這是一樁可能釀成內亂的事故，內閣為之大驚失色。大戰已經迫在眉睫，此刻又將出現內亂的景象：街壘，騷動，甚至暴動。部長們重新展開唇槍舌劍，是否要請出“另冊”。所謂“另冊”，乃是一份名冊，上面開列的全是政府掌握的煽動分子、無政府主義分子、和平主義分子，以及間諜嫌疑分子，這些人都得在動員那天逮捕。巴黎警察廳長和前總理克列孟梭都建議內務部長馬爾維（Malvy）先生把這份“另冊”付諸實施。維維亞尼和另外幾位同僚希望維持國家的團結，反對付諸行動。他們態度堅決，寸步不讓。最終只逮捕了若干有間諜嫌疑的外國人，而沒有一個法國人被捕。為了防范騷動，那天晚上軍隊作了嚴密戒備，但第二天早晨卻只見一片深切的憂傷和深沉的寂靜。“另冊”上開列的2501人中，最后有80%都志愿參軍服役去了。

那天深夜2時，普恩加萊被按捺不住的俄國大使從床上喚醒，來者便是先前做過外交大臣的過度活躍的伊茲沃利斯基。他“非常傷心，非常焦慮”，要求知道“法國作何打算”。

伊茲沃利斯基對普恩加萊的態度毫不擔心，他本人和俄國的其他政治家們所害怕而日夜不安的是：俄法軍事同盟，以其條款從未向法國議會透露過，到時候議會可能不予批準。條文中言明：“德國或在德國支持下的奧地利進攻俄國時，法國將竭盡全力進攻德國。”不論德國或奧地利，一經動員，“法國和俄國，無須事先有任何協議，應立即同時動員它們的全部軍隊，并將各自的軍隊調往盡可能靠近邊界之處……兩國軍隊應火速開始全力作戰，迫使德國在東線和西線同時應戰”。

這些條款看來是一清二楚、毫不含糊的，然而，正如伊茲沃利斯基1912年所焦急不安地詢問普恩加萊那樣，法國議會會承認此項義務嗎？在俄國，沙皇擁有絕對權力，所以法國“對我們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在法國，沒有議會的支持，政府便無能為力。議會對于1892年文本[[3]](#_3__Zhi_E_Fa_Liang_Guo_Mi_Mi_Jun)又毫不知情……我們憑什么可以相信你們的議會會跟著政府走呢？”

就在先前的那次談話中，普恩加萊回答說，“如果德國進攻的話”，議會“無疑”是會聽從政府的。

現在普恩加萊又在這深更半夜當面向伊茲沃利斯基保證：幾小時內就會召集內閣會議，給他一個答復。在同一時刻，身著外交禮服的俄國武官也出現在梅西米的臥室里，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梅西米打電話給總理維維亞尼。維維亞尼雖然夜間政務繁忙，已精疲力盡，卻尚未就寢。“天哪！”他一聽之下，大為發作，“這些俄國佬不但是些酒鬼，而且是嚴重失眠的人。”他激動地勸告對方：“鎮定，鎮定，再鎮定！”

俄國人逼著他們表態，霞飛逼著他們動員，然而為了向英國表明法國只是出于自衛才采取行動，而又不能有所動作，法國政府感到要保持鎮定真是談何容易。翌日，8月1日早晨8時，霞飛來到圣多米尼克大街陸軍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鎮定的常態，言辭哀婉動人”，懇求梅西米迫使政府應允動員。他指出最遲不得晚于4時，這樣命令就可以送往郵政總局，及時用電報發往全國各地而于午夜開始動員。上午9時，他和梅西米一起來到內閣，提出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是再耽誤總動員，那么每耽擱二十四小時就等于失去15到20公里的國土，他作為總司令，將拒絕承擔這個責任。他走了，把問題留給了內閣。普恩加萊主張行動起來；維維亞尼代表著反戰的傳統，仍然希望時間會提供一個解決辦法。11時，他到外交部去會見馮·舍恩，后者迫不及待地已經提早兩小時到達外交部，聽取法國對德國前一天所提法國在俄德戰爭中是否保持中立問題的答復。“我的問題未免過于天真，”這位怏怏不樂的大使說，“因為我們知道你們已有一個同盟條約。”

“不消說，”維維亞尼應聲說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萊事先商量好的答復，“法國將按它的利益行事。”馮·舍恩剛走，伊茲沃利斯基就奔了進來，帶來了德國給俄國最后通牒的消息。維維亞尼回到內閣，內閣終于同意動員。命令簽署好后交給梅西米，但是維維亞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幾小時內能出現扭轉局勢的變化，執意要梅西米將命令放在口袋里等到3時30分再掏出來。同時，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當晚，梅西米親自打電話給各軍司令，“奉共和國總統令，各部隊、巡邏隊、偵察隊、各種分遣小隊，都不得向東越過規定的國界。違者一律軍法論處。”此外，出于關懷，還特地給福煦將軍率領的第二十軍下了一道禁令，因據可靠報告，有人看見該軍的一個胸甲騎兵中隊曾跟德國一個槍騎兵中隊處于“劍拔弩張”狀態。

3時30分，霞飛部下的埃伯內（Ebener）將軍由兩名軍官陪同按約來到陸軍部領取動員令。梅西米默不作聲，把動員令遞給了他們。“我們四個人都意識到，這張小小的紙片將產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后果，因而我們的心弦都繃得緊緊的。”梅西米和三位軍官一一握手，他們舉手敬禮，走出陸軍部，將命令送往郵局。

4時，第一張布告出現在巴黎的墻頭（在協和廣場和皇家路的轉角，至今還被保存在玻璃框里）。在阿默農維爾，在布洛涅公園這個上流社會的宴游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經理走上前，招呼樂隊停止演奏，并向大家宣布：“動員令已經頒布，午夜開始動員。奏《馬賽曲》。”市內街上，車輛已經絕跡，都被陸軍部征用去了。一隊隊的后備役軍人，帶著包裹和送別的花束前往東站，市民們沿途揮手歡呼。一群人在協和廣場停了下來，把他們的花束放在披著黑紗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腳下。人群一片啜泣，高呼“阿爾薩斯萬歲！”，并且拉下了從1870年以來一直披在它身上的喪裝。在所有的飯店，樂隊都高奏著法國、俄國、英國國歌。“想不到演奏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發過這樣的議論。演奏這些國歌，仿佛是在表示一種希望，但這弄得人群中的英國人很不自在，最不自在的莫過于膚色紅潤、身軀肥碩的英國大使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禮服，頭戴灰色高頂禮帽，撐著一把綠色遮陽傘，走進法國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惡心而且可恥”。他命令使館把大門關上，據他在日記中寫道：“雖然今天是‘英國萬歲’，也許明天便是‘英國背信棄義’。”

在倫敦，在一間充塞著沉悶空氣的房間里，身材矮小、留有白胡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愛德華·格雷爵士相對而談。格雷告訴他，必須等待局勢出現某種“新的發展”，因為俄、奧、德三國的爭執所涉及的問題與英國“無關”。康邦在他無懈可擊的口才和彬彬有禮的莊重儀態中也微露了一點怒火。英國是否“要等到法國的領土受到侵犯之后才出面干預”？他問道，并且示意對方，要是那樣，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過晚”。

格雷盡管守口如瓶，鼻如鷹爪，內心里卻同樣憂心如焚。他熱切相信，出于英國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國；事實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國不予援助，他便辭職；他相信未來的事態發展會迫使英國表態。但是，目前他既無法以官方地位對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沒有那么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態度，在英國公眾看來是令人寬慰的，他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個堅強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國同僚看來則是“冷酷無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話：“比利時的中立也許會成為一個因素。”格雷——并且不僅是他——所要等待的局勢發展正是這個因素。

英國的困境源出一種人物性格的分裂對立，這在內閣之中和政黨之間都是顯而易見的。布爾戰爭遺留下來的裂痕造成了內閣中的派別——以阿斯奎斯、格雷、霍爾丹和丘吉爾為代表的自由黨的帝國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小英格蘭派”。格萊斯頓的后輩，跟他們已故的領袖一樣，對于在國外的糾葛都疑慮重重，他們認為，給被壓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務中唯一的正業，要不然，外交事務就會被視為對于改革、對于自由貿易、對于國內管理，以及對于上院否決權的惱人的干擾。他們傾向于把法國視為頹廢、輕佻的蚱蜢，并樂于把德國看作勤勞而值得尊敬的螞蟻，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軍國主義者趾高氣揚，咆哮如雷，不免給這種看法澆了冷水。他們本來是絕不會站在法國一邊支援一場戰爭的，不過比利時這個“小小的”國家如果發出正義的呼聲，要求英國給它保護，可能使情況有所變化。

另一方面，內閣里的格雷派則是和保守黨同持一個基本前提：英國的國家利益和維護法國的生存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語似平淡但內容精彩的話最好不過地說明了這個道理：“德國主宰歐洲大陸，是我們和別的國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因為我們勢必會被孤立起來。”這個史詩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國的全部政策，據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國果真受到挑戰，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現那個“不愿意看到”的結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則又勢必引起內閣和全國的分裂，從而在戰爭開始之前就使任何從事戰爭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擊。

在歐洲唯獨英國不實行義務兵役制。戰時，它得依靠自愿應募。如果在戰爭問題上有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著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將領導成立一個反戰組織，募兵工作就會因此產生不堪設想的后果。如果法國的首要目標是要與英國結盟開戰，那么英國參戰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一個聯合一致的政府。

這便是問題的試金石。內閣會議上，反對干預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們的領袖莫利勛爵是格萊斯頓的老朋友和傳記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個人可能贊同我們”，反對丘吉爾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熱的直率態度”所公然為之奮斗的解決辦法。從內閣的討論來看，莫利覺得有一點是很清楚的：比利時的中立“比起我們在德法爭斗中的中立來是處于第二位的”。在格雷眼中，同樣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時的中立遭到破壞才會使主和派相信德國的威脅，相信需要進行戰爭以保衛國家的利益。

8月1日，內閣里和議會里的裂痕已現，并且在擴大中。那天，十八個內閣閣員中，有十二個人聲明他們反對英國保證在戰爭中給予法國支持。下午，在下議院會客廳里，自由黨議員決策委員會以十九票對四票（雖然有許多人棄權）通過一項動議：“不論比利時或其他地方發生什么事情”，英國都應保持中立。那個星期的《笨拙》（Punch）周刊發表了《表達一個普通的英國愛國者意見的詩》：

憑什么我要奉行你們的打仗路線，

就為了一樁與我無關的事件？……

到時候我將被征召作戰，

全歐洲烽火遍地，

卷進了一場別人的戰爭，

為的是要履行兩家協約的規定。

普通愛國者在當時的愛爾蘭危機中，已經泄盡他們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憤怒。“克拉兵變”（Curragh Mutiny）便是英國的卡約夫人事件。《愛爾蘭自治法案》的影響所及，北愛爾蘭要以武裝叛亂相威脅，反對愛爾蘭自治，而駐扎在克拉軍營的英軍則拒絕向北愛爾蘭親英分子開火。克拉的駐軍司令高夫（Gough）將軍和他部下的軍官全體辭職，總參謀長約翰·弗倫奇爵士隨后辭職，繼霍爾丹之后任陸軍大臣的約翰·西利（John Seely）上校也接著辭職。陸軍情緒激憤，全國鼎沸，國家陷于分裂狀態，國王和各黨領袖舉行了御前會議，但也無濟于事。勞合·喬治不祥地談到這是“斯圖亞特王朝以來我們國家發生的最嚴重的事件”，“內戰”和“叛亂”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還有一家德國軍火公司滿懷希望地把4萬支步槍和100萬發子彈運進北愛爾蘭。在此期間，陸軍大臣的職務繼任無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無時間，更無興致過問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卻有一位特別活躍的海軍大臣。溫斯頓·丘吉爾聞到遠方戰爭的火藥味，就像《舊約·約伯記》里的那匹戰馬，不因刀劍退回，而是“一聽角聲就不耐站立，角每發聲，它說，呵哈”。在英國大臣中，只有他對于國家應該如何行事成竹在胸，并能毫不猶豫地采取行動。7月26日，也就是奧地利拒不接受塞爾維亞復照內容的那天，同時也是英國政府下定決心前的十天，他發布了一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命令。

7月26日，英國艦隊正在完成一場動員和作戰演習。這次演習，參加的艦艇一律按戰時定員配足，但與當前的危機無關。各中隊定于翌晨7時解散，有些將去公海進行各種訓練項目，有些將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員遣回訓練學校，有些將進塢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據海軍大臣日后的回憶，是“風和日麗的一天”。他獲悉來自奧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決心“使海軍的形勢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勢，所以大艦隊必須在德國人能夠知道我們是否參戰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話，也必須在我們自己作出決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戰位上”。他與海軍部第一海務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親王磋商后，便命令艦隊不得解散。

接著，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訴了格雷。經格雷同意后，他向報界發布了海軍部的命令，希望這個消息會對柏林和維也納產生“一種清醒劑的作用”。

單把艦隊集結起來是不夠的，還必須使之處于“戰位”，這兩個字丘吉爾都是用大寫字母寫的。艦隊的首要職責，根據海軍上將馬漢（Mahan，他是海戰理論方面的克勞塞維茨）的規定，是保持“艦隊的存在”。在戰時，英國作為一個島國所仰仗的艦隊，必須確立和保持對海上貿易航線的控制權；必須保護不列顛諸島不受侵略；必須保護海峽和法國海岸，以履行英法協約；必須集中足夠的實力，在德國艦隊討戰時能每戰必勝；而尤為重要的，則是必須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潛在威脅力量尚未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魚雷——的襲擊。海軍部纏繞于懷的，是生怕突然遭到一場不宣而戰的魚雷攻擊。

7月28日，丘吉爾下令艦隊開赴遠在北海濃霧彌漫的奧克尼群島（Orkney）尖端的斯卡帕灣（Scapa Flow）的作戰基地。29日，艦隊駛出波特蘭（Portland）港，夜幕降臨時，長達18英里的戰艦行列便已向北駛過多佛爾海峽。此行與其說是為了尋求戰功的光榮，還不如說是為了尋求審慎的安全。海軍大臣寫道：“無論如何，突如其來的魚雷襲擊已成為一場噩夢，一去不復返了。”

艦隊的臨戰準備布置完畢，丘吉爾便將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變臨頭的直覺轉到為整個國家做好戰前準備。7月29日，他說服阿斯奎斯授予拍發報警電報的權限，這是預先安排好由陸軍部和海軍部發出宣布進入預警階段的信號。英國沒有德國的面臨戰爭危險的公告或法國的戒嚴令可以作為實施戒嚴的根據，因此這一預警階段的設定便被說成是“天才的發明……在時間已經成為決定一切的因素時……可以讓陸軍大臣無須通過內閣而徑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龍活虎的丘吉爾深感時機緊迫，他認為自由黨會分裂，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經投身過的保守黨接觸。聯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維持政府的團結一致。誰都不會認為七十六歲高齡的莫利勛爵能在戰時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為充沛的財政大臣勞合·喬治，這是因為他在任職期間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對選民具有影響的緣故。勞合·喬治精明干練，雄心勃勃，又有威爾士人令人著迷的口才，他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跨向任何一邊。他的盛譽新近遭到幾次挫折。他看出一個人已成為和他爭奪黨魁的新對手，那就是莫利勛爵所說的“海軍部的那個杰出的雇傭兵隊長”；他的一些同僚認為，“打和平牌”來對付丘吉爾也許會在政治上得到好處。勞合·喬治完全是個難以捉摸的危險人物。

阿斯奎斯無意領導一個分裂的國家投入戰爭，他以煎熬難忍的耐心繼續等待，以便讓事態的發展使主和派認識錯誤。他在7月31日的日記中，以絲毫不動感情的筆調寫道，當前的問題是“我們要投身其中還是袖手旁觀。當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觀”。在7月31日內閣會議上，格雷的態度倒并不這么消極，而近乎開門見山。他說，德國的政策“是跟拿破侖一樣兇惡的歐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侖的名字在英國只有一個意思），他告訴內閣作出決定的時刻已經到來，是支持協約國，還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說，倘內閣選擇中立，他絕不是執行這種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爭，其影響幾乎跟明言直說一樣。

一個在場的人寫道，“內閣好像發出了一聲浩嘆”，好長一陣子，舉座“鴉雀無聲”。大臣們面面相覷，頓感他們這個政府的繼續存在現在已成問題。他們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就休會了。

那個星期五，正值8月份銀行假日周末的前夕，證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風潮中于午前10時宣告停市；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首先在紐約掀起了這場風潮，全歐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繼關閉。倫敦城人心惶惶，預示著末日將臨，外匯暴跌。勞合·喬治說，銀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戰爭就“大驚失色”，戰爭將“使以倫敦為中心的整個信貸體系陷于崩潰”。英格蘭銀行總裁于星期六晉見勞合·喬治，告訴他整個倫敦城“全都反對我國插手”戰爭。

就在這個星期五，保守黨的領袖人物全都從他們的鄉間別墅被召回到倫敦會商這一危機。亨利·威爾遜，一會兒沖到這個人面前，一會兒沖到那個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勸告，又是大發議論，說明如果猶豫不決的自由黨在這當口退縮不前將會使英國蒙受怎樣的恥辱。威爾遜此刻正是英法軍事會談的心臟、靈魂、精神、脊梁和支柱。兩國總參謀部給他們的聯合計劃商定了一個委婉的用詞，稱之為“會談”。霍爾丹首先確定了“不承擔義務”的措辭。這一措辭，曾引起坎貝爾―班納曼的憂慮不安，曾為伊舍勛爵所摒棄，但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著官方立場，雖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義。

它確實沒有什么意義。克勞塞維茨說得好，如果戰爭是國家政策的延續，那么，軍事計劃也同樣如此。英法聯合計劃是花了九年時間才把全部細節擬訂完畢的，它不是逢場作戲，不是幻想的馳騁，也不是為避免軍事人員惹是生非的紙上游戲。這些軍事計劃如不是政策的繼續，那就什么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間的安排或德奧之間的安排絲毫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還有明知不符事實而仍按習慣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設，說什么英國無須因此“承擔義務”，采取行動。不喜歡這個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議員，只是閉上雙眼，自行催眠，而對這樣的假設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與格雷進行了痛苦的會見之后，再去拜訪反對黨領袖時，連外交辭令也棄置不顧了。“我們所有的計劃都是雙方共同擬定的。我們兩國的總參謀部都曾進行過磋商。你們已經看到了我們的全部計劃和準備工作。請看我們的艦隊！由于我們和你們所作的安排，我們的整個艦隊都在地中海，因而我們的海岸對敵人敞開著。你們把我們搞得門戶洞開！”他告訴他們，如果英國袖手旁觀，法國是永遠不會原諒它的，他最后滿含悲憤，厲聲責問：“那么榮譽呢？英國知道什么是榮譽嗎？”

在不同人的眼中，榮譽有著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須使榮譽穿上一件比利時的外衣，才能說服主和派考慮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給法德兩國政府分別去電，要求它們正式保證：“在比利時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國家破壞時”，它們準備尊重比利時的中立。法國在7月31日深夜接到電報一小時內，就回電表示同意；德國則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內閣討論了這個問題。勞合·喬治用手指在地圖上劃了一條他認為德國人會經過比利時的進軍路線，這條路線正好穿過靠近法比邊境的一個小角落，是直達巴黎的最短直線路徑；他說，這不過是對中立的“小小的破壞”。丘吉爾要求授權他進行艦隊動員，就是說，征召海軍的后備力量，內閣在經過一番“激烈交鋒”后拒絕了。格雷要求授權他履行對法國海軍承諾的義務，莫利勛爵、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約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和劉易斯·哈考特（Lewis Harcourt）便要求辭職。內閣外邊，謠傳四起，都在議論德皇與俄國沙皇之間最后一分鐘的較量和德國的最后通牒。格雷走出房間去和利希諾夫斯基通電話——他的話被后者誤解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最后還引起了毛奇將軍一場虛驚。他還會見了康邦，告訴他“此時此刻法國必須獨自作出決定，不要指望我們眼下所無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內閣會議室去了，康邦則是臉色發白，渾身哆嗦，癱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務次官阿瑟·尼科爾森（Arthur Nicolson）爵士辦公室的椅子上。“他們要拋下我們不管了。”他說。一位《泰晤士報》編輯問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說：“我要等著瞧，‘榮譽’這個詞是不是會從英語詞典里刪去。”

內閣里誰也不想破釜沉舟，雖然有辭職的傳聞，卻還沒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繼續穩坐不動，絕少開口，等待局勢的發展，好讓這種電報往來頻繁、如癡似狂的日子快告結束。那天夜間，毛奇拒絕東進，費爾德曼中尉的連隊占領了盧森堡名叫“三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電話中重申了后撤十公里的命令；海軍大臣在海軍部殷勤款待反對黨的朋友們，其中兩位是未來的比弗布魯克（Beaverbrook）和伯肯黑德（Birkenhead）勛爵。他們吃罷了晚飯便打橋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時光。就在打牌的當兒，一員信使送來一只紅色公文遞送箱——恰巧還是最大號的。丘吉爾從衣袋里取出一把鑰匙，打開箱子，里面只是一紙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國已向俄國宣戰。”他告訴了在座的人，便換下晚餐禮服，“徑自走出去，就像是去處理習以為常的事務一樣”。

丘吉爾穿過皇家騎兵衛隊閱兵場，來到唐寧街，從花園門進去，上樓見到格雷、現已出任大法官的霍爾丹以及印度事務大臣克魯（Crewe）勛爵都在首相這兒。他告訴他們，“不管內閣如何決定，必須立即進行艦隊動員”。阿斯奎斯一言不發，但是丘吉爾認為他似乎“十分滿意”。格雷陪同丘吉爾出來時對他說：“我剛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對康邦講了，我們絕不允許德國艦隊進入海峽。”或者這是丘吉爾在與格雷交談中感到難于捉摸他說話的要領的情況下，對他的話的理解。這話意味著現在艦隊已承擔了保衛海峽的義務。到底格雷是怎么說的，他是已經作了保證，還是如學者們后來所肯定的那樣準備翌日作出保證，其實都無關系，不論何者屬實，都不過是對丘吉爾已作的決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爾回到海軍部后，便“立即發出了動員令”。

丘吉爾的命令，以及格雷要信守同法國的海軍協議的保證，都是與內閣的多數意見背道而馳的。第二天，內閣勢須批準這些行動，否則就得解散，格雷則預計到那時比利時會出現某種“發展”。他跟法國人一樣，認為這個“發展”會由德國作出。

注釋

[[1]](#_1_6) 西拉諾（Cyrano de Bergerac），同名戲劇的主角，該劇是一出歌頌英雄的喜劇，系法國劇作家羅斯唐（Edmond Rostand，1868—1918）所作。——譯注

[[2]](#_2_4) 《費加羅報》的主編加斯東·卡爾梅特（Gaston Calmette）在報上發動了一場對當時任財長的卡約的人身攻擊，1914年3月16日被卡約夫人槍殺；17日卡約辭職。——譯注

[[3]](#_3_4) 指俄法兩國秘密軍事同盟的文本。——譯注

讓德國承擔發動侵略的惡名：Joffre, 133.

邊境部隊后撤十公里：Orders of the War Ministry for the withdrawal are Nos. 22, 25, 26, and 27 in Annexes to AF, I, I.

維維亞尼“驚魂未定”：Viviani, 194–5.

“保證取得英國鄰邦的合作”：Annexe No. 25.

霞飛將軍催政府下令動員：Joffre, 123–5; Messimy, 139–50.

“惶恐不安”：Viviani, 195.

“在整個8月份一直如此”：Messimy, 183. The premier's nerves were also remarked on by Bertie, 5.

戈捷博士“忘了”：Messimy, 156.

普恩加萊還記得他在十歲那年：Poincaré, III, 1.

反復地呼喊著“法蘭西萬歲！”：Messimy, 138.

“不費一彈進入法國”：ibid., 140.

“變相的動員令”：Messimy, 144.

康邦報稱英國的態度“半冷不熱”：Poincaré, II, 242. “No interest to Great Britain”: ibid., 264.

“另冊”：Messimy, 147–8; de Gaulle, 237; Renouvin, 13, 27–8.

伊茲沃利斯基“非常傷心”：Poincaré, II, 272.

俄法軍事同盟的條款：text in Livre Jaune, l'Alliance Franco-Russ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Paris, 1918, 92; also in Joffre, 102. Over the years from 1892 to 1914 the Alliance was the subject of continuing discussion between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especially as to the exact interpretation of its casus foederis, and it became gradually encrusted with layers of aides-mémoires. According to various English translations, France was obligated to “attack,” to “oppose,” or to “fight” Germany. In the French text the word is “attaquer.” For Poincaré's interpretation, see II, 289.

“鎮定，鎮定，再鎮定！”：Messimy, 183–4.

霞飛乞援“言辭哀婉動人”：ibid., 149.

馮·舍恩與維維亞尼的會談：Poincaré, II, 265; Schoen's report of Viviani's reply, Kautsky, No. 571.

重申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原文：AF, Annexe No. 26.

槍騎兵中隊處于“劍拔弩張”狀態：Joffre, 129, n. 3.

埃伯內將軍領取動員令：Joffre, 128; Messimy, 150.

動員令頒布后巴黎街頭的景象：Adam, 20; Gibbons, 73; Guard, 9; Wharton, 14.

“演奏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Wharton, 10.

“惡心而且可恥”：Bertie, I, 6–7.

康邦與格雷的會談：Poincaré, II, 264.

格雷準備辭職：“Throughout the whole of this week I had in view the probable contingency that we should not decide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o support France. In that event I should have to resign.” Grey, II, 312.

格雷“冷酷無情”：Lichnowsky to Jagow, April 13, 1913, qtd. Halévy, 627.

“德國主宰歐洲大陸”：Grey, I, 299.

莫利勛爵對內閣分歧的看法：Morley, 4, 5, 10.

自由黨議員：Addison, 32.

《笨拙》周刊中的詩：by Owen Seaman, Punch, August 5, 122.

勞合·喬治談到這是“斯圖亞特王朝以來我們國家發生的最嚴重的事件”：qtd. Halévy, 547.

德國軍火公司把軍火運進北愛爾蘭：ibid., 548.

丘吉爾和海軍：Corbett, 25–30; Churchill, 230ff. Subsequent material on Churchill's role in the crisis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Fleet is from his Chapter IX, “The Crisis,” and Chapter X, “Mobilization of the Navy.”

“天才的發明”：L. J. Maxse, “Retrospect and Reminiscence,” National Review, Vol. LXXI, 746.

“杰出的雇傭兵隊長”和“打和平牌”：Morley, 24.

“我們要投身其中還是袖手旁觀”：Asquith, II, 7.

7月31日內閣會議上的格雷：Morley, 2.

“內閣好像發出了一聲浩嘆”：ibid., 3.

銀行家和商人“大驚失色”，整個倫敦城“全都反對我國插手”戰爭：Morley, 5; Lloyd George, 61.

保守黨領袖：Chamberlain, 94–101; Wilson, 154.

康邦責問：“那么榮譽呢？英國知道什么是榮譽嗎？”：Chamberlain, 101.

格雷關于比利時中立的電報和法國的回電：British Blue Book, Nos. 114, 124, 125.

“小小的破壞”：Beaverbrook, 15–16.

勞合·喬治告訴康邦“法國必須獨自作出決定”：Nicolson, Diplomatist, 304.

“他們要拋下我們不管了”：ibid., 304–5.

丘吉爾參加晚宴：Beaverbrook, 22–3.

## 第7章　布魯塞爾：德國的最后通牒

德國駐布魯塞爾公使赫爾·馮·貝洛―扎萊斯克（Herr von Below-Saleske）的保險箱里鎖著一封由特別信使于7月29日從柏林送來的密封信件，隨附的命令責成：“未奉此處電令，不得拆閱。”8月2日，星期天，電令到達，指示他立即拆封，將封內照會于當晚8時遞交比利時政府，并注意務使對方“感到有關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達”。他務必要求比利時人在十二小時內作出答復，然后“盡速”電告柏林，同時立即用汽車將答復送達正在亞琛聯盟旅館內的馮·埃米希（von Emmich）將軍。亞琛，亦名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是德國離比利時東大門列日最近的一個城市。

赫爾·馮·貝洛是個獨身漢，身材高大挺拔，蓄著黑黑的八字胡子，一只碧玉煙嘴時刻不離手，1914年初開始擔任駐比利時公使之職。他的辦公桌上有只銀煙缸，煙缸上有個子彈洞眼。每逢來訪德國使館的客人問及這個洞眼的來歷時，他總是放聲大笑，告訴客人說：“我是一只不祥之鳥。我被派駐土耳其，土耳其鬧了場革命；我到中國，又碰上義和團。這個洞眼就是他們的一顆子彈從窗外飛來打穿的。”然后就是落落大方、姿態雅致地把香煙慢悠悠地送到唇邊，再補上一句：“不過現在，我是悠哉游哉了。布魯塞爾真是一派升平啊。”

自從那封密封信到達以后，他就不再悠哉游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時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爾（de Bassompierre）男爵來訪，告訴他晚報準備刊登法國給格雷的復信，在這封復信里法國保證尊重比利時中立。巴松皮埃爾婉轉表示，鑒于德國尚未作出類似答復，赫爾·馮·貝洛或許愿意發表一項聲明。但是他未經柏林授權這樣做，所以也就只能借助外交手腕來回避。他仰靠椅背，兩眼盯住天花板，透過繚繞的煙霧，把巴松皮埃爾剛剛對他說的話留聲機似的逐字重復了一遍。然后一面站起來，一面寬慰他的客人說：“比利時對于德國沒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就此結束了這次會見。

第二天上午，當達維尼翁（Davignon）先生——這位比利時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時被德國入侵盧森堡的消息從睡夢中驚醒的——召他進行解釋的時候，赫爾·馮·貝洛又對他照樣寬慰了一通。返回使館之后，為了安撫嘩然的新聞界，他使用了一個后來被廣泛引用的絕妙譬喻。他說：“你鄰居的屋頂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將安全無恙。”

不少比利時人，不論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傾向于相信他的話。有些是出于親德情緒，有些是出于一廂情愿的想法，有些則是因為對比利時中立的國際保證的真誠可靠，天真地篤信不疑。比利時的獨立經有關國家保證已經有七十五年之久，他們由此享受了有史以來持續最長的一段和平時期。自從愷撒攻打比爾蓋人[[1]](#_1__Bi_Er_Gai_Ren__Belgae__Luo_M)以來，比利時這塊土地就一向是窮兵黷武者的必經之地。勃艮第勇士查爾斯[[2]](#_2__Bo_Gen_Di_Yong_Shi_Cha_Er_Si)和法蘭西的路易十一這兩個不共戴天的宿敵曾在這里一決雌雄；西班牙的鐵蹄曾在這里蹂躪過低地三國；英國名將莫爾伯勒[[3]](#_3__Mo_Er_Bo_Le__Marlborough_165)曾在這里同法國進行了馬爾普拉凱（Malplaquet）的“浴血戰”；拿破侖曾在這里的滑鐵盧迎戰威靈頓；這里的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一個又一個統治者——勃艮第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荷蘭人——直至1830年最后推翻奧蘭治王朝（House of Orange），擁戴維多利亞女王的母舅，即薩克森―科堡公國的利奧波德大公為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從此，比利時逐步走向繁榮昌盛，并致力于解決佛蘭芒人（Flemings）同瓦隆人（Walloons），天主教徒同新教徒的兄弟鬩墻，解決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以及法語和佛蘭芒語并用的爭論。他們強烈希望鄰國能讓這種安樂境況長此下去，不受干擾。

如今，國王、首相和總參謀長雖然都已不再有此奢望，但是中立的義務和對于中立的信念卻使他們裹足不前，未能制訂計劃，抵御外敵進犯。直到最后時刻，他們依然難以相信，保證他們中立的國家之一竟會果真入侵。得知德國7月31日發布“面臨戰爭危險”公告之后，他們立即下令于午夜開始動員軍隊。當天夜間和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戶拉響門鈴，傳達命令，男人們或從床上爬起，或是離開工作崗位，打好背包，告別親人，走向營地。比利時一向恪守中立，直到此時此刻并沒有確定任何作戰方案，所以動員并無某一具體敵國為其目標，也不是向某一具體方向揮戈，所謂動員，只是征召入伍而已，并無任何部署可言。比利時和它的保證國一樣，負有維護中立的義務，因此未見公開入侵行動之前，不能采取公開行動。

8月1日晚，德國對格雷的要求默不作答已滿二十四小時，阿爾貝國王決定以個人名義向德皇作最后一次呼吁。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亞公爵的女兒，德國血統的伊麗莎白王后——共同商討擬就了文稿，并由她逐句譯成德文。她與國王字斟句酌，推敲了每個詞的含義。他們在信中承認，一些“政治上的障礙”可能有礙發表一項公開聲明，但是希望“親緣和友誼的紐帶”會使德皇向阿爾貝國王作出個人的私下保證，尊重比利時的中立。但是親緣關系也沒能打動德皇，使他作出回答。這里所說的親緣關系，源出阿爾貝國王的母親——霍亨索倫―錫格馬林根（HohenzollernSigmaringen）的瑪麗公主；這個家族是普魯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遠族。

相反，送來的卻是在貝洛的保險箱里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后通牒；送來的時間是8月2日晚上7時。外交部的一名侍役推開次官的房門，探進頭來，以激動的聲調輕輕地報告說：“德國公使剛剛來了，去見達維尼翁先生了！”十五分鐘后，貝洛驅車駛返法律大街，只見他雙手拎著帽子，滿額汗珠，一口接一口地抽煙，那急促的動作活像一只機械玩具。一等他那“趾高氣揚的身影”離開了外交部，兩位次官便立即奔到大臣的房間。他們發現，往日總是鎮定樂觀的達維尼翁先生此時看上去面無人色。“壞消息，壞消息！”他一面說，一面把剛剛收到的德國照會遞給他們。政務秘書德蓋菲耶（de Gaiffier）男爵一面念著，一面慢慢翻譯；巴松皮埃爾坐在大臣辦公桌旁，一面記錄，一面推敲著每一個模棱含混的用詞，確定其正確的譯法。而達維尼翁先生和常任次官范德埃爾斯特（van der Elst）男爵則坐在火爐兩邊的座椅上諦聽著。以往不論遇到什么問題，達維尼翁先生最后一句口頭禪總是：“我相信，最后總會萬事如意。”范德埃爾斯特因為對德國人懷有一片尊崇之情，所以過去一直寬慰政府，說德國軍備不斷增長旨在東進，唯此而已，對比利時絕非不祥之兆。

翻譯工作剛剛完成，身任首相兼陸軍大臣的德布羅克維爾（de Broqueville）男爵走了進來。他身材高大，膚色黧黑，修飾考究，是位紳士氣派十足的大人先生，兩撇堅挺有力的黑八字胡子，加上一雙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更為他的神態增添了幾分堅毅。在向他宣讀那份最后通牒的時候，室內每個人對每個字都聚精會神地聽著，一如這份通牒作者擬稿時的全神貫注。德國人擬就這份最后通牒，確實頗費一番心力，可能當時就已意料到，它必是本世紀的關鍵性文件之一。

這份最后通牒，在7月26日——也就是在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前兩天，奧地利和俄國開始動員前四天，德奧兩國拒絕愛德華·格雷爵士提出的關于召開五強會議的建議的同一天——已由毛奇將軍親筆擬就了底稿。毛奇將底稿送交外交部后，經由副外交大臣齊默爾曼和政務秘書施圖姆（Stumm）修改，復經外交部大臣雅戈和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潤色訂正，最后才將定稿密封，于29日送達布魯塞爾。德國人為此不遺余力，說明了他們對于這份文件的重視。

照會一開始說，德國收到“可靠情報”，法軍擬將沿著日韋（Givet）至那慕爾一線推進，所以“法國擬欲通過比利時國境進犯德國的意圖已不容置疑”。（因為比利時人并未發現法軍向那慕爾移動的任何跡象，事實上也根本沒有這種移動，所以這一指控未能對比利時發生作用。）照會繼而又稱，不能指望比利時軍隊可以阻止法軍推進，因此根據“自衛之需”，有必要“先發制人，以阻止這種敵對性的進攻”。如果比利時人把德國進入比利時國土的行為視為“針對它本身的一種敵對行動”，德國將“深感遺憾”。不過，如果比利時能夠保持“善意的中立”，則德國將保證“一俟締結和約當即撤出其領土”，保證賠償德軍所造成的一切損失，并“在和約締結時，保證其主權和獨立”。在原稿中，這一句還接著說：“并保證以最大的善意支持比利時可能向法國提出的任何賠償要求。”不過在最后一刻，貝洛按指示刪去了這個賄賂。

照會最后說，如果比利時反對德國通過其領土，則將被視作敵國，今后與它的關系則將聽由“槍炮決定”。照會要求比利時十二小時之內必須作出“明確無誤的答復”。

據巴松皮埃爾后來的回憶，照會念完之后，接著是“一陣長達數分鐘之久的憂郁的沉默”，室內每個人都在思考國家面臨的抉擇。比利時疆域狹小，獨立不久，唯其如此，確保獨立的決心益發堅決。至于決定捍衛獨立的后果如何，室內每個人都是無須明言的。他們的國家將受攻擊，他們的家園將遭毀滅，他們的人民將遭遇十倍于他們的一支武裝力量的報復，不論戰爭結局如何，直接處于德國人進軍途中的他們，對于自己的這種后果是不存懷疑的。反之，如果他們屈服于德國的要求，那將等于聽任德國占領比利時，而一個戰勝了的德國，只有很低的可能性會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僅如此，他們還將使比利時成為進攻法國的幫兇，成為自身中立的破壞者。不論選擇哪條道路，他們都要被德國占領；但如屈服，還得喪盡榮譽。

“如果我們必然要被化為齏粉，”巴松皮埃爾這樣記述著他們當時的情緒，“就讓我們光榮地化為齏粉吧。”在1914年，說到“光榮”的時候是沒有什么可羞慚難堪的，“榮譽”是為人們所篤信的一個熟悉的概念。

范德埃爾斯特打破了室內的沉寂，向首相問道：“那么，閣下，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準備好了，”德布羅克維爾答道，“是的，”他重復了一遍，好像盡力要使自己相信似的，“不過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我們還沒有得到重型炮。”政府還只是在上一年才由墨守中立的國會勉強準予增加軍事撥款，重型炮是向德國克虜伯（Krupp）公司訂購的，交貨也就無怪乎要受拖延。

十二小時限期中的一小時已經過去。在其他同僚開始召集全體大臣準備于9時召開國務會議時，巴松皮埃爾和德蓋菲耶便著手草擬復照。應該如何答復，他們已無須商討。首相德布羅克維爾將此事交由他們辦理之后，便去王宮稟告國王。

國王阿爾貝感到作為一個統治者的責任重大，因此對于外界的壓力也就感覺非常敏銳。他并非生下來就注定日后南面為王的。他是國王利奧波德的弟弟的次子，是在王宮偏僻的一角，在一個極平庸的瑞士教師的教誨下長大的。科堡家族的生活并非愉快。利奧波德的親生子夭亡之后，1891年，他的侄子博杜安（Baudouin），也就是阿爾貝的哥哥，又去世，因此阿爾貝在十六歲時便成了王位繼承人。老國王痛喪嫡嗣之后，又失去了他以父情相愛的博杜安，悲切之余，對于阿爾貝最初并未寄予厚望，只管他叫作“封了口的信封”。

可在這“信封”之內，卻蘊藏著驚人的體力和智力，可以與他同時代的西奧多·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這兩位偉人相媲美。而在其他方面，又與他們迥然不同。他沉默寡言，而他們則是性格外向；不過，他雖與羅斯福氣質互異，卻也有許多相同的愛好：他喜歡戶外活動、體育鍛煉、騎馬爬山，愛好自然科學，關心保護自然環境，并酷愛書本。同羅斯福一樣，他每天必讀兩本書，內容包羅萬象——文學、軍事科學、殖民主義、醫學、猶太教義、航空學，等等。他有一輛汽車、一架飛機，專由自己駕駛。他最最熱衷的是登山運動，曾經隱姓化名覓遍歐洲諸峰。身為確定的嗣位人后，他曾旅游非洲，實地研究殖民問題；作為國王，他又曾親臨現場，研究軍隊，考察博里納日（Borinage）的煤礦和瓦隆人的“紅色鄉村”。他的一位大臣曾說：“國王每次開口，都好像要有所建樹。”

1900年，他和維特爾斯巴赫（Wittelsbach）的伊麗莎白結婚。新娘的父親是位公爵，在慕尼黑一家醫院做眼科醫生。這對夫婦顯然相親相愛，他們生了三個孩子，家庭生活堪稱楷模，與舊王朝那種有失體統的生活方式適成對照，這使阿爾貝即位之初便大得人心。1909年，他繼承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登基為王，國人普遍感到如釋重負，為之慶幸。新國王和新王后一如既往，不講虛飾豪華。合意的人，他們盛情款待；中意的地方，他們就前往舒展獵奇探險之心。危險、禮儀、非議等等，他們始終漠視不計。他們這個帝王之家的生活與其說有布爾喬亞的氣派，不如說是波希米亞的氣質。

阿爾貝在軍事學校做士官生時曾與后來任總參謀長的埃米爾·加萊（Emile Galet）同學。加萊是鞋匠的兒子，是全村人共同捐款送去上學的。他后來當過軍事學院教官，不過當他再也不能同意比利時參謀部無視情況不同生搬硬套法國人那套殊死進攻理論的時候，便辭職引退。加萊還曾脫離天主教會成為一名嚴格的福音派信徒。他悲觀厭世，苛嚴刻板，忠貞耿直，對于自己的職業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一概嚴肅認真——據說他每天必讀《圣經》，一向不茍言笑。國王聽過他講課，在演習中和他會過面，并對他的教誨印象深刻。他教導說：不顧客觀情況為進攻而進攻是危險的；“只有在具有重大勝利的前景時”，軍隊才應求戰；而且，“進攻必須具備優勢手段”。雖然他還只是一名上尉，雖然他是個平民的兒子，雖然他是在一個天主教國家而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但是卻被國王選任為私人軍事顧問，這是個特地為他設立的職務。

根據比利時憲法，阿爾貝國王只有在戰爭爆發后才能成為總司令，因此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和加萊不能將自己的憂慮和戰略主張強加于總參謀部。而總參謀部則是死死抱住1870年的先例不放，認為盡管當時法軍若是進入比境就會有足夠的回旋余地可以撤退，可是那時不論是普魯士軍隊或是法國軍隊，都未有一兵一卒踏上過比利時領土。然而，阿爾貝國王和加萊認為，自那時以來，軍隊數量已有巨大增長，因此情況已愈發明顯：如果這兩個國家再度大舉進軍，必將涌向舊日征途，必將再度兵戎相見于舊日疆場。

利奧波德二世1904年與德皇會晤時，德皇曾向他最清楚不過地表明這一點，當時他曾為之吃驚不已。但他回國之后，這種震驚之感卻逐漸消逝。因為，對于威廉這樣一個變幻無常的人，誰能信以為真？國王曾把此次會見情況告訴范德埃爾斯特，范德埃爾斯特也與國王有同感。1910年德皇回訪布魯塞爾時，其表現確實使人疑慮頓釋。他對范德埃爾斯特說，比利時根本沒有什么可害怕德國的，“你們將不會有任何理由對德國不滿……我完全理解你們國家的處境……我絕不會使它為難。”

總的說來，比利時人相信了他。他們對于自己的中立保證是認真從事的。比利時忽略了自己的軍隊、邊防、工事，凡屬意味著對那項保護性條約缺乏信心的事情，他們一概置之不辦。社會主義才是風靡一時的論題。公眾對于國外發生的情況無動于衷，國會則被經濟問題所纏，結果是軍隊狀況任其惡化，而與土耳其人的情況毫無二致。部隊紀律松弛，懶散拖沓，軍容不整，士氣低沉，軍禮不行，步調不一。

軍官隊伍的狀況也好不了多少。在人們思想上，軍隊是多余的，甚至還有點荒唐可笑，既吸引不了才智之士，也吸引不了有才干、有抱負的青年。而那些確以行伍為業并由軍事學校科班出身的人，則深受法國鼓吹沖動和殊死進攻那套學說的感染。他們得出的一條驚人的公式是：“要使我們不受忽視，關鍵在于我們必須進攻。”

不論這種精神多么威武雄壯，這一公式則是與比利時的實際狀況格格不入的。一個受中立義務約束而只能制訂防御計劃的參謀部竟然尊崇這種進攻理論，誠然是件咄咄怪事。中立禁止他們與任何其他國家協同制訂計劃，并規定他們必須把踏上其國土的第一步視作敵對行動，而不論這一行動是來自英國人、法國人，還是德國人。因而在這種情況下，也就難于制訂出一項協同作戰計劃。

比利時軍隊包括六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而他們所要應付的卻是擬將越過比利時的34個德國師，同時裝備不足，缺乏訓練，軍費微薄，所能提供的彈藥有限，每人每周只能進行兩次實彈射擊，每次又只有一發子彈，因而射擊技術低劣。1913年才實行義務兵役制，而其結果只是使部隊更加不得人心。那年，國境之外已是戰車隆隆，征兆不祥，國會才勉強將每年服役人數從13000人增至33000人，而且，批準安特衛普防御工事現代化的撥款時，是以此項開支必須通過縮短義務兵役期所節省的開支覆蓋為條件的。以前根本沒有總參謀部，直到1910年，由于新國王的堅持才設立。

總參謀部由于成員意見分歧很大，成效有限。一派主張制訂進攻計劃，遇到戰爭威脅時將部隊集結于邊界前沿。另一派主張防御，將部隊集結在內地縱深。而主要由阿爾貝國王和加萊上尉組成的第三派，則主張御敵于盡可能接近受威脅的邊界，而又不危及通向安特衛普筑壘基地的交通線。

歐洲上空，烏云密布，比利時的參謀們卻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未能完成集結計劃。由于他們不得指明誰是敵人，不同意見也就取得了妥協。一項折中計劃總算獲得通過，不過也僅僅是個大綱而已，鐵路時刻表、補給兵站、部隊宿營等等都沒有作出安排。

1913年11月，阿爾貝國王同他伯父九年前一樣，應邀訪問柏林。德皇盛宴招待，宴席上擺滿紫羅蘭，賓客五十五人，其中有陸軍大臣法爾肯海因（Falkenhayn）將軍，帝國海軍大臣蒂爾皮茨海軍上將，總參謀長毛奇將軍，以及首相貝特曼―霍爾韋格。比利時大使拜恩斯（Beyens）男爵也出席，他注意到，國王在席間自始至終神態嚴峻異常。席散后，拜恩斯又在旁注意著他與毛奇交談，只見國王一面聽，一面臉色越來越陰沉，越來越憂郁。國王臨走時對拜恩斯說：“明天9時來見我，我必須和你談談。”

次日上午，國王和拜恩斯穿過勃蘭登堡門，經過一排排在柔和的晨霧披裹中閃閃耀目、英姿勃勃的霍亨索倫家族歷代君王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步行來到蒂爾加滕（Tiergarten）。在這里，他們可以靜靜交談，“不受打擾”。阿爾貝說，他第一次受到震動是在他來訪不久舉行的那次宮廷舞會上，當時德皇指著一位將軍對他說，這個人就是受命“率師向巴黎進軍”的人——那就是馮·克盧克（von Kluck）。后來，也就是在上一天晚宴之前，德皇又把他帶到一邊個別交談，對法國歇斯底里、滔滔不絕地發作了一通。德皇說，法國從沒有停止過對他的挑釁，法國既然采取這種態度，與法國開戰也就勢不可免，而且已是迫在眉睫。法國報界對德國惡言中傷，“三年兵役法”是蓄謀的敵對行動，法國渴望復仇之心難以遏止，現已舉國蠢動。阿爾貝試圖勸他息怒，于是說道，他比較了解法國，他每年都訪問法國，因而可以向德皇保證，他們不是好事侵略的人，他們真誠渴望和平。然而只是徒勞，德皇依然堅持戰爭不可避免。

晚宴之后，毛奇又撿起這個話題。對法國的戰爭即將爆發，“這一次，我們一定要徹底結束戰爭。戰爭到來的那一天，不可抗拒的激昂情緒定將彌漫整個德國”。德國的軍隊是不可戰勝的；憤怒的條頓人是不可阻擋的；他們足跡所到之處，留下的將是一片廢墟；他們必勝無疑。

談話的內容使阿爾貝惴惴不安，而他們如此意外地吐露秘密，其動機何在，同樣使他憂心忡忡，他不能不得出結論，他們意在恫嚇比利時就范。德國人顯然決心已定，他感到應該向法國發出警告。他指示拜恩斯如實一一轉告法國駐柏林大使朱爾·康邦（Jules Cambon），并敦促大使以最有力的措辭向普恩加萊總統匯報。

他們后來知道，就在同一次宴會上，毛奇將軍也對比利時武官梅洛特少校發泄了一通，語氣更為激烈。梅洛特也聽到他說，對法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比你們想象的早得多”。毛奇對于外國使館官員向來交談不多，可是這次卻是“開懷暢談”。他說，德國不希望戰爭，但是總參謀部已經“萬事皆備”。他說：“法國必須停止對我們的挑釁和攻訐，否則我們就不得不以兵戎相見，而且越早越好，我們早已不耐煩長此保持戒備。”毛奇列舉了一些法國挑釁的事例，除了“大事”之外，他還談了德國飛行員在巴黎所受的冷遇，談了德國駐法武官溫特費爾德（Winterfeld）少校受到巴黎社交界的抵制；溫特費爾德的母親——阿爾文斯勒本（d’Alvensleben）伯爵夫人，對此曾頗有怨言。至于英國，他說，要知道，德國的海軍可不是為了躲在海港里而建立的。它會出擊，也有可能吃敗仗，德國會損失艦只，但是英國將失去海上霸權，海上霸權將落到美國手中，美國將成為一場歐洲戰爭的唯一受益者。英國懂得這一點，將軍如此說道，并且話鋒一轉得出結論：英國因此可能保持中立。

他的話還遠沒有完。他問梅洛特，如果一支外國大軍入侵比利時國土，比利時將何以自處？梅洛特回答說，它將捍衛其中立。毛奇力圖弄清比利時是將如德國人所想那樣僅是抗議一下了事還是將奮起抗擊，于是逼他說得明確一些。梅洛特答道：“不論哪個大國進犯我們的邊界，我們都將全力抗擊。”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你們還必須有一支能夠履行中立責任的軍隊”。

回到布魯塞爾后，阿爾貝國王立即索取了一份有關動員計劃進展情況的報告。他發現毫無進展可言。根據在柏林聽到的情況，他征得德布羅克維爾的同意，準備以德國進犯這一假設為基礎，制訂一項作戰方案。他任命他本人和加萊提名的一個叫作里克爾（Ryckel）的能干的上校執行此項任務，預定4月份完成。但到4月份，仍未完成。在此期間，德布羅克維爾已任命另一軍官——塞利耶·德莫朗維爾（de Selliers de Moranville）將軍為總參謀長，位居里克爾之上。到了7月份，還在審議四份不同的集結方案。

挫折并未改變國王的決心。緊接柏林歸來之后，由加萊上尉草擬的一份備忘錄就具體體現了他的方針政策。“我們決心向蓄意侵犯我們領土的任何大國宣戰；決心竭盡全部力量和全部軍事資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過疆界，進行戰爭；并且決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進犯之敵敗退之后，仍將繼續打下去，直至實現全面和平。”

8月2日上午9時，阿爾貝國王于王宮主持國務會議，他在開幕詞中說道：“不論后果如何，我們的回答必須是‘不’。我們的責任是捍衛我們的領土完整。對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不過，他也堅決要求每一位與會者都不應抱有任何幻想：后果必將是嚴重的、可怕的；敵人必將是殘酷無情的。首相德布羅克維爾也警告一些動搖不定的人切莫相信德國保證在戰后恢復比利時主權的諾言。“德國一旦戰勝，”他說，“比利時不論持何種態度，都將被并入德意志帝國。”

一位年事已高、不平則鳴的大臣，最近還曾把德皇內弟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公爵奉為上賓招待，此時對那位公爵的虛情假意怒不可遏，整個會議期間，他咕噥著罵個不停，猶如會議合唱聲。在總參謀長塞利耶將軍起身說明所采用的防御戰略時，他的副參謀長里克爾上校低聲喝道：“我們一定要狠揍他們的要害。”用他們一位同僚的話來說，他和總參謀長的關系是“絕無溫良恭儉讓可言”。當他發言時，他建議先發制人，在侵略者越過比利時邊界之前就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打擊他們。聽者俱感詫異愕然。

午夜休會后，一個由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組成的委員會重返外交部草擬復照。正當工作進行之際，一輛汽車駛進了黑暗的庭院，停在此時唯一燈火通明的一排窗口下面。聽說是德國公使來訪，幾位大臣驚異不已。此時已是深夜1時30分，他來有何貴干？

赫爾·馮·貝洛夙夜奔波，說明他的政府越來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們那道最后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紙黑字，已是無可挽回，它對比利時民族自尊心的影響也已無可挽回。幾年來，德國人一直彼此相互告慰：比利時不會反抗。但是現在事到臨頭，他們開始深為焦慮不安，雖然這種不安為時已晚。比利時氣壯山河、響徹云霄的一個“不”字，定將有如雷鳴，震蕩全球，對其他中立國家的影響勢將不利于德國。但是德國最擔憂的倒不在于中立國家的態度，而是比利時的武裝抵抗將會耽誤它的時間表。如果比利時軍隊決心抵抗，而不是“拱手讓路”，德國就必須從進軍巴黎所需要的兵士中留下若干師來。比軍破壞鐵路和橋梁，就可以切斷德軍的進軍路線和給養供應，從而造成極大的麻煩。

德國政府苦思再三之后，不得不遣赫爾·馮·貝洛深夜造訪，進一步指控法國罪行，企圖借此影響比利時對最后通牒的答復。貝洛對接見他的范德埃爾斯特說，法國飛機投了炸彈，法國巡邏隊越過了邊界。

“這些事情發生在什么地方？”范德埃爾斯特問道。

回答是：“在德國。”

“既然如此，我看不出這些消息與我們有什么關系。”

德國公使趕忙解釋說，法國對國際法缺乏尊重，因此可以逆料它會破壞比利時的中立。這種別出心裁的邏輯推理并未奏效。范德埃爾斯特出門送客，請走了客人。

半夜2時30分，國務會議在王宮復會，通過大臣們提交的對德復照。復照申言，比利時政府倘若接受德國建議，它“將犧牲其民族尊嚴，背叛其對歐洲的義務”。政府宣布，它“堅決以其權力范圍以內的一切手段抵抗對其權利的每一進犯”。

在未加任何改動通過復照以后，會議對國王堅持的主張進行了辯論。國王堅持認為，在德軍實際進入比利時之前，不應向保證其中立的國家發出求援呼吁。盡管爭執激烈，他的主張還是通過了。凌晨4時，會議結束。最后離開的一位大臣轉過身來，只見國王手持復照副本，背對房間，凝望窗外，曙光已經開始照亮天空。

在柏林，8月2日深夜也在進行著一個會議。在首相官邸，貝特曼―霍爾韋格、馮·毛奇將軍和蒂爾皮茨海軍上將，像上一夜討論對俄宣戰問題一樣，在商討對法國的宣戰書。蒂爾皮茨“一遍又一遍”地埋怨說，他不懂為什么非得搞這些宣戰書不可；他說，這些東西總帶有“侵略味道”，“沒有這些玩意兒”，軍隊照樣可以進攻。可是貝特曼―霍爾韋格指出，對法宣戰是必要的，因為德軍要借道比利時。蒂爾皮茨則是重復著利希諾夫斯基大使發自倫敦的警告：進犯比利時勢必要把英國卷進來；他建議暫緩入侵比利時。毛奇感到這對他的時間表又增加了一個威脅，為此很是擔憂，于是立即宣稱這是“不可能的”，運輸時間表“絕不容許受到阻撓”。

他說他本人也不認為一紙宣戰書具有什么價值。當天日間法國的敵對行動已使戰爭成為事實。他指的是所謂法國轟炸紐倫堡地區的報道，德國報紙當日散發號外，大肆宣傳，弄得柏林居民惶惶不安，老是抬頭張望天空。其實根本沒有轟炸。可是現在，根據德國人的邏輯，鑒于這種意想中的轟炸，宣戰已被認為勢所必須。

蒂爾皮茨仍舊不以為然。他說，全世界都不會有任何懷疑，法國人“按理說至少是個侵略者”；但是，德國政治家們卻過于粗心大意，沒有闡明這一點，以致本來是件“純屬應急措施”的入侵比利時行動，竟會毫無道理地給蒙上“野蠻的暴力行動的不祥色彩”。

在布魯塞爾，國務會議于8月3日清晨4時散會之后，達維尼翁回到外交部，指示政務秘書德蓋菲耶男爵向德國公使遞交復照。上午7時正，正是十二小時限期的最后一刻，德蓋菲耶按響了德國使館的門鈴，將復照遞交給了赫爾·馮·貝洛。回家途中，他聽到報童的叫賣聲，晨報宣布了最后通牒的全文和比利時的答復。他聽到人們閱讀這些新聞，聽到激動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發出刺耳的驚嘆聲。比利時無所畏懼的一聲“不！”振奮了人心。許多人認為，這一來，德國可要繞過他們的國土而不致冒天下之大不韙了。“德國人是危險的，但還不是瘋子”，人們如此相互告慰。

甚至在王宮，在內閣各部，也仍然抱著一線希望；很難想象德國人竟會明知錯誤，還要自絕于人，蓄意發動戰爭。但到8月3日晚，當收到德皇對阿爾貝國王兩天前發出的個人呼吁姍姍來遲的答復時，最后一線希望也隨之消失。德皇的復電不過是再次試圖勸誘比利時不戰而降。德皇復電說道，“正由于懷著對比利時的最友好的愿望”，他才提出了他的嚴肅的要求。“正如所提條件已經闡明的那樣，能否維持我們以前和目前的關系，依然取決于陛下。”

“他把我當作什么啦？”阿爾貝國王大聲叫道。自從危機開始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失卻控制，流露出他的憤慨。就任最高統帥之后，他立即下令炸毀列日附近默茲河上的橋梁，以及與盧森堡交界處的鐵路隧道和橋梁。他依然未向英、法兩國發出呼吁，要求軍事援助和結盟。比利時的中立是歐洲列強一項差不多可說是成功的集體行動。在公開入侵行動實際發生之前，阿爾貝國王還不能使自己為比利時的中立簽署死亡證書。

注釋

[[1]](#_1_7) 比爾蓋人（Belgae），羅馬帝國時期凱爾特民族的一部分，聚居在萊茵河下游西南部。譯注

[[2]](#_2_5) 勃艮第勇士查爾斯（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1433—1477），勃艮第大公，曾想聯合勃艮第、盧森堡、荷蘭，自立為王，后遭法蘭西皇帝路易十一挫敗。——譯注

[[3]](#_3_5) 莫爾伯勒（Marlborough，1650—1722），英國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著名政治家和軍人，原名約翰·丘吉爾，因于1702年對法作戰有功，獲授莫爾伯勒公爵銜，后曾于1709年于馬爾普拉凱再次大敗法軍。——譯注

貝洛―扎萊斯克得到的命令：Jagow to Below, July 29 and August 2, marked “Urgent and Secret,” Kautsky, Nos. 375 and 648.

“我是一只不祥之鳥”：Whitlock, 3.

巴松皮埃爾與貝洛的會面：Bassompierre, 15–16.

“你鄰居的屋頂可能失火”：ibid.

伊麗莎白王后為比利時國王翻譯向德皇的最后一次呼吁：Cammaerts, 405; text of the letter: Galet, 31.

遞交宣戰書：Bassompierre, 17; remainder of paragraph and further account of government discussions of ultimatum are from Bassompierre unless otherwise noted.

貝洛驅車返回：Gibson, 9–10.

達維尼翁和范德埃爾斯特對德國人的尊崇：Klobukowski, 34–5.

毛奇起草最后通牒：Kautsky, No. 376, n. 1.

最后通牒文本：Belgian Grey Book, No. 20.

“封了口的信封”：Cammaerts, 39.

“國王每次開口，都好像要有所建樹”：ibid., 67.

加萊的教誨、職業生涯和性格：D'Ydewalle, 94.

德皇向范德埃爾斯特做出的保證：Cammaerts, 108–9, 115.

“要使我們不受忽視”：Galet, 8.

阿爾貝國王1913年訪問柏林：Beyens, II, 38–43; Jules Cambon to Pichon, November 22, 1913, French Yellow Book, No. 6; Poincaré, II, 86; Galet, 23.

毛奇對梅洛特說的話：Beyens, II, 47–53.

加萊上尉草擬的備忘錄：Galet, 23.

8月2日阿爾貝國王主持國務會議：Carton de Wiart, 207–9: Galet, 46–50.

“德國一旦戰勝……比利時……將被并入德意志帝國”：qtd. Poincaré, II, 281.

德國擔心比利時抵抗：see notes on Moltke and Jagow for Chapter 8, p. 145.

貝洛與范德埃爾斯特說的話：Belgian Grey Book, No. 21; Cammaerts, 13.

國王凝望窗外：Carton de Wiart, 210.

在貝特曼―霍爾韋格官邸的會談：Tirpitz, I, 366–70.

柏林居民惶惶不安地抬頭望天：Hanssen, 14. More sophisticated Germans were skeptical of the reports. Conrad Haussmann (16), noting the lack of precise details, found them “not very convincing.”

德蓋菲耶遞交復照：Bassompierre, 31, 37; text of the reply, Belgian Grey Book, No. 22.

德皇給比利時國王的復電：Galet, 58–9.

“他把我當作什么啦？”：Cammaerts, 19.

## 第8章　“葉落之前凱旋”

8月2日，星期天，這天下午，在德國的最后通牒在布魯塞爾遞交之前幾小時，格雷要求英國內閣授權履行英國海軍保衛海峽一側法國海岸的諾言。但是英國政府最為頭痛的時刻，莫過于要它作出斬釘截鐵的具體決定。整個下午，內閣局促不安，舉棋不定，不愿毅然承擔義務。

在法國，盡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夠避免這場戰爭，但是戰爭既已臨頭，他們也就把它作為民族劫數接受下來。過去曾有種種說法，認為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已經敗壞了法國人民的愛國精神；并且預料，一旦發生戰爭，這種影響將會帶來亡國之禍。而今，據一位外國觀察家幾乎近于肅敬的報道，法國人民“民族忠義”勃發，而又“全無騷動不安情事”。在比利時，則出現了一位歷史上罕見的英雄，這位心地純正的國王使比利時聲譽大振，使其在這或降或戰必擇其一的關頭，不出三小時就作出了決定，盡管明知其后果可能就是滅亡。

英國沒有阿爾貝，也沒有阿爾薩斯，雖然武器齊備，但卻斗志闕如。過去十年間，它已為如今臨頭的這場戰爭作了研究和準備；1905年以來，它還搞了一套名為“兵書”的體系，一掃英國人歷來茍且從事的舊習。戰爭時要發的命令全已準備就緒，只待簽署；信封已經寫好；通告和聲明或已印就或已排版；國王每次離開倫敦，凡需他立即簽署的文件，均隨帶在身。辦法可謂條理分明，但英國人的思想卻茍且如故。

德國艦隊如在海峽出現，對于英國的直接挑釁將不亞于當年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因此，星期天這天的內閣會議終于勉強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當天下午向康邦遞交了一份書面保證，聲稱：“如果德國艦隊進入海峽或是通過北海對法國海岸或海上運輸采取敵對行動，英國艦隊將全力給予保護。”不過格雷又加上一句，該項保證“并不約束我們必須與德國作戰，除非德國艦隊采取上述行動”。他還一言道出了內閣的內心恐懼，他說，因為英國不能確保本國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裝部隊出國”。

康邦先生問，這是否意味著英國將永遠不采取這一行動。格雷答道，他是“僅就當前情況”而言的。康邦建議派遣兩個師，以收“道義上的效果”。格雷說，派遣這樣小的一支部隊或者甚至派遣四個師，“都會給他們帶來最大的危險，而效果又將是微乎其微”。他繼而還說，在次日通知議會之前，英國海軍承擔的義務千萬不得公開。

康邦既感失望而猶抱著希望，以“絕密”電報向本國政府報告了這一保證，電報于當晚8時30分到達巴黎。雖然這只能算半個承諾，遠非法國所望，但他依然相信這會導致全面參戰，因為，如他后來所說，無論哪個國家，都不會“半半拉拉”地打仗。

但是，這項海軍方面的保證，是強內閣之所難作出的。這使阿斯奎斯一向竭力防止其分裂的內閣終于分崩瓦解。莫利勛爵和約翰·伯恩斯兩位大臣辭職；權勢顯赫的勞合·喬治依然“態度不明”。莫利認為，內閣的瓦解，“那天下午已完全在預料之中”。阿斯奎斯不得不承認，“我們處在決裂的邊緣”。

慣于未雨綢繆的丘吉爾，自行擔當起密使角色，準備將他以前所屬的保守黨引入一個聯合政府。內閣一散會，他就趕忙去見前首相——保守黨的貝爾福，這位貝爾福和該黨其他領袖一樣，認為英國應該將導致三國協約的政策貫徹始終，縱然結果辛酸，也是理所當然。丘吉爾對他說，如果宣戰，他預計自由黨內閣的一半成員將會辭職。貝爾福回答說，他的黨準備參加一個聯合政府，不過，即使到了那個地步，他預料退出政府的那些自由黨人領導的反戰運動仍會造成國家的分裂。

這時候，英國對于德國給比利時的最后通牒尚無所聞。丘吉爾和貝爾福，霍爾丹和格雷，這些人思想深處所考慮的是，如果法國覆滅，則有德國稱霸歐洲之虞。但是，必須援助法國這一政策是關起門來搞的，從未公之于眾，沒有充分得到舉國上下的認可。自由黨政府的大多數成員都不接受這一政策。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政府內部還是全國人民，都不可能意見一致地去參加戰爭。這次危機，大多數英國人都認為只不過是德法之間歷史糾紛的又一插曲，與英國毫不相干，縱然不是大多數人，至少也有很多人如此認為。要使這個危機在公眾心目中成為切膚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時遭到入侵之時。因為中立的比利時是英國政策的產兒，在那里，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將是對英國設計和簽字的條約的踐踏。于是格雷決定于次日上午要求內閣將這種入侵視作正式的宣戰理由。

那天晚上，他和霍爾丹共進晚餐的時候，外交部一名信差送來一個公文遞送箱，里面有一份電報。據霍爾丹說，電報的內容是囑請注意“德國即將入侵比利時”。那是份什么性質的電報，是誰發來的，都不得而知，不過格雷肯定其言可信。他將電報遞給霍爾丹，問他有何想法。霍爾丹回答：“立即動員。”

他們立即離開餐桌，驅車唐寧街。他們到達之時，首相正在接待客人，于是他們將他請到一個幽靜的房間，給他看了電報，要求他批準動員。阿斯奎斯首肯同意。霍爾丹自薦暫時重返陸軍部任職，以資應急，因為首相第二天勢必繁忙，無暇顧及陸軍大臣職務。阿斯奎斯也表示同意，而且求之不得，因為早就有人敦促他委派陸軍元帥、喀土穆勛爵基欽納補缺，而他每想到這個獨斷獨行的人，心頭就感不安。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氣晴朗，是個和麗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群并沒有去海濱，而是被危機所吸引，蜂擁到首都倫敦。中午時分，白廳門前人群擁塞，車輛難以通行；熙攘之聲，內閣會議室內清晰可聞。室內幾乎連續不斷地在開會，大臣們正在力圖拿定主意，決定是否要為比利時問題開戰。

陸軍部那邊，霍爾丹已經發出動員的電令，召集后備役士兵和本土軍。11時，內閣得到消息，比利時已經決定將其六個師投入戰斗，抗擊德意志帝國。半小時后，他們又收到保守黨領袖們在獲悉德國向比利時發出最后通牒之前所擬就的一份聲明。聲明指出，對法國和俄國的援助如果猶豫不決，就會“使聯合王國的信譽和安全化為泡影”。俄國成為盟國，對大多數自由黨大臣來說已是難于接受。約翰·西蒙爵士和比徹姆（Beauchamp）勛爵兩位大臣因此辭職，不過比利時的事態則決定了中樞人物勞合·喬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時，格雷預定要就這次危機向議會宣布政府的首次正式公開聲明。整個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都在引領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國家投入戰爭，而且要朝野一致，舉國團結。他必須得到向以和平主義為其傳統的本黨的支持。他必須向世界上歷史最久而又最講實際的議會說明，為什么英國并非由于承擔義務而要援助法國。他必須說明比利時是緣由而又不隱瞞法國才是根本緣由；他必須喚起英國的榮譽感，同時又要直言不諱地指出英國的利益才是決定性因素；他必須面對的乃是一個就外交問題進行辯論的傳統已發揚了三百年之久的場所，而他既無伯克（Burke）的才氣又無皮特（Pitt）的威力，既無坎寧（Canning）的練達又無帕默斯頓自信的勇氣，既無格萊斯頓的辯才又無迪斯累里（Disraeli）的機敏，可卻必須證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國外交政策是正確的，這場戰爭是無法避免的。他必須使同代人心悅誠服，必須無愧于前人，同時又必須為后人所理解。

他沒有時間準備講稿。臨到最后一小時，正當構思幾個要點的時候，有人通報德國大使來訪。利希諾夫斯基焦慮不安地走了進來，打聽內閣決定如何，格雷將對議會說些什么。是宣戰嗎？格雷回答說：不是宣戰，而是“說明條件”。利希諾夫斯基問道：“比利時的中立是否條件之一？”他“懇請”格雷不要將此提作條件。他對德國總參謀部的計劃毫不知情，但他并不認為計劃之中要“嚴重”侵犯比利時的中立，雖然德國軍隊有可能越過比利時領土的一個小角。利希諾夫斯基這時用了人在無可奈何時常說的一句話，他說：“既已如此，那也無可挽回了。”

他們是站在門口談的，各自心急如焚，格雷急于離開，爭取最后幾分鐘的清靜，準備一下他的演說，利希諾夫斯基則是竭力想要推遲公布這一挑戰的時間。他們終于分手，從此再也沒有作過官方會晤。

下院開會時，議員無一缺席。自從1893年格萊斯頓提出《愛爾蘭自治法案》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為了容納全體議員，過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團席上除德、奧大使缺席留有兩個空位外，座無虛席。上院客人擠滿了旁聽席，長期主張義務兵役制而不見采用的陸軍元帥羅伯茨勛爵也在其中。會場一片緊張的沉寂，沒有人走動，沒有人傳遞紙條，也沒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頭竊竊私語。可是就在此刻，突然咔嗒聲響，議院牧師從議長身邊后退的時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絆了一腳。全場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內閣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溫文爾雅的臉上毫無表情，勞合·喬治蓬頭散發、面無血色，像是突然老了幾年。他們兩人之間，坐著一身淺色夏季西裝的格雷。

顯得“蒼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時站立起來。他雖任下院議員已經二十九年，躋身大臣席上也已八載之久，可大體說來，他指導外交政策的方針，議員所知不多，而國人則是知之更少。這位外交大臣，不論向他提出什么問題，都很難使他落入圈套，作出明確或肯定的回答。若是換了一個冒冒失失的政治家，這種閃爍其詞的作風是會引起責難的，可是對他，卻無人疑忌相視。他毫無世界主義傾向，而是堅守英國本色；他鄉土氣息如此之濃，一言一行又如此謹慎，因而無人認為他會惹是生非，卷入其他國家的紛爭之中。他對外交業務并不愛好，對于自己的職務也無樂趣可言，只是無可奈何地把它作為應盡之責而已。逢到周末，他從不跑到彼岸大陸度假，而是隱身本國鄉村。他的法語僅及學童水平，除此之外，他不會任何外語。他五十二歲，是個鰥夫，無子無女，不好交際，人常有之的情欲愛好，在他也像對他所任公職一樣，感到索然無味。他的性情，厚墻四堵，如果還有什么愛好能夠突破這堵圍墻使他動心，那就是鱒魚戲游的溪流，還有百鳥的啾鳴。

格雷講得從容不迫，但卻富有感情，他要求下院能從“英國的利益、英國的榮譽和英國的責任”出發來看待這次危機。他敘述了與法國軍事“會談”的經過，說明沒有任何“秘密協定”束縛議院或限制英國決定其行動方針的自由。他說，法國卷入戰爭是出于它對俄國所負“榮譽上的義務”，但是“我們不是法俄聯盟的成員；我們甚至對于這一聯盟的條款也不清楚”。為了說明英國并未承擔義務，他似乎有些過于推托其詞。一個保守黨人，德比（Derby）勛爵，不禁憤憤然對他鄰座低聲說道：“天哪，他們要拋棄比利時啦！”

格雷接著透露了與法國的海軍安排。他告訴下院，根據與英國的協議，法國艦隊都集結在地中海，以致法國北海岸和西海岸“毫無防御”。他說他“感到”：“如果德國艦隊開進海峽，轟擊法國未加防御的海岸地區，我們不能視若無睹，袖手旁觀，無動于衷，不采取任何行動！”反對黨議席上爆發出一陣喝彩聲，而自由黨議員則是聽著，“垂頭喪氣，不吱一聲，默然認可”。

為了說明他何以會使英國早就承擔了保衛法國西北部海岸的義務，格雷談起了“英國的利益”和英國在地中海的貿易通道。這是個復雜的論題，好比一團亂麻，于是他匆匆略過，轉到比利時中立的問題，“一個更為嚴重，并且每時每刻愈趨嚴重而必須考慮的問題”。

為了充分闡明這一問題的重要性，格雷頗為明智，他不是憑借自己的辯才，而是借助格萊斯頓1870年的如同棒喝之言：“我們能夠袖手旁觀，熟視這史上最嚴重的罪行玷污歷史的篇章，從而成為這一罪行的幫兇嗎？”他還援引格萊斯頓的另一句話說明了這一問題的關鍵所在——英國必須“反對任何大國的無度擴張”。

他接著用自己的話說：“我要求下院能從英國利益出發，考慮這個存亡攸關的問題。如果法國戰敗投降……如果比利時落入同一統治勢力之下，繼而荷蘭，繼而丹麥……如果在這樣一場危機之中，我們逃避根據比利時條約所應承擔的事關榮譽和利益的義務……我完全不相信，在戰爭結束時，即使我們持旁觀態度，能夠把戰爭中所已經發生的情況改變過來，防止我們對面的整個西歐陷于一個獨大的大國統治之下……我相信，我們也將在全世界面前喪失尊敬，喪失我們的名譽和聲望，我們將無法逃脫最嚴重和最嚴酷的經濟后果。”

他把“問題和抉擇”攤在下院面前。下院“沉痛而專心地”聽了一小時又一刻鐘，最后爆發出一片掌聲，表示響應。一個人能夠駕馭整個國家的時刻是令人難忘的，事實證明，格雷的演說就是處在這樣一種時刻，以后被人們奉為重大事件。但是依然有人發表了不同意見，下院不同于大陸國家的國會，不會全體心悅誠服，完全一致。拉姆齊·麥克唐納代表工黨議員發言說，英國應保持中立；基爾·哈迪（Keir Hardie）揚言他將喚起工人階級反對戰爭；后來一群沒有誠服的自由黨議員在下院會客廳里通過了一項決議，聲稱格雷沒有道出參戰的理由。但是阿斯奎斯深信，總的說來“我們那些極端的和平愛好者已經啞口無言，雖然他們不久之后還會說話的”。上午辭職的兩位大臣晚上被勸了回來。普遍的看法是，格雷獲得了舉國支持。

“現在怎么辦？”丘吉爾在和格雷一道離開下院時問他。“現在嘛，”格雷說道，“我們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向他們發出最后通牒，要他們停止對比利時的侵犯。”幾小時之后，他又對康邦說：“如果他們拒絕，那就是戰爭。”雖然他差不多又等了二十四小時才發出最后通牒，但利希諾夫斯基擔心的事情已成事實：比利時果真成了條件。

德國人之所以冒此風險，是因為他們以為這將是一場速決戰，盡管那些文官領袖們到最后一刻還在唉聲嘆氣，擔心英國會采取什么行動，而德軍總參謀部則已考慮了英國的參戰問題，并且對此毫不介意。他們認為，這對一場他們相信四個月就會結束的戰爭不會有什么影響，或是根本沒有影響。

克勞塞維茨，一位已經過世的普魯士人，還有諾曼·安吉爾，這位雖然在世卻為人所誤解的教授，已不約而同地用速決戰觀念束縛了歐洲人的思想。速決取勝，這是德國的傳統觀念；一場持久戰在經濟上不可能也不勝負荷，這是人人皆有的傳統觀念。“你們在葉落之前就會凱旋回家。”德皇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對出征將士這么說。德國宮廷社交活動的一個記事人員8月9日有這么一段記載：那天下午，奧佩爾斯多夫（Oppersdorf）伯爵走進來說，戰爭不會打上十周之久；而霍赫貝格（Hochberg）伯爵認為只需八周，爾后還說：“你我將在英國聚首。”

一名即將開赴西線的德國軍官說，他預期可于色當日（9月2日）[[1]](#_1__Se_Dang_Ri_Shi_Ji_Nian_Pu_Fa)在巴黎和平咖啡館享用早餐。俄國軍官也預期在大約相同的時間進入柏林；一般都認為六周時間足矣。一名御前近衛軍軍官征求沙皇御醫的意見時，就曾問他是把大禮服隨身帶上以便開進柏林時穿著，還是留待下一班信使帶往前線？一名曾任駐布魯塞爾武官并被認為是一名知情人士的英國軍官，在重返他的團隊時，有人問他對戰爭可能打多久的看法。這位軍官回答說，他可不知道，但他知道存在著“財政上的原因，大國因此不可能把戰爭拖長下去”。這是從首相那兒聽來的，“首相對我說，霍爾丹勛爵是這么對他說的”。

在圣彼得堡，問題不是俄軍能否取勝，而是需要打兩個月還是打三個月；態度悲觀認為需要打六個月的人就被視為失敗主義者。“瓦西里·費多羅維奇（Vasilii Fedorovitch，弗雷德里克的兒子威廉，亦即德皇）盤算錯了；他是堅持不了的。”俄國司法大臣就是這么一本正經地預料的。這倒也不是什么謬誤之見。德國沒有作需要長期打下去的打算，所以在進入戰爭時，制造火藥的硝酸鹽儲存僅敷六個月之用。只是后來發明了從空氣中提取氮氣的方法，才得以繼續維持下去。法國人則是孤注一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速戰速決上，竟然出此險著，不派軍隊駐守難以守衛的洛林鐵礦區，聽任德軍占領。他們的理論是：勝利之時，這個地方也就會自然收復。結果他們在戰爭期間失去了80%的鐵礦，險些因此戰敗。英國人則以含糊其詞的作風，籠統地認為勝利只不過是幾個月的事情，至于何時何地以及如何取勝，則沒有言明。

不知是出于本能還是歸功于才智，三個有頭腦的人曾預見到黑暗的陰影將漫長數年而不是數月。這三個人都是軍人。毛奇是其一，他曾預言這將是一場“漫長的疲勞戰”。霞飛是其二，1912年，他在回答部長們的問題時曾指出，法國初戰告捷之時，將是德國舉國抗戰開始之日，反之亦然。且不論出現哪種情況，其他國家都將被卷入，結果會是一場“漫無限期”的戰爭。然而，不論霞飛還是毛奇，雖然他們自1911年和1906年以來就各是本國的軍事首腦，但在他們的計劃中都沒有為他們預見到的一場消耗戰留有余地。

第三位——也是唯一按其預見行事的人——是基欽納勛爵，但他沒有參與制訂最初的計劃。8月4日，他正準備乘上一艘輪船前往埃及的時候，倉促奉召就任了陸軍大臣。由于內心深處受到奧妙的靈感的啟示，他在赴任時就預言戰爭將延續三年。他對一個不敢茍同輕信的同僚說，時間甚至可能更長些，不過，“暫且說它三年是不會錯的，像德國這樣一個國家，既已逼得人家和它交手，那只有把它徹底打垮，它才會甘心認輸。而這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但究竟要多久，只有鬼知道。”

基欽納自從就任之日起，就堅決主張籌建一支數百萬人的大軍，準備打上幾年。但除他之外，沒有任何人訂過三至六個月以上的計劃。至于德國人，短期戰爭已成定見，既然有了這種想法，也就必然認為，在一場短期戰爭中，英國的參戰將無關大局。

“怎么就沒人事先告訴我英國將會出兵反對我們！”戰爭發生后，德皇一天在最高統帥部午餐桌上曾如此慨嘆。此時有人誠惶誠恐地小聲說：“梅特涅（Metternich）事先說過。”他在這里指的是德國前駐倫敦大使。這位大使1912年被解職，正是因為他老是喋喋不休地預言德國海軍的不斷增長必然會導致與英國發生戰爭，并且至遲不會晚于1915年。1912年，霍爾丹也曾向德皇陳言，英國絕不會容許德國占有法國的海峽沿岸港口，并且也曾提醒他對比利時的條約義務。1912年，普魯士亨利親王也曾直截了當地問過他表兄英王喬治：“一旦德奧同俄法作戰，英國會不會援助后兩個國家？”喬治回答說：“在一定情況下，毫無疑問會援助。”

可是德皇不顧這些警告，明知事必如此，卻仍拒不置信。根據他身邊一個隨員看到的情況，7月5日，他在同意奧地利可以相機行事之后回到他的游艇時，依然“深信”英國將保持中立。而他在波恩學生時代的兩個同會兄弟貝特曼和雅戈，則頗像虔誠的天主教徒手捻念珠、口中念念有詞那般，不時以英國定會保持中立相慰藉。這兩個戴著黑白緞帶相互以“你”（du）相稱[[2]](#_2__De_Yu_Zhong_Di_Er_Ren_Cheng)的兄弟會成員，主要是靠與德皇的個人友誼，才得以踏上仕途的。

毛奇和總參謀部都不需要格雷或其他什么人向他們說明英國要采取什么行動，他們早就料到它的參戰是必然無疑的。“英國人來得越多越好。”這是毛奇對海軍上將蒂爾皮茨說的。他的意思是說，在歐洲大陸登陸的英國人越多，在一場決定性的敗績之中落網的也就越多。毛奇天性悲觀，使他不作一廂情愿的非非之想。1913年，他草就的一份備忘錄，對形勢闡述之精確，遠非英國人所及。他寫道，如果德軍沒有比利時的同意而竟借道比利時，“那么，英國將會而且必然會參加我們敵人的行列”，英國既然在1870年就公開表示了這個意圖，當今就更會如此了。他認為沒有哪個英國人會相信德國人所作的諾言，即在打敗法國之后便撤出比利時；他深信，在德法戰爭中，不論德軍是否借道比利時，英國都會參戰，“因為它害怕德國稱霸，而且，為了切實貫徹保持均勢的政策，它將竭其所能制止德國勢力的增長”。

“戰前那幾年里，我們就毫不懷疑英國遠征軍是會迅速開到法國沿岸的。”這是總參謀部最高將領之一馮·庫爾（von Kuhl）將軍的證詞。參謀部估計，英國遠征軍將于（戰爭爆發后）第十天動員，第十一天在港口集結準備，第十二天開始起航，第十四天向法國運送完畢。這個估計后來證明幾乎絲毫不差。

德國海軍參謀部也沒有抱任何幻想。“一旦開戰，英國可能為敵”，海軍司令部早在7月11日就如此電告了當時在太平洋“沙恩霍斯特”號（Scharnhorst）戰艦上的艦隊司令馮·施佩（von Spee）。

格雷在下院演說結束后兩小時，1870年以來萊茵河兩岸人人憂于內心，1905年以來大多數人料于眼前的事終于發生。德國向法國宣戰了。德國王儲說，這在德國人，是對日益緊張的局勢的“軍事解決辦法”，是四面被圍這一夢魘的終結。一家德國報紙那天在以《槍炮的福祉》（The Blessing of Arms）為大字標題的特刊中欣然寫著：“行動起來，才是樂趣所在。”它還說，德國人“欣喜若狂……這個時刻我們盼望已久……目的未達，疆土未擴展到必須擴及之處，強要我們拿起的刀劍絕不入鞘”。但也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欣喜若狂。左派議員被召到國會時，發現彼此都很“沮喪”，都很“緊張”。一個議員在表示愿意投票贊成全部軍事撥款時曾嘀咕說：“我們不能聽任他們把帝國毀掉。”另一個則嘟噥不已：“真是無能的外交，真是無能的外交。”

法國是在6時15分得到開戰信號的。那時總理維維亞尼的電話鈴響了起來，他聽到美國大使邁倫·赫里克（Myron Herrick）抽噎著對他說，他剛剛接受委托，要他代管德國大使館，并在旗桿上升起美國國旗。他說他已接受代管使館的委托，但沒有同意升旗。

維維亞尼很清楚這是怎么回事，所以等待著德國大使立即來訪，不一會，通報他來了。馮·舍恩——他的妻子是比利時人——進門時顯然心緒不寧。他一開始就抱怨說，在他到這里來的路上，一位太太把頭伸進他汽車的窗口侮辱了“我和我的皇帝”。維維亞尼這幾天痛苦已極，神經已緊如弓弦，不禁問道，大使此來是不是就為了抱怨這事。舍恩方說他還另有任務，于是打開手中文件，宣讀了內容；他深為文件內容感到羞愧不安，因為按照普恩加萊的說法，他是個“重視榮譽的人”。文件說，鑒于法國“有組織的敵對”行動和對紐倫堡及卡爾斯魯厄（Karlsruhe）的空襲，鑒于法國飛行員飛越比利時國境從而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德意志帝國認為自己已處于與法國交戰狀態”。

維維亞尼正式否認了這些指控。法國政府十分清楚這些事情并未發生，因此德方文件列數這些罪責與其說是說給法國政府聽的，不如說是說給德國國內公眾聽的，為的是要他們相信自己是法國侵略的受害者。維維亞尼把馮·舍恩送到門口，然后不愿分手似的，又陪他走出大樓，步下臺階，直到等在那里的車子門口。這兩位“世代宿敵”的代表佇立了片刻，怏怏相對無言，爾后躬身告別，馮·舍恩乘車消失在暮靄之中。

當晚在白廳，愛德華·格雷和一位朋友站在窗口，正值窗下路燈華光初放，他一聲感懷，后來成了那個年代的寫照：“整個歐洲的燈光正在熄滅；此生不會看到它們重放光明了。”

8月4日清晨6時，赫爾·馮·貝洛最后一次拜訪了布魯塞爾的外交部，遞交了一份照會。照會說，鑒于他的政府的“善意的建議”遭到拒絕，為了自身安全，德國將不得不采取措施，并“于必要時以兵戎相見”。這個“必要時”是有意為比利時改變主意留下的余地。

那天下午，應邀前往代管德國使館的美國大使布蘭德·惠特洛克（Brand Whitlock）到達時，看到馮·貝洛和他的一等秘書馮·施圖姆根本沒有收拾行裝，而是倒在兩張椅子上，“差不多垮了似的”。貝洛一手吸煙，一手抹著額頭，除此之外，不見他有其他動作。兩個年老的官員拿著蠟燭、封蠟和紙條，慢條斯理、鄭重其事地在房子里轉來轉去，給存放檔案的幾張橡木櫥貼封條。“唉，可憐的笨蛋！”馮·施圖姆喋喋不休地說著，一半也是自言自語，“他們干嗎不避開壓路機呢？我們并不想傷害他們，但是如果他們擋路，那就得給碾成齏粉。咳，可憐的笨蛋！”

只是后來，德國那一方才有人反躬自問，這一天到底是誰做了笨蛋。奧地利外交大臣切爾寧（Czernin）伯爵后來終于發覺這一天正是“我們招致最大災難的一天”；甚至德國王儲在此后很久沮喪地承認這一天是“我們德國人在全世界人心目中輸掉第一個大回合的一天”。

那天上午8時剛過兩分，第一陣土灰色的浪濤在離列日30英里的蓋默尼希（Gemmenich）沖過了比利時邊境。比利時憲兵從哨所里開了火。這支由德國主力部隊派出來攻打列日的先遣部隊，是由馮·埃米希將軍率領的，計六個步兵旅和三個騎兵師，各步兵旅都配備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該部日暮前就到達了默茲河畔的維塞（Visé），這座城市成了后來一系列廢墟中首當其沖的一個。

直到入侵那一時刻，許多人依然認為德軍從其自身利益出發，也會繞過比利時邊界線。他們為何一定要增加兩個敵人，把他們拉入戰場與自己作對呢？沒有人把德國人當作蠢人，所以出現在法國人頭腦中的答案，也就理所當然是：德國給比利時的最后通牒不過是個花招而已。通牒的用意并不真想隨即入侵，只不過企圖“誘使我們首先進入比利時罷了”——梅西米在一道命令中就是這么說的。他在這道命令中禁止法國部隊，甚至“一個巡邏兵，一個騎兵”越過邊界線。

不知是否出于這個原因，格雷直到德國入侵時還沒有發出英國的最后通牒。阿爾貝國王也沒有向保證比利時中立的國家發出呼吁，要求軍事援助。他也擔心德國的最后通牒是個“大騙局”。如果他過早地招來法國人和英國人，那他們的出現就會把比利時身不由己地拖入戰爭；同時，在他內心深處還有一個隱憂，擔心這些鄰居們一旦在比利時國土上立足下來，說不定就會不急于離開。只是在德軍縱隊向列日進軍的腳步聲打消了他的一切疑慮，使他不再有任何選擇余地以后，他才于8月4日中午呼吁各保證國采取“協同一致”的軍事行動。

在柏林，毛奇依然希望比利時人在為了面子起見開了幾槍之后，或許仍會接受勸告，“達成諒解”。唯其如此，德國最后一份照會只是說“以兵戎相見”，暫時還避不宣戰。當比利時大使拜恩斯在遭到入侵那天上午前來索取護照時，雅戈趕忙迎上前去問道：“你有什么話要對我說嗎？”似乎在等待著某種建議。他再次申明德國愿意尊重比利時的獨立，并說，如果比利時能不毀壞鐵路、橋梁和隧道，在列日不事防御抵抗而是讓德軍自由通過，德國愿意賠償一切損失。拜恩斯轉身要走的時候，他又跟在后面懷著希望地對他說：“或許我們仍有一些話可以談談。”

在布魯塞爾，德國入侵開始后一小時，阿爾貝國王身穿軍服，未作任何佩戴，騎馬走向國會。一輛敞篷馬車上坐著王后和她的三個孩子，后面跟著兩輛馬車，國王獨自一人在馬背上殿后，這個小小的行列沿著皇家大道碎步小跑而來。一路上家家戶戶掛著國旗，拿著鮮花；街頭巷尾滿是興奮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識的人們相互握手，歡笑與呼號交雜一片，每個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后來回憶所說，“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間的共同的愛和共同的恨的紐帶聯結在一起”。一陣又一陣的歡呼聲朝著國王而來，仿佛人們懷著共同的感情，試圖向他表明，他是他們國家的象征，是他們堅持獨立的意志的象征。甚至不知怎么竟忘了不該出場，也和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們一起在國會窗口觀看著這個小小行列的奧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淚了。

在大廳里，在議員、來賓以及王后和朝臣就座之后，國王一個人走了進來，將帽子和手套莊重地放在講臺上，便開始演說，只是聲音稍有顫抖。他回顧到創建獨立的比利時的1830年國會會議時問道：“先生們，你們是否矢志維護我們先輩留下的這份神圣禮物，使其不受侵犯？”議員們難以抑制自己，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美國大使在他的日記里記述了這個場面。他描寫了他如何注視這位國王的十二歲的嗣位人在當時的情形：他身著一套水手服，兩眼凝視著父王，全神貫注地聽著他的演說；描寫了他又如何好奇地想著：“這個男孩的腦子里現在在想什么呢？”惠特洛克先生似乎僥天之幸，對未來稍有微感，不禁暗自問道：“年長日久之后，他還會想起這個場面嗎？又是怎樣想起，何時想起，在什么情況下想起呢？”但這個身著水手服的男孩，在他登基做了利奧波德三世之后，在1940年卻向德國的又一次侵略屈膝投降了。

演說結束后，街頭巷尾激情高漲，如癡似狂。一向為人瞧不起的軍隊現在成了英雄。人們高呼：“打倒德國佬！處死殺人犯！比利時獨立萬歲！”國王離去之后，群眾又歡呼求見陸軍大臣。在政府中，陸軍大臣不論由誰擔任，由于職務關系，平時總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個人。德布羅克維爾先生雖然是個溫文爾雅、老于世故的人，但是當他出現在陽臺上的時候，也為那天布魯塞爾每個人同仇敵愾的激昂情緒所感動，不禁流下了眼淚。

同一天在巴黎，穿著紅褲子和寬下擺、紐扣在兩邊的深藍色上裝的法國士兵，邁著整齊的步伐穿過街道，引吭高歌著：

這是阿爾薩斯，這是洛林，

這是我們的阿爾薩斯，

啊，啊，啊，啊！

唱到最后一個“啊”字，歌聲化成一片勝利的歡呼。失去了一只手臂，因而贏得更多歡呼聲的獨臂波將軍，佩戴著1870年沙場老將的青黑綬帶，騎馬走在前列。胸甲騎兵團的士兵，身披閃光耀眼的護胸鐵甲，頭盔上垂下長長的黑色馬尾，他們并不感到這有什么不合時代。跟在他們后面的，是裝著飛機的大木條箱和平板拖車，車上放著細長的75毫米口徑的野戰炮，這種大炮是法國的驕傲。人馬輜重整天川流不息，穿過北站和東站的拱形大門。

車輛絕跡的林蔭大道上，走過一隊又一隊的志愿兵，扛著旗幟和橫幅，橫幅上寫著表示決心的口號：“盧森堡人絕不做德國人！”“羅馬尼亞忠于自己的拉丁族母親！”“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國人的鮮血換來的！”“西班牙和法國親如姊妹！”“英國人愿為法蘭西而戰！”“希臘人熱愛法蘭西！”“巴黎的斯堪的納維亞人！”“斯拉夫民族和法蘭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衛拉丁美洲文化的母親！”一條橫幅上寫著“阿爾薩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受到人群表示敬意的歡呼喝彩。

在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上，維維亞尼的面色死一般蒼白，看上去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演說時，仍能勝其力之所不能，熱情洋溢，辯才雄健；這篇演說和這天每個人的一樣，被譽為他一生事業中最偉大的一次演說。他的公事包里帶著法俄條約的文本，但并沒有人對這份條約提出質詢。當他說到意大利已“以其拉丁民族的理智所獨具的洞察力”宣布中立時，響起了如癡似狂的歡呼聲。三國同盟中的這第三個成員，在考驗來臨的時刻，果如所料，拔腳走開了。其理由是：奧地利進攻塞爾維亞，是一種侵略行為，從而解除了它對條約所負的義務。意大利的中立使法國無須在南部邊界布防，也就等于騰出了四個師即八萬人的兵力。

普恩加萊總統因公未能親蒞議會，在維維亞尼演說完畢之后，由人代讀了他的演說詞。宣讀時，全體聽眾均離座肅立。他說，法國在全人類面前代表著自由、正義和理智，表示同情和善意的函電，已從“文明”世界（“文明”兩字，他是有所指而特作此稱的）的各個角落紛至沓來。他特意改動了法國傳統的三個座右銘。[[3]](#_3__Fa_Guo_Chuan_Tong_De_San_Ge)就在宣讀總統演說詞的時候，霞飛將軍“鎮定自若、信心十足”地來到總統那里，向他辭行，奔赴前線。

當帝國國會議員們聚集一堂，準備去聆聽德皇圣諭的時候，柏林正大雨滂沱。他們先到國會大廈來和首相見面。此時大廈窗下的人行道上，馬蹄聲嗒嗒不絕，清晰可聞，一隊隊騎兵正輕捷地馳過水光閃耀的街道。大廈里面有個房間，飾有一幅大型繪畫，畫的是德皇威廉一世趾高氣揚地騎馬踐踏一面法國國旗的不勝得意的場面：德皇和俾斯麥及陸軍元帥毛奇一起在色當戰場上昂首躍馬，前面一名德國士兵在皇帝的馬蹄下鋪著一面法國國旗。各黨派的領袖就在這個房間里同貝特曼會晤。貝特曼表示他很關心團結，他規勸議員們在作出決定時要做到“一致”。“我們一定會一致的，閣下。”自由黨一個發言人恭順地回答說。這個無所不知的埃茨貝格爾，不僅是軍事委員會的發言人，還是首相的心腹親信，人家都說他的耳朵能夠通天。他這時候正奔走在他的同僚議員之間，要他們放心：“下星期一這個時候”，塞爾維亞人肯定已被打敗，現在一切都很順利。

議員們在大教堂做過禮拜之后便集體列隊進入皇宮。入口處戒備森嚴，繩柵隔道，這些人民代表經過四道檢查證件之后，才終于在白廳坐下。德皇在幾位將軍陪同之下靜悄悄地走了進來，登上御座。穿著龍騎兵制服的貝特曼從御用公文包里取出演說詞呈給德皇，德皇離座起立，開始宣讀。他頭戴盔帽，一手按住劍柄，站在首相旁邊顯得身材矮小。他宣稱“我們拔劍出鞘，問心無愧，雙手清白”，但對比利時問題卻只字不提。他說，戰爭是由塞爾維亞在俄國支持之下挑起的。他歷數了俄國的罪行，激起一片“可恥！”的噓叫聲。預先準備好的演說念完后，他提高嗓門宣布：“從今日起，我不承認黨派，只承認德國人！”然后要求各黨派領袖，如果同意他的意見，就上前握他的手。在“狂熱的激動”中，所有領袖都從命不誤，與此同時，在場的其他人員爆發出一陣欣喜若狂的歡呼聲。

3時整，國會議員又在國會大廈續會，先是聆聽首相講話，接著履行余下的職責，首先是投票通過戰爭撥款，然后是通過國會的休會。社會民主黨同意使投票結果一致，并且緊張地商討了是否要和其他議員一起向德皇“致敬”，他們為此花了身負國會議員職責的最后幾個小時，最后決定改為向“德皇、人民和祖國”致敬，從而圓滿解決了這個問題。

當貝特曼起立講話時，每個人都憂慮地期待著，看他怎樣談比利時問題。一年以前，外交大臣雅戈在國會指導委員會的一次秘密會議上，曾保證德國絕不侵犯比利時；當時的陸軍大臣馮·黑林根（von Heeringen）將軍也曾保證，如果發生戰爭，只要德國的敵人對比利時的中立尊重一天，德國最高統帥部也將尊重一天。8月4日這天，議員們并不知道他們的軍隊已經在早晨入侵比利時。他們只知道那份最后通牒，至于比利時的答復，則一無所知。政府從沒有公開這個答復，它要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比利時已經默許，它的武力抵抗因而是非法的。

“我們的軍隊，”貝特曼通知屏氣凝神的聽眾說，“已經占領盧森堡，并且或許”——這個“或許”已是事后八小時了——“已經在比利時境內。”（一陣巨大的騷動）確實，法國曾向比利時保證尊重它的中立，但是“我們知道，法國是時刻準備入侵比利時的”，所以“我們不能等待”。他又少不了地說道，這是出于軍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得法律的”。

這時候他總算把他的聽眾，不論是瞧不起他的右派還是不信任他的左派，都俘虜過來了。但他下一句話卻引起了一陣喧嘩。他說：“我們對比利時的侵犯是違背國際法的，但是我們現在正在犯的——我公開這么說——過錯，在我們的軍事目標一經達成之后，我們是會彌補的。”蒂爾皮茨海軍上將認為這是有史以來一個德國政治家最嚴重的失言；自由黨的一位領袖康拉德·豪斯曼（Conrad Haussmann），則認為這是通篇演說中最精彩的部分。入侵行為既已有人公開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他和他的左派同僚議員也就覺得自己身上的罪愆被洗刷干凈了，于是不禁對首相致敬，高呼“非常正確！”。這一天貝特曼雖然已有不少令人難忘的至理名言，可他還要補充一句，好使他青史留名；他最后一句驚人妙語說道：不論是誰，若是也像德國人這樣受到如此嚴重的威脅，他所考慮的也只能是如何“殺出一條血路”。

一筆50億馬克的戰爭撥款獲得一致通過，爾后是表決通過國會休會四個月，或者說，在普遍所預料的戰爭所需時間一直休會。貝特曼在宣布結束議程時滿懷信心地說道：“不論我們的命運會是怎樣，1914年8月4日將永遠成為德意志最偉大的日子之一！”他的話博得了英勇斗士們的喝彩致敬。

同一天晚上7時，英國終于作出了多少人在焦慮久候的明確答復。英國政府在上午終于鼓足勇氣，決定發出最后通牒。不過這份通牒是分兩步走的。第一步，格雷要求德國保證“不執行”它對比利時的最后通牒，并要求對此“立即回答”，但他并未附加時間限制，也沒有提到如果得不到回答將如何制裁，所以這份照會從技術上說并不是一份最后通牒。他一直等到獲悉德軍已經入侵比利時之后才發出第二份照會，宣布英國感到有義務“維護比利時的中立和堅持遵守德國與我們同樣是締約國的條約”。照會要求午夜之前必須作出“滿意的答復”，不然英國大使就將索取護照。

為什么上一夜在國會明確表示同意格雷演說之后，沒有立即發出最后通牒，這只能以政府的猶豫不決加以解釋。除了德國人俯首聽命，從他們那天上午蓄意而無可挽回地越過的那條邊界撤退回來之外，不知英國政府在指望什么樣的“滿意答復”，為什么英國竟又抱著不切實際的空想期待出現什么奇跡而且一直要等到午夜？這些問題都是難以解釋的。在地中海，那晚午夜之前失去的幾小時可關系重大。

在柏林，英國大使愛德華·戈申（Edward Goschen）爵士在和首相進行具有歷史意義的會見時，向首相遞交了最后通牒。他發現貝特曼“非常激動”。據貝特曼本人說：“促使英國參戰的并不是比利時問題，可卻偽善地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誠使我熱血沸騰。”貝特曼盛怒之下，大發了一通議論。他說，英國竟對一個“聯姻的國家”宣戰，這種作為簡直“不可思議”，這“等于在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生命而與兩個來犯的人搏斗時，從他背后猛擊一下”。他說，英國要對“這一致命的嚴重步驟”可能產生的所有可怕事件負責，而“這一切都僅僅是為了一個詞——‘中立’——僅僅是為了一紙文件……”

戈申當時幾乎沒有注意到，這句話后來竟響徹全球。不過他后來還是把這句話寫進了他的一份匯報之中。他當時的答對是：如果鑒于戰略原因，借道比利時事關德國生死存亡，那么履行莊嚴盟約說來也事關英國的生死存亡。“首相閣下是如此激動，得悉我們的行動之后是如此怒形于色，而且又是如此不可理喻”，他只好避而不再作進一步爭論。

當他離開的時候，有兩個人乘著一輛《柏林日報》的送報車正穿過街道，散發傳單，宣布——做得未免過早，因為最后通牒的限期要到午夜截止——英國已經宣戰。繼意大利變節之后，這個最新的“背叛”行為，這個最新的背信棄義行為，這個又給德國增添一個新的敵人的行為，使得德國人怒不可遏，許多人立即成了一群狂吼的暴徒，在隨后的一小時中將英國使館的窗戶用石頭全部砸碎。一夜之間，英國成了最最可恨的敵人，“種族背叛”成了大家最喜歡用的泄恨口號。德皇不勝悲傷：“想不到喬治和尼基竟會背叛我！我外祖母如果健在是絕不會容許的！”在他有關此次戰爭的所有膚淺之見中，可說以此為最。

德國人對于這一背信行為怎么也想不通。已經軟弱到這種地步——要求參政的婦女竟敢詰問首相，并且公然抗拒警察——的英國人，竟想要打仗，簡直是難以置信的。英國的勢力雖然廣泛而強大，但已日薄西山，德國人對它就像西哥特人對后期的羅馬人一樣，既輕蔑，同時又帶有一種后來者的自卑感。英國人以為他們能“像對待葡萄牙人那樣來對待我們”，蒂爾皮茨海軍上將憤憤不平地說。

英國的背叛加深了德國人缺少朋友之感。他們自知是個不為人愛的國家。尼斯于1860年被法國并吞，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幾年就能忘記他們原是意大利人，而50萬阿爾薩斯人，卻為何寧愿背井離鄉也不愿生活在德國統治之下？“我們的國家在哪兒都不受人愛戴，而且經常遭人怨恨。”王儲在旅途之中對此深有感觸。

當人群在威廉大街大喊大叫復仇的時候，垂頭喪氣的左派議員則聚集在咖啡館里同聲哀嘆。“全世界都起而反對我們，”一個說，“日耳曼主義在世界上有三個敵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而現在他們已聯合起來反對我們。”

“我們的外交已使我們只剩下奧地利這一個朋友，我們必須支持她。”另一個說。

“至少還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不會打得很久，”第三個這么安慰著他們，“四個月內我們就會有和平。經濟上、財政上我們都不能支撐更久。”

“大家指望著土耳其人和日本人。”又一位提醒說。

事實上，前一天晚上，當咖啡館里的顧客聽到遠處街上陣陣歡呼的時候，一個謠言就已傳遍各個咖啡館。有人在日記里記述了當時的情況：“歡呼聲越來越近。人們聽著聽著，就都跳了起來。歡呼聲越來越大，回蕩在波茨坦廣場上空，勢如狂風驟雨。顧客們放下飯菜，奔出飯館。我隨著人流向前。發生什么事啦？‘日本對俄國宣戰啦！’他們狂叫著。好哇！好哇！歡呼聲響徹云霄。人們相互擁抱著。‘日本萬歲！好哇！好哇！’一片歡樂情景。這時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館去！’于是人群一哄而去，每個人都被席卷到這人流之中，使館給圍得水泄不通。‘日本萬歲！日本萬歲！’人們激動地呼喊著，直到日本大使最后不得不出來。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對這突如其來的并且看來也是受之不當的敬意表示了感謝。”雖然第二天真相已白，這個謠言全屬子虛，但是這種敬意不當到何種程度，那是兩個星期之后才見分曉的。

當利希諾夫斯基大使及其使館人員終于離開倫敦的時候，一個前往維多利亞車站送行的朋友看到這一行人“憂傷和憤懣的情狀”，深有感觸。他們責怪國內的官員把他們拖進一場除奧地利外別無其他盟國的戰爭。

“在四面受敵的情況下，我們得勝的機會能有幾何？有誰是對德國友好的呢？”一個軍官凄然問道。

“據說暹羅是友好的。”一個同僚回答了他。

英國剛剛發出最后通牒，內閣又發生了新的爭執：是否派遠征軍到法國去呢？既已宣布參戰，他們便爭論起應該走多遠的問題了。根據與法國的聯合作戰計劃，一支由六個師組成的遠征軍應于動員第四天到動員第十二天之間到達法國，并應于動員第十五天之前在法國戰線左翼末端做好作戰準備。但是這份時間表已被打亂，因為英國動員的第一天（8月5日），根據原計劃應僅遲于法國兩天，可是現在已遲了三天，而且跟著還會進一步有所拖延。

阿斯奎斯先生的內閣唯恐遭到入侵，嚇得不知所措。1909年，帝國國防委員會在對這個問題專門進行研究后曾宣稱，只要國內駐軍保持足夠的實力，使德國入侵的兵力必須多到無法逃過英國海軍，大規模入侵就“行不通”。盡管委員會斷言英倫三島的防務足可由海軍充分保證，而英國領導人在8月4日依然不能鼓起勇氣將常備軍派出英倫三島。有人主張派出的部隊要少于六個師，有人主張不是盡快派出而是遲一些派出，有人甚至主張根本不派。海軍上將杰利科（Jellicoe）接到通知，“目前”暫不需要他按原計劃派艦護送遠征軍渡過海峽。陸軍部里沒有一個電鈕能自動將英國遠征軍投入行動，因為英國政府還不能下定決心去按這個電鈕。陸軍部本身也已四個月沒有部長，苦于群龍無首，無所適從。而阿斯奎斯雖然已經邀請基欽納到倫敦來，但卻還不敢毅然請他就任。性情暴躁的亨利·威爾遜，“對于這種狀況深為反感”，他毫無忌諱的日記在戰后問世的時候還使人感到同樣痛苦難堪。可憐的康邦也是這樣，他帶著一份地圖來見格雷，向他指出英國的六個師對于法軍左翼是多么事關重大。格雷答應提請內閣注意。

威爾遜將軍對于這種拖延大為震怒，認為原因在于格雷的“罪惡的”游移不決，他氣憤地向反對黨內的朋友出示了一份動員令，這份動員令不是下令“動員和出發”，而僅僅是下令“動員”。他說，僅此一項就要使時間表順延四天。貝爾福應承敦促政府。他在給霍爾丹的一封信中向政府提出，協約的整個宗旨以及根據協約所作軍事安排的整個宗旨就在于保全法國，因為一旦法國被擊潰，“整個歐洲前途就可能朝著我們視為災難性的方向發展”。他進言道，既然方針已定，該做的事情就是“迅速進行打擊，并且要用你們的全部力量進行打擊”。當霍爾丹前來向他說明內閣游移不決的原委時，貝爾福不禁感到他們“有些思路不清，意志不決”。

8月4日下午，大約在貝特曼向德國國會、維維亞尼向法國眾議院發表講話的同時，阿斯奎斯向下院宣讀了一份“由陛下欽簽的上諭”。議長先生離座起立，議員脫帽恭聽“動員公告”。接著，阿斯奎斯照著他拿在手里微微抖動著的一份打字副本，宣讀了剛向德國發出的最后通牒。當他念到需在“午夜之前得到滿意答復”這幾個字時，臺下響起了一陣莊重的歡呼。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午夜了（英國時間11點整）。9時，政府從一份截獲到的柏林發出的明碼電報中獲悉，德國政府認為自英國大使索取護照之時起，它已與英國處于交戰狀態。內閣于是趕忙開會，討論是否把那個時間算作宣戰時間，抑或等到最后通牒規定的時限。他們決定等待。內閣會議室里燈光慘淡，他們圍坐在綠色會議桌旁，一片沉寂，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慮之中。在命運所系的以往時刻曾圍坐在這張桌旁的那些人的幽靈，此時在他們面前宛然若現。每雙眼睛都凝視著時鐘，最后通牒規定時限在它的嘀嗒聲中慢慢消逝。大本鐘響起了11時的第一下沉重的報時聲，勞合·喬治有著一副對傳奇劇頗為敏感的凱爾特人的耳朵，此時“鐺——鐺——”（boom）的鐘聲在他聽來宛若在說：“完蛋！完蛋！完蛋！”（doom）

二十分鐘之后開戰電令被發出：“戰爭，德國，行動。”至于何時何地行動，仍然未定，留待第二天召開的戰時委員會解決。英國政府并不好戰，但在各位閣員就寢時，英國已是一個參戰國了。

第二天，隨著列日受到襲擊，大戰的第一個戰役打響了。那天毛奇在給康拉德·馮·赫岑多夫的信中寫道：歐洲在進入“一場將要決定今后百年歷史進程的戰斗”。

注釋

[[1]](#_1_8) 色當日是紀念普法戰爭中法皇拿破侖三世率師在色當投降的日子（時在1870年9月2日）。——譯注

[[2]](#_2_6) 德語中第二人稱有“Sie”和“du”兩種，前者表示客氣或尊敬，后者表示親昵或蔑視，此處表示親昵。——譯注

[[3]](#_3_6) 法國傳統的三個座右銘，即自由、平等、博愛。——譯注

8月2日格雷要求英國內閣授權：Grey, II, 12.

法國人民“民族忠義”勃發：Report by British Consul in Dunkirk, BD, XI, 508.

“兵書”：Corbett, 20–21.

格雷向康邦遞交書面保證：Grey, II, Appendix D, 301.

格雷與康邦的談話：Grey to Bertie, BD, XI, 487.

康邦的“絕密”電報：oincaré, II, 278.

國家不會“半半拉拉”地打仗：article by Cambon, Revue de France, July 1, 1921.

內閣的瓦解：Morley, 4, 17; Asquith, II, 8.

丘吉爾趕忙去見貝爾福：Dugdale, II, 78.

霍爾丹和格雷收到比利時的電報，并要求阿斯奎斯批準動員：Haldane, 294–5.

保守黨領袖要求對法、俄施援：Dugdale, II, 79–80; Chamberlain, 99–100.

自由黨大臣不愿接受俄國成為盟國：Morley, 6.

利希諾夫斯基與格雷的最后一次會面：Grey, II, 13.

下院聽取格雷的演說：MacDonagh, 3; Punch, August 12, 153.

“垂頭喪氣，不吱一聲，默然認可”：Grenfell, Field Marshall Lord, Memoirs, London, 1925, 204.

格雷的演說：full text, Grey, II, Appendix D.

德比勛爵的議論：Grenfell, op. cit., 204.

拉姆齊·麥克唐納、基爾·哈迪和不同意宣戰的自由黨議員：NYT, August 4.

“現在怎么辦？”：Churchill, 235.

“如果他們拒絕，那就是戰爭”：Poincaré, IV, 519 (French ed.).

“葉落之前凱旋”：Blücher, 137.

德國記事人員的記錄：ibid., 12, 16.

色當日在巴黎享用早餐：Count Häseler, qtd. Grelling, 30.

英國軍官被問及對戰爭可能打多久的看法：Bridges, 74.

俄國預期可以取得速勝：Vladimir Gurko, 542; Botkin, 112.

“瓦西里·費多羅維奇”：Vladimir Gurko, 542.

德國儲存硝酸鹽的總量：Erzberger, 15.

霞飛預言“漫長的疲勞戰”：Joffre, 53.

基欽納的預測：Birkenhead, 22.

“怎么就沒人事先告訴我英國將會出兵反對我們！”：qtd. Bernhard Huldermann, Albert Ballin, London, 1922, 212.

普魯士亨利親王與英王喬治：King George to Grey, December 8, 1912, BD, X, part 2, No. 452. On July 26, 1914, Prince Henry, who was again in England, was told by King George, “I hope we shall remain neutral.… But if Germany declares war on Russia and France joins Russia, then I am afraid we shall be dragged into it.” Nicolson, George V, 245–6.

德皇“深信”英國將保持中立：Freytag-Loringhoven, qtd. AQ, April 1924, 153.

德皇的同會兄弟：Wile, 212.

“英國人來得越多越好”：Kuhl, 34.

毛奇1913年的備忘錄：Ritter, 68–9. Even in 1906 Schlieffen envisaged Britain as an enemy with an expeditionary force of 100,000 in Belgium, ibid., 161–4.

“我們就毫不懷疑英國遠征軍是會迅速開到法國沿岸”：Kuhl, qtd. AQ, April 1922, 166.

“英國可能為敵”：qtd. Frothingham, 60. The German Navy, like the Army, expected Britain to be an enemy: “There was scarcely any possible doubt that England would never countenance a military weakening of France by us,” Tirpitz, I, 334.

德國王儲談“軍事解決辦法”：My War Experiences, 5.

《槍炮的福祉》：Alldeutscher Blätter, August 3, qtd. Hallays, 27.

左派議員都很“沮喪”：Hanssen, 13, 19.

赫里克給維維亞尼打電話：Poincaré, II, 284.

馮·舍恩遞交宣戰書：ibid., 285–8.

“整個歐洲的燈光正在熄滅”：Grey, II, 20.

貝洛：“于必要時以兵戎相見”：Bassompierre, 37.

惠特洛克見貝洛：Whitlock, 64; Gibson, 22.

“我們招致最大災難的一天”：Czernin, In the World War, New York, 1920, 16.

“我們德國人在全世界人心目中輸掉第一個大回合的一天”：Crown Prince, Memoirs, 180.

很多人懷疑德國的最后通牒是個花招：Galet, 51; Joffre, 135.

梅西米的命令：Messimy, 289.

阿爾貝國王向保證比利時中立的國家發出呼吁：Galet, 63.

毛奇希望與比利時“達成諒解”：Moltke to Jagow, Kautsky, No. 788.

拜恩斯與雅戈的對話：Beyens, II, 269–72.

“共同的愛和共同的恨的紐帶”：Millard, 35.

奧地利大使揩拭眼淚：Bassompierre, 41.

阿爾貝國王在議會：Galet, 62; Gibson, 13–19; Whitlock, 60.

議員們難以抑制自己：Bassompierre, 40; Millard, 35–7.

巴黎的外國志愿兵：Gibbons, 27.

維維亞尼和普恩加萊的演說：French Yellow Book, Nos. 158 and 159; Poincaré, II, 296–7.

霞飛將軍“鎮定自若”：Poincaré, ibid.

柏林的情況：Hanssen, 25.

色當一幅繪有德皇威廉一世的繪畫：Wetterlé, 29.

貝特曼和埃茨貝格爾會見議員：Haussmann, 16–20.

德皇在皇宮中的講話：ibid., 21; Hanssen, 25; text of speech is in Ralph H. Lutz, Fall of the German Empire, Documents, 1914–18, Stanford, 1932, Vol. I.

社會民主黨商討是否要向德皇“致敬”：Haussmann, 23.

雅戈和馮·黑林根的保證：Erzberger, 231.

貝特曼的講話：NYT, August 5, 2:6; full text in Lutz, op. cit.

英國的最后通牒：British Blue Book, Nos. 153 and 159.

戈申與貝特曼的會談：Bethmann, 159, note; Goschen to Grey, British Blue Book, No. 160.

英國駐德國使館的窗戶被德國民眾用石頭全部砸碎：Gerard, 137; Beyens, I, 273.

“想不到喬治和尼基竟會背叛我！”：qtd. Blücher, 14.

“像對待葡萄牙人那樣來對待我們”：Tirpitz, I, 307.

“我們的國家在哪兒都不受人愛戴”：Crown Prince, Memoirs, 81–2.

垂頭喪氣的左派議員的哀嘆：Haussmann, 25, 27; Hanssen, 32.

涉及日本的謠言：Hanssen, 14.

“據說暹羅是友好的”：Blücher, 6.

康邦會見格雷：Poincaré, II, 293.

威爾遜對動員令的拖延大為震怒：Wilson, 147, 156; Chamberlain, 103–4.

貝爾福給霍爾丹的信：Dugdale, II, 81.

阿斯奎斯在議會宣讀對德最后通牒：Punch, August 12, 154; MacDonagh, 78. Punch's correspondent, who was present, says Asquith's statement was received with “a deep-throated cheer … fierce in its intensity.” The Times correspondent (MacDonagh), who was also present, says it was received in “complete silence.” This illustrates one of the perils of writing history.

內閣等待午夜：Lloyd George, 69–71.

毛奇：“一場將要決定今后百年歷史進程的戰斗”：Conrad, IV, 194.

# 第三部分　激戰

## 第9章　“當時在逃的敵艦‘格本’號”

早在陸戰開始之前，8月4日臨近拂曉時分，德國海軍部給地中海德軍艦隊司令威廉·蘇雄（Wilhelm Souchon）海軍上將的一份無線電報的電波掠空而過。電文說：“8月3日已與土耳其結盟。立即向君士坦丁堡進發。”盡管電報預期的事情后來表明還言之過早，而且這份電報幾乎隨即被撤銷了，蘇雄海軍上將仍然決定按照指示前進。歸他統率的有兩艘高速新戰艦，一艘是戰列巡洋艦“格本”號，另一艘是輕型巡洋艦“布雷斯勞”號（Breslau）。這兩艘巡洋艦的司令在此后七天中完成的航程，在全世界人心頭留下的陰影，是這場大戰中任何一次大膽行徑所不及的。

到薩拉熱窩事件發生時，土耳其有著許多敵人，而無一個盟友，因為誰都認為不值得和它結盟。一百年來，被稱為歐洲“病夫”的奧斯曼帝國，一直被窺視左右的歐洲列強看作已奄奄一息，它們只等它死后下手。可是年復一年，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病夫卻不甘死亡，衰弱的雙手依然牢牢抓住巨大家當的鑰匙不放。實際上，自從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的革命推翻老蘇丹“該死的阿卜杜勒”，建立了以他的比較通情達理的弟弟為首而由“統一與進步委員會”（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主持的政府以來，在最近六年中，土耳其確實已經開始重獲新生。

這個“委員會”，或者說青年土耳其黨人，在他們的“小拿破侖”恩維爾貝伊（Enver Bey）領導下，決心重建祖國，錘煉出必要的力量，扣緊日趨松弛的權力紐帶，驅走待機而動的鷹隼，恢復奧斯曼極盛時期的泛伊斯蘭統治。這一進程很不合俄、法、英三國的脾胃，它們在這個地區都有爭雄的野心。德國是登上這個帝國舞臺的后來者，帶著它自己的從柏林通至巴格達的夢想，決定充當青年土耳其黨人的保護者。1913年德國派去一個軍事代表團，前往整編土耳其軍隊，激起了俄國人的強烈不滿，最后只得由列強共同努力提出了保全臉面的辦法，才使之沒有先薩拉熱窩事件一年釀成俾斯麥警告的“巴爾干地區的蠢事兒”。

此后，土耳其人不得不選邊站隊的日子悄然迫近，好似幽靈，使他們感到不寒而栗。他們既怕俄國，又恨英國，也不信任德國，弄得無所適從。年輕英俊的“革命英雄”恩維爾，雙頰紅潤，黑胡子留得就像德皇那樣朝上尖尖地翹著，是僅有的一心一意熱烈主張和德國結盟的人。他和稍后的某些思想家一樣，相信德國是未來的浪濤。而塔拉特貝伊（Talaat Bey）就不那么深信無疑。此人是“委員會”的政治領袖、實際的掌權者。他是個黎凡特冒險家，長得強壯結實，一磅魚子醬用兩杯白蘭地和兩瓶香檳酒一灌，就能一口氣吞下去。他認為土耳其從德國人那里可以撈到的好處，要比協約國的出手為高。對于土耳其在一場列強大戰中保持中立而幸存下去的機會，他毫無信心。如果協約國得勝，奧斯曼的一家一當就會在它們的壓力下化為烏有；如果同盟國得勝，土耳其就將成為德國的仆從。至于土耳其政府中別的一些派系，只要辦得到的話，則寧愿和協約國結成同盟，心存籠絡俄國之望。俄國是土耳其的世仇，覬覦君士坦丁堡已達千年之久，還把這座位于黑海口的城市干脆稱為“沙皇格勒”。那條叫作達達尼爾（Dardanelles）的狹小的著名出海通道，長僅50英里，最寬處不過3英里，是俄國唯一的終年可用以通向世界各地的出口。

土耳其有一個無價之寶——它的地理位置，正好處在各條權力之路的會合處。正因為這個緣故，一百年來英國充當了土耳其的傳統保護人，但如今英國已經不再把土耳其當作一回事了。英國為了讓一個軟弱無能，因而也乖乖聽話的專制君主橫踞在它通往印度的道路上，才支持蘇丹抵抗一切外來者；經過一個世紀以后，英國終于開始感到厭倦，不想再和被溫斯頓·丘吉爾客氣地稱為“聲名狼藉、衰老垂危、不名一文的土耳其”束縛在一起了。很久以來，對土耳其人苛政、腐敗和殘暴的惡名，歐洲人一直感到臭氣沖鼻。格萊斯頓曾呼吁把土耳其人這個“人類社會中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敗類”逐出歐洲。1906年起執政的英國自由黨人則是這一著名呼吁的繼承人，他們的政策是根據土耳其人半為病夫半為惡棍這一形象制定的。克里米亞戰爭后，索爾茲伯里（Salisbury）勛爵拿賽馬作譬喻說，“我們押錯了馬”，這話竟成了讖語。英國左右土耳其政府的權勢，剛好在它可能成為無價之寶的時候，竟然任其消失了。

1909年，溫斯頓·丘吉爾曾訪問君士坦丁堡，跟恩維爾和青年土耳其黨的大臣們建立了在他看來的“友好關系”。土耳其要和英國締結永久同盟的請求，也是通過丘吉爾于1911年作為中介拒絕的，他以英帝國對東方國家常用的口吻建議說，雖然英國不能同意結盟，土耳其還是不要“回到舊政權那種暴虐手法，或者嘗試擾亂英國目前的現狀”來疏遠同英國的友誼為好。他以海軍大臣的地位，從世界全局出發，提醒土耳其說，只要英國仍然是“歐洲唯一保持制海權的國家”，那么英國的友誼還會有很大用處。可是，土耳其的友誼，甚至它的中立，對英國也許同樣有用這一點，不論是丘吉爾還是別的大臣，都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

1914年7月，德國人鑒于兩線作戰的局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一下子急如星火起來，想爭取這個可以封鎖黑海出口的盟國，以切斷俄國和其盟友的聯系以及從盟友得到補給的線路。土耳其早先的結盟建議，過去一直掛在那里，這下子突然顯得非常可取了。德皇驚恐之余堅稱：“現在該做的事是要讓巴爾干各國的槍炮全都做好準備對準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一開始在條款上討價還價，并且裝出倒向協約國的模樣，德皇更加驚慌，指示大使在答復土耳其的建議時“要毫不含糊、直截了當地順從……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打發他們走”。

7月28日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那天，土耳其正式要求德國締結秘密攻守同盟，于任何一方和俄國交戰時生效。就在當天，柏林收到這項建議，當即接受，并用電報發回一份由首相簽署的草約。但是在最后關頭，土耳其人還是無法下定決心，把自己的命運和德國人的拴在一起。要是他們拿得準德國人會勝利……

就在他們猶豫不決的時候，英國沒收了他們兩艘根據合同正在英國船塢里建造的軍艦，這就起了促使他們作出決定的作用。這兩艘都是第一流的主力艦，和英國最好的軍艦不相上下，其中一艘配備有13.5英寸口徑的大炮。7月28日，那位生氣勃勃的海軍大臣，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征用了”土耳其的軍艦。其中的“蘇丹奧斯曼一世”號已于5月間完工，第一期款子也已付清。可是當土耳其人想把船接回國去的時候，英國人多方奸詐地暗示說，希臘人圖謀用潛水艇攻擊它，并以此勸說他們把船留在英國，等另一艘姊妹艦“列沙吉耶”號（Reshadieh）造好后一同回國。7月初，“列沙吉耶”號完工后，英國又制造借口不讓離開。航速和火力的試驗無緣無故推遲了。率領500名土耳其水兵在泰恩河（Tyne）一艘運輸艦上待命的土耳其指揮官，一聽說丘吉爾的命令，就威脅著要登上他那兩艘軍艦并升起土耳其國旗。海軍部的發言人頗感興味地下令，“必要時以武力”制止這種企圖。

這兩艘軍艦花了土耳其300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這筆錢是土耳其在巴爾干戰爭的敗北喚醒了國內公眾，深知必須使自己的武裝部隊重整旗鼓之后，由民眾捐款籌措起來的。安納托利亞的農民人人都捐了幾文。沒收這兩艘軍艦的消息，雖然公眾尚未得悉，卻引起政府“精神上極度的痛苦”——這是海軍大臣杰馬勒帕夏（Djemal Pasha）的說法，一點也不過分。

英國不屑花費任何力氣來安撫土耳其人。格雷在正式通知土耳其有關泰恩河上這樁地道的海盜行徑時，還蠻有把握地認為，土耳其人會理解英國出于“自己在這場危機中的需要”而沒收這兩艘軍艦的原委的。至于土耳其的財政和其他損失——英王陛下政府“真誠感到遺憾”的事情——格雷干巴巴地說，將會受到“適當考慮”。“賠償”兩字他根本不提。在“病夫”和“錯馬”兩種想法結合一起所產生的影響下，英國終于認為整個奧斯曼帝國還不如兩艘額外的軍艦來得重要。格雷表示遺憾的電報是在8月3日發出的。同一天，土耳其和德國簽署了盟約。

然而土耳其并不踐約向俄國宣戰，也沒封鎖黑海，也沒公開采取任何違反嚴格中立的行動。在按照自己的條件同一個大國結盟以后，土耳其的種種表現說明它并不急于幫助新盟友。土耳其舉棋不定的大臣們寧愿再觀望一下，等看清戰爭的最初幾仗趨向如何再說。德國遠處天涯，而俄國人和英國人卻是近在咫尺且經常存在的威脅。如今，英國參戰已成定局，這就需要認真重加考慮了。德國政府就怕事態這樣發展下去，于是下令給大使旺根海姆（Wangenhaim）男爵，“如果可能”，爭取使土耳其“就在今天”對俄宣戰，因為“防止奧斯曼帝國在英國行動影響下脫離我們，事屬至關重要”。可是，奧斯曼帝國并未照辦。除恩維爾外，人人都想推遲公開對抗俄國的行動，等到戰爭進程出現了某些端倪，可以看出可能的結局時再說。

地中海上，各種灰蒙蒙的形影，都在為即將來臨的戰斗進行活動。無線電收發報員在緊張地傾聽著耳機里的聲音，記錄下遙遠的海軍部發來的作戰命令。英法艦隊的當務之急是保衛法國殖民軍從北非到法國的通道。該軍不是正常編制的兩個師而有三個師之多，連同輔助部隊共有8萬余人。整個軍能否在戰線的指定地點出現，對于法國的作戰計劃可能起到決定性作用；而作戰雙方都認為，法國在跟德國最初沖突中的命運如何又將決定著整個戰局。

法英兩國的海軍部都把眼睛盯在“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上，認為這兩艘德艦是對法國運兵船的主要威脅。法國人擁有地中海上最大的艦隊，可以用來保護運輸船只的計有16艘戰列艦，6艘巡洋艦和24艘驅逐艦。以馬耳他為基地的英國地中海艦隊，雖然沒有無畏級艦只，而為首的三艘戰列巡洋艦——“不屈”號、“無敵”號和“不倦”號（Inflexible, Indomitable, and Indefatigable）卻都是18000噸，備有8門12英寸口徑大炮，時速二十七八海里。這三艘軍艦都可以追擊和消滅無畏級戰艦以外的一切船只。此外，英國艦隊還有4艘14000噸的裝甲巡洋艦、4艘5000噸以下的輕型巡洋艦和14艘驅逐艦。意大利艦隊是中立的。以亞得里亞海頂端的普拉（Pola）為基地的奧地利艦隊，有著八艘現役主力艦，其中包括配備12英寸口徑大炮的新造無畏艦兩艘，還有相當數量的其他船只。但卻是一只紙老虎，全無作戰準備，后來表明也無活動能力。

德國艦隊的規模雖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地中海上只有兩艘戰艦。一艘是23000噸的戰列巡洋艦“格本”號，和無畏艦一般大，記錄的試航速度為27.8海里，和英國的“不屈”號級相同，火力也相仿。另一艘是4500噸的“布雷斯勞”號，和英國的輕型巡洋艦不相上下。“格本”號由于速度比任何法國戰艦或巡洋艦都快，按照英國海軍大臣的可怕預測，“可以毫不費力地躲過法國的戰列艦隊，撇開或越過其巡洋艦而襲擊其運輸艦，把這些滿載士兵的船只一一擊沉”。如果戰爭爆發前英國海軍的軍事思想有什么特點的話，那就是傾向于過高估計德國海軍在不利情況下甘冒風險的勇氣和決心，既高于英國人自己的可能表現，也高于德國人面臨考驗時的實際表現。

隨時準備攻擊法國運輸艦，確實是“格本”號及其僚艦自從1912年下水以來一直被派在地中海上游弋的一個理由。但到最后時刻，德國人發現還有更重要的任務有待它們去完成。8月3日，當德國人看到有必要對不愿宣戰的土耳其人施加一切可能的壓力時，蒂爾皮茨海軍上將便令蘇雄海軍上將駛向君士坦丁堡。

蘇雄是個膚色黝黑、身體結實、年已五十的機靈水兵。1913年，他在“格本”號上升起他的司令旗。此后他一直在自己的新防區內的各個內陸海和海峽上航行，往來游遍各海岸和岬角，繞行各島，參觀港口，使自己熟悉戰爭一旦爆發他可能要應付的那些人物和地方。他到過君士坦丁堡，會見了土耳其人；也曾和意大利人、希臘人、奧地利人、法國人……總之除了英國人以外，和所有國家互相致敬。他向德皇稟報說，英國人絕不讓他們的船只和德國人的船只同時泊在同一港口。英國人一向習慣于在德艦走后立即出現，以便消除德國人可能留下的影響，或者照德皇的文雅說法，以便“向湯里吐唾沫”。

蘇雄在海法（Haifa）聽到薩拉熱窩的消息后立即感到這是戰爭的一個預兆，同時也為自己的鍋爐著急。一段時間來，這些鍋爐一直漏氣。“格本”號原定于10月份由“毛奇”號前來接替，自己開回基爾修理的。這時蘇雄決定準備應付最壞的局面，立即出發去普拉，并事先打電報給海軍部，要求運送給他一批新的鍋爐管子和熟練的修理工到普拉等他。整個7月份，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船員中揮得動榔頭的人個個都被征集來幫忙。在18天內，找出了4000根壞管子，并作了更換。可是修理工作還沒結束，蘇雄就接到報警電報，他隨即離開了普拉，以免被困在亞得里亞海。

8月1日，他開到意大利這個靴形半島鞋跟部的布林迪西（Brindisi），那兒的意大利人借口海上浪大、補給船無法行駛，不給他供應用煤。顯然，意料中的意大利對三國同盟的背叛即將成為事實，使蘇雄無法加煤。他召集手下的軍官，商量行動方針。他們想突破協約國的警戒線開往大西洋，并在一路上盡力給法國運輸船以打擊，但是否有此可能全在于他們的速度如何，而速度則又取決于鍋爐。

“有多少鍋爐漏氣？”蘇雄問隨從參謀。

“過去四個小時內有兩只漏氣。”

“該死！”海軍上將大發雷霆，在這樣的時刻，命運竟使他這條了不起的軍艦瘸了腿。他決定駛往墨西拿（Messina），好和德國商船會合，向它們征煤。德國為防備戰事發生，早已將全世界的海洋劃分成一系列的區域，每個區域由一位德國軍需官主管，這位官員有權命令本區所有的船只開赴德國軍艦可能要和它們會合的任何地方，有權征用德國銀行和商行的資財以應軍艦之需。

“格本”號在沿著意大利這塊靴形地帶繞行的時候，船上的無線電報機一整天都在給德國商船發命令，召集它們到墨西拿去。在塔蘭托（Taranto），“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會合了。

8月2日，英國領事發出電報說：“緊急。德艦‘格本’號抵塔蘭托。”這一發現敵蹤的呼號，在海軍部里激起了英國海軍的強烈作戰欲望：找出敵人的位置等于一場戰斗完成了一半。但英國尚未宣戰，獵殺還不能開始。一直躍躍欲試的丘吉爾，在7月31日就已指示地中海艦隊司令海軍上將伯克利·米爾恩（Berkeley Milne）爵士，他的第一個任務將是“把槍炮對準個別德國快速艦只，特別是‘格本’號，并在可能的情況下迫使它應戰”，以協助保護法國運兵船只。他還提醒米爾恩說：“你所轄各艦速度足可以使你從容選擇戰機。”但是，出于某種矛盾心理，他同時告訴米爾恩，“開始時要盡量保存你的實力”，并且“避免在現階段卷入對優勢兵力作戰”。后一條命令在此后幾天的事態發展中，將像浮標上抑郁的鐘聲那樣回響著。

丘吉爾心目中的“優勢兵力”，按他事后的解釋，指的是奧地利艦隊。奧國艦隊的戰艦和英國“不屈”號級的對比關系猶如法國戰艦和“格本”號的關系；也就是說，它們的裝甲和火力配備都更好，但速度較慢。后來丘吉爾還解釋說，他的命令本意并不是指“任何時候不管情況如何必要，都禁止英國軍艦和優勢兵力交戰”。如果說這道命令原意并不是禁令，那么其本意勢必是讓司令官根據自己的判斷來理解了，這種做法往往把事情引向戰爭的“熔點”——司令官的氣質。

一旦真槍實彈的時刻，也就是一個司令官的全部職業訓練所指向的那一時刻來臨的時候，一旦他部下士兵的生死、一場戰斗的結局，乃至一次戰役的命運，都可能取決于他在特定時刻所作的決定的時候，一個司令官的內心深處究竟會出現什么情況？這樣的時刻會使有些司令官大膽勇敢，有些變得猶豫不決，有些審慎而明智，而另一些則會陷入癱瘓。

米爾恩海軍上將則是變得謹慎小心。這位五十九歲的單身漢，在社交場中仍屬一表人才，原先是愛德華七世的侍從官，至今還是宮廷里的親信。他是海軍元帥的兒子，祖父和教父也都是海軍高級將領。他還是個釣魚能手，潛行捕鹿的好手，而且槍法高明。這位阿奇博爾德·伯克利·米爾恩爵士，在1911年成了地中海司令的當然人選。這個職務即使不再是英國海軍中的主要職務，也還是最出風頭的。他是由新任海軍大臣丘吉爾先生任命擔當此職的。但這一任命卻立即被海軍上將費希爾勛爵私下斥為“出賣海軍的行為”。費希爾勛爵是前海軍大臣，無畏艦隊的創建人，同代人中最易沖動、講話最不簡潔的英國人。他一心向往的計劃就是當他預言的戰爭在1914年10月爆發時，要確保海軍炮術專家杰利科海軍上將當上總司令。

丘吉爾一任命米爾恩為地中海司令，費希爾就認為這會使米爾恩有望得到他想留給杰利科的職務，因而勃然大怒。他痛罵丘吉爾“屈從宮廷權勢”；他暴跳如雷，像火山爆發那樣大發怨言，罵米爾恩是個“毫無半點用處的司令”，“根本不適合當海上的高級司令，更不適合你實際讓他當上的最高司令”。他一會兒說他是個“搞陰謀的小人”，一會兒說他是“最低級的一類毒蛇”，乃至稱他是“花一個小錢買舊《泰晤士報》看的B. ‘米恩’爵士[[1]](#_1__Fei_Xi_Er_Gu_Yi_Ba_Mi_Er_En)”。費希爾的書信——每一封都少不了“閱后付丙”（編按：意即焚毀）的告誡，幸而收信人都沒理會——所講的一切都顯得大過實際情況十倍，因此，如果要作符合實際情況的理解，那就得按比例加以縮小。米爾恩上將既不是“最低級的一類毒蛇”，也不是納爾遜（Nelson）一樣的人物，而是海軍中一個普普通通的、毫不出眾的點綴品。當費希爾發覺事實上并沒有人考慮讓米爾恩當總司令以后，他冒火的兩眼才轉到別的事情上，而讓B. “米恩”爵士太太平平地去領略地中海的風光了。

1914年6月，米爾恩也訪問了君士坦丁堡，和蘇丹及其大臣們一同進餐，還在自己的旗艦上款待他們；但對土耳其在地中海戰略中的可能地位，他并不比別的英國人更為關心。

他收到丘吉爾的第一次警告以后，于8月1日，就已在馬耳他集結了自己一隊的三艘戰列巡洋艦以及由海軍中將歐內斯特·特魯布里奇（Ernest Troubridge）爵士指揮的另一隊裝甲巡洋艦、輕型巡洋艦和驅逐艦。8月2日一早，他接到丘吉爾的第二道命令：“務必用兩艘戰列巡洋艦緊緊跟蹤‘格本’號”；還說亞得里亞海“必須受到監視”，這大概是為了防范奧地利艦隊的出現。派出兩艘戰列巡洋艦尾隨“格本”號這道明確的命令，顯然是因預見到戰斗將臨而發的，但是米爾恩并沒有遵辦。相反，他派了“無敵”號和“不倦”號隨同特魯布里奇的一隊前去監視亞得里亞海。得悉那天早晨發現“格本”號在塔蘭托海面向西南方向行駛后，他派出輕型巡洋艦“查塔姆”號（Chatham）去搜索墨西拿海峽。據他推斷，“格本”號可能到了那兒，事實上也確實在那里。“查塔姆”號于下午5時離開馬耳他，次日早晨7時穿過墨西拿海峽，但發回的報告說，“格本”號不在那里。這次搜索晚了六個小時，蘇雄海軍上將早就離開了。

蘇雄將軍是在前一天下午到達墨西拿的，正好碰上意大利宣布中立。意大利人再次拒絕供煤給他，盡管如此，他還是裝了2000噸，是由一家德國輪船公司供應的。他征用了德國東非輪船公司的一艘商船“將軍”號，在把乘客卸下，付給他們每人一張最遠可到那不勒斯的火車票款后，用它作了供應船。蘇雄直至此時還未接到海軍部的任何命令，他決定占據一個戰位，萬一敵對行動開始，可以在優勢兵力阻擋他之前，第一時間領略一下戰斗的滋味。8月3日午夜1時，他在一片漆黑中離開墨西拿，朝西駛往阿爾及利亞的海岸，打算炮轟波尼（Bône）和菲利普維爾（Philippeville）這兩個法國人登輪的港口。

就在同一個小時，丘吉爾給米爾恩發來了第三道命令：“亞得里亞海口應繼續監視，但你的目標是‘格本’號，不論它駛往何處，尾隨不放。宣戰看來大有可能，而且迫在眉睫，做好準備，一旦宣戰，隨即投入戰斗。”米爾恩海軍上將收到這道命令時根本不知道“格本”號在哪里，因為“查塔姆”號丟失了目標。但他相信，它正在西去攻擊法國運輸艦；根據他收到的情報，一艘德國運煤船正在馬略卡島（Majorca）待命，他斷定，“格本”號接著會駛往直布羅陀和公海。于是，他把“無敵”號和“不倦”號撤出對亞得里亞海的監視，派它們西去搜索“格本”號。8月3日一整天，從墨西拿西行的“格本”號一直在被它的獵者以相距一天的航程尾隨著。

這時，法國艦隊正從土倫（Toulon）跨海駛向北非。這支艦隊本該早一天出發，無奈8月2日在巴黎發生了海軍部長戈捷博士不幸垮臺的事件，因為發現他竟忘記把魚雷艇派進海峽。在緊接著的吵鬧中，發給地中海的命令被拖了下來。陸軍部長梅西米一心要讓殖民軍盡快到達。處境狼狽的戈捷博士企圖掩蓋他在海峽的疏忽，便一下子跳到了好戰的極端，建議在宣戰前攻擊“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他的神經處于緊張狀態”，普恩加萊總統這樣認為。接著海軍部長提出要和陸軍部長決斗，但經過同僚們的竭力勸解，兩個對手終于冷靜下來，戈捷含淚擁抱了梅西米，并經人說服以健康為由辭職了。

究竟英國人要扮演什么角色，至今還沒有表態，弄得法國人毫無把握，使事情更加復雜化。下午4時，內閣總算拼湊了一份多少還算有條理的電報，發給法國總司令布韋·德拉佩雷爾（Boué de Lapeyrère）海軍上將，通知他，曾在布林迪西發現過“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兩艦，要他一收到敵對行動開始的信號就“攔住它們”，還要他不要使用護航隊，而采取火力控制兩艘敵艦的辦法來保護運輸艦。

德拉佩雷爾海軍上將是個強有力的人物；使法國海軍擺脫陳舊過時的狀態，主要是他的功勞。這時他當機立斷，決定無論怎樣也得組織護航隊，因為照他看來，英國扮演什么角色尚屬“可疑”，因此他別無其他選擇。他立即生火，次日凌晨4時就出發了，這時蘇雄離開墨西拿也才幾小時。此后二十四小時中，法國海軍的三支艦隊朝南開往奧蘭（Oran）、阿爾及爾和菲利普維爾，而“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也正在朝西駛向同一目的地。

8月3日下午6時，蘇雄海軍上將從自己的無線電中得到對法宣戰的消息。他和法國人一樣快速前進，但他的速度更快。8月4日半夜2時，他接到蒂爾皮茨海軍上將要他“立即向君士坦丁堡進發”的命令，這時他正在接近目的地，也愈來愈接近交火的高潮時刻。他不愿就此掉頭，而“不品味一下我們人人熱切想望的那個交火時刻”——這是他后來寫下的話。他按原來航線繼續前進，直到阿爾及利亞的海岸在晨曦中出現。他升起了俄國旗號，一進入射程就開了火，“散播死亡和恐怖”。后來出版這次航程紀事的一個船員情緒激動地寫道：“我們的詐術取得了輝煌的成功。”按照德國總參謀部發布的《作戰守則》，“為蒙騙計，穿著敵軍軍裝，使用敵國或中立國旗幟或徽志，現宣布均可容許”。對于這類情事，《作戰守則》體現了德國官方的想法，他們認為這本手冊可以抹掉海牙公約上德國的簽字；該約第二十三條禁止使用敵國旗號進行偽裝。



在炮擊菲利普維爾以及“布雷斯勞”號炮擊波尼以后，德國的蘇雄海軍上將沿著來的路線折回墨西拿。他計劃先在那兒裝好從德國商船上要來的煤，然后出發去1200英里外的君士坦丁堡。

德拉佩雷爾海軍上將幾乎在炮擊發生的時刻就從無線電里得到消息。他猜測“格本”號會繼續西駛，也許還會在逃往大西洋的路上炮擊阿爾及爾。他加快速度，以期截住敵艦，“如果它出現的話”。他沒有派遣船只去偵察“格本”號，因為據他推測，如果敵艦出現，少不了有仗給它打的；如果不出現，那么眼前就無須再去操心它了。德拉佩雷爾海軍上將，和協約國方面的任何人一樣，是單純從海軍戰略角度來考慮“格本”號的。對于它可能去執行一項政治使命，從而深刻影響并延長戰爭進程這一點，不僅是他，就是別人也都從未想到過。此后，“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再也沒有在法國人的航線上出現過，德拉佩雷爾海軍上將也就再沒有去搜索它們。就這樣在8月4日早晨，丟失了第一個機會。可是又一個機會隨即送上來了。

那天早晨9時半，通宵在向西行駛的“無敵”號和“不倦”號在波尼海面遭遇了“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這兩艘德艦正在朝東回墨西拿去。要是前一天晚上格雷在議會發言以后立即向德國提出最后通牒的話，那么英國和德國這時候就已經處于交戰狀態，巡洋艦的大炮也就不會沉默。事實卻是，就在相隔7000多米，完全在射程之內的情況下，雙方的軍艦默默地交臂而過，既未宣戰，也只得滿足于瞄準一下大炮和免去相互致敬的例行禮節。

蘇雄海軍上將決心在敵對行動開始前盡可能遠離英國人，因此，竭鍋爐之所能拼命加速。“無敵”號和“不倦”號掉轉船頭追趕，決心把德艦保持在射程內，以待宣戰。兩艦的無線電，就像獵人發現獵物后吹起的號角那樣，向米爾恩海軍上將報告了船位。米爾恩立即轉告海軍部：“‘無敵’和‘不倦’在東經7.56˚、北緯37.44˚處跟蹤上‘格本’和‘布雷斯勞’。”

海軍部因不能行動而極為沮喪。就在與特拉法爾加角同一片水域的海面上，英國軍艦置敵艦于射程之內，卻不能開火。丘吉爾發出電報，“好極，不要讓它逃跑，戰爭在即”。還趕發了一份“最急件”備忘錄給首相和格雷，建議說，如果“格本”號攻擊法國運輸艦，應授權米爾恩的艦隊“立即與之交戰”。不幸，米爾恩海軍上將在報告船位時沒有說明“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駛向何方，以致丘吉爾設想它們正在西去，打算再次在法國人身上打壞主意。

照阿斯奎斯的說法，“溫斯頓已經披掛好準備上陣，渴望一場海戰來擊沉‘格本’號”。阿斯奎斯是樂意讓他滿足愿望的，可是不幸他向內閣報告了這件事，而內閣又拒絕在最后通牒時限屆滿之前下令采取戰爭行動。這樣，第二次機會又丟失了。不過，這次機會說什么也會丟掉的，因為丘吉爾的命令是以“格本”號攻擊法國運輸艦為前提的，而“格本”號早已放棄了這個目標。

于是在夏季寧靜的海面上展開了一場你死我活的追逐，蘇雄海軍上將力圖把他的追蹤者遠遠撂在后面，而英國人則竭力要在午夜之前把他保持在射程之內。蘇雄竭盡軍艦之所能，把時速提高到24海里。通常在高溫和煤灰飛揚的情況下一班至多工作兩小時的司爐，不得不以高速連續鏟煤；管子開裂了，他們還受著蒸汽的炙燙。從早到晚保持這樣的速度，四個人死去了。然而，可以覺察出獵物和追獵者之間的距離在慢慢地拉大。“無敵”號和“不倦”號的鍋爐也有毛病，爐前人員又不夠，愈來愈難以支持。到了下午，約翰·凱利（John Kelly）海軍上校指揮的輕型巡洋艦“都柏林”號參加了這兩艦的靜悄悄的長途追逐。隨著時間慢慢過去，距離愈拉愈大；到5時，“無敵”號和“不倦”號落到射程以外。只有“都柏林”號還跟著，把“格本”號保持在視線以內。7時起了一場濃霧。9時，“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就消失在西西里海面上一片愈來愈濃的煙霧朦朧中。

那天，丘吉爾和他的幕僚在海軍部整整一天“受著坦塔羅斯[[2]](#_2__Tan_Ta_Luo_Si__Tantalus__Xi)那樣的折磨”。下午5時，第一海務大臣、巴滕貝格的路易斯親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說在天亮前還來得及擊沉“格本”號。丘吉爾在內閣的決定牽制下，無法下達這道命令。就在英國人等待午夜信號的時候，“格本”號到了墨西拿，煤也到手了。

拂曉時候，英國人雖已處于交戰狀態，可以放手開火了，可是已經找不到“格本”號的影蹤。根據“都柏林”號在失去聯系前的最后一份報告，他們斷定它在墨西拿，但在這時候，又插進來一個新障礙。海軍部發來了一道命令，通知米爾恩說意大利已宣布中立，并指示他“嚴格尊重中立，船只不得進入意大利海岸六英里以內”。這道禁令意在避免由于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而和意大利發生麻煩。這也許小心過分了。

米爾恩海軍上將被這六英里的限度所阻，進不了墨西拿海峽，只好在兩個出口處布置警戒。他相信“格本”號會再次西去，于是親自坐鎮在旗艦“不屈”號上，和“不倦”號一起警戒著通向西地中海的出口，而在通向東地中海的出口處[[3]](#_3__Mo_Xi_Na_Hai_Xia_Shi_Nan_Bei)，只派了由“都柏林”號艦長的兄弟霍華德·凱利（Howard Kelly）海軍上校指揮的輕巡洋艦“格洛斯特”號（Gloucester）去那里巡邏。同時，也由于想把兵力集結在西面，米爾恩海軍上將下令“無敵”號就近在比塞大（Bizerte）而不到東面的馬耳他去加煤。因此，如果“格本”號東去，那么三艘“不屈”號級的軍艦就沒有一艘位于可以截擊它的地點。

8月5日和6日連續兩天，米爾恩在西西里以西的海面上巡邏，一心認為“格本”號企圖西逃。同樣，海軍部也想不出，“格本”號除了從直布羅陀突破或者躲在普拉外，還有別的什么路線好走，因此對米爾恩的安排也沒表示異議。

在這兩天里，直到8月6日黃昏，蘇雄海軍上將一直頂著重重困難在墨西拿加煤。意大利人始終堅持執行中立法，要求他在到達后二十四小時內離開。而煤又只能直接從德國商船上裝，只好劈開商船的甲板，拆掉欄桿，才能搬運過來，費的時間是平常的三倍。海軍上將一面和港口當局爭論中立法的條文，一面強令每個船員參加鏟煤。盡管用了額外配給的啤酒、軍樂隊的演奏和軍官們的愛國演講來打氣，水兵們在8月的高溫下由于勞累過度而一個接一個地昏了過去，最后船上到處躺著渾身污黑、浸透汗水的人，就像無數具尸體。到8月6日中午，裝好的1500噸煤，還不夠用來開到達達尼爾海峽，可是能繼續干下去的人一個也不剩了。蘇雄海軍上將“心情沉重”，下令停裝，并令全體人員休息，準備5時啟碇。

在墨西拿，他收到兩份電報，加劇了他的危急感，迫使他面臨一項緊急的決定。一份電報說，“由于政治原因，目前不宜進入君士坦丁堡”。蒂爾皮茨向君士坦丁堡進發的命令一下子就被撤銷了。這次變更是因土耳其人意見不一而造成的。恩維爾曾通知德國大使，準許“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通過警衛達達尼爾海峽的布雷區；而首相和其他大臣卻因兩艦的通過顯然違反土耳其仍然公開保持的中立，堅持必須撤回許可。

蒂爾皮茨的第二份電報通知蘇雄說，奧地利在地中海無法給德國提供海軍支持，讓蘇雄自行決定在這種情況下的去路。

蘇雄深知，他的鍋爐不能為他提供必要的速度以突破敵人的重重屏障而沖向直布羅陀。可是，要自己蜷縮在普拉，依靠奧地利人，這事他也不干。他決定無視命令，前往君士坦丁堡。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很明確的：“迫使土耳其人，即使違反他們的意愿也要迫使土耳其把戰火擴大到黑海，對抗他們的宿敵俄國。”

他下令生火待發，5點鐘啟碇。船上所有的人以及岸上的人，都知道“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正準備在極不利的情況下去經受一場嚴峻考驗。一整天，興奮的西西里人擠在碼頭上，向“那些馬上要去送死的人”兜售明信片之類的最蹩腳的紀念品，還叫賣著大標題為《在死亡的魔爪之中》、《不是恥辱就是敗北》、《此行不是駛向死亡，就是駛向光榮》的號外。

蘇雄海軍上將預料到要受追擊，故意決定趁天還亮的時候離開，好讓人看到他在朝北行駛，仿佛是在去亞得里亞海。夜晚來臨時，他打算改變航向，朝東南方向開去，在夜色掩護下溜走。由于煤不夠整個航程用，萬事都決定于他能否不被發覺而和奉命在希臘東南角上的馬萊阿角（Cape Malea）接應他的一艘運煤船會合。

“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一開出墨西拿海峽的東口，就立即被正在口外巡邏的“格洛斯特”號發現而跟上。“格洛斯特”號雖然和“布雷斯勞”號勢均力敵，可是“格本”號的重炮在16000米遠處就能揍得它無法在海上存身；因此，它只好監視住敵人以待增援，別無其他作為。凱利海軍上校一面打電報給率領著所有三艘戰列巡洋艦還在西西里西面巡邏的米爾恩海軍上將，報告船位和航線，一面在“格本”號外側尾隨。夜幕降臨，快到8點時，他把航線轉到“格本”號的內側，因為月亮升起在他的右面，這樣可以把“格本”號置于月光之下。這一移動使它進入了射程，但并沒惹得“格本”號開火。在晶瑩的夜色中，兩艦隱隱約約的船體向北行駛，后面另一個黑影緊隨。由于在墨西拿加的煤質量低劣，煙囪里冒出來的黑煙污染了月光皎潔的天際，老遠的地方也可以根據黑煙看到兩條軍艦的所在。

米爾恩海軍上將得悉“格本”號已從東口離開墨西拿，就留在原地未動。據他推想，如果“格本”號按目前的航線繼續前進，它會受到正在監視亞得里亞海的特魯布里奇艦隊的截擊。但他又傾向于認為，它的航線是個假象，它終究會轉向西行，那時他自己的戰列巡洋艦艦隊就可以截擊。他覺得不存在別的可能，因而只派一艘輕型巡洋艦——“都柏林”號——東去和特魯布里奇的艦隊會合。

這時，擺脫不了“格洛斯特”號的蘇雄，要想靠他手頭現有的煤開赴愛琴海，就無法再按假裝的航向繼續前進。不管有沒有人尾隨，他必須改變航向東去。到晚上10時，他掉了頭，同時干擾“格洛斯特”號的波長，以免自己的轉向被報告出去。但他干擾未成。凱利海軍上校通知轉向的無線電訊在午夜光景傳到米爾恩和特魯布里奇那兒，米爾恩就此出發去馬耳他，打算在那兒加煤并“繼續追逐”。既然敵人沖著特魯布里奇開來，這下該由他來攔截了。

特魯布里奇奉命“防止奧地利人出來、德國人進去”，早就停在亞得里亞海的口子上。從“格本”號的航向看來，它顯然是在駛離亞得里亞海，但他認為，如果他立即南下，有可能截住它。然而，他能指望在真正有勝利希望的條件下和它交戰嗎？他的艦隊是由“防衛”號、“黑王子”號、“武士”號和“愛丁堡公爵”號四艘裝甲巡洋艦組成的，各艦都是14000噸，配備的都是9.2英寸口徑的大炮，射程要比“格本”號的11英寸口徑大炮近得多。海軍部那道最初的命令，顯然是作為他的上司米爾恩海軍上將的指示轉發下來的，命令制止“對優勢兵力”作戰。此后又未接到米爾恩的任何命令，特魯布里奇于是決定一試，希望能在凌晨6時前東方曙光初露，使能見度有利于他而足以彌補射程不足的時候去攔截敵人。一過午夜不久，他全速南下。但是四小時后，他改變了主意。

特魯布里奇在日俄戰爭期間擔任過駐日海軍武官，因此懂得不能小看長射程炮火的效能。他既系出名門，曾祖父曾經和納爾遜一起在尼羅河上作過戰，又享有“青年時代一度是海軍中最最優秀的軍官”的盛名，他“對航海技術的信仰就像克倫威爾手下的士兵對《圣經》的信仰一樣”。丘吉爾很器重他，于1912年任命他進入新成立的海軍作戰參謀部工作。但是，在面臨危急的殊死一戰的時刻，航海技術和參謀工作方面的卓越才干并不一定有助于一個指揮官。

到凌晨4時，特魯布里奇還沒找到“格本”號，他斷定自己不再有任何希望可以在有利條件下和它交戰了。他相信，在大白天“格本”號即使被截住，也能躲出他的大炮射程，并把他的四艘巡洋艦一一擊沉。他顯然明白，一旦和它進行這場射擊和廝殺的技藝較量，他的四艘巡洋艦和八艘驅逐艦中任何一艘用炮火或者魚雷去擊中它的機會是極少的。他斷定，它就是海軍部告訴他不要與之交火的“優勢兵力”。于是他停止追逐，并把這情況用無線電報通知了米爾恩，然后在扎金索斯島（Zante）外游弋到上午10時，仍然盼望著米爾恩的戰列巡洋艦會有一艘出現。最后他駛進扎金索斯港，準備重新監視亞得里亞海上的奧地利人。就這樣，第三次機會丟失了，而“格本”號載著命運的重負，沿著自己的航線駛去。

米爾恩仍然相信“格本”號存有掉頭朝西的意圖，于是在早晨5時30分發信號給“格洛斯特”號，要它“逐步落向后面，免遭俘獲”。他也好，海軍部也好，都還不認為“格本”號是艘正在逃竄中的船只，不是在尋求戰機，而是在避免戰斗，是在使出渾身解數全速駛向它遙遠的目的地。可以說，英國人由于菲利普維爾遭受襲擊留下的印象，以及多年來對德國海軍愈來愈大的恐懼，把“格本”號看作一艘橫行海上襲擊商船的海盜船，隨時會掉頭撲將過來。他們盼望無論如何總得把它圍困起來，可是他們在追趕它的時候卻缺乏緊急迫切之情，因為他們始終在等它掉轉頭來，根本沒有看出它是在竭力想脫身東逃，具體地說，也就是逃往達達尼爾海峽。這與其說是海軍的過錯，毋寧說是政治上的失算。很久以后，丘吉爾悔恨交加地承認：“我想不起英國政府在作重大決策時，還有哪次比土耳其人的消息還要閉塞。”這一情況的根子在于自由黨人對土耳其根深蒂固的厭憎。

時至8月7日天全亮時，只有“格洛斯特”號不理米爾恩的信號，還在跟蹤“格本”號。這時“格本”號已再次和“布雷斯勞”號會合，在向希臘海岸駛去。蘇雄海軍上將不便在敵人視線下和他的運煤船碰頭，拼命要甩掉他的尾巴。他下令“布雷斯勞”號落向后去，在“格洛斯特”號前面來回穿梭，裝成布雷的樣子，同時采用其他擾亂視聽的戰術，想把“格洛斯特”號引開。

還在指望援兵的凱利海軍上校，急于拖住“格本”號，已不顧一切。當“布雷斯勞”號落到后面來恫嚇他時，他不考慮它是不是一支“優勢兵力”，決心對它進行攻擊，以迫使“格本”號掉回頭來保護它。他不顧魚雷的威脅開了火。“布雷斯勞”號回擊。“格本”號不出所料果然掉過頭來助戰。誰也沒有擊中誰。一艘從威尼斯駛往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小客輪剛好路過，目擊了這場戰斗。凱利海軍上校撤出和“布雷斯勞”號的戰斗，退下陣來。蘇雄海軍上將經不起把珍貴的煤用在追逐上，重新上路。凱利海軍上校再次開始跟蹤。

他不讓“格本”號溜出視野，又追了三個小時，直到米爾恩發來信號，嚴令禁止他追過希臘島頂端的馬塔潘角（Cape Matapan）。下午4時30分，當“格本”號繞過馬塔潘角駛進愛琴海時，“格洛斯特”號終于放棄追逐。蘇雄海軍上將擺脫了監視，隱沒在希臘的小島之間，去和運煤船會合了。

大約八個小時以后，午夜剛過，米爾恩海軍上將裝好煤，進行了檢修，率領“不屈”、“無敵”、“不倦”和輕型巡洋艦“韋茅斯”號（Weymouth）離開馬耳他向東行駛。也許因為他覺得目前這一階段加速只是浪費煤而已，他以12海里的速度前進，從容不迫地追趕著。到第二天，8月8日下午2時，他約莫在馬耳他和希臘之間的半路上，從海軍部傳來消息說奧地利已經對英宣戰，這使他立即停了下來。很遺憾，這個消息是誤傳，一個文書錯發了這個事前約定表示與奧地利作戰的代號電報。可是這已足以使米爾恩放棄追逐，于是他占定一個位置，以便奧地利艦隊一旦出現時，不致和馬耳他隔絕。就在那兒，他命令特魯布里奇的艦隊和“格洛斯特”號前來和他會師。又一個機會丟失了。

這些軍艦在那里集結，停留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時之久，直到次日中午，米爾恩聽到尷尬不堪的海軍部說奧地利根本沒有宣戰，于是再次重新開始追捕。到這時，離8月7日下午看到“格本”號駛進愛琴海的最后蹤跡，已經過去四十多個小時。按照米爾恩海軍上將后來的敘述，他在考慮朝哪個方向去找它的時候，認為“格本”號可能采取的航線有四條。他仍然認為它可能企圖西去逃往大西洋，也可能南去攻打蘇伊士運河，也可能找個希臘港口避一避，甚至也可能去攻打薩洛尼卡（Salonika）——后兩種假想，從希臘還是個中立國這點來看，不啻海外奇談。出于某種原因，他不信蘇雄海軍上將有破壞土耳其中立的意圖；達達尼爾海峽這個目的地，在他腦子里跟在國內的海軍部一樣，連想也沒有想過。他所設想的戰略是，把它“朝北”困在愛琴海這只甕中。

“朝北”確實是蘇雄的去向，可是土耳其人已經在海峽入口布了雷，不經他們準許，他的軍艦不能進入。在裝好煤并和君士坦丁堡聯系上之前，它們是無法前進的。他的運煤船“博加迪爾”號（Bogadir）正按照命令偽裝成希臘船在馬萊阿角等著。由于擔心會被發現，他命令它向愛琴海上更靠里面的一個島嶼提諾斯島（Denusa）駛去。因為沒覺察到英國人已經中止追逐，8月8日一整天他的軍艦潛伏不動，直到9日早晨才偷偷溜向荒無人煙的提諾斯島海岸。在那兒，“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整天加煤，同時鍋爐里燒足蒸汽，以便一接到通知半小時內就能出發。他還在一處山頂上設了一個瞭望哨，監視英國人；其實英國人當時遠在500英里外監視著奧地利人。

蘇雄海軍上將不敢和君士坦丁堡通電報，因為可以傳那么遠距離的強力信號有可能同時把自己的位置泄露給敵人。他命令從墨西拿沿著一條更加偏南的航線跟著他來的“將軍”號，駛往士麥那（Smyrna），并從那里打電報給駐君士坦丁堡的德國海軍武官：“由于無法規避的軍事需要，必須攻擊黑海的敵人。盡一切努力替我安排，立即讓我穿過海峽，如果可能則取得土耳其政府的準許，必要時可不經其正式同意。”

9日一整天蘇雄等著回音。他的無線電收發報員曾經意外地收到一份含義不清的電文，但無法破譯出來。夜幕來臨，仍無答復。這時米爾恩已經得知有關奧地利的消息系出誤傳，他的艦隊再次向愛琴海進發。蘇雄決定，如果沒有回音，必要時強行闖入達達尼爾海峽。8月10日凌晨3時，他收聽到英國艦隊進入愛琴海時拍發的無線電信號。他不能再事等待。就在這時，耳機里傳來另外一陣斷斷續續的嗡嗡聲。這是“將軍”號，它終于發來了曖昧難解的訊息：“進去！勒令要塞投降，逮捕引水員。”

弄不清這是要他炫示一下實力，以保全土耳其人的臉面，還是真的要他強行進入，蘇雄就這么在拂曉時離開了提諾斯島。一整天他以18海里的時速北上，而米爾恩海軍上將則整天在愛琴海出口處來回巡行，不讓它出來。當天下午4時，蘇雄已經看到了特內多斯（Tenedos）和特洛伊平原；5時，他在查納克（Chanak）大要塞的炮口下到達了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堅不可摧的通道入口處。全體船員進入戰位，每個人的心都懸著，根根神經繃得緊緊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它慢悠悠地駛近前去。“派個引水員來”的信號旗飄拂著升上了桅桿頂。

那天上午，曾經目擊“格洛斯特”號與“格本”號、“布雷斯勞”號兩艦戰斗的那艘意大利小客輪到達君士坦丁堡。乘客中有美國大使亨利·摩根索先生的女兒、女婿和他們的三個孩子。他們帶來了一個令人激動的故事：遠處幾艘兵艦，炮聲隆隆，白煙滾滾，龍蜿蛇行，各施方略。他們聽意大利船長說，其中兩艘就是鼎鼎有名的才從墨西拿逃出來的“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幾小時后，摩根索先生因事碰到旺根海姆大使，提到他女兒講的故事，旺根海姆聽了之后表現出“一種焦慮不安的關注心情”。他吃好午飯，馬上由奧地利大使陪同來到了美國大使館。兩位大使面對那位美國太太“鄭重其事地在椅子上坐定下來”，“對她進行了非常仔細但卻十分客氣的盤問……他們連一個細節也沒讓她漏掉；他們想要知道打了多少發炮彈，德國船是朝哪個方向開走的，客輪上所有的人講了些什么，等等，等等……他們離開使館的時候，可說是心花怒放、得意洋洋”。

這下，他們得知“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已經躲過英國艦隊脫身了。剩下來要做的就是取得土耳其人的同意，讓它們穿過達達尼爾海峽。身為國防大臣，控制著布雷區的恩維爾帕夏真是求之不得，但是他得玩一套復雜的把戲，才好對付那些神經更加緊張的同僚。那天下午，當他正跟德國軍事代表團的一個團員在一起的時候，通報說又有一個團員馮·克雷斯（von Kress）中校緊急求見。克雷斯說，查納克要塞司令報稱“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要求準許進入海峽，并請立即指示。恩維爾回答說，不跟首相商量他無法決定。克雷斯堅持說，要塞需要立即答復。恩維爾一言不發，坐了好幾分鐘，然后突然說：“讓要塞準許它們進來吧。”

一直不自覺地屏住呼吸的克雷斯和另外那位軍官，這下才發覺自己松了口氣。

接著，克雷斯問：“假如英國軍艦跟著它們進來，要不要對英國人開火？”恩維爾又一次拒絕答復，借口必須和內閣商量。可是克雷斯堅決主張要塞不能沒有明確的指示。

“要不要對英國人開火？”隨后冷場了很久。最后恩維爾回答說：“要。”

在150英里外的海峽入口處，一艘土耳其驅逐艦離岸開出來，駛近“格本”號，甲板上所有的眼睛都極其擔心地盯著它。一面信號旗飄揚了一會兒，經認出是“跟著我”的意思。8月10日晚上9時，“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駛進達達尼爾海峽，照事后很久丘吉爾凄然承認的說法，它所帶來的“屠殺、痛苦和毀滅，其程度之烈，就一只船來說，是空前的”。

這一新聞立即經電報傳遍全球，當晚就傳到馬耳他。仍然在愛琴海各島之間搜索的米爾恩海軍上將到第二天中午也得悉了。他的上司對“格本”號的任務了解得太少了，竟命令他布置一條封鎖線來堵住達達尼爾海峽，“以防德國軍艦出來”。

阿斯奎斯首相對這個消息的評論是：它是“令人關切的”。可是他在日記里卻寫道：“它并沒有什么大不了”，“因為我們將堅持”“格本”號的船員應由土耳其人接替，而他們是沒有能力駕駛這條船的。在阿斯奎斯看來，必須做的事情就是“堅持”而已。

協約國的大使們立即怒氣沖沖地一再堅持這個主張。土耳其人仍然抱住中立不放，把它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于是決定要求德國人解除“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的武裝。這雖“只是暫時做個樣子”，可是遭到應邀前來聽取這一建議的旺根海姆的斷然拒絕。經過進一步激烈討論之后，有一個大臣忽然提出：“難道德國人不可以把這兩條船賣給我們嗎？難道我們不可以把它們的到來看作根據合同前來交貨嗎？”

這誠是個高見，皆大歡喜，既打開了進退維谷的局面，又給了英國人沒收兩艘土耳其軍艦以理想的報應。在德國的同意下，這筆買賣向外交使團宣布了。此后不久，“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經重新命名為“雅武斯”號（Jawus）和“米迪利”號（Midilli），升起了土耳其旗號，船員戴上土耳其帽，在土耳其人一片狂熱聲中，接受了蘇丹的檢閱。這兩艘德國軍艦真像是鬼使神差特意送來代替他們那兩艘被搶走的軍艦似的，既使老百姓欣喜若狂，又給德國人抹上一層深得人心的光輝。

德國一直催逼宣戰，土耳其人則是一直拖延，不但如此，他們還為自己的中立開始向協約國索取越來越高的代價。俄國因為“格本”號來到黑海大門口，給嚇壞了，愿意照付。就像處在絕境中的無賴漢發誓拋棄終身惡習那樣，俄國甚至愿意不再染指君士坦丁堡。8月13日，外交大臣薩佐諾夫向法國建議，可向土耳其提出，如它保持中立，愿對它的領土完整給予莊嚴的保證，并且給它“巨大的財政好處，由德國人負擔”。他甚至愿意加上這樣一個保證：“即使我們勝利了”，俄國人也將履行諾言。

法國人同意，并且，用普恩加萊總統的話說，“竭盡全力”一方面使土耳其保持鎮靜和中立，一方面勸說英國參加對土耳其領土的聯合保證。但是英國人絕不能屈尊去對一度受他們保護的國家的中立進行討價還價或支付任何代價。丘吉爾在他“非常好斗”和“強烈反土”的情緒下，向內閣建議派一小隊魚雷艇穿過達達尼爾海峽去擊沉“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這也許是對動搖不定的土耳其人能施加影響的唯一姿態，也許是能防止最終發生的一切的唯一姿態。早在達達尼爾海峽遭到侵犯那天，法國一個最為敏銳、最有勇氣的有識之士就曾提出過這樣的建議。“我們應該跟著它們進去，”加利埃尼將軍說，“否則土耳其會加入敵對陣營。”在英國內閣中，丘吉爾的想法被基欽納勛爵否定了。他說英國人對土耳其采取攻勢，就會疏遠全體伊斯蘭教徒，那是英國受不了的。應該讓土耳其“先出手打第一拳”。

土耳其政府內部各派系爭吵不已，搖擺不定，差不多有三個月之久，在這期間，協約國時而威脅，時而磋商，德國人在君士坦丁堡的軍事影響則與日俱增。到10月底，德國人打定主意不能再讓他們無限期地拖延下去。為了從南面封鎖俄國，土耳其的實際參戰已屬絕對必要。

10月28日，原“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在蘇雄海軍上將指揮下，帶著幾艘土耳其的魚雷艇，駛進黑海，炮轟了敖德薩（Odessa）、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和費奧多西亞（Feodosia），造成一些老百姓喪生，擊沉了一艘俄國炮艇。

土耳其政府中的大多數人，被德國海軍上將在自家門口干下的既成事實嚇呆了，而想推卸責任，但被有力地阻止了。起作用的因素是，“格本”號就停在金角灣（Golden Horn）里，由它自己的軍官指揮，配備著它自己的船員，而他們又是無視管束的。塔拉特貝伊指出，政府、王宮、首都、他們這些人本身、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權力，以及哈里發，都處在德國炮口之下。趕走德國的軍事代表團和海軍代表團，他們又辦不到，而這一點卻是協約國一直要求土耳其作為它保持中立的證明。既然戰端已經以土耳其人的名義挑起，俄國便于11月4日向土耳其宣戰，英國和法國接著在11月5日也宣戰了。

這下子戰爭的血刃便伸展到另半個世界的頭上。土耳其的鄰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意大利和希臘，最終也都卷了進去。此后，通向地中海的出口被堵死，俄國只好依靠一年中有半年冰封的阿爾漢格爾斯克（Archangel）和遠離前線8000英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Vladivostok）了。黑海被封閉以后，俄國的出口降低了98%，進口降低了95%。俄國被隔絕以及隔絕造成的種種后果，加利波利（Gallipoli）的一場徒然的血腥悲劇[[4]](#_4__Zhi_1916Nian_Ying_Guo_Wei_Qi)，協約國不得不分兵于美索不達米亞、蘇伊士和巴勒斯坦等戰役，奧斯曼帝國的最后瓦解，中東往后的歷史，都是“格本”號這次航程造成的結果。

別的余波即使不那么重要，也同樣辛酸。特魯布里奇海軍上將遭到同僚們的指摘后，要求成立調查法庭；1914年11月，調查法庭下令把他交軍事法庭審判，罪名是“他放過當時在逃的敵艦‘格本’號而不加追擊”。在他是否有理由把“格本”號看作“優勢兵力”這個根本問題上，海軍為了自身的緣故，宣判他無罪。雖然他在大戰中還繼續服役，但由于海軍的反感，從此不再讓他擔任海上指揮。為了把地中海交由法國人控制，米爾恩海軍上將于8月18日被召回國退休。8月30日，海軍部宣布，在對付“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的問題上，他的指揮和部署，業經“仔細審查”，結果是“各位大臣對于他所采取的步驟的任何方面，都表示贊同”。各位大臣先前看不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現在也不找替罪羊。

注釋

[[1]](#_1_9) 費希爾故意把米爾恩（Milne）讀作“米恩”（Mean，意即“平庸的、下作的、小氣的”），以示鄙視。B為米爾恩的名字伯克利的縮寫。——譯注

[[2]](#_2_7) 坦塔羅斯（Tantalus），希臘神話中主神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機被罰永世站在上有果樹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時水即減退，腹饑想吃果子時樹枝即升高。——譯注

[[3]](#_3_7) 墨西拿海峽是南北向的，北面的出口通西地中海，南面的出口通東地中海。為了講清楚地形，這兩個出口分別稱為西、東出口。

[[4]](#_4_2) 指1916年英國為強渡達達尼爾海峽遠征加利波利，結果傷亡慘重，戰果全無。——譯注

Sources for all action by, and events aboard, the Goeben and Breslau,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re Souchon, Kopp, and Krieg zur See, the official German naval history. Likewise, for action of the British ships, the sources are the official history, Corbett, 56–73 (with two magnificent maps, unfortunately too large to reproduce in these less expansive days), Milne, and Churchill 236–43 and 265–75. Corbett's account was published first; Milne's was written to dispute Corbett who, he felt, had done him injustice, Churchill's to compose a narrative that, while not too obviously blaming the naval commanders, would show the Admiralty to have been blameless and still claim to be history, not special pleading. This delicate feat of balancing was accomplished by placing the blame for failure to arrest the Goeben on accidents of fate; on “the terrible Ifs,” in his words. The account is one to be read with caution not incompatible with admiration.

德國海軍部給蘇雄將軍的電報：Krieg zur See, 2. Tirpitz's idea was that Souchon should b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o command the Turkish fleet.” Tirpitz to Jagow, Kautsky, No. 775.

恩維爾貝伊主張與德國結盟：Emin, 68–69; Nogales, 26, Morgenthau, 30–34.

塔拉特貝伊的飲食和觀點：Steed, I, 377; Morgenthau, 20–24; Nogales, 26–28.

丘吉爾對土耳其的看法：Aftermath, 374.

丘吉爾拒絕土耳其結盟的信件：Churchill, 524.

德皇的指示：These took the form of marginal notes on telegrams from Wangenheim, German ambassador in Constantinople, Kautsky, Nos. 141 and 149. The Kaiser was on his yacht at this time, mid-July, and his marginalia were telegraphed to the Foreign Office as instructions.

德國與土耳其的談判：Emin, 66–8; Djemal, 107–14; correspondence between Wangenheim and Jagow; Kautsky Nos. 45, 71, 117, 141, 144, 183, 285. Draft of the Treaty, signed Bethmann-Hollweg, is No. 320; final text is No. 733; further discussion of terms and implementation, Nos. 398, 411, 508, 517, 726, 836.

英國“征用了”土耳其的軍艦：Churchill, Aftermath, 377–8; Djemal, 96, 104, 116; Grey, II, 165–66; Grey's “regrets”: British Blue Book, II, Nos. 1, 2, 3, and 4.

軍艦耗費3000萬美元：Allen, Whitehead and Chadwick, The Great War, Philadelphia, 1916, II, 374.

土耳其舉棋不定：On August 3 Wangenheim reported that Enver would like “to declare war immediately” but the other ministers were against it; Kautsky, No. 795.

“向湯里吐唾沫”：Souchon, 33.

“有多少鍋爐漏氣？”：Souchon gives the conversation verbatim, 37.

英國領事的電報：BD, XI, 480.

丘吉爾7月31日給米爾恩的命令：Churchill, 237–8.

并不是禁令：ibid., 272.

“出賣海軍的行為”：Fisher, Letters, II, 451, April 22, 1912.

費希爾勛爵的易怒：ibid.; “succumbing to court influence,” 458; “Utterly useless,” ibid.; “unfitted,” 451; “backstairs cad,” 360; “serpent,” 418; “Sir B. Mean,” 447.

丘吉爾8月2日的命令：Churchill, 239; third order to Milne, ibid.

戈捷要跟梅西米決斗：Poincaré, II, 279–80.

德拉佩雷爾收到的命令及他的行動：Capt. Voitoux, “l'Evasion du Goeben et Breslau,” R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March and May, 1919. The French role in the failure to arrest the Goeben, like the British, became a cause of extreme embarrassment to the government and was investigated in 1916 by a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f Inquiry under Admiral Amadée Bienaimé. Its report, implying blame of Admiral Lapeyrère, which he refused to answer, was never published but was analyzed in Admiral Bienaimé's book, which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making Admiral Lapeyrère the scapegoat for a general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navy. Materials collected by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were deposited in 1919 with the Ministry of Marine.

“交火時刻”和“散播死亡和恐怖”：Souchon, 40.

“格本”號升起俄國旗號及“我們的詐術取得了輝煌的成功”：Kopp, 23–4.

米爾恩報告船位：Churchill, 239.

“好極，不要讓它逃跑”：ibid.

丘吉爾給阿斯奎斯的緊急電報：ibid., 240.

“溫斯頓已經披掛好準備上陣”：Asquith, II, 21.

司爐員的死亡：Kopp, 28–31, 53; Souchon, 42.

“受著坦塔羅斯那樣的折磨”：Churchill, 242.

指示米爾恩嚴守意大利中立和避免“無關緊要的小事”的命令：ibid., 241.

蒂爾皮茨的兩份電報：Krieg zur See, 13; Souchon, 47. Turkish hesitations which caused the cancellation are reported by Wangenheim, Kautsky, Nos. 852 and 854.

“迫使土耳其人”：Souchon, 47.

西西里報章的頭條：Souchon, 45.

“防止奧地利人出來”：Corbett, 62.

特魯布里奇是“最最優秀的軍官”、“對航海技術的信仰”：Kenworthy, 32.

命令“格洛斯特”號“免遭俘獲”：Milne, 104.

文書錯發奧地利對英宣戰的電報：Churchill, 275.

“無法規避的軍事需要”：Krieg zur See, 20.

“進去！勒令要塞投降，逮捕引水員”：ibid.

旺根海姆表現出“焦慮不安的關注心情”：Morgenthau, 70–71.

恩維爾與馮·克雷斯的交涉：Kannengiesser, 25–26.

“屠殺、痛苦和毀滅”：Churchill, 271.

海軍部命令封鎖達達尼爾海峽：Corbett, 73.

阿斯奎斯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將堅持”：Asquith, II, 26.

將“格本”號“賣給”土耳其：Djemal, 119–20; Morgenthau, 76–78. The “sale” and the diplomatic furor aroused by the arrival of the German warships is documented in the reports of the various ambassadors in Constantinople to their governments, especially Giers to the Russian Foreign Office and Sir Louis Mallet to the British, contained in the Russian Orange Book, II, and the British Blue Book, II, respectively.

薩佐諾夫：“即使我們勝利了”：Paléologue, 84–85.

“非常好斗”，“強烈反土”：Asquith, II, 26, 28.

加利埃尼的話：Gallieni parle, 78.

基欽納說應該讓土耳其“先出手打第一拳”：ibid., 26.

蘇雄駛進黑海攻擊俄國：Emin, 75–76; Giers to Foreign Office, Russian Orange Book, II, No. 98; Roberts to Grey, British Blue Book, II, No. 178; Memorandum by Sir Louis Mallet, November 20, ibid.

“他放過當時在逃的敵艦‘格本’號而不加追擊”：article on Troubridge, DNB. On the ground that the House of Commons had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review courts-martial, Commander Bellairs, an M.P., made several attempts to force the Admiralty to release the report of the Court, without success. As the finding was acquittal, the Commander said he could see no reason for the Admiralty to keep the report secret, “except to prevent the public from knowing the bad arrangements they made at the outset of the war.” April 15, 1919, Parliamentary Debates, 5th series, Vol. 114, 2863–71.

“各位大臣對于他所采取的步驟的任何方面，都表示贊同”：article on Milne, DNB.

## 第10章　列日和阿爾薩斯

德法兩國，當它們的大軍尚在集結之際，各自的先遣部隊便已經像走馬燈似的在向前推進，準備發動進攻。德軍來自東方，法軍則從西方來。對峙的兩方都在從地處走馬燈外緣的各自陣地的右翼一端率先行動。兩軍相距300英里。不管法軍采取什么行動，德軍將襲擊列日，并摧毀其周圍十二座護城堡壘，為其右路大軍打通橫貫比利時的道路。法軍亦將不顧敵方作何行動，準備一舉突入上阿爾薩斯，這樣用兵是感情因素大于戰略因素，用心在于趁愛國熱情高漲之際開戰，以鼓動當地居民揭竿而起反抗德國。在戰略上，它的目的是把法軍推進到萊茵河右岸固守。

列日就像是一座城堡的吊閘，守衛著從德國進入比利時的大門。它雄踞在默茲河左岸高達150米的陡坡上。這一帶的河道，寬近200米，是它的天然城壕，方圓30英里，都有堡壘衛護。它是一座有口皆碑的、全歐洲最固若金湯的城池。十年前，旅順港是在抵擋了九個月的圍城后才投降的。全世界的輿論都寄希望于列日，即使它不能無限期地堅守不屈，也肯定能和旅順港的紀錄并駕齊驅。

全部兵力超過150萬人的德國七個集團軍，在沿著比法兩國邊境集結。按番號順序，從部署在與列日對峙的德軍陣線的右翼頂端的第一集團軍，直至部署在阿爾薩斯的左翼末端的第七集團軍。第六、七兩集團軍組成德軍左翼，計16個師；第四、五兩集團軍組成中路，計20個師；而第一、二、三集團軍組成右翼，計34個師，按計劃將穿越比利時的便是右翼。另有一支由三個騎兵師組成的獨立軍配屬于右翼。右翼的三個集團軍分別由馮·克盧克將軍、馮·比洛將軍和馮·豪森（von Hausen）將軍指揮。三位將軍都是六十八歲，前面兩位是1870年的沙場老將，騎兵軍的軍長是馮·馬維茨（von Marwitz）將軍。

由于馮·克盧克的第一集團軍進軍路線最長，全線推進的速度必須根據它的進展予以調節。第一集團軍在亞琛以北集結，準備取道列日市默茲河上五座橋梁渡河，因此攻占列日便是決定一切的首要目標。列日周圍堡壘的炮群控制著介于荷蘭邊境和樹木蘢蔥、丘陵起伏的阿登山區之間的孔道。列日的幾座橋梁是渡過默茲河的僅有的幾條通道。列日又是把比利時、德國與法國北部連接起來的四條鐵路線的樞紐，因此它是向前方的德國部隊運輸給養的必經之地。所以，在占領列日并將其周圍的堡壘打啞以前，德軍右翼部隊將無法前進。

為了打通經過列日的這條道路，特別從第二集團軍抽調了六個旅編成一支“默茲河部隊”，由馮·埃米希將軍指揮，如果比利時人不堅決抵抗，這支部隊可望在主力集結之際便可完成這一任務。德皇戰前多次失言事件之一，便是在觀看演習時對一個英國軍官伸出巴掌凌空一翻，說：“我將這樣通過比利時！”德國人認為，比利時人所謂不惜一戰的說法，不過是——用一個普魯士政治家對他國內政敵的用語說——“綿羊的夢囈”。列日拿下了，第一、第二兩集團軍在列日兩旁大路上開到了與該城齊平的地點，這時候大進軍便可開始了。

亨利·布里阿爾蒙（Henri Brialmont）是他那時代里舉世無雙的防御工程大師，19世紀80年代，他在利奧波德二世的堅決敦促下，構筑了列日和那慕爾兩地的堡壘群。堡壘群分別環列在兩城四周高地上，意圖是扼守默茲河的通道，抵御不論來自何方的入侵。列日的堡壘群構筑在河的兩岸，距列日一般是四至五英里，堡壘之間各相距約兩三英里。東岸的六座全部面對德國，西岸的六座環列在列日的周圍和背后。這些堡壘好像是在地底下構筑的中世紀城堡，地面上只露出一塊三角形的頂部，頂上伸出一些拱形罩蓋，隱蔽著所有的炮塔。其他一切設施全部在地下，有傾斜的隧道通往地下室，并溝通炮塔與彈藥庫和火力控制室的聯系。六座大堡壘和分布其間的六座小堡壘共擁有大炮400門，其中最大的是口徑8英寸（210毫米）的榴彈炮。三角形頂部邊角處有小型炮塔，塔中的速射炮和機關槍控制著堡壘前方的斜坡。每座堡壘四周都圍有一道9米深的壕塹，并各有一座像它的大炮一樣能降落至地面以下的鋼制瞭望塔，塔上裝有一臺探照燈。每座大型堡壘由兩連炮兵和一連步兵共計400名士兵駐守。修筑這些堡壘群的原來意圖是作為捍衛邊疆的前哨，而不是作為抵擋敵軍圍攻背城借一的陣地，因此必須倚仗野戰軍守住各堡壘之間的空地。

比利時人過分信賴布里阿爾蒙精心設計的這些防御工事，因而忽略了使堡壘現代化的工作。守軍人數不足，而且都是來自預備役中年紀最大的一屆，每連僅有軍官一名。比利時人唯恐德國人找到借口，指責比利時違犯中立，因此遲至8月2日才下令挖掘戰壕和架設有刺鐵絲網的路障，以保衛堡壘之間的空隙地帶，并清除有礙大炮火力的樹木和房屋。德軍發動攻擊時，這些措施才剛開始。

就德國人而言，他們相信比利時人將屈服于最后通牒，或最多只是進行象征性的抵抗，因此沒有把他們已準備好的秘密武器運到前線。這種巨型攻城加農炮，其體積與破壞力之大一直被認為是無法移動的。一種攻城加農炮是由奧地利斯科達兵工廠制造的12英寸（305毫米）的迫擊炮；另一種是由在埃森（Essen）的克虜伯兵工廠制造的16.5英寸（420毫米）的龐然大物，連同炮架在內長逾7米，重98噸，其炮彈重1800磅，長約0.9米，射程達9英里，需要炮手達200名之多。在以前，已知的各種大炮中以英國13.5英寸口徑的海軍炮和海岸炮兵的11英寸固定榴彈炮為最大。當年圍攻旅順達六月之久才拿下該地的日軍，曾不得不將自己海岸上的這種大炮全部拆下來供攻城之用，不過，也是轟了三個月方才迫使俄國要塞投降的。

德國人的時間表卻容不得花這樣長的時間去收拾比利時的堡壘。毛奇對康拉德·馮·赫岑多夫說過，他預期到動員第39天西線便已決定勝負，因此答應從動員第40天開始派遣德國部隊到東線支援奧地利。盡管德國人估計比利時人不敢應戰，但是德國人的縝密周全要求做到對于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都要有所準備。問題就在于要設計一種用于攻克堡壘的能在陸上運輸的最重型大炮。它要么是一種迫擊炮，要么是一種短炮管的榴彈炮，能以高仰角發射，使炮彈落在堡壘的頂部，同時又可以無須長炮管的來復線而能相當準確地擊中特定目標。

1909年，克虜伯工廠在絕密的情況下試制成功420毫米口徑的大炮。這種短炮管的龐然大物，雖然能夠成功地發射炮彈，但也確實過于笨重，難以搬動。搬運時必須把它拆成兩段，各由一輛火車頭拖運，還必須敷設支軌，才能把它運到炮座。由于發射時下沖的后坐力巨大，底座必須挖至幾米的深度，注滿水泥，把炮架固定在水泥座體中；如要拆運，還須用炸藥炸毀水泥。炮位裝置過程需要六小時。在以后四年中，克虜伯繼續研制一種可以分成幾部分因而適宜于公路運輸的大炮。1914年2月，樣炮試制成功，并在庫默斯道夫（Kummersdorf）試驗場試射，應邀專程蒞臨現場觀看的德皇感到非常滿意。不過，在公路上用蒸汽機、汽油馬達甚至用馬隊牽引的進一步試驗，都證明仍需繼續改進。預定在1914年10月1日改進完畢。

奧地利斯科達廠在1910年制成的305毫米大炮具有優越的機動性。它可以拆為三部分：即炮身、炮架和可以搬動的底座。用馬達牽引，每天可行15至20英里。這種大炮不用軟胎，而是在輪子上裝上當時被人們敬畏地稱之為“鐵腳”的履帶。到達炮位后，首先安置好可搬動的鋼鑄底座，用螺栓把炮架緊固在底座上，然后架上炮身。整個操作過程需時40分鐘。拆卸過程能以同樣速度完成，這樣就能保證不致被敵人繳獲。它能向左右作60度旋轉，射程7英里。和420毫米口徑的大炮一樣，它能發射裝有延發引信的穿甲炮彈，讓炮彈在穿入目標內部后爆炸。

8月戰爭爆發時，德國有幾門奧地利的305毫米大炮，是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在德國人自己的同類型火炮能夠使用前借給他們的。這時候，克虜伯已生產了五門420毫米口徑鐵路大炮和兩門公路大炮。但這些大炮在運輸方面仍需改進。8月2日發出緊急命令，要求把這些大炮準備就緒。入侵比利時開始后，克虜伯拼命加緊生產，夜以繼日，裝配炮身、炮架、馬達、設備，配備應急的馬隊、機修工、卡車司機以及在出發前必須進行一次最后訓練的炮兵人員等。

毛奇仍然希望不必動用這些大炮而能順利通過。可是，如果比利時人執迷不悟，真的不惜一戰，德國人指望一舉攻克這些堡壘。有關這次進攻的一切細節都經周密考慮，由總參謀部的一名軍官——他是施利芬的最忠誠的門徒——負責研究行動計劃。

對工作不嫌其多和花崗石一般的性格，幫助這位埃里克·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上尉克服了姓氏不屬名門望族的缺陷，在1895年，也就是他三十歲那年，成為總參謀部的一員，贏得了人所渴望的帶紅色條紋的軍服。粗壯的身軀，淡黃色小胡子下面有著一張叫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唇角下垂的嘴巴，圓圓的雙下巴，加上頸背上隆起的那塊埃默森稱之為獸印記的橫肉，這一切都突出地表明魯登道夫屬于與施利芬那種貴族風度完全相反的體形。盡管如此，魯登道夫卻刻意仿效施利芬的那種不茍言笑、隱而不露的性格。這樣一個存心要落落寡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物，盡管不出兩年他對德國人民和他們的命運所行使的權力如此之大是腓特烈大帝以來沒有人能及得上的，但直到此時此刻，他還是一個不為人知、未受贊賞的人物。通常，大人物都有親友家屬撰寫對他的回憶，積累些有關他的故事和言論，可是他卻沒有；甚至在他享有盛名之后，也都不曾留下什么傳聞軼事，他是個沒有影子的人。

魯登道夫把施利芬看作“古往今來最偉大的軍人之一”。1904年至1913年，他任職總參謀部動員科并最后主管該科，不遺余力地要使他的恩師的計劃能保證成功。關于這個計劃的正確性，他說，總參謀部全體成員都深信不疑，因為“沒有人相信比利時的中立”。一旦戰爭爆發，魯登道夫期望出任作戰處長。但在1913年，他與當時的陸軍大臣馮·黑林根將軍意見相左，因此被攆出總參謀部，外調擔任團長。1914年4月，他被提升為將軍，并有命令給他，要他在動員的時候出任第二集團軍副參謀長[[1]](#_1__Zhe_Ge_Zhi_Cheng_Yu_Suo_Zhi)。8月2日，他作為副參謀長被派到擔任進攻列日的埃米希的默茲河部隊，任務是負責突擊部隊與軍部的聯絡。

8月3日，阿爾貝國王出任比利時軍隊的總司令，他已不存任何幻想。他和加萊根據德軍可能發動入侵的設想而制訂的計劃受到了阻撓。他們本來打算把比利時部隊的六個師全部布防在默茲河一線，利用這道天然屏障加強列日和那慕爾兩地的筑壘陣地。可是總參謀部和新上任的參謀長塞利耶·德莫朗維爾將軍不愿讓年輕的國王和官卑職小的加萊上尉在戰略上發號施令，總參謀部本身又因進攻與防御兩派意見之爭而莫衷一是，沒有作出安排把部隊調至默茲河沿岸。在戰前，為了嚴守中立的原則，六個師分別部署在各個方面以應付一切來犯之敵：第一師在面對英國的根特（Ghent）；第二師在安特衛普；第三師在面對德國的列日；第四、第五兩師在面臨法國的那慕爾、沙勒魯瓦和蒙斯；第六師和騎兵師在中央，即布魯塞爾。塞利耶將軍的計劃是，一旦判明敵人來自何方，部隊即在國家中心地帶集中，迎擊入侵者，而聽任安特衛普、列日和那慕爾的城防守軍各自為戰。一般來說，推行既定計劃的力量總是大于改變這些計劃的力量。德皇無法改變毛奇的計劃，基欽納也改變不了亨利·威爾遜的計劃；同樣，朗勒扎克（Lanrezac）也改變不了霞飛將軍的計劃。到8月3日，阿爾貝國王正式就任總司令，因而權力已在塞利耶將軍之上，但再要把全軍部署在默茲河一線已為時過晚。此時采取的戰略是把比利時部隊集結在熱特河（Gette）畔的盧萬（Louvain，又譯為魯汶）前方，亦即布魯塞爾東約40英里處，決定在這里打一場防御戰。在這種情況下，國王最多只能堅決要求留駐列日的第三師以及留駐那慕爾的第四師增援邊防守軍而不開往國家的中心地帶去和野戰集團軍會師。

國王于1914年1月親自提名六十三歲的陸軍大學校長勒芒（Leman）將軍擔任第三師師長兼列日軍事長官，并使這一任命獲得通過。勒芒和霞飛一樣，原來也是一位工兵軍官，除了在工兵部隊任職的六年外，三十年來一直都在陸軍大學工作。阿爾貝曾在該校求學，親聆過他的教誨。勒芒有七個月的時間在未取得總參謀部支持的情況下整頓了列日堡壘群的防務。危機到來之際，他的兩位上司之間爆發了一場各自發布命令的沖突。8月1日，塞利耶將軍發出命令，要調走第三師的一個旅，也就是說要調走該師三分之一的兵力。根據勒芒的要求，國王撤銷了這道命令。8月3日，塞利耶將軍轉過來也撤銷了國王關于破壞列日上游幾座橋梁的命令，理由是這些橋梁是比利時部隊行動所需。這一次又是因為勒芒的要求，國王支持這位將軍抵制了總參謀部。國王并給勒芒寫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堅守托付給你的陣地，死戰到底”。

然而，保衛祖國的意志超越了保衛祖國的手段。以機槍為例，它是防御的主要武器，但按人數比例計算，比軍擁有的機槍只及德軍一半。至于保衛堡壘之間的陣地所需的重型野炮，比軍一門也沒有。原來打算在1926年以前把野戰集團軍的名額增加至15萬人，外加后備兵員7萬，并把堡壘部隊增加至13萬，但這一擴軍計劃，幾乎沒有付諸實施。1914年8月，野戰集團軍湊集了11.7萬人，沒有受過訓練的后備兵員也湊在內，剩下來的后備兵員全都被用來守衛堡壘了。民防人員也被強行編入現役，這些民防人員原來是頭戴高頂軍帽、身穿鮮綠制服、紳士氣派十足的憲兵隊。現在，民防的職務有許多改由童子軍來執行了。現役部隊對挖掘戰壕沒有實際經驗，同時也缺乏必需的工具。運輸設備不足，帳篷與野戰炊事房尚付闕如，炊具必須到鄉村和農莊里去征集，電話設備少得可憐。大軍出發，一片嘈雜喧鬧，猶如烏合之眾。

這支大軍也是乘激情之浪、駕幻想之霧進軍的。一夜之間，丘八都成為英雄，老百姓紛紛饗之以食物、熱吻和啤酒。不久，他們就解散隊列，漫步街頭，炫耀他們的軍服，或向友好致意。有些士兵的雙親隨軍出發，想看看戰爭究竟是什么樣的玩意兒。被征用的上等小轎車作為運輸工具，滿載面包和肉塊在路上飛馳。汽車過處，行人報以一片歡呼之聲。像佛蘭德的牛奶車一樣用狗拉的機槍，也受到人們的歡呼。

8月4日清晨，晴空萬里，靜謐寧安。布魯塞爾以東70英里的地方，第一批入侵者馮·馬維茨的騎兵部隊越過邊境進入比利時。蹄聲嗒嗒，沉著堅定，他們手持12英尺長的鋼頭旗桿矛，或在身上掛著軍刀、手槍和來復槍。公路兩旁的田野里正在收割的莊稼漢抬頭張望，在家里的村民從窗子后窺視。他們壓低嗓門說：“槍騎兵！”（Uhlans）這個奇怪的名字源于剽悍的韃靼騎手，念起來不禁使人想起發生在古代歐洲的蠻族入侵。德國人自命肩負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使命，即為其鄰邦傳播德國文化。然而，他們在執行這項使命的時候，往往熱衷使用恐嚇手段，正如德皇在使用“匈人”[[2]](#_2___Xiong_Ren___Huns__Gong_Yuan)這個詞時一樣。

作為入侵的前衛，騎兵的任務是偵察比軍和法軍的陣地，密切注視英軍的登陸行動，并掩護德國部隊的展開以防敵人進行相似的偵察。在第一天，那些打頭陣的騎兵中隊在汽車運來的步兵的支援下，打算在默茲河上各橋梁被毀之前攻占所有的渡河通道，同時奪取一些農莊和村落，以保證糧食與飼料的來源。瓦薩格（Warsage）是位于邊境上比利時一側的小城市。那天，當騎兵部隊在比利時的鵝卵石公路上策馬前進的時候，七十二歲的市長弗萊歇先生（M.Flechet）披上他的公職綬帶，站立在村前的廣場上。騎兵中隊長在市長跟前勒住坐騎，面帶笑容，有禮地遞上一份鉛印的宣言書，聲稱德國因為“迫不得已”而進入比利時，茲表示“遺憾”。盡管希望避免戰斗，宣言還是說“我們必須有一條暢通無阻的道路。任何破壞橋梁、隧道和鐵路的行動將被視作敵對行為”。從荷蘭到盧森堡之間的比利時邊境沿線各個鄉村的廣場上，槍騎兵都散發了這份宣言，并扯下村公所的比利時國旗，升起德意志帝國的黑鷹旗。他們滿懷信心地向前進軍，因為他們的司令曾向他們保證，比利時不會進行抵抗。

在他們后頭，通向列日的各條公路上擠滿一隊隊埃米希麾下的突擊部隊的步兵。在一片單調的土灰色之中，只有漆在鋼盔前面的各團的紅色番號鮮艷奪目。再后頭就是用馬挽的野戰炮。皮靴以及馬具上的新皮革嘎嘎作響。一批批騎自行車的士兵搶在前頭奪取十字路口和田莊，并架設電話線。一輛輛載著戴上單片眼鏡的參謀部官員的小轎車穿越人群，不斷地撳著喇叭。勤務兵坐在前頭，握槍在手，車尾捆扎著一些皮箱。每一個團配備有野戰炊事車，據說是模仿德皇在一次俄軍演習時看見過的一輛戰地廚房車制成的。行軍時炊事兵站在車上，在熊熊的爐火上不斷攪拌燉鍋。入侵者的配備如此盡善盡美，進軍步伐又如此整齊劃一，人們還以為他們是在閱兵行進。

每個士兵負重65磅：來復槍和彈藥、背包、水壺、備用皮靴、挖壕溝工具、小刀以及用皮帶束在外套上的各式各樣的器具和個人裝備。口袋里放著他本人的“應急口糧”——兩罐肉、兩罐蔬菜、兩包硬餅干、一包咖啡粉和一瓶威士忌。這瓶酒只有在得到上級批準后才能開封，而且每天檢查一次，看這瓶酒的所有者是否老實。另一個口袋里裝有針線、繃帶和橡皮膏；還有一個口袋裝有火柴、巧克力和煙草。軍官們的頸脖上都掛著望遠鏡和標明該團行軍路線的皮面地圖。這些地圖保證了德國軍官不致像有些英國軍官那樣抱怨戰斗總是發生在兩幅地圖交接的地方而使他們處于困境。德軍行軍時縱情高唱。他們高唱《德國至上》、《萊茵河的守衛》和《國王勝利萬歲》。他們在停止前進時，在宿營或狂飲時也是歌聲不絕。在經歷過此后三十天激烈戰斗而痛苦和恐懼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將記得這些無休止的、一再重復的男聲歌唱，是這次入侵中給人們帶來的最可怕的折磨。

馮·埃米希指揮的各旅德軍從東、南、北三個方面向列日進迫，它們到達默茲河時發覺該市上下游的橋梁已被破壞。它們試圖架設浮橋渡河時，比利時步兵便開火，德國人想不到竟真的打起來了，在真槍實彈中他們開始傷的傷，死的死。德軍數達六萬，比軍只有兩萬五千。黃昏降臨時，德軍在列日北面的維塞渡河成功。從南方發動攻擊的各旅被阻，中路突破默茲河向內彎曲處的各旅，已進抵筑壘地帶，還沒有到達河畔。

這一天，當德軍的皮靴、車輪和馬蹄蹂躪比利時農村，踐踏已成熟的莊稼時，狙擊越來越劇烈，德國士兵的苦惱也隨之加深，因為原來告訴他們的是比利時人不過是“巧克力士兵”而已。德軍遇到抵抗后，既弄得措手不及又感到氣惱萬分。第一次戰斗的洗禮使他們處于歇斯底里狀態，以至于一聽到有人發出“狙擊手！”的叫聲就緊張萬分。他們馬上疑神疑鬼，以為每一棟房屋和每一道樹籬后面都有憤怒的老百姓在向他們射擊。他們馬上呼喊“有人開槍！”，這句話成了以后德軍從維塞打到巴黎城門，一路上對各地老百姓恣意進行報復的信號。從戰爭的第一天起，記憶中1870年的可怕的“自由射手”的形象，經過他們的渲染夸張，開始具體化了。

著名的地下報紙《自由比利時人》（Le Libre Belge）隨后喚起的邊境城鎮居民的反抗精神，在戰爭打響的第一天早上尚未萌芽。他們的政府深知敵人的本性，業已把布告散發各地廣為張貼，命令居民將武器上繳各城鎮當局，并提出警告，一旦為德國人發現持有武器就有可能被處以死刑。布告告誡群眾，切勿攻擊或侮辱敵人，并應待在屋內，關上窗子，以免提供“任何引起流血、掠奪或屠殺無辜居民的鎮壓措施的口實”。受到如此嚴厲的告誡，在入侵者面前惶恐莫名的老百姓當然不敢妄圖以打兔子的獵槍來阻擋全副武裝的大軍。

不過，在入侵的第一天，德國人不僅槍殺平民，甚至槍殺比利時教士，這是蓄意制造的事端。8月6日，德國前首相的兄弟，擔任參與進攻列日之役的某騎兵師師長卡爾·烏爾里希·馮·比洛（Karl Ulrich von Bülow）少將[[3]](#_3__Qia_Li_Gu_La__Caligula__Luo)告訴一名袍澤說，他不贊成“前一天對一些比利時教士的處決”。所謂比利時教士參與密謀煽起游擊戰——這是在戰事發生后二十四小時之內無視文官政府的告誡組織起來的——之說，完全是個借口，是說給德國人聽的。這一批處決又是做給比利時人看的，就是要開殺戒，震懾人心，他們根據的便是卡利古拉[[4]](#_4__Qia_Li_Gu_La__Caligula__Luo)皇帝提出的理論：“Oderint dum metuant”（“不怕他們恨我，只要他們怕我”）。

也是在頭一天，德國人槍決了六名在瓦薩格抓的人質，并焚毀了巴蒂斯（Battice）這個村子，以示儆戒。“村子被付之一炬，只剩下一片斷垣殘壁，”幾天以后行軍路過該村的一名德國軍官這樣寫道，“通過沒有框架的窗戶可以看到室內燒剩的鐵床架和家具的殘骸。馬路上到處是家用器皿的碎片。除了在廢墟中覓食的貓犬之外，大火過后沒有留下任何生命的痕跡。市集廣場上有一座教堂，屋頂和塔尖都已不知去向。”他聽說在另外一處曾有三個德國輕騎兵遭到射擊，于是“整個村子成了一片火海，牲口棚里的牛群厲聲嘶叫，被燒得半死的小雞狂奔亂竄，一堵墻前躺著兩具身穿農民長罩衫的尸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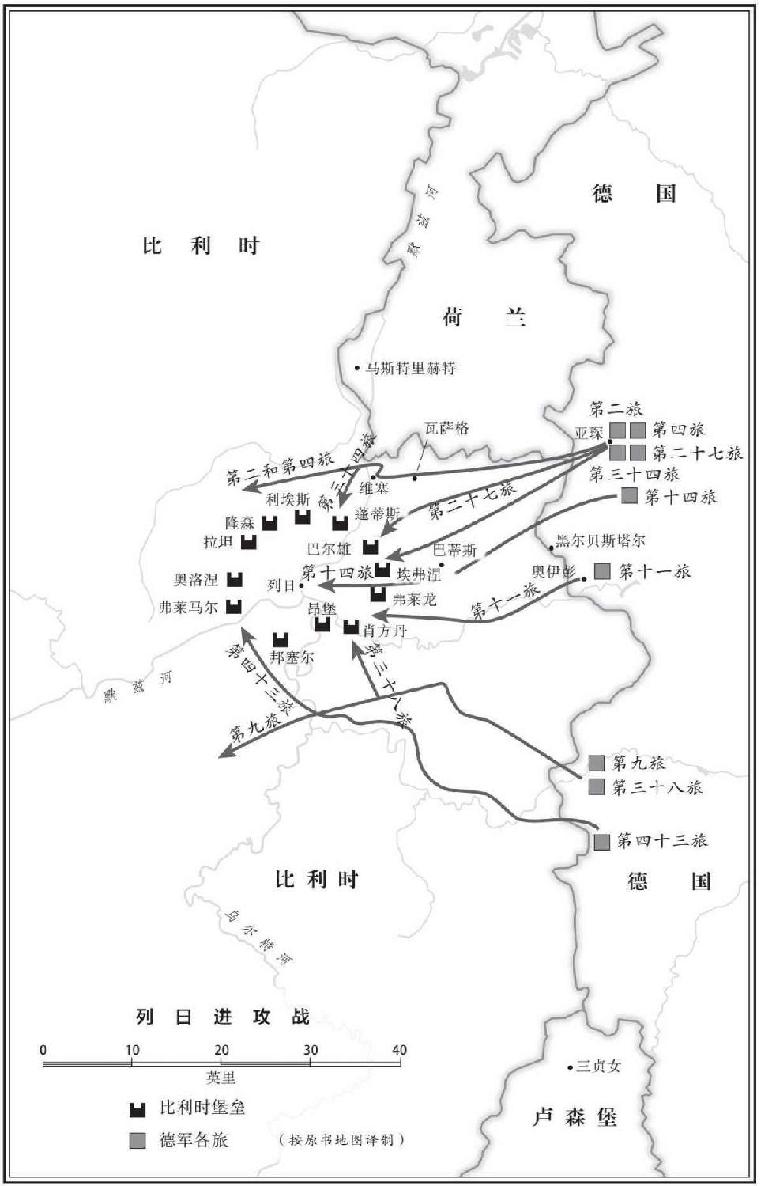
“我們在比利時的進軍肯定是殘酷的，”8月5日毛奇在致康拉德的信中這樣寫道，“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場求生存的搏斗，任何妨礙我們前進的人必須承擔一切由此產生的后果。”他沒有考慮到德國對此必須承擔的后果。但是德國要在比利時遭受當頭一棒的過程已經開始。

8月5日，埃米希的各旅兵力開始攻擊列日東端的四座堡壘。德軍先以野戰炮進行連續轟擊，接著是步兵沖擊。落在堡壘上的輕磅炮彈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比利時人對德軍傾瀉的炮彈卻消滅了他們位于前列的士兵。一連一連的德軍繼續投入戰斗，沖向各堡壘之間比軍壕溝尚未竣工的那些空隙地帶。在一些地點，德軍突破比軍陣地后強行爬上比軍大炮無法俯射的斜坡，但被堡壘的機槍火力掃倒，尸體山積，高近一米。在巴爾雄堡壘（Fort Barchon），比軍看到德軍陣線開始動搖，便趁機出擊，以刺刀擊退了敵人。德軍一再強攻，不惜傷亡，因為他們知道，有大量后備人員足以補充損失。“他們并不試圖展開隊形，”一名比利時軍官寫道，“而是一排排地并且幾乎是肩并肩地沖過來，直到中彈倒地。倒下去的傷亡人員堆疊成一堵可怕的街壘，快要遮住我們的槍口，為我們帶來麻煩。街壘越來越高，我們實在不知道究竟是隔著它射擊好，還是走出去用雙手開拓出一些通道……可是你相信嗎？——這堵用尸體和傷員砌成的名副其實的墻垛卻幫助了那些令人驚嘆的德國人，使他們得以越爬越近，終于爬上碉堡前的斜坡。但是他們最多只能走到一半，因為我們的機槍和步槍的火力把他們擊退了。當然，我們也有損失，但和敵人蒙受的大量傷亡比起來是微不足道的。”

列日之戰爆發后第二天，交戰國不計傷亡的情況就開始了。這種情況在以后時日里越來越嚴重，直至把士兵的生命視若草芥。索姆河（Somme）一戰，雙方傷亡多達數十萬，而凡爾登一役傷亡竟在百萬人以上。德軍遭受第一次挫折后惱羞成怒，不顧一切地投入大量兵力以對付堡壘，需要多少就投入多少，以便按期攻克目標。

8月5日夜間，埃米希指揮的各旅德軍分別在他們進軍的各條公路上再度集結，準備在午夜時分發動一次新的攻勢。隨軍出發的魯登道夫將軍發覺他所在的部隊，即位于德軍中路的第十四旅的士兵情緒沮喪，“緊張不安”。前頭便是堡壘的炮群，令人望而生畏。不少軍官表示懷疑，步兵沖擊是否敵得過這些大炮的火力。謠傳那天更早一些時候所派出的一支執行偵察任務的自行車連隊已被“全殲”。一支在黑夜中迷途的縱隊碰上了另一支縱隊，兩隊人馬糾纏在一起，不得不在一片混亂之中停止前進。魯登道夫策馬前去查明引起麻煩的原因，他發覺第十四旅旅長馮·武索（von Wussow）將軍的勤務兵牽著將軍的坐騎，馬鞍空著，原來馮·武索已被機槍擊斃于前面路上。魯登道夫當機立斷，接管了該旅的指揮，并命令發動攻擊，以期突破弗勒龍（Fleron）與埃弗涅（d’Evegenée）兩堡壘之間的空隙地帶。在前進時，有的士兵中彈倒地，這是魯登道夫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擊中人體的子彈發出的那種奇特的砰砰聲”。

由于戰火中的機緣湊巧，不到兩英里以外的弗勒龍堡壘突然停止炮擊。在發生逐屋戰斗的那個村子里，魯登道夫調來一門野戰榴彈炮，“向房屋”頻頻炮擊，不久就打開一條通道。到了6日下午2時，第十四旅已經突破堡壘圈，進抵默茲河右岸一些制高點。從那里，他們可以遙望對岸的列日及其城堡。城堡是座威嚴但已廢棄不用的堡壘。在這里，他們與馮·埃米希將軍會師，并等候其他各旅部隊的到來。他們在那兒等候多時，眺望通向南北的幾條公路，不見友軍影蹤，越來越感到心焦。第十四旅發覺自己是突入堡壘圈內的一支孤軍。它的野戰炮都對準城堡，開始射擊，既作為發向其他各旅的信號，也用以“恫嚇要塞司令和當地居民”。



德國人因為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和人力去和比利時人作戰而感到惱火，他們認為，如果比利時人具有一般常識，就早該讓他們通過。所以，德國人在整個8月份始終擺脫不了“威嚇”比利時人使他們放棄愚蠢而無益的抵抗的想法。前一天，德軍派出前駐布魯塞爾武官打著一面休戰旗幟去跟他原來相識的勒芒將軍接觸，試圖說服他放下武器，如果不成的話，就威脅他投降。使者告訴勒芒，如果他不讓德軍通過，齊柏林飛艇（Zeppelins）便將毀掉列日。會談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8月6日，齊柏林L-Z飛艇按時從科隆起飛，對這個城市進行了轟炸，一共投下了13顆炸彈，炸死9名市民，給20世紀的這一做法開了頭。

轟炸過后，魯登道夫派出另一名使者，打著另一面休戰旗幟來勸降。同樣，這個使者也未能說服勒芒。接著，德國人還耍了個陰謀詭計。為了綁架或殺害這個比軍司令，德軍派出由6名軍官和30名士兵組成的一支分遣隊，穿上沒有標志的像英軍穿的那種制服，乘坐幾輛汽車，開到勒芒在圣福瓦路（Rue Sainte-Foi）的司令部，要求會見將軍。將軍的副官馬爾尚（Marchand）上校走到門口，大聲叫喊：“他們不是英國人！是德國佬！”他當即中彈倒地。上校的袍澤們立即為他報了仇。根據1914年那種生動而如實的報道，這些袍澤“為這種公然破壞戰爭文明準則的卑怯行徑氣得發狂，沒有饒恕敵人，把他們全都殺了”。在一片混亂之中，勒芒將軍逃到城西的隆森堡壘（Fort Loncin），在那里繼續指揮防守。

勒芒認識到，既然德軍一個旅已經插入堡壘之間的空隙地帶，他已沒有希望堅守列日市。如果從南北兩方面攻來的各旅德軍也取得突破，列日勢將陷入包圍，第三師將被孤立，不能動彈，最終難逃陷于絕境而被殲滅的厄運。勒芒的情報處已經辨認出進攻的部隊隸屬于四個不同的軍，據此看來，埃米希的總兵力相當于八個師，而勒芒僅有一個師。事實上，埃米希的部隊并非按軍編制組成，而是一些互不關聯的獨立旅，當時的實力，加上臨時湊合的援軍，共約五個師。孤立無援的第三師，力不足以保存自己或守住列日。勒芒將軍知道國王堅定不移的宗旨在于保存野戰集團軍的建制和實力并使之與安特衛普保持聯系，而不管其他地區發生什么情況。因此，他于8月6日晨命令第三師撤出列日，與其余部隊在盧萬前沿會合。這個行動意味著列日市，盡管不包括它的堡壘群，勢將陷落。但即使是為了列日，也不能犧牲一個師，因為比利時的獨立比列日更重要。除非國王仍然統率一支部隊繼續留守在他自己國土上的某個角落，否則他就不僅要任憑敵人的擺布，而且要任憑盟友的擺布。

8月6日，比軍在前一天擊退德軍的消息傳來，布魯塞爾一片歡騰，如醉似癡。報紙號外歡呼“比利時人的偉大勝利！”。心頭充滿喜悅的人們涌進咖啡館，互相祝賀，聲稱要報仇雪恥，整夜狂歡。次日早晨，他們爭相傳誦比利時的公報。公報說，12.5萬德軍“完全不起任何作用，發動攻擊的三個軍被切成數塊，已成強弩之末”。盟邦各報也感染了這種歡樂情緒，此唱彼和，紛紛報道“德軍全線潰退”，若干團已放下武器，大批被俘，傷亡兩萬，守軍在各處戰果輝煌，“入寇已被有效遏制”，他們的進軍已是“寸步不前”。對于比利時第三師的撤退只是一筆帶過，在如此大好形勢之下為何撤出列日，則未見有任何解釋。

設在盧萬老市政廳的比軍司令部里，信心之高，就好像比利時擁有34個師、德軍只有6個師而不是恰恰相反似的。總參謀部里的急進派“正忙于提出各種異想天開的計劃，要立即發動一次攻勢”。

國王立即否決了這個攻勢。他從敵軍攻擊列日使用的實力，以及新近收到的一些有關入寇德軍現經查明的五個軍的報告中，已看出施利芬包抄戰略的輪廓。如果法英援軍能及時到達，他仍然有機會在安特衛普和那慕爾之間的熱特河畔擋住德軍。他已兩次向普恩加萊總統發出緊急呼吁。即使在目前這個階段，他和比利時的每個人一樣，仍然期望他的盟友會出兵比利時和他會師。“法國人在哪兒？英國人在哪兒？”人們到處都在相互打聽。在一個村子里，一個比利時婦女向一個身穿外國軍服的士兵獻了一束以英國國旗包扎的鮮花。她以為那個人穿著的便是英國的卡其軍裝。這個士兵感到有點困窘，當即聲明他是德國兵。

在法國，普恩加萊和那個出于一時沖動，曾沖口建議派五個軍去援助比利時人的梅西米都無能為力，因為霞飛一聲不吭，頑固地拒絕改變他的部署計劃，即使動用一個旅也不同意。由索爾代（Sordet）將軍指揮的三個法國騎兵師將于8月6日進入比利時，偵察默茲河東岸的德軍兵力，但霞飛聲稱，只有在英國部隊不來的情況下他才愿意考慮延伸他的左翼。8月5日深夜，倫敦傳來消息，說作戰委員會在舉行了一整天會議后決定派遣遠征軍，由四個師加上騎兵組成，而不是原定的六個師。盡管這個決定使人失望，但霞飛還是不愿抽調任何兵力去左翼補充英國兵力的不足。他要把一切能抓到手的力量都抓在手里，以便法軍在中路發動攻勢，實行突破。他派往比利時的，除騎兵外，只有一名參謀布雷卡爾（Brécard）上校。他隨身帶了致阿爾貝國王的一封信，信中建議比軍推遲決戰，并退至那慕爾與法軍會合，一俟法軍集結完畢，即發動聯合攻勢。霞飛說，法軍將派四個師去那慕爾，但要在8月15日才能到達。

按照霞飛的想法，為了一條共同戰線，比軍應把純屬比利時一國的利益擱置一邊，而作為法軍的一翼采取符合法國戰略的行動。至于阿爾貝國王，由于清楚地意識到德軍右翼的威脅，則認為如果他讓比軍在那慕爾一線進行抵抗，比軍就有可能被前來的德軍切斷它與安特衛普基地之間的聯系而陷于孤立，最終被迫退出比利時而進入法境。阿爾貝國王一心一意要讓比軍留在比利時領土上，而將共同戰略置于次要地位。因此，他決心要守住比軍退往安特衛普的通道。從純軍事觀點出發，應在那慕爾一線組織抵抗；但從歷史和民族的觀點出發，則應退往安特衛普，即使存在著部隊被圍困在那兒，以后無法對整個戰爭施加直接影響的風險，也應如此。

如果萬不得已，比軍應退往的是安特衛普，而非那慕爾，國王是這樣告訴布雷卡爾上校的。布雷卡爾深感失望，他通知霞飛，不能指望比利時人和法國人一起發動聯合攻勢。

8月7日，對第十七號計劃向不知情，而此刻又礙于計劃規定的要求而未能馳援比利時的法國政府，將法國榮譽軍團的一級勛章授予列日市，并將軍功勛章授予阿爾貝國王。這種姿態，在當時的情況下已不適當，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世人對比利時奮起抗擊入侵之敵的敬佩。法國國民議會議長宣稱，比利時不僅是在“保衛歐洲的獨立；它是為榮譽而戰的戰士”。倫敦《泰晤士報》宣稱，它打破了德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因而“流芳百世”。

正當稱頌之詞紛至沓來的時刻，列日市人民在地下室度過了第一個夜晚，這也是20世紀的歐洲人將要在地下室里度過無數個漫長黑夜的第一夜。經歷了齊柏林飛艇空襲恐怖的一天之后，列日城徹夜受到炮轟，炮彈爆炸聲不絕，魯登道夫的野戰炮企圖一舉懾服該城，使之屈膝投降。這個方法，正如1918年德國大貝爾塔大炮（Big Berthas）對巴黎進行長距離炮擊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空軍和V-2飛彈轟炸倫敦那樣，毫無效果。

在稠密的炮火初步削弱守軍抵抗力之后，埃米希和魯登道夫不待其他各旅到來，便決定進入列日。由于比軍第三師業已撤退，第十四旅沒有遇到抵抗就越過了兩座尚未被破壞的橋梁。魯登道夫以為奉命奪取城堡的前衛部隊已完成任務，于是帶領一名副官乘坐一輛參謀部的汽車駛上那條陡峭迂回的公路。汽車到達城堡的場院后，他發覺前衛部隊尚未來到，城堡尚未為德軍占領。不管怎樣，他毫不猶豫地“猛敲大門”。大門開啟后，他從留駐城堡里的比利時士兵手中把城堡接收過來。魯登道夫那年四十九歲，比起1793年的拿破侖年長一倍，列日成為他的土倫。

與此同時，在市區里，埃米希將軍找不到勒芒，便把市長逮捕了，并且通知他說，除非各堡壘的守軍放下武器，否則德軍將炮轟列日，并付之一炬；同時表示將給他一張通行證，讓他去找勒芒將軍或國王，勸他們投降。他拒不從命，于是成了一名階下囚。黃昏時分，另外三個旅德軍突破堡壘圈，與第十四旅在市內會師。

那天傍晚6時，一名摩托運輸兵的軍官駕車飛馳，闖過亞琛的街道，把驚人的消息送到第二集團軍司令部：埃米希將軍已進入列日，正與該市市長進行談判。在一片歡呼和“萬歲”聲中，司令部收聽到埃米希發給他妻子的電報說：“好哇！已進入列日！”晚上8時，一名聯絡官帶來了埃米希的口信，他說盡管沒有俘獲勒芒，主教和市長已成階下囚，城堡已投降，比軍已撤出列日市，但關于各個堡壘的情況，他沒有得到任何消息。

在柏林——部隊集結時期結束以前，是德軍統帥部的所在地——德皇欣喜若狂。起初，當比軍顯得大有不惜一戰的氣概時，德皇曾痛責過毛奇：“瞧你怎么搞的，無緣無故把英國人惹來打我！”可是，列日陷落的消息傳來后，他把毛奇稱為他的“最親愛的愷撒大將”，而且，毛奇還寫道，“他把我狂吻了一陣”。可是，英國人還是使德皇提心吊膽。8月10日，美國大使杰勒德（Gerard）先生前來轉達威爾遜總統愿意進行調解的建議時，發現德皇“神情沮喪”。他坐在御苑里一頂陽傘下，綠色的鐵桌上凌亂地放著一些報紙和電報，兩條德國種小獵狗睡在他腳旁。皇帝哀嘆道：“英國人使整個局勢改變了——一個固執的民族——他們要把戰爭打下去。戰爭不會很快結束的。”

占領列日后的第二天，魯登道夫離開該市報告戰況。市郊各堡壘尚在比軍手中，一個也未攻克的嚴酷事實，到此時方才為人所知。魯登道夫堅決要求馬上把攻城大炮調來投入戰斗；看來比利時人還無意投降。按預定計劃，克盧克的第一集團軍原定于10日首先出發，向前推進，現在不得不延遲至13日。

與此同時，那些形狀駭人、顏色烏黑、笨頭笨腦的巨型攻城迫擊炮仍在埃森不能動彈。在它們四周，還正在忙于調集摩托運輸車輛和受過訓練的炮兵。到8月9日，兩門公路型攻城迫擊炮已準備完畢，當天晚上裝上貨車，用鐵路盡可能運送到接近目的地的地點，以減少它們的輪胎磨損。火車于10日離開埃森，黃昏時到達比利時；可是，在晚上11時到達列日以東20英里的黑爾貝斯塔爾（Herbesthal）后便停了下來，因為鐵路隧道被比利時人炸毀，道路被阻。費盡了氣力還是無法打通，結果只好把巨炮從火車上卸下，取道公路，繼續前進。雖然只要再走11英里便可把堡壘地帶置于射程之內，可是一再發生的故障使它無法前進。馬達失靈，馬具折斷，道路阻塞，于是不得不硬把路過的部隊拉來拖曳這兩尊巨炮。跟這兩個不聲不響的怪物進行的進展遲緩的搏斗持續了整整一天。

當攻城炮尚在途中，德國政府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試圖說服比利時人，在他們國土上讓出一條通道，以便過境。8月9日，杰勒德先生受托向他在布魯塞爾的同僚轉送一份遞交給比利時政府的備忘錄。“既然比利時部隊不顧力量懸殊，對優勢兵力進行了英勇抗擊，從而保持了它的榮譽”，備忘錄寫道，德國政府“懇求”比利時國王陛下和他的政府別讓比利時“繼續忍受戰爭的恐怖”。如果德國部隊能獲得一條自由通過比利時的走廊，德國準備與比利時締結任何有關協定，并“莊嚴保證”它絕無意侵占比利時領土，一俟戰爭形勢發展許可，德國部隊將撤出該國領土。美國駐布魯塞爾和海牙的兩位公使都婉拒轉達這個建議，最終通過荷蘭政府的協助，該份備忘錄在8月12日送達阿爾貝國王手中。國王表示拒絕。

鑒于他的國家面臨如此嚴重威脅，他的臨危不懼，即使在他的盟國眼中，也是難以完全相信的。沒有人想到比利時竟會表現得如此英勇不屈。戰后，比王在答謝一位法國政治家對他的行動的贊揚時說：“是的，我們那時走投無路，不得不如此。”1914年，法國人是有他們自己的顧慮的。8月8日，法國政府派遣外交部副部長貝特洛（Berthelot）先生就有關比利時國王即將與德國人安排停火的傳聞會見國王。貝特洛的差使是不愉快的。他必須向國王解釋清楚，法國將不遺余力協助比利時，但只能以不打亂法國自己的行動計劃為限。阿爾貝再一次力圖向法國人表明德軍強大的右翼有可能通過佛蘭德進逼，并再次提出警告，比軍可能被迫撤至安特衛普。一俟“盟軍足夠接近”的時候，他巧妙地補充說，比軍將重啟攻勢。

對外部世界來說，攻擊列日的德國部隊似乎“已遭到痛擊”，高踞權威頂峰的《泰晤士報》軍事記者就是那么宣稱的。征諸當時情況，此說與事實相去不遠。自吹自擂的德軍曾認為它能輕而易舉地擊敗“在做夢的綿羊”，而事實上卻未能一舉攻下比利時人的堡壘群。德軍在8月9日以后就停止前進，等候增援——不過它等待的不是援軍而是攻城炮。

在法國，霞飛將軍和他的幕僚仍舊跟往常一樣堅決不考慮佛蘭德，而把思想狂熱地集中在萊茵河。法國五個集團軍的實力和德國部署在西線的70個師相仿。它們的部署按番號順序，由第一集團軍居右依次到第五集團軍居左，并以凡爾登到圖勒的防線為界分別集結成兩支大軍，在人數上和德軍以梅斯至蒂永維爾一線為分界線的兩個集團的比例相埒。在阿爾薩斯和洛林，第一、第二集團軍面對德國的第七、第六集團軍，組成法軍右翼，其任務為發動強力攻勢，把與之對峙的德軍趕回萊茵河一線，同時在德軍左翼與中路之間打入一枚堅實的楔子。

駐守在右翼末端的是一支特種攻擊部隊，其任務與埃米希部隊在列日的任務相似，要首先突入阿爾薩斯。它由第七軍和第八騎兵師組成，不受第一集團軍的節制，其任務是解放米盧斯（Mulhouse）和科爾馬爾，并據守德國、阿爾薩斯、瑞士交界處的萊茵河沿岸。

與這支部隊為鄰的是由一表人才的迪巴伊將軍指揮的第一集團軍。據說這位將軍心目中不存在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他有著與無限精力相結合的百折不撓的意志。出于某種難以捉摸的軍中政治原因，他和據守在他左側的德卡斯泰爾諾將軍的關系并不太好。這時德卡斯泰爾諾已離開總參謀部，任第二集團軍司令，率軍據守南錫周圍至關重要的防線。

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團軍集結在凡爾登的另一面，準備按照第十七號計劃的部署，發動突破德軍中路的大攻勢。他們的兵力從凡爾登展開至伊爾松。據守開口的第五集團軍面向東北方，準備發動通過阿登山區的攻勢，而不是向北迎擊南下的德軍右翼。在第五集團軍左方的陣地，以莫伯日要塞為中心，指望由英軍駐守。該要塞一度曾堅實牢固，以后卻未被好好照管；而即將到達的英軍，現在獲悉其人數將低于原定計劃。霞飛和他的總參謀部正全神貫注于其他戰場，因此對這里的缺陷和兵力不足情況并不過分擔心。但第五集團軍司令朗勒扎克將軍卻為之深感不安。

在德軍右翼的攻擊面前，朗勒扎克勢將首當其沖，因此對他眼前所處地位的危險最為敏感。他的前任，即第五集團軍的前司令加利埃尼，曾多次巡視過這里的地形，并曾向總參謀部建議把莫伯日要塞現代化起來，但未被采納，對此他早已悶悶不樂。加利埃尼在1914年2月到達服役年限時，霞飛任命“真正的雄獅”朗勒扎克接任他的職務。他在智力方面的天賦得到霞飛的青睞，因而在1911年他便是霞飛屬意的副總參謀長的三個候選人之一。朗勒扎克具有“敏銳的智力”，因而被認為是總參謀部的一員將星。正因為如此，他好挖苦人的脾氣以及在講演中為追求清晰、鮮明和邏輯性而容易出現暴躁態度和出言不遜的情形也就得到了原諒。年紀六十又二，他和霞飛、德卡斯泰爾諾和波將軍一樣，完全符合那種大胡子和大腹便便的法國將領的模樣。

1914年5月，五個集團軍的將領分別收到第十七號計劃中與自己有關的部分。朗勒扎克隨即指出了如果德軍在默茲河西岸大舉南下，他暴露的翼側將面臨險境。他的反對意見被置之不顧。總參謀部的基本看法是，德軍右翼越強，“對我方就越是有利”。動員前夕，朗勒扎克致函霞飛將軍，表達了他的反對意見。第十七號計劃在大戰結束后引起了大量的批評和爭論，有關文件多如山積，這封信給拿了出來，成了主要文件。朗勒扎克的一個袍澤指出，他這封信的筆調之大膽，不像是在對一份權威性的計劃提出異議，而像是一個教授在評論其學生的論文。信中指出，為第五集團軍計劃的攻勢，其前提依據是德國人將通過色當前來。而事實上，更可能的是他們將取道更北一些的那慕爾、迪南（Dinant）和日韋。“很顯然，”這位教授解釋道，“一旦第五集團軍投入指向訥沙托（Neufchâteau，在阿登山區）的攻勢后，它將無法回避德軍在更北一些地方發動的攻擊。”

實際上，這是個關鍵問題。然而，朗勒扎克卻好像要為自己留有余地，而在信中加了一句“這不過是作為一個建議而提出的”，以免自己的論點顯得過于鋒芒畢露。信在8月1日即動員日送到霞飛手中。霞飛認為這封信“完全不合時宜”；由于“整天忙于處理要公”，他沒有作復。與此同時，他對第三集團軍司令呂夫（Ruffey）將軍前來表示的他對德軍可能“長驅直入穿過比利時”的憂慮，也置若罔聞。霞飛只以其特有的簡潔的語言回答了一聲：“你錯了。”在他心目中，總司令只要發布命令，不必進行解釋；將軍只要執行命令，不必思考。將軍在收到命令后應該心無旁騖地執行，要知道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8月3日，即德國宣戰之日，將軍們應霞飛之召前來參加會議，他們希望最終將能聆聽霞飛對第十七號計劃以及他們受命要付諸實施的戰略作一通盤的說明。他們的希望落空了。霞飛沉默不語，只是慈祥地靜待別人發言。最后，迪巴伊打破沉默，他說計劃中他的部隊要執行的進攻任務需要增援，但增援至今尚無著落。霞飛以一句他所常用的含義隱晦的字句作答：“那可能是你的計劃，而不是我的。”沒有人聽懂這句話，迪巴伊也以為自己的話被誤解了，因此再說了一遍。霞飛“露出他那慣常的天使般的笑容”，逐字重復了一遍：“那可能是你的計劃，而不是我的。”事實是，對霞飛來說，在大軍鏖戰的一片混沌之中，起作用的不是什么計劃，而是用以執行這個計劃的干勁和激情。他深信，勝利并非來自最理想的計劃，而是來自最堅強的意志和最堅定的信心；這兩個條件，他毫不懷疑，他都具備無缺。

8月4日，他設立了名為法軍總司令部的總參謀部，地點在馬恩河畔的維特里——勒弗朗索瓦（Vitry-le-François），約處巴黎和南錫的正中。在那里，他和五個集團軍的司令部的距離大致相等，即相距80到90英里。毛奇任總司令的時間不長，也從未親臨前線和視察過各個野戰集團軍的司令部。霞飛則不同，他和他的司令官之間經常見面，保持接觸。他總是安詳地坐在汽車的后座上，由專任的私人司機、汽車大獎賽三界冠軍喬治·布約（Georges Bouillot）駕駛，以每小時70英里的速度行駛。人們認為，如果是德國將領，他們拿到一份完善的計劃后，在執行時是不需要上級經常指點的。而法國將領，如福煦所說那樣，則是要思考的。但霞飛總是懷疑他的下級神經不健全或有其他缺陷，因而熱衷于把他們置于嚴密的監督之下。1913年的演習結束后，他命令五名將軍退出現役。這個轟動一時的事件使法國每一支駐軍都不寒而栗。這個行動是史無前例的。8月份，在真刀真槍的可怕的考驗下，霞飛一看到那些將軍表現出他認為是無能或“沖動”不足的跡象，便會像揚谷那樣把他們拋棄掉。

在馬恩河畔的維特里（Vitry），斗志昂揚。8月的驕陽照耀著靜靜的、兩旁綠樹成蔭的馬恩河。陽光中的河水碧波粼粼，金光閃閃。在總司令部接管的校園里，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把兩個部門分隔開來：一個是第三處（作戰），它占用了教室；另一個是第二處（情報），它占用了體育館，館內原有設備靠墻堆放，吊環則系在天花板上。第二處整天搜集情報，審訊戰俘，破譯文件，拼集成深有見地的推測并制成報告分送各兄弟單位。這些報告都一貫指出，德軍在默茲河西岸活動頻繁。從早到晚，第三處忙于審閱、傳閱報告，提出批評，展開爭論。如果這些報告的內容所得結論是要修改法國的攻勢計劃的話，那么第三處就干脆不予置信。

每天上午8時，霞飛主持部門首腦工作會議。他以主宰者的身份出現，正襟危坐，威嚴莊重。局外人看見他默不作聲，而且桌上空無一物，不免會以為他不過是個傀儡，實權操在他的親信手中。事實絕非如此。他桌上不放紙張文件，墻上不掛地圖。他從不動筆，絕少開口，一切計劃都是別人制訂的。福煦說：“他權衡得失，然后決定取舍。”站在他面前而不打哆嗦的人是少見的。和他一起進餐的人如果遲到五分鐘，就要碰上猶如雷霆萬鈞的兩道緊蹙的眉頭，并受到冷落，直至用餐完畢。霞飛用膳時一言不發，像美食家那樣全神貫注于菜肴。他一直抱怨，說他的幕僚把他蒙在鼓中。有位軍官提起最新出版的《畫報》（l’Illustration）上登載的一篇文章，霞飛因為還沒有看到就怒沖沖地說道：“你瞧，他們隱瞞一切，不讓我知道。”他慣常邊揉額角，邊喃喃自語：“可憐的霞飛啊！”他的幕僚漸漸懂得，這個動作就是表示他要拒絕別人向他提出的請求。如果別人直截了當地要求他改變主意，他就生氣。和塔列朗（Talleyrand）一樣，他不贊成過分的熱情。他缺乏朗勒扎克那種追根求源的智力，也缺少福煦那種創新求是的智力；由于氣質使然，他傾向于依仗他親手選拔的幕僚。他始終是主宰一切的首腦，幾乎是個暴君。他珍惜自己的權威，哪怕是小小的有損于他的權威的事情，都會惹他發火。那時，普恩加萊已經指定，一旦遇到意外情況，加利埃尼將為霞飛的接班人。當有人建議，應把加利埃尼安頓在總司令部時，霞飛無論如何都不同意，因為他擔心跟他的老上司在一起會有失體面。“他很難安置，”霞飛私下告訴梅西米，“我一直在他指揮下工作，他總是惹我生氣。”考慮到日后在馬恩河戰役前夕左右法國命運的重要關頭，霞飛和加利埃尼之間的私人關系所起的作用，這個表白多少有點耐人尋味。由于霞飛拒絕讓他在總司令部占一席之地，加利埃尼便一直待在巴黎，無所事事。

法國的三色旗將在阿爾薩斯重新飄揚的那個盼望已久的時刻終于來到。擔任掩護的部隊，隱蔽在孚日山脈茂密的松樹叢中，因為一切都已準備就緒而焦急。人們都還記得這里起伏的山巒以及群山中的湖泊和瀑布，松樹叢中芳香的蕨類植物散發出陣陣潮濕的沁人心脾的氣息。山巔上放牧牛群的草地與片片森林互相交錯，遠處是阿爾薩斯的圓形山峰——孚日山脈的最高峰，它那暗淡的紫色的輪廓隱沒在云霧之中。冒險攀登頂峰的巡邏隊可以俯視失地，紅瓦村舍與灰色的教堂尖頂盡收眼底。一衣帶水的摩澤爾河（Moselle）在閃閃發光，近水源處，侵蝕尚少的河床相當狹窄，人們可以涉水而過。長著馬鈴薯白花的方塊田與長著紅花菜豆以及一行行灰、青、紫三色甘藍的狹長菜畦相間。田野里，矮胖的金字塔似的干草堆星羅棋布，像是畫家的丹青點化。大地正處在它最豐腴的時刻。陽光普照，江山如此多嬌，前所未有，確實值得人們為之戰斗。難怪《畫報》在戰時出版的第一期中把法蘭西表現為一個英俊的法國兵，他把象征著阿爾薩斯的年輕貌美的姑娘抱了起來，狂熱地摟在懷中。

陸軍部已印好一份告市民書，準備在收復的各市鎮張貼。空中偵察表明，該地區的防務薄弱。在第七軍司令博諾（Bonneau）將軍眼中似乎是太薄弱了，他擔心他正在“落入圈套”。8月6日傍晚，他派了一名副官去向迪巴伊將軍報告說，他認為米盧斯行動“既脆弱又危險”，并對他的右翼和后方感到憂慮。在8月3日的將軍會議上，迪巴伊將軍表達了同樣的關心，并曾就此問題與總司令部磋商，總司令部認為各種疑慮都反映了進攻精神的衰退。一個司令官在作戰行動開始時表現出來的疑慮，不論它是多么的健全合理，往往會成為進行退卻的一條理由。在法國軍事學說中，爭取主動要比對敵軍實力進行慎重估計更為重要。成功取決于司令的戰斗素質，在霞飛和他的幕僚眼中，如果在行動伊始就允許部屬小心翼翼或舉棋不定，其后果必然是災難性的。總司令部堅持盡早在阿爾薩斯發動攻勢。迪巴伊接受命令，給博諾將軍掛了電話，問他是否“已準備好了”，對方作了肯定回答，他便下令翌晨開始攻擊。

8月7日凌晨5時，亦即魯登道夫帶領他的一旅德軍開進列日前幾小時，博諾的第七軍從孚日山峰上傾瀉而下，越過邊界時舉槍致敬，突然猛襲阿爾特基什（Altkirch），進行傳統的白刃戰。這個城鎮位于通向米盧斯的大道上，居民約4000人。該軍奮戰6小時，以傷亡100人的代價，攻占了阿爾特基什。在這次大戰中，這雖非最后一次白刃戰，但如此出色的白刃戰以后就不多見了。不久以后，泥濘的壕溝成了這次大戰的象征。這次拼刺刀完全符合1913年操典所規定的最優良的風格和精神，看來它體現了視死如歸的勇敢精神，達到了光榮的頂峰。

據法方公報報道，“這是個難以描述的激動人心的時刻”。狂歡的人們把邊界上的一些界柱拔出，扛在肩上，穿過市鎮，歡慶勝利。然而，博諾將軍還是放心不下，他沒有乘勝追擊直取米盧斯。對這種遲疑不決停滯不前的情況，總司令部失去了耐心，它在次日早晨發出一道緊急命令，飭令攻占米盧斯，并在當天破壞萊茵河上的全部橋梁。8月8日，第七軍在德軍最后一批撤出米盧斯前往保衛更北面的邊境后約一小時，兵不血刃地進駐了該地。

街道上法軍騎兵疾馳而過。他們頭戴黑色馬鬃羽飾，護胸鐵甲閃閃發光。這支從天而降的騎兵幾乎把老百姓嚇呆了。他們起先呆若木雞，站立在路邊，低聲啜泣，然后才逐漸破涕為笑。法軍在大廣場上舉行了歷時兩小時的盛大閱兵典禮。軍樂隊高奏《馬賽曲》和《桑布爾河和默茲河進行曲》。大炮上掛滿紅、白、藍三色的花朵，墻上張貼了霞飛將軍發布的公告，把他的士兵吹噓為“完成復仇雪恥大業的先驅……他們的旗幟上閃耀著‘權利和自由’的富有魅力的字眼”。人們爭先恐后把巧克力、糕點和裝滿煙絲的煙斗塞給士兵。家家戶戶窗口都有人朝外揮動旗幟和手帕，甚至屋頂上也站滿了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表示歡迎。居民中有許多德國人，他們自1870年以來就在這里定居。一名軍官策騎通過人群時看見其中有人“咬著煙斗，面色陰沉，好像在點我們的人數”——他們的確在點人數，天黑以后，他們便趕緊出去匯報法軍師旅的實力。

正當法軍忙于占領該市時，從斯特拉斯堡倉促調來的德軍增援部隊已在該市四周展開。博諾將軍一開始就缺乏取勝決心，為了避免陷入包圍，他竭盡所能進行了相應部署。8月9日晨戰斗打響后，他在塞爾奈（Cernay）的左翼整日頑強奮戰，而他的右翼卻固守在一段未受威脅的戰線上，沒有及時抽調過來。最后，總司令部終于認識到有必要派出援軍，而這正是迪巴伊一開始所堅決要求的。一個后備師奉命開赴前線，但在這個階段，如果要鞏固前方陣地則需要兩個師的兵力。戰斗持續了二十四小時，雙方互有進退，到8月10日晨7時，法軍受挫后退，為了免遭包圍，最后撤出了陣地。

對法國部隊來說，在各種公報和公告相繼使用了如此振奮人心的措辭之后，在復仇雪恥的宿愿被壓抑了四十四年之后，米盧斯的喪失，無疑是丟臉的；而對該地居民來說，則更是殘酷不過的，他們現在只能聽憑德國人恣意報復了。對法軍表示過熱忱歡迎的法國人現在受到同市鎮的德裔居民的密告，遭到不幸的下場。第七軍現在退至距貝爾福不到十英里的地方。在總司令部里，參謀官員對戰地將領懷有的自然而永恒的敵意爆發了。霞飛原來就認為博諾缺乏勇氣，現在更深信不疑。他開始清洗，一個個不得力的將領相繼被革，這就是后來人所共知的霞飛的治軍方式。博諾將軍成為第一個被調充閑職的人（limogés），那時被解除指揮權的將領都被調至利摩日（Limoges）擔任后方職務。以“有失職守”為理由，霞飛在三天之內又免去第八騎兵師師長和另一個師長的職務。

霞飛熱衷于執行原來的計劃：解放阿爾薩斯并將德軍牽制在那條戰線上。他不顧來自比利時的報告，動用了一個正規師和三個后備師，將它們并入第七軍，專門組成一個阿爾薩斯集團軍，以便在他的右翼末端重新采取行動。原已退休的波將軍應召重新服役，受命指揮這支部隊。在該部隊集結的四天時間里，其他地區的壓力亦逐漸增強。8月14日，即波將軍按計劃向前推進的那天，人們看見30只白鸛飛越貝爾福上空向南方飛去，比它們通常離開阿爾薩斯的時間提前兩個月。

法國人民對所發生的事情簡直一無所知。總司令部的新聞簡報極盡遮掩蒙蔽之能事。霞飛行事有一條固定不變的原則：不該讓非軍事人員知道任何事情。新聞記者均不得訪問前線，將領姓名、傷亡人員的名字以及部隊番號一律不得見報。為了不讓敵人搜集到任何可資利用的情報，總司令部采用了一條日本人信守的原則——“不聲不響，隱姓埋名”，進行戰爭。法國被劃分為后方地區和軍事地區兩大部分。在軍事地區，霞飛是個專制的獨裁者，非經他本人批準，任何非軍事人員，即使是總統，都不得進入軍事地區。那些受到輕視的下院議員就更不用說了。在向阿爾薩斯人民發布的公告上，署名的是他，而不是總統。

部長們都有怨言，說他們對德國軍隊的行動要比對法國軍隊的行動知道得更多一些。霞飛認為他不受陸軍部長的約束，因此他直接向普恩加萊匯報，而普恩加萊也抱怨他從來聽不到戰事失利的報告。有一次安排了總統親自視察第三集團軍，而霞飛則為此向第三集團軍司令發出“嚴格的命令”，飭令“不得與總統討論任何有關戰略或外交政策的問題，且必須書面報告這次談話的情況”。他手下的將領都受到告誡，不得向政府任何成員解釋軍事行動。“在我發出的報告里，”霞飛告訴他們，“我從不透露當前軍事行動的目的，也不談我的意圖。”

不多久，在公眾壓力日益增長的情況下，霞飛的這種方式終于失靈。在8月份一條條國境線被突破，一個個國家遭到入侵，戰爭還處于運動戰階段，大軍轉戰東西，從塞爾維亞到比利時的戰事震撼了整個世界的這些日子里，來自前線的確切消息卻少得可憐。發生在這個月份的史實，哪怕有成千個熱心的編年史作者，也難以作出翔實的記載。8月9日，加利埃尼將軍身穿便服，在巴黎一家小咖啡館用餐。他聽到鄰座一位《時報》（Le Temps）的編輯向一個友人說：“我告訴你，加利埃尼將軍率領三萬大軍剛剛開進科爾馬爾。”加利埃尼把身子向前一靠，對他的朋友輕聲地說：“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

正當列日的德軍耐心等待攻城炮的時候，正當全世界對固守堡壘的比軍能堅持抵抗表示驚奇和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引述輿論一致的看法，認為這些堡壘“絕不會陷落”的時候，正當部隊在繼續集結的時候，有人則在以極度焦急的心情等待著德國攻勢的明朗化。加利埃尼將軍便是其中之一。使他苦惱的是：“德軍戰線后面的情況怎樣？”“列日后面正在進行什么樣的大規模集結？我們必須始終估計到，德國人必定會排山倒海而來。”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索爾代將軍所部的一支騎兵奉派進行偵察。可是，急如星火的騎士們策馬馳騁，一下子跑得太遠，也跑得太快。他們在8月6日越境進入比利時，沿默茲河疾馳，偵察德軍集結的實力和方向。這支騎兵部隊在三天之內走了110英里，平均每天差不多前進40英里。他們經過訥沙托，進抵離列日9英里處。每到一地，這些騎兵既不下馬，又不卸鞍，以致馬匹經過一路來的急行軍后都已精疲力盡。休息了一日，他們繼續在阿登山區和默茲河以西地區進行偵察，遠達沙勒魯瓦。但不論在什么地方，他們都是來得過早，無法看到大批德軍渡過默茲河的跡象，活躍的德軍騎兵到處掩蔽在德境后面集結的部隊。法國人發現，他們未能得遂所愿，親歷一場驚心動魄的騎兵沖鋒，而這正是傳統的開戰方式。盡管德國騎兵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朝盧萬和布魯塞爾方向發動攻勢時使用了沖鋒的突擊戰術；但在這里，他們卻回避直接交鋒，而是以若干自行車營和摩托化步兵在法軍面前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步兵的機槍使法軍無法逼近。

真叫人泄氣。盡管美國內戰中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南部邦聯的摩根（Morgan）將軍讓他的騎兵部隊使用步槍作戰，在指揮時他高喊著：“小伙子們，那些帶馬刀的笨蛋又來了，給他們點厲害嘗嘗！”可是到現在雙方的騎兵們仍然深信馬刀出鞘見分曉的方式。日俄戰爭期間，一位英國觀察員，即后來的伊恩·漢密爾頓爵士將軍曾報道說，騎兵要是碰上架設在戰壕里的機槍，他們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為步兵燒飯。這種言論使陸軍部的人懷疑他在東方度過了幾個月，是否變得神志不清了。同一次戰爭中的一位德國觀察員，即后來的馬克斯·霍夫曼將軍對于架設在戰壕里的機槍的防御威力問題，在他的報告中得出同樣的結論，毛奇看了不禁慨然浩嘆：“從來不曾有過如此瘋狂的作戰方法！”

1914年，德國人避免騎兵作戰而使用機槍，取得了有效的掩護作用。索爾代的報告說，沒有發現大部隊的德軍向法軍左翼移動，這正好符合總司令部原先的想法。然而，對阿爾貝國王和朗勒扎克將軍來說，德軍右翼包抄行動的輪廓已越來越明顯。他們兩人都處在這個行動的必經之路上，因此更加傾向于這樣估計問題。另外一個是富尼耶（Fournier）將軍，他是法國莫伯日要塞司令。他向總司令部反映，德國騎兵已于8月7日進入默茲河畔的于伊（Huy），他所收到的報告都表明，這支騎兵正在掩護著五六個軍的德軍向前推進。鑒于列日與那慕爾之間唯一的橋梁就在于伊，這支敵軍顯然是想要渡過默茲河。莫伯日的這位要塞司令告誡說，他的要塞沒有能力抗擊如此龐大的敵軍。在總司令部看來，關于五個或六個軍的報告似乎是失敗主義者的杯弓蛇影之談。對霞飛而言，在8月份，肅清那些優柔寡斷的懦夫成為他取勝的當務之急，于是他立即解除了富尼耶將軍的指揮權。后來，經過調查又取消了這道命令。與此同時，也弄清了情況，要使莫伯日具有有效的防御能力，最少需要兩個星期的時間。

朗勒扎克將軍也收到了關于于伊的報告，憂慮有增無已。8月8日，他派參謀長埃利·杜瓦塞爾（Hély d’Oissel）將軍前往總司令部，促使總司令部確實感到德軍右翼部隊包抄行動的威脅。但總司令部的答復是，朗勒扎克將軍的顧慮是“不成熟的”，因為這樣的行動與“敵人手頭可資動用的手段全不相稱”。從比利時方面不斷傳來進一步的證據，但對每一份這樣的報告，信奉第十七號計劃的“門徒”總是能找到一個解釋，不是說在于伊出現的部隊是在執行“某種特殊任務”，就是說情報來源“不可靠”，并認為進攻列日不過是為了占領該地的橋頭堡“而已”。8月10日，總司令部認為“它的印象已得到證實，即德軍不會在比利時采取重大行動”。

法軍總參謀部決心發動自己的攻勢，因此要求比軍在第五集團軍和英軍前往會師之前能支持下去。霞飛派了又一個使者阿德爾貝（Adelbert）上校帶去普恩加萊致阿爾貝國王的一封私人信件，希望雙方部隊能采取“一致行動”。這位軍官8月11日到達布魯塞爾，他和以前幾位使者一樣，得到同樣的答復：倘德軍如國王所預見的那樣，采取橫越比利時的行動，國王將不會允許他的部隊陷于被切斷后路而無法退往安特衛普的險境。阿德爾貝上校是個沖動論的狂熱信徒，他感到無法把國王的悲觀情緒帶回總司令部。幸而第二天就發生了戰斗，比軍取得驚人的勝利，他也再沒有必要執行這個不愉快的任務了。

德國槍騎兵朝盧萬方向突破，但在哈倫（Haelen）被德維特（de Witte）將軍麾下的比利時騎兵的密集火力阻于橋堍。德維特命令他的士兵翻身下馬，拿起步槍，在步兵的支持下投入戰斗，重演了摩根將軍在田納西取得的勝利。從早晨8時直到傍晚6時，沉著的排槍射擊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手執旗桿矛和馬刀的德軍的進攻。馮·馬維茨的最優秀的槍騎兵中隊遺尸遍野，最后剩下的一點人馬向后撤退，比軍得以逞雄于戰場之上。這場輝煌的勝利被布魯塞爾興高采烈的記者們宣布為這次戰爭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役。比利時參謀部的官員以及他們的法國朋友因此欣喜若狂；他們恍若已置身柏林。阿德爾貝上校報告總司令部，認為“德國騎兵的退卻是決定性的，德國打算發動借道比利時中部的攻勢已被推遲，甚至已被放棄”。

列日堡壘群在敵前仍然屹立不動，看來為這種樂觀情緒提供了根據。每日早晨，比利時各報都以大字標題報捷：《堡壘群固若金湯！》。8月12日，即哈倫之役的同一天，德軍盼望前來結束這種自夸言論的攻城巨炮終于運到陣地。

列日與外界的聯系已被切斷。這幾門黑色的龐然大物運抵郊區，把堡壘群置于射程之內時，只有當地的居民看見這些怪物。有一個目擊者說，它們看起來像“吃得太飽的鼻涕蟲”。矮胖的炮管，再加上像巨瘤般的制退機筒，便顯得加倍的肥大，張開著洞穴似的炮口，對著天空。8月12日傍晚，其中一門炮架設完畢，炮口對準蓬蒂斯堡壘（Fort Pontisse）。炮手們以墊料護衛他們的眼睛、耳朵和嘴。他們俯伏在地上，在離炮位近300米遠的地方準備發射這門電控大炮。6時30分，第一發炮彈的巨響震撼列日。炮彈的弧形彈道高達4000英尺，60秒鐘后命中目標。炮彈爆炸時塵土、碎片和硝煙形成巨大的圓錐形，升入1000英尺的高空。與此同時，斯科達305毫米大炮也運抵前線，開始轟擊其他堡壘。炮兵觀察員從教堂尖頂或氣球上進行校正，使炮彈“逐步接近”目標。比利時守軍聽到炮彈降落時發出的呼嘯聲，并且感到爆炸聲越來越近，像在自己頭上爆炸似的。彈著點在不斷地得到校正，他們的恐懼也一陣高過一陣，炮彈終于在他們頭頂上爆炸了，震耳欲聾，鋼彈頭擊穿工事。彈雨陣陣，把人炸得段段塊塊，強烈炸藥的濃煙使人窒息，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內到處是火焰和瓦斯，喊聲一片。人變得“歇斯底里起來，在擔心下一發炮彈擊中的高度緊張狀態中，甚至發瘋了”。

在這些大炮開始轟擊之前，只有一座堡壘在敵軍的沖擊下失守。炮擊持續了二十四小時，蓬蒂斯堡壘中了45發炮彈，坍毀不堪，于8月13日為德軍步兵攻陷。同一天，另有兩座堡壘也告陷落。至14日，城東和城北兩面的堡壘全部失守。堡壘的大炮全部被毀，城北的道路被打通了。馮·克盧克的第一集團軍開始向前推進。

攻城迫擊炮接著前移，把炮口對準城西的堡壘。一門420毫米的大炮被拖過市區去攻打隆森堡壘。列日的下院議員塞勒斯坦·當布隆（Célestin Demblon）先生這時恰巧在圣皮埃爾廣場，看到廣場拐角處出現“一門大炮，大得簡直叫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個怪物分成兩部分，三十六匹馬拖著，人行道都給震動了。群眾看見這件非凡的怪家伙，個個目瞪口呆，異常驚愕。巨炮慢吞吞地穿過圣朗貝爾廣場，轉入劇院廣場，然后沿著蘇弗尼埃爾大街和阿夫魯瓦大街去了，在它慢吞吞地吃力地行進時，吸引了一批批好奇的人。當年羅馬人看見漢尼拔的大象部隊也不至于驚奇到這個地步。跟著巨炮的士兵，腳步挺直，氣氛肅穆，像在舉行莊重的宗教儀式。這炮真是炮中的邪魔啊！……到達阿夫魯瓦公園之后，德國炮兵小心翼翼地把炮架起來，并審慎地作了瞄準，接著傳來可怕的爆炸聲。人群前倒后仰，地動山搖，宛如發生了地震，附近的玻璃窗全部震碎……”

到8月16日，十二個堡壘中已有十一個失守；只有隆森堡壘尚未陷落，在炮擊暫停的間歇，德方派出使者，手持停火旗幟，要求勒芒將軍放下武器。他拒絕了。16日，一枚炮彈命中隆森，在彈藥庫內爆炸，從內部把整個堡壘炸毀。德軍進入時，在一堆破碎的裝甲炮塔和冒煙的水泥工事中，發現勒芒將軍壓在一大塊磚石下面，看來已經氣絕身死。一名滿臉污垢的副官守衛在側，他說：“請對將軍尊重一點，他已經死了。”其實勒芒還活著，只是失去了知覺。他被救活之后送到馮·埃米希將軍面前，他交出指揮刀說：“我是在昏迷中被俘的。請你務必在戰報中說明這一點。”

“你的指揮刀并沒有玷污軍人的榮譽，”埃米希答道，同時把指揮刀還給將軍，“留著吧。”

后來，在德國過著戰俘生活的勒芒將軍寫信給阿爾貝國王：“當時我是樂于獻出自己的生命，無奈死神不要我。”他的兩個對手，馮·埃米希和魯登道夫頸上則都掛上了藍、白、金三色的功勛十字章——德國的最高軍事勛章。

隆森堡壘陷落的次日，第二、第三集團軍便立即向前推進，這就把德軍右翼的全部兵力投入行動，開始其橫越比利時的進軍。按照時間表，這次進軍應在8月15日開始；因此，列日之役把德軍的攻勢拖遲了兩天，而不是當時世人以為的兩個星期。事實上，比利時給予協約國的既不是兩天也不是兩個星期，而是一個戰斗的理由和榜樣。

注釋

[[1]](#_1_10) 這個職稱與所指的職務是相稱的，采用這個職稱而不用德語原文Quartiermeister（軍需官），是因為后者對英語讀者來說會引起混淆。

[[2]](#_2_8) “匈人”（Huns），公元4世紀至6世紀生活在中亞、東歐地區的民族，德皇威廉二世曾以其作為德國軍人的榜樣。——譯注

[[3]](#_3_8) 卡利古拉（Caligula），羅馬帝國皇帝（公元37—41年在位），嗜殺成性，曾處死許多無罪的人。公元41年，被近衛軍將領保民官卡西烏斯·凱列亞殺死。——譯注

[[4]](#_4_3) 卡利古拉（Caligula），羅馬帝國皇帝（公元37—41年在位），嗜殺成性，曾處死許多無罪的人。公元41年，被近衛軍將領保民官卡西烏斯·凱列亞殺死。——譯注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e operations of the Belgian Army in this chapter are based chiefly on Galet, van der Essen, and Cammaerts; of the German Army on Ludendorff's chapter “Liège,” 28–46, and on Reichsarchiv, Weltkrieg, Vol. I, 108–20, which, rather disproportionately, gives twelve pages to the infantry assault and only one to the work of the siege guns. The assembly, transport, and operations of the guns are taken chiefly from Schindler. Operations of the Army of Alsace are from Dubail and AF, I, I, Chapters 4 and 5, 90–154.

鼓動阿爾薩斯居民反抗德國：Joffre, 136; Engerand, Bataille, 193.

“我將這樣通過比利時！”：qtd. J. M. Kennedy, The Campaign Round Liège, London, 1915.

“綿羊的夢囈”：a remark applied by Baron von Stein to the Tugenbund, qtd. Buchan, 129.

毛奇預期到動員第39天西線便已決定勝負：In correspondence with Conrad in 1909 Moltke at first said h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transfer troops to help Austria, after defeating France, “between the 36th and 40th day of mobilization.” Conrad, I, 369. Later he thought he could defeat France by the 21st day if she took the offensive and by the 28th day if she fought behind her frontiers. Ibid., 374. Five years later, on May 12, 1914, when Conrad visited Moltke at Karlsbad, Moltke said, “We hope to be finished with France in six weeks from the start of operations or at least to be so far forward that we can turn our main forces to the East.” Ibid., III, 669. On this occasion, he specified achieving a decision in the west “on the 39th or 40th day after mobilization.” Karl Friedrich Nowak, Les Dessous de la défaite, Paris, Payot, 1925, 53.

重型大炮：In addition to Schindler, whose account is largely concerned with the transport and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guns, the technical facts are taken from Army War College,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Large Calibre Mobile Artillery in the European War, Washington, GPO, 1916, p. 8; U.S. Field Artillery Journal, October 1914, p. 591 and January 1915, p. 35; “Austria's Famous ‘Skoda’ Mortars,”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3, 1915.

埃默森稱之為獸印記的橫肉：qtd. Whitlock, 126.

“古往今來最偉大的軍人之一”：Ludendorff, 28.

“沒有人相信比利時的中立”：ibid., 29.

“死戰到底”：Galet, 56.

瓦薩格市長弗萊歇先生：Hanotaux, III, 84.

德國的宣言書：van der Essen, 52.

“巧克力士兵”：Schryver, qtd. AQ, October 1922, 157.

比利時政府的布告：Gibson, 31; Cobb, 90.

“前一天對一些比利時教士的處決”：Bülow, III, 160. General von Bülow was killed the same day. According to rumor at the time, he committed suicide; according to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Prince Bülow, he was shot by a franc-tireur.

德國槍決六名在瓦薩格抓的人質：Hanotaux, III, 125.

焚毀巴蒂斯村：Bloem, 27, 29.

“我們在比利時的進軍肯定是殘酷的”：Conrad, IV, 193.

比利時軍官的記錄：qtd. Times History of the War, I, 336.

“恫嚇要塞司令和當地居民”：Ludendorff, 41.

齊柏林飛艇將毀掉列日：Weltkrieg, I, 115.

給勒芒的最后通牒：Schryver, 103.

德軍試圖綁架或殺害勒芒：van der Essen, 62.

“沒有饒恕敵人，把他們全都殺了”：Martin H. Donohue in NYT, August 10.

“提出各種異想天開的計劃”：Cammaerts, 147.

比利時婦女錯向德國士兵獻花：Bloem, 48.

霞飛拒絕向比利時增兵：Poincaré, III, 7.

霞飛給比利時國王阿爾貝的信及國王的回復：Galet, 83–4.

比利時正在“保衛歐洲的獨立”：M. Deschanel, qtd. Times, August 7. So great was the moral effect of Belgium's resistance that even the Irish Nationalist leader, John Redmond, said there was no sacrifice he would not make on behalf of Belgium, Times History of the War, I, 357.

“好哇！已進入列日！”：Bülow, 22.

德皇痛責和親吻毛奇：Moltke, Erinnerungen, 24.

德皇“神情沮喪”：Gerard, 198, 206.

德國8月9日遞交比利時的備忘錄：Gibson, 44.

“我們那時走投無路”：Cammaerts, 20.

貝特洛與比利時國王的會面：Galet, 93–5.

迪巴伊將軍：Engerand, 456–7.

“真正的雄獅”朗勒扎克：Spears, 345. One of Joffre's choices: Joffre, 12, 236.

朗勒扎克批評作戰計劃的信函：AF, I, I, Annexe 19, 59–60; Lanrezac, 54–56; Engerand, 412–15.

霞飛沒有作復：Joffre, 130–31.

霞飛對呂夫的回答：Briey, April 15, 1919, evidence of Ruffey.

“那可能是你的計劃，而不是我的”：ibid., also Dubail, 12, and Lanrezac, 60–61.

司機喬治·布約：NYT, September 20, I V, 3.

霞飛的習慣和性格：Mayer, 40; Pierrefeu, GQG, 96–99.

“他總是惹我生氣”：Gallieni parle, 69.

博諾的擔心：Dubail, 14–20.

法軍攻入阿爾特基什及在米盧斯的閱兵式：Hanotaux, III, 179, 185–92.

“有失職守”：qtd. Mayer, 35; Joffre, 152, 156.

白鸛離開阿爾薩斯：Poincaré III, 51.

“不聲不響，隱姓埋名”及霞飛禁止將領與總統討論戰略問題：Gallieni, Mémoires, 172; Corday, 138; Poincaré, III, 92. Messimy, 243–52, gives a heart-rending account of the Government's “anguish” at being kept uninformed by GQG of events at the front and of its persistent efforts to force Joffre out of his “obstinate mutism.” Although his exasperation nerved Messimy at one point to inform his liaison officer with GQG that “this intolerable and even ridiculous situation” could not continue, and to appoint André Tardieu as his own representative at GQG, Joffre calmly continued in his “systematic defi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managed to “seduce” Tardieu to his views.

霞飛禁止將領與總統討論戰略問題：Gallieni, Mémoires, 172; Corday, 138.

“歷史就是這樣寫成的”：Gallieni, Carnets, 33, n. 1.

加利埃尼的苦惱：ibid., 32, n. 2.

法國騎兵的行進：Maurice, 30; Spears, 100. The French cavalry's habits were severely disapproved by British cavalrymen. “They never got off,” says Major Bridges, 81.

漢密爾頓、霍夫曼和毛奇“瘋狂的作戰方法”：qtd. De Weerd, 72.

富尼耶的報告和被免職：Poincaré, III, 19; Engerand, 422.

朗勒扎克將軍的顧慮“不成熟”：Joffre, 159.

總司令部認為“德軍不會在比利時采取重大行動”：Joffre, 141, 147–8, 150.

阿德爾貝上校的使命：Galet, 96.

比利時和法國參謀部恍若已置身柏林，認為“德國騎兵的退卻是決定性的”：ibid., 100.

攻城巨炮運抵陣地：Schindler, 119; Mühlon, 92; Essen, 77–79; Sutherland, 34, 83, who was in Namur when the same guns shelled those forts ten days later.

當布隆目睹大炮被拖過市區：Demblon, 110–11.

勒芒將軍被俘：Hanotaux, III, 254.

“死神不要我”：Cammaerts, 151.

## 第11章　英國遠征軍開往大陸

由于英國人發生了一場爭執和意見分歧，英軍沒有及時前來掩護朗勒扎克將軍暴露的左翼，彼處戰線原定是由英方防守的。8月5日，英方宣戰后的第一天，因亨利·威爾遜詳細制訂的總參謀部計劃，必須首先得到不列顛帝國國防委員會的批準，而不是像大陸國家的作戰計劃那樣能自動生效，該委員會于這天下午4時召集了一次作戰會議，與會者照常是那幾位文職和軍方領袖，另外還有一位既是文官又是軍人的顯赫人物第一次參加這次會議。

陸軍元帥基欽納勛爵就任了陸軍大臣。他本人對于這一任命不感愉快，同僚們對于由他出長陸軍部所感到的不愉快也不相上下。政府也為自效忠于查理二世的蒙克（Monk）將軍以來，基欽納作為第一個現役軍人進入內閣而忐忑不安。使將軍們擔心的是，他有可能利用他的地位或者為政府所利用，來干擾派遣赴法遠征軍的決定。他們的擔心確非杞人憂天。基欽納不久就對英法計劃指定英軍所必須執行的戰略、方針和任務等等表現了極端的輕視。

由于他處于雙重地位，他的具體的職權范圍是不完全清楚的。英國參戰之初，人們模模糊糊地認為最高權力在首相手中，至于首相應聽從什么人的建議或者以誰的建議為準，則缺乏明確的安排。在軍內，戰地軍官輕視參謀人員，認為他們“既無頭腦，又要故作姿態”。而這兩種人又都同樣厭惡那些被稱為“大禮服”的文官大臣的干擾。文官反過來也把軍人稱為“笨蛋”。出席8月5日舉行的作戰委員會的文官是阿斯奎斯、格雷、丘吉爾與霍爾丹，陸軍方面是十一名將級軍官：內定出任遠征軍總司令的陸軍元帥約翰·弗倫奇爵士，遠征軍的兩位軍長，即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爵士和詹姆斯·格里爾森爵士，遠征軍參謀長阿奇博爾德·默里（Archibald Murray）爵士，他們都是中將；其次還有副參謀長亨利·威爾遜少將，他的個性易樹政敵，在克拉危機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以致栽了跟斗，失去了一個更高的職位。在文武官員之間，基欽納勛爵究竟代表何方，誰都不十分清楚。他對遠征軍的目的非常懷疑，對其總司令很不賞識。如果說基欽納在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時不如海軍上將費希爾那樣來得暴烈，至少他對總參謀部的計劃把英國軍隊“釘在”法國戰略的尾巴上的做法，則已開始流露出同樣的蔑視。

基欽納沒有親自參與制訂大陸作戰計劃，因而能夠正確地評估遠征軍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在70個德國師與70個法國師之間迫在眉睫的沖突中，遠征軍的6個師能對戰局產生多大影響。基欽納在出任喀土穆戰役的指揮官時，克羅默（Cromer）勛爵曾說過，“他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有能力的人”。他雖然是個職業軍人，近幾年來處理的事務卻都在宏觀層面。他所關注的只以印度、埃及、帝國等大事為限。人們從未見他與士兵交談過，或注意過他們。與克勞塞維茨一樣，他把戰爭看作政策的延續，并在這個意義上看待戰爭。他與亨利·威爾遜以及總參謀部不同，不埋首于制訂登陸日期、鐵路時刻表、馬匹及營房等計劃表。他站在一個比較超脫的地位觀察戰爭，因此能夠從各個強國之間的關系出發縱觀戰爭的全貌。同時他能夠看到，為擴充國家軍事實力，應付即將開始的長期抗衡，該作出多么巨大的努力。

他宣稱：“我們必須準備好把數以百萬計的軍人投入戰場并維持數年。”他的聽眾大吃一驚，覺得難以置信，基欽納卻是鐵石心腸。為了參與并贏得一場歐戰，英國必須擁有一支與大陸國家旗鼓相當的70個師的兵力。他估計過，這樣一支軍隊要到戰爭的第三個年頭才能配備足額，這就意味著人們可以從中得出一種令人震驚的推論，即這場戰爭就將持續這么長的時間。他還認為，現有的正規軍及其職業軍官，特別是士官，是培訓他心目中那支大軍的一批可貴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力量。如果把這支常規部隊投入到他認為處于不利形勢下的眼前的戰役中，或把它部署在從長遠角度考慮是不能起決定性作用的地方，他都認為是犯罪的愚蠢行為。在他看來，一旦這支部隊完蛋，就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部隊來代替它了。

英國不實行征兵制是英國與大陸國家的軍隊之間一切差別中最顯著的一個方面。常規部隊的建立旨在執行海外任務，而不是保衛本土的安全；保衛本土的職責由本土軍承擔。威靈頓公爵當年說過，派赴海外服役的新兵“必須是志愿兵”，從此以后這就成了一條不可更易的金科玉律，英國也就全靠志愿部隊進行戰爭，因此也就弄得其他國家無法肯定究竟英國已承擔或愿意承擔多大的義務。已過七十高齡的陸軍元帥羅伯茨勛爵，多年來一直力主實行征兵制，他在內閣中唯一的支持者不用說就是溫斯頓·丘吉爾。可是工人階級強烈反對，同時也沒有一屆政府甘冒倒臺的風險去支持征兵法案。英國的軍事建制，其本土諸島的正規軍（Regular Army）為6個師和一個騎兵師，另有派駐海外的4個正規師（6萬人）和14個本土師（Territorials）。后備役約30萬人，分為兩類：一類是特別后備役（Special Reserve），這一部分僅夠勉強補充正規部隊，使之達到作戰實力，能在戰場上支持得住最初幾個星期的作戰；另一類是為本土軍提供補充的國民后備役（National Reserve）。按基欽納的標準，本土軍是一批未經訓練、無用的“業余軍人”。對于本土軍的看法，他跟法國人對他們的后備軍一樣，是完全蔑視的，是不公正的，認為它們的作用等于零。

基欽納二十歲時，曾在法國軍隊中充當志愿兵參與1870年的戰爭，講一口流利的法語。無論他是否因此而對法國特別同情，他絕非法國軍事戰略的最狂熱的支持者。在阿加迪爾危機期間，他曾告訴帝國國防委員會，他預期德國人將會“像鷓鴣一樣”穿越法國；他拒絕邀請，不愿插手作出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任何決定。據伊舍記載，他曾捎信給委員會，表示“如果委員們設想他將指揮在法國的部隊，他就要他們自己先見鬼去吧”。

英國政府1914年讓他主管陸軍部，從而任命了唯一的一個準備堅持組織長期作戰的人，倒不是出于他的見解，而是因為他有聲望。他不擅長主管一個政府部門所需的官僚手腕，內閣會議的那套“議事程序”又不配他的胃口，他做慣了殖民地總督，一向只知道簡簡單單地叫人“照我說的辦”。基欽納盡他力之所能擺脫命運的安排。他的超人的洞察力，并不如他性格上的缺點那樣為英國政府和將軍們所了解，因此他們都巴不得讓他回埃及去，無奈他們又少不了他。他被任命為陸軍大臣，這不是因為考慮到他的高見為他人所望塵莫及，而是因為他的名聲乃是“安定民心”之所需。

喀土穆戰役以后，舉國上下都對基欽納懷有一種近乎宗教徒的虔誠。在他和公眾之間存在著一種后來在法國人民和“霞飛老爹”之間或在德國人民和興登堡（Hindenburg）之間發展起來的不可思議的內心的息息相通。“喀土穆的基欽納”，兩個詞的第一個字母（K of K）成為具有魔力的徽號，他的一把寬闊而威武莊嚴的胡子也成了英國的民族象征，猶如紅褲子是法國的象征一樣。基欽納身材高大，肩膀寬闊，濃濃的胡須，一副大權在握的神態，乍看起來儼然是獅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ed）出現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形象，所不同的只是在他嚴肅的、炯炯的目光背后，隱藏著一種令人莫測高深的神情。從8月7日起，一份著名的征兵招貼出現在街頭，畫中的那髭須、那眼睛以及那手指“祖國需要你”的形象，都深深射進每個英國公民的心靈。英國要是在沒有基欽納的情況下參戰，就會像禮拜天沒有教堂一樣不可思議。

可是這時候，人人所想的都是把六個師派往法國這個眼前的問題，作戰委員會也不把他的先見之明當作一回事。格雷在很久以后帶著也許大可不必如此迷惑不解的語調寫道，“從未透露過他是怎樣或是根據什么推理過程而對戰爭的長期性作出這一預測的。”是不是因為基欽納是對的而別人都錯了，或者是因為老百姓難以相信軍人也具有思維，還是因為基欽納從來未能或從來不屑于闡明自己的理由，但不管怎樣，正如格雷所說那樣，他的同僚和同輩人無不認為“他不是憑推理，而是憑直覺中一閃而過的靈機”作出他的結論的。

不管經歷了什么樣的過程，基欽納還預言了德國即將在默茲河西岸所采取的進攻模式。據一位總參謀部的官員說，人們后來同樣認為，他之能一語中的，應歸功于他的“某種料事如神的天才”而不是出于他“對時間和距離的了解”。實際上，基欽納與阿爾貝國王一樣，已看出對列日的襲擊預示著施利芬右翼的包抄行動。他認為，德國侵犯比利時和把英國卷入對德作戰，并非像勞合·喬治所說那樣，是為了通過阿登山區而對比利時的中立進行“小小的侵犯”。基欽納拒絕對戰前的計劃承擔責任，可是，他現在也不能建議扣下這六個師。不過，他認為根本沒有必要讓這六個師去莫伯日那樣遠在前方的地點面臨覆滅的風險，他預料它們在莫伯日將承受德國侵略軍的全部壓力。他建議把它們集結的地點改為亞眠（Amiens），也就是退后70英里。

計劃的急劇改變激怒了眾將軍。在他們眼中，這顯得是臨陣畏怯，從而證實了他們原來的最壞估計。即將上陣掛帥的，身材矮胖、面色紅潤的約翰·弗倫奇爵士正處于驍勇好斗狀態的高峰。他平時那種中了風似的呆滯神色，加上系得緊緊的用以代替衣領及領帶的騎兵硬領巾，始終給人一種瀕于窒息的印象。而事實上，他的確是經常感到窒息，如果不是肉體上，至少在情緒上是如此。1912年，他被任命為帝國總參謀長后，就立即通知亨利·威爾遜，說他打算使軍隊作好對德作戰的準備，因為他認為這是“勢所必然”，自此以后，在名義上他負責與法國共同制訂聯合作戰計劃，盡管事實上他對法國的作戰計劃就像他對德國的作戰計劃那樣一無所知。跟霞飛一樣，在被任命為總參謀長時，他既沒有任何參謀閱歷，又沒有參謀學院的學歷。

他的中選，跟基欽納的出長陸軍部一樣，主要是由于他的軍階和聲譽，而他的內在素質倒在其次。在幾次給英國建樹了軍事聲譽的殖民地戰爭中，約翰爵士表現得勇敢而機智，并像一位權威人士所稱譽的那樣“切實掌握中小局面的戰術”。在布爾戰爭中，作為一名騎兵將領，他的功績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他急馳穿過布爾人的防線，援救被圍的金伯利城（Kimberley）這一傳奇式的行動。這些功績為他贏得樂于擔當風險的勇敢的指揮官的聲譽，并在大眾中為他博得了幾乎與羅伯茨和基欽納相埒的美名。由于英國在與既未經訓練又缺乏現代武器裝備的對手的較量中未能取得怎樣輝煌的成就，此時出了一位英雄，部隊高興，國家感激。弗倫奇的英勇善戰，加上他在社交界的赫赫名聲，使他扶搖直上。跟海軍上將米爾恩一樣，他也是愛德華七世治下的顯貴人物。身為騎兵軍官，他知道自己是陸軍中的精英。他與伊舍勛爵之間的友誼更對他有益無害；同時，在政治上，他與自由黨人結好，該黨于1906年執政。1907年，他任本土防衛軍總監（Inspector General）；1908年，他代表陸軍，陪同國王愛德華到雷維爾對沙皇進行國事訪問；1912年就任英帝國參謀長；1913年被提升為陸軍元帥；到六十二歲時，他是級別僅次于基欽納的現役軍官。他比基欽納小兩歲，雖然外表顯得比基欽納老些。普遍認為，如果戰爭爆發，他將指揮遠征軍。

1914年3月克拉兵變發生后，軍隊首腦受到沖擊之猛烈，猶如參孫傾覆神室[[1]](#_1__Can_Sun_Qing_Fu_Shen_Shi__Sa)一般，弗倫奇引咎辭職，看上去像堂吉訶德一樣突然中斷了他的職業生涯。然而，政府對他的寵愛反而加深，因為在政府的心目中，這次兵變是反對黨策劃的。“弗倫奇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喜歡他。”格雷不勝惋惜地寫道。四個月后，當危急關頭到來時，他又再度受到重用。7月30日被指定在英國參戰時出任總司令。

由于缺乏學習方面的訓練，又因天性不喜讀書，弗倫奇之所以成名，與其說是由于他智力過人，不如說是由于他急躁易怒，至少在他早期立下汗馬功勞之后是如此。“我并不認為他特別聰明，”國王喬治五世向其叔父透露過，“而且他的脾氣壞得驚人。”就像在海峽彼岸的法軍司令一樣，弗倫奇也不是一個憑理智行事的軍人。但他們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霞飛的突出品質是堅定不移，而弗倫奇則是極易受壓力、人和他人成見影響。有人說過，他具有“愛爾蘭人和騎兵普遍具有的那種反復無常的氣質”。霞飛在各種處境下都很沉著；而約翰爵士卻是順利時盛氣凌人，不順利時垂頭喪氣。他容易感情沖動并易為流言蜚語所左右；在伊舍勛爵看來，他有“一顆愛作奇想的稚子之心”。有一次，他贈給他以前在布爾戰爭中的參謀長一只刻有“我們的友誼久經考驗，同甘共苦永不變”字樣的金瓶作為紀念。這位久經考驗的朋友就是那位不像他那樣易動感情的道格拉斯·黑格。也就是這位黑格，1914年8月在日記中寫道：“從內心來說，我認為在我國歷史上這個生死存亡的時刻，讓弗倫奇擔任這個舉足輕重的職務是不太適宜的。”黑格內心的這種看法跟他的某種意識不是沒有聯系的，那就是最合適的人選就是他本人。他這個人是指揮權不到手絕不肯罷休的。

基欽納重新開啟了關于英國遠征軍的目的地——因此也牽涉其目標——等問題的討論。按照亨利·威爾遜的看法，委員會里“大多數人對問題一竅不通……他們猶如白癡一樣討論著戰略問題”。這時，約翰·弗倫奇爵士突然“插進了一個荒謬的建議，要把部隊開往安特衛普”，說什么英國的動員既然落后于預定的時間，那就得考慮與比軍合作的可能。黑格也像威爾遜那樣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對他上司改變計劃的“那種不顧后果的方式感到震驚”。新上任的英帝國總參謀長查爾斯·道格拉斯（Charles Douglas）爵士也同樣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他說：鑒于在法國登陸的事情全都安排妥當，同時法國已撥出運輸車輛準備往前方輸送軍隊，因此，在這最后時刻，任何改變都將導致“嚴重的后果”。

最使總參謀部感到煩惱的莫如法英兩國火車車廂容載人數不同這個不幸的問題。要把載運的部隊從一種車廂轉到另一種車廂，牽涉到一個極其復雜的數學上的排列問題。難怪負責運輸的官員聽到計劃行將改變時會感到擔憂。

幸而丘吉爾否決了把部隊轉向安特衛普的決定，使得負責運輸的官員們得以放下心來。兩個月之后，丘吉爾親自到安特衛普去了一趟，計劃派兩旅海軍陸戰隊和一師本土軍去那里作一次大膽的、孤注一擲的登陸，為拯救這個重要的比利時港口作一番最后而又徒勞的努力。不過在8月5日，他說海軍不可能保護運兵船隊作橫跨北海到比境內的斯海爾德河（Scheldt）這樣長途的航行，但可絕對保證船隊安全通過多佛爾海峽。由于海軍已有充分時間作了橫渡海峽的準備，他聲稱時機業已成熟，并主張立即將六個師全部派遣過去。霍爾丹支持，羅伯茨勛爵也支持。接著又產生了究應派幾個師去的問題，爭論著在本土軍有更多時間進行訓練或從印度調回接替部隊之前，是否得留下一個或幾個師。

基欽納又提出了他那個在亞眠集結的想法，并得到他的朋友、未來的加利波利戰役的指揮官伊恩·漢密爾頓爵士的支持。后者感到不管怎樣，應讓英國遠征軍盡快到達那里。格里爾森發言支持“在要害地點部署優勢兵力”這一觀點。走在激進派最前列的約翰·弗倫奇爵士提出了“我們應該立即渡過海峽，隨后再決定目的地”的建議。最后，一致同意馬上調集運輸艦船把六個師全部運過去，目的地待法國參謀部的代表到達后再協商決定。在基欽納的堅持下，已向法國參謀部提出緊急要求，請派一名代表前來就法國戰略問題作進一步討論。

由于一夜之間出現的入侵恐慌鬧得人心惶惶，委員會在二十四小時內改變了自己的主意，把六個師減為四個師。由于討論遠征軍人數的消息有所外傳，自由黨的喉舌、有影響的《威斯敏斯特報》譴責了這種削弱本土防務的“魯莽”行為。對立陣營的諾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勛爵也來反對派遣一兵一卒。雖然海軍部重申了帝國國防委員會1909年所作的不可能有嚴重入侵的結論，但仍不能消除人們頭腦中敵人會在東海岸登陸的想法。亨利·威爾遜感到極端厭惡的是，這位目前對英國安危負有重任的基欽納，竟把原來安排好直接從愛爾蘭開往法國的一個師抽調回國，并且從別的師中又抽調了兩旅兵力去守衛東海岸，從而“把我們的計劃搞得一塌糊涂”。因為最后的決定是：立即派遣四個師和騎兵部隊——8月9日起開始上船——然后再派遣第四師而將第六師留在國內。休會時，基欽納以為大家都已同意把亞眠作為集結地，但是別的將軍卻沒有這樣的想法。

法國總參謀部火速派來了陸軍上校于蓋。他一到達，威爾遜就將出發的時間告訴了他。雖然這不是一件需要對遠征軍的法國東道主保密的事情，但威爾遜卻惹怒了基欽納，他指責威爾遜泄密。威爾遜“頂了嘴”，他寫道，他“不想受基欽納的氣”，“尤其在今天像他這樣胡說八道的時候”。于是他們之間產生了，也可說加深了對遠征軍毫無益處的敵對情緒。在所有的英國軍官中，威爾遜與法國人民的關系最為密切，約翰·弗倫奇爵士也最能聽取他的意見。然而，基欽納卻認為他傲慢放肆，就此不理睬他。而威爾遜也宣稱，他認為基欽納是個“瘋子”，并且認為他“對英國的危害不亞于毛奇”，他還把他的偏見灌輸到那位生性好疑、易于激動的總司令的頭腦中去。

8月6日到10日期間，正當列日的德軍在等待攻城炮和法國得而復失米盧斯的時候，配備有軍馬3萬匹、野戰炮315門和機槍125挺的8萬名英國遠征軍在南安普敦和樸次茅斯集結。軍官們的指揮刀都是剛磨過的，閃閃發光，這是他們奉命一律在動員的第三天送修械所磨的。但這些軍刀除在檢閱時用以致敬外，別無其他用場。不過，據這支部隊的軍史纂修人所述，這支部隊，除了這種偶見的騎士遺風的舉止外，確是“歷來踏上征途的英軍中訓練、組織和裝配得最好的”。

8月9日，部隊開始登艦，運輸船每隔十分鐘開出一艘。每艘船離開碼頭時，港內其他船只汽笛和喇叭齊鳴，甲板上人人歡呼致意。喧鬧聲震耳欲聾，在一位軍官看來，遠在列日城外的馮·克盧克將軍也不可能聽不到。不管怎樣，海軍深信他們已把海峽封鎖起來，可以安全橫渡海峽，而無遭受襲擊之虞。運輸船隊在沒有護航的情況下在夜間渡海。一個在凌晨4時30分醒來的士兵感到大吃一驚，他發現整個運輸船隊漂浮在平靜如鏡的海面上，發動機全都停了，附近看不見一艘驅逐艦；原來是在等候其他港口開出的船隊前來在海峽中途會合。

第一批部隊在魯昂登岸，受到狂熱的歡迎，一位在場的法國人說，仿佛他們是來為圣女貞德舉行贖罪儀式似的。在布洛涅，另幾批在高聳的拿破侖紀念碑腳下登陸，拿破侖當年便是計劃從這座圓柱形紀念碑坐落所在誓師出發入侵英國的。其他運輸船只進入勒阿弗爾時，當地的法國駐軍爬上營房屋頂，為在強烈的陽光下走下舷梯的盟軍狂熱歡呼。當晚，遠處傳來隆隆的雷聲，殘陽如血，冉冉西下。

第二天，在布魯塞爾，人們終于看見了英國同盟者，盡管僅僅是一瞥而已。美國公使館秘書休·吉布森（Hugh Gibson）帶著一項使命去找英國武官，他未經通報就步入武官的房間。吉布森發現一個臟乎乎、胡子滿面、身穿野戰軍服的英國軍官在伏案書寫。武官連忙把他推出室外，后者則不客氣地問其余的英國部隊是否都藏在這座大樓內。事實上，英軍登陸地點的機密保護得如此之好，德軍在蒙斯第一次碰上他們前，完全不知道英國遠征軍已開抵何處和在何時到達。

與此同時，在英國，各指揮官之間的互不相容日益表面化。國王在巡視時向與宮廷關系密切的黑格詢及他對約翰·弗倫奇爵士任總司令有何看法。黑格認為他有責任這樣回答：“我非常懷疑，他是否具有足夠平和的性情和足夠高深的軍事學識，使他能夠勝任指揮官的職責。”國王離去后，黑格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約翰爵士在布爾戰爭期間的軍事思想“常常使我震驚”；接著他又寫下了他對阿奇博爾德·默里爵士的“看法”：默里是個“老太婆”，為了避免跟約翰爵士發生爭執，他總是“姑息遷就”，明知命令謬誤，還是執行不違。黑格認為兩人“全都不適宜于擔任他們現在的職務”。他告訴另一位軍官說，約翰爵士將不愿傾聽默里的意見而“寧愿信任威爾遜，這反而更為壞事”。威爾遜不是一位軍人，而是一個“政客”；對于“政客”一詞，黑格解釋說，與“不正當的交易和錯誤的生活準則同義”。

黑格這個人態度溫和，舉止文雅，看不出有什么缺點，凡是可能于他有幫助的地方，他都有朋友。行年五十又三，生平事業一向無往不利，如今他傾吐這一番衷曲，是要為更上一層樓創造條件。在蘇丹戰役中，身為一名軍官，他就已慣于養尊處優，在跟隨他一起穿越沙漠的私人包裹馱載隊中就有“一只滿馱著紅葡萄酒的駱駝”。

8月11日，在啟程赴法的前三天，約翰·弗倫奇爵士第一次獲悉一些使他感興趣的有關德國部隊的實情。他和作戰處副處長卡爾韋爾（Callwell）將軍一起拜訪了情報處。情報處長開始告訴他們一些有關德國運用后備兵役制的情況。卡爾韋爾寫道：“他不斷搞出一批批新的后備師和額外后備師，就像一個魔術師從口袋里掏出一缸又一缸金魚那樣。而且，他似乎是故意為之，讓人感到惱火。”這些情況，法國情報部門的第二處于1914年春獲悉，為時太晚，已來不及說服總參謀部改變它對德軍右翼的判斷。要改變英國人的想法也為時過晚。一種新的想法，如要深入人心并從根本上改變既定的戰略以及更動部署上無窮的具體細節，就得需要時間，而余下的時間卻遠遠不夠。

在下一天舉行的委員會的最后一次會議上，基欽納和將領們為了戰略問題展開了一場激戰。到會的除基欽納外，還有約翰·弗倫奇、默里、威爾遜、于蓋和另兩名法國軍官。基欽納除非憑著心靈的耳朵，他當然聽不到打通穿過列日的道路的420毫米大炮炮彈的爆炸聲。雖然如此，他斷言德國的“強大兵力”將從默茲河彼岸過來，他并揮動手臂，在墻頭的大地圖上比劃了德軍的包圍陣勢。他振振有詞地說，倘若遠征軍集結在莫伯日，在做好戰斗準備之前就有陷于重圍被迫后撤之虞，這次作戰是克里米亞戰爭以來第一次與一個歐洲國家的交鋒，被迫后撤會給遠征軍的士氣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為了取得回旋余地，他堅持要以亞眠這個更后一些的地方作為基地。

他的六個對手，三名英國軍官及三名法國軍官，都同樣毫不動搖地堅持原來的方案。約翰·弗倫奇爵士本人原來建議向安特衛普轉移，而今在威爾遜的授意下，則堅決表示任何變化都將“打亂”法國的作戰計劃，仍舊主張向莫伯日進軍。法國軍官強調了填補其戰線左翼末端空白地區的必要。威爾遜對于把部隊集中在亞眠的這種“懦夫之見”則是五內俱焚。基欽納說，法國的作戰計劃是危險的；他說，他們不應采取攻勢，他“完全反對”這樣做，而應等到德軍發動進攻時予以反擊。爭吵持續三個小時，最后基欽納被迫逐步作出讓步，盡管他還沒有被說服。作戰計劃早已存在，五年來，他一直知道這個計劃，而且根本不贊成。如今，部隊已經上船出海，他只能接受這個計劃，因為已沒有時間再擬定新計劃了。

最后，基欽納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態——或者是一種旨在開脫自己責任的姿態——他帶領約翰·弗倫奇爵士一起去向首相匯報爭論情況。正如威爾遜在其日記中所吐露的那樣，阿斯奎斯“對這事根本不懂”。他所作的決定，不出人們所料。他在聽取基欽納陳述他跟聯合總參謀部的專家們一致意見相左的看法后，表示同意總參謀部的意見。遠征軍由六個師減為四個師，按原計劃行動。這種按既定計劃辦事的勢頭又一次獲得了勝利。

然而，與法德兩國的陸軍大臣不同，基欽納仍保留有指揮本國軍務的大權。他現在給約翰·弗倫奇爵士發出的有關遠征軍在法國行動的命令，反映了他意圖限制遠征軍在戰爭初期所應承擔的責任。丘吉爾預見到英國海軍行將擔負的重任，因而命令地中海艦隊既要同“格本”號交戰又要避開敵人的“優勢火力”。跟丘吉爾一樣，基欽納現在預見到他必須建立起一支數百萬人的大軍，因而給遠征軍規定了不相協調的方針和任務。

他寫道：“你所統率的部隊，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和配合法國陸軍……并協助法軍阻止或擊退德軍入侵法國或比利時領土。”他帶著某種樂觀情緒繼續寫道：“并最終恢復比利時的中立”——這個計劃好比要為姑娘恢復童貞。鑒于“英軍及其配屬的增援部隊的兵力非常有限”，必須“經常牢記”，“盡最大努力把死亡和損耗減到最低限度”乃屬必要。基欽納的命令反映了他不贊成法國的進攻戰略。命令指出，在被要求參加任何“前方調動”時，如果在此調動中，法軍并未投入大量兵力，或有使英軍“過分暴露易受敵軍攻擊”之虞，約翰爵士應當首先請示本國政府，同時還必須“清楚地了解，你的指揮權是完全獨立的，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意義上，你都不受任何盟軍將領的節制”。

這番話毫無模棱兩可之處。基欽納已經一筆勾銷了統一指揮的原則。他的動機是把英軍作為未來的核心力量來保存。而這樣做的后果，對一個具有約翰爵士那樣氣質的指揮官來說，實際上是取消“支持與配合”法軍的命令。這種思想，即使是在約翰爵士去職和基欽納本人去世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還不時露頭，影響盟國在戰事上作出努力。

8月14日，約翰·弗倫奇爵士、默里、威爾遜以及一位取了一個振奮人心的名字的陸軍少校參謀赫里沃德·韋克（Hereward Wake）爵士，一起到達亞眠。英軍在這兒下火車，然后繼續前往勒卡托（Le Cateau）和莫伯日周圍的集結地區。英軍開始出發那天，克盧克的部隊也開始從列日向南移動。英國遠征軍高高興興地朝著通往勒卡托和蒙斯的道路前進，沿途人群不斷報以“英國人萬歲！”的熱烈歡呼聲。這種歡樂氣氛，使基欽納勛爵向全軍發布的使人掃興的通告增添了說服力，通告指出他的軍隊可能會“遇到美酒和女色的誘惑”，全軍必須“一律抵制”。英國軍隊越往北走，歡迎的熱情越高漲。人們紛紛饗以熱吻，贈以鮮花。擺設盛放食物和飲料的臺子，招待英軍，分文不收。有一處欄桿上掛了一塊紅臺布，上面縫著一些白布條，權代英國國旗上的圣安德魯十字的圖案。士兵們把部隊臂章、帽子和皮帶拋給那些索取紀念物的笑容滿面的姑娘及其他景慕他們的人。不久，英國部隊便只好頭戴農民的花呢帽子，用繩子束住褲子開向前方。一個騎兵軍官后來寫道，一路上“我們受到人們的盛宴款待和熱烈歡呼，但不消多久，他們便要看見我們向后敗退了”。如今回顧當時的情景，他記憶中的英國遠征軍進軍蒙斯，真是“一路春風得意”。

注釋

[[1]](#_1_11) 參孫傾覆神室（Samson's temple），系基督教《圣經》故事，見《舊約·士師記》第十六章。參孫，以身強力大著稱，為了報非利士人剜他雙眼的仇，抱住托房的那兩根柱子，盡力屈身，房子倒塌，壓住首領和房內的眾人。這樣，參孫死時所殺的人，比活著所殺的還多。——譯注

Unless otherwise noted, facts about the BEF are from Edmonds, and all quotations from Sir Henry Wilson and Haig are from their diaries, edited by Callwell and Blake, respectively.

“既無頭腦，又要故作姿態”：Philip Gibbs, Now It Can Be Told.

“大禮服”、“笨蛋”：Childs, 134.

基欽納蔑視把英國軍隊“釘在”法國戰略尾巴上的計劃：qtd. F. Maurice, Life of General Rawlinson, 95.

“我們必須準備好”：qtd. Magnus, 284. On Kitchener's views, see also Esher, Tragedy, 31, 38–9.

威靈頓公爵：qtd. Hurd, British Fleet, 29.

“像鷓鴣一樣”：qtd. Magnus, 279.

“他們自己先見鬼去吧”：Esher, Journals, III, 58.

“安定民心”：Arthur, 13.

“他不是憑推理，而是憑直覺中一閃而過的靈機”：Grey, II, 69.

對德作戰“勢所必然”：Wilson, 112.

“切實掌握中小局面的戰術”：article on French, DNB.

“弗倫奇是一個勇敢的人”：qtd. Trevelyan, 198.

“我并不認為他特別聰明”：to the Duke of Connaught, May 23, 1915, qtd. Nicolson, George V, 266.

“反復無常的氣質”：qtd. Cruttwell, 23.

“一顆愛作奇想的稚子之心”：Esher, Tragedy, 43.

8月5日的作戰委員會會議：Churchill, 248–55; Haldane, 296; Wilson, 158–9; Blake, 68–9; Esher, Tragedy, 24.

“對英國的危害不亞于毛奇”：td. Magnus, 302.

軍官們的指揮刀都是剛磨過的：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Montgomery of Alamein, New York, 1958, 30.

“歷來踏上征途的英軍中訓練、組織和裝配得最好的”：Edmonds, 11.

在一位軍官看來，遠在列日城外的馮·克盧克將軍都能聽到英國的歡呼聲：Childs, 115.

魯昂的目擊者：qtd. Poincaré, III, 31.

隆隆的雷聲和如血的殘陽：Childs, 117.

黑格告訴另一位軍官：Charteris, 11.

弗倫奇爵士和卡爾韋爾將軍拜訪情報處：Callwell, Dug-Out, 17.

8月12日的作戰委員會會議：Huguet, 41–2; Wilson, 162–3; Arthur, Kitchener, 22.

基欽納的指令：Edmonds, Appendix 8.

“美酒和女色的誘惑”：text in Spears, Appendix XIII.

沿途的法國民眾招待英軍：Corbett-Smith, 32.

“一路春風得意”：Bridges, 75.

## 第12章　桑布爾河和默茲河

西線戰場上，調集軍隊和前哨戰階段在第十五日結束，進攻戰階段開始。法軍右翼向德國占領的洛林地區發動進攻，他們抄襲一條古老的深溝壁壘的蹊徑，這樣的小道，在法國和比利時為數很多。世世代代以來，不論哪個兵家都率師蹈常襲故走這樣的小道，夷平那些反復遭到夷平的村莊。在東去南錫的道路上，法軍走過一塊紀念碑，上面銘刻著“362年，約維努斯（Jovinus）于此擊敗條頓游牧部落”。

正當波將軍所部在法軍右翼邊緣，在阿爾薩斯再次發動攻勢的時候，迪巴伊將軍的第一集團軍和德卡斯泰爾諾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正在分別穿越洛林地區的兩條天然通道。這是法軍進攻的必經之路。這兩條天然通道，一條通往迪巴伊部隊出擊的目標薩爾堡（Sarrebourg）；一條從環繞南錫的大庫羅訥（Grand Couronné）山區迂回而下，經過薩蘭堡（Château Salins）進入一個山谷，山谷盡頭就是德卡斯泰爾諾部隊出擊的目標莫朗日（Morhange）天然要塞。德國人已估計到法國的進攻，早就在這一帶設置了鐵絲網，挖掘了戰壕，建筑了炮臺，嚴陣以待。他們在薩爾堡和莫朗日都筑有堅固的工事，要擊退他們，只有進行銳不可當的沖鋒或用重炮轟擊。法國人向來依靠前者，蔑視后者。

1909年，總參謀部的一個炮兵軍官，在征求他有關105毫米重型野炮的意見時，他回答說：“感謝上帝，幸好我們一尊也沒有！”“法軍的威力全靠加農炮的輕便。”1911年，作戰委員會建議為法國陸軍配備105毫米重炮，但炮兵部門人員卻矢忠于馳名的法國75毫米大炮，而始終執拗反對。他們鄙視重型野炮的作用，認為只會影響法軍進攻的機動性，是個累贅，只能像機槍一樣作為防御武器。陸軍部長梅西米和當時供職總參謀部的迪巴伊將軍，力排眾議，爭得撥款，擬創建若干105毫米重炮炮兵連，但因政府屢經更迭和炮兵部隊的鄙視，及至1914年，編入法國陸軍的重炮兵部隊寥若晨星。

德方洛林陣地的守軍，是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團軍，以及8月9日起歸他指揮的馮·黑林根將軍的第七集團軍。魯普雷希特的任務，是把盡量多的法軍牽制在他的戰線上，使他們去不了面對德軍右翼的主力陣地。按照施利芬計劃，他要完成這項任務，必須先行退卻，將法軍引入“口袋”，拉長法軍的交通線，然后把法軍咬住，而這時候，決戰就在別處開打了。這項計劃的精髓所在，就是讓這個戰區的敵人在他們跡象畢露意欲進犯的當口，遂其意圖，任其前來，誘之取得戰術上的勝利，使之遭受戰略上的失敗。

這一戰略，與對東普魯士的計劃無異，有其心理方面的問題。軍號響了，擔任司令的那些袍澤在奮勇直前走向勝利，而這時候，魯普雷希特卻得服從往后退卻的需要。這對一個向往榮譽、雄心勃勃的司令員，特別是對一個儲貳身份的人來說，是個很不愉快的情景。

魯普雷希特，不失軍人嚴謹本色，挺直，英俊，目不斜視，有兩撇得體的髭須。他毫無以前兩位任性的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國王的那種氣息。那兩個國王生性放蕩，一個迷戀洛拉·蒙特茲[[1]](#_1__Luo_La__Meng_Te_Zi__Lola_Mon)，一個沉溺于里夏德·瓦格納[[2]](#_2__Li_Xia_De__Wa_Ge_Na__Richard)，結果一個遭到廢黜，一個被宣布為瘋子。其實，魯普雷希特出身的門第并不那么怪僻，這一房曾出過為瘋子國王擔任過攝政王之人。魯普雷希特本人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兒亨麗埃塔（Henrietta）的直系后裔，所以也是英國斯圖亞特王朝的合法繼承人。為紀念查理國王，每年逢到他被處決的這一天，巴伐利亞王宮總披上白玫瑰素裝。魯普雷希特與協約國方面還有一層新的私人關系——他妻子的胞妹伊麗莎白嫁給了比利時國王阿爾貝。盡管如此，巴伐利亞的部隊卻是地道的德國軍隊。開戰幾天以后，迪巴伊將軍就曾報告說，他們盡是“野蠻人”。這些人在撤出城鎮之前，總是將宿營的住房洗劫一空，桌椅家具、床墊、裝飾品、一切器皿，砸的砸，踏的踏，窗簾給撕了下來，櫥柜里的東西給撒了一地。然而這一切，尚且只是悻然撤退的軍隊習以為常的行為。洛林更慘的遭遇還在后頭哩。

在迪巴伊和德卡斯泰爾諾進攻的頭四天，德軍按照計劃往后徐徐退卻，僅與法軍作后衛戰。藍衣紅褲的法國軍隊從梧桐夾道的寬闊筆直的公路上源源而來。在沿路每一高坡上，他們可以看到一望無際、阡陌縱橫的田野，這一片是翠綠的苜蓿，那一片是金黃的谷物，另一片是耕耘待種的褐色的田地，再就是星羅棋布、成排整齊的草堆。在這田野上空發出了刺耳的尖嘯聲，75毫米大炮響了，法軍開進了他們曾經的國土。最初的幾次戰斗，盡管德軍一使用重炮就把法軍戰線打得七零八落，可是法軍卻未遇到德軍的堅決抵抗就勝利了。8月15日，迪巴伊遇到運回傷兵的車輛，那些傷兵面色蒼白，血肉模糊，有的四肢被炸得殘缺不全。他還看到上一天的戰場，仍然尸橫遍野未及收埋。17日，德卡斯泰爾諾的第二十軍在福煦將軍的指揮下，占領了薩蘭堡，且已迫近莫朗日，莫朗日已在其射程之內了。18日，迪巴伊部隊攻占了薩爾堡，軍心大振，“殊死進攻”看來已奏膚功。士兵們欣喜若狂，甚至看到了攻至萊茵河的那一天。殊不知就在此時此刻，第十七號計劃已開始破產，事實上，這個計劃早已破產好多天了。

在比利時境北的戰線上，朗勒扎克將軍一再強烈要求總司令部，讓他北上狙擊正在南下的德軍右翼，而不是開往東北攻入阿登山區打擊德軍中路。他看到自己正在為來自默茲河西岸的德軍所包圍，并猜想這支德軍具有相當的實力，因此執意要求讓他把部分軍隊調往默茲河左岸，進入默茲河與桑布爾河匯合的三角地帶，以便堵截德軍去路。在這里，他可以固守沿桑布爾河的防線。桑布爾河發源于法國北部，朝東北流入比利時，經過博里納日山麓礦區而下，在那慕爾與默茲河匯合。沿河兩岸，礦渣堆積如山，矗然林立，從沙勒魯瓦起航的運煤船只絡繹不絕。沙勒魯瓦這座以王名命名的城市[[3]](#_3__Sha_Le_Lu_Wa__Yuan_Wen_Wei_C)，1914年以后將使法國人聽來像色當一樣地感到哀痛。

朗勒扎克的報告連珠炮似的發到總司令部，這些報告說，根據他自己偵察到的德國部隊及其調動情況，德國大軍在從列日兩側蜂擁而來，為數不下幾十萬，也許有70萬，“甚至上200萬人”。但法軍總司令部堅決認為這些數字肯定錯了。朗勒扎克力爭說，倘他的第五集團軍進入阿登山區，強大的德軍會在這時兵分三路從那慕爾、迪南和日韋向其翼側撲來。他那位素來意氣消沉，而今更是日益憂心忡忡的參謀長埃利·杜瓦塞爾，前往總司令部為朗勒扎克申述情由，接待他的那位軍官大發雷霆說：“怎么，又來了！你們的朗勒扎克還在擔心左翼被圍嗎？那不會的！”他還用總司令部的基調說：“要是真的被圍了，那就太好了！”

可是，盡管法軍總司令部決心不許干擾它預定在8月15日發動的主力進攻，但它對德軍右翼在策動包抄的越來越多的證據也不能完全無動于衷。8月12日，霞飛答應朗勒扎克把他左翼的軍移到迪南。“該是時候了。”朗勒扎克帶著譏諷的口吻輕聲低語，但他堅決認為這樣做已無濟于事，而必須把他的整個部隊西調才行。霞飛拒不答應，執意第五集團軍必須繼續東進，在阿登山區執行其指定的任務。霞飛一向唯恐有損自己的權威，這時，便對朗勒扎克說：“阻擋包圍戰的事兒，責不在你。”朗勒扎克就像所有敏于思考的人看到盲人騎瞎馬那樣憤慨，何況他又是一個慣于被人奉為戰略家的人，因此，他繼續對總司令部進行要挾。霞飛對他的不斷批評和無休止的爭論越來越惱火。霞飛認為，將領的整個職責就是戰斗似雄獅，服從如忠犬；但是，素有自己的見解，而今又感到局勢危急的朗勒扎克，則認為這種觀念是無法順從的。事后他寫道：“我內心的焦慮，與時俱增。”8月14日，亦即發動進攻的前夕，他親自趕到維特里。

在辦公室里，他見到霞飛和他的兩位左右手——參謀長貝蘭（Belin）和助理參謀長貝特洛。貝蘭一度以富有生氣著稱，而今卻因過度操勞顯得心力交瘁。貝特洛敏捷、機智，像英軍中他的對等人物亨利·威爾遜一樣，是個根深蒂固的樂觀派，要他感到會有什么麻煩事兒是生就的難事。他體重230磅，那是正值8月盛暑季節，他早就顧不得軍人的尊嚴，穿著開領短上衣，拖著涼鞋上班了。而朗勒扎克黝黑的克里奧爾人（Creole）的面孔，則已憂愁得兩頰深陷。他堅決認為，一旦他深入阿登山區，德國人將會出現在他左面，而阿登山區艱難險阻的不利地形既使他未必能速決速勝，又使他無法掉頭后撤，到那時將束手聽任敵人完成其包抄了。

霞飛用普恩加萊稱之為“奶油般的語調”對朗勒扎克說，他的擔心“為時過早”。霞飛還說：“我們認為德國人在那里并沒有什么部署。”他說的“那里”指的是默茲河西側。貝蘭和貝特洛也都一再保證“那里并沒有什么部署”，并努力一面安慰他，一面鼓勵他。他們力促他將被圍的想法置之腦后，只想進攻的事兒。朗勒扎克離開總司令部時，如他所說：“我的靈魂死了！”

他回到設在阿登山區邊緣的勒泰勒（Rethel）的第五集團軍司令部，看到案桌上放著一份總司令部情報處的一份報告，又頓增了末日來臨之感。該情報估計，敵軍在默茲河彼岸約有八個軍和四到六個騎兵師的兵力——事實上這還是低估的數字。朗勒扎克立即派副官帶了一封信去見霞飛，請他注意“來自你自己司令部”的情報，而且堅持第五集團軍調赴桑布爾河和默茲河戰區的事宜，應“立即著手研究和從事準備”。

與此同時，又有一個來訪的人憂心忡忡地來到維特里，試圖說服總司令部相信左翼處境危殆。當年霞飛不讓加利埃尼在總部任職時，梅西米把他安置在陸軍部負責處理各類報告。縱然那里面沒有霞飛存心不送給政府的那些來自總司令部情報處的報告，但加利埃尼從搜集的情報中已足以判定，大批德軍將如滔滔洪水向法蘭西奔騰而下。而這正是饒勒斯在談到有朝一日前線將調用全部后備力量時所曾預言的“可怕的沒頂之災”。加利埃尼對梅西米說，他必須去維特里敦促霞飛改弦易轍。但是梅西米就其資歷而論，與霞飛相差將近二十年，并且一向敬畏霞飛。他說，還是加利埃尼自己去好，作為霞飛在他事業上的一位感恩戴德的人物，霞飛不會不理他的。這是對霞飛的估計不足，霞飛此人是愛不理誰就不理誰的。加利埃尼來到之后，霞飛只會見他幾分鐘就把他交給了貝蘭和貝特洛。這兩位又把他們向朗勒扎克的保證對他重復了一遍。總司令部已決心“不理會證據”，并且拒不認為德軍在默茲河西岸的挺進是個嚴重威脅。加利埃尼回去后立刻向梅西米作了匯報。

然而，當天傍晚，法軍總司令部在情況越來越確鑿的壓力下開始動搖了。霞飛在答復朗勒扎克最后一份急電時表示同意“研究”調遣第五集團軍的建議，并準許作調動的“初步部署”，盡管他對朗勒扎克翼側的威脅仍然堅持“遠非迫在眉睫，遠非肯定無疑”的看法。及至第二天8月15日晨，威脅已越來越逼近。此時一心一意要大舉進攻的法軍總司令部忐忑不安地注意起左翼來了。上午9時許，給朗勒扎克掛了電話，授權他作部隊調動的準備，但在總司令親自下達命令之前，不得行動。整整這一天，總司令部收到了許多報告，都說一萬名德國騎兵已在于伊渡過默茲河；接著又收到一份報告說，敵軍正在進攻迪南，且已占領了右岸高岡上俯瞰城區的堡壘；其后又有報告前來說，敵軍已強渡過河，但遭到從左岸猛沖而下的朗勒扎克第一軍的回擊，經過一場鏖戰，敵軍已被趕過橋退回對岸去了［在這次戰斗的第一批傷員當中有一位二十四歲的中尉，此人就是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第一軍正就是8月12日批準過河的那支部隊。

對左翼的威脅，不能再低估縮小了。下午7時，霞飛親自下達了調遣第五集團軍進入桑布爾河和默茲河三角地帶的命令。他先用電話通知朗勒扎克，一小時后送去了手諭。法軍總司令部就此屈服了嗎？并不盡然。因為這道命令——第十號特別指令——對計劃的更動，給人的印象只是應付敵人包抄的威脅，而遠沒有到達放棄第十七號計劃的地步。命令承認，敵軍“似乎在日韋北面用其右翼準備大干一場”——好像朗勒扎克還要他告訴似的——并命令第五集團軍的主力開往西北，“會同英、比部隊作戰，狙擊北方來犯之敵”。但第五集團軍的一個軍則仍然要面向東北，支援第四集團軍，因為攻入阿登山區的主要任務而今已交由第四集團軍執行。這道命令的結果是把第五集團軍的戰線向西展開得更為寬廣，但沒有為此給它增加一兵一卒。

第十號命令指示新任先頭突擊部隊的第四集團軍司令德朗格勒·德卡里（de Langle de Cary）將軍做好進攻準備，“總方向是訥沙托”，亦即攻入阿登山區腹地。為了加強部隊的戰斗力，霞飛在德卡斯泰爾諾、朗勒扎克和德朗格勒三個集團軍之間進行了錯綜復雜的調動。結果，朗勒扎克統率訓練的兩個軍從他手下調開了，而調來的則是原不屬他指揮的別的部隊。盡管新來的部隊中有兩個師是從北非調來，德艦“格本”號曾企圖中途截擊的精銳部隊，但這種節外生枝的調動和臨陣時的突然改變，陡然增加了朗勒扎克的苦惱和失望。

法軍的其他部隊向東沖殺去了，朗勒扎克感到這是要讓他來防守法國這條毫無掩護的翼側，以對付他所認為是想置法國于死地的那一擊。他還感到給他的是最艱巨的任務——盡管總司令部拒不承認這點——而擁有的卻是最微薄的兵力。他想到與英、比兩軍協同作戰的前景，鑒于它們既是獨立的部隊，而兩軍司令的軍階都比他高，又素不相識，因此心境并不感到舒暢些。在赤日炎炎的8月里，他的部隊必須行軍80英里，這得要五天時間，而且即使能在德國人之前趕到桑布爾河戰線，他也擔心可能為時已晚。那時，德軍來勢之大，恐阻擋不了。

理應在他左側的英國人究在何處？時至今日，誰也沒有見過他們。縱然朗勒扎克能從總司令部探悉到英軍的確實下落，可是他對總司令部已不再信任。他憂心忡忡地懷疑法國已成了英國人背信棄義、耍弄陰謀詭計的犧牲品。英國遠征軍要么是一句騙人的鬼話，要么還在作參戰前最后一場板球賽。除非他部下有軍官能親眼看到遠征軍，否則他就不能相信有英國軍隊的存在。每天他派出偵察班，包括駐在第五集團軍的英國聯絡員斯皮爾斯（Spears）中尉在內，去野外偵察，但從未發現有穿黃卡其軍裝的部隊。斯皮爾斯執行的誠是一項奇怪的聯絡任務，連他本人在他一本聞名的著作中也未作解釋。找不到英國人的行蹤，又使朗勒扎克增加了岌岌可危之感。重重焦慮煎熬著他，他寫道：“我的苦惱，達到了五內俱焚的地步。”

在發布第十號命令的同時，霞飛要求梅西米從海岸防線調派三師本土軍去充實海峽和莫伯日之間的空白地帶。他寧愿挖盡老底來權宜應付德軍右翼的進攻，而不愿他念念不忘的中路進攻減少一兵一卒。他還不愿承認他在給敵人牽著鼻子跑。不論普天下有多少個朗勒扎克和加利埃尼，以及多少件偵察來的情報，都絲毫不能動搖法軍總司令部關于德軍右翼的力量越大，法軍從中路突破進而奪取主動權的前景越好這一堅定不移的主要信念。

德國人在比利時，猶如南美叢林中定期出現捕食其他動物的群蟻。群蟻所到之處都造成一條死亡線，德軍則是奪路前進，直穿田野、公路、村莊和城鎮，像群蟻那樣，不為河川或其他障礙物所阻。馮·克盧克的部隊從列日北面，馮·比洛的部隊從列日南面，沿著默茲河流域向那慕爾蜂擁而來。“默茲河是一條寶貴的項鏈，”阿爾貝國王曾說道，“而那慕爾又是項鏈上的一顆明珠”。默茲河流經兩邊是高岡的一個寬闊的峽谷，河的兩岸有著大塊空地。這里是一處度假勝地，每年的8月，是傳統的度假季節。家家戶戶在這里郊游野餐，孩子們在河邊嬉水，男人們坐在河岸太陽傘下垂釣，母親們坐在折椅上編織，白色扁舟揚帆輕飄而過，游覽船艇往返于那慕爾和迪南之間。這時，馮·比洛的一部分部隊正在列日和那慕爾之間的于伊渡河，沿著兩岸向比利時著名的第二個要塞挺進。那慕爾四周的堡壘圈，造得與列日一樣，它是進入法國前的最后一關。德國人完全相信他們的攻城大炮的鐵拳威力。在進攻列日時，這些大炮打得很出色，發揮了威力，現在正由馮·比洛的輜重車拖來完成第二項任務，他們指望三天內就可拿下那慕爾。而馮·比洛左邊的由馮·豪森將軍統率的第三集團軍，這時也正在向迪南挺進。這樣，朗勒扎克部隊在進入桑布爾河和默茲河三角地帶時，這兩支軍隊也將在那里會師。但是也就在施利芬的戰略在戰場上如期一一實現的時刻，孰料在后方他們的計劃卻出現了毛病。

8月16日，在軍隊集結時期結束之前一直待在柏林的德軍統帥部，遷到萊茵河畔的科布倫茨（Coblenz）來了，這里距德軍前線的中心約80英里。施利芬曾設想此時此地的總司令絕不應該做拿破侖，在高地上騎著白色駿馬觀察戰斗，而應做一個“現代的亞歷山大”，“在一所有很多寬暢的辦公室的房屋里”指揮戰爭，“在這里，手邊備有電報、電話和眾多無線電通訊設備，同時還有一支隨時待命出發的汽車和摩托車隊。在這里，這位現代的總司令坐在大桌旁的一只舒適的靠背椅上從地圖上綜觀著戰場全局。在這里，他用電話頒發激勵士氣的訓示，他批閱集團軍司令和軍長的報告以及來自偵察敵人動向的氣球和飛艇的情報”。

現實可破壞了這幅美景。這個現代的亞歷山大輪到毛奇擔當。毛奇自己也承認，他始終沒有從戰爭開始第一夜經受德皇折磨的痛苦中恢復過來。他理應用電話發給各司令“激勵士氣的訓示”，可他從沒有接觸過那些設備，即使接觸了，也會打不通。德軍在敵境作戰遇到的最大困難莫過于通訊方面的阻礙。比利時人切斷了電話、電報線路；埃菲爾鐵塔無線電臺強烈電波的干擾，攪得德方電訊必須重復三四遍始能把電文意思弄清楚。德軍統帥部唯一的一座收報臺因電路擁塞，電報得要八至十二小時才能通達。這是德國總參謀部所沒有預料到的“摩擦”之一，軍事演習時暢通的通訊誤導了他們。

比利時人毫不客氣的抵抗，俄國“壓路機”突破東普魯士的幻景，更使德軍統帥心煩意亂。參謀部內部產生摩擦了。深受普魯士軍官高傲自恃風尚影響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盟者。副參謀長馮·施泰因（von Stein）將軍，是眾所公認的一位足智多謀、心地善良、刻苦勤奮的人，不過德軍統帥部的奧國聯絡官卻說他粗魯暴躁、不夠圓通、好爭不讓，并且沾染了冷嘲熱諷和盛氣凌人的所謂“柏林衛士的風氣”。作戰處的鮑爾（Bauer）上校就痛恨他的首長塔彭（Tappen）上校對部下的那種“尖刻口吻”和“惡劣態度”。軍官們也牢騷滿腹，一則毛奇不許吃飯的時候喝香檳酒，再則德皇供給的伙食太差，飯后還得自己掏腰包買三明治充饑。

自法軍在洛林發動進攻的那時起，毛奇執行施利芬完全依靠右翼這一計劃的決心就開始動搖了。他和他的參謀人員指望法軍會調集其左翼主力前來迎擊德軍右翼的威脅。朗勒扎克焦急不安地派了偵察班去尋找英國人的下落，德軍統帥部也同樣在焦急不安地尋找法軍大部隊在默茲河西側活動的跡象，但到8月17日什么也沒發現。戰爭中出現敵人不如所望、不按照對己方最有利的方式行事這種問題，是夠惱人的，而今這個問題纏得德軍統帥部忐忑不安。他們從法軍在洛林地區活動頻繁而在默茲河西卻一無動靜的情況斷定，法軍正在集結主力準備通過梅斯和孚日山脈之間的洛林地區大舉進攻。他們考慮著有無重新調整整個戰略的必要。如果那是法軍主攻目標，那么德軍能否在其右翼進行包抄打一場決戰之前，把部隊調往左翼，在洛林地區先打一場決戰？能否真正打一場施利芬內心深處所向往的兩面包抄的名副其實的坎尼戰役？從8月14日到17日，德軍統帥部緊張地討論了這一誘人的前景，甚至還研究了將重心往左翼作某些初步轉移的問題。只是到了17日那天，他們判定法軍在洛林并不如所想象的那樣在集結部隊，遂又回到施利芬原來的計劃。

可是，一種主義的神明一旦遭到懷疑，就無法返回對它的絕對信仰。從那時起，德軍統帥部一見左翼有機可乘時，就為之心動。毛奇在思想上已不反對根據敵人動向改變作戰計劃。這樣，施利芬執意傾注全力于一翼，不問敵人行動如何必須嚴格執行的孤心苦詣的計劃被打破了。原來在紙面上顯得那么天衣無縫的計劃，現在在戰爭中，在情況變幻莫測的壓力下，特別是在感情沖動的壓力下破碎了。毛奇既然不讓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預先安排好的計劃上，由此每當要他作出決定時，便苦于拿不定主意了。8月16日，魯普雷希特王儲又要求作出一項緊急決定。

魯普雷希特要求允許反攻。魯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設在圣阿沃爾德（Saint-Avold），這是一座冷落的默默無聞的小鎮，坐落在骯臟不堪的薩爾礦區旁邊的一個深山幽谷里，那里沒有王孫公子的豪華生活可言，也沒有他可住的別墅，甚至連一家大旅館都沒有。他向西望去，廣闊的長空下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帶，一直延伸到摩澤爾河畔，沒有什么大的障礙物，在天際閃閃發光的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洛林的明珠：南錫。

魯普雷希特據理力爭，認為要在他的戰線上完成盡可能多地牽制法軍這一任務，最好的辦法是進攻，然而這一理論是和“口袋”戰略背道而馳的。從8月16日到18日，魯普雷希特司令部和總司令部用電話激烈討論了整整三天，好在這段電話線路是在德國境內。當前法軍的進攻是不是它的主要攻勢？法軍在阿爾薩斯和默茲河西岸似乎沒有“認真其事地”干些什么，這又說明了什么？如果法軍不向前推進并陷入“口袋”，那將怎么辦？如果魯普雷希特繼續后撤，那他與他的右鄰第五集團軍之間會不會敞開一個缺口，法軍會不會乘虛而入？這是否會招致右翼的失敗？魯普雷希特和參謀長克拉夫特·馮·德爾門辛根（Krafft von Dellmensingen）將軍都堅決認為這是可能的。他們說，他們的軍隊等候進攻的命令已等得不耐煩了，已難以管束他們了，迫使“急于前進”的部隊后撤也是可恥的；而且，開戰伊始就放棄洛林國土，即使是權宜之計，也絕非明智，除非事出萬不得已。

德軍統帥部對此既是神魂顛倒，又是膽戰心驚，一時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了少校參謀措爾納（Zollner）前往圣阿沃爾德第六集團軍司令部作進一步面商。他說，統帥部對有計劃后撤正在考慮作些變動，但是還不能完全棄口袋策略于不顧。他沒有解決問題就回去了。他剛走，第六集團軍司令部就收到一份飛機偵察情報，說當地法軍正在往后向大庫羅訥移動；第六集團軍參謀處“當即解釋”這是敵軍畢竟不在向前進入口袋的佐證，并且認為盡速向敵進攻乃是上策。

情況異常緊急。以魯普雷希特和馮·克拉夫特為一方跟馮·施泰因和塔彭上校為另一方之間的電話不絕。統帥部又派了一個信使多梅斯（Dommes）少校來到這里——這是8月17日——帶來的消息表明，現在發動反攻看來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時機。他說統帥部現在很有把握，法軍正在往其西翼調動，而并不是“束縛”在洛林上。他還談了攻城大炮在列日的威力，從這些威力看來，法國的堡壘陣線并不那么堅不可摧。他還說，統帥部相信英國人還沒有在歐洲大陸登岸，如果此時此地在洛林迅速打一場決戰，他們也許就永遠不會前來了。多梅斯少校又說：當然，根據毛奇的指示，他不得不提請注意這場反攻戰將冒種種危險，其中最主要的和壓倒一切的危險，將是一場正面攻擊——這在德國軍事學中是最忌諱的——因為那里山巒起伏，加上法軍堡壘林立，要進行包抄是不可能的。

魯普雷希特反駁道，進攻的危險并不大，危險大的倒是繼續后退。他說，他將出敵不意，把他們打得暈頭轉向；并說，他和參謀已考慮了種種風險，并能設法戰而勝之。魯普雷希特為他英勇的軍隊的進攻精神再一次大唱贊歌，而且越唱越響。他說這樣的軍隊絕不應再叫它后撤，同時聲稱，他已決心進攻，除非統帥部給他明確的禁令。“要么讓我進攻，”他聲嘶力竭地說，“要么就下一道明確禁止進攻的命令吧！”

多梅斯為王儲的“強硬口氣”所窘，便匆匆回到統帥部作進一步的請示。而在魯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則是“我們等著，擔心會不會來一紙禁令”。18日，他們整整等了一個上午。到下午，仍然音訊杳然，馮·克拉夫特于是掛電話給馮·施泰因要求告訴他是否會下達命令。他們兩人對一切有利的方面和疑慮不定之處又翻來覆去地爭論起來了。最后，馮·克拉夫特按捺不住，要求馮·施泰因直截了當地答復究竟是“行”還是“不行”。“噢，不，我們不會束縛你們的手腳不準你們進攻的，”馮·施泰因用一種不像是一位現代亞歷山大權威的口吻回答說，“你必須擔當起責任，本著良知作出你的決定。”

“早就決定了，我們進攻！”

馮·施泰因回答時“吶”了一聲，這是方言中一個說明無可奈何的表示，隨著又說：“那么，打吧，愿上帝保佑你！”

就這樣，口袋戰略被放棄了，命令下達給第六、第七兩集團軍掉轉身來準備反攻。

就在這期間，德國人認為尚未登陸的英國軍隊正在向法軍左翼末端的指定陣地移動。法國老百姓相繼報以欣喜若狂的歡迎，這與其說是對他們世代宿仇的英國人發自內心的熱愛，不如說是對一個同盟者在法國進行存亡攸關的戰斗時刻挺身而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感激。他們吻著英國兵，送他們食物，給他們戴上鮮花。在英國兵看來，宛如一個盛大的慶功會，而他們是受之有愧的英雄。

他們的總司令——嗜斗好爭的約翰·弗倫奇爵士是8月14日登岸的，同來的有默里、威爾遜和當時派到英國司令部任聯絡官的于蓋。他們在亞眠過宿，第二天來巴黎會見總統、總理和陸軍部長。簇擁在北火車站前面廣場上和街道兩旁歡迎的兩萬群眾欣喜若狂地高呼著：“弗倫奇將軍萬歲！”“好！好！好啊！英吉利萬歲！法蘭西萬歲！”通往英國大使館的大道上人山人海，人們揮手歡呼，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們。據說，這次歡迎群眾之多甚于歡迎飛越海峽的布萊里奧[[4]](#_4__Bu_Lai_Li_Ao__Louis_Bleriot)。

普恩加萊見到這位客人不禁一驚，他原來是一個“舉止文質彬彬……外表很少軍人氣派”的人。他嘴唇上留著一撮長長的胡須，看上去倒像個埋頭苦干的工程師，而不像一位享有盛名的沖鋒陷陣的騎兵司令。他看來慢條斯理而不怎么沖動。他有一個法國籍的女婿，在諾曼底（Normandy）還有一所避暑別墅，但說不了幾句過得去的法語。他從容不迫地向普恩加萊宣布，他的軍隊要十天時間，也就是要到8月24日才能作好作戰準備，這可使普恩加萊吃驚不已，因為這時候朗勒扎克已經擔心8月20日都可能為時過晚。“我們真是受騙上當了！”普恩加萊在日記中寫道，“我們以為他們早已準備就緒，而現今他們卻不能如期會合！”

確實，此公起了令人難以理解的變化。他之能夠獲得指揮權，除了資歷深和有得力的朋友外，一向是由于他的軍事熱忱。可是從他踏上法蘭西那時起，就開始表現出一種“等一等的態度”，表現了出奇的對把英國遠征軍投入戰斗的不情愿和斗志的消沉。這是基欽納強調保持實力，囑咐不要冒“死亡和損耗”風險的指示所致？還是因為他頓然察覺到英國遠征軍沒有訓練有素的預備役部隊為繼？還是因為登上大陸以后，強敵當前，近在咫尺，勢在必戰，因而感到責任重大？還是因為豪言壯語后面的那種膽識，已失其元氣于無形？還是因為抱有作戰異國，為人作嫁，責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歷其境、身當其職的人是不能判斷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約翰·弗倫奇爵士與盟友的會晤，從一開始就使他們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驚愕和氣憤。英國遠征軍開來法國的直接目的——防范法國為德國所滅——他似乎已置之度外，或者至少說，他對此反應似乎沒有迫切之感。他仿佛認為，基欽納一再強調要他獨立指揮，意思是他可以“愛什么時候打就什么時候打，愛什么時候休整就什么時候休整”，像普恩加萊所說那樣，可以不顧這時候德軍有無蹂躪法國的可能，叫人明日黃花話戰機。洞察一切的克勞塞維茨曾經指出，在作戰中切忌盟軍獨立指揮，如不可避免，則起碼要求其司令官“絕不應是個最謹小慎微的人，而該是個最有膽識氣魄的人”。在此后三周戰爭的關鍵時刻，克勞塞維茨的至理名言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8月16日，約翰·弗倫奇爵士走訪了維特里法軍總司令部，霞飛發覺此人“固執己見”而且“急于維護他自己軍隊的利益”。而約翰·弗倫奇爵士，也許出于英國軍官的過分講究個人社會背景，對霞飛也沒有好感。在英國人眼中，法軍在民主化的斗爭中產生了一種不幸的后果，大部分軍官出身于非“紳士階級”。“歸根結蒂，他們是一批微賤的家伙，”幾個月以后，約翰爵士在給基欽納的信中寫道，“人們要永遠牢記大多數法軍將領的階級出身。”毫無疑問，法軍的總司令是一個商人的兒子。

在這次會見中，霞飛很有禮貌但又很迫切地表示希望英國遠征軍能于8月21日在桑布爾河戰線會同朗勒扎克出師作戰。約翰·弗倫奇爵士一反他對普恩加萊的表示，說他將盡量如期趕上。他還要求霞飛調遣索爾代的騎兵隊和兩個后備師“直接由我指揮”，因為他將堅守法軍戰線末端無所掩護的陣地。這不用說，給霞飛一口拒絕了。約翰·弗倫奇爵士向基欽納匯報了出訪情況，他說貝特洛將軍和法軍參謀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深謀遠慮，從容不迫，充滿信心”，而且“毫無忙亂”現象。他對霞飛沒有發表任何意見，只說他看來似乎理解“等一等的態度”的好處，這可是一個不可思議、不言而喻的錯誤判斷。

接著，他走訪了朗勒扎克。第五集團軍司令部當時的情緒非常緊張，這從于蓋8月17日晨與久尋未獲的英國軍官同車到達時，埃利·杜瓦塞爾招呼他的第一句話中可窺見一斑。他說：“你們終于來了。但來得可一點兒都不算早，我們如果被打敗了，可要你們負責的。”

朗勒扎克將軍來到臺階上迎接客人。盡管這些客人親自光臨，仍未能消除他的疑心，他認為他為光桿兒司令們所騙。在隨后半小時的會談中，也沒有談出什么可使他放心的東西。這兩位將軍，一個不會說英語，一個幾乎不會說法語，可是接著就不帶譯員避入密室進行單獨會談。這種方式作用何在，實在令人費解，即使像斯皮爾斯中尉所說這是出于他們的保密狂，恐也難說明一二。不久，他們走出密室，來到作戰室和他們的參謀在一起。參謀中有些人通諳兩國語言。約翰·弗倫奇爵士戴上眼鏡，靠近作戰地圖看著。他指著默茲河畔一個地方——于伊，這個地名確實是很難讀的——想用法語問朗勒扎克是否認為德軍會在那里渡河。于伊的橋梁是列日到那慕爾之間唯一的橋梁，約翰·弗倫奇爵士提這問題時，馮·比洛的軍隊正在越橋過河，所以說他的發問，縱然是多余的，卻是正確的。他用法語先是結結巴巴地說不清“渡河”兩字，而由亨利·威爾遜接口用法語解決了，但到了要說“于伊”的時候，可又支支吾吾的了。

“他說什么？他說什么？”朗勒扎克急切地問道。

“……于伊，”約翰·弗倫奇爵士終于勉強說出來了，發音好像在招呼一條船過來似的（編按：英語中招船用語ahoy，與于伊，à Huy，發音近似）。

有人向朗勒扎克作了解釋，說英國總司令想知道他是否認為德國人會在于伊渡過默茲河。“告訴元帥，”朗勒扎克回答說，“我認為德國人是到默茲河釣魚來的。”他的這種語氣，用于回應在他的著名講座中提出愚蠢問題的人本無不可，但絕不是通常對待一位友軍陸軍元帥所應有的。

“他說什么？他說什么？”約翰·弗倫奇爵士雖不明白他說的內容，但對語氣則有所察覺，因此反問了兩聲。

“他說，德國人就要渡河了，先生。”威爾遜平心靜氣地回答說。

在這次交談產生的對立情緒下，誤解自然而生。在友軍之間容易發生摩擦的宿營地和交通線的問題上，首先出現了這種情形；而在使用騎兵的問題上，誤解又更為嚴重，兩方的司令都想用對方的騎兵進行戰略偵察。霞飛調給朗勒扎克的精疲力盡、鞋襪不全的索爾代軍，又剛被拉往桑布爾河北部去和比利時人取得聯系，以冀穩定他們不向安特衛普退卻。朗勒扎克和英國人一樣，迫切需要敵軍及其行軍路線的情報。他想使用英國騎兵師這支生力軍，但遭到約翰·弗倫奇爵士的拒絕。約翰·弗倫奇爵士帶來法國的部隊只有四個師，而不是原定的六個師，因此他想把騎兵留作后備力量，暫不動用。朗勒扎克聽約翰·弗倫奇爵士的口氣是說，他想把騎兵在戰場上用作騎馬的步兵，這是一種不光彩的用兵之計，而這位援救金伯利城的英雄是會像一個使用假餌釣魚的人樂于使用活餌一樣采取這種用兵之計的。

最嚴重的爭執是關于英國遠征軍何日能參戰的問題。前一天約翰·弗倫奇爵士還曾對霞飛說，他可以在21日準備就緒，但如今不知是純粹為了慪氣，還是出于三心二意，他竟又出爾反爾回到他原來對普恩加萊的說法，不到24日準備不好。這對朗勒扎克是個致命的打擊。難道這位英國將軍以為敵人會等著他嗎？他實在不能理解，不過沒有說出口來。很明顯，一開始他心中早就有底，英國人是靠不住的。會晤以“面紅耳赤”而告終。此后，朗勒扎克向霞飛匯報說，英國人“最早要到24日”才會準備就緒，他們的騎兵將作為騎馬的步兵使用，因此“休想派別的用場”，并且提出了“一旦退卻”，很可能在途中和英國人發生混亂的問題。這話使總司令部大吃一驚，這位眾所欽佩、敢作敢為的“真正雄獅”——朗勒扎克，竟然在考慮退兵了。

約翰·弗倫奇爵士回到臨時駐扎在勒卡托的司令部時也吃了一驚，聽說第二軍軍長、他的摯友格里爾森將軍當天早上在距亞眠不遠的火車上猝然逝世。弗倫奇點名提請基欽納派某一位將軍前來接替格里爾森——“此事務望如余所請”，他寫道——結果被拒絕了。基欽納派來了霍勒斯·史密斯―多林（Horace Smith-Dorrien）爵士將軍。此人與弗倫奇從未融洽相處過，他們兩個都是固執己見的人。像黑格一樣，史密斯―多林不大尊重這位總司令，喜歡自作主張、自行其是。約翰·弗倫奇爵士對基欽納的遴選表示不滿，這使他對史密斯―多林更加憎恨，并在事過境遷之后在他《1914年》一書中發泄出來了。這是一本可悲的、歪曲事實真相的文獻，一位著名的書評家曾說它是“歷來最使人遺憾的著作之一”。

8月17日，正是約翰·弗倫奇爵士會見朗勒扎克的那天，也正是魯普雷希特要求下令反攻的那天。也就在這天，德布羅克維爾首相來到盧萬的比利時總司令部謁見阿爾貝國王商討關于將政府從布魯塞爾遷往安特衛普的問題。據報道，四五倍于比軍且具有各個兵種的馮·克盧克的一些分遣隊，正在進攻15英里外的熱特河的比軍防線；馮·比洛所部一支8000人的部隊正在越過30英里外的于伊的橋梁，朝那慕爾挺進。列日一旦淪陷，那慕爾又將如何？德軍的集結期已告結束，其主力部隊正在進軍，而比利時的那些中立保證國的軍隊還沒有開到。“我們孤立了。”國王對德布羅克維爾說。他判定德軍或許會竄犯比利時中部，進而占領布魯塞爾，而“結局如何，尚難逆料”。他們確實指望法國騎兵會于是日來到那慕爾地區，霞飛在把騎兵的任務知照阿爾貝時也曾向他保證說，根據法國總司令部最可靠的判斷，德軍在默茲河西側的部隊只是一支“掩護部隊”。他并且答應將很快加派若干師前來與比軍協同對敵作戰，但阿爾貝國王認為集結在熱特河和于伊的德軍并不是一支掩護部隊，因此作出了將政府撤離首都的悲傷決定。8月18日，國王又下令將軍隊從熱特河全面撤往安特衛普防御陣地，將總司令部從盧萬向后遷到15英里外的梅赫倫（Malines）。

這道命令在比利時總參謀部激進派中產生了“難以置信的沮喪情緒”，而在普恩加萊總統的特使阿德爾貝上校心中更是如此。法國駐比利時公使后來懊惱地承認，這位特使精力充沛，才氣橫溢，沖鋒陷陣有余，執行外交使命“不足”。

“難道你們在僅僅一支騎兵掩護部隊的面前就要退卻嗎？”阿德爾貝勃然大怒地說。他驚詫不置，怒氣沖沖，責罵比利時人“恰恰在法國騎兵部隊到達桑布爾河和默茲河北部的時刻”，竟不向法國人打聲招呼就“拋棄”他們走了。他說，這在軍事上將造成嚴重的后果，在精神上將給德國人帶來巨大的勝利；這將使布魯塞爾失卻掩護，拱手“讓德國騎兵襲擊”。這些是他對敵人力量的估計，實際上兩天以后敵人以25萬以上的兵力占領了布魯塞爾。不論他的判斷多么錯誤，他的出言多么粗魯，從法國人的觀點說來，阿德爾貝上校的苦惱是可以理解的。比利時人向安特衛普的后撤，意味著在法軍大舉進攻的前夜，他們把軍隊從協約國防線的翼側上撤走并割斷了和法軍的聯系。

8月18日這一天，國王一方面想拯救比軍，使之免遭覆滅之災，一方面又不愿在法國援軍可能到達的時刻放棄有利陣地，因此舉棋不定，苦惱萬分，幾經改變決定。但在這一天即將過去的時候，霞飛當天發布的第十三號命令給他解決了進退維谷的困境。命令明確了法軍主力將致力于另一方向，而將默茲河西部交由比軍防守，由法軍第五集團軍和英國部隊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援。國王遂此不再猶豫，他重申前令向安特衛普退卻。當夜，比利時的五個師脫離了熱特河陣地，向安特衛普撤退，8月20日抵達目的地。

霞飛的第十三號命令是大舉進攻突破德軍中路的“準備”信號，而一舉突破德軍中路則是法國人全部希望所系。此項命令是發給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團軍的，同時知照了比、英兩軍。命令指示呂夫將軍的第三集團軍和德朗格勒·德卡里將軍的第四集團軍準備進攻阿登山區，同時飭令第五集團軍根據對默茲河西側德軍力量的最后估計，從下述兩個作戰方案中進行抉擇。第一個方案是由朗勒扎克“與比、英兩軍通力配合”，向桑布爾河北面進攻；第二個方案是，倘敵人“僅將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用于默茲河西側，即由朗勒扎克回渡默茲河，支援向阿登山區進攻的主力部隊，“由比、英兩軍負起對付桑布爾河和默茲河北部的德軍的任務”。

這是一道行不通的命令。當時朗勒扎克統率的部隊，不是一支統一的部隊，而是一支左右展開長達30英里寬、擁有三個軍和七個獨立師的龐大的混合部隊，并正在向桑布爾河挺進。而命令卻要他面對兩個方向，并且在第二個方案中還要他折返他僅三天前好容易才把部隊調離的陣地。這道命令本可以使朗勒扎克陷入無能為力的境地而聽由霞飛來抉擇。但朗勒扎克卻不然，那句倘敵人動用的僅是“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的話，使他決定不再相信總司令部了。他對第二個方案置之不理，繼續向桑布爾河挺進。他向霞飛報告說，他將于8月20日進入陣地，反擊企圖在那慕爾和沙勒魯瓦之間渡河的任何敵軍，“把他們攆回去，叫他們葬身桑布爾河”。

朗勒扎克的部隊向集結地邁步前進，高唱著法軍心愛的《桑布爾河和默茲河進行曲》，此乃紀念1870年之戰的一支進行曲：

自由在呼喚，為了自由

桑布爾、默茲大軍踏上征途！

尋求通往人類永生的光輝道路。

自由在呼喚，為了自由

桑布爾、默茲大軍戰死沙場！

寫下他們永垂不朽的光輝篇章。

第十三號命令之所以發布，是出于法軍總司令部執行第十七號計劃的堅定不移的決心，把速戰制勝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這一計劃上。8月間，戰爭剛爆發時期，速戰速決的思潮仍然居于上風。法軍總司令部堅信，無論德軍右翼多么強大，法軍如果發動進攻，破其中路，就可使之陷于孤立，一舉殲滅之。當天夜晚，梅西米對桑布爾河下游國境線的防御薄弱感到“憂心”，于是打電話給霞飛；可是對方回答說，總司令已就寢。梅西米對他的敬畏勝過對防線的“憂心”，便同意不要去驚醒他。貝特洛將軍安慰梅西米說：“如果德國人膽敢輕舉妄動從比利時北部策劃包抄，那就太好了！他們在右翼的人馬越多，我們從他們中路突破就越加容易。”

那天，德軍右翼正通過比利時兜過來，馮·克盧克、馮·比洛和馮·豪森所部，正從外、中、內三路分別向布魯塞爾、那慕爾和迪南挺進。由比利時第四師和衛戍部隊守衛的那慕爾已陷于孤立，盡管列日已遭不幸，但人們仍普遍認為那慕爾是個堅不可摧的堡壘。那些曾留心列日戰役的人，也認為那慕爾能堅守的時間，至少足以讓朗勒扎克渡過桑布爾河前來與守軍會師，把部隊部署于那慕爾四周的堡壘圈。但是原任法國駐布魯塞爾的陸軍武官、現任駐那慕爾聯絡官迪律伊（Duruy）少校于8月19日曾消極悲觀地向朗勒扎克報告說，他認為這個要塞不能堅守多久，因為那里的守軍與其他部隊的聯系已被切斷，彈藥匱乏，士氣低落。盡管他的判斷在很多人中是有異議的，但他仍然堅持他那悲觀的看法。

8月18日，馮·克盧克的先頭部隊到達熱特河，發現比軍的行動使他們的計劃不能得逞。馮·克盧克的任務就是消滅這支比軍。他本想插入這支比軍和安特衛普之間，趕在它撤往安全基地之前將它圍殲，可是為時太晚了。阿爾貝國王的后撤命令挽救了軍隊，保存了實力，并使這支部隊日后在馮·克盧克轉向南下進攻巴黎時成了他的后方的一個威脅。“他們老是有辦法逃脫我們的手掌，所以他們的軍隊既沒遭到決定性的打擊，也沒有被迫退出安特衛普。”這就是馮·克盧克送向統帥部的無可奈何的匯報。

馮·克盧克必須立刻轉而向南推進，因為他不但后有比軍，而且前有英國部隊這個新的敵人。德國人推測，英國人合理的登陸地點該是靠近比利時前線的幾個口岸，而且馮·克盧克的騎兵偵察隊具有人類非凡的才能，可以看到人們主觀愿望想看到而實際上并不存在的東西，該隊報稱英國人于8月13日分別在奧斯坦德（Ostend）、加來和敦刻爾克（Dunkirk）登岸。這樣這些英國人幾乎隨時都會穿過馮·克盧克的戰線。事實上，他們根本不是在這些地方，而是在還要往西南一些的布洛涅、魯昂和勒阿弗爾等港口登陸的。可是英國人在奧斯坦德登陸的報告卻使德軍統帥部憂心忡忡，擔心馮·克盧克揮戈南下時，其右翼會受到他們的襲擊，如果馮·克盧克將左翼調過來迎戰，則他和馮·比洛兩軍之間又可能造成缺口。為了防范這種危險，統帥部于8月17日命令馮·克盧克聽從馮·比洛指揮。克盧克為之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德軍統帥部竟在同一天一面根據英國人在奧斯坦德登陸的報告采取了行動，一面卻又通知魯普雷希特說，英軍還沒有登陸，也許永遠不會來了。這真是一件戰地奇聞，我們只能猜測個中原因：也許是德軍統帥部內負責左翼的參謀官員和負責右翼的參謀官員不屬一個部門而又互不通氣的緣故。

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的兩位司令都是再過兩年即達七旬高齡的人了。馮·克盧克其貌不揚，黑色皮膚，一副可怕相，看上去不像年近七十的人。馮·比洛就不同了，須發霜白，面孔虛腫，顯得蒼老得多。馮·克盧克在1870年的戰爭中負過傷，五十歲時榮獲象征貴族的“馮”的名號，在發動戰爭以前就被遴選為向巴黎進軍的主要角色。他的部隊被視為右翼的主力，是錘子的頭部，制約著全線的步伐，且備有最雄厚的打擊力量，每英里戰線的兵士密度為18000人（約為每米10人）。相比之下，馮·比洛每英里僅為13000人，而魯普雷希特就更少了，為3300人。統帥部提心吊膽，唯恐出現缺口，因此認為馮·比洛地處右翼中堅的有利地位，最宜于擔當協調三軍并駕齊驅之責。馮·克盧克對這種安排極其不滿，于是對馮·比洛的每日行軍進程的命令百般刁難，再加上通訊遭到破壞，因而造成極大的混亂，使得統帥部十天以后不得不撤銷這道命令——于是，一個缺口果真無可挽救地出現了。

比利時人比馮·比洛更使馮·克盧克惱火。比利時軍隊迫使德軍每前進一步得作戰一步，從而推遲了德軍前進的時間表；同時，他們炸毀鐵路、橋梁，切斷德軍軍火、糧食、藥品、郵件以及其他補給品的運輸供應，迫使德軍不得不經常抽調力量來維持后方運輸的暢通。老百姓堵塞了公路，更糟的是他們切斷電話和電報線，使德軍不但各集團軍與統帥部之間難以溝通，而且集團軍與集團軍之間、軍與軍之間的電訊聯系都遭到破壞。這種被馮·克盧克稱為“極端挑釁性的游擊戰爭”，特別是自由射手對德國兵的狙擊，觸怒了他和他的那些袍澤司令。從他的部隊進入比利時之時起，他就認為要對付老百姓的這種“叛逆性”的襲擊，必須采取他所說的如“射殺個人、焚毀房屋”等方式的“嚴厲而無情的報復”。因此，第一集團軍所到之處，焚毀的村莊、打死的人質，比比皆是。8月19日，德軍渡過熱特河，發現比利時軍隊已于夜間撤離之后，便對熱特河和布魯塞爾之間的一個小鎮阿爾斯霍特（Aerschot）大肆泄憤，使該鎮成為大屠殺的第一個受害者。在阿爾斯霍特，被槍決的平民有150人。此后，馮·比洛所部在阿登山區和塔明（Tamines）的屠殺，其殺人之多，愈演愈烈，而馮·豪森所部在迪南更是殺人如麻，多達664人。他們把居民集中在大廣場上，通常將男女各分站一邊，任憑個別軍官的心血來潮，從中挑選逢十或逢雙的人，或是將所有的人押到附近的田野或火車站后面的空地上槍決。如今在比利時，許多城鎮的公墓里，墓碑林立，上面刻著姓名、1914年的日期和一致的銘文——“為德軍槍殺”。公墓中還有很多更新更長的墓碑行列，碑上是同樣的銘文，但日期則是1944年。

第三集團軍司令馮·豪森將軍如同馮·克盧克一樣，認為比利時人在其進軍的道路上給他們的“重重障礙”是“叛逆性”的行為，應該“毫不猶豫地給以極為嚴厲的”報復。這些報復手段包括“逮捕莊園主、市長、神父等顯要人物作為人質，燒毀房屋和農莊以及槍殺現行敵對分子”。豪森的軍隊盡是薩克森人；“薩克森”這個名字在比利時人心目中已成為“野蠻人”的同義詞。豪森本人對“比利時人的這些敵視行為”始終不能理解，每當發現“我們是多么遭人怨恨”的時候，總是驚訝不已。他曾在德格雷蒙（D’Eggremont）伯爵家里住過一夜。這個擁有40個房間，有許多溫室和花園，還有能容納50匹馬的馬房的豪華莊園的主人一家，對他的冷遇使他深為抱怨。這位年邁的伯爵，“手插在口袋里，捏緊著拳頭”在那里徘徊；兩個兒子則決計不到餐桌旁去，這位父親就餐時也是姍姍來遲，緘口不言，甚至問他什么話都拒不作答。盡管豪森態度寬容，命令憲兵不要沒收他在東方任外交職務期間收集的中國和日本武器，而此公態度仍然惹人討厭。這是一個非常苦惱的經歷。

然而，德軍對比利時的報復行動，除個別情況外，并不是對比利時人的挑釁行為一時自發的反應，而是德國人事事未雨綢繆的一個預先謀劃，他們企圖以此盡快地嚇倒比利時人，好節省時間、節省人力。速度是至要的。把每一支可動用的部隊都開入法國同樣是至要的；如果比利時抵抗，那就需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就會影響這個目標的實現。通告已預先印好，只要德軍一進城，就像發生了《圣經》中所說的那種瘟疫一樣，全城的墻壁驟然變成一片白色，挨家挨戶頃刻之間都被貼上了通告，警告老百姓不得采取任何“敵對”行動。老百姓凡向德軍士兵開槍的，一律處以死刑，其他種種微不足道的行為也同樣處以極刑：“任何人走近飛機或氣球場地200米以內的，當場格殺勿論。”凡屋內發現有隱藏武器的，其屋主一概槍決。凡戶內發現有比利時士兵躲藏的，其戶主一概解送德國服“終身”勞役。凡村里對德軍犯有“敵對”行動的，全村一概“燒毀”。倘“敵對”行動發生在“兩村之間的道路上，此類辦法同時適用于兩村居民”。

通告最后總括說：“對于一切敵對行動，均采用下列原則：嚴懲不貸，集體負責，大量扣押人質。”這種連帶責任制，海牙公約早已明文列為非法，所以在1914年，對人類進步曾抱有信心的世界輿論大為震驚。

馮·克盧克抱怨說，不知怎的，方法用盡，而“去邪除惡，總遲遲不見成效”。比利時老百姓仍然視之為不共戴天之仇。“平民百姓的那些罪惡行徑嚙噬著我軍的生機。”于是，德軍的報復日益頻繁，日趨殘酷。大批協約國、美國以及中立國家的記者紛紛向全世界報道火燒農莊、硝煙彌漫的情景，難民成群、途為之塞的情況，市長、鎮長作為人質被處決的慘狀。這些記者由于霞飛和基欽納的禁止不得去前線采訪，因此從戰爭爆發的第一天起便蜂擁來到比利時。一批美國記者是筆下栩栩如生的寫作大師，他們當中有報業辛迪加（Syndicate）的理查德·哈丁·戴維斯（Richard Harding Davis）、《柯里爾》（Collier’s）雜志的威爾·歐文（Will Irwin）、《星期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的歐文·科布（Irwin Cobb）、《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的哈里·漢森（Harry Hansen）、《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的約翰·T. 麥卡琴（John T.McCutcheon），等等。他們獲有德軍頒發的證件，一直在隨軍采訪。他們寫了種種慘象：劫后的房屋狼藉遍地，火后的農村空無一人，只是在毀壞的臺階上有一只不聲不響的貓兒蜷伏在那里；街道上盡是破瓶子和碎玻璃；母牛帶著干癟的乳房在痛苦地哞哞叫著；難民隊伍絡繹不絕，背著包袱，趕著馬車，推著小車，帶著雨夜在路邊過夜用的雨傘；田野里，成熟了的谷穗兒低垂著頭無人收割，等等。他們還報道了反復被問及的一連串問題：“你們看見法國人了嗎？法國人在哪里？英國人在哪里？”路上躺著一個破舊的布娃娃，頭已給炮車輪子壓扁了，這在一個美國記者的心目中，似乎象征著比利時在這場戰爭中的厄運。

8月19日，正當25英里外的阿爾斯霍特炮火連天的時候，布魯塞爾是一片叫人感到大難將臨的沉寂。政府已于上一天撤走。街道上仍掛滿國旗，陽光下國旗招展，紅、黃輝映。首都在最后時刻似乎格外妖嬈，但是越來越沉寂，已是一座愁城。就在日落西山前，第一批法軍出現了，一隊騎兵慢吞吞地沿著圖瓦松多爾（Toison d’Or）大街蹀躞而來，士兵沒精打采，馬頭低垂。幾小時后，四輛汽車滿載著身穿從未見過的那種卡其制服的軍官疾駛而過。人們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有氣無力地歡呼著：“英國人！”比利時的盟軍終于來到了，可是為時過晚，已挽救不了它的首都。19日這天，難民源源不斷地從東面涌進城來。國旗紛紛下降，居民已受到警告，氣氛中蘊藏著危在旦夕的惡兆。

8月20日，布魯塞爾被占領了。一隊隊手持旗桿矛、戒備森嚴的德國槍騎兵驟然出現在街頭。但他們只是可怖的軍事示威游行的先遣部隊而已，后面接踵而來的隊伍，其兵力之強、威勢之盛，幾乎難以置信。隊伍是1點鐘開始通過的，首先是一隊隊身穿土灰色軍服的步兵，修飾得很整潔，胡子刮得光光的，皮靴擦得亮亮的，刺刀在陽光下閃閃發光，隊伍嚴肅緊湊，一有掉隊，一出現空檔，后面就迅捷趕上。接著騎兵來了，也是土灰色的軍服，旗桿矛上飄著黑白色的三角旗，儼然是中世紀的騎士。密集而無數的馬蹄，一片整齊劃一的蹄聲，征途上的任何東西都會被踩得稀爛似的。炮兵隊的重炮輪子在圓石子路上滾滾向前，聲如雷鳴。鼓聲隆隆，士兵們拉開嘶啞的嗓門齊聲高唱著用《上帝保佑國王》的曲子譜成的《祝你永戴勝利花冠》的凱歌。前進又前進，隊復一隊，越來越多。觀看行軍的人群，默默無言，對這支隊伍的浩浩蕩蕩、綿延不絕、精良絕倫，不禁茫然咋舌。顯示裝備力量，使人肅然敬畏的目的達到了。設有補鞋作坊的卡車車隊固然使人驚奇，而由四匹馬拖曳的炊事車車隊同樣令人驚訝。補鞋作坊車上，鞋匠們站在工作臺旁打掌子，修鞋子的士兵們站在踏腳板上等候。炊事車上，則是爐火熊熊，炊煙裊裊。

隊伍靠著大道的一邊行走著，好讓參謀的汽車和通訊員的自行車沿途往返通行無阻。騎兵軍官，有的叼著香煙，傲然目空一切，有的戴上單片眼鏡，有的脖頸子上道道橫肉，有的拿著英式馬鞭，形態不一，但全都是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征服者的行軍走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走了整個下午、整個晚上，通宵達旦，直到第二天。就這樣，馮·克盧克的32萬大軍整整三晝三夜川流不息地開進了布魯塞爾。一個德國總督接管了這座城市，市政大廳上升起了德國國旗，時鐘都改為德國標準時間。同時，規定首都十天內須償付5000萬比利時法郎（等于1000萬美元）賠款，布拉邦特省償付4.5億比利時法郎（等于9000萬美元）賠款。

在柏林，攻占布魯塞爾的消息傳來，鐘聲齊鳴，街頭巷尾一片興高采烈的歡呼聲，人們欣喜若狂，互不相識的人也緊相擁抱，到處是“狂歡”景象。

也就在這一天，8月20日，法國的進攻計劃并未卻步。朗勒扎克業已到達桑布爾河，英軍也已趕到同一條線上。約翰·弗倫奇爵士一再搖擺不定之后，此刻向霞飛保證說，他準定于次日投入戰斗。豈料，洛林傳來了噩耗，魯普雷希特已以雷霆萬鈞之勢開始反攻。德卡斯泰爾諾的第二集團軍，由于霞飛把他的幾個軍調往比利時前線而力量懸殊，正在退卻之中。據報告，迪巴伊正遭到猛烈的攻擊。在阿爾薩斯，在德軍兵力大大減少的情況下，波將軍已奪回米盧斯及其周圍地區。而今，由于朗勒扎克所部已開往桑布爾河，調走了中路進攻的力量，波將軍所部勢需前去接替空下的陣地。但是霞飛出于急需，甚至不惜把阿爾薩斯作為第十七號計劃祭壇上的最大的祭品，毅然作出了撤出波將軍所部的決定。雖然像布里埃（Briey）鐵礦一樣，阿爾薩斯是可望隨勝利而收復的，但是波將軍在給剛解放的人民的最后一份公告中，字里行間流露了他內心的悲觀失望。他寫道：“在北方，大戰開始了。這一仗將決定法國的命運，同時也將決定阿爾薩斯的命運。為了這場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攻，總司令在那里集中了全國的兵力。而我們深感遺憾的是，為確保阿爾薩斯的最后解放，我們不得不暫時撤離阿爾薩斯。這是出于委曲求全的需要，是阿爾薩斯部隊及其司令所不得不服從的，是他們非到最后萬不得已絕不會這樣做的。”自此以后，留在法國人手中的只不過是環繞坦恩（Thann）周圍的一塊小小的楔形領土而已。11月，霞飛來到這里，對默默無語的群眾只是說了聲“給你們帶來了法蘭西的慰問”。在場的群眾無不淚流滿頰，泣不成聲。阿爾薩斯其他地區的最后解放得等待足足四年之久。

在桑布爾河戰線上，朗勒扎克定于第二天發動進攻。這里，依照斯皮爾斯中尉的話說：“20日這天，對部隊是個激動的日子。氣氛緊張，有一發千鈞之感，人人感到一場大戰迫在眉睫。第五集團軍的士氣極為旺盛……他們都深信必勝無疑。”他們的司令卻并不如此。霞飛最后時刻派往英軍左翼的那三個本土師的司令達馬德（d’Amade）將軍，也坐立不安。貝特洛將軍在答復他向總司令部提出的問題時說：“有關德軍在比利時的種種情報，都言過其實，沒有什么理由可以大驚小怪的。按我的命令部署，眼下足可應付。”

當天下午3時許，第四集團軍德朗格勒·德卡里將軍向總司令部報告了他的防線對面敵人的調動情況，他問霞飛要否立刻開始進攻。總司令部仍然堅信德軍調往右翼越多，其中路就越弱。“我曉得你已按捺不住了，”霞飛回答道，“可是依我看，進攻的時刻還未到來……在我們轉入進攻的時候，那地區（阿登山區）的敵軍越是空虛，我們第四集團軍在第三集團軍支援下進攻的效果，可以預料，就會越好。因此，十分重要的是必須讓敵人在我們的鼻子下涌往西北，而不要過早地進攻他們。”

當夜9時，霞飛判斷時間來到了，于是下令第四集團軍立刻開始進攻。這是一個多么激動的時刻！8月20日，夜幕降臨時，霞飛向梅西米報告說：“現在有理由信心百倍地期待戰局的發展。”

注釋

[[1]](#_1_12) 洛拉·蒙特茲（Lola Montez，1818—1861），英國女演員。——譯注

[[2]](#_2_9) 里夏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國著名作曲家。——譯注

[[3]](#_3_9) 沙勒魯瓦，原文為Charleroi，意為查理王。——譯注

[[4]](#_4_4) 布萊里奧（Louis Blériot，1872—1936），法國飛行家，1909年第一次駕飛機飛越英吉利海峽。——譯注

Spears’ narrative, Chapters IV through VIII, is the most vivid and valuable in English for the Sambre and Meuse front if its strong anti-Lanrezac bias and other prejudices are skirted and Lanrezac, Engerand, and other French accounts are read to balance it. All French orders cited are in the Annexes to AF, I, I.

“感謝上帝，幸好我們一尊也沒有！”：qtd. Monteil, 34; also on the artillery, Dubail, 44; Messimy, 86–87.

魯普雷希特集團軍的“口袋”戰術：Rupprecht, 12, 15.

巴伐利亞王宮在英王查理被處決的紀念日披白玫瑰素裝：NYT, Obituary of Rupprecht, August 9, 1955.

“野蠻人”：Dubail, 39.

朗勒扎克將軍對左翼的擔心及其請求將第五集團軍向左移動的努力：Lanrezac, 67–77.

“甚至上200萬人”：Percin, 105.

“怎么，又來了！”：Lanrezac, 73.

“阻擋包圍戰的事兒，責不在你”：Pierrefeu, Plutarque, 69.

“我們認為德國人在那里并沒有什么部署”：Lanrezac, 78.

“我的靈魂死了！”：ibid.

朗勒扎克就情報處報告寫給霞飛的信：ibid., 79; Annexe No. 283; Joffre, 159.

加利埃尼來到維特里：Joffre, 158; Messimy, “Comment j'ai nommé Gallieni,” Revue de Paris, September 15, 1921, 247–61.

霞飛準許作調動的“初步部署”：Annexe No. 270.

第十號特別指令：Annexe No. 307.

錯綜復雜的調動：Joffre, 164; Engerand, 523–4.

朗勒扎克懷疑英國人背信棄義：Spears, 89.

“現代的亞歷山大”：Schlieffen's Cannae, qtd. Earle, Modern Strategy, 194.

德軍電話、電報線路擁塞，電波信號受到干擾：Bauer, 47; Kuhl, qtd. AQ, January 1921, 346.

馮·施泰因粗魯暴躁、不夠圓通、好爭不讓，有“柏林衛士的風氣”：Sturgkh, 24.

塔彭上校對部下的“惡劣態度”：Bauer, 34.

毛奇不許吃飯的時候喝香檳酒，及德皇供給的伙食差：ibid., 46.

德軍統帥部權衡是否把部隊調往左翼：Tappen, 103–4.

魯普雷希特和克拉夫特主張進攻的理由：Rupprecht, 13–21; these and the following account of events at Sixth Army Hq., visits of Zollner and Dommes,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and OHL are from Krafft, 12–22.

弗倫奇到達法國時得到民眾的歡迎及普恩加萊的反應：Guard, 23; Poincaré, III, 51.

“等一等的態度”：French, 39.

“愛什么時候打就什么時候打”：Poincaré, III, 225.

克勞塞維茨：“最有膽識氣魄的人”：qtd. Poincaré, III, 169.

弗倫奇拜訪霞飛：Joffre, 161; French, 34–5.

“歸根結蒂，他們是一批微賤的家伙”：qtd. Magnus, 302.

法軍參謀部給弗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to Kitchener, August 17, French, 39–40.

“你們終于來了”：Huguet, 51.

朗勒扎克與弗倫奇的會面以及關于于伊的討論：Besides the accounts of the two principals, which are of little interest, there are four eyewitness reports of this encounter: Wilson's in Callwell, 164; Spears, 72–82; Huguet, 51; and a postwar speech by Captain Fagalde, Intelligence officer of Lanrezac's staff, to the Forum Club, London, qtd. AQ, April 1925, 35.

在騎兵使用和英軍參戰日期等問題上的誤解，以及朗勒扎克向霞飛的匯報：Spears, 80–81; Annexe No. 430.

“此事務望如余所請”：French, 40.

史密斯―多林與弗倫奇從未融洽相處過：Bridges, 80.

“歷來最使人遺憾的著作之一”：J. W. Fortescue, Quarterly Review, October 1919, 363.

比利時首相德布羅克維爾與國王阿爾貝的會談：Galet, 103, 116–19.

德軍在默茲河西側的部隊只是一支“掩護部隊”：Galet, 106.

“難以置信的沮喪情緒”：Galet, 122.

阿德爾貝勃然大怒：Klobukowski, Résistance belge; D'Ydyewalle, 109; Galet, 122.

第十三號命令：Annexe No. 430.

“把他們攆回去，叫他們葬身桑布爾河”：Spears, 92.

貝特洛將軍安慰梅西米：“如果德國人膽敢輕舉妄動從比利時北部策劃包抄，那就太好了！”：Briey, March 28, evidence of Messimy.

迪律伊少校：Spears, 87–8, 94.

“他們老是有辦法逃脫我們的手掌”：Kluck, 32.

馮·克盧克的騎兵偵察隊在奧斯坦德發現英軍：Kluck, 18.

克盧克怒不可遏：Kluck, 22; Bülow, 37.

德軍兵士密度：Edmonds, 44.

馮·克盧克對馮·比洛的每日行軍進程的命令百般刁難：Kluck, 29–30.

“嚴厲而無情的報復”：ibid., 25–6.

在阿爾斯霍特，被槍決的平民有150人：Whitlock, 209; Dinant: Gibson, 326–29. Method of procedure: Gibson, 151; Whitlock, Cobb, et al, see Notes to Chap. 16.

豪森語：Hausen, 25, 135, 141, 152–3.

德軍在占領區內的通告：Whitlock, 70–71; 162.

“去邪除惡，總遲遲不見成效”：Kluck, 26.

地上破舊的布娃娃在一個美國記者心中似乎象征著比利時在這場戰爭中的厄運：Cobb, 79.

德軍進入布魯塞爾：Gibson, 115; Whitlock, 113, 124–6, 138.

柏林的“狂歡”景象：Blücher, 20.

波將軍撤出前給民眾的公告：La France héroïque et ses alliés, Paris, Larousse, 1916, I, 44. Joffre's speech at Thann: Hinzelen, Emile, Notre Joffre, Paris, Delagrave, 1919, 39.

貝特洛將軍：“沒有什么理由可以大驚小怪的”：Annexe No. 587.

“我曉得你已按捺不住了”：Annexe No. 589.

“現在有理由信心百倍地期待戰局的發展”：Annexe No. 585.

## 第13章　在洛林、阿登、沙勒魯瓦、蒙斯等地的潰退

“一想起世上前所未聞的最大的一場大戰，不出這星期就要打起來了，”亨利·威爾遜8月21日在日記中寫道，“真叫人感到既光榮又可怕。”其實，他寫這篇日記時戰爭已經開始。整個西線，自8月20日至24日就已炮火連天，打了四個戰役，歷史上統稱之為邊境戰役（Battle of the Frontiers）。勝負初見于8月14日起就一直在打的右翼的洛林，并波及整個邊境戰線。就這樣，洛林戰役影響著阿登戰役，阿登戰役影響著桑布爾河―默茲河戰役（習稱“沙勒魯瓦戰役”），而沙勒魯瓦戰役又影響了蒙斯戰役。

在洛林，到8月20日上午，迪巴伊將軍的第一集團軍和德卡斯泰爾諾將軍的第二集團軍在進攻薩爾堡和莫朗日兩地德軍嚴陣以待的防線時，已被打得焦頭爛額，頭破血流，吃了苦頭。對配有重炮、鐵絲網以及隱蔽在掩體中的機槍的防御陣地，“殊死進攻”的局限性立即暴露無遺。法軍野戰條例的突擊戰術，是依據步兵部隊向前沖刺20秒鐘，推進50米，而敵人來不及端槍、瞄準、射擊這一估計制定的。正如后來一個法國士兵痛心疾首所說的那樣，所有這些“在演習時那樣苦苦操練的科目”在戰場上都被證明是愚不可及的蠢事。敵軍機槍只需8秒鐘而不是20秒鐘就可以射擊。野戰條例也還核定：用75毫米口徑的大炮發射的榴霰彈會迫使敵人抬不起頭來而只能“朝天開火”，從而“壓制”防御一方。然而，正如伊恩·漢密爾頓據日俄戰爭經驗提出的告誡那樣，敵人在榴霰彈轟擊下如有壕溝上的胸墻掩護，是可以繼續從槍眼里向進攻者直接射擊的。

這兩位法國將軍，盡管受挫，仍命令于8月20日前進。沒有密集炮火的掩護，他們的部隊就這么撲向德軍鞏固的防線。德軍統帥部沒有勇氣拒絕魯普雷希特的反攻要求，反攻也就在同一天上午開始了，炮火凌厲，打得法軍隊伍支離破碎。德卡斯泰爾諾屬下福煦的第二十軍組成了突擊的先頭部隊，前進至莫朗日德軍防線前受阻卻步。魯普雷希特所部巴伐利亞士兵，士氣高昂，躍躍欲試，他何甘壓抑。他們轉而進入反攻，一舉沖進法國國土。在法境，一有人叫喊“自由射手”，他們便狼奔豕突，大肆燒殺擄掠。梅斯和南錫之間的摩澤爾河峽谷中，有一老鎮諾梅尼（Nomeny），在8月20日這一天，就有50名黎民喪命于槍口和刺刀之下。炮擊之后剩余下來的一半房屋，經巴伐利亞第八團馮·漢納佩爾（von Hannapel）上校一聲令下，也被付之一炬。

全線陷于苦戰的德卡斯泰爾諾所部，這時左翼正遭到梅斯的德國駐軍分遣隊的猛攻。左翼垮了，后備隊業已全部投入作戰，德卡斯泰爾諾意識到進攻的全部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停止戰斗。這時候不得不承認，采取守勢——禁忌的字眼、禁忌的念頭——是他唯一的選擇。第十七號計劃最激昂慷慨的批評家們，認為德卡斯泰爾諾理應認識到法軍的職責是守衛國土而不是進攻。至于他當時是否出于這一認識則殊難肯定，但他終于命令全線撤退到大庫羅訥防線，因為非如此不可。他右面的迪巴伊的第一集團軍，盡管傷亡慘重，仍堅守陣地，并有所前進。但德卡斯泰爾諾的撤退使它的右翼失卻掩護，有鑒于此，霞飛命令第一集團軍跟友鄰軍一致行動，一并撤退。好容易打了七天才拿下的地方，如今被迫放棄，迪巴伊非常“反感”。他認為這場撤退，按“我軍情況，絕不需要”。為此，他對德卡斯泰爾諾的厭惡有增無減。

雖然法國人當時還不理解，但事實上莫朗日這場大屠殺已撲滅了進攻主義燦爛的火焰。進攻主義在洛林戰場已宣告壽終正寢。日暮時分，只見尸橫遍野，一排排一行行，四肢伸開，臉面貼地，暴死的景狀慘不忍睹，與狂飆施虐后的災區何異。一個幸存者后來恍然大悟，這原是“上帝用以訓示帝王們律法”的教訓之一。防御戰使戰爭初期的運動戰變為以后四年的陣地戰，并吞噬了歐洲一代人的生命，它的巨大威力在莫朗日戰役中就已顯示出來了。第十七號計劃戰略思想的奠定人，那位教導“保衛自己只有一途——一經準備就緒就發動進攻”的福煦，在莫朗日親眼目睹并親身體驗了這個威力。在四年多殘酷無情、毫無裨益的殺戮中，交戰國都在這威力面前撞得頭破血流。最后，還是這位福煦，領導有方，贏得了勝利。不過，當時汲取的教訓，在下次大戰中卻又證明是錯誤的。

8月21日，德卡斯泰爾諾得到兒子戰死沙場的消息。部下前來慰問，他沉默片刻之后對他們說道：“先生們，我們要繼續下去。”這句話后來在法國幾乎成為一句口號。

次日，魯普雷希特的重炮轟鳴，猶如萬馬奔騰，越來越近，日夜不停。炮擊長達75小時，4000發炮彈傾瀉到諾梅尼附近的圣熱納維埃夫（Ste. Geneviève）。德卡斯泰爾諾認為情況嚴重，可能得放棄南錫，撤到大庫羅訥后面。福煦后來寫道：“我21日去南錫，他們想撤出那里。我說敵人到南錫還有五天路程，而且有第二十軍在那兒，他們休想不遭抵抗就可通過第二十軍！”課堂上的理論，現在變成了戰場上的“進攻！”。福煦力爭，他們后有堅固防線可恃，最好的防御是反攻；他的意見得勝。8月22日，福煦看到一個機會。在法國圖勒防區和埃皮納勒防區之間有個叫沙爾姆峽口（Trouée de Charmes）的天然峽谷，法軍原希望把德軍的進攻引向那里，而今偵察表明，魯普雷希特正在向沙爾姆進攻，把他的翼側暴露給了南錫守軍。

魯普雷希特的行動，是在和德軍統帥部又一次重要的通話中決定的。德軍左翼在薩爾堡和莫朗日擊退法軍，其后果有二：一是給魯普雷希特帶來了一、二級鐵十字勛章，比較起來，這倒還不是一個有害的結果；一是德軍統帥部在洛林決戰的念頭就此死灰復燃。也許正面攻擊終究是強大的德軍可以掌握運用自如的；也許埃皮納勒、圖勒同列日一樣是可以攻克的，摩澤爾河跟默茲河一樣也并不是個障礙；也許左翼的兩個集團軍終究可以突破法國的筑壘防線，可會同右翼來一個真正的坎尼之戰——兩面包抄。這正如塔彭上校所述，是德軍統帥部憧憬的前景。它像妖婦的微笑，奪取了多年來對右翼的不二鐘情。

毛奇和顧問們正屏息緊張討論這一想法的時候，魯普雷希特的參謀長克拉夫特·馮·德爾門辛根將軍打來了電話，他想知道是繼續進攻還是就此停止。原來總認為魯普雷希特所部只要遏制住法軍的初攻，穩定了陣地，就會停止下來，組織防御，騰出一切可以騰出的兵力增援右翼。不過，原先也曾慎重擬訂了一個備用的名為三號的作戰方案，規定可以越過摩澤爾河發動進攻，但必須有統帥部的明令方能行動。

“一定得讓我們明確知道仗究竟將怎樣打下去，”克拉夫特要求說，“我認為該實行三號方案了。”

“不，不！”作戰處長塔彭上校回答說，“毛奇還沒作出決定。你如果在電話里等五分鐘，我也許能給你想要的那個命令。”不到五分鐘，他回來作了一個出乎意料的答復：“向埃皮納勒方向追擊。”

克拉夫特“愣住了”，“我感到這次戰爭中對戰局最有影響的一項決定就在這幾分鐘里定下來了”。

“向埃皮納勒方向追擊”意味著取道沙爾姆峽口進攻，意味著要第六集團軍和第七集團軍正面攻擊法國要塞陣地，而不再留作增援右翼之用。第二天，8月23日，魯普雷希特氣勢磅礴地發起進攻不誤。福煦也同時反攻。以后幾天里，德國第六、第七集團軍陷入了同貝爾福、埃皮納勒和圖勒等地大炮支持下的法國第一、第二集團軍的鏖戰中。就在他們苦戰時，別的戰役也打響了。

在洛林進攻的失利并沒使霞飛氣餒。相反，他看到魯普雷希特的猛烈反攻已使德軍這一左翼深陷鏖戰難以脫身，因此此刻正是他放手進攻德國中路的大好時機。霞飛是在獲悉德卡斯泰爾諾已撤出莫朗日的消息之后，于8月20日夜發出在阿登山區進攻的號令的。從這里進攻是第十七號計劃的核心策略和基本策略。在第三集團軍和第四集團軍進入山區的同時，他又令第五集團軍越過桑布爾河進攻敵人的“北方集團軍”——這是法軍總司令部稱呼德軍右翼的專用語。盡管剛從阿德爾貝上校和約翰·弗倫奇爵士那里分別了解到比軍和英軍對這場進攻不能如望前來支持，霞飛還是下達了這道命令。比利時軍隊，除駐扎在那慕爾的一個師外，其余均已失去聯系。而英國軍隊，據其司令稱，在三四日內不能準備就緒。除了這些情況變化以外，洛林戰場業已暴露打法上危險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是霞飛早在8月16日就已覺察到的，那天他曾指示各集團軍司令必須學會“等待炮兵的支援火力”和防止部隊“匆匆地暴露在敵人火力前面”。

然而，法國信奉第十七號計劃是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唯一法寶。第十七號計劃要求進攻——立時立刻，不容稍候。當前唯一抉擇該是立即改弦易轍，轉入邊境防御；可是就法國軍事組織的訓練、思想、精神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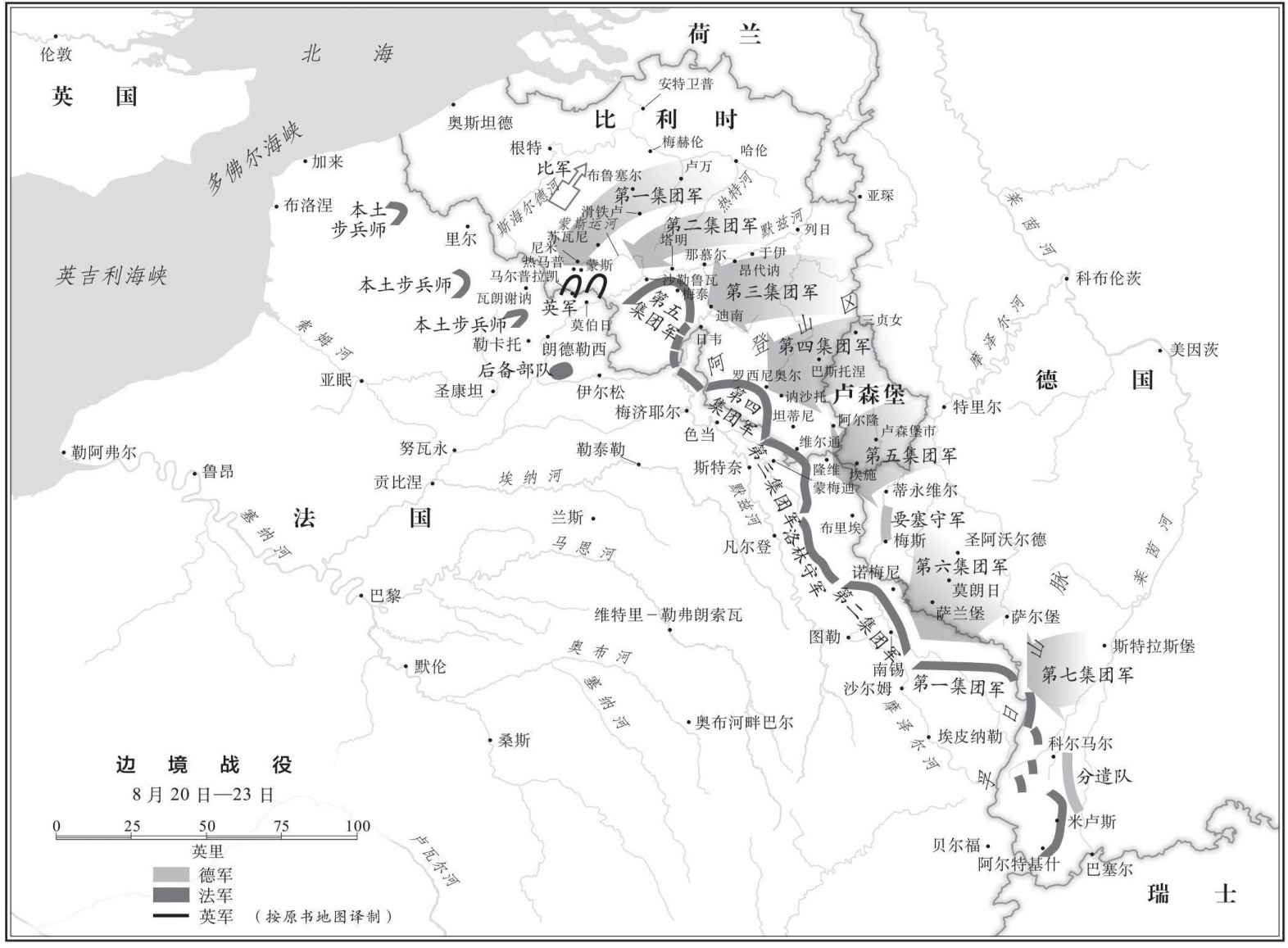
此外，法軍總司令部還深信法軍中路人數會占優勢，關于德軍中路兵力勢必薄弱的理論曾支配了法軍參謀部的所有計劃工作，參謀部擺脫不了這一理論的束縛。霞飛就是出于這種想法，發出了于8月21日在阿登山區和桑布爾河發起總攻的命令。

阿登山區的地形不宜于進攻——樹林茂密，丘陵起伏，地形復雜。坡勢從法國方面起全面逐漸升高，山與山之間，溪澗縱橫，自成峽谷。愷撒用了十天時間才行軍通過了這個山區，他把這里隱秘、幽暗的森林描繪為“恐怖之鄉”，此處道路泥濘，泥炭地上冒起的霧靄終年不散。以后，很多地方開拓耕種了，公路、村莊以及兩三個大城鎮替代了愷撒的“恐怖之鄉”；然而，大多數地方仍然林木茂密、道路稀少，容易伏擊。法國的參謀們1914年以前曾多次察看過這里的地形，深知其中的艱難險阻，并多次提出警告。盡管如此，阿登山區還是被選作突破點，因為這里地處中段，德軍部署的兵力據信將最為薄弱。這塊地方，法國人思之再三終于認為可取的理由，正如霞飛所說，就在于它的艱難險阻使它對“我們這樣重炮處下風而野戰炮占優勢的一方有利”。霞飛的回憶錄，盡管經常用第一人稱“我”字，而事實上是由一批軍事人員協作編寫的，所以它反映了1914年以前和1914年期間總參謀部的指導思想，是官方審慎的實際看法。

8月20日，法國總司令部認為所報戰線對面敵軍調動的情況，是德軍開往默茲河，因此阿登山區的敵軍在他們估計是相對“空虛”的。霞飛想使其進攻出敵不意，便禁止步兵偵察，唯恐他們和敵軍發生接觸而在主要的遭遇戰前引起小規模戰斗。奇襲的目的確實達到了，可是法軍也同樣嘗到了它的滋味。

阿登山區南端和法國洛林北端接壤，布里埃鐵礦區就在洛林北端地區。1870年，這個礦區曾被普魯士軍隊占領，當時礦藏尚未發現，因而未包括在洛林被德國吞并的那部分地區里面。鐵礦的中心是希耶（Chiers）河畔的隆維（Longwy），占領隆維的榮譽留給了擔任德國第五集團軍司令的王儲。

王儲三十二歲，是個生得一副狐貍面孔，沒有胸脯，瘦得像柳條似的家伙，一點不像母后每隔一年所生的五個身體健壯的兄弟。這位威廉王儲，給人的印象是弱不禁風，而且用一個美國觀察家的話說，“智力平庸”，不像他父親。可是裝腔作勢倒和他父親一樣，很喜歡作驚人之態，他有著太子們慣有的一種為人子之身不由自主的對立情緒，其通常表現是政治上的鉤心斗角與生活上的放蕩不羈。他甘當最富有侵略性的軍國主義主張的庇護人和支持者。柏林的商店所出售的他的題字相片，上面寫著：“只有依靠劍，才能得到陽光底下的地盤，那該是我們的，但它不會自愿地給我們。”盡管想培養他成為司令官，但他的鍛煉并不十分夠格。他只擔任過骷髏頭輕騎兵（the Death’s Head Hussars）的上校，在總參謀部工作過一年，而沒有擔任過師長或軍長。然而王儲卻認為他過去幾年在參謀部的工作以及在參謀野外見習的經驗已“為我統率大部隊打下了理論基礎”。他的這種自信，施利芬可不以為然，他認為任命年輕而缺乏經驗的指揮官是不幸的。施利芬唯恐這些指揮官“瘋狂地獵取最高榮譽”時勁道十足，而對執行戰略計劃卻不感興趣。



王儲率領的第五集團軍和符騰堡公爵率領的第四集團軍的任務是擔任右翼的支點，在右翼以巨大包抄合圍之勢展開時，從中路緩慢地向前推進。第四集團軍將通過阿登山區北部進攻訥沙托，第五集團軍將通過山區南部進攻維爾通（Virton）以及法國的兩個要塞隆維和蒙梅迪（Montmédy）。王儲的司令部設在蒂永維爾（德國人稱為迪登霍芬，Diedenhofen）。他在那兒吃的是大老粗士兵們的伙食——卷心菜湯、土豆和辣根煮牛肉。不過他貴為王子，有野鴨、色拉、水果、酒、咖啡和雪茄可以補充。王儲和他的參謀們，既困陷在當地居民一張張“嚴肅、陰郁”的面孔之中，又羨慕友軍在列日的榮譽和右翼的進展，于是求戰心切，迫不及待。最后，于8月19日進軍的命令終于來了。

與王儲部隊對峙的是呂夫將軍統率的法國第三集團軍。呂夫是唯一鼓吹使用重炮的人，由于為巨炮陳詞如懸河瀉水，以“加農詩人”聞名。呂夫不僅敢于懷疑75毫米大炮的萬能作用，而且敢于建議使用飛機作為一種進攻武器和成立一支擁有3000架飛機的空軍。這個主意并沒有得到青睞。福煦將軍于1910年叫嚷道：“這些盡是些玩意兒！”他還說，要是用于軍隊，“飛機是個廢物”！可是第二年，加利埃尼將軍在演習中使用飛機偵察，從而俘虜了最高軍事委員會的一名上校及其部屬。到1914年，法軍使用了飛機，而呂夫將軍仍被認為“太富于想象”。不僅如此，由于他討厭參謀部軍官對他指手畫腳，在開入阿登山區前已在總司令部里結了一些冤家。呂夫的司令部設在凡爾登，任務是把敵人趕回梅斯至蒂永維爾一帶，并把他們包圍在那里，同時在前進過程中收復布里埃地區。在他包圍住德軍中路的右翼的時候，他的友鄰部隊德朗格勒·德卡里將軍率領的第四集團軍將包圍中路的左翼敵軍。這兩支法國軍隊將從中路殺出，將德軍右翼的這支臂膀從肩部砍掉。

德朗格勒將軍是1870年的宿將，戰爭爆發前一個月雖然年紀已達法軍服役年限的六十四歲，但還是被留了下來擔任指揮。他短小精悍，機警靈活，精力充沛，貌似福煦，人也像福煦，在照片上看上去有著“摩厲以須，吾刃將斬”之勢。現在，德朗格勒將軍已枕戈待旦，確實是躍躍欲試，那些叫人不安的消息并沒有使他氣餒。他的騎兵在訥沙托附近戰斗中已遭到猛烈反擊，被迫后撤。一位參謀乘汽車出去偵察，帶回了進一步的警告。這位參謀在阿爾隆曾同一位憂心忡忡的盧森堡政府官員談了話，那位官員說，德軍就在附近的森林中，“兵力很強”。參謀在歸途中所坐汽車也遭到射擊。可是他向第四集團軍司令部所作的這些報告卻被認為是“悲觀的”。斗志可謂高昂，但是謹慎不足。要求迅速行動而不是躊躇不決的時刻已經到來。德朗格勒將軍只是在戰斗過后才想起，他曾表示不贊成霞飛“不許我先行試探”就發起進攻的那道命令。他只是在后來才寫道：“法國總司令部要突然襲擊，可是，正是我們自己遭到了突然襲擊。”

呂夫將軍比德朗格勒將軍更為不安。比利時農民送來關于德軍駐扎在森林和玉米地的報告，他是比較認真看待的。可是他對與他對陣的敵軍力量的估計，法國總司令部卻未加注意，甚至如他后來所說，連看都沒看。

8月21日晨，阿登山區從平地起到處濃霧彌漫。德國第四、第五集團軍在19日、20日一直是一面挺進，一面在所到之處構筑陣地。他們在期待著法軍的進攻，雖然他們不知道法軍將在何時何地發動進攻。派往前面偵察地形的法國巡邏騎兵，在濃霧中“等于蒙住了眼睛”。敵對的兩軍，都在穿越樹林，通過山間夾道向前推進，幾步以外什么都看不清，要不是互相撞上了，還不知道前面是些什么。當第一批部隊一接觸開了火，指揮官們意識到戰斗已在周圍爆發之后，德軍便立即掘壕固守。而法國軍隊，由于軍官在戰前唯恐把士兵“粘住”，輕視壕溝作戰訓練，又由于他們盡可能少帶鏟鎬，這時候只好進行刺刀突擊，結果紛紛被機槍一掃而倒。但在有些遭遇戰中，法軍75毫米的大炮重創德軍，使它們同樣遭到突然襲擊。

第一天的遭遇戰是分散的、序幕性的。22日，阿登山區南部就硝煙彌漫全面打開了。在維爾通和坦蒂尼（Tintigny），在羅西尼奧爾（Rossignol）和訥沙托，在各個戰場上，炮聲隆隆，炮火熊熊，雙方士兵互相猛撲，負傷了，倒下來了，尸體枕藉。在羅西尼奧爾，法國第三殖民師的阿爾及利亞人被王儲所部第六軍包圍，打了六小時，直到殘存無幾。師長拉費納爾（Raffenel）將軍、旅長龍多內（Rondoney）將軍俱陣亡。1914年8月，將領們像普通士兵一樣傷亡眾多。

在維爾通，薩拉伊（Sarrail）將軍統率的法國第六軍用75毫米大炮襲擊了德軍一個軍的翼側。“過后的戰場是一片難以置信的景象，”一個被嚇得不知所措的法國軍官說，“成千上萬的死人還是站著，靠在像是由成批成批尸體壘成的60度斜坡的飛扶壁上。”從圣西爾陸軍軍官學校出來的軍官們上陣時還戴著白羽毛裝飾的圓筒軍帽和白手套。戴白手套陣亡被認為是“漂亮的”。一位姓名不詳的法國士官的日記寫道：“大炮每發射一次就要后坐一下。夜幕降臨，它們看來就像是老年人在伸著舌頭噴火。到處尸體枕藉，有法國兵，也有德國兵，槍還在手里。雨下著，炮彈在呼嘯、在爆炸，炮彈橫飛，無時或息。大炮的火力是最可怕的。我整夜躺著，聽著傷員——有些是德國兵——的呻吟。炮擊連續不斷，但只要一停，我們就聽到森林里傷員的一片哀嚎，每天總有兩三個人發瘋。”

在坦蒂尼的一個德國軍官也記了日記。“不能想象還有什么比這更可怕了，”他寫道，“我們前進得太快——一個老百姓向我們射擊——他馬上給打死了——我們奉命進攻樺樹林中敵人的翼側——我們迷失了方向——士兵們完蛋了——敵人開火了——炮彈冰雹似的落在我們頭上。”

王儲這時候得到魯普雷希特已在薩爾堡和莫朗日打了勝仗的消息。他不甘落后，督促所部創造堪與他們的戰友們相匹敵的“勇于犧牲的奇跡”。他已將司令部搬到隆維對岸的盧森堡的埃施（Esch），他從四面墻上釘著的大地圖上察看著戰斗進程。戰局未卜，真折磨人；同科布倫茨的電話通訊糟糕透頂；統帥部又“在后方過遠”；仗打得驚心動魄，損失太大；隆維還未拿下，他說，不過“我們覺得已頂住了敵人的進攻”；據報告，法軍并不是在有計劃地撤退，而是在潰退。

情況確是如此。呂夫將軍在臨戰之前的最后時刻，發現原來歸屬于他的約五萬之眾的三個后備師已不屬于他了，他為之暴跳如雷。為了對付魯普雷希特可能的進攻，霞飛抽走了這三個師，把它們和從其他方面湊攏來的四個后備師一起專門組成一個洛林軍。這支部隊是8月21日開始建立的，由莫努里（Maunoury）將軍統率，駐扎在凡爾登和南錫之間，用以支持德卡斯泰爾諾集團軍和掩護右翼沖過阿登山區。這是最后時刻重新作的部署之一。這說明法軍還有可取之處，還有靈活性，不過在當時卻產生了相反的后果。這一部署削弱了呂夫的兵力，使七個師在關鍵時刻動彈不得。呂夫后來一直說，這五萬人，他已作了部署，維爾通一戰，要是這些兵力在手邊，他是可以打贏的。他當時的怒氣沖沖說明了他有些不夠老練。總司令部的一個參謀在作戰時來到他的司令部，呂夫大發雷霆，他說：“你們總司令部的人從來不看我們送去的報告。你們像敵人袋子里的牡蠣一樣愚昧無知。……告訴總司令，他指揮作戰，比起1870年來還要差——他根本什么都看不見——什么地方都不行。”這些話絕不是住在奧林匹斯山的眾神所歡迎的，霞飛和隨從們這些天神總是喜歡把責任歸咎于指揮官和士兵的無能，呂夫就是被歸咎者之一。

也就在8月22日這天，德朗格勒將軍經受了一個指揮官最痛苦的時刻——等待前線的消息。他“如坐針氈”，硬是把自己約束在默茲河畔離色當20英里的斯特奈（Stenay）的司令部里，失利的報告一個緊跟一個而來。按他的性子真想奔赴戰場，但他提醒自己，一個將軍不應淹沒在部隊之中，而只能在遠處指揮，這樣一想他才克制下來。可是要在部下面前保持鎮定自若和做到“一個首長在關鍵時候必不可少的自持”是同樣困難的。

日暮時分，殖民軍傷亡慘重的情況分明了。另一軍，德朗格勒認為由于司令指揮不當，也正在撤退之中，且危及了友鄰軍。他因此不得不向霞飛報告：“在坦蒂尼遭嚴重挫敗，所有部隊的戰果都不令人滿意。”并稱，由于所部損失巨大且已被打亂，要在8月23日完成任務的命令已無法遵辦。但霞飛就是不信，甚至在收到德朗格勒的報告之后，還泰然自若并怡然自得地向梅西米報告說，各路部隊都部署在“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區，以確保我方兵力優勢”。總司令部的工作已經完成，現在得看“有兵力優勢之利”的部隊和司令們了，于是霞飛幾次三番要德朗格勒放心，并一再堅稱在他面前的敵軍只不過三個軍，因此他必須重新進攻。

事實上，法軍在阿登山區并不占據優勢，而是恰恰相反。王儲的部隊除了法軍已查明的三個軍外，還有與現役軍等同兵力的兩個后備軍，而符騰堡公爵的部隊也是如此。這兩個集團軍所集結的兵力和大炮要比法軍第三、第四集團軍多得多。

8月23日繼續打了一天。但不待日落，法軍射不中的、箭斷矢折的局面已明，阿登山區的敵軍畢竟不是“一攻即破的”。盡管德軍在右翼集結了雄厚的兵力，但在中路并不薄弱，法軍沒有“把它們劈成兩半”。鼓足法軍引以自豪的勇氣，揮舞著軍刀，高喊著“前進！”，軍官們率領著各個連隊攻向據壕堅守和使用著野戰炮的敵人。融入蒼茫暮色和迷霧中的土灰色擊敗了顯眼的紅色，扎實的、按部就班的訓練戰勝了勇氣。法國在阿登山區的兩支部隊都在撤退，第三集團軍在向凡爾登退卻，第四集團軍在撤往斯特奈和色當。布里埃的鐵礦沒有奪回來，它在以后四年里將給德軍用來鑄造軍火彈藥，服務于長期戰爭。德國沒有這些礦石是無法長期打下去的。

霞飛到8月23日夜晚，還不了解阿登山區的敗績全況。他打電報給梅西米說：攻勢“暫時受挫”，“我將盡一切努力再一次發動進攻”。

那天，王儲軍隊從隆維經過，留下攻城部隊攻打隆維要塞，其余所部按令繼續前進，去凡爾登攔截法國第三集團軍。這位王儲，在不到一個月以前，其父王曾告誡他要事事服從總參謀長，要“按他的吩咐行事”，今天在這勝利之日，他又接到“威廉爸爸”的電報，向他和向魯普雷希特一樣，獎授一枚一、二級鐵十字勛章。他“深為感動”，電報給所有的參謀人員傳閱了。不久，王儲自己也授發勛章，據戰爭后期一個崇拜者的描寫，他身穿“炫目的緊身白外衣”，在兩列士兵中間走著，從副官捧著的籃筐里分發著鐵十字勛章。當時一個奧地利盟友報道說，只有自殺才能避而不受二級鐵十字勛章。此時，這位不久將被人贊揚為“隆維英雄”的人，已獲得與魯普雷希特同等榮譽。在這種阿諛奉承聲中，如果施利芬的幽靈對這既沒有包抄又沒有殲滅敵人的“普通的正面進攻的勝利”發了些牢騷，或是對“瘋狂地獵取勛章”的行徑有所微詞，那么沒有人聽到。

在這期間，在桑布爾河畔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團軍已奉命過河進攻，“以那慕爾要塞為砥柱”，由其左翼繞過沙勒魯瓦前進，而以敵人的“北方集團軍”為目標。同時，第五集團軍的一個軍將駐守兩河之間的夾角地帶，保衛默茲河防線，防范德軍從東面進攻。霞飛無權指揮英軍，但在命令中要求約翰·弗倫奇爵士“配合這次行動”，“向蘇瓦尼（Soignies）總方向”前進，也就是要他渡過蒙斯運河。蒙斯運河是桑布爾河的一條支流，連通斯海爾德河，使航運從那慕爾經桑布爾河而下，在沙勒魯瓦轉入運河，東與斯海爾德河相接，直通海峽。因此蒙斯運河是這一連續航道的組成部分，它橫切著德軍右翼的通道。

根據德軍的時間表，馮·克盧克集團軍應于8月23日到達這條天塹，比洛集團軍應在途中攻陷那慕爾后先期到達，和克盧克部大致同時越過運河。

根據約翰·弗倫奇進軍命令規定的英軍時間表，英國遠征軍也應于23日，也就是和德軍同一天到達運河。這兩方面的部隊當時都不知道這個巧合。英軍的先頭部隊按時間表要早到一些，應在22日晚到達。在21日朗勒扎克奉命渡過桑布爾河這天，原來期待能前來“配合行動”的這支英國遠征軍落在法軍后面整整一天的路程。由于英軍出發遲緩，加上兩軍指揮官之間關系不睦造成了聯絡不好，這兩支軍隊，盡管雙方司令部相距只35英里，終未能如計劃協同作戰，而是各管各地打了兩個戰役——沙勒魯瓦戰役和蒙斯戰役。

在朗勒扎克心里，進攻主義已告壽終正寢。當時他雖不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德國三路大軍壓境的全貌，但已能感到這些壓力。豪森的第三集團軍從東殺來，比洛的第二集團軍從北殺來，克盧克的第一集團軍正在奔向他左側兵力不到其一半的英軍。朗勒扎克不了解這些部隊的番號和人數，但知道這些部隊就在跟前。他也知道——或許是通過偵察推算出來的——奔向他來的敵軍，兵力要比他所能對付的大得多。對敵軍實力的估計不是絕對的，而是由零星的偵察材料和情報拼湊而成的一幅圖景，并盡可能使之合乎預先的設想，或是合乎戰略的要求。一個參謀機構從現有的材料中將得出什么樣的結論，取決于其人員樂觀或悲觀的程度，取決于他們想相信些什么或怕相信些什么，有時還取決于個人的敏感性或直覺。

同樣一份有關默茲河西岸德軍實力的報告，在朗勒扎克和法軍總司令部眼中，所表達的圖景不同。總司令部認為阿登山區德軍中路兵力薄弱，而朗勒扎克則認為一股巨浪在向第五集團軍滾滾而來。總司令部估計默茲河西岸的德軍兵力為十七八個師，同時估計迎擊德軍的兵力，有朗勒扎克的13個師，兩個后備師組成的一支獨立部隊，英軍5個師和比利時駐扎在那慕爾的一個師，總共21個師。總司令部因此認為人數上占到綽綽有余的優勢。霞飛的計劃，就是用這支大軍將德軍阻擋在桑布爾河彼岸，待第三集團軍和第四集團軍在阿登山區突破德軍中路后，兩路大軍合兵一起向北挺進，將德軍攆出比利時。

在職份上不是由亨利·威爾遜主管而實際上卻由他主宰的英國參謀部，同意法軍總司令部的這一估計。威爾遜在8月20日的日記中所寫的默茲河西岸德軍數目也是十七八個師，并且還下了個“越多越好，那就會削弱他們中路兵力”的結論。而返回到英國、遠離了前線的基欽納勛爵，則是惴惴不安，預感不妙。他曾告誡過約翰·弗倫奇爵士，要他提防德軍席卷默茲河西岸和北岸。8月19日，他又電告爵士：德軍席卷之勢，“看來肯定會有發展”。他責成所有的報告都要讓他知道；第二天，他重申了這個要求。的確，此時此刻在默茲河西岸的德軍不是十七八個師，而是30個師：7個現役軍、5個后備軍、5個騎兵師和其他部隊。馮·豪森集團軍，當時還沒有渡過默茲河，但已是右翼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還得加上這4個軍的8個師。就整個邊境戰役來說，德軍在人數上的優勢是1.5：1，而右翼的優勢則近乎2：1。

這支兵力進攻的焦點是朗勒扎克集團軍，朗勒扎克也知道這一點。他在和英軍司令非常不愉快的會晤之后，就認為英國人既不會及時準備好，也不可靠。他也知道比利時的防線將在那慕爾崩潰。新近在部隊對調中派給他去沙勒魯瓦西面擔任左翼的一個新編軍，到8月21日還未進入陣地。所以他認為如果按照命令渡過桑布爾河發起進攻，向他的左翼潮涌而來的德軍就會對他形成翼側包圍，德軍也就會如入無人之境直搗巴黎。“在哪里遇到敵人就在哪里進攻”，是他在圣西爾陸軍軍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教授的指導原則，也是訓練法國軍隊的一條原則。這條原則，在他現在看來，所見的只是一副骷髏罷了。

朗勒扎克躊躇了。他寫信給霞飛說：他如在桑布爾河北岸發動進攻，由于英國人不可能準備就緒配合行動，第五集團軍“會陷于孤軍作戰境地”；如要雙方協同作戰，則第五集團軍必須等到23日或24日。霞飛回答說：“由你全權決定發動進攻的時刻。”但敵人可不是這么隨便答應的。

比洛集團軍的主力在攻打那慕爾，而其分遣隊于8月21日就沖到桑布爾河，并在那慕爾和沙勒魯瓦之間兩處地方進行了強渡。朗勒扎克曾叮囑第五集團軍各部須待“友鄰軍”到達才發動進攻，但在此期間必須打擊德軍渡河的任何企圖。法國軍事詞匯中是沒有“防御準備”這個詞的，駐守該地區的第十軍在南岸既沒有挖掘戰壕，也沒架設鐵絲網或構筑別的防御工事，只是等著用肉體去猛沖敵人。“軍號嘹亮，戰鼓隆隆，旗幟飄揚”，至于大炮則一無準備，法軍就這樣沖向前去，襲擊敵人，打得非常猛烈，但終于被趕了回來。夜幕降臨，敵人仍占據著塔明和桑布爾河南岸的另一個村莊。

步槍聲和炮彈爆炸聲之外，還可以聽到遠處更深沉的響聲，如巨鼓擂動。德軍攻城大炮已開始轟擊那慕爾要塞。420毫米和305毫米的攻城炮，從列日拖來后在轟擊那慕爾的射程內構筑了火炮陣地，這時正在向比利時這座第二要塞傾瀉著兩噸重的炮彈。曾率領志愿救護隊去那慕爾的一名英國婦女寫道，這種炮彈“帶著經久不息的刺耳嘯聲”，不論你站在哪里，總像是在向你飛來，不論它實際擊中何處，總像是在你周圍咫尺之內爆炸。破壞之神從天空雷鳴而降，撲向那慕爾四周堡壘。這座城市在兩整天可怕的雷鳴聲中坍縮了。結果是列日的慘劇重演：四處爆炸，鋼筋水泥碎如泥灰，藏身地下室的人們給嚇瘋了。衛戍部隊和第四師跟比軍其他部隊的聯系已被切斷，他們感到被拋棄了。朗勒扎克駐那慕爾的聯絡官迪律伊少校回到第五集團軍司令部報告說，在他看來，法軍如不拿出一些援助行動，這座要塞連一天也頂不住。他為守軍請命：“他們必須看到法軍浩浩蕩蕩開來，旗幟飄揚，軍樂響亮。必須有個軍樂隊。”法軍三個營——約3000人的一個團——當夜出發，于次日上午參加了那慕爾的保衛戰。守軍僅3.7萬人，而8月21日至24日幾天里投入進攻的德軍，為數在10.7萬到15.3萬人之間，大炮計400到500門。

8月21日夜，約翰·弗倫奇爵士向基欽納報稱，他不認為24日前會有大戰。他在報告中寫道：“我想我對戰局了如指掌，我認為戰局對我方有利。”可是他對戰局并不如他所想那樣了如指掌。第二天，當英軍朝“蘇瓦尼總方向”在去蒙斯的路上前進時，騎兵巡邏隊報告說，德軍的一個軍在從布魯塞爾至蒙斯的公路上開來，也是在向蘇瓦尼進軍。從這支德軍的位置判斷，他們當晚可以到達這個村子。看來敵人是不會等到約翰·弗倫奇爵士所預定的24日這個日期的。一個英國飛行員又帶來更為叫人驚恐的消息：德國另一個軍正沿著一條公路開來，并已經逼近到可從西邊對英軍左翼進行翼側包抄。包抄！頓然間，英國軍隊，至少是情報部門，清晰而可怕地看到這個迫在眉睫的威脅。基欽納一貫說的“席卷”已不再是個概念，而是一隊隊活生生的人了。可是那些參謀長官們在威爾遜的影響下不以為然。由于威爾遜的關系，他們墨守法軍戰略，同法軍總司令部一樣不愿接受關于德軍右翼的這種危言聳聽的說法。“你們得到的并轉給總司令的那個情報，看來有點夸大”，他們就這樣作了決定并保持進軍命令不變。

他們知道他們正踏在過去曾打過勝仗的土地上。他們在蒙斯南面十英里的地方走過了法比邊界上的馬爾普拉凱，在路旁看到一塊標明莫爾伯勒在此打敗路易十四的石碑，莫爾伯勒曾為此贏得了一首法國民歌對他永世不忘的傳誦。滑鐵盧也就在他們前面，在蒙斯和布魯塞爾之間。如今他們在滑鐵盧戰役將近一百周年之際來到這個英國人曾高奏凱歌的戰場，能不信心十足！

當先頭部隊于22日接近蒙斯的時候，在運河北面公路上偵察的一部分騎兵中隊的人，看到一隊四騎人馬向他們馳來。這些人看上去很陌生。就在同時，這些陌生人也看見了英軍，勒住了馬，雙方屏息相視片刻之后才意識到碰到了敵人。這些德國槍騎兵掉轉馬頭與中隊的其余人員匯合疾馳而去。英軍急起直追，在蘇瓦尼的大街上趕上了他們。在小規模的激戰中，槍騎兵的“長旗桿矛礙手礙腳，很多人把它扔掉了”。英軍殺死了三四名德軍，從這個小戰場勝利而歸。騎兵中隊長霍恩比（Hornby）上尉，作為第一個用新式騎兵刺刀殺死德軍的英國軍官，被授予杰出戰功勛章。戰爭以正確的方式開始，戰果非常鼓舞人心。

首次接觸，既然如所預期是在去蘇瓦尼的路上發生的，也就沒有理由使參謀長官們改變他們對敵人實力和位置的估計。威爾遜認為，和英軍對陣的德軍兵力只有一個或兩個軍加上一個騎兵師，同英國遠征軍的兩個軍和一個騎兵師相比處于劣勢，至多也不相上下。威爾遜性格剛強，情緒高昂，對這里地形和對法國人的熟悉了解又是眾所公認的，這一切都比情報官的報告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尤其是作戰處的軍官們向來認為情報處總是從最壞處著想，對情報處的估計歷來不以為然，因而這種情況尤為突出。英國對德國軍事理論和德國軍事實踐研究得最細致入微的詹姆斯·格里爾森爵士的逝世，又使得威爾遜的那些理論——它們是全盤抄襲法軍總司令部的——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參謀和軍長們，對第二天的戰斗都滿懷信心，雖然約翰·弗倫奇爵士未必如此。

弗倫奇的情緒仍然陰沉憂郁，其猶豫不決與朗勒扎克幾不分軒輊。21日，剛到達法國前來代替格里爾森的史密斯―多林將軍來請示時，得到的吩咐是“在孔代運河（Condé Canal）防線作戰”。史密斯―多林將軍問，這是說進攻還是防守？吩咐是“聽從命令”。弗倫奇焦慮的一個因素，是他不了解朗勒扎克在他右翼的作戰計劃，擔心他們兩軍之間會形成缺口。22日上午，他乘汽車出發去和這位令人不愉快的鄰居商量，但在途中得悉朗勒扎克已前往設在梅泰（Mettet）的軍司令部，第十軍正在梅泰激戰。他沒有會面朗勒扎克就這么回來了。在司令部里迎接他的是一條好消息。起初留在英國的第四師已經到達法國，現正在前來途中。德軍在比利時向前推進以及比軍的撤往安特衛普，促使基欽納下決心把第四師派來。

馮·克盧克將軍對蘇瓦尼公路上的騎兵沖突比英軍更為吃驚。直到此刻，他還不知道英軍已在他面前，英法的保密措施何其得力！克盧克知道英軍業已登陸，因為他從一份比利時報紙上看到有關消息，該報登有基欽納宣布英國遠征軍已平安到達“法國國土”的官方公報。英國、全世界以及敵人知道英軍登陸的第一個消息，就是8月20日發布的這項公報。不過，克盧克仍然認為英軍是在奧斯坦德、敦刻爾克、加來登陸的。這主要是出于他的主觀愿望，他打算在跟法軍交鋒之前將英國軍隊和比利時軍隊一并“擊潰”。

現在，他從布魯塞爾揮師南下，不得不擔心比軍會在他后方從安特衛普突然出擊，不得不擔心英軍可能會對他的翼側猛撲過來。他總認為英軍神秘地部署在他右面的比利時境內的什么地方，因此他一直設法讓部隊朝西徐徐前進，好尋找英軍進攻，然而比洛則是始終害怕產生缺口，不斷令他靠攏。克盧克反對，比洛堅持。“不這樣，第一集團軍就會走得過遠而不能支援第二集團軍。”克盧克發現英軍在蘇瓦尼，正在他前面，又想往西轉移，尋找敵人翼側。可他再次為比洛所阻，他怒不可遏，向最高統帥部提出抗議。然而，統帥部對英軍的行蹤比協約國對德軍右翼的了解更為模糊。“本部看來，并沒有發生意義重大的登陸行動。”統帥部說，因此否定了他的意見。克盧克給奪去了包抄敵人的機會而被迫作正面攻擊，只好怒氣沖沖地向蒙斯前進。命令要求他在8月23日渡過運河，占領河南陣地，迫使敵軍退往莫伯日，同時從西面切斷其退路。

8月22日那天，比洛跟左側的豪森之間和跟右側的克盧克一樣，矛盾很大。克盧克傾向于趕在前面，而豪森則傾向于拖后。鑒于先頭部隊已渡過桑布爾河在同朗勒扎克的第十軍作戰，比洛計劃由他的部隊和豪森的部隊聯合大舉進攻，打一場殲滅戰，可是豪森在22日還未準備就緒。比洛苦苦埋怨友鄰軍的“不夠合作”，而豪森則不堪忍受比洛再三要求幫助，同樣怨氣沖天。比洛決定不再等待，對桑布爾河一線投入三個軍，發動了猛烈進攻。

這一天以及第二天，比洛和朗勒扎克兩軍在這場沙勒魯瓦戰役中鏖戰不舍，第一天日暮時，豪森部隊加入戰斗。而這兩天，也正是法國第三、第四集團軍在阿登山區大霧彌漫的森林中與覆滅之災進行搏斗的兩天。朗勒扎克坐鎮在梅泰指揮作戰，但主要是痛苦地等待師長和軍長們送來他們那里的戰況報告。而這些師長和軍長要了解他們部隊里的情況，也是相當難的。這些部隊，不是處于密集炮火之下，就是在村子里巷戰肉搏，即使有一個軍官精疲力盡、負傷淌血、跌跌撞撞地回來了，也已支持不住不能向上司報告了。活生生的人證比報告先到梅泰，一輛汽車載著一名受傷的軍官開進廣場。朗勒扎克和參謀們由于煩躁不安在屋子里待不下去，這時正在廣場上焦急地來回踱著。這個傷員經認出來是第十軍的一位師長博埃（Boë）將軍。他臉色灰白，目光凄慘，其聲微微，痛苦地、斷斷續續地向奔到汽車旁邊來的埃利·杜瓦塞爾說道：“告訴他……告訴將軍……我們在盡力……堅持。”

在沙勒魯瓦北面，在第十軍左方的第三軍報告損失“慘重”。沙勒魯瓦這座亂七八糟地延伸在河流兩岸的工業城鎮，已在白天被德軍突破，法軍還在猛烈戰斗，想擊退他們。當德軍在未得到教訓以前按老規矩以密集隊形進攻的時候，就成了75毫米大炮的極好目標。可是這些每分鐘原可打15發的75毫米大炮，所供應的炮彈卻只夠它每分鐘打2.25發。在沙勒魯瓦，志愿應募入伍的兩個阿爾及利亞師的步兵們（Turcos），像他們父輩當年在色當一樣勇敢。一個營沖向德軍一個炮兵陣地，用刺刀刺死了炮手，歸來時全營1030人只有兩名沒有掛彩。法軍到處遭到炮擊，而敵人的炮兵陣地通常不是看不見就是打不著。他們在不同戰區不同的情況下，有的人被打得怒火中燒，有的被打得意志消沉。他們對在頭頂上空充當炮兵彈著觀察員的德軍隼式飛機，既火冒三丈而又無可奈何。這些飛機在他們陣地上空飛過之后必然跟來又一陣炮彈。

及至黃昏，朗勒扎克不得不報告：第十軍“損失慘重”，“被迫退卻”；第三軍在“苦戰”；軍官“傷亡巨大”；左面的第十八軍雖完整無損，可是左端的索爾代將軍的騎兵軍已“精疲力盡”，也已被迫退卻，使第五集團軍和英軍之間造成了缺口。這個缺口確有十英里之寬，足可容敵人一個軍。朗勒扎克焦急得只好傳言給約翰·弗倫奇爵士，請他進攻比洛的右翼，借以減輕法軍的壓力。約翰爵士的回答是不能照辦，不過答應將堅守蒙斯運河防線二十四小時。

夜間，朗勒扎克的處境更岌岌可危。豪森帶來四個生力軍和340門大炮攻打默茲河防線。他在夜間發動了進攻，占領了河對岸的橋頭堡。弗朗謝·德斯佩雷（Franchet d’Esperey）的第一軍進行了反攻。第一軍的任務是守衛沿朗勒扎克陣地右面的一段默茲河，它是第五集團軍唯一掘壕堅守的軍。

豪森的意圖是，根據德軍最高統帥部的命令，揮戈西南，進攻日韋，希望由此直撲朗勒扎克軍的后方，陷該軍于他和比洛所部夾攻之中而殲滅之。而比洛——他在這戰區雖已重創敵軍而所部同樣遭到重創——則決心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最終解決戰斗的攻勢。他命令豪森西指梅泰直接攻擊第五集團軍的主力，而不是進軍西南，切斷第五集團軍退路。豪森照辦了。這是一個錯誤。它使豪森在8月23日整天纏于正面進攻弗朗謝·德斯佩雷一軍防守嚴密的陣地，對付這位將才橫溢的軍長，聽任朗勒扎克的退路敞開無阻，打一場殲滅戰的機會就此錯過在這條敞開的通道上了。

8月23日，晴朗酷熱，夏日的天空終日密布著炮彈的團團黑色煙霧。法軍立即把它比作法國家家戶戶火爐上的鑄鐵鍋，給這些炮彈起了個“煲湯鍋”（marmites）的綽號。倦乏不堪的法國兵所能記起的那天情景就是“炮彈如雨”。有些地方，法軍還在進攻，想把德軍趕回桑布爾河另一側；有些地方，法軍還在固守；有些地方，法軍已在踉蹌潰退。公路上都是一長列一長列的比利時難民，途為之塞。他們滿身塵土，給嬰兒和大包小裹壓得彎腰曲背，推著手推車，毫無生氣，疲憊不堪，漫無止境、漫無目標地流浪著，無家可歸，無藏身之所，只求躲開北面可怕的隆隆炮聲。

難民隊伍走過離沙勒魯瓦20英里的菲利普維爾，朗勒扎克的司令部那天正設在那里。朗勒扎克穿著紅褲子的兩腿叉開，雙手反剪，站在廣場上看著他們，憂郁凄惻，默默無言，黝黑的面孔在黑色緊身軍裝上衣上頭顯得近乎蒼白，豐滿的雙頰業已下陷。他“為極度憂慮所困”。敵人從四面八方向他壓來。總司令部除詢問對形勢的看法以外一無指示。他很敏銳地意識到索爾代騎兵軍撤退造成的缺口的后果。正午時分消息來了，比利時的第四師正從那慕爾撤出。這個消息是預料得到的，但仍然是難以置信的。這座控制著桑布爾河和默茲河匯合處的城市及市區外圍高地上的堡壘群，即將落入比洛手中。那天早晨，他曾給第四集團軍的德朗格勒·德卡里將軍去信，要求他調兵加強兩軍銜接的那部分地區。然而，德朗格勒杳無回音。

朗勒扎克的參謀力勸他同意弗朗謝·德斯佩雷的反攻要求。據德斯佩雷報告，一支追擊第十軍的德軍已將其翼側暴露給他，這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機會。也有一些熱心為人說項的人則敦促他讓第十八軍從左端發起反攻，減輕英軍的壓力，英軍這天正在蒙斯同馮·克盧克的整個集團軍作戰。朗勒扎克厭惡這種頭腦發熱的做法，拒不應聲。他始終不置一詞，不發一令，只是等著。后來他的批評者和支持者就沙勒魯瓦戰役進行了糾纏多年的爭論，對朗勒扎克這天下午的靈魂深處發生了什么各有各的看法。在有些人看來，他不是臨陣怯戰就是驚恐癱瘓。有些人則認為他是在情況不明、形勢危殆的局面下冷靜衡量各種可能。既然總司令部對他不置可否，不作指示，朗勒扎克只有自行決定。

傍晚時，一樁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件發生了。豪森所部擴大了默茲河對岸迪南南面翁埃耶（Onhaye）的橋頭堡。這是個大威脅，有從第五集團軍后方進行襲擊的危險。弗朗謝·德斯佩雷立即派出一個旅，由芒讓（Mangin）將軍率領去處理這個危局。也就在這時，朗勒扎克終于收到德朗格勒的消息。這是個不能再壞的消息。第四集團軍在阿登山區不僅沒有像總司令部先前在公報中所暗示的那樣打了勝仗，而且正在被迫退卻之中，這將使色當和朗勒扎克右翼之間的這段默茲河無人防守。豪森的薩克森部隊在翁埃耶的出現頓時成了嚴重的威脅。朗勒扎克認為——他說，“我確實認為”——這是支先頭部隊，由于德朗格勒的撤退，它就可以恣意行動，如果不立即把它擊退，它還會得到增援。這時候他當然不會知道——因為事情還沒發生——芒讓將軍率領的那個旅會在一場漂亮的刺刀沖鋒中把薩克森人趕出翁埃耶。

緊接著又傳來消息，沙勒魯瓦北面的第三軍在遭受攻擊之后未能守住陣地，正在退卻。迪律伊少校又帶來消息說德軍已占領那慕爾北面的堡壘群，并且已經入城。朗勒扎克回到希邁（Chimay），在軍部里，“收到證實第四集團軍受挫的消息，該集團軍自早晨起一直在退卻，使第五集團軍的右翼完全失去掩護”。

在朗勒扎克看來，他右翼的危險“似乎很嚴重”。他一直惴惴不安，擔心在德朗格勒將軍撤出的地方會發生另一場災難，“四十四年前，我軍曾在這里遭到德軍的包圍而被迫投降——那場可恨的災難使我國遭到無可挽回的失敗——多么不能忘懷的一頁！”

要使法國不出現第二次色當戰役，就必須使第五集團軍免遭覆滅之災。朗勒扎克此刻很清楚，法軍從孚日山脈到桑布爾河在全線撤退。只要軍隊還在，就不會出現像色當戰役那樣不可挽回的失敗，就可以繼續打下去。假使第五集團軍被殲滅，整個戰線就會動搖，接著就是徹底失敗。不論打得如何英勇，也不論如何迫切需要，反攻已不能挽救整個局勢。

朗勒扎克最后開口了，下令全面撤退。他知道他會被作為“闖下大禍的人”撤職——他后來確實被撤掉了。據他自己說，他曾和一位軍官講過：“我們打敗了，但這個不幸是可以補救的。只要第五集團軍存在，法國就不會滅亡。”這些話盡管有著事后著筆的回憶錄的味道，但他很可能是這樣說的。在生死存亡的時刻，特別是在法國，往往會激起豪言壯語。

朗勒扎克自行作出了決定，他認為霞飛是不會同意的，所以未征求總司令部的意見。“敵軍威脅我默茲河右翼，”他報告說，“翁埃耶已被占領，日韋受到威脅，那慕爾已被攻下。”由于這種形勢以及“第四集團軍行動阻滯”，他已令第五集團軍撤退。隨著這份電報的發出，法國想在一場短期戰爭中打敗這個宿敵的最后希望全都化為烏有。法軍最后一次進攻已告失敗。霞飛果真不同意這個決定——不過不是當晚。8月23日（星期日）夜晚，是一個濃霧迷漫而難熬的夜晚，此刻，法國的整個計劃正在土崩瓦解，誰也不能肯定各戰區的目前情況如何，色當戰役的幽靈徘徊不去，除朗勒扎克以外人人憂心忡忡，總司令部對第五集團軍的撤退，既沒有提出異議，也沒有撤銷該令。霞飛默不作聲，算是批準了這個決定；然而對此他是不會饒恕的。

關于沙勒魯瓦戰役，官方后來的說法竟然是，朗勒扎克將軍“自認為他右翼受到威脅便命令撤退而沒有反攻”。這是法軍總司令部要為第十七號計劃的失敗找替罪羊而強加在這位第五集團軍司令身上的不實之詞。朗勒扎克作出決定的那個時刻，總司令部里誰也沒有像戰后通報所說的那樣，向他提出過：他完全是“自認為”右翼受到威脅，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遠在左翼，英軍和馮·克盧克所部自清晨起就在18米寬的蒙斯運河展開了爭奪戰，打得難解難分。8月的朝陽沖破了清晨的迷霧細雨，預示著這天是個大熱天。禮拜天的教堂同往常一樣敲起了鐘聲，礦區的村民也同往常一樣穿著禮拜天的黑色服裝去做彌撒。運河兩邊是些鐵路支線和工廠堆貨場。煤泥以及工廠和爐子里的化學廢渣、廢水把運河污染成一股黑水，臭氣四溢。菜地里、牧場和果園里的灰色煤渣堆，像是女巫戴的尖帽子似的，給原來的景色添上了一種古怪異常的樣子。戰爭在這里看來沒那么不協調。

英軍在蒙斯兩邊都建立了陣地。史密斯―多林將軍率領的第二軍在蒙斯西面沿著蒙斯到孔代計15英里長的一段運河布下了防線，而且進駐了緊挨在蒙斯東面運河向北拐彎形成的一塊大約兩英里寬、一英里半長的突出地區；黑格將軍的第一軍守著第二軍右翼從蒙斯到朗勒扎克左翼之間的一條斜形陣地；而未來的耶路撒冷征服者艾倫比（Allenby）將軍指揮的騎兵師則留作后備部隊。黑格對面是克盧克和比洛兩集團軍的銜接地區。由于克盧克部在盡可能向西推進，黑格一軍在后來被稱為蒙斯戰役的8月23日的著名戰斗中沒有遭到攻擊。

約翰·弗倫奇爵士將司令部設在蒙斯以南30英里的勒卡托。他在一條25英里長的戰線上指揮著5個師，同朗勒扎克在50英里長的戰線上指揮13個師的情況相比，他是完全沒有必要離開前線那么遠的。他之作出這種抉擇可能是猶豫不決所致。弗倫奇既給空軍和騎兵的偵察報告弄得惴惴不安，又苦于對友鄰軍捉摸不透，而對和友鄰軍共同守衛的這段于敵人有機可乘的彎彎曲曲的防線也很不自在，所以，他對進攻并不比朗勒扎克感到高興。

在戰斗前夜，他將兩個軍和騎兵師的高級參謀召到勒卡托，對他們說，“由于法國第五集團軍的撤退”，英軍將不進攻了。其實這時候的第五集團軍，除了第十軍外都未撤退，而第十軍又不和英軍相鄰，但約翰·弗倫奇爵士是必須歸罪于人的。朗勒扎克前一天在這種同志式的精神的驅使下，也曾把自己的未能進攻歸咎于英軍的沒有到場。那時朗勒扎克給各軍的命令是固守桑布爾河防線而不是渡河進攻，如今約翰·弗倫奇爵士的命令同樣是固守運河防線。盡管威爾遜仍然在按向北大舉進攻把德軍攆出比利時的路子著想，但指揮官們得到的是采取全屬另一套行動的可能。有鑒于此，史密斯―多林將軍便于凌晨2時30分下令做好炸毀運河橋梁的準備。這是個切合實際的預防措施，但這類措施是法軍所不取的。正由于此，1914年8月的法軍傷亡率達到驚人的程度。戰斗開始前五分鐘，史密斯―多林進一步下令，指示“一旦必須撤退”，要按師部命令破壞一切橋梁。

清晨6時，約翰·弗倫奇爵士向各軍長發布最后一道指令時，他——或許是他的參謀們——對于將與之交鋒的敵方兵力的估計仍然同前不變，仍是一個或至多兩個軍加上騎兵。事實上，那時在英國遠征軍攻擊距離內的克盧克集團軍擁有四個軍和三個騎兵師，計16萬人和600門大炮。而英國遠征軍的兵力則僅為7萬人，300門大炮。至于克盧克的兩個后備軍，一個還差兩天路程，尚未趕到，一個留在后方防范安特衛普的敵軍。

上午9時，德軍向英軍陣地發射第一批炮彈，這次攻擊首先是指向運河拐彎形成的那塊突出地區，其北端的尼米橋（bridge at Nimy）是攻擊的焦點。德軍以密集隊形沖將過來，給掘壕堅守有方、專門訓練有素的英國步兵提供了“再好不過的目標”，他們打得又快又準，德軍以為碰上了機槍。德軍在一浪接一浪的沖殺遭到擊退以后，調來更多兵力，并改用了疏開隊形。英軍在“頑強抵抗”的命令下，盡管傷亡逐漸增大，而在突出地區的火力仍然不衰。10時30分起，德軍的炮隊，起先是第三軍的，接著是第四軍的，相繼投入戰斗，戰火便沿著運河的平直地段蔓延到西面。

及至下午3時，守衛突出地區的英軍各團已飽受了六小時的炮擊和步兵的進攻，鑒于人員越來越少，壓力過大，便炸毀尼米橋，逐連逐連地撤到兩三英里后面準備好的第二道防線。由于突出地區的放棄危及守衛運河河道平直地段的兩支友鄰部隊，后者也當即奉令于傍晚5時開始撤退。地處運河彎道和平直河道交接點的熱馬普（Jemappes）及其西面兩英里的馬里埃特（Mariette），因缺少雷管無法炸毀橋梁，頓時陷入千鈞一發。值此撤退之際，倘德軍沖過運河，不僅會使有秩序的撤退變成一場潰退，甚至會就此突破整個防線。一個霍雷修斯[[1]](#_1__Huo_Lei_Xiu_Si__Horatius__Lu)是絕不能守住橋梁的。然而英國陸軍工兵的賴特（Wright）上尉則在馬里埃特的橋下一只手轉一只手地懸著身子蕩過去，想給炸藥接上引線。在熱馬普，一名下士和一名士兵在不停的炮火下，也為接上引線努力了一個半小時。他們兩人事竟其成，并且榮膺了維多利亞勛章和杰出戰功勛章；賴特上尉盡管不顧身負重傷，作了第二次努力，但終未能成功。他也得到維多利亞勛章，不過，三星期后即捐軀埃納（Aisne）河畔。

傍晚時分，在零星炮火下脫離戰斗的微妙過程告成。一團一團依次掩護友鄰部隊撤退，直到全部到達第二道防線的村子和宿營地為止。看來德國人在白天戰斗中也同樣傷亡重大，他們既沒有認真地強攻未遭破壞的橋梁，也沒有追擊敵人的任何興趣。相反，撤退的英軍在暮色蒼茫中可以聽到他們“停止射擊”的軍號和爾后免不了的歌聲。最后，運河對岸一片寂靜。

英軍是何等幸運，馮·克盧克竟沒有利用他兩倍多的兵力優勢。由于比洛命令的掣肘，他不能尋找敵人翼側兜而圍之。他只有用他中路第三、第四兩個軍和英軍迎面交鋒作正面攻擊，結果損失慘重。第三軍的一個后備役上尉發覺他是全連中唯一幸存的軍官，也是全營中唯一幸存的連長。“你是我唯一的支持人了，”少校嚎啕大哭著說，“這個營只剩下一個空架子，我那引以自豪的、美好的營啊……”這個團也“被擊敗了，打垮了，只剩下少數人”。這個團的上校，像戰爭中的任何人一樣，只能根據自己隊伍發生的情況來判斷戰斗的過程，他整夜焦慮不安，因為如他所說，“英國人要是對我們的情況稍有懷疑并發動反攻的話，那他們簡直會把我們踏扁”。

馮·克盧克軍的兩翼，右面的第二軍和左面的第九軍都沒有投入戰斗。他們和第一集團軍的其他部隊一樣，11天行軍150英里，這時候長長的隊伍正在沿著公路前進，距中路兩個軍的后方還有幾小時的路程。各個軍如果在8月23日都參加了進攻，歷史也許會改觀。馮·克盧克在下午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命令中路兩個軍牽制英軍，等待翼側的軍調集上來進行包抄，打一場殲滅戰。可就在這之前，英軍已被迫果斷地改變了計劃。

亨利·威爾遜對第十七號計劃仍然懷著中世紀騎士般的熱情，一心想沖鋒陷陣，而不了解在當前這種形勢下執行這計劃跟使用中世紀的長弓幾無不同。威爾遜和霞飛不分軒輊。霞飛在接到德朗格勒關于阿登山區慘遭災難的報告后六小時仍然堅持發動攻勢，而威爾遜，甚至在運河戰線已被迫放棄之后，仍然熱衷于第二天發起進攻。他作了“仔細核計”，得出了“我們對面只有一個軍和一個騎兵師（也可能兩個軍）”的結論。他要約翰·弗倫奇爵士和默里“相信”，情況就是這樣，“結果我被允許草擬明天進攻的命令”。晚上8時，正當命令草擬完畢的時候，霞飛發來電報通知英軍說，各方面匯集的證據表明英軍現在面對的敵軍為三個軍和兩個騎兵師，命令就此作廢。霞飛的電報比威爾遜更具有說服力，從而一下子結束了任何進攻的念頭。接著是更壞的消息接踵而來。

晚上11時，斯皮爾斯中尉慌忙乘車從第五集團軍司令部趕來，帶來了令人難受的消息：朗勒扎克將軍已停止戰斗，正在將第五集團軍撤往設在英軍后方的防線。斯皮爾斯對這種既不和英軍商量，又不通知英軍的做法，就像阿德爾貝上校聽到國王阿爾貝將部隊撤往安特衛普的決定時那樣既忿懣又沮喪。十七年后，他寫這件事時仍然耿耿于懷。

朗勒扎克的撤退使英國遠征軍失去掩護，頓時處境危殆。經過緊張討論，決定一俟命令擬就并送達前線，就立即撤出部隊。但由于史密斯―多林軍部的地點選擇得離奇，以致耽誤了時間，造成了不必要的傷亡。史密斯―多林的司令部設在薩爾拉布律耶爾（Sarsla-Bruyère）的一幢普通的私人鄉村住宅里，不過名字倒很有氣派，叫做“巖石堡”。這個住宅坐落在偏僻的村道旁邊，既不通電報也沒有電話，白天已經難找，深更半夜就更困難了。即使是莫爾伯勒和威靈頓，他們選擇司令部的地點，也比較注重便利，要設在大道旁邊，縱然房子不太體面也無妨，他們的司令部，一個設在修道院，一個設在小旅館里。給史密斯―多林的命令只得用汽車送去，直到凌晨3時才送到，而還未投入戰斗的黑格第一軍早一小時就接到電報命令，從容做好了撤退準備，天不亮就開拔了。

但在這時，德軍已將兩個翼側軍調集前來，重新開始進攻。整天挨到炮擊的第二軍只得在炮火下開始撤退。混亂之中，有一個營始終沒接到命令，一直打到四面被圍，死的死，傷的傷，被俘的被俘，只有兩名軍官和200名士兵逃了出來。

第一天的戰斗就這樣結束了，這是英國士兵自克里米亞戰爭以來首次和歐洲敵人作戰，也是滑鐵盧戰役以來在歐洲大陸上的第一仗。但多么令人失望！冒著酷暑，仆仆風塵兼程前來的第一軍，幾乎一槍未發，現在就不得不掉過頭來往回走了；尤其是對那個以與有名的勁敵較量為榮的第二軍來說，失望更甚。他們既對敵人的人多勢眾和對第五集團軍的撤退一無所知，因而對撤退的命令也就無法理解了。

這在亨利·威爾遜是個“極大的”失望，他把一切都歸咎于基欽納和內閣沒有派六個師而只派了四個師來法國。他使出了不承認錯誤的驚人本領，他說：如果六個師都在那里，“這就不會是撤退而是前進，不會是敗績而是勝利”。他這種本領使他后來成為陸軍元帥。

威爾遜的自信和興致勃勃的勁頭開始消失，而那個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喜怒無常的約翰·弗倫奇爵士則是沉陷在沮喪之中。他到法國只一個多星期，可是緊張、焦慮、職責，加上朗勒扎克的不義行徑，戰幕初啟時已使他心灰意懶，對指揮作戰感到失望。第二天，他在給基欽納的報告的結尾就提出了一個灰溜溜的建議，“我認為應立即將注意力轉到勒阿弗爾的防御方面”，這說明他已開始從撤離法國來考慮問題了。勒阿弗爾位于塞納河口，在英軍原先登陸的基地布洛涅以南約100英里。

這就是蒙斯戰役。英國的這首次出戰，既是大戰的序幕，在追溯的時候，也就變得意義重大，被推崇備至，它跟黑斯廷斯（Hastings）戰役和阿讓庫爾（Agincourt）戰役一樣，在英國眾神殿中也要同占一席。這場戰役還被安上了蒙斯天使那樣的傳說。戰士個個英勇，亡者都是英雄。凡經命名的每個團的事跡，都寫到最后一分鐘，寫到最后一槍一彈，直寫得蒙斯一戰在這種英勇壯烈的煙霧中若隱若現地好似一場勝利。毫無疑問，英軍在蒙斯一戰中確實打得很勇敢，打得很出色，打得比法軍某些部隊要好，但是并不比很多其他部隊更好；不比哈倫之戰的比軍，或沙勒魯瓦之戰的阿爾及利亞步兵，或翁埃耶之戰中芒讓將軍的那個旅以及各個戰場的敵軍為好。這場戰役，到開始撤退前歷時九小時，投入作戰的英軍計兩個師，35000人，總共傷亡1600人，把馮·克盧克集團軍的前進拖住了一天。它是邊境戰役的一部分。而在整個邊境戰役中，法軍有70個師，約125萬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方打了四天。法軍這四天的傷亡達14萬多人，也就是當時在法國的英國遠征軍總數的兩倍。

緊接在沙勒魯瓦戰役和蒙斯戰役之后，比利時盡是殘垣斷壁，遍地堊灰，滿目戰爭瘡痍，一片廢墟。街頭巷尾到處散落著士兵做墊褥用的滿是污泥的干草、丟棄的背包和血跡斑斑的繃帶。正如威爾·歐文[[2]](#_2__Wei_Er__Ou_Wen__1873__1948)所寫的那樣，“到處臭氣沖天。我從未聽說在描寫戰爭的任何書本中提到過這種情況，這是50萬沒有洗澡的士兵散發出的汗酸臭……在德國人經過的每一個城鎮里，這種臭氣多日不散”。混雜一起的，還有血腥氣、藥品氣、馬糞和尸體的臭氣。人的尸體理應由他們所屬的部隊在午夜前掩埋掉，但往往是尸體太多，時間太少，至于掩埋死馬就更沒有時間了。那些死馬久未掩埋，都已腐爛膨脹。軍隊開拔之后，可以見到比利時農民拿著鐵鏟、彎著腰在田野里清理尸體，這種景象宛如一幅米勒的杰作。

在尸體中間，零落可見棄擲下來的第十七號計劃片紙只字，以及印有“……法軍今后應以進攻為唯一法則……只有進攻才能產生積極結果……”字樣的耀眼的法軍野戰條例殘篇。

邊境已被突破，各部隊不是在退卻就是在作死守的困獸之斗，對這場災難應負最終責任的霞飛，在法國的所有希望徹底破滅的這個時刻，竟不可思議地依然泰然自若，毫不內疚。他立即把過失推卸到計劃執行人身上，為計劃制訂者開脫責任。這樣，他就可以保持對自己、對法國的信心白玉無瑕。這樣，也就為他提供了置身今后災難深重的日子里所必不可少的和唯一的條件。

24日上午，在像他所說“事實證據俱在，回避不了”的這個時候，他向梅西米作了匯報。他說，部隊“已被迫不得不采取守勢”，必須靠其筑壘的防線支持下去，一方面消耗敵軍，一方面等候有利時機，重新展開攻勢。他立即著手部署退守的防線，并著手變更部隊部署，編成密集隊形，在他所希望建立的索姆河防線上恢復攻勢。帕萊奧洛格最近自圣彼得堡的來電使他深受鼓舞，德軍為了對付俄國的威脅隨時都會被迫從西線撤軍東去，對此，他抱了很大希望。他在自身遭到災難之后，便引領等待俄國這部壓路機的響聲。可是傳來的只是一份晦澀不明的電報，說對東普魯士的“一些重大戰略問題”正在解決之中，同時答應“進一步采取進攻性行動”。

查明戰敗原因是霞飛僅次于重組戰線的當務之急。他毫不猶豫地認為原因在于“指揮官的嚴重缺陷”。有些指揮官確實為肩負的可怕責任壓垮。炮兵部隊的一名將軍不得不上去替代沙勒魯瓦北面第三軍軍長的職務，因為那位軍長在戰斗最關緊要的階段竟然哪里也找不到他。第五軍的一名師長在阿登戰役中竟然自殺了。人，就像計劃一樣，在面對演習中所沒有的危險、死亡和真槍實彈時，難免會出現問題。可是，霞飛這位不承認計劃會有問題的人，是不允許任何人犯錯誤的。他查問那些表現得軟弱無能的將領們的名字，無情地擴大了免職、降職的人員名單。

跟亨利·威爾遜一樣，霞飛不承認理論上和戰略上的錯誤，因此他只好說：“盡管我認為已為我軍準備了優勢兵力”，但由于“缺乏進攻精神”以致進攻失敗了。其實，他與其說“缺乏”，倒不如說“太過”。在洛林的莫朗日，在阿登山區的羅西尼奧爾，以及在桑布爾河畔的塔明等地，導致法國敗北的不是膽量太小，而是膽量太大。法軍總司令部在大潰敗后的當天發出的《給各軍的通知》中，曾把“缺乏”進攻精神改為“錯誤理解”進攻精神。通知上說：各軍對野戰條例“理解不透，應用不當”。步兵發動進攻的地點太遠，又無大炮支持，因而受到機槍射擊，遭到本可以避免的損失。今后，占領陣地之后，“必須立即從事防御的編成，務必挖掘塹壕”。步兵與炮兵之間缺乏配合協作是“主要錯誤”，糾正這一錯誤事屬“絕對必要”。75毫米大炮務必以最大射程射擊。“最后，我軍一定得仿效敵人，使用飛機作為炮兵耳目”。可見不論法軍還有其他什么缺點，不愿吸取經驗教訓則不在所談缺點之列，至少在戰術方面是如此。

至于尋找自身在戰略方面的疏忽，法軍總司令部則沒那么敏銳，甚至在8月24日第二處揭露了一個驚人的情況，發現敵軍現役軍后面跟隨著使用同樣番號的后備軍之后，還是如此。這是在前線使用后備部隊的第一個證據，它說明了德軍如何使右翼和中路同時都具有同樣強大的兵力。但是，霞飛卻沒有因此懷疑第十七號計劃的制訂依據可能有問題。他仍然認為計劃是正確的，其失敗是執行不當所致。對于導致法國敞開大門遭受入侵的這場大災難，議會在戰后調查原委要他作證時，曾問及他對戰前總參謀部關于德軍右翼越強對法國越有利這個理論的看法。

“我仍然是這樣看的，”霞飛回答說，“事實說明我們的邊境戰役計劃正是為此制訂的，如果這一仗打贏，我們的出路就打通了。……再說，如果第四集團軍和第五集團軍打得好，這一仗就勝利了。打得好，那就意味著整個德軍先遣部隊的殲滅。”

在1914年8月開始撤退那天的陰暗早晨，霞飛責怪的主要對象是第五集團軍及其司令，而不是第四集團軍。盡管英軍也把怨恨一股腦兒地發泄在朗勒扎克身上，然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軍發言人終究說，朗勒扎克8月23日命令撤退而不作反攻的決定，避免了“又一次的色當大敗”。在朗勒扎克早前堅持將默茲河西岸的第五集團軍轉移到沙勒魯瓦的問題上，這位發言人也說：“毫無疑問，計劃的這一改變挽救了英國遠征軍，也可能挽救了法國軍隊，使他們沒有遭到覆滅之災。”

8月24日，整個戰局已經明朗，法軍各路都在撤退，敵軍則在以長驅直入之勢向前推進。然而法軍潰敗到怎樣的境地，公眾直到8月25日德國宣布攻下那慕爾、俘虜5000人之后才知道。這個消息震動了全世界，使人難以置信。倫敦《泰晤士報》曾說那慕爾可以經得起六個月的圍攻；可是如今四天就陷落了。在英國，據驚慌失措而又克制的說法，那慕爾的失陷“普遍認為是個明顯的不利……迅速結束戰爭的可能已大為減少”。

結束的可能究竟減少到什么程度，又究竟多么遙遠，當時還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能意識到，就相同作戰時間的參戰人數、傷亡人數以及傷亡率而言，這場大戰中最大的一個戰役已經打過了。也沒有人能預見到這次戰役的后果：德國最后占領整個比利時和法國北部之后，將如何擁有這兩個國家的工業能力，列日的制造工業、博里納日的煤、洛林的鐵、里爾的工廠，以及河流、鐵路和農業之利；將如何助長德國的野心，將如何迫使法國下定決心打到每寸失地都收復、每分錢都得到賠償，從而堵塞了后來所有謀求妥協性和平或“沒有勝利的和平”之路，使戰爭延長達四年之久。

所有這些都是事后的認識。8月24日，德國人心潮澎湃，無限自信。他們看見前面只不過是些殘兵敗將；施利芬的才華業已得到證實；德國人看來已穩操勝券。在法國，普恩加萊總統在日記中寫道：“我們必須下定決心，既要后撤也要進襲。過去兩星期的夢幻結束了。現在，法國的未來取決于它的抵抗能力。”

光有沖動是不夠的。

注釋

[[1]](#_1_13) 霍雷修斯（Horatius），羅馬傳說中一位守橋抗敵的英雄。——譯注

[[2]](#_2_10) 威爾·歐文（1873—1948），美國作家和新聞工作者。1914—1915年作為隨軍記者發表過一些作品，1916—1918年為《星期六晚郵報》記者。——譯注

“真叫人感到既光榮又可怕”：Wilson, 165.

法軍野戰條例及“在演習時那樣苦苦操練的科目”：qtd. Lt.-Col. Fliecx, Les Quatre Batailles de la France, Paris, 1958, 12–13.

第十七號計劃最激昂慷慨的批評家們：Engerand, 473.

迪巴伊非常“反感”：Dubail, 57. Battles of Morhange-Sarrebourg: AF, I, I, 176–265, passim.

莫朗日尸橫遍野，“上帝用以訓示帝王們律法”的教訓：Engerand, 473.

“一經準備就緒就發動進攻”：qtd. Edmonds, 507.

“先生們，我們要繼續下去”：Giraud, 535.

“我21日去南錫”：Aston, Foch, 115.

德軍統帥部被引向左翼：Tappen, 15 (German ed.).

三號方案及克拉夫特與塔彭的通話：Rupprecht, 37, n.; Krafft, 47.

霞飛發出在阿登山區進攻的號令：Annexes Nos. 592 and 593. Battle of Ardennes: AF, I, I, 351–432, passim.

“等待炮兵的支援火力”：Annexe No. 352.

阿登山區的地形對“重炮處下風而野戰炮占優勢的一方有利”：Joffre, 66.

霞飛的回憶錄：Messimy (88) says they were written by “a group of faithful and devoted officers.”

“智力平庸”：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69.

“只有依靠劍，才能得到陽光底下的地盤”：Grelling, 46.

“為我統率大部隊打下了理論基礎”：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3.

“瘋狂地獵取最高榮譽”：qtd. Goerlitz, 158.

“嚴肅、陰郁”的面孔：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12.

“加農詩人”、“太富于想象”：Engerand, 483, 488–9.

“這些盡是些玩意兒！”：qtd. Monteil, 34.

第四集團軍偵查后的報告被認為是“悲觀的”：Engerand, 491.

“正是我們自己遭到了突然襲擊”：Langle, 137.

法國總司令部對呂夫將軍的報告未加注意：Briey, April 15, evidence of Ruffey.

“等于蒙住了眼睛”：Commandant A. Grasset, Un Combat de rencontre, Neufchâteau, 22 Août, 1914, qtd. AQ, January 1924, 390.

“過后的戰場是一片難以置信的景象”：qtd. Engerand, 499, 504.

法國士官的日記：qtd. W. E. Grey, With the French Eastern Army, London, 1915, 49.

德國軍官的日記：Charbonneau, 54.

“勇于犧牲的奇跡”及本段余下部分：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26, 29–37.

呂夫的三個后備師被抽走：Joffre, 166; Briey, April 15, evidence of Ruffey.

“你們總司令部的人……像敵人袋子里的牡蠣一樣愚昧無知”：Briey, ibid.

德朗格勒將軍“如坐針氈”：Langle, 137. “Serious check at Tintigny”: Annexe No. 1098.

“有兵力優勢之利”：Annexe No. 1044.

德國沒有布里埃的鐵礦無法長期打下去：A memorandum addressed to the German Supreme Command by Dr. Reichert of the Iron and Steel Association in December 1917 supported a plea for annexation of Briey with the argument that without the ores of this regio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war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f we had not possessed Briey we would have been defeated long ago.” Wirtschaftzeitung der Zentralmaechte, December 17, 1917, qtd. Engerand, 486. The subject is fully discussed in Engerand's Rapport on Briey, première partie.

“我將盡一切努力再一次發動進攻”：qtd. Isaac, Joffre at Lanrezac, 87.

“按他的吩咐行事”：qtd. AQ, April 1923, 37.

“威廉爸爸”的電報：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37.

“炫目的緊身白外衣”：Sven Hedin, qtd. Gardiner, 223.

只有自殺才能避而不受二級鐵十字勛章：Sturgkh.

霞飛命令朗勒扎克進攻，要求約翰·弗倫奇爵士“配合這次行動”：Annexe No. 695. Battle of Charleroi: AF, I, I, 433–480, passim.

基欽納的8月19日電報：Arthur, 29.

“會陷于孤軍作戰境地”：Spears, 127. “I leave you absolute judge”: Annexe, No. 705.

法軍既沒有挖掘戰壕，也沒架設鐵絲網或構筑別的防御工事：Spears, 105; Engerand, 530–31.

“軍號嘹亮，戰鼓隆隆，旗幟飄揚”：Spears, 132.

“帶著經久不息的刺耳嘯聲”：Sutherland, 36–9.

“必須有個軍樂隊”：Spears, 128.

“我想我對戰局了如指掌”：Arthur, 30.

“你們得到的并轉給總司令的那個情報，看來有點夸大”：Spears, 137, n.

英、德騎兵在蘇瓦尼的遭遇戰：Bridges, 77.

史密斯―多林將軍得到的命令：Edmonds, preface to Bloem, viii.

克盧克將軍打算在跟法軍交鋒之前將英國軍隊和比利時軍隊一并“擊潰”：Kluck, 33.

克盧克反對，比洛堅持：Kluck, 37–8, 41–2.

“并沒有發生意義重大的登陸行動”：Bülow, 50.

比洛與豪森的抱怨：Bülow, 58; Hausen, 165–6, 191–3.

博埃將軍：Spears, 144.

第三軍報告損失“慘重”：Annexe No. 894.

每分鐘打2.25發：Lanrezac, 135.

第十軍“損失慘重”，“被迫退卻”等：Annexe No. 876.

朗勒扎克請弗倫奇協助，及弗倫奇的回答：Spears, 149–50; Edmonds, 92, n. 2.

“煲湯鍋”：Engerand, 537.

“為極度憂慮所困”，及其他引言：Lanrezac, 181, 183–4, 196. General Spears has stated (173) that the retreat of the Fourth Army “was not the reason” for Lanrezac's decision because, according to Spears, Lanrezac did not know of it until next morning, a direct contradiction of Lanrezac's own statement that he had “received confirmation” of it before he made his decision. Writing after Lanrezac was dead, Spears states (173 n.), “There is not the least trace of such a 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as Messimy testified at the Briey hearings, the archives contained 45,000 to 50,000 files of 500 to 1,000 documents each, a probable total of 25 to 30 million pieces, Spears’ negative is hardly proof. His verdict was conditioned less by the evidence than by his feeling that Lanrezac's retreat “left the British in the lurch” (176).

“自認為他右翼受到威脅便命令撤退而沒有反攻”：Lanrezac, 185; Pierrefeu, Plutarque, 74.

“由于法國第五集團軍的撤退”：Edmonds, 68, 72. For the battle of Mons, see also Maurice, 58–76.

史密斯―多林關于破壞橋梁的命令：Edmonds, 72, n. 1.

“再好不過的目標”：Smith-Dorrien, 386.

“頑強抵抗”：Edmonds, 77.

炸毀橋梁的努力：Hamilton, 28; Edmonds, 86.

“你是我唯一的支持人了”等語：Bloem, 72–73.

威爾遜作了“仔細核計”，并要弗倫奇和默里“相信”情況就是這樣：Wilson, 165.

霞飛的電報：French, 64; Wilson, 167.

薩爾拉布律耶爾難找：Smith-Dorrien, 388; and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 in 1959.

威爾遜將不利戰局歸咎于基欽納和內閣沒有派六個師而只派了四個師來法國：Wilson, 167.

“勒阿弗爾的防御方面”：Arthur, 36.

“到處臭氣沖天”：qtd. Mark Sullivan, Our Times, V, 26.

霞飛把過失推卸到計劃執行人身上，及隨后四段的引言：Joffre, 178, 181, 183–5, 187.

法軍第二處發現德軍后備軍的情況：Joffre, 187.

霞飛在戰后的證詞：Briey, July 4, evidence of Joffre.

不愿透露姓名的英軍發言人：editor of Army Quarterly, April, 1925, 35.

那慕爾的失陷“普遍認為是個明顯的不利”：NYT from London, August 26, 1:3.

“我們必須下定決心”：Poincaré, III, 88.

## 第14章　“哥薩克來啦！”

8月5日，在圣彼得堡，法國大使帕萊奧洛格驅車在路上遇到一團哥薩克騎兵開往前線。統領部隊的將軍看到大使車上的法國國旗，便勒馬側身與大使擁抱并懇請大使惠允檢閱他的部隊。在帕萊奧洛格從汽車上莊重地檢閱他的部隊時，這位將軍在發號施令之間，還慷慨陳詞，振臂高呼：“我們要消滅那些卑鄙的普魯士人！……普魯士必亡，德國必亡！……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島（St.Helena）去！”檢閱結束后，將軍躍馬在隊伍后面疾馳而去，揮動著馬刀，吶喊著戰斗口號：“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島去！”

俄國人同奧地利的爭執加速了戰爭的爆發。俄國人感激法國人信守協約，并很想通過支持法國的計劃來表示他們對協約的同樣忠誠不貳。沙皇為了克盡厥責，只好言過其實，儼然很有信心和勇氣地宣稱：“我們原來的目標，就是要殲滅德國軍隊”；他向法國保證，他認為對奧作戰是“次要的”，他且已命令大公“不惜任何代價，盡快打開通往柏林的道路”。

總司令一職，盡管向往此職的蘇霍姆利諾夫曾為自己進行過一番激烈的爭奪，但在危機最后幾天，終于任命大公擔任。俄國政權，雖說已經到了羅曼諾夫王朝末期，可還沒有愚蠢到這種地步——在他們兩人當中竟會選擇傾向德國的蘇霍姆利諾夫來領導對德戰爭。不過，他仍留任陸軍大臣。

大戰一爆發，法國人由于不能肯定俄國是否確實愿意和能否履行其諾言，便開始規勸這個盟國趕緊行動。8月5日，帕萊奧洛格大使在謁見沙皇時懇求說：“請求陛下命令麾下軍隊立即采取攻勢，否則法軍有遭覆沒之虞。”帕萊奧洛格不以謁見沙皇為足，還拜訪了大公。大公向大使保證，為了遵守動員第十五天行動的諾言，他擬不待部隊全部集結完畢，于8月14日就開始大力進攻。大公的出言吐語，向以不妥協著稱，有時甚至唐突得不堪入耳，可是，他卻立即擬了一份富有中世紀騎士精神的文稿，致電霞飛：“堅信必勝”，他還將高高并舉他自己的旗幟和1912年演習時霞飛贈送給他的那面法蘭西共和國國旗，向敵人進軍。

可是，向法國許下的諾言跟履行這些諾言的準備工作之間，差距委實非常明顯，這也許就是大公流淚的原因。據說，大公被任命為總司令時曾淚落如珠。根據他的一位袍澤所述，他“對這項任務，看來毫無準備，用他自己的話說，接到上諭之后哭了很久，因為不知道如何著手是好”。俄國的一位著名的軍事史家認為他是“非常勝任”此職的，大公的哭泣，也許不是為了本人，而是為了俄國，為了整個世界。1914年籠罩著一種氣氛，使感受到的人都為人類前途不寒而栗，即使最有膽識、最為果敢的人，也會為之淚下。8月5日，梅西米在內閣會議上的開場演說，充滿勇氣和自信，但講到一半，突然中斷，掩面而泣，難以為繼。溫斯頓·丘吉爾在送別亨利·威爾遜，祝上帝保佑英國遠征軍一路平安和勝利時，曾“控制不住，泣不成聲，不能終句”。在圣彼得堡也多少可以感受到大致相同的情緒。

大公的袍澤并不是一些最得力的臺柱。他1914年的參謀長是亞努什克維奇（Yanushkevich），是個四十四歲的年輕人，唇上一撮黑髭須，頭上一把黑鬈發，而他最引人注意的是頷下沒有胡子，因此，陸軍大臣說他“仍舊是個娃娃”。他與其說是個軍人，不如說是個朝臣。他沒有參加過對日戰爭，但他跟尼古拉二世同在禁衛軍的一個團服過役。這就是他迅速高升的原因。他是參謀學院的畢業生，后來成為該院的院長，擔任過陸軍部的參謀，戰爭爆發時任參謀長才三個月。他同德國王儲相似，完全是在副參謀長指引之下工作的；嚴肅、寡言的副參謀長丹尼洛夫（Danilov）將軍是位工作勤奮、紀律嚴明的人，是參謀部的智囊。參謀長亞努什克維奇的前任日林斯基將軍是寧愿免去本職、說服蘇霍姆利諾夫任命他為華沙軍區司令的。如今他在大公手下，在前方全面負責指揮西北集團軍對德作戰。在日俄戰爭中，他任總司令庫羅帕特金（Kuropatkin）將軍的參謀長，沒有什么功績，也無大錯；在幸免那場身敗名裂的厄運之后，這位既無個人聲望也無軍事才干的將軍仍舊在軍隊的上層應付著。

俄國答應法國提前進攻，但未作任何準備，直到最后時刻才不得不臨渴掘井。有關“提前動員”計劃的命令下達了。為了贏得幾天的時間，計劃中略去了一定的預備階段。巴黎的電報源源而來，加上帕萊奧洛格大使轉遞時的口若懸河，壓力持續不斷。8月6日，俄國總參謀部的命令說，必須準備“盡快對德發動一場有力的進攻以緩和法國面臨的局勢。當然，這只有具備足夠力量時才能進行”。可是，到8月10日，“具備足夠力量”的這條但書，則避而不談。那天的命令寫道：“鑒于德國準備對法國突然給一猛擊，支持法國自屬我們的義務所在。而這一支持，又必須以盡快的方式進攻德國，攻打其留在東普魯士的部隊。”第一、第二集團軍已奉命“整裝待發”，于動員第十四日（8月13日）出發，不過他們勢必在沒有后勤部隊的情況下開拔，后勤部隊要到動員第二十日（8月19日）才能完全集中起來。

組織工作困難很大：正如大公一次向普恩加萊所承認的，問題的實質在于俄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命令發出了，但是誰也不能肯定是否送達了。缺乏電話線，缺乏電報設備，缺乏受過訓練的通訊兵，在在都使得通訊無法做到迅速可靠。機動運輸工具的缺乏也使俄國人邁不快腳步。1914年，陸軍只擁有418輛機動運輸車，259輛客車，兩輛救護車（不過，卻有320架飛機）。因此，補給品在離開鐵路末站以后就得依靠馬匹輸送。

補給充其量也得碰運氣。對日戰爭后，據審訊證詞透露，陸軍暗地里的貪污賄賂，像是密如蛛網的鼴鼠穴道，比比皆是。甚至莫斯科總督賴因博特（Reinbot）將軍也曾因辦理陸軍承包工程受賄，被判刑入獄，不過他終究長袖善舞，不僅獲得赦免，而且重又得到一個新的職位。大公身為總司令后第一次接見其軍糧部門人員時，就對他們說：“先生們，不許盜竊。”

戰爭的另一個傳統伴侶，即伏特加酒，被禁止了。在上次（1904年）動員的日子里，士兵們來的時候個個都是搖搖晃晃的，團隊的兵站里亂糟糟地盡是些醉漢和破酒瓶，整頓這種混亂狀態，曾多花了一周時間。現在，由于法國人把每延遲一天都說成事關生死存亡，俄國頒布了這道作為動員期間臨時措施的禁令。這除了體現羅曼諾夫王朝末期典型的輕率作風以外，沒有什么比這更能確切說明俄國人是在真心誠意地滿足法國人要他們趕速行動的懇求了。俄國政府又于8月22日下令將禁令延長到整個戰爭期間。出售伏特加是政府的一項專賣事業，這道禁令就此一刀砍掉了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一位惶惑不解的杜馬議員議論說：眾所周知，從事戰爭的各國政府無不想方設法課征各種捐稅以增加收入，“而一個國家在戰爭期間竟放棄歲入的主要來源，則是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

一個迷人的夏夜，大公在第十五天的最后時刻晚上11時離開首都，前往設在巴拉諾維奇（Baranovichi）的戰地司令部。巴拉諾維奇是莫斯科——華沙鐵路線的樞紐，地處德國與奧地利戰線的中點。他和幕僚以及他們的家屬，一群一群拘謹地聚集在圣彼得堡車站的月臺上，恭候沙皇駕臨為總司令送行。可是，皇后猜忌，無視禮儀，尼古拉沒有露面。人們低聲告別、祝福；大公及其幕僚默不作聲地上了火車，啟程了。

在后方，調集軍隊的工作還在努力進行。而俄國的騎兵偵察部隊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深入德國國境進行刺探。他們的這種侵襲，功不在于侵入了德國的警戒線，這算不了什么，倒是為德國報紙上驚人的大標題以及關于哥薩克暴行的種種荒誕故事的出籠，提供了口實。早在8月4日，德國西部邊境城市法蘭克福（Frankfurt）的一位官員就聽到謠傳，說城里將要收容來自東普魯士的三萬名難民。不過，保全東普魯士，不讓它受到斯拉夫游牧民族入侵的要求，則開始分散了德國總參謀部的注意力，使其不能專心致志于集中全部軍力對付法國的工作。

8月12日拂曉，萊寧坎普（Rennenkampf）將軍的第一集團軍的一支先遣部隊，由戈爾科（Gourko）將軍率領的一個騎兵師和一個起支援作用的步兵師組成，在主力推進之前，拉開了入侵東普魯士的戰幕，占領了德境內五英里的馬格拉博瓦鎮（Marggrabowa）。俄國人躍馬鳴槍，穿過郊區和進入空曠的集市廣場時，發現該鎮沒有設防，德軍已經撤走。商店關門閉戶，只是些居民在窗內張望。在農村，居民們在先遣騎兵隊到達和戰斗打響之前，仿佛經過事先安排似的，都已倉促逃走一空。在向前推進的第一個早晨，俄國人看到沿著他們前進路線升起了柱柱黑煙，走到臨近一看，并不是逃走的物主在焚毀莊園和房舍，而是一堆堆的草料在燃燒，作為信號，標明入侵者前進方向。德國人曾作過系統準備的跡象在在可見。山頂上有木料搭建的瞭望塔；當地農村十二歲到十四歲擔任通訊員的男孩子都發有自行車；派作密探的德國兵都偽裝成農民，有的甚至打扮成農村婦女。后者大概是在非軍事行動中因他們所穿的政府發給的內褲被發現的；但是，很可能有許多這樣的人始終沒有被逮住。戈爾科將軍遺憾地承認說，要在東普魯士撩起每個婦女的裙子來看看是不可能的。

萊寧坎普將軍在接到戈爾科將軍關于市鎮撤空、居民逃走以及據他推斷德國人在維斯瓦河基地以東地區不打算進行認真抵抗的報告后，更是熱衷于勇往直前，更少關心他不完善的補給勤務。他是一位年已六十一歲的軍官，整潔、挺拔，目光射人，留著兩撇挺勁的翹髭須。他在鎮壓義和團期間，在日俄戰爭中身為騎兵師師長期間，以及后來作為討伐軍首領，遠征赤塔，殘酷殲滅1905年革命余部期間，都以勇敢果斷、胸懷韜略而享有盛譽。但他這位杰出的將才，卻蒙有一層薄薄的陰影，一是因為他是德國人的后裔，再是事出某種未經說明的糾葛，而這些糾葛，據戈爾科將軍所說，“使他的道德名譽遭受到相當大的損害”。在以后幾周中，他的不可思議的行動，令人又想起這些因素，可是，他的袍澤們還是深信他是忠于俄國的。

萊寧坎普不顧西北集團軍群司令日林斯基將軍——這位司令從一開始就是悲觀的——的告誡，趕緊集中了三個軍和五個半騎兵師，于8月17日展開攻勢。他的20萬人的第一集團軍沿著35英里長、間有羅明滕森林的戰線，越過了邊界。它的目標是距邊界37英里的因斯特堡峽口，按照俄軍行軍速度約計三天行程。峽口是一片約30英里寬的開闊地，北至柯尼斯堡要塞區，南至馬祖里湖區。這是一個分布著小村莊和田地未作圈欄的大農場的地區，從間或隆起的高地眺望，視野廣闊。在這里，第一集團軍將可以如愿與德軍主力作戰，直至薩姆索諾夫（Samsonov）的第二集團軍由南邊繞過湖的障礙，從翼側和后方給德軍以決定性的打擊。俄國這兩支集團軍預期將在阿倫施泰因（Allenstein）地區會師后并肩作戰。

薩姆索諾夫將軍要到達的戰線跟阿倫施泰因平行，距邊界43英里，如果一切順利，約三天半到四天時間可達。可是，在他的出發地點和目的地之間，有很多機會會碰上料想不到的戰爭風險——即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摩擦”。由于俄屬波蘭和東普魯士之間沒有橫貫東西的鐵路，薩姆索諾夫要比萊寧坎普軍晚兩天才能越過邊界，而且在到達邊界以前，得行軍一周，路線是沿著沙礫路，穿過一片未開發的荒原。荒原上，森林、沼澤遍布，居民寥寥，只有零星貧苦的波蘭農民，而且一進入敵人地區，糧秣來源就很少了。

薩姆索諾夫將軍跟萊寧坎普將軍不同，對這個地區較為生疏，對他的部隊和幕僚也不熟悉。1877年，他十八歲時，同土耳其人打過仗：四十三歲時，當上了將軍；在日俄戰爭中，他也是一位騎兵師長；1909年以后，任土耳其斯坦（Turkestan）總督，從事半軍事性的工作。戰爭爆發時，他五十五歲，在高加索休病假，直到8月12日，才到達華沙第二集團軍司令部。他的部隊和萊寧坎普部隊之間，以及與設在后方協調他們兩支部隊行動的日林斯基司令部之間，通訊聯系都很不穩定。講究時間的精確性，完全不是俄國人的長處。戰爭爆發前，在4月份曾舉行一次軍事演習，其司令和參謀人員大部分就是這次戰爭披掛上陣的那些司令和參謀，總參謀部在這次演習之后曾憂郁悲觀地感到問題不少。由蘇霍姆利諾夫擔任總司令的這次軍事演習，已經表明第一集團軍出動過早，可是戰爭發生時，這張時間表卻未變更，仍遵行不誤。萊寧坎普先出發兩天，而薩姆索諾夫所部還有四天的路程要走，這樣，德軍就會有六天時間只消對付一支俄國軍隊。

8月17日，警衛萊寧坎普左右兩翼的兩個騎兵軍，奉命不僅要掩護部隊前進，而且要切斷鐵路兩側的支線，阻止德國火車撤退。俄國既已蓄意使用了不同于德國的鐵路軌距作為防止入侵的一項措施，現在也就無法將自己的車輛調集過來，也不能利用這些寶貴的東普魯士鐵路網，除非繳獲了德國的列車，而德國人當然不會留下許多車輛拱手送給俄國人的。俄軍從基地向敵國推進，越走越遠，幾乎立即就超出了依靠馬匹拖拉而又沒有完全組織好的補給車隊所及了。至于通訊，由于缺乏電線架設自己的線路，俄國人只好依靠德國的電報線路和電報局，當發現這些設施已被破壞時，就使用無線電明碼發送電訊，因為他們各部門的參謀部、處都沒有密碼和密碼員。

他們很少進行空中偵察，也很少使用飛機指點大炮射擊。大多數空軍已派往奧地利前線。俄國兵一見到飛機——在他們是生平第一次看到——不問國籍，就用步槍連續射擊；他們深信像飛行機器這種聰明的發明，只有德國人才可能有。士兵吃喝著大量的黑面包和茶，據說這會使他們身上發出一種特有的味道，至于道理何在就不得而知了。這種味道很有點像馬的臭味。他們備有四棱刺刀，裝在步槍上，整個武器就和人一樣高，在白刃戰中，使他們比德國兵有利。可是，就火力和戰斗力而言，德軍在大炮方面的優勢，可使兩個德國師抵得上三個俄國師。身為陸軍大臣的蘇霍姆利諾夫和身為總司令的大公之間的相互懷恨，當然無助于改善這種不利條件，前后方聯系糟糕透頂的情況和還要糟糕的補給問題，則更是幫了倒忙。作戰還不滿一個月，彈藥短缺的情況已非常嚴重，而陸軍部則漠不關心，也可說是怠惰懶政。這種態度益發使人灰心失望，因此，大公于9月8日被迫徑向沙皇呼吁。他報稱，在奧地利前線，如炮彈儲存達不到每門炮100發，將勢必被迫停止作戰。“目前，我們每門炮只有25發炮彈，我感到有必要請求陛下催促速運彈藥。”

“哥薩克來啦！”響遍東普魯士的驚叫聲，動搖了德國只準備給這個省留下最低限度防御的決心。駐東普魯士的第八集團軍，計有四個半軍、一個騎兵師、柯尼斯堡的衛戍部隊以及一些地方部隊，人數相當于俄軍兩個集團軍中的任何一個集團軍。毛奇給第八集團軍的命令是保衛東、西普魯士，不得讓自己為優勢兵力所壓服或被趕進柯尼斯堡要塞區。如果發覺受到非常強大的部隊的威脅，就撤到維斯瓦河西面，將東普魯士放棄給敵人。按照當時任第八集團軍作戰處副處長的馬克斯·霍夫曼上校的看法，這些命令會“對意志薄弱者的心理形成危險”。

在霍夫曼心目中，這位意志薄弱的人就是第八集團軍司令馮·普里特維茨·加夫龍（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中將。作為朝廷的寵臣，普里特維茨的戎馬生涯是飛黃騰達的。據一位和他同事的軍官說：他“懂得在餐桌上如何以滑稽可笑的故事和淫穢的閑話來博得德皇好感”。他現年六十六歲，向以大腹便便著稱，是一個德國式的福斯泰夫[[1]](#_1__Fu_Si_Tai_Fu__Falstaff__Sha)，“儀表堂堂，妄自尊大，冷酷無情，甚至粗鄙下流，恣意放縱”。他的諢名叫“胖子”，沒有動腦筋或搞軍事的興趣，是能不動就不動的人。毛奇認為他力不勝任，多年來一直力圖撤掉他第八集團軍司令的職務，但都枉費心機；普里特維茨的一些人事關系使毛奇的種種努力水潑不進，針插不入。毛奇所能做的，最多不過是委派了他自己的副手馮·瓦德西伯爵擔任普里特維茨的參謀長。時至8月，身患手術后遺癥的瓦德西，按霍夫曼的意見“是不能勝任的”，而普里特維茨也從未勝任過，霍夫曼因此便樂滋滋地確信指揮第八集團軍的實權將操在最合適的人手中，而此人就是他自己。

8月15日，日本宣布參加協約國，使大量俄國部隊得以脫身出來；德國人因而對東普魯士的安危更為焦慮。結交和保持友誼一向是德國外交深感困難的一項任務，而今又告失敗。在一場歐洲戰爭中，自身的最高利益何在，日本有它自己的打算，受日本蓄意侵害的國家是洞察其奸的。袁世凱總統就說過：日本將從這場戰爭中漁利，主宰中國。事實證明，確如所述，日本趁戰時歐洲列強無暇他顧而制止它不得的時機，將“二十一條”強加于中國，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攪動了20世紀的歷史。但日本參加協約國立竿見影的效果，首先是使俄軍從遠東脫身出來。想象到斯拉夫大軍增加后的情景，德國人對于把東普魯士交由第八集團軍單獨守衛的問題，現在又有了新的理由感到緊張不安。

從一開始，馮·普里特維茨將軍就感到難以駕馭其第一軍軍長馮·弗朗索瓦（von François）將軍，那是一位五十八歲的軍官，胡格諾派教徒的后裔，晶瑩的眼睛給人一種坦率、天真、入世未深的印象，看來很像是個德國的福煦。第一軍的士兵都是從東普魯士招募來的，它的司令是決意不讓一個斯拉夫人踐踏普魯士領土的人，他向前推進很遠，大有打亂第八集團軍戰略之勢。

第八集團軍根據霍夫曼的分析，認為萊寧坎普所部會先進軍，預料8月19日或20日，可于該部到達因斯特堡峽口以前，在距俄國邊境25英里的貢賓嫩[[2]](#_2__Gong_Bin_Nen__Gumbinnen__Xia)地區迎擊該軍。因此，派三個半軍與一個騎兵師，其中包括弗朗索瓦的第一軍，去迎戰萊寧坎普，派第四軍去東南與正在逼近的薩姆索諾夫所部接觸。8月16日，第八集團軍司令部向前移到接近因斯特堡前線的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發現弗朗索瓦業已到達貢賓嫩并在繼續前進。弗朗索瓦認為應立即采取攻勢，而霍夫曼的戰略則是讓萊寧坎普所部在頭兩天盡可能向西推進，他的理論是，萊寧坎普推進得離基地愈遠就愈易被擊潰。霍夫曼并不要萊寧坎普的前進受到阻擋，恰恰相反，他要讓萊寧坎普盡快到達貢賓嫩地區，以便德軍在必須轉而對付薩姆索諾夫以前，好有時間同萊寧坎普單獨作戰。

弗朗索瓦于8月16日在貢賓嫩設下司令部，并繼續前進。這個架勢，是要把第八集團軍其余的部隊拖在他后面支援他的翼側，這樣就要把第八集團軍展開到原非它力所能及之處。16日，普里特維茨斷然命令他停止前進。弗朗索瓦在電話中憤然不服，堅決主張在愈近俄國的地方作戰，德國領土損失的風險愈少。普里特維茨回答說，犧牲東普魯士的部分領土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發了一道書面命令，提醒弗朗索瓦，他是“唯一的司令”，并再次禁止繼續前進。弗朗索瓦置之不理；8月17日下午1時，普里特維茨收到弗朗索瓦的一封電報，“大為驚愕”，電報說，他已在貢賓嫩前面20英里、距俄國邊境僅5英里的施塔盧珀楠（Stalluponen）投入戰斗。

17日這天上午，當萊寧坎普所部大舉越境時，由于協調不夠而不是出于有意安排，居中的第三軍比其他兩個軍早出發了幾小時。俄軍偵察隊探明弗朗索瓦的部隊在施塔盧珀楠后，遂下令進攻，在鎮東數英里處投入戰斗。馮·弗朗索瓦將軍及其參謀在施塔盧珀楠教堂尖頂上觀察戰況，“就在這使人心煩的緊張氣氛中”，教堂里忽然響起了嚇人的鐘聲，聲震耳鼓，尖頂為之搖晃，望遠鏡也在三腳架上顛動。原來是鎮議會負責人以為預先通知人們俄軍已經逼近是他的職責所在；可是，卻激怒了軍官們，他們信口對這位倒霉的鎮議會負責人進行了一通條頓式的咒罵。

第八集團軍司令部收到弗朗索瓦的電報時，同樣怒不可遏。用電話、電報命令他立即停止戰斗，并派了一個少將趕往當面落實這一命令。他登上鐘樓，那里已是怒氣沖天，而他也毫不遜色地吼道：“主帥命你立即停止戰斗，向貢賓嫩撤退！”弗朗索瓦對他這種語氣和神態不禁火冒三丈，便放肆反唇回敬說：“告訴馮·普里特維茨將軍，馮·弗朗索瓦將軍擊敗俄國人后會停止戰斗的！”

在這期間，德軍已自右翼派了一個帶著五個炮兵連的旅，從后方攻打俄軍。由于俄第三軍，特別是俄軍目前正在施塔盧珀楠作戰的第二十七師開拔過早，因此在該軍和其左翼友鄰軍之間敞開了一個缺口，以致對德軍的攻擊毫無防御。遭受德軍攻擊的一個團被打得潰不成軍，四散逃竄，不僅連累了第二十七師全師退卻，而且為德軍留下了三千俘虜。雖然萊寧坎普所部其余的部隊到達了規定當天應到的戰線，但由于第二十七師不得不退回邊境重組，原定第二天進軍的時間表也就不能執行了。弗朗索瓦滿懷勝利的喜悅撤出施塔盧珀楠，并于當夜退回貢賓嫩。他深信不疑，拒不從命是有好處的。

萊寧坎普的部隊不顧挫折，重新前進。不過，到8月19日，才這么幾天時間，就開始感到原不完善的后勤補給已捉襟見肘。距國境才15英里，各軍軍長就報稱補給供應不上以及各軍之間、軍與集團軍司令部之間的電訊不通。前面的道路，被逃難的人群和他們趕著的大批亂竄的牛、羊阻塞住了。不過居民的逃跑和弗朗索瓦軍的后退，使萊寧坎普及其上級西北戰線司令日林斯基將軍，都認為德國在撤出東普魯士。但這并不符合俄軍的意圖，如果德軍退得過快，就會逃脫俄軍的鉗形夾擊。萊寧坎普遂此下令20日停止前進，這主要倒不是因為他本身的困難，而是要誘敵前來作戰，并留出更多時間好讓薩姆索諾夫的第二集團軍趕來，從德軍后方給它以決定性的打擊。

馮·弗朗索瓦將軍正是求之不得。19日，他再次嗅到戰斗將臨，便打電話給第八集團軍司令部普里特維茨將軍，吵吵嚷嚷地要求準予反攻而不再繼續后撤。他斷言，這是一個絕好機會，因為俄國人的推進松松垮垮、零零落落。他深有情感地描繪居民們離鄉背井的情況，慷慨激昂地力陳拱手讓普魯士國土遭斯拉夫人踐踏的可恥。普里特維茨被弄得心神不定。由于打算在貢賓嫩后面打一仗，第八集團軍已在安格拉普河沿岸據有準備停當的陣地。但是，馮·弗朗索瓦過早挺進，打亂了這個方案。他現時在貢賓嫩以東約十英里的地方。要是讓他在那里進攻，那就是說要在遠離安格拉普防線的地方應戰；另外兩個半軍就得跟著他走，就會和派往監視南下的薩姆索諾夫部隊的第二十軍分開得更遠，而該軍又是可能隨時需要支援的。

另一方面，德軍沒有經過認真作戰就自行退卻的情景，即使僅退20英里，也令人反感，特別是在喪魂落魄的居民面前退卻，就尤其令人反感了。德軍截獲了萊寧坎普停止前進的命令之后，更難以作出決定。萊寧坎普的命令是以簡單的密碼用無線電發給俄軍各軍的，密碼被一位派來第八集團軍任密碼員的德國數學教授輕松破譯。

現在的問題是萊寧坎普會停多久？德軍可以放手打一支俄軍而不受另一支俄軍牽制的時間已為時不多；到那天晚上，六天就只剩下三天。要是德國人在安格拉普等萊寧坎普來犯，他們就會立即陷在兩支俄軍的夾擊之中。也就在這時，第二十軍發來消息：薩姆索諾夫所部已在那天上午越過國境。鉗子的另一翼在前進中。德軍必須要么拋開它在安格拉普準備好的陣地，立即攻打萊寧坎普，要么脫出身來對付薩姆索諾夫。普里特維茨及其參謀選定前一方案，命令弗朗索瓦于次日（8月20日）晨發動進攻。唯一的困難是，在安格拉普河謹候命令的另兩個半軍，不能及時趕來同弗朗索瓦并肩作戰。

黎明以前，馮·弗朗索瓦的重炮開火了，給了俄國人一個突然襲擊；炮擊繼續了半個小時。凌晨4時，他的步兵在莫辨東西的黑暗中，越過收割后的田野向前推進，直抵俄軍步槍射程以內。拂曉，戰斗遍及全線，勢如烈火燎原。俄軍野戰炮也炮彈如雨，向前進中的那些灰色的隊伍傾注而來，前面白色的大路眼看突然變成了灰色，盡是德軍的尸體。接著第二個灰色浪潮又沖了過來，而且越來越近。俄國人已經可以看出尖頂鋼盔。炮兵連再次開火。這一浪退了，另一浪又涌上來了。俄軍大炮的炮彈是以每天244發的發射率供應的，而現時的發射率則為440發。一架具有黑十字標志的飛機掠過上空，轟炸了俄軍炮兵陣地。灰色浪潮滾滾而來。就在浪頭到達450米內的時候，俄軍大炮結結巴巴地終于沉靜下來，彈藥已經用盡。弗朗索瓦的兩個師重創了俄軍第二十八師，使它傷亡60%，基本上把它殲滅了。弗朗索瓦的騎兵同三連騎炮兵橫掃了俄軍毫無掩護的末端陣地，沒有大炮的俄國騎兵不事抵抗就撤走了，聽由德軍進攻俄軍后方的運輸隊。這是萊寧坎普最右翼幾個軍的遭遇；至于其中路和左翼情況則迥然不同。

這些地方的俄軍在弗朗索瓦黎明前的炮聲警告下，已作好迎戰準備。這時候，35英里寬的戰線上，德軍只是在零星地進攻。在中路，德軍第十七軍直至上午8時才到達前線，比弗朗索瓦晚四小時；在德軍的右翼，第一后備軍也直到中午才抵達。第十七軍的軍長是奧古斯特·馮·馬肯森（August von Mackensen）將軍，他也是參加過1870年戰爭的那批六十五歲及以上的宿將之一。第一后備軍是由奧托·馮·貝洛（Otto von Below）將軍統率的。19日晚，接到次日晨參加弗朗索瓦在貢賓嫩以東進攻的意外命令時，他們都一直駐扎在安格拉普河西岸。馬肯森趕緊集中部隊，星夜過河，但在河對岸的路上，隊伍就困陷在難民、車輛和牲口群里，前進不得。等到他清理好隊伍，推進到可與敵軍接觸的時候，已失去奇襲的有利時機，俄國人首先開火了。不管誰受到炮擊，重炮的殺傷力都是很大的；在這次炮擊中挨揍的卻是德軍，這是1914年罕有的情況之一。步兵俯伏在地，不敢抬起頭來，彈藥車爆炸了；無人駕馭的戰馬在亂奔。到下午，馬肯森的第三十五師在炮擊下潰散了。一連人扔下武器逃之夭夭，另一連人陷于驚慌失措；然后是整個團，再后是它兩側的部隊。很快，成營成營的人，鋪天蓋地從路上、從田野里向后方涌退。參謀人員、師部將領以及馬肯森本人，乘車沖到前面，企圖制止潰散；可是在他們止住以前，部隊已陸續后撤了15英里。

馬肯森右面的馮·貝洛的第一后備軍，也無法給他以任何幫助，因為他們出發得更晚，而且在他們到達羅明滕森林邊緣的戈烏達普（Goldap）這個指定地區時，就立即被俄軍咬住，鏖戰一場。中路馬肯森軍的潰敗，使馮·貝洛的左翼失卻掩護，迫得他也不得不后撤，既借以掩護馬肯森的退卻，也保護他自己。馮·貝洛的右面，由馮·莫根（von Morgen）將軍統率的第三后備師是最后一個從安格拉普河出發，直到晚上一切都已結束時才到達的，因此沒有經歷戰斗。盡管德軍退卻成功，盡管俄軍在同弗朗索瓦的戰斗中也遭到重創，但是，總的來說，貢賓嫩戰役是俄國人勝利了。

普里特維茨認為整個戰役失敗。倘俄國人穿過崩潰的德軍中路，進行強有力的追擊，就有可能沖過因斯特堡峽口，把第八集團軍割裂開來，逼迫北面的弗朗索瓦軍藏身于柯尼斯堡要塞區，而這是德軍最高統帥部所明白告誡絕不容許發生的。要挽救第八集團軍并使它保持銜接一氣，普里特維茨認為唯一的辦法是退到維斯瓦河。毛奇最后給他的有關命令是：“保全部隊。不要被趕出維斯瓦河地區，但在絕對必要時，可放棄維斯瓦河以東地區。”普里特維茨認為現在是絕對必要的時候，特別是在和馬肯森通過電話，聽馬肯森生動地描繪了所部驚恐的狀況之后，更感到事屬絕對必要。

8月20日當天傍晚6時，普里特維茨打電話給弗朗索瓦，告訴他盡管他的戰區獲勝，但是部隊還必須退到維斯瓦河。弗朗索瓦感到是個晴天霹靂，激烈反對，申述了各種理由，力勸普里特維茨重新考慮。他堅決認為，俄軍由于本身的損失，不可能再發動一場有力的追擊，他懇求普里特維茨改變主張。他掛斷電話時的印象是，普里特維茨并不完全固執己見，已同意考慮他的意見。

在指揮部，人們來往頻繁，情緒激動，報告互不一致，經過這一陣混亂之后，一種令人心驚膽寒的情況開始明朗了：并無追兵在后。在俄軍指揮部，萊寧坎普原已下令在那天下午3點至4點之間進行追擊，嗣因據報德軍掩護馬肯森退卻的炮火猛烈，遂于4時30分撤銷該令。由于弄不清德軍中路潰敗到什么地步，萊寧坎普選擇等待。一個精疲力盡的參謀請求讓他去睡一會，萊寧坎普對他說：可以躺下，但不要脫掉衣服。他睡了一個小時，被萊寧坎普叫醒。萊寧坎普站在他床邊，笑著對他說：“現在可以脫去衣服了，德國人正在退卻。”

對于萊寧坎普的這句話，那些在一場戰役過后總是趨之若鶩的軍事史家，作了大肆渲染，尤其是霍夫曼，更是心懷叵測而樂滋滋地作了可說是歪曲事實的詳述。他們指出敵人退卻之際正是追擊時機，而不是就寢的時候，這當然無可厚非。可是，由于貢賓嫩戰役是更重大的坦嫩貝格戰役的序幕，萊寧坎普停步不前的這段情節便引起了團團疑云，對此不乏胡亂的解釋和指責，而且忘不了提及他的德國家世并明確地指控他是一個賣國賊。其實，克勞塞維茨遠在這事發生之前一百年的一番話也許倒是比較可行的解釋。他在論述追擊問題時寫道：“在一支部隊里，感受到的整個壓力是迫切需要休息和恢復精力。在這種情況下，就得要求指揮官有非凡的魄力，要高瞻遠矚而不要只看當前，要立即采取行動，奪取那些在當時看來僅不過是勝利的錦上添花——勝利的豪華點綴——的成果。”

無論萊寧坎普有沒有看到那些最后的結局，事實是，他不可能一鼓作氣，追擊逃竄的敵人，奪取最后的勝利，也許他自己也認為是不可能的。他的補給線運轉得很差，要是向前推進得超過鐵路終點更遠一些，那就會把補給線整個兒拋在后面；而且當他的補給線在敵國境內越拉越長的時候，德軍的補給線，隨著他們向基地撤退，將是越縮越短。沒有擄獲到德國的車輛，因此不能利用德國的鐵路，而他手頭又沒有鐵路工人來改變軌距。何況在遭到德軍騎兵的攻擊后，他的運輸工作已陷于混亂狀態；而他右翼的騎兵表現糟糕，他又損失了幾乎一整個師。于是他就地停下來了。

傍晚天氣炎熱。霍夫曼上校站在司令部室外，在和頂頭上司格呂納特（Grünert）少將討論作戰情況和明天的形勢，他期望少將能和他一起左右懦弱的普里特維茨以及瓦德西。就在這時，給他們送來了一份電報。這是第二十軍朔爾茨（Scholtz）將軍發來的，報告南線俄軍有四五個軍正在越過邊境，在五六十英里寬的戰線上全面挺進。霍夫曼以他特有的那種誰也不知道他是否當真的搗蛋方式，建議把報告“壓下來”，不讓普里特維茨和瓦德西知道，據他判斷，“現時他們的神經已經失卻控制”。在關于這場戰爭的回憶錄里，描述一位袍澤所常用的措辭中，再沒有像“他的神經已經失卻控制”一語用得這樣廣泛的了。這次無疑用得是對的。可是，霍夫曼的這個短命的密謀落空了，就在那時，普里特維茨和瓦德西走出屋來，從神情中可以看出他們也收到了這份報告。普里特維茨請他們都到室內去，然后對他們說：“先生們，假如我們繼續對維爾紐斯軍作戰，華沙軍將會向我們背后挺進，切斷我們通向維斯瓦河的去路。我們必須停止對維爾紐斯軍的作戰，撤過維斯瓦河。”他已經不再談撤“到”而是說撤“過”維斯瓦河了。

霍夫曼和格呂納特對這樣做的必要性立即表示懷疑，而且斷言他們能在兩三天內“結束”與維爾紐斯軍的戰斗，并且還可以趕得上對付來自南方的威脅，而朔爾茨軍，在他們趕到之前，是可以“自行設法對付的”。

普里特維茨粗暴地打斷了他們的話。這該由他和瓦德西來作決定。他堅決認為南路俄軍的威脅太大，霍夫曼必須為撤過維斯瓦河進行必要的部署。霍夫曼指出，南路俄軍的左翼已比德軍更靠近維斯瓦河，他用圓規作了一個測比，表明撤退已不可能。他要求“指示”如何進行部署。普里特維茨粗魯地打發他和室內的人走開后，打電話給科布倫茨的德軍最高統帥部匯報了他的打算：即使不撤過維斯瓦河也要撤到維斯瓦河。他還說，炎夏的維斯瓦河水位不高，要是沒有增援，他甚至疑慮能否守住這條河。

毛奇嚇呆了。這就是讓這個胖子白癡指揮第八集團軍的結果，也是他本人給這個白癡的最后一道命令考慮欠周的結果。放棄東普魯士會嚴重挫折士氣，也會損失最寶貴的糧食和乳制品產區。更糟的是，倘若俄國人越過維斯瓦河，他們不僅會威脅柏林，而且會威脅奧地利的翼側，乃至維也納。增援！除了從西線以外他能從哪里抽調增援？而在西線，連最后一個營都投入了戰斗。現在從西線抽調部隊會意味著對法作戰的失敗。毛奇由于吃驚過度，或許由于距離現場太遠，以致沒有考慮下達一道否定的命令，而是暫且滿足于責成其參謀跟弗朗索瓦、馬肯森以及別的軍長直接通話，查明事實。

而在這時，在第八集團軍司令部里，霍夫曼和格呂納特正在努力說服瓦德西，退卻不是唯一的途徑——實際是個行不通的途徑。霍夫曼獻計，利用內部線路和鐵路的有利條件，第八集團軍可以部署得足以對付兩路俄軍的威脅，要是情況的發展又不出他所料，那他們還可以把全部力量用來對付兩路俄軍之一。

霍夫曼建議，如果萊寧坎普所部翌日還不追擊——他相信萊寧坎普是不會追擊的——就讓弗朗索瓦的第一軍脫離接觸，乘火車長途繞道增援南線朔爾茨的第二十軍。弗朗索瓦將在朔爾茨的右翼建立陣地，面對薩姆索諾夫軍的左翼，因它距維斯瓦河最近，對德軍的威脅最大。在貢賓嫩沒有參加戰斗的馮·莫根將軍統率的那個師，也可經由不同的鐵路線前往援助朔爾茨。部隊及其補給、裝備、馬匹、槍炮彈藥的調動，車輛的集中，在擠滿難民的車站上的登車，車輛從這一線到另一線的調度，所有這些雖都是復雜的問題，但是霍夫曼深信德國的鐵路系統是能勝任的，因為在鐵路上已經費了不知多少心血。

當進行這些調動時，馬肯森和馮·貝洛兩軍的撤退將向南行軍兩天，這樣在成功地脫離接觸的時候，他們離南線的距離可縮短30英里左右。如果一切進行得順利，他們將從這里穿過內線捷徑去朔爾茨左翼建立陣地，但他們應在弗朗索瓦開到朔爾茨右翼后不久到達。這樣，整個四個半軍就可以在恰當的位置跟南線敵軍作戰。騎兵和柯尼斯堡的后備部隊將留在萊寧坎普部隊的正面作為掩護。

這個策略的成敗將完全取決于一個條件，即萊寧坎普按兵不動。霍夫曼認為，萊寧坎普為了休整并修補其補給線，會再按兵不動一兩天。霍夫曼的堅信不疑，不是根據任何神秘的啟示，也不是出于其他什么超自然的才智或歪才，而只是根據他的信念，他認為萊寧坎普由于種種慣常的原因勢需停頓下來。不管怎樣，這兩三天，馬肯森和馮·貝洛兩軍的戰線不會發生任何變化。到那時，在進一步截獲密電碼的幫助下，萊寧坎普的意圖是會有某些跡象可尋的。

這就是霍夫曼的論點，他說服了馮·瓦德西。不知怎么地，在當晚，瓦德西也竟說服了普里特維茨，讓霍夫曼去準備必要的命令，也可能是他未經普里特維茨同意而擅自做主，有關這方面的檔案記載得不清楚。由于參謀部不知道普里特維茨當時已向最高統帥部報告了他擬撤到維斯瓦河的意圖，誰也沒有操心去向最高統帥部報告已經打消了這個主意。



第二天早晨，毛奇的兩個參謀，由于戰地電話屢打不通，經過幾個小時才分別同東線各軍長通了話。從他們的談話中，這兩位參謀得到的印象是，情況是嚴重的，但是退卻是過于輕率的辦法。既然普里特維茨看來決意要退卻，因此毛奇決定撤換他。也就在毛奇和他的副手馮·施泰因商量的時候，霍夫曼正怡然自得，感到至少到目前還是他正確。偵察結果表明，萊寧坎普所部并無動靜；“他們根本不在追擊我們”。于是立即下令調弗朗索瓦的第一軍去南線。據弗朗索瓦本人的說法，那天下午他離開貢賓嫩時，曾激動得流下淚來。普里特維茨顯然已同意霍夫曼的論點，但立刻又后悔起來。那天傍晚，他再次打電話給最高統帥部，向馮·施泰因和毛奇報告說，他的參謀進攻華沙軍的建議是“行不通的，太冒失了”。在回答一個問題時，他說，以他“這么少的人馬”，他甚至不能保證能否守住維斯瓦河，他必須得到增援。這就決定了他的解職。

東線既有崩潰之虞，也就急需一位勇敢、堅強并且果斷的人來接替指揮職務。在實戰中，一個指揮官面對危機是否能指揮得當總是沒有把握的。可是，德軍統帥部卻有幸了解到一位參謀官，他僅是在一周以前剛在作戰中大顯身手的——他就是魯登道夫，列日的英雄。他堪任第八集團軍的參謀長。按照德軍共同負責的指揮體制，參謀長跟司令同樣重要，有時，憑其能力和氣質還顯得更為重要些。魯登道夫那時正隨比洛的第二集團軍在那慕爾郊外，繼他在列日大奏膚功之后，在猛攻比利時的第二大要塞。這正是他接近法國國門的關鍵時刻——但是東線需要急切。毛奇和馮·施泰因一致認為必須召他來。于是，立即派了一個上尉參謀，乘車于第二天（8月22日）上午9時將信送達魯登道夫將軍。

“你也許能挽救東線的局勢，”馮·施泰因寫道，“我可以這樣絕對信賴的別無他人了。”他為把魯登道夫在決戰前夕調走表示歉意，“這場決戰，請上帝保佑，將是最后一仗”，不過，犧牲是“必不可免的”。“當然，你無須對東線已經發生的情況負責，而且以你的能力，你足可防止最糟的情況發生。”

魯登道夫在十五分鐘之內乘坐上尉參謀的車子走了。他的車子曾經過距那慕爾十英里的瓦弗（Wavre），這地方“就在我前天路過時，還是一座平靜的城鎮，現在則是一片火海。這里的老百姓也在向我軍開火”。

傍晚6時，魯登道夫到達科布倫茨。三小時內，聽了有關東線局勢的戰報，受到了“顯得疲勞”的毛奇和“非常鎮靜”的德皇的接見，不過德皇在情緒上深受敵軍侵犯東普魯士的影響。魯登道夫給第八集團軍發了一些命令，晚上9時乘專車前往東線。他的命令，除囑咐霍夫曼和格呂納特在馬林堡（Marienburg）見他以外，是調弗朗索瓦的第一軍乘火車去南線支援朔爾茨的第二十軍。馬肯森和馮·貝洛兩個軍到8月23日這天要完全脫離接觸并休整好。這些命令和霍夫曼的命令相同，體現了德國軍事學院要求所有學員對一個命題作出同樣答案的要求。不過也有可能魯登道夫已看過霍夫曼命令的電報副本。

在魯登道夫乘汽車穿過比利時的時候，上尉參謀曾告訴他，最高統帥部已選中一位退休的將軍擔任第八集團軍的司令，但是還不知道他是否接受這項任命，他的名字是保羅·馮·貝內肯多夫·興登堡（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Hindenburg）。魯登道夫不認識他。在當天夜晚離開科布倫茨以前，他獲悉已找到馮·興登堡將軍，興登堡也已接受了任命，并將于次晨4時在漢諾威（Hanover）登車前往履新。

德軍最高統帥部原來在選定參謀長之后，便著手解決物色一位司令官的問題。大家都認為魯登道夫無疑是一位具有真才的人，但要配成一對，最好還得選一位名副其實的“馮”。許多退休的軍長都被考慮了。馮·施泰因忽然想起戰爭爆發時收到的一位老同事的來信，信上說：“如果情況的發展需要一個指揮官的話，不論哪里，請不要忘掉我。”信上并且保證說寫信人“還很健壯”。恰好的人選！他出生于一個在普魯士定居了幾個世紀的容克世家。1911年，六十五歲時退休，曾在施利芬的總參謀部工作過，他是經過逐級提升而成為一個軍的參謀長并于后來擔任軍長的。再過兩個月他就年滿六十八歲了，但他并不比右翼的克盧克、比洛和豪森這三位將軍年老。東線所需要的，特別是在普里特維茨表現得驚慌失措之后，是一個無所畏懼的人，而興登堡以往行事，一向穩如磐石，可資信托，以沉著鎮定聞名。毛奇批準了；德皇也首肯了。于是，給這位退休的將軍發了一份電報。

下午3時，興登堡在漢諾威家中收到電報，問他是否愿意接受“緊急任命”。他復稱：“樂于接受。”第二封電報命令他立即前往東線就任第八集團軍司令。最高統帥部沒有費神請他來科布倫茨談話，而是命令他在漢諾威上車，并通知他，他的參謀長將是魯登道夫將軍，將在去東線的火車上和他會面。因時間緊迫，幾套土灰色新軍裝興登堡只來得及試穿了一套，他不得不窘迫地穿了一套普魯士將軍的舊藍軍裝就出發了。

幾天后普里特維茨撤職的消息發表時，那位難能可貴的日記作者布呂歇爾公主記道：“一個叫作興登堡的將軍，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接替了他的職位。”報紙編輯們趕忙搜集有關新司令的材料，但很不容易找，因為他在軍人名冊中列在“貝內肯多夫”這個姓氏下。不過編輯們很高興，終于查到他曾在色當作戰，并榮獲過二級鐵十字勛章，而且他也是1866年對奧地利戰爭中的一位宿將。他的貝內肯多夫祖先是定居在東普魯士的條頓騎士團的成員；“興登堡”這個姓是在18世紀因婚姻關系而來的。他是西普魯士波森[[3]](#_3__Bo_Sen__Posen__Ji_Bo_Zi_Nan)人，在他早期的經歷中，在任駐柯尼斯堡第一軍參謀時，曾研究過馬祖里湖區的軍事問題。這件事不久就成了描繪興登堡如何早在三十年前就規劃了坦嫩貝格戰役的傳說的由來。他是在他祖父位于西普魯士諾伊德克（Neudeck）的莊園中長大的，他還記得童年時曾和一個替腓特烈大帝干過兩星期活兒的老花匠交談過。

興登堡在漢諾威車站上等著，火車于清晨4時進站。他從未見過的魯登道夫將軍，以“輕捷的步伐”走上月臺，向他報到。在東去途中，魯登道夫對當前的局勢和他已發布的命令作了說明，興登堡聽了表示贊同。他們就這樣在前往日后使他們馳名于世的疆場途中結合起來了。以具有神秘氣息的花押“”[[4]](#_4__Xing_Deng_Bao_He_Lu_Deng_Dao)表示的這一“結合”行將統治德意志帝國直到帝國的末日。后來興登堡成了陸軍元帥，但同時也博得了一個“‘你說呢’元帥”的諢名，因為每當有人征詢他的意見的時候，他總是轉問魯登道夫：“你說呢？”

關于第八集團軍司令的人事更迭，德軍最高統帥部考慮通知的第一個人是東線的鐵道總監克斯滕（Kersten）少將。8月22日下午，還在專車首途以前，這位少將就來到霍夫曼的辦公室，帶著“一副非常吃驚的表情”，給霍夫曼看了一封電報。電報通知說，一位新司令和一位新參謀長的專車將于明天到達馬林堡。這就是普里特維茨和瓦德西怎樣知道自己被免職的經過。一小時后，普里特維茨收到一封給他本人的電報，把他和瓦德西列入“待分配的名單”中了。霍夫曼說：“他向我們告別時，對于這樣的處理毫無怨言。”

魯登道夫的做法也并不委婉。盡管他很了解霍夫曼，和他在總參謀部工作期間，曾在柏林和他同住一屋達四年之久；可是，他還是分別發電報給各軍長下達命令而未通過第八集團軍參謀部。這并不是故意要得罪人；總參謀部的軍官得罪人是常情。霍夫曼和格呂納特都立刻認為受了侮辱。在馬林堡與新任指揮官們的會面，按魯登道夫的說法，“并不愉快”。

現在必須面對這場戰役命運所系的關鍵問題了。馬肯森和馮·貝洛兩個軍究竟是應該停在原地以防萊寧坎普的進一步前進呢，還是按照霍夫曼的計劃，把他們調往南線抵抗薩姆索諾夫的右翼？除非用上第八集團軍的全部力量，否則沒有希望打敗薩姆索諾夫所部。8月23日那天，弗朗索瓦軍在因斯特堡和柯尼斯堡之間五個車站分別登車的復雜過程剛剛完成，正在前往南線途中；還要有兩天時間的換線轉軌和進行同樣復雜的下車工作，才能進入陣地作戰。馮·莫根的師也在從另一條鐵路向南線進軍途中。馬肯森和馮·貝洛兩個軍這天未動。騎兵偵察隊報告萊寧坎普所部仍“無動靜”。他與馬肯森和貝洛兩個軍相隔大約只有三四十英里，如果他們兩軍向南移動攻打另一支俄軍，他仍可——要是他推進的話——追擊他們，從后面猛攻。而霍夫曼要馬肯森和馮·貝洛立即啟程。魯登道夫離開那慕爾只三十六個小時，是新來到這里，而在當前形勢下，無論作出哪種決定都是命運攸關的，而且要對局勢負責，所以把握不定。興登堡從解除退休復出僅二十四小時，全依仗魯登道夫。

在俄軍方面，高級指揮部傷透腦筋的是怎樣選擇時機，使鉗形攻勢的兩翼一起夾擊敵軍。障礙如此之多，如此五花八門，如此難以處理，又如此明顯，弄得軍事長官們一開始就充滿悲觀情緒。西北戰線司令日林斯基的職責是協調萊寧坎普和薩姆索諾夫兩支部隊的行動，可是如何完成這一職責，他可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是一味地下令催促趕緊行動。萊寧坎普已首先出動而且已首先投入戰斗，于是日林斯基要求盡快行動的命令全都發給薩姆索諾夫。與此同時，法國人一連串的空前緊急的請求又都沖向日林斯基本人而來。法國人為了減輕他們在西線的壓力，指示他們的大使“堅持”要求“俄軍必須對柏林開展殊死進攻”。這些要求，從霞飛送到巴黎，從巴黎送到圣彼得堡，從圣彼得堡送到“斯塔夫卡”［Stavka，設在巴拉諾維奇的俄軍總司令部］，從“斯塔夫卡”送到日林斯基，日林斯基又把這些要求全部轉送給了薩姆索諾夫將軍，而薩姆索諾夫將軍這時正在沙礫路上一步一步地奮力前進著。

自從在日俄戰爭中指揮一個騎兵師以來，這位正如英國駐第二集團軍聯絡官所稱的“樸實厚道的人”還從未有過指揮擁有十三個師的一支集團軍的經驗。他通過并不為他所熟悉的參謀們和師長們進行工作。俄軍不是按地區編制的，報到的后備役軍人——有時占到一個團的人數的三分之二——對他們的軍官和士官來說，都是陌生的。軍官短缺，士兵文化水平甚低，乃至往往目不識丁，這些情形，使命令不易逐級下達到前線。管理電訊的通信部隊幾乎是混亂的。在華沙電報局，一個參謀大吃一驚，發現一大堆給第二集團軍的電報擱著未拆也未遞送，因為和戰地司令部之間沒有建立起通訊聯系。這位軍官于是把電報收集起來用汽車去分送。軍部只是同師部聯系的線路是夠用的，而同集團軍司令部或友鄰軍聯系的線路就不足了，因此只得借助于無線電報。

由于硬要趕緊行動，把集結時間縮短了四天，以致后勤的組織工作未能臻于完善。一個軍由于另一個軍的補給車輛沒有開到，就得分一些炮彈給它，這樣也就攪亂了自身的打算。面包運輸車也不見影蹤，要從敵境征集給養，就需派遣征集隊在騎兵護衛下先行出發，而在這方面又未作什么安排。僅靠一匹馬在沙礫路上拖動貨車和炮架，事實證明是不夠有力的。在有些地方，不得不把一半貨車的馬匹卸下來，加套到另一半的車輛上，用兩匹馬來拉一輛車子。向前走一段以后，再把馬都卸下來，套到后面的車子上，然后再如此往返一段一段地前進。

“第二集團軍要趕緊推進，你們要盡量加速行動，”日林斯基8月19日來電說，“第二集團軍的推進遲緩正在使第一集團軍處于困境。”事情并非如此。19日，薩姆索諾夫正在按原定日程越過邊境，不過，日林斯基深信情況將會如此，所以言之在先。

薩姆索諾夫回答說：“正在按時間表前進，每日行軍12英里以上的沙礫路，不事休息。已無法再快。”他報告說，他的士兵每天要腳不停步地走十到十二小時。三天后，日林斯基電告：“我堅持要立即投入決戰。”薩姆索諾夫回答，士兵們“疲憊不堪”，要以更快的速度前進是不可能的。“鄉村毀壞，馬已久無草料，人也無糧食。”

就在那天，薩姆索諾夫所部由馬爾托斯（Martos）將軍指揮的第十五軍碰上了德國朔爾茨將軍的第二十軍。戰斗打響了。德軍還未得到增援，于是后撤。馬爾托斯將軍占領了德國境內約十英里的佐爾道（Soldau）和幾小時前還是朔爾茨的司令部所在地的奈登堡（Neidenburg）。開進奈登堡的哥薩克偵察隊報告說，德國居民從窗口向他們開火，馬爾托斯將軍下令炮擊，摧毀了該城主要市區的大部分房屋。馬爾托斯，一位“矮小的老年人”，當晚感到很不自在。他發現他住的那座房子的德國主人已經走了，留下的全家合影在從壁爐架上凝視著他。這是市長的住宅，他吃的是為市長準備的晚飯，侍候他的是市長的女仆。

8月23日，也就是魯登道夫和興登堡到達東線的那天，在馬爾托斯將軍右側的俄國第六和第十三軍還占領了許多村莊；朔爾茨將軍除得到維斯瓦河守備隊從后方給他的一些支援外，仍在孤軍作戰，進一步后撤。日林斯基不顧萊寧坎普在北線按兵不動，對薩姆索諾夫依然令如雨注。他吩咐薩姆索諾夫，在他這一線的德軍正在倉促退卻，“僅僅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部隊在對付你。因此你必須按計劃發動一場極為有力的攻勢……必須進攻并攔截在萊寧坎普前面退卻之敵，斷其去維斯瓦河的退路”。

當然這是原先所計劃的，但當時是根據萊寧坎普牽制住北面德軍的部署制訂的。事實上，那天，萊寧坎普同德軍已無接觸。他雖于8月23日又開始前進，但方向錯了。不是插向南方和薩姆索諾夫在湖濱地區前會師，而是徑直向西挺進，意圖阻止柯尼斯堡敵軍出擊，他唯恐一旦南下，弗朗索瓦會攻其翼側。這是與原計劃截然不同的行動，可是日林斯基并未糾正。日林斯基就像萊寧坎普一樣，是在對德軍動向如墮五里霧中的情況下行事的，他以為德軍正在按俄國人的打算行動——撤至維斯瓦河。因此，他繼續催促薩姆索諾夫前進。

8月23日晚，馬爾托斯將軍的第十五軍覺察到敵軍正在退卻，深受鼓舞，便從奈登堡挺進到距德軍前線約600米的陣地。朔爾茨軍在奧爾勞（Orlau）和弗蘭克瑙（Frankenau）之間筑壕固守。俄國人奉命要不惜一切代價攻下這些塹壕。他們在陣地上埋伏了一夜，黎明前又匍匐前進了近100米。進攻的信號發出后，他們通過三次沖鋒拿下了最后的500米。德軍機槍開火了，他們就趴倒在地，然后再蜂擁而上。他們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起伏前進的。當白軍裝上衣的人群，揮舞著明晃晃的刺刀，浪潮一般沖過來時，德軍從塹壕里爬了出來，丟下機槍逃了。在前線其他地方，德軍則以優勢的大炮懲罰了進攻的敵人。在馬爾托斯右面的俄國第十三軍，或由于通訊聯絡的錯誤，或由于指揮無能，或兼而有之，未能趕來支援，因此，這一仗俄軍沒有得到多大好處。到這天結束時，德軍是撤退了，但并沒有被打垮。俄國人雖然繳獲了兩門野戰炮，俘獲了一些俘虜，但是，他們自己的損失也很大，計達4000人。有一個團16個連長有9名陣亡。190人的一個連，120人和全部軍官都陣亡了。

盡管德軍犧牲較少，但是朔爾茨在面對絕對優勢的兵力下，還是后退了10英里左右，在坦嫩貝格村莊設下司令部過夜。日林斯基仍然催趕著薩姆索諾夫，堅持要他繼續推進到約定的戰線，截斷敵軍的“退路”，因此，薩姆索諾夫對所屬各軍——左翼第二十三軍，中路第十五和第十三兩軍，右翼第六軍——發布命令，對他們第二天進軍的路線和部署作了安排。同遠于奈登堡的通訊聯系，越來越困難。有一個軍的電線已全部用完，在依靠傳令兵騎馬傳送。第六軍沒有第十三軍用的密電碼。因此，薩姆索諾夫只好用無線電明碼發布命令。

到這時，魯登道夫和興登堡雖說已到達二十四小時光景，第八集團軍可還沒有決定是否把馬肯森和馮·貝洛的軍調往抵擋薩姆索諾夫的右翼。興登堡和他的參謀來到坦嫩貝格同朔爾茨商量，朔爾茨表現得“沉重，但頗有信心”。他們返回司令部。霍夫曼后來寫道，那晚“是整個戰役最困難的時候”。當參謀們正在辯論時，通信部隊的一個軍官送來一份截獲到的電報，是薩姆索諾夫關于第二天（8月25日）的作戰命令。來自敵人的這個幫助，雖沒有透露萊寧坎普的意圖（一個關鍵問題），可確實向德國人指明了他們可望在哪里迎戰薩姆索諾夫所部。這就解決了問題。第八集團軍決心把全部力量投入對薩姆索諾夫的戰斗。司令部向馬肯森和馮·貝洛發布了命令，叫他們把萊寧坎普置于腦后，立即揮戈南進。

注釋

[[1]](#_1_14) 福斯泰夫（Falstaff），莎士比亞戲劇中一個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譯注

[[2]](#_2_11) 貢賓嫩（Gumbinnen），現名古謝夫（Gusev），屬俄羅斯。——譯注

[[3]](#_3_10) 波森（Posen），即波茲南。——譯注

[[4]](#_4_5)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姓氏的第一字母分別為H和L。——譯注

Chief sources for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is chapter are Golovin (all references are to his Campaign of 1914), Gourko who was with Rennenkampf's Army, Knox who was with Samsonov's Army, Hoffmann and François who were with the Eighth Army, Danilov and Bauer who were at Russian and German Headquarters, respectively, and finally, Ironside who assembled material from both sides. (Hoffmann's two books are referred to in the Notes as WLO and TaT.)

“把德皇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島去！”：Paléologue, 65.

沙皇：“我們原來的目標”：Golovin, 89.

“請求陛下”：Paléologue, 61.

大公給霞飛的電報：Joffre, 140.

大公被任命為總司令時曾淚落如珠：The colleague who reported them was General Polivanov, War Minister in 1915–16, qtd. Florinsky, Russia, New York, 1958, II, 1320.

梅西米和丘吉爾的流淚：Poincaré, III, 3 and Wilson, 163.

俄國動員令：Ironside, 39–50.

賴因博特將軍：Gardiner, 132.

“先生們，不許盜竊”：ibid., 133.

“而一個國家在戰爭期間竟放棄歲入的主要來源”：qtd. Florinsky, End of the Empire, 38.

法蘭克福官員聽到有三萬名難民的謠言：Bloem, 13.

俄軍在軍事演習中被證明有問題的時間表在戰爭中被沿用：Golovin, 38–9.

俄軍用無線電明碼發送電訊：Danilov, 203; Hoffmann, TaT, 265.

馬的臭味：Julius West, Soldiers of the Tsar, London, 1915, 8.

兩個德國師抵得上三個俄國師：McEntee, 90.

“每門炮只有25發炮彈”：Golovin, Army, 144.

“哥薩克來啦！”：Gourko, 33.

“對意志薄弱者的心理形成危險”：Hoffmann, WLO, 17.

“懂得在餐桌上如何……博得德皇好感”：Lt.-Gen. Kabisch, Streitfragen des Weltkrieges, qtd. AQ, July 1925, 414.

日本將從這場戰爭中漁利：qtd. Stephen King-Hall,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Far East, London, 1924, 160.

普里特維茨的命令及弗朗索瓦的反對：François, 156; Hoffmann, WLO, 17.

弗朗索瓦將軍及其參謀在教堂尖頂上觀察戰況的情況：François, 170–76.

萊寧坎普部隊停止前進的原因：Danilov, 192–3; Golovin, 155.

德國數學教授：François, 276.

毛奇給普里特維茨的最后命令：François, Tannenberg, Das Cannae des Weltkrieges, qtd. AQ, January 1927, 411–13.

普里特維茨命弗朗索瓦退回維斯瓦河：François, 190.

“現在可以脫去衣服了”：Knox, 88.

“感受到的整個壓力”：Clausewitz, I, 224.

“他的神經已經失卻控制”：Hoffmann, WLO, 20–22.

霍夫曼與普里特維茨關于撤至維斯瓦河的分歧：Hoffman, TaT, 248.

普里特維茨打給最高統帥部的電話：from Prittwitz's papers, found after his death and published in Militär Wochenblatt, April 22 and May 7, 1921, qtd. AQ, October 1921, 88–92.

毛奇嚇呆了，及他的命令：Bauer, 45.

霍夫曼建議將軍隊調往薩姆索諾夫方向：Hoffmann, WLO, 23.

“他們根本不在追擊我們”：Hoffmann, TaT, 250.

“行不通的，太冒失了”：Lt.-Gen. Kabisch, qtd. AQ, July 1925, 416.

關于魯登道夫的任命：Ludendorff, 49–55.

關于興登堡的任命：Hindenburg, 100–03; John Wheeler-Bennett, Wooden Titan, New York, 1936, 14–16; Ludwig, Hindenburg, Philadelphia, 1935, 83.

替腓特烈大帝干過兩星期活兒的老花匠：Hindenburg, 8.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的會面：Ludendorff, 55; Hindenburg, 103.

“‘你說呢’元帥”：Capt. Henri Carré, The Real Master of Germany, qtd. NYT, May 19, 1918.

“一副非常吃驚的表情”：Hoffmann, TaT, 253.

法國“堅持”要求“俄軍必須對柏林開展殊死進攻”：Paléologue, 102.

“樸實厚道的人”：Knox, 60.

用兩匹馬來拉一輛車子：Golovin, 183.

日林斯基的命令及薩姆索諾夫的抗議：Ironside, 126–9.

“矮小的老年人”：Knox, 62.

馬爾托斯吃了為市長準備的晚飯：Martos Ms. qtd. Golovin, 188.

日林斯基對薩姆索諾夫下達的后續命令：Ironside, 134–5.

第六軍和第十三軍使用了不同的密電碼：Golovin, 171.

朔爾茨表現得“沉重，但頗有信心”：Hoffmann, TaT, 261.

薩姆索諾夫關于第二天的作戰命令的電報被截獲：ibid., 265; Ludendorff, 59.

## 第15章　坦嫩貝格戰役

魯登道夫知道萊寧坎普所部在他后方，惴惴不安，急于先同薩姆索諾夫決一死戰。他命令第一階段的戰斗于8月25日打響。馮·弗朗索瓦將軍的第一軍將進攻烏斯道（Usdau），包圍薩姆索諾夫的左翼。但弗朗索瓦拒不從命。他的重炮部隊和一部分步兵，輾轉從貢賓嫩長途運來，還在卸車之中，沒有進入陣地。沒有足夠的大炮支持，沒有充分的彈藥供應，他說，發動進攻就會冒失敗的危險；而薩姆索諾夫的退路如果任其暢通，他就會逃脫為他安排下的滅亡命運。霍夫曼和第二十軍的朔爾茨將軍私下都支持弗朗索瓦。朔爾茨將軍前一天曾同俄國人交鋒，但在戰地電話里他還是要弗朗索瓦放心，即使不能立即得到支援，他也保證可以扼守陣地。

新任指揮第二天就遇到抗命的情形，魯登道夫盛怒之下便帶著興登堡和霍夫曼乘車來到弗朗索瓦的司令部。他堅持前令，弗朗索瓦的回答是：“如果命令下定了，我當進攻，但我軍將不得不以軍刀肉搏。”為了表示誰是指揮，魯登道夫根本不聽弗朗索瓦的理由，重申前令不變。他們交談時，興登堡未置一詞，交談結束后，他順從魯登道夫一齊乘車走了。霍夫曼坐在另一輛汽車上，開到蒙托福（Montovo）的火車站時停了下來，這里是跟司令部通電話電報最近的地方。一個通訊主任前來交給他兩份截獲俄國人的明碼無線電報。一份是萊寧坎普當天清晨5時30分發出的，一份是薩姆索諾夫當天清晨6時發出的。萊寧坎普的命令下達了第一集團軍的進軍路程，表明他第二天的目的地并不遠，不足以威脅德軍于后方。薩姆索諾夫的命令是責成繼續前一天的對朔爾茨將軍的追擊，表明他將朔爾茨的轉轍回馬誤認為是全面撤退；且命令追擊他視為敗北之敵的具體路線和時間。

自從一個希臘叛徒為波斯人帶路繞過塞莫皮萊使波斯人大勝[[1]](#_1__Sai_Mo_Pi_Lai__Thermopylae_Y)以來，還沒有誰給一個指揮官送上過這樣好的禮物。這兩份電報未免太完整了，霍夫曼的頂頭上司格呂納特少將反而給弄得疑惑不決。正如霍夫曼所說：“他焦急地一遍又一遍地問我，是不是應該相信這些電報？為什么不該相信？……原則上我本人是相信它們的每一個字的。”霍夫曼自稱，他本人對萊寧坎普和薩姆索諾夫之間自日俄戰爭以來的個人爭執有所了解，因他在日俄戰爭中曾任德國的觀察員。他說，薩姆索諾夫的西伯利亞哥薩克騎兵，由于萊寧坎普的騎兵師不顧一再命令始終按兵不動，以致在英勇作戰后不得不放棄煙臺煤礦[[2]](#_2__Yan_Tai_Mei_Kuang__Zai_Wo_Gu)。他說，薩姆索諾夫后來曾在奉天車站月臺上同萊寧坎普發生劇烈爭吵，把他打倒在地。霍夫曼得意洋洋地指出，這回萊寧坎普將顯然不會急于前來支援薩姆索諾夫。但這不是支援不支援薩姆索諾夫的問題，而是事關這一戰勝負的問題，不知霍夫曼究竟是真正相信還是裝作相信他自己的這篇故事，不過他總是愛把這個軼事掛在嘴上。

霍夫曼和格呂納特抓著這兩份電報趕緊乘上汽車去追興登堡和魯登道夫。不幾英里就趕上了。霍夫曼叫司機把車子靠攏過去，邊開邊把電報遞給他們。兩部汽車一下子都停了下來，四個將領研究了情況。看來第二天由馬肯森軍和貝洛軍進攻薩姆索諾夫右翼的計劃可以照舊進行而不致受到萊寧坎普的干擾。但按照爭執雙方不同的解釋，情況并不足以說明弗朗索瓦是否可以把進攻推遲到他全部人馬和輜重到齊之后。為了維護威信，魯登道夫寸步不讓，一回到司令部就重申了前令。

同時下達的，還有第二天即8月26日要按兩面包抄的總計劃行事的命令。德軍左路馬肯森軍，將在貝洛軍支持下，進攻薩姆索諾夫的右翼末端。這時，薩姆索諾夫右翼末端的部隊業已到達湖泊地帶前方的陣地比紹夫斯堡（Bischofsburg），而將騎兵駐扎在森斯堡（Sensburg）。如果萊寧坎普所部也及時到達湖泊前方地區，則兩軍陣地就可銜接一氣。但萊寧坎普所部未來，德國人打算包抄的薩姆索諾夫的這一翼因此沒有掩護。德軍中路，將由朔爾茨的第二十軍繼續上一天的戰斗，這時它已得到蘭德韋爾師（Landwehr division）和馮·莫根將軍第三后備師的支援。德軍右路，將由弗朗索瓦按命令發動進攻，包抄薩姆索諾夫的左翼。

全部命令于8月25日午夜前發畢。但次日晨，即全線作戰開始那天早晨，魯登道夫卻給偵察飛行員提供的關于萊寧坎普正在朝著他的方向進軍的報告弄得心神不定。雖然興登堡很有把握，認為第八集團軍“用不著有絲毫的遲疑”，只需留下一支掩護部隊來對付萊寧坎普即可，但是魯登道夫的憂慮又全部回潮。他寫道，萊寧坎普“千軍萬馬，聲勢浩大，像一片雷雨欲來的烏云密布在東北方”，“他只要逼近我們，我們就會失敗”。他開始感到那種曾經侵擾過普里特維茨的恐懼，于是舉棋不定，不知是將全部兵力投入打擊薩姆索諾夫為好，還是放棄進攻俄國的第二集團軍而掉轉頭來打它的第一集團軍為好。這位列日戰役的英雄，“似乎有點失去勇氣了”，這固然是霍夫曼幸災樂禍的記載，是出自這位最不惜把這種弱點加在袍澤身上的軍事作家的大筆。不過，連興登堡也承認他的同伴為“嚴重的疑慮”所苦；興登堡聲稱，在這時刻，是他使他的參謀長堅定下來的，用他的話說，“我們克服了內心的危機”。

可是一個不同的危機又冒出來了，司令部發現弗朗索瓦依然在等待他的炮兵部隊而沒有按令發動進攻拉開戰幕。魯登道夫責令進攻必須于正午開始。弗朗索瓦回答說，司令部認為應在上午首先拿下的陣地還沒有拿下來。這可激起魯登道夫大發雷霆，招致了霍夫曼所謂的“或許是不友好的”回話。弗朗索瓦這一天就是設法按兵不動，拖延時間，等候他的時機到來。

突然間，遠道來自科布倫茨德軍統帥部的一個意外的電話打斷了同弗朗索瓦的爭吵。即使統帥部不找什么麻煩，魯登道夫也已夠煩心的了。他拿起電話，同時命令霍夫曼也拿起另一只聽筒聽聽“他們想干些什么”。使他驚異的是他聽到統帥部作戰處長塔彭上校提出要給他增援三個軍和一個騎兵師。他剛從西線來，參與過動員計劃的修訂，對于進攻中每一英里需要的兵力密度，他清楚到最后一位小數。所以，塔彭的話使他簡直無法置信。施利芬計劃依靠把最后一兵一卒都用來加強右翼，而今正是右翼攻勢高峰時刻，是什么原因使統帥部決定抽出三個完整的軍來削弱這一線力量的呢？他感到惶惑，他對塔彭說，這些援軍，東線并不“確實”需要，即使來，對目前這一戰也為時過晚，因戰斗已經打響。塔彭說，這些部隊是可以抽出來的。

這個關系重大的決定，原來是出于統帥部的驚慌失措。俄國人在動員之后，不是如德國計劃所料的六個星期，而是兩個星期就發動了攻勢。之所以能抽出三個完整的軍，據塔彭說，是由于在法國邊境上的“大捷”，“使統帥部深信西線的決戰已經打響，而且已經打勝”。在這種印象下，毛奇于是“不顧向他提出的種種反對意見”，而于8月25日決定派遣援軍，使東普魯士不致落入俄國人之手。難民的疾苦，放棄的領土上容克產業聽任掠奪成性的哥薩克人的宰割，以及名門貴婦向德皇、皇后懇求拯救她們家族的園地和財產的哭訴，都有其影響。為了激起反俄情緒，德國政府曾有心將難民分散到各個城市，但結果是嚇壞了自己。東普魯士聯邦政府委員會主席曾前來統帥部為家鄉乞援。克虜伯的一個董事在8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各方面的人都說：‘嘿！俄國人嘛，他們的動員絕不會有完成的時候。……我們大可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保持守勢。’但是今天，每個人的想法全都不同了，都在談放棄東普魯士了。”德皇深受影響。毛奇本人本來就一直擔心東線防御薄弱，他在戰前曾寫道：“要是俄國人開進柏林，西線的一切勝利都將付諸東流。”

毛奇這時從西線撤走的軍，其中兩個曾攻打地處德國第二和第三集團軍連接地帶的那慕爾。比利時這個要塞打下之后，比洛將軍就宣布這兩個軍可以聽便調動。這兩個軍于是于8月26日與第八騎兵師一并調出，開赴國內車站——因比利時的鐵路已遭破壞——以便“盡速”運往東線。另一個軍在遠程來到蒂永維爾車站時，統帥部里主張慎重的意見終于說服毛奇撤銷了前令。

東去800英里，薩姆索諾夫正準備于8月26日重啟戰幕。在他右翼末端，勃拉戈維斯欽斯基（Blagovestchensky）將軍的第六軍已如期到達湖泊地區前面的指定會合地點，但是薩姆索諾夫讓這支部隊成了離群孤雁，因他這時把主力朝過于偏西的方向推進了。但是薩姆索諾夫認為，主力雖然拉開了同萊寧坎普所在或是萊寧坎普應到達的地點的距離，方向還是正確的，可以使他插到維斯瓦河和他認為正在向西退卻的德軍之間。他的目標是阿倫施泰因至奧斯特魯達（Osterode）一線，在那里他可以腳跨德國鐵路干線兩邊；從那里出發，正如他8月23日報告日林斯基所說，“直搗德國心臟就容易多了”。

但情況很清楚，他這些精疲力盡、半饑不飽、跌跌撞撞勉強行至邊境的部隊，已不堪一戰，更談不上直搗德國心臟。軍糧不濟，士兵已吃盡預備糧，村莊空無一人，牧草和燕麥在田里都沒有收割，為人為馬都從地里刮不出什么東西。所有的軍長都要求停止前進。總參謀部的一個軍官向日林斯基司令部報告了部隊供應的“悲慘”情況。他說：“我不知道這種情況士兵怎么能再忍受下去。必須組織一支正規的軍需征集部隊。”日林斯基遠在戰線東面的沃爾科維斯克（Volkovisk），直線距離有180英里，乘火車繞道還要遠一些。隔山隔水，這些報告在他完全沒有切身感覺。他堅持要薩姆索諾夫繼續進攻，“迎頭痛擊正在萊寧坎普前面退卻之敵，并截斷其向維斯瓦河的退路”。

對敵人動向的這種看法，是根據萊寧坎普的報告得來的。而萊寧坎普在貢賓嫩戰役以后再沒有同德軍接觸過，他有關德軍動向的報告是自己的幻想。不過，薩姆索諾夫這時已從鐵路運輸情況和其他片斷的情報看到，他面對的并不是一支在全面退卻的軍隊，這支軍隊已經重振旗鼓，正在向他挺進。同時，又不斷有報告前來，說有一支新的敵軍——弗朗索瓦軍——正在他左翼對面集結。看到他左翼的危險，他派了一個軍官向日林斯基力陳將部隊由繼續北上改為向西推進的必要。日林斯基抱著后方司令對前方司令的小心謹慎所慣有的那種輕蔑態度，認為這是想采取守勢，因而“粗暴地”答復那個軍官說：“在沒有敵人的地方尋找敵人，那是懦夫。我不讓薩姆索諾夫當懦夫，一定要他繼續進攻。”他的戰略，按他的一個袍澤的說法，像在下俄國跳棋，就是要使自己的棋子全部被吃掉才算勝。

8月25日夜，也就在魯登道夫發布命令的時候，薩姆索諾夫作了部署。中路由馬爾托斯將軍和克廖耶夫（Kliouev）將軍的第十五和第十三兩軍，加上康德拉托維奇（Kondratovitch）將軍第二十三軍的一個師作為主力，向阿倫施泰因至奧斯特魯達一線挺進。這路大軍的左翼由阿爾托莫諾夫（Artomonov）將軍的第一軍扼守，由第二十三軍的另一個師支援。50英里之外，由孤軍第六軍扼守右翼。俄國騎兵偵察技術不太高明，薩姆索諾夫不知道最后看到的那支從貢賓嫩戰場潰敗的馬肯森軍，業已重振旗鼓，經過急行軍已同貝洛軍會合，到了他的前面，在向他右翼挺進。起初，他命令第六軍堅守陣地，“任務是掩護全軍的右翼”；接著，他改變主意，叫它“全速”前來支援中路向阿倫施泰因挺進。到了26日晨，他在最后一分鐘又將命令改為留守原地不動，執行原來的任務，掩護右翼。但這時，第六軍業已向中路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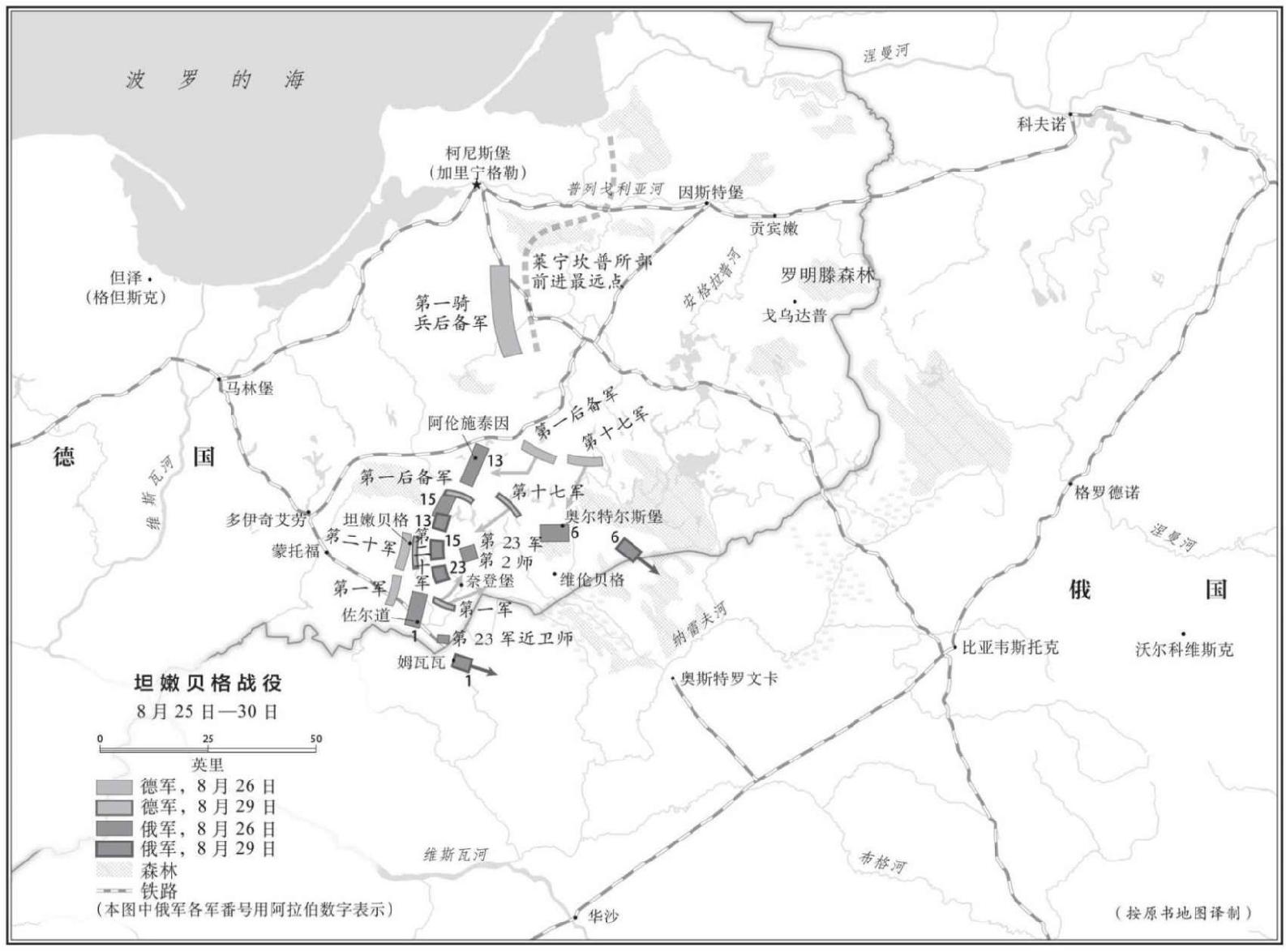
遠在后方的俄國高級指揮部，則有一片大難臨頭之感。早在8月24日，蘇霍姆利諾夫，這位不相信火力、不屑建造軍工廠的陸軍大臣，就曾寫信給嘴上沒有胡須的參謀長亞努什克維奇將軍，要求“看在上帝分上，下令收集步槍。我們已把15萬支槍送給塞爾維亞，我們的儲備已接近用完，而工廠的生產力又很薄弱”。盡管勇敢的軍官們，像那位高喊著“把威廉流放到圣赫勒拿去！”策馬上戰場的將軍那樣熱血沸騰，可是那些陸軍首腦的情緒，從一開始就是灰溜溜的。他們投入戰爭時沒有信心，在戰爭中也一直沒有信心。司令部里竊竊私語的悲觀論調不可避免地傳到了圣彼得堡法國大使的長耳朵里。8月26日，薩佐諾夫對他說，日林斯基“認為在東普魯士發動攻勢注定要失敗”。據說亞努什克維奇同意此見，并激烈反對這一攻勢。不過，副參謀長丹尼洛夫將軍則堅持俄國不能使法國失望，盡管有著“不容置疑的風險”，也勢必進攻。

丹尼洛夫同大公一道駐扎在巴拉諾維奇的“斯塔夫卡”，即總司令部。這是樹林深處的一個幽境，總司令部后來在這里待了一年。之所以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它是南北鐵路線同莫斯科——華沙干線的交叉點，由此可以督導德、奧兩線作戰。大公同他的私人隨從、總參謀部的負責軍官，以及盟國的武官們，食宿在火車車廂里，因為原來準備給總司令居住的房子，發現距離作戰處人員和情報處人員占用的站長的房子過遠。這些車廂上面都造了頂蓋，以避日曬雨淋，車廂外鋪設了木板走道。車站花園里搭了大帳篷，夏天就在里面用膳。談不上富麗堂皇，物質條件的短缺也不在乎，只是門矮了些，使大公往往不幸頭撞門楣。于是所有的出入口處不得不貼上白紙條，使他注目，提醒他進出時得低頭彎腰。

丹尼洛夫深感不安，一是萊寧坎普顯然失去了同敵人的接觸，一是通訊聯系失靈，結果是日林斯基茫茫然不知各部隊所在，各部隊之間也互不知所在。薩姆索諾夫已于8月24日至25日進攻敵軍并將繼續進攻的消息傳到總司令部后，擔心萊寧坎普未能把鉗子的另一翼配合夾攻的焦急情緒就尖銳化了。8月26日，大公視察了設在沃爾科維斯克的日林斯基司令部，堅持要他催促萊寧坎普前進。萊寧坎普自8月23日開始追趕敵人以來，一直從容不迫，毫不著急。途中，他曾穿過德國第八集團軍向南大轉移時在安格拉普河一帶棄下的陣地，匆匆撤退的種種跡象證實了他對一支潰敗敵軍的設想。根據他的一個參謀的筆記，他認為追逼德國人過急將是一個失著，因為敵人可能因此在薩姆索諾夫截斷他們的退路以前退到維斯瓦河后面。萊寧坎普從不努力設法尾追敵人到近處，以目睹的事實來證實其想象，而他的這種失職看來也沒有使日林斯基有所不安，這位司令毫不懷疑地接受了他的看法。

日林斯基在大公視察后于當天給萊寧坎普下了一道命令，要他追擊他仍然認為正在退卻的一支敵軍，并要他防范柯尼斯堡要塞德軍對他側翼可能的突然襲擊。原來的設想是用六個后備師狙擊柯尼斯堡的敵人，但他們都還沒有到達。現在日林斯基指示萊寧坎普用兩個軍封鎖柯尼斯堡以待后備師到達，同時用兩個軍追趕“未躲進柯尼斯堡而可以認定在退向維斯瓦河的那些敵人”。既“料想”敵人在退卻，他就不會想到敵人是在威脅薩姆索諾夫，也不督促萊寧坎普按原計劃迅速朝著跟薩姆索諾夫右翼銜接的地點靠攏。他只是告訴他，第一、第二集團軍的“聯合行動”，必須以迫使正在退卻的德軍退向海邊從而遠離維斯瓦河為目標。但這兩支俄國軍隊，既互不聯系，也互不靠攏，“聯合”顯然無從談起。

8月26日破曉，薩姆索諾夫的第六軍，遵照他們還不知道業已撤銷的前令，開始向中路進發。一個師已經在途，另一個師得到消息，敵人已出現在它后方偏北約6英里的地方。該師師長認為這是從萊寧坎普那里敗退下來的德軍，便決定迂回過去襲擊。事實上這支德軍是馬肯森軍，是前來進攻的。它向這些俄國人猛撲過來，后者一面奮戰圖命，一面向這時已出發8英里的友師死命呼救，要它回來。友師于是再回頭走，往返經過19英里跋涉后在日暮時分碰上了第二支敵軍貝洛軍。俄軍這兩個師之間已失卻聯系。軍長勃拉戈維斯欽斯基將軍則是“昏了頭，不知所措”（這種說法在此是一個英國軍事評論家用上去的）；打了一整天的那個師，傷亡5000人，損失野戰炮16門，師長有鑒于此，便自作主張命令撤退。夜間，反復無常的命令更增加了混亂，各個隊伍在公路上混在一起；到了第二天早晨，整個第六軍已潰不成軍，節節后退。薩姆索諾夫的右翼給打垮了。



在這一情況發生的時候，薩姆索諾夫中路兩個半軍發動了攻勢。馬爾托斯將軍居中，戰斗非常激烈。他左鄰第二十三軍一個師被擊退，使他左側失去了掩護。他右側的克廖耶夫將軍的第十三軍，攻下了阿倫施泰因，但得悉馬爾托斯處境困難，便前來支援，留下阿倫施泰因由第六軍前來占領，克廖耶夫認為該軍正在前來途中。第六軍當然是永不會前來了，在阿倫施泰因就此留下一個缺口。

距前線幾英里，在奈登堡的第二集團軍司令部里，薩姆索諾夫正在同參謀長波托夫斯基（Potovsky）將軍和英國武官諾克斯（Knox）少校吃飯的時候，第二十三軍的那個被打敗的師涌到街上來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些士兵一聽到響聲就疑為追兵。一輛救護馬車轆轆而來，便引起了一陣呼叫“德國槍騎兵來啦！”。聽到這種亂哄哄的情況，薩姆索諾夫同波托夫斯基——一位戴著夾鼻眼鏡，現在已不知出自何因而有“瘋子毛拉”（Mad Mullah）之稱的神經質的人物——便掛上軍刀，趕了出來。他們親眼看到部隊的情況。這些士兵“精疲力盡……已有三天沒有面包和糖下肚”。一個團長告訴他們：“我的部下已有兩天沒有拿到軍糧，一點供給也沒有送來。”

當天晚上，薩姆索諾夫還沒有得到第六軍遭難的全部消息，但是他已意識到當時已不是包圍敵人而是自己如何免遭包圍的問題了。雖然如此，他仍然決定不退出戰場，第二天繼續作戰，由他中路的軍努力纏住德國人，直到萊寧坎普前來給他們以致命一擊。他命令第一軍軍長阿爾托莫諾夫將軍守住俄軍左翼末端面對弗朗索瓦的陣地，要“……不惜任何代價，保住全軍翼側”。他深信，“即使一支頗具優勢的敵軍也不能突破赫赫有名的第一軍的抗擊”。他還說，這場戰斗的勝利將有賴于它的堅守。

第二天27日清晨，弗朗索瓦焦急等待的進攻時刻到來了。炮兵部隊已全部到達。4時，天尚未亮，一陣威力巨大、勢如颶風的炮擊，在烏斯道俄國第一軍陣地上炸開了。德國統帥部的領導人物走出臨時設在勒包（Löbau）的司令部，興登堡古井無波，非常沉著，魯登道夫殺氣騰騰而又緊張，霍夫曼跟在他們后面——一個亦步亦趨的影子。他們是在前往20英里外的一座小山，魯登道夫想在那里找塊地方，“現場監督”弗朗索瓦和朔爾茨兩軍的協同作戰。他們還沒有走到山腳，消息來了，說已拿下烏斯道。可是就在他們沉浸在歡樂之中的時候，差不多緊接著又來了一份報告，說前一份報告消息不確。猛烈的炮聲隆隆不絕。俄國人的戰壕里，“赫赫有名的第一軍”的士兵，跟他們第二十三軍的戰友一樣，早已饑腸轆轆，喪失了斗志，在傾注如雨的炮彈下狼狽逃走了，留下的尸體同逃脫的人一樣多。不到上午11時，俄國第一軍就放棄了整個陣地。這一戰是單靠大炮贏得的。要是按照魯登道夫過早行動的那些命令行事，這一戰也許會輸掉。魯登道夫認為俄國第二集團軍眼下已被“徹底打垮”。

但是，俄國第二集團軍并沒有被打垮。魯登道夫發現這一仗“跟其他戰役不同”，未在一天之內贏到手。弗朗索瓦仍然被阻在烏斯道東面，未能前進；中路的兩個俄國軍——很難對付的一支人馬，仍然在進攻；萊寧坎普的威脅仍然籠罩在他后方。公路上塞滿了難民和牲口；整村整村的人在逃亡。德國士兵也已精疲力盡，馬蹄聲、腳步聲，也都疑為追兵，士兵聞聲就大叫“他們來了！”。這種叫喊傳到隊伍后面就成了“哥薩克來了！”。統帥們回到勒包后，就聽到一個叫人不寒而栗和難以置信的消息說，弗朗索瓦軍正在撤退，“殘部”正在退入蒙托福。一個驚慌失措的電話還證實在車站前面的確可以看到第一軍退下來的三五成群、垂頭喪氣的士兵。弗朗索瓦這一翼要是真的垮了，這一仗就可能敗北。在這可怕的一瞬間，打敗仗、退到維斯瓦河后面和放棄東普魯士這些曾經出現在普里特維茨面前的情景，又都再現了。不過當即查明，在蒙托福的只是在烏斯道外面作戰退下來的那一營的士兵。

那天晚些時候，實際情況終于傳到日林斯基的司令部，德國人根本不是在“向維斯瓦河退卻”，而是在向薩姆索諾夫進逼。最后，他打電報給萊寧坎普說，第二集團軍正遭到猛烈攻擊，他應該配合行動，“把你的左翼盡可能向前推進”。但他指定的目的地過于偏西，向前推進的路程也不夠遠，并且沒有談到要萊寧坎普趕速前進或是作急行軍。

戰斗進入第三天。雙方軍隊都已全部投入戰斗。40英里的戰線上，兩軍蜂擁而上，鏖戰一場，隊伍被打散了，分開了，再混戰一團、各自為戰。一個團前進了，而友鄰軍則被擊退下來，于是出現了缺口，敵人插進來了，或是不知何故竟沒有乘虛而入。大炮轟鳴著，騎兵、步兵、馬曳重型野戰炮的炮兵，過村莊，穿森林，走過湖泊相間的地帶，越田野，跨公路，他們移動著，踉蹌地前進著。炮彈擊中了農舍，摧毀了村莊街道。一個營在大炮掩護下沖了過去，在煙霧后面消失了，不知兇吉。一隊隊被趕往后方的俘虜，堵塞了前進隊伍的道路。幾旅幾旅地在進入陣地，幾旅幾旅地在退出陣地，互相穿過交通線，雜亂無章，歸錯了隊伍，弄錯了番號。野戰指揮官們不知部下所在，參謀人員的車輛到處飛馳，德國偵察機在頭頂上盤旋搜集情況，集團軍司令千方百計地想弄清究竟，發布著命令。這些命令，前線也許收不到，也許不會執行，也可能在到達前已時過境遷，不符合實際情況。30萬人馬，互相踐踏著，前進著，又疲乏不堪地退了回來，打著打著，要是走運占領了一座村莊就可酩酊大醉一番，或是夜幕降臨，就和幾個同伴坐在森林的空地上；第二天又繼續作戰，東線大戰正酣。

馮·弗朗索瓦將軍28日黎明再一次以猛烈炮火開路，打響了戰斗。魯登道夫令他轉向左側，以減輕朔爾茨軍所受的壓力，他認為該軍已“疲乏不堪”。弗朗索瓦置之不理，堅持向東筆直挺進，決心整個包圍薩姆索諾夫的翼側并截斷他的退路。他上一天以不服從命令而竟得到勝利，所以魯登道夫現在幾乎是懇求他服從命令，他說第一軍“執行這些指示將為全軍立下最大的功勞”。弗朗索瓦仍然置若罔聞，揮戈東進，并沿途布置分遣隊，以防敵人突圍。

朔爾茨的戰地司令部設在戰場外的弗勒根瑙村（Frögenau），距一個更小的村子坦嫩貝格約兩英里。魯登道夫和興登堡對中路情況非常焦慮，便來此等待消息。從弗勒根瑙發出的命令都標明日期和地點。魯登道夫再一次為萊寧坎普所苦，對他放心不下。既為朔爾茨軍擔心，又對弗朗索瓦生氣，復困于和這位好犯上的司令之間“戰地電話根本失靈”，加上同左翼馬肯森和貝洛之間根本沒有電話通訊設施，所以魯登道夫“十分不滿意”。馬肯森和貝洛由于命令前后矛盾，一時要朝這個方向，一時又要朝那個方向，因而被搞得不知所措，他們派了一個參謀乘飛機來到司令部弄清究竟。這位參謀受到的則是“十分不友好的接待”，因為他們兩個軍都不在應處的戰位上。不過，接近下午時分，這兩個軍都已按要求行動了，馬肯森軍在向潰敗的俄軍右翼緊逼，貝洛在向阿倫施泰因的缺口挺進，準備攻打俄軍中路。這時，弗朗索瓦的進軍路線便顯得很有道理了。魯登道夫于是向他發出糾正前令的命令，要他繼續向他已經進軍的方向推進。

正當深信勝利在即的想法在德軍司令部開始欣然成為定論的時候，消息來了，說萊寧坎普所部確實在前進。不過，按照這天迄至當時為止的進展情況來看，可以肯定他為時已晚。事實上，當夜露營時，萊寧坎普的走在最前面的軍，距兩天前薩姆索諾夫的第六軍被打敗的地方比紹夫斯堡還有20英里。他們在敵區牛步前進，到第二天8月29日結束時，最遠也只向西前進了10英里左右，且沒有向南一步，也沒有同薩姆索諾夫取得聯系，以后也再沒有取得聯系。

薩姆索諾夫將軍的右翼第六軍的瓦解，加上被寄予厚望的“赫赫有名的第一軍”的崩潰，向他預示了末日的來臨。他的兩翼已折；他的騎兵，唯一一支在人數上超過德軍的武裝力量，由于向兩側拉得過遠，在戰斗中不能發揮有力的作用，這時且已處于孤軍境地；供給和通訊已整個陷于混亂狀態；只有堅韌不拔的第十五和第十三兩個軍仍在奮戰。在奈登堡的司令部里，他可以聽到弗朗索瓦部隊越來越近的炮聲。在他似乎只有一件事可做了。他打電報給日林斯基說，他將離開這里去前線。接著他命令將行李和無線電通訊工具送回俄國，就此割斷了他同后方的通訊聯系。他作此決定的理由，“被他帶進了墳墓”。不過還是不難理解其原委的：交由他指揮的這支軍隊在他的率領下已在土崩瓦解。他重又成了一名騎兵軍官和師長，做了他最熟悉的事情。帶著七名參謀人員，騎著從哥薩克騎兵那里征來的馬匹，他馳赴火線親自指揮作戰。在馬鞍上他感到很自在。

8月28日，他在奈登堡城外同諾克斯少校告別。他坐在地上，在查看地圖，四周圍著參謀人員。他站起身來，把諾克斯帶到一邊，告訴他情況“嚴重”。他說他的職責是和部隊共存亡。既然諾克斯的任務是向本國政府匯報，薩姆索諾夫于是勸他“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就回國去，然后騎上馬，回過頭來悵然微笑著說：“敵人有走運的一天，我們也會有走運的一天。”

嗣后，正在一座小山頂上指揮他那段戰線的馬爾托斯將軍，剛下令將一隊德國俘虜帶出火線的時候，不覺大吃一驚——集團軍司令竟帶著七名參謀人員騎馬來了。薩姆索諾夫詢問了撤走的那一隊人是怎么一回事，在聽說是俘虜之后便策馬走近馬爾托斯，欠身過去擁抱了他，傷心地說道：“只有你能救我們了。”但是，他心里更明白，所以當夜便命令第二集團軍剩下的部隊全部撤退。

以后兩天，8月29日和30日，繼續撤退。這是一場越來越無情的災難。這兩個奮戰最久、打得最好、前進最遠、撤退最遲的中路軍，鮮有脫身的機會，已兜底落在德軍包圍圈的羅網里了。克廖耶夫將軍的軍，當貝洛在阿倫施泰因突破其右側缺口從而將俄軍中路整個包圍起來的時候，仍然在進攻。他和馬爾托斯兩個軍，在沼澤地區，左沖右突，無濟于事，暈頭轉向，前進不得，重新集結隊伍，站定下來進行抵抗，也不得逞；而敵人的包圍圈則越縮越緊。沼澤地區的堤道上，每個路口都派有德國兵架著機槍警戒著。馬爾托斯的士兵這四天都在饑餓線上；克廖耶夫軍在最后的40小時中走了42英里，什么軍糧都沒有，馬匹也沒有喂料、沒有飲水。

8月29日，馬爾托斯將軍和他的幾個參謀人員，企圖在五個哥薩克士兵的護送下找條穿過森林的出路。敵人在四面射擊。他的參謀長馬恰戈夫斯基（Machagovsky）少將，在機槍掃射下喪生，其余的人也逐個地遭到狙擊，飲彈斃命，最后跟著這位將軍的只剩下一個參謀和兩個護送的哥薩克士兵。馬爾托斯的軍糧袋是由一個副官保管的，但這個副官失蹤了，所以從一早到現在，他沒吃沒喝，也沒有煙抽。一匹馬力竭而死，人都下鞍牽著余下的馬走著。夜幕降臨，他們想靠星星辨認方向，可是偏偏滿天烏云。忽聽到有部隊在走過來，他們以為是友軍，因為馬拖著他們朝那方向走。突然間，德國人的一架探照燈在樹林里閃耀起來了，照來照去在找他們。馬爾托斯跨上馬想奔馳脫身，可是馬中了彈，他跌了下來，為德國兵所俘。

后來，馬爾托斯身為俘虜被禁錮在奧斯特魯達一家“骯臟的小旅店”時，魯登道夫曾到他房間里來，用一口流利的俄語，奚落他的失敗，并夸口俄國國境對德國的長驅直入現已大門敞開。興登堡跟著進來，“看到我不安的樣子，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懇切地要我務必鎮定”。他用講得很別扭、口音很重的俄語答應把軍刀還給馬爾托斯，告別時還點頭致意，并說“祝你過得愉快些”。

在奈登堡北面森林里的馬爾托斯軍的殘部，或遭到殺戮，或是投降。第十五軍只有一個軍官逃回俄國。在奈登堡東約十英里的第十三軍，軍長克廖耶夫將軍也被俘，最后剩下的一些人，堅守在一個圓形的戰壕里。他們用從森林里的德國炮兵那里繳來的四門大炮在8月30日苦戰了一整夜，抵擋著敵人，直到彈盡和大部分人殞命為止。余下的均成了階下囚。

俄國人的最后一次進攻，是在阿爾托莫諾夫將軍被革職后接任第一軍軍長的西列柳斯（Sirelius）將軍以偉大的氣概在8月30日發動的。他將散在四處沒有投入作戰的各步兵團和炮兵部隊聚集成約計一個師，發動了一次進攻，突破了弗朗索瓦的防線，重又攻克了奈登堡。但這已為時太晚，獨木難支。俄國第二集團軍的這次最后一擊，并不是出自薩姆索諾夫的命令，他已經死了。

8月29日夜，薩姆索諾夫同馬爾托斯將軍一樣，陷入了羅網，不過他是在森林的另一個地方。馳過鐵路兩邊的森林后，他和幾個同伴到了維倫貝格（Willenburg），距祖國國境只七英里了，可是德國人已先到一步。這位將軍和他的一隊人馬在森林里一直等到夜幕降臨，才繼續徒步前進，因為沼澤地黑夜騎馬難行。火柴用盡，已無法再看清指南針。為了避免在黑暗里走散，他們手拉著手跌跌撞撞地走著。薩姆索諾夫犯了氣喘病，顯然越來越虛弱。他一遍又一遍地跟參謀長波托夫斯基說：“沙皇信任我。但這樣慘敗之后，有何面目去見他？”走了六英里，他們停下來休息。那是半夜1時，薩姆索諾夫離開同伴，走進一片松樹下更濃深的黑暗處。一聲槍響打破了黑夜的沉寂，波托夫斯基立即意識到這是怎么一回事。前些時候，薩姆索諾夫曾向他吐露過自殺的意圖，不過他認為已經說服他打消此念。這時，他肯定這位將軍已告別人間。參謀人員力圖在黑暗里找到他的遺體，但沒有找到。他們決定等到黎明，但天剛亮就聽到德國人走近了。這些俄國人只好放棄這一任務繼續向國境前進，并在國境上遇到一支哥薩克巡邏隊而終于脫險。薩姆索諾夫的遺體為德國人發現，并由他們埋在維倫貝格。1916年，在紅十字會的協助下，他的遺孀方能取回尸體，帶到俄國安葬。

第二集團軍已無聲無息。日林斯基司令部同它的無線電聯系已斷。兩天來薩姆索諾夫那里已一無音訊。日林斯基令萊寧坎普的騎兵突破阿倫施泰因的德軍戰線，查明第二集團軍的究竟，但已為時過晚。這個任務是永遠完不成了，德國第八集團軍在消滅了原來準備粉碎德軍的鉗形攻勢的一翼之后，正在轉而收拾另一翼了。

德國人看到自己戰績之大也幾乎驚嘆不已。敵尸、敵俘以及繳獲的大炮，為數驚人：俘虜計92000名——不過按某些說法，這數字偏高。在這一仗結束后的一個星期，用了60列火車才把他們送到后方。第二集團軍約有600門大炮，德國人繳獲的數量，據不同的估計，在300到500門之間。至于擄獲的馬匹，則是成群成群地被趕到匆忙搭起來的畜欄。死亡和失蹤人數，說法不一，但估計超過3萬名。第十五軍和第十三軍，或被俘或陣亡，已被殲滅而不復存在；這兩個軍中能夠逃生的一共不過50名軍官和2100百名士兵。兩翼的兩個軍，即最先退卻的第六軍和第一軍，各自的幸存者，也都不過一個師而已；至于第二十三軍，則僅剩下一個旅左右。

高唱凱歌的人，也損失慘重。在困倦不堪、提心吊膽地打了六天之后，他們也已神經緊張、心驚肉跳。8月31日，再次拿下四經易手的奈登堡那天，一輛汽車疾駛開過廣場時，一個神經緊張的憲兵吆喝它：“停車！”里面坐著馮·莫根將軍的這輛汽車，沒有理睬他的命令，他便大叫：“俄國佬，停下來！”并隨即開了槍。一排子彈打中了汽車，司機身亡，坐在將軍旁邊的一個軍官受傷。也就在當夜，這位在手下人槍口下死里逃生的將軍，又給他的侍從叫醒。這個侍從一面嚷著“俄國佬回來啦！”，一面抓起將軍的衣服就跑。他不得不穿著內衣帶上左輪手槍跑上街，這令他“十分生氣”。

除了少數幾個軍官曾身經沙場外，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經歷炮火，加以這場大戰的猛烈及其帶來的恐懼、疲憊、痛苦所激起的想象，一種荒誕的傳說產生了，說有成千上萬的俄國人淹沒在沼澤里，或是陷在泥塘和流沙里一直陷到脖子那么深，德國兵不得不用機槍把他們打死。一個軍官對國內一群聽得心驚肉跳的朋友說：“他們的慘叫聲，直到我死的一天都還會在我耳邊響著。”“那個廣泛流傳的關于俄國人被趕進沼澤和死在那里的傳說是個神話，”魯登道夫寫道，“那附近根本沒有沼澤地。”

敵人的敗績已經一清二楚，德國的司令們便開始認為他們已贏得如霍夫曼在日記中所寫的“歷史上的一大勝仗”。于是決定——按霍夫曼的說法是根據他的建議，而按魯登道夫的說法，則是應“我的建議”——將這一戰役命名為坦嫩貝格戰役，以雪歷史上條頓騎士團在那里敗于波蘭人和立陶宛人手下之恥。盡管這第二個勝利比列日的勝利更大，但是魯登道夫還不能興高采烈，“因為萊寧坎普所部動向不明，使我的神經過度緊張”。不過這時候，加上毛奇正從西線調來的兩個軍，他完全可以以更大的信心掉過頭來攻打萊寧坎普。

他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得歸功于別人：得歸功于霍夫曼，雖然他的正確判斷系出自錯誤的理由，但畢竟是他堅持萊寧坎普不會追趕，是他設想的計劃和草擬的命令將第八集團軍調往迎擊薩姆索諾夫的；得歸功于弗朗索瓦，是他反抗了魯登道夫的命令，從而保證了對薩姆索諾夫左翼的包圍；得歸功于興登堡，是他在關鍵時刻使魯登道夫沉著鎮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得歸功于德國計劃工作中從沒有想到的一個因素——俄國的無線電訊。魯登道夫后來十分依賴截獲的電訊。他手下的人員白天按時收集電訊，進行破譯或翻譯，每夜11時呈送給他，倘偶爾遲送，他就會不安，親自到通信兵的房間來查明原因。霍夫曼承認，真正使坦嫩貝格戰役勝利的是截獲的電訊。“我們有一個盟軍，”他說，“那就是敵人。我們知道敵人的全部計劃。”

在公眾心目中，東普魯士的救星是名義上的司令興登堡。這場勝仗，使這位從退休中被拖出來的年邁的、穿著舊藍色軍服的將軍成了一個偉人。在東普魯士贏得的這一勝利，在渲染過頭的歌頌和傳播之下，使有關興登堡的神話在德國扎下了根，甚至連霍夫曼的惡意中傷也不能把它削減分毫。霍夫曼后來身為東線參謀長時，會帶領參觀訪問的人走訪坦嫩貝格戰場，并且會這樣告訴他們：“這是戰役開始前元帥睡覺的地方；這是戰役結束后他睡覺的地方；這是戰役進行中他睡覺的地方。”

在俄國，慘敗的消息并沒有立即震動人心，它給同一時期在加利西亞（Galicia）戰線擊敗奧軍的巨大勝利沖淡了。加利西亞戰線的勝利，從數字上看，甚至超過德國人在坦嫩貝格贏得的戰果，使敵人遭到同樣重大的打擊。在從8月26日到9月10日以倫貝格[[3]](#_3__Lun_Bei_Ge__Lemberg__Xian_Mi)一戰為高峰的一系列戰斗中，俄國人打死打傷敵人25萬，俘虜10萬，迫使敵人在18天中連續后退150英里，完全肢解了奧匈聯軍，特別是把它訓練有素的軍官打得殘缺不全，使奧匈聯軍從此一蹶不振。那一戰使奧地利折了腿，但不能彌補坦嫩貝格戰役對俄國造成的損失，也不能醫治坦嫩貝格的創傷。俄國第二集團軍不復存在了。薩姆索諾夫已僵臥沙場，他麾下五個軍長中兩個成了階下囚，三個因無能而被撤職。萊寧坎普將軍在隨后進行的馬祖里湖一戰中被攆出了東普魯士，他“發了昏”——在此，這個習慣說法是日林斯基用上去的——棄下所部駕著一輛摩托車回到俄國，從而徹底身敗名裂，被開除軍籍，并給日林斯基帶來了同樣的下場。在給大公的一份電報中，日林斯基指控萊寧坎普倉皇脫逃，這使大公很為惱火，他認為這次失敗主要是日林斯基的失職。他因此呈報沙皇，說日林斯基“昏了頭，不能控制戰局”，結果，坦嫩貝格戰役的又一個角色就此成了犧牲品。

訓練不足，物資匱乏，將軍不稱職，組織工作不力，這一切在戰爭中都暴露無遺。后任陸軍大臣古奇科夫（Guchkov）將軍曾作證說，他在坦嫩貝格之戰以后“深信戰爭已輸”。敗績給那些親德集團帶來了新的力量，他們開始公然煽動退出戰爭。維特公爵深信戰爭將毀滅俄國；拉斯普京深信戰爭將摧毀沙皇政權。司法大臣和內務大臣為沙皇草擬了一份備忘錄，力主盡快與德國媾和，理由是繼續與民主國家為盟必將頭破血流。機會送上來了，不久，德國便提出了跟俄國單獨媾和的建議，以后在1915年和1916年又繼續提出這樣的建議。是出于對盟國和《倫敦條約》的忠誠，抑或害怕同德國人談和，抑或對革命浪潮不察，或純粹是出于政府的遲滯，不管怎樣，俄國人始終沒有接受這些建議。混亂日增，軍火日竭，他們就這么對付著繼續作戰。

慘敗之時，法國武官馬爾基·德拉吉什（Marquis de Laguiche）將軍曾向總司令致以慰問。大公豪邁地回答說：“能為我們的盟國作出這樣的犧牲，我們很高興。”山崩于前而色不變是他的準則，而俄國人，深知他們有無窮的人力資源，多大的災難他們都慣于泰然處之。俄國這部壓路機，西方盟國均曾寄予莫大希望，在它們于西線受挫之后，對這部壓路機則更是引領以待，可是它卻像是用大頭針釘起來的船在路上崩解了。夭折于過早出動，確如大公所說，是為盟國作出了犧牲。這個犧牲，不論它使俄國人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卻成全了法國之所望：德國從西線削減兵力。那兩個沒有趕上坦嫩貝格戰役的軍，將不能參加西線的馬恩河戰役了。

注釋

[[1]](#_1_15) 塞莫皮萊（Thermopylae，一譯溫泉關）是希臘北部和中部交界處的隘口，形勢險要，便于扼守。公元前480年希臘各城邦在此抵御波斯的侵略，波斯王多次進攻，沒有得逞。因希軍出了叛徒，把抄希軍后路的山徑告訴敵人，以致波斯軍隊開到塞莫皮萊守軍的后方，守關的斯巴達王和300名戰士全部戰死。這就是世界古代史上希波戰爭中的塞莫皮萊戰役。——譯注

[[2]](#_2_12) 煙臺煤礦，在我國遼寧省遼陽。——譯注

[[3]](#_3_11) 倫貝格（Lemberg），現名利沃夫（Lviv），屬烏克蘭。——譯注

弗朗索瓦拒絕在重炮到達之前投入戰斗：Hoffmann, 273–5; all references in this chapter to Hoffmann are to his Truth About Tannenberg.

“如果命令下定了”：François, 228.

截獲兩份俄軍明碼無線電報：Ludendorff, 59; Hoffmann, 265–68. “He kept asking me anxiously”: qtd. Nowak, Introduction to Hoffmann's Diaries, I, 18. Hoffmann's account of Rennenkampf-Samsonov quarrel, 314; his handing over the messages while cars in motion, 268.

魯登道夫寸步不讓：Ludendorff, 58; Hindenburg, 115, 118; Hoffmann, 282.

塔彭的電話：Hoffmann, 315–16. OHL's reasons: Tappen, 16–19, 110–111. President of the Prussian Bundesrat: Ludwig, 456. Director of Krupp: Mühlon, 113. Kaiser deeply affected: François, 51. Moltke quoted: Memorandum of 1913, Ritter, 68–9.

德軍從比利時抽出三個軍支援東線：Bülow, 64–5; Hansen, 179.

“直搗德國心臟”：Ironside, 133.

“我不知道這種情況士兵怎么能再忍受下去”：ibid., 130.

日林斯基命令“迎頭痛擊正在萊寧坎普前面退卻之敵”：ibid., 134.

“在沒有敵人的地方尋找敵人”：Golovin, 205; Poddavki: ibid., 217.

薩姆索諾夫給第六軍的命令：Ironside, 155–7.

“看在上帝分上”：Agourtine, 34.

薩佐諾夫轉述的俄軍司令部的悲觀論調：Paléologue, 104.

“斯塔夫卡”的情況：Danilov, 44–46.

萊寧坎普的一個參謀的筆記：Ironside, 198.

“未躲進柯尼斯堡而可以認定在退向維斯瓦河的那些敵人”：ibid., 200.

勃拉戈維斯欽斯基將軍“昏了頭，不知所措”：ibid., 157.

薩姆索諾夫和波托夫斯基親眼看到敗軍撤退的情況：Knox, 68–9; “Terribly exhausted”: Ironside, 176.

薩姆索諾夫給阿爾托莫諾夫下達的命令：ibid., 164.

烏斯道戰役：Ludendorff, 62–3; Hoffmann, 285–89.

弗朗索瓦軍敗退的傳言：Ludendorff, 62.

日林斯基命令萊寧坎普“把你的左翼盡可能向前推進”：Ironside, 207.

魯登道夫懇求弗朗索瓦“執行這些指示將為全軍立下最大的功勞”：Hoffmann, 305.

魯登道夫“十分不滿意”：Ludendorff, 64.

馬肯森的參謀受到“十分不友好的接待”：Hoffmann, 310.

“被他帶進了墳墓”：Golovin, 254.

薩姆索諾夫同諾克斯少校告別：Knox, 73–4.

“只有你能救我們了”：Martos Ms., qtd. Golovin, 263.

馬爾托斯和克廖耶夫的部隊缺糧：Kliouev, 245; Knox, 80.

馬爾托斯被俘及他與魯登道夫和興登堡的會面：Martos Ms., qtd. Golovin, 294, 327.

“沙皇信任我”和薩姆索諾夫的自殺：Potovsky Ms., qtd. Golovin, 301; Knox, 82, 88.

德軍的戰績：François, 243–45.

莫根將軍在奈登堡遇險：François, 240.

“他們的慘叫聲，直到我死的一天都還會在我耳邊響著”：Blücher, 37.

俄國人被趕進沼澤的傳說是個神話：Ludendorff, 68; François (245) also calls it a “legend.”

“歷史上的一大勝仗”：Hoffmann, Diaries, I, 41. Naming the battle Tannenberg: Hoffman, 312; Ludendorff, 68. “Strain on my nerves”: ibid.

魯登道夫親自到通信兵的房間詢問截獲的電報：Dupont, 9.

“我們有一個盟軍”：Hoffmann, Diaries, I, 41. Tappen (108) also acknowledges that the detailed knowledge of Russian movements obtained from the intercepts “greatly facilitated” German command decisions in East Prussia.

“這是戰役開始前元帥睡覺的地方”：qtd. De Weerd, 80. Hoffmann remained on the Eastern Front throughout the war, eventually succeeding Ludendorff as Chief of Staff on that front and conducting the German side of the negotiations at Brest-Litovsk. He appears as General Wilhelm Clauss, the central character of Arnold Zweig's novel The Crowning of a King, N.Y., 1938.

日林斯基和萊寧坎普身敗名裂：Gurko, 83; Golovin, 386.

“深信戰爭已輸”：Golovin, Army, 24.

俄司法大臣和內務大臣草擬的求和備忘錄：Richard Charques, The Twilight of Imperial Russia, New York, 1959, 216.

“能為我們的盟國作出這樣的犧牲，我們很高興”：Knox, 90; Paléologue, 106.

## 第16章　火燒盧萬

1915年，比利時當代詩杰埃米爾·凡爾哈倫（Emile Verhaeren）所寫關于他的祖國被侵略一書，在他流亡中出版了。1914年以前，他曾火熱地獻身于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理想，這些理想在當時認為是可以消除民族界限的。他作為序言的一段獻辭寫道：“本書作者原是個和平主義者，而在此書中，則仇恨躍然紙上……在他，幻想的破滅莫甚于此，其突如其來亦莫過于此，給他的打擊之大，使他感到和過去已判若兩人。然而，盡管此恨綿綿，使他有良知消失之感，但還是激情滿懷地將這些篇章獻給故我。”

戰爭和侵略對他那時代的人的思想究竟起到怎樣的影響，在所有有關的著作中，凡爾哈倫一書的陳詞，最為深刻痛切。邊境戰役結束時，戰爭已進行了二十天。在這期間，交戰國和作壁上觀的中立國，都產生了種種激情、看法、想法和論點，也正是這一切，決定了戰爭的前途和此后的歷史進程。過去的世界和塑造這世界的種種觀念，如同凡爾哈倫故我的靈魂一樣，也在8月和以后歲月的長廊里消失了。過去人們曾寄希望于社會主義四海一家的思想以及財政、貿易和其他經濟因素交織成的種種遏止力量，會使戰爭欲爆發而不能，但事到臨頭它們卻沒有起到作用。國家觀念猶如狂飆突起，把它們橫掃在一邊。

人們懷著不同的心情和各種各樣的想法投入戰爭。交戰國中有些人，如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他們從心底里反對戰爭；但有一些人，像魯伯特·布魯克[[1]](#_1__Lu_Bo_Te__Bu_Lu_Ke__Rupert_B)，則是歡迎戰爭。他不感到有瀆上帝，而在《1914年》的詩里寫道：“現在該感謝上帝，他賜我們以天時。”對于布魯克，時代似乎——

轉變了，好似游泳人，躍身入清澈，

欣然離開這已老朽、冷酷和萎靡的世界……

榮譽已歸來……

高尚的風格又闊步在我們的大道上，

我們終于回到了我們的傳統。

德國人有著類似的情感。托馬斯·曼（Thomas Mann）寫道，戰爭是“一種純化，一種解放，一個巨大的希望。德國的勝利將是精神戰勝數量的勝利”。他解釋說：“日耳曼精神是同和平主義者的文明理想對立的，難道和平不是社會腐化的一個因素嗎？”這個概念，是德國軍國主義的基本理論——戰爭使人高尚說——的寫照，跟魯伯特·布魯克的戰爭狂熱幾乎不分軒輊，且在當時為眾多的知名人士所信奉，西奧多·羅斯福就是其中之一。到1914年，除邊緣地區的幾次巴爾干戰爭外，歐洲大陸已有一代人以上的時間不以兵戎相見了。一個觀察家認為，對戰爭持歡迎態度是由于有些“不知不覺地厭倦和平”。

布魯克崇尚清澈和高尚風格，而曼則注目于一個更明確的目標。他說：德國人是全世界最有教養、最守法律、最愛和平的民族，理應成為最有權勢的民族，理應統治世界，理應通過“這場不論怎么說都有理由稱之為德國的戰爭”建立一個“德意志和平”。這雖寫于1917年，但他所反映的則是1914年。1914年該是德國的1789年[[2]](#_2__1789Nian__Fa_Guo_Da_Ge_Ming)，該在歷史上確立德意志意識的地位，使德國文化登上寶座，完成德國使命的一年。8月，在亞琛的一個咖啡館里，一個德國科學家跟美國記者歐文·科布說：“我們德國人是歐洲最勤勞、最誠摯、最有教養的民族。俄國代表反動，英國代表自私和背信棄義，法國代表墮落，只有德國代表進步。德國文化將照耀全球，戰后不會再有其他文化了。”

同桌的一個德國商人則有更為明確的目標：應叫俄國喪盡權勢，使斯拉夫人再也不能成為威脅歐洲的危險；英國應化為齏粉，應使它喪失海軍和印度、埃及；法國應繳付一筆使它永遠恢復不了元氣的戰爭賠款；應迫使比利時放棄其沿海地區，因為德國需要英吉利海峽的港口；日本也應在適當時候受到懲罰。“歐洲所有的條頓民族、斯堪的納維亞民族，連同保加利亞人”結成的聯盟，“將握有從北海到黑海的絕對統治權。歐洲將有一幅新地圖，德國將處于這幅地圖的中心”。

這種論調，在戰前談了多少年，沒有為德國增加分毫好感。貝特曼―霍爾韋格承認，由于經常公開聲言德國領導世界的權利，“我們就常常搞得天下六神不安”。這是因為，他解釋說，被人說成是醉心于統治世界，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種“孩子氣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感情沖動”。

然而，世界并未如此看待它。德國人的調子里有著刺耳之聲，流露的是威脅而不是感情沖動。對于德國的刀光劍影，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先生在1914年寫道：整個世界“又頭痛又厭煩”。“我們給普魯士軍國主義及其對我們的蔑視，對人類幸福和常識的蔑視，折磨得忍無可忍，我們只好群起而攻之。”

有些人起來反抗德國軍國主義，他們對問題具有明確的認識，至少他們自信是這樣的；而有些人，對于他們之所以反對只有極其模糊的概念；還有一些人則是完全不知所以。赫伯特·喬治·威爾斯[[3]](#_3__Wei_Er_Si__Herbert_George_We)先生屬于第一種類型。他在8月4日的報刊上宣稱：敵人是德國帝國主義和德國軍國主義，是“1870年產生的可怕的虛榮、自負”。德國的“鐵血政策，耀武揚威的條頓式的吉卜林[[4]](#_4__Ji_Bu_Lin__Joseph_Rudyard_Ki)主義”的勝利，將意味著“戰神將永遠主宰著人類的一切事務”。德國的失敗“也許”能——威爾斯先生沒有說“必將”——“為全世界的裁軍與和平開辟道路”。一個英國后備役軍人對問題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去兵站的火車上，他對一個旅伴說：“我是去打該死的比利時人的，我現在就是到那里去的。”在通往蘇瓦尼的那條路上打死第一批德國人的那個騎兵中隊隊長、陸軍少校湯姆·布里奇斯（Tom Bridges）爵士，就是第三種類型的人了，只是打仗手癢而根本不問戰爭目的。“對德國沒有什么仇恨，”他說，“我們本來是準備打任何人的……而且本來也會同樣毫不遲疑地去打法國人的。我們的格言是‘我們一定要干。干什么，不管它’。”

法國既有老賬要算，也就無須作自我辯解，何況德國人兵臨城下已足以說明問題。不過，這里也有人抱有“巨大希望”。柏格森就認為，雖然協約國的最后勝利需要作出“可怕的犧牲”，但是通過這些犧牲，隨同“法國的復興和擴大，將出現歐洲道德的新生。那時真正的和平降臨了，法國和全人類就可以重新邁步前進，勇往直前，走向真理和正義”。

這些并不是政治家們公開表示的觀點，也不是群眾的集體意見，而只是某些人的個人見解，而且這些個人見解也還沒有像日后那樣成為定見。對德國的民族仇恨還沒有扎根。見于《笨拙》周刊8月12日一期關于戰爭的第一批而且是最令人難忘的漫畫中，有一幅題為《禁止通行》的漫畫，畫的是英勇的小小的比利時——一個穿著木屐的男孩子，鐵板著面孔，擋住德國侵略者的去路。德國被畫成一個樂隊指揮，一個胖胖的老頭兒，口袋外掛著一串香腸。他看上去很滑稽，但不可惡。另一方面，在前些日子，漫畫家們筆下的寵兒是王儲，他們總愛把他畫成一個浮夸的花花公子，緊身背心，又高又緊的硬領，不同一般的帽子，一副傻里傻氣的蠢相。但他好景不長，戰爭局勢嚴重了，他被德國最出名的人物代替了。此人是最高統帥，統帥部的每份命令都要署他的名字，所以看來他像是德國一切行動的主宰——他，就是德皇。他現在也不再被畫成戰前那個惹是生非的黷武主義者了，而被畫成一個陰森森的、魔鬼似的暴君，散發著殘酷惡毒的氣息，每一線條都顯示了他的殘忍。這種變化始于8月，從布里奇斯的那種“對德國沒有仇恨”的冷靜說法以后，逐步地發展到斯蒂芬·麥克納[[5]](#_5__Si_Di_Fen__Mai_Ke_Na__Stephe)的另一種說法。后者在1921年寫道：“對那些記憶猶新的人，德國人的名字叫人惡心。德國人的出現叫人憤恨。”麥克納不是冒充英雄的超級愛國主義者，而是一位清醒的、有頭腦的教師。他的回憶錄是那時代的一部社會文獻。他記載了當時的情緒變化，也就是這種變化終于堵塞了任何和談的道路，把戰爭一直進行到全面勝利為止。而造成這種情緒變化的正是比利時的遭遇。

比利時事態的演變是德國恐怖論的產物，克勞塞維茨曾把恐怖規定為縮短戰爭的正當手段。他的整個戰爭理論的基礎是必須快打、猛打和決戰。不讓平民百姓感受到戰爭影響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們感到戰爭壓力，并且要以最嚴厲的措施，迫使他們強迫他們的領導人媾和。戰爭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敵人的武裝，“我們就必須置敵人于繼續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難以忍受的境地”。這個似乎言之成理之談，完全適合德軍總參謀部的杰出的人才在整個19世紀所嘔心構思的那種科學的軍事理論。這在1870年法國人在色當之戰以后奮起抵抗的時候，就已付諸實踐。當時德國以法國人進行“自由射手”戰的罪名殺害俘虜和百姓的殘酷報復行為，曾使全世界在欽佩普魯士為時六周就已取得勝利的奇跡的同時，為之震驚，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認識了德國人的人面獸心。雖然1870年已經證實恐怖理論及其實踐所造成的后果，即加深對立、激發抵抗，最后是延長戰爭，但是德國人對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蕭伯納所說，他們是無視常識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貼出了由馮·比洛將軍簽署的告示，宣稱：默茲河畔靠近那慕爾的昂代訥（Andenne）小鎮，其居民以極其“陰險”的方式襲擊他的部隊，“經我同意，統率該部的將領已將該鎮化為灰燼，并槍決了110人”。這就是告訴列日居民，讓他們懂得如果按他們的鄰居那樣行事，等待他們的將是怎樣的命運。

昂代訥的焚毀和大屠殺——據比利時估計被害221人——是在8月20日和21日沙勒魯瓦戰役期間發生的。比洛手下的司令們，既要遵守時間表，而又受到比利時人炸毀橋梁和鐵路的騷擾，于是就對他們所到的村莊進行無情的報復。跟昂代訥鎮隔河相望的塞耶（Seilles），有50名百姓被殺，許多住家遭到恣意搶劫和燒毀。塔明是在8月21日被攻陷的，當晚，戰斗一結束，洗劫便開始了，搶了整整一夜和整個第二天。通常在準許搶劫任其恣意妄為的情況下，隨同發生的是酗酒，約束松弛，并把士兵引導到所希望于他們的那種野性發作的地步，以遂其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圖。塔明鎮淪陷第二天，約400名公民在士兵監視下被趕到教堂前的大廣場，行刑隊先是有計劃地向這群人開槍，槍聲停后，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塔明公墓中384個墓碑上刻著：“1914年被德國人槍殺”的墓志。

比洛的軍隊拿下3.2萬人口的城市那慕爾后，便張貼通告，宣布：已從每條街取得10名人質，倘有人向德國人開槍，就將槍斃這些人質。人質的取得和殺害，像征收食品那樣在有計劃地進行。德國人越向前推進，逮捕的人質就越多。最初，馮·克盧克的部隊每到一城鎮，便立即貼出布告，警告居民說，市長、首席法官和地區參議員均已被扣作人質，并照例警告說，他們的命運將如何如何。

不久，三個有名望的人作為人質不夠了；每條街一個人，甚至每條街10個人也都不夠了。在馮·克盧克軍隊任后備軍官的小說家瓦爾特·布勒姆（Walter Bloem）——他寫的有關進軍巴黎的報道是非常有價值的——告訴我們，在他的連隊住宿的那些村莊里，“馮·克萊斯特少校”每夜都要“下令按戶取一人質，沒有男的，就要女的”。這種辦法有其特有的致命傷，所以越是恐怖，似乎就越需要恐怖。

每當鎮上一有狙擊的報告，這些人質就立即被處決。馮·克盧克部隊的歐文·科布曾從窗口看到兩個平民押在兩排上了刺刀的德國兵中間，被帶到火車站后面。一陣槍聲后，兩副擔架抬著一動不動的人體出來了，上面蓋著毯子，只有他們硬直的靴尖露在外面。科布還看到了兩次同樣的情況。

維塞是德國入侵第一天在去列日的路上打第一仗的地方。它被摧毀了，但不是被剛從火線上下來的部隊摧毀的，而是在戰爭向前推進好多時以后被占領軍摧毀的。8月23日，德軍一個團從列日調到維塞來了，這是對一份狙擊報告作出的反應。當夜，在荷蘭境內五英里的埃斯登（Eysden）都可以聽到槍聲。第二天，埃斯登就被4000名難民的洪流淹沒，維塞的居民，除了被槍殺的和被送到德國去為他們收割農作物的700名男人和男孩外，全部涌來了。放逐是從8月開始的，這在道義上，尤其在美國，激起了很大的反響。美國公使布蘭德·惠特洛克后來在訪問維塞時，見到的只是被燒黑了的斷壁殘垣，“一片廢墟，可能就是當年龐貝的景象”。不見人影，不見有生命之物，不見屋頂。

8月23日，在默茲河畔的迪南，馮·豪森將軍的薩克森士兵正在同法軍作沙勒魯瓦戰役的最后一戰。馮·豪森親眼看到了比利時居民阻礙修建橋梁的“不顧信義”的行為“是嚴重違犯國際法的”。他的部隊于是開始行動，捉了“幾百”名人質，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禮拜天，有50人是從教堂里抓走的。這位將軍看見“這些人在擲彈兵的監視下，擠作一團，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躺在地上，臉上流露著恐懼和難以言狀的痛苦，并顯示了強烈的憤怒和為遭受的災難激起的復仇心情”。馮·豪森是個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們在發泄著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時一個紳士家里給弄得很不愉快的那個將軍，吃飯的時候，那個紳士就是兩手捏著拳頭插在口袋里拒不同他交談。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個負傷的法國士兵，頭上在淌血，躺在那里快死了，一聲不響，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絕任何治療。馮·豪森到此結束了他的敘述。他很敏感，沒法談迪南公民的下場。事實上，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廣場上，傍晚之后被排成兩隊，女人在一邊，男人在她們對面分成兩行，前一行的人跪著。兩個行刑隊開到廣場中間，各向一方射擊，直到沒有一個站立的目標為止。經驗明埋葬的尸體計612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個星期的費利克斯·菲韋（Felix Fivet）。

接著便縱使薩克森兵大肆騷擾、搶劫、放火。曾經保衛過這個城市的中世紀城堡，像鷹巢似的聳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視著中世紀的破壞掠奪的重演。薩克森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礫遍布，坑坑洼洼，灰燼滿地，了無生意。馮·豪森將軍對部下造成的這種慘無人煙的情景“深為觸動”。他撤出迪南這堆廢墟時則確信責任在于比利時政府，是“它同意這種違背國際法的不顧信義的街道狙擊戰的”。

德國人對違反國際法的關注囿于謬見。他們完全無視他們在比利時的存在的非法性，而著眼于把比利時人反抗他們的存在視為違法行為。德意志帝國國會的阿爾薩斯議員——韋特萊神父，一次曾以長期隱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認說：“在拉丁語學校養成的頭腦，是很難理解德國人的心理的。”

德國人的囿于謬見有兩個方面：一是認為比利時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認為他們的反抗是由“上層”組織起來的，是由比利時政府或是市長、神父以及其他可列為“上層”的人物組織起來的。把這兩個方面歸結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德國人的報復行為，不論程度如何，都是正當的、合法的。槍殺一名人質，或是屠殺612人，或是把一個城鎮夷為平地，都得一律歸罪于比利時政府——這就是從迪南事件以后的豪森到盧萬事件以后的德皇，每個德國人都是這么說的。豪森一貫聲稱：責任必須“由那些煽動居民起來反抗德國人的人承擔”。他還堅持說：毫無疑問，迪南和其他地區的全體居民“是由阻止德國人前進的愿望所驅使的——那又是誰下的命令？”；沒有“上層”命令的驅使，人民竟會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難以想象的。

德國人到處看到這些命令。馮·克盧克聲稱，比利時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采取敵對行為的公告，實際上是“煽動平民百姓向敵人開火”。魯登道夫譴責比利時政府“有計劃地組織平民戰爭”。王儲對法國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樣的理論。他指責隆維地區“狂熱”的人民用著“巴黎特地送來的”獵槍“奸詐而不顧信義地”從門窗里向他們射擊。在法國農村，星期日打野兔的獵槍，就像穿的褲子那樣，是件普普通通的東西。如果這位殿下的旅行也包括了解法國農村的話，那他就會知道是用不著巴黎送槍來武裝自由射手的。

德國人在談論他們在敵人境內的經歷的時候，一談到游擊戰問題，就歇斯底里大發作，出言刺耳了。魯登道夫說游擊戰是“可憎的”。這個時過不久其大名就成了欺詐、暴行、狡獪的別稱的魯登道夫，自稱他是“帶著騎士的、人道的戰爭觀念”上陣的，可是自由射手的手法“使我本人的幻想痛遭破滅”。布勒姆上尉兩周以前自己還是個平民，可是卻為一種“可怕的想法”弄得終日惶惶不安，他想他可能會被一個平民一槍擊中或是打死。他報道說，在一天28英里的精疲力盡的行軍中，沒有一個士兵掉隊，因為他們“認為落到瓦隆人手中要比腳痛更糟糕”——腳痛是向巴黎進軍的另一個極大的痛苦。

對自由射手的害怕和恐懼，是出自德國人認為平民百姓的反抗基本上是目無法紀的想法。歌德曾說，假如在不講正義和目無法紀兩者之間可以選擇的話，德國人寧愿選擇前者。一個在臣民對君主的關系以服從為唯一基礎的國家訓導出來的人，對一個建立在其他基礎上的國家是無法理解的，所以當他來到這樣一個國家的時候，他會感到很不自在。只有在權威面前才感到舒服的人，是會把平民狙擊手視為禍害之尤。在西方人心目中，自由射手是英雄；而在德國人，則視為威脅國家生存的異端。在蘇瓦松（Soissons），有一座紀念1870年喚起學生和平民起來反抗普魯士人的三位教師的青銅和大理石的紀念碑。1914年，一個德國軍官驚奇地凝視著這塊紀念碑，對一個美國記者說：“你瞧，法國人就是這樣，竟為自由射手樹碑立傳。在德國，是不允許人民干這種事的，也不能想象他們想干這樣的事。”

為了使德國士兵處于適宜的精神狀態，據布勒姆上尉的記載，從第一周起，德國報紙就充滿了關于比利時人“反抗的殘酷行為”的種種故事，“……武裝的教士帶領著一幫一幫搶劫掠奪的市民，無惡不作……奸詐陰險地伏擊巡邏兵，哨兵的眼睛被挖，舌頭被割”。類似的“恐怖傳聞”早已傳到柏林，布呂歇爾公主已在8月11日寫進了日記。她向一個德國軍官核實情況時，那個軍官對她說，當時亞琛就有30個德國軍官被比利時婦女和兒童挖掉了眼睛，躺在醫院里。

被這種種故事激起的情緒，是很容易使德國士兵猖狂的，只要大叫一聲“狙擊手！”，他們便會大肆搶劫掠奪，殺人放火，而軍官們則毫不加以管束。施行暴虐，其意圖就在于不派駐占領軍而能起到與占領軍同樣的作用。最高統帥部要從進軍巴黎的部隊中抽調部隊擔任占領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8月25日，火燒盧萬開始。盧萬坐落在列日到布魯塞爾的公路上，以其大學和無與倫比的圖書館著稱于世，是座中世紀城市，建于1426年，那時，柏林還只是一片木棚。設在14世紀織布工人大廳里的圖書館，藏書23萬卷，其中有世所罕見的收藏品——750份中世紀的手稿和1000多冊古版書。稱為“哥特式藝術珍寶”的市政廳的門墻上的一組石刻騎士、圣人、貴婦人的圖案，即使在同類的雕刻中，也堪稱精彩。圣伯多祿教堂（Church of St. Pierre）祭壇鑲板上的繪畫系出自迪里克·布茨[[6]](#_6__Di_Li_Ke__Bu_Ci__Dierik_Bout)及其他佛蘭德大師之手。盧萬的火燒、搶劫，連同對平民的槍殺持續了六天，其后就與開始時一樣突然停止了。

盧萬剛被占領時，一切都很平靜。商店生意興隆。德國士兵的舉止行動堪稱模范，買明信片，買紀念品，買什么都付錢，并且在理發店和普通顧客一起排隊理發。第二天，情況比較緊張了，一個德國兵腿上中了一槍，據說是狙擊手干的。市長趕緊再次號召市民繳出武器。他和另兩名官員被捕作為人質。在火車站后面殺人成了常事。馮·克盧克的小分隊沉重的腳步聲日復一日地在市內不停地響著。

8月25日，駐在安特衛普壁壘森嚴的防地邊緣的梅赫倫比軍，對馮·克盧克軍的后衛部隊進行了一次猛烈的突然襲擊，把他們沖得潰不成軍，退回了盧萬。天黑以后，就在退卻的混亂之中，一匹無騎士的戰馬，闖過幾道門跑掉了。另一匹馬受驚，欲脫韁而不得，帶著挽具摔倒下來，拖著的車子也翻了。槍聲響了，引起了“法國人來啦！英國人來啦！”的叫喊聲。后來，德國人聲稱是比利時平民向他們開火，又說是平民在屋頂上開槍向比軍發信號。但比利時人聲稱是德國兵在黑暗中自己打自己。在這震驚全球的事件發生之后，特種法庭對肇事的原因進行了經年累月的調查，德國的控訴遭到比利時反訴的駁斥。究竟是誰打誰的問題始終沒有定案。這反正與后來發生的事件無關，因為德國人火燒盧萬，不是作為對所謂比利時人的不軌行為的懲罰，而是作為對他們所有的敵人的一種威懾和警告——一種在全世界面前顯示德國威力的姿態。

布魯塞爾新市長馮·呂特維茨（von Luttwitz）將軍在第二天上午就表達了這個意思。在美國和西班牙公使前來公務訪問時，他對他們說：“盧萬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們在那里的一位將軍被市長的兒子開槍射中了。居民向我們的部隊開了火。”他停了一停，看了看來訪的人們，最后說：“現在，我們當然也就不得不毀滅這座城市了。”惠特洛克先生后來經常聽到這個或那個德國將軍被市長的兒子——有時被市長的女兒——開槍射中的故事；所以在他看來，比利時人肯定把市長的孩子培育成一批像中世紀在敘利亞專事暗殺的秘密教派那樣的特殊人物。

盧萬被焚的消息早已傳開。逃出來的那些嚇得不知所措、哭哭啼啼的難民，向人們訴說了德軍逐條街縱火和野蠻地搶劫、不斷抓人殺人的暴行。8月27日，當時正在比利時的美國記者之星——理查德·哈丁·戴維斯，乘軍用火車來到盧萬。德國人把他鎖在車廂里，但那時，大火已燒到車站對面的蒂勒蒙（Tirlemont）大街，他可以看到一排排房子上升起的“筆直的火柱”。德國兵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為。一個士兵從關著另一個記者阿諾·多施（Arno Dosch）的車廂里把頭伸出窗口大叫著：“三個城市夷為平地啦！三個！還會有更多的！”

8月28日，美國公使館的一等秘書休·吉布森在瑞典和墨西哥的同僚們的陪同下，去盧萬親自察看了情況。墻黑木焦的房屋還在燃燒，路面發熱，灰燼遍地；到處躺著死馬死人。一個白胡子平民老頭兒就這么臉朝天地躺在太陽里。許多尸體已經發腫，顯然已死了好多天。各種毀壞了的東西以及家具、瓶子和撕破了的衣服，還有一只木屐，扔在灰燼里。德國第九后備軍的士兵，有的喝醉了，有的緊張不安、愁眉苦臉、滿眼血絲，在把居民從殘存的屋子里趕出來，正如他們告訴吉布森的那樣，這樣就可以徹底毀滅這座城市。他們從一幢房子跑到另一幢房子，破門而入，搶著貴重的東西，口袋里塞滿了雪茄煙，然后揮舞火把。房屋主要是磚石結構，火蔓延不開來。一個主管軍官在街上看得發愁，抽著雪茄煙。他恨透比利時人，反復對吉布森說：“我們一定要把它毀掉，絕不會有一塊磚石還砌在另一塊磚石上！——你聽著，一塊也不會。我們要教導他們尊重德國。人們將世世代代到這里來看看我們干了些什么！”這就是德國人讓人永世不忘他們的方式。

在布魯塞爾，由美國人設法營救出來的大學校長德貝克爾（de Becker）主教，敘述了圖書館被燒的情景。圖書館被燒得蕩然無存，全部化為灰燼。當他要說“圖書館”這個詞時，已不能出聲。他停了一下，想再說時，剛說到前兩個音就說不下去，撲在桌上哭了。

這一損失，成了比利時政府公開抗議的主題，美國公使館也作了官方報道，當烈火還在熊熊燃燒的時候，就已引起整個世界的憤怒聲討。外國報刊以大量篇幅登載著難民親眼目睹的種種事實和記者們所作的報道。除了大學和圖書館外，“所有宏偉壯麗的公共建筑”，包括市政廳以及圣伯多祿教堂及其所有繪畫，據說也已全部被破壞無遺；只是到后來才發現，市政廳和教堂雖已損壞，但還屹立著。《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在戴維斯的報道上面列了一條醒目的大標題：《德國人洗劫盧萬；婦女、教士遭槍殺》，在“柏林證實在盧萬的恐怖行為”的副標題下，刊登了德國駐美使館散發的一份柏林廣播聲明，說是由于比利時平民“不顧信義”的襲擊，“盧萬才受到全城毀滅的懲罰”。這跟馮·呂特維茨將軍的說法完全一樣，表示柏林不希望世界各國誤解他們在盧萬的舉動的性質。毀滅城市，蓄意并直認不諱地向平民發動戰爭，對于1914年的世界來說是駭人聽聞的觀念。在英國，一些社論宣稱，這是“匈人的進軍”，是“對文明的背叛”。《紀事日報》（Daily Chronicle）說，火燒圖書館不僅是對平民的戰爭，“而且是對子孫萬代”的戰爭。甚至連慣常保持沉默、小心保持中立的荷蘭報紙也奮起仗義執言。鹿特丹《新聞報》（Courant）說，不論肇事原因為何，但“全城被毀事實俱在”，而且是個“可怕的”事實，“全世界聞此消息定必毛骨悚然”。

這些報道見于8月29日外國報刊之后，盧萬的焚毀于8月30日告終。8月30日這天，德國外交部還發出了一份正式公報，一口咬定，“事件的全部責任在于比利時政府”，并且沒有忘記那種慣常的說法：“婦女和女孩都參加了戰斗，挖了我們傷兵的眼珠，使他們成為瞎子。”

為什么德國人要這樣干？全世界人們都在提這個問題。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在給他從前的朋友、德國文豪格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一封公開信中責問道：“你們是歌德的后代還是匈人王阿提拉的后代？”比王阿爾貝在同法國公使的交談中認為，德國人這樣干主要是出于他們的自卑感和嫉妒心。他說：“這些人心懷妒忌，精神失常，脾氣急躁。他們焚毀盧萬的圖書館，只是因為它是舉世無雙和舉世稱道的。”——換句話說，這是野蠻人對文明事物泄憤的一種表示。這個解釋，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忽視了德國人《作戰守則》中有關蓄意使用恐怖手段的規定。該守則寫道：“進行戰爭，不能僅針對敵國的戰斗人員，還必須設法摧毀敵方的全部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這對全世界永遠是一種野蠻人的姿態。德國人原來意圖以此恐嚇世界，誘使其屈服，結果卻反而使很多人深信他們有一個不能與之和解、與之妥協的敵人。

比利時的遭遇使問題清晰化了，對許多人來說，比利時也成了戰爭中“最重要的問題”。在美國，據一位當代歷史學家回顧說，比利時問題是各種觀點的“沉淀劑”，而火燒盧萬則又是比利時問題的頂峰。在德國不得不開始政治宣傳工作之后，不久就要負責這一工作的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曾感到比利時“幾乎喚起了整個世界來反對德國”。他的反駁論點——從軍事需要和自衛出發論證德國舉動的正當性，正如他勉強帶著幾分遺憾所承認的那樣，說服力是“不夠充分的”。

盧萬事件后十天，德皇在致威爾遜總統的電報中聲稱，對于“比利時人的野蠻罪行所造成的”比利時的災難，“我感到痛心”。他還解釋說，比利時人的反抗是由他們的政府“公開煽動”和“周密組織起來的”，這就迫使他的將軍們不得不采取最強硬的措施來對付這批“嗜血成性的居民”。可是德皇采取的這個攻勢，并沒有為他帶來什么好處。

德國93名教授和其他知識界人士的《致文明世界》（To the Civilized World）的聲明也幫不了什么忙。聲明宣揚了德國文化對文明所起的作用，并聲稱：“說我們違法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是不正確的。……說我們的軍隊野蠻地毀壞了盧萬也是不正確的。”不管這些簽名的人——哈納克（Harnack）、蘇德曼（Sudermann）、洪佩爾丁克（Humperdinck）、倫琴（Roentgen）、霍普特曼——是多么顯赫，但圖書館沉默的灰燼則作了更響亮的回答。到8月底，協約國的人們已經相信，他們面臨的是個必須被打垮的敵人，必須被摧毀的政權，必須要血戰到底的戰爭。9月4日，英、法、俄三國政府簽訂了《倫敦條約》，三國承諾“在當前這場戰爭中不單獨媾和”。

此后，問題就僵化了。協約國越是公開聲明它們的目的是要摧毀德國軍國主義和霍亨索倫皇族，德國便越是公然宣揚不獲全勝絕不收兵的誓言。對于威爾遜總統愿意從中斡旋的提議，貝特曼―霍爾韋格復稱，《倫敦條約》已迫使德國不得不戰斗到它能忍受的限度，所以德國不會提出任何作為和談基礎的建議。而協約國也持同樣立場。因此，在此情況下，雙方只好繼續鏖戰到底。交戰國雙方陷入戰爭越深，它們付出的生命和財富越多，它們想在打出頭的日子謀取補償的決心也越堅定。

德國所期望的勝利果實，在戰爭開始后三十天中，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擬就的于9月2日交給政府的一份備忘錄里就已作了規定。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身為天主教中央黨領導人和軍事委員會的起草報告人，是首相的左右手和首相在帝國國會中最親密的朋友。他是個機靈、能干、善于投機取巧的人物，什么觀點占優勢，他就是什么觀點的代表。他之善于把才干和智慧同政治靈活性結合運用，在歐洲是塔列朗[[7]](#_7__Ta_Lie_Lang__Talleyrand_Peri)之后所未見的。據說他“沒有定見，只有貪心”，既然有朝一日會使自己成為德國請求停戰的使者，并為魏瑪共和國第一屆內閣效勞，現在他也就可以開列一張會使最極端的泛德意志主義者得意洋洋的戰爭目標清單。信賴他的貝特曼一直感到驚奇，不知埃茨貝格爾的所有妙想從何而來，而貝特曼本人則似乎從來沒有想出個什么門道來。

按埃茨貝格爾的妙想，德國必須利用勝利，“永遠”控制歐洲大陸。和談桌上的所有要求，必須從這個前提出發，要實現這個前提，后列三個條件——廢除德國毗鄰國家的中立，結束英國在世界事務中“令人難以容忍的霸權”，肢解俄國巨人——是必不可少的。埃茨貝格爾設想了一個跟后來國際聯盟的委任統治制度相似的歐洲聯邦。一些國家將由德國“指導”；其他國家，諸如波蘭以及從俄國兼并過來的波羅的海諸國，將“永遠”置于德國君權之下，它們在帝國國會中可有其議員，但沒有表決權。至于比利時，把它放在哪一類為宜，埃茨貝格爾還沒有拿定主意，但不論怎樣，德國將保持對整個比利時的軍事控制，而且還將保持對敦刻爾克直到包括布洛涅和加來在內的法國沿海地區的軍事控制。德國還將獲取它在1870年沒有得到的布里埃―隆維鐵礦和上阿爾薩斯的貝爾福。它還將取得法國、比利時在非洲的殖民地。不過摩洛哥，說也奇怪，竟不在其列，可能是因為那兒將消耗德國過多的力量的緣故。關于英國的殖民地，則沒有提及，這使人感到埃茨貝格爾當時可能是在考慮同英國進行談判解決問題。在賠款方面，戰敗國必須至少償付10萬億馬克的直接戰爭費用，另加上足敷退伍軍人基金、公共住房建筑、給將領和政治家們的饋贈，以及清償德國全部國債之用的款項，從而豁免以后多年德國人民的稅款。

在8月征戰勝利得意忘形的日子里擬訂的這些戰爭目標，表明德國的戰爭目標非常宏大，已大到以后無法降低水平去進行任何可行的妥協。協約國方面最初的戰爭目標，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曾于8月20日在圣彼得堡與帕萊奧洛格秘密會晤時向他作了說明。他說：“我的方案很簡單，我們一定得摧毀德國軍國主義。”他們同意這次戰爭是一場謀求生存的戰爭，而且只有取得徹底勝利才能達到這個目標。作為沙皇專制政體的一個大臣未免有嫌魯莽的薩佐諾夫還同意，如想不使德皇主義死灰復燃，就必須對德國進行徹底的政治變革。波蘭必須復國，比利時必須擴大，阿爾薩斯―洛林必須歸還法國，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必須歸還丹麥，漢諾威必須重建，波希米亞必須從奧匈帝國手中解放出來，德國所有的殖民地必須交給法國、比利時和英國。

這些是職業政治家們刻畫的地圖。而對分不清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波希米亞的平民，則在戰爭進行了二十天的時候，內心深處形成了一個潛在的意識：世界給“法國革命以來最大的人間事件”纏住了。雖然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但在8月里，在這場災難還剛開始的時候，它似乎已蘊藏著“巨大的希望”——一個以后情況會有所好轉的希望，一個戰爭會從此消失、世界會有機會得到改造的希望。威爾斯小說里的布里特林（Britling）先生，雖是個虛構的人物，但頗有代表性。這位先生認為，戰爭可能被證明是“人類生活向前大大邁進的一步。它是四十年懸而不決的罪惡局面的結束。它既是危機，也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位先生看到了“一個極大的機會。……我們能夠修訂世界地圖……世界是可塑的，人們想把它搞成什么樣子就成什么樣子。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時代的開端……”。

注釋

[[1]](#_1_16) 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1887—1915），英國詩人，所著十四行詩集《1914年》聞名于世。——譯注

[[2]](#_2_13)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推翻了封建王朝，從而揭開了世界歷史的新時代。——譯注

[[3]](#_3_12) 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國作家，早期寫的科學幻想小說（如《隱身人》等）主張依靠技術力量逐步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后來發表的長篇小說（如《巴海姆先生的獨裁政治》等）反映出作者對法西斯勢力日益猖獗的憂慮。——譯注

[[4]](#_4_6) 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作家，生于印度。他的創作描述英國殖民地生活，宣揚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鼓吹種族主義思想。——譯注

[[5]](#_5_2) 斯蒂芬·麥克納（Stephen McKenna，1888—1967），英國小說家。——譯注

[[6]](#_6_2) 迪里克·布茨（Dierik Bouts），荷蘭古代的畫家，約生于1410—1420年間，1475年死于盧萬。——譯注

[[7]](#_7) 塔列朗（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法國外交家，以權詐多變聞名。——譯注

The quotations on these pages, with three exceptions, are taken from the books by the persons quoted, listed under SOURCES, as follows: Verhaeren, Dédicace, unpaged; Cobb, 176–7; Bethmann-Hollweg, 95; Shaw, 37; Bridges, 73; Bergson (Chevalier), 24; McKenna, 158; Clausewitz, I, 5. The statement by Thomas Mann is from his “Reflections of a Nonpolitical Man,” 1917, qtd. Hans Kohn, The Mind of Germany, New York, 1960, 253–5. H. G. Wells is quoted from NYT, August 5, 3:1. “I'm a'goin’ to fight the bloody Belgiums” is from Peel, 21.

比洛將軍簽署的告示：facsimile in Gibson, 324.

昂代訥、塞耶和塔明的大屠殺：Apart from Belgian sources, the most complete firsthand record of these events is that of the American Minister, Mr. Whitlock, in his chapters xxx, “Dinant”; xxxi, “Namur, Andenne and Elsewhere”; xxxii, “Tamines”; and xxxiii, “Man Hat Geschossen.” For estimated total of civilians shot in August, see Encyc. Brit., 14th ed., article “Belgium.”

在那慕爾從每條街取得10名人質：Sutherland, 45.

布勒姆關于人質的記述：34.

科布從窗口看到的情況：104.

維塞：NYT from Maestricht, August 25, 2:2; Whitlock, 198.

豪森對迪南情況的記述：167–70. 612 dead: Gibson, 329. For description of Dinant after the destruction, Cobb, 409–10.

本頁所引用的話來自以下資料：Wetterlé, 231; Kluck, 29; Ludendorff, 37; 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41–2, 50; Bloem, 28, 32, 20, Blücher, 16, 26.

歌德：qtd. Arnold Zweig, Crowning of a King, N.Y, 1938, 306.

“你瞧，法國人就是這樣”：Cobb, 269.

一匹無騎士的戰馬引起恐慌：Whitlock, 152.

呂特維茨：“盧萬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ibid.

理查德·哈丁·戴維斯：qtd. Mark Sullivan, Our Times, V, 29; Arno Dosch in World's Work, Oct. and Nov, 1914.

美國公使館的一等秘書休·吉布森去盧萬察看情況：154–172.

德貝克爾主教：Whitlock, 160.

鹿特丹《新聞報》及其他報章的報道：NYT, August 30.

德國外交部的正式公報：ibid., August 31.

比王阿爾貝語：Poincaré, III, 166.

德國《作戰守則》：52.

比利時成為戰爭中“最重要的問題”：Wile, Assault, 115. “Precipitant”: Mark Sullivan, loc. cit.

埃茨貝格爾語：23.

德皇的電報：NYT, Sept. 11.

德國93名教授和其他知識界人士的《致文明世界》的聲明：text in Literary Digest, Oct. 24, 1914.

貝特曼―霍爾韋格給威爾遜總統的回復：NYT, September 18, 1:4.

“沒有定見，只有貪心”：Wetterlé, 144.

貝特曼―霍爾韋格對埃茨貝格爾一番妙想的反應：Bülow, III, 235.

埃茨貝格爾的備忘錄：Among others to whom Erzberger sent it was Grand Admiral von Tirpitz, who published it after the war in his Politische Dokumente, Hamburg, 1926, III, 68–73. See also Karl Epstein, Matthias Erzberger, Princeton, 1959, chap. v.

“法國革命以來最大的人間事件”：Frank H. Simonds in “1914—the End of an Era,” New Republic, Jan. 2, 1915.

## 第17章　大海、封鎖、強大的中立國

冒風險的念頭，1914年在英國海軍部里是最不得人心的。英國的艦隊是英國最珍貴的財物。丘吉爾在1912年曾存心挖苦德國海軍，說它是一支“奢侈品艦隊”，而英國艦隊，則不是如此。它是生存的必需，“生存”一詞確是言之不虛的。海軍打了敗仗，或是甚至由于艦只的損失而失去海軍優勢，英國便活不下去。海軍負有重任，它必須捍衛不列顛諸島免受入侵；它必須護送英國遠征軍平安抵達歐洲大陸；它必須把軍隊從印度運回本國以充實正規軍，再把本土軍送去接替海外駐軍；更重要的是，它必須確保海上貿易在全世界各大洋上通行無阻。

英帝國國防委員會業已宣布，入侵英國是“辦不到的”，海軍部也認為入侵并不是主要危險，“貿易被迫中斷，航運瀕于毀滅”才是主要危險。英國有三分之二的糧食是進口的。它的生計依靠由英國貨船所承運的對外貿易。英國商船在世界總噸位中占到43%，而且承運了世界海運貿易總額半數以上的商品，相當于世界其他國家承運量的總和。戰前，英國老是為德國的快速商船有朝一日可以改裝為襲擊商船的驅逐艦而寢食不安。預計德國至少可以拿出40艘這樣的商船來協助它的巡洋艦，損害英國珍貴的海上貿易。英國艦隊不得不四面八方鋪開，保衛通向波斯、印度以及遠東的蘇伊士航線，保衛圍繞非洲的好望角航線，保衛前往美國和加拿大的北大西洋航線，保衛通向西印度群島的加勒比海航線以及到南美洲和澳大利亞的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航線。海洋上的交叉路口，海運航線匯集，最易遭受敵艦攻擊，是需要控制的樞紐所在。

“海上作戰的全部要旨，就是要使海軍所擁有的一切大小艦艇能夠不受約束地到處活動。”出自費希爾之口的這句話等于是海軍中的一道教皇通諭。用一句日常通用的話來說，這就等于說，海軍必須同時在一切地方都占優勢，或者是在任何有可能與敵艦交戰的地方都占優勢。英國海軍負有莫大的重任，它必須竭盡全力在本國領海內集結優勢力量，千方百計避免在本國領海打一場勢均力敵的戰斗。人之常情都是期望用主力艦去進行一次大會戰，一舉而決定海上的盟主地位屬于誰家，如同日俄兩國的對馬海峽之戰那樣。英國擔負不起冒喪失海上優勢的風險而去進行這樣的一次戰斗；而德國海軍則不然，不惜冒險取勝。1914年的德國是張牙舞爪的德國。德皇業已公開宣布，“德國的未來是在海上”。海軍同盟會的組織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大張旗鼓地為購買戰列艦募款，提出的口號是：“英國是仇敵！”“英國背信棄義！”“大戰即將爆發！”“英國危險！”“英國在1911年便計劃襲擊我們！”德國這時已被認為是富有侵略性的，是準備好以寡敵眾訴之一戰的，而這種情況將會使它進行孤注一擲的冒險行為。

敵人的意圖雖尚莫明究竟，但志在必打則已令人生畏，尤其是害怕來去無蹤的潛艇，它致命的潛在力量顯得一年比一年更令人驚恐，英國海軍因此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

斯卡帕灣，幾乎是大艦隊能夠航行抵達的最遠一點，也算得上是英國領土上最荒涼冷落的天涯一角，是不列顛諸島一處最邊遠的戍守之所，比主島的最北端還要向北，它是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中一處天生的隱蔽所，它被選中作為英國艦隊的戰時基地，可惜的是被選定得過晚了。斯卡帕灣地處北緯59度，與挪威隔海遙遙相望，位于北海頂端，比德國艦隊出航的出發地點黑爾戈蘭還要朝北350英里，南距英國遠征軍從樸次茅斯到勒阿弗爾橫渡海峽的航線550英里。所以這里和德國出擊點的距離要比德國人和英國運輸線的距離遠得多，要是他們襲擊的話。英國大艦隊可以從這個陣地保衛本國通過北海的海運貿易航線，封鎖德國經過北海的海運貿易航線，而且還可依仗它所處的地位把敵艦圍困在港口之內，在敵艦離港出海的時候，還可以插入敵艦與其基地之間，迫使敵艦應戰。然而這里還未準備就緒，不能進駐。

船體每增大一次，船塢和港口也就需要加寬一次，而建造無畏戰艦的計劃，因自由黨政府的意見不一已受到損害。費希爾的熱忱和丘吉爾的積極主張，不由得政府不被說服，從而通過了造艦計劃，然而自由黨人為了補償他們的反戰感情所遭受的這一損害，便在支付費用方面予以刁難。結果是時至1914年8月，斯卡帕灣的干船塢和固定的防御設施還沒有造好。

正當政府還在辯論是否參戰的時候，丘吉爾已機警地作了動員，艦隊于8月1日安抵那里。用這位海軍大臣的話來說，宣戰以后的日子，是一段“心理上極度緊張”的時期。由于滿載部隊的船艦啟程時刻即將到來，敵人每小時都有可能襲擊沿海地區以牽制英國艦隊，或者進行別的軍事挑釁活動，因此丘吉爾認為“一場海上大戰隨時可能發生”。

海軍上將約翰·杰利科爵士的心情和丘吉爾完全一樣，他在8月4日乘火車北上前往斯卡帕灣的途中，拆開一份標有“機密”字樣的電報，得悉他已被任命為大艦隊的總司令。使杰利科感到心情沉重的，并不是這個他所期望已久的任命，也不是他對自己能否勝任有所顧慮。他在1872年進入海軍時，年僅十二歲半，身高只有四英尺半。他早已習慣于自己的才能受到廣泛的賞識。不論是在艦隊的職務上還是在海軍部的各種官職上，他所表現的才能都博得了費希爾勛爵一貫的、熱誠的、共鳴的贊賞。費希爾勛爵看準杰利科“……在大決戰來臨時，將是個納爾遜……”這個日子已經到來了，但是費希爾所看中的這位納爾遜的接班人，從他到達的時刻起，就一直對斯卡帕灣基地毫無防御的狀況感到“焦急萬分”。沒有岸基大炮，沒有水下柵欄網，也沒有固定水雷陣地，這個基地“對于潛水艇和驅逐艦的攻擊毫無防御”。

杰利科在8月5日捕獲了幾艘德國拖網漁船，發現船上有幾只信鴿之后，深感不安，他懷疑信鴿是給潛水艇通風報信用的。德國曾聲言將不受協議規定的限制進行布雷，因此對水雷的恐懼更增加了他的憂慮。8月9日，英國的一艘輕型巡洋艦撞沉了德國潛水艇U-15，他憂多于喜，趕緊命令他所有的主力艦駛出這個“已受影響的水域”。有一回，在斯卡帕灣港內，一名炮手突然開火，據說目標是一個在移動的潛望鏡，一炮既鳴，頓時便眾炮齊應，驅逐艦也如臨大敵，四處搜索，他還命令艦隊所轄的三個戰斗中隊全部駛往外海整夜守候。造成這場虛驚的，就連官方的海軍史學家也承認“可能是一只海豹”。英國艦隊曾經兩次轉移到較安全的基地，一次到蘇格蘭西岸的埃韋灣（Loch Ewe），一次到愛爾蘭北岸的斯威利灣（Loch Swilly），而任德國人在北海自由活動（如果德國人知道這種情況的話），而后，又兩次返回原地。在這期間，如果德國人真的發動海軍攻勢，他們是可以獲得輝煌戰果的。

像一匹馬聽到嗖嗖蛇爬而驚恐莫名突然脫韁一樣，英國海軍立即著手封鎖港口，在北海上巡邏警戒，日日夜夜監視著有無敵人出沒的動靜。由于自己具有24艘無畏戰艦的戰斗實力，也知道德國的實力在16到19艘之間，英國大可依仗它扎實的優勢，而且在次一級的戰列艦中，英國人相信自己的實力“也顯然超過德國的8艘”。但是英國人還是覺得勝敗尚未分曉，心情異常沉重。

丘吉爾在8月8日警告杰利科，在運兵船只通過海峽的一周間，“德國人有著采取行動的最強烈的動力”。但海面上連一艘魚雷艇也看不見。敵人沒有動靜，反而使緊張氣氛愈加緊張。分散活動的敵方戰列艦依然在遼闊的海洋上自由出沒，地中海上有“格本”號和“布雷斯勞”號，大西洋上有“德累斯頓”號和“卡爾斯魯厄”號，太平洋上有屬馮·施佩統率的艦隊的“沙恩霍斯特”號、“格奈澤瑙”號（Gneisenau）以及“埃姆登”號（Emden），都在進行大膽的襲擊，或作更大膽的逃逸。但潛伏在黑爾戈蘭后面的公海艦隊卻是毫無動靜，似乎預示著還有更為兇險的圖謀。

“敵人顯得出奇的安靜，沒有動靜，這可能是重大行動的前奏……說不定在本星期就要大舉登陸”，這是丘吉爾在8月12日向各艦隊司令發出的警告。他建議英國大艦隊向南移動，以便更加靠近“決戰地區”。杰利科卻是遠在蘇格蘭北端與挪威之間一片灰暗的海洋上繼續巡邏，僅有一次，就是在8月16日，在英國遠征軍渡海處于高潮時，他的艦艇曾冒險南下到北緯56度以南。從8月14日到18日，運輸船共進行了137船次橫渡海峽的航行。這時期，整個英國大艦隊及其所屬的中小艦隊也都嚴陣以待地在海上巡邏，監視著魚雷的白浪航跡，監聽著報道德艦出海的無線電信號。

德國海軍大元帥馮·蒂爾皮茨，是德國的費希爾，德國海軍之父，海軍的締造者，也是德國海軍的靈魂。“名垂史冊的蒂爾皮茨”，有著像海神尼普頓（Neptune）那樣鋼叉似的白胡須，年紀六十五歲，從1897年以來便一直是海軍大臣，自俾斯麥以后，他是在同一個職位上連任時間最長的一人，海軍是他一手締造的，可是人家偏偏不許他知道海軍的作戰計劃。作戰計劃，“海軍參謀部甚至對我也保密”。7月30日，給他看了作戰令，他才發現秘密：根本沒有計劃。德國海軍的存在是導致這場戰爭的一大因素，而當戰爭到來之時竟未給它安排一個用武之地。

德皇讀的書，如果只限于那本放在他的游艇的床頭小柜上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的話，那么，世界大戰可能不會發生。這本書是肯尼思·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所寫的夢境一般的故事，講的是處身在冷冰冰的成人世界中的英國少年。然而德皇卻不拘于一家之言，他閱讀了一本1890年問世的美國書，此書在它自己的領域中，就像《物種起源》或《資本論》在它們各自的領域中那樣有著巨大影響。海軍上將馬漢，在他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on History）一書中闡明了他的論點，即誰控制海上交通，誰就掌握他自己的命運；控制海洋就等于主宰形勢。一幅宏偉的遠景于是立即展現在敏感的威廉面前：德國在海上必須和在陸上一樣成為一個主要強國。興建海軍的計劃著手進行了，德國雖然不能立刻超過英國，但是用德國人那種全力以赴的精神去干，最后是會超過的。這樣德國就對英國所賴以生存的海上優勢形成了挑戰，明知這可能引起英國在戰時與德國為敵，從而使用它的主要武器——封鎖——來對抗德國。

只要擁有世界上最多商船的英國能保持中立，那么身為大陸強國的德國，就可以跟歐洲大陸上可能聯合起來的任何幾個強國作戰，而無海上運輸供應中斷之虞。就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沒有海軍的德國，將會比有海軍的德國更為強大。俾斯麥早已反對進行海上冒險多樹一個海上敵人，從而削弱陸上威力。可是威廉聽不入耳，他被馬漢所惑，被他內心的妒火所纏。他對獨步海上的英國又傾慕又懷恨的妒火，在英國考斯港舉行的一年一度的游艇競賽周中達到了高峰。他把海軍看作突破包圍的一把利刃。他時而堅決認為他絕不想與英國為敵，時而又堅決認為“一支較強大的艦隊會使英國人大驚失色，從而使他們清醒過來”。那時候他們就會“屈從于不可避免的命運，我們就會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他派去英國的大使們，對于這種政策的令人懷疑的邏輯性提出告誡，可是都未生效。霍爾丹的柏林之行也沒有成功，丘吉爾關于艦隊就是英德關系中的阿爾薩斯―洛林的一番警告，也是徒費口舌。按一定比例建造海軍的建議，或由各國共商海軍裁軍的建議都被拒絕了。

向英國海上優勢的挑戰一旦形成，英國人的敵對情緒就難以避免了。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德國得付出更大的代價，它得從陸軍中抽調大批人員和大量資金——這些人員和資金足夠建立兩個軍。如果德國建立海軍不是無的放矢，那這支海軍就必須起到一定的戰略作用，不是阻止敵人增援部隊的到來，就是阻止封鎖。正如在《1900年德國海軍法案》序言中所承認的那樣：“一場海軍封鎖戰……即使僅僅延續一年，也將使德國的貿易遭到破壞，給德國帶來災難。”

正因為德國海軍在實力和效能上，在訓練有素的官兵數字上，都已有所增長，正因為德國海軍的技術設計人員改善了海軍的射擊技術、炮彈穿甲能力、光學儀器和測距儀的裝置，以及軍艦裝甲的抗彈性能，所以德國海軍已是一筆珍貴的財富而不容輕易喪失。雖然以一對一的實力來說，德國海軍已接近于英國海軍，而且在大炮的威力上超過英國，但德皇舉不出歷史上有過像德雷克[[1]](#_1__De_Lei_Ke__Sir_Francis_Drake)或納爾遜一類的海軍將領，所以他始終不能真正相信德國海軍能擊敗英國海軍。他不忍想象他的“心肝寶貝”（比洛是這樣稱呼他的戰列艦的）被炮火打得粉身碎骨，血跡斑斑，或終于受到重創，失掉艦舵，沉沒海底。蒂爾皮茨雖曾一度蒙德皇封以“馮”的貴族稱號，但由于他的海軍學說立足于海軍用于作戰的理論，他開始顯得是個危險人物，甚至幾乎成了一個敵人，并漸漸地被擯于核心班子之外。他那種出自他這個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之口，而又尖細得像出自孩童或太監之口從而不免使人感到意外的刺耳聲音，從此便再也聽不到了。盡管他仍擔任行政首腦，而海軍決策，卻已讓由海軍參謀長馮·波爾（von Pohl）上將和德皇的海運內閣大臣、海軍上將馮·米勒（von Müller）組成的一個小組，以及海軍總司令馮·英格諾爾（von Ingenohl）上將，在德皇領導下掌握決定。波爾雖支持以作戰為本的戰略，但他在霍亨索倫王朝的德國卻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其默默無聞可能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甚至連集流言蜚語之大成的比洛都沒有提到過他。米勒是那些作為國王顧問，而實際是朝廷裝飾品的性喜男色的馬屁精之流。英格諾爾是個“堅主防御戰略”的軍官。“我不需要總長，”德皇說，“我自己能擔當這個職務。”

當包圍德國的這個時刻、威脅著德皇統治的這個時刻、死了的英王愛德華赫然“比我這個活人還強”的這個時刻來到的時候，德皇諭示：“我命令公海艦隊現時采取守勢。”德國對他手中這一銳利武器采取的戰略，是通過保存實力而發揮其作用。讓它待在固若金湯的筑壘陣地內，它對敵人就會成為一個經常存在的潛在危險，迫使敵人得時刻保持警戒，不使它有出擊的可能，從而消耗敵人的海軍資源，并使敵人的部分兵力不能從事其他活動。兩支艦隊，處于劣勢的一方如此行事，是普遍認可的，也是馬漢所贊成的。不過，馬漢后來的結論是：一支“存在的艦隊”的作用“被過分夸大了”，因為一支甘心雌伏、不去作戰的海軍，其影響力是勢必日趨削弱的。

如果沒有充分的理由，沒有堅強的支持，那么就是德皇也不會強行實施這樣一項政策的，而他兩者都有。許多德國人，尤其是貝特曼和較有世界主義色彩的文官集團，一開始就不相信英國是一個真正想認真打一仗的對手。他們一直認為英國是可以被收買而單獨媾和的，尤其是在法國被擊敗以后。埃茨貝格爾對英國殖民地采取謹慎小心避不攫取的政策，就是這種想法的部分表現。德皇的母系親族，德國王公貴胄的英籍夫人以及古老的條頓人的血緣關系，都足以產生一種親屬感。英德兩國之間有可能進行調解，因而兩國之間的戰爭和流血傷亡，雖非不可能，據認為也是難以發生的（不知何故，在他們的思想上，對于把英國遠征軍和法國軍隊同時一舉圍殲的流灑鮮血，居然不當作一回事兒）。此外，德國還希望把它的艦隊保持完整無損，作為迫使英國就范的討價還價的條件。這種理論，貝特曼堅決支持，德皇也樂意接受。隨著時間的推移，勝利的希望日趨暗淡，使德國艦隊安然度過戰爭，以供和平談判桌上討價還價之用的愿望也就更加鞏固。

8月份，德國的主要敵人似乎不是英國而是俄國，因而德國艦隊的首要任務被認為是控制波羅的海——至少那些想要延遲和英國較量的人們是這樣認為的。他們說，德國艦隊應防范俄國干擾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海上供應，應防范俄國可能襲擊德國的海岸。他們擔心對英國采取行動會削弱德國艦隊對波羅的海的控制，從而讓俄國登陸，導致德國在陸上戰敗。

要把愿望變成政策，總是可以找到論據的。別的不談，8月份，德國海軍之所以被置之腦后，主要是由于相信陸軍可以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同時普遍認為戰爭不會打得很久，封鎖不致成為需要多加操心的問題。有“先見之明”的蒂爾皮茨，早在7月29日丘吉爾動員艦隊的那天，便已請求德皇把海軍控制權置于一人手中。因為他覺得“我的一只小指頭要比波爾的全身都強”（這種思想情緒是他私下對他夫人透露的，而不是對德皇表示的），所以他只能建議把所提的這個職位“托付給我本人”。他的建議遭到拒絕。雖然他考慮過辭職，然而考慮到德皇“不見得會接受我的辭呈”，沒有提出來。他和其他幾位大臣一起被拉到科布倫茨，不得不在陸軍統帥部的勝利氣氛中忍受痛苦，當時“陸軍在各方面都得到勝利而海軍卻一無所獲。積二十年之努力，而今我的處境如此糟糕，誰也不會理解”。

他的公海艦隊計有16艘無畏戰艦，12艘較老式的戰列艦，3艘戰列巡洋艦，17艘其他巡洋艦，140艘驅逐艦和27艘潛水艇，仍然都停泊在港內和波羅的海，同時對英國的進攻也只限于潛水艇在第一周的一次海上搜索和布置水雷。德國的商船也已撤回。7月31日，德國政府命令各輪船公司取消一切商船出航。到8月底，計有275萬噸，數占德國商船總噸位一半以上的670艘德國商船，躲藏在中立國港口，其余的除了那些往返于波羅的海的商船以外，都停留在國內港口。德國40艘可怕的偽裝成商船的襲擊艦，只出動了5艘，所以英國海軍部環顧四方驚訝不已之余得以在8月14日報稱：“橫渡大西洋的航道安全無阻。英國海運商務照常進行。”除了襲擊快艦“埃姆登”號和“柯尼斯堡”號在印度洋上，以及海軍上將馮·施佩所率領的艦隊在太平洋上外，其余所有德國海軍和德國商船在8月底前都已從各大洋的水面上引退。

另一場戰役——英國和強大的中立國美國之間的戰役已開始了。引起1812年戰爭的那些老爭端，那幾句老話——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國旗掩護商品——以及中立國的通商權和交戰國的限制權之間不可避免的那些老沖突，又都重新出現了。1914年的所有交戰國，加上美、荷、意及西班牙，曾在1908年舉行會議，試圖制訂一套有關的規章。這次會議是第二次海牙會議的繼續。東道國是世界上海運業務最大和對中立國家的貿易暢通無阻最感興趣的英國，愛德華·格雷爵士雖不是出席會議的代表，但卻是這個會議的推動者和發起人。盡管海軍上將馬漢作為美國的首席代表精力充沛地出席了會議，但會議產生的《倫敦宣言》中，中立國的貿易權比起交戰國的封鎖權來還是占了上風。甚至連馬漢這位海上的克勞塞維茨和施利芬，也奈何不得英國影響所起的溫和作用。與會者全都支持中立國照常進行商務，馬漢的反對意見遭到他的文官同事們的否決。

貨物被分為三類：絕對禁運品，這包括只供軍用的物品；有條件的禁運品，即既可供軍用也可供民用的物品；非禁運品，包括食品在內。只有第一類貨物在交戰國宣布封鎖后才可以由交戰國沒收；第二類貨物則必須證實目的地是敵對國家方可予以沒收；第三類貨物則根本不能沒收。但當各國代表簽署宣言回國后，英國的另一種利益——制海權——抬頭了。海軍上將馬漢的旗號又在桅桿上飄揚了。他的一些英國門徒一見到保障英國生存的海上優勢遭到出賣，便發出驚恐的呼號。他們問道，如果允許中立國供應敵人需要的一切，則阻塞敵人的海上通道又有何用？他們使《倫敦宣言》成為巨大的爭議，在報刊上和議會中發動了一場反對它的運動。《倫敦宣言》將使英國艦隊失去作用；它是德國的陰謀；貝爾福反對它。《倫敦宣言》雖在下院通過，但上院卻一鼓作氣根本沒有讓它付諸表決，這也許是他們在20世紀中最有聲色的一個行動。這時政府已經另有考慮，所以欣然任其夭折。《倫敦宣言》遂此始終未獲批準。

同時，海上力量的新的現實情況已使英國傳統的近距離封鎖敵國港口的政策過時。直到當時，英國海軍部的打算是，在與大陸強國作戰時，由驅逐艦隊在巡洋艦乃至戰列艦的支持下，實行近距離封鎖。但是潛水艇、浮動水雷的發展，線膛炮的改進，形勢逼人，勢需改弦易轍，采取遠距離封鎖的政策。海軍部在1919年的作戰令中采用了這項政策，但又波瀾四起，將整個問題重又投入了混亂的深淵。當一艘輪船企圖通過近距離的封鎖線時，它所駛向的目的港是明顯的，因此根本不存在目的地問題。但當輪船在遠離目的地幾英里以外，譬如說在北海之端被攔截時，按照封鎖條例的規定，必須有目的地是敵國或貨物屬于禁運品的證據證明確實后才可扣留。于是問題就像一個帶有許多鐵刺的浮動水雷似的，十分棘手。

戰爭爆發之際，《倫敦宣言》仍然是各國在這個問題上意見集中的一份宣言書。美國在8月6日，即戰爭爆發后第二天，正式要求交戰國公開承諾遵循該項宣言。德奧兩國積極地表示在敵對國家同樣贊同的條件下，支持該項宣言。英國，作為協約國在海軍政策上的發言人，作出了一個肯定的答復，同時聲言保留對“有效地進行海戰所必不可少的”某些權利。因此這個答復說是同意，實際上是不同意。英國對于禁運品迄無定策，只是憑經驗覺得《倫敦宣言》的條款需要略加引申。英帝國國防委員會在1911—1912年的報告中曾建議應將貨物的最終目的地，而不是船舶的目的地，作為衡量有關貨物是否屬于有條件的禁運品的標準，因此制作馬鞍的皮革、制作輪胎的橡膠、銅、棉、紡織品原料、紙張等都可以轉為軍用物品，不得僅僅因為它是運給中立國的收貨人就可以自由通行。倘這些物品可由陸路轉運到德國，則封鎖云云，就不值得。該委員會于是建議“連續航行”（continuous voyage）的原則應予“嚴格執行”。

“連續航行”是那種具有神秘力量的用語之一，它在歷史上時見時隱，它的出現使歷史為之改變。“連續航行”這個概念，是18世紀英法戰爭中英國人的一大發明。它的意思是說，決定的因素是貨物的最終目的地，而不是先到的目的地。這個用語還沒有完全斷氣就被《倫敦宣言》埋葬了，而現在卻像愛倫·坡的那只已被送入墓穴的貓一樣，又被挖了出來，還有著惹起麻煩的能耐。陸軍部接到通知說，中立國運往荷蘭的糧食是準備供應在比利時的德軍的。8月20日，英內閣會議頒發了一道樞密院令，宣稱有條件的禁運品，今后如系運往敵國或“敵國的代理人”或其最終目的地為敵對國家，均一體視為拿獲對象。至于目的地的證明，從此將不復以提貨單為憑，而將依據——用了一句其伸縮性之大無與倫比的措辭——“任何充分的證據”。

這就是“連續航行”的理論，好不張牙舞爪、氣勢逼人。其實際效果，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塞西爾·斯普林―賴斯（Cecil SpringRice）爵士承認，是把每樣貨物都視為絕對禁運品。

樞密院令的起草人當時想都沒有想到“繼續航行”原則復活后會導致一系列的重大后果和執行決定時的巨大困難，如命令船舶停駛和登船檢查，X光查驗貨物，設立處理戰利品的軍事法庭和法律上的復雜事務，以及德國最終訴諸無限制潛艇戰及其對美國的影響等等。亨利八世決心與阿拉貢的凱瑟琳離婚時，沒有想到要發生宗教改革運動。大臣們于8月20日在內閣會議桌上聚首時，所關心的是在軍事上有必要制止物資源源不絕地從鹿特丹運到比利時供應德軍。樞密院令是根據軍方意見提出、經大臣們討論后批準的。有關這次討論的僅有記錄，是阿斯奎斯日記中的輕飄飄的一句話：“長時間的內閣會議——關于煤炭和禁運品等各種各樣的零碎事項。”

不只是首相對這類零碎事項漠不關心。當德國政府的某一高級官員預見到戰爭將轉為長期消耗戰，因而向毛奇提出需要建立一個經濟總參謀部的備忘錄時，毛奇回答說：“不要用經濟問題來打擾我——我正忙于指揮一場戰爭。”

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道使人想起1812年戰端的樞密院令，恰恰出籠在英國人把華盛頓市付之一炬的一百周年紀念日。幸好這一奇怪的巧合，以及命令本身都沒有引起美國公眾的重視。他們這時都全神貫注于報章上的通欄大標題，有關布魯塞爾的陷落、美國人在巴黎的困境、德皇和俄國沙皇、艦隊、哥薩克騎兵、陸軍元帥、齊柏林飛艇、西線和東線戰事等等的報道。然而美國政府是感到震驚的。英國這道樞密院令盡管其序言部分措辭溫和婉轉，在提出微妙的保留意見之前也申明了信守《倫敦宣言》的態度，但其用心卻瞞不過國務院法律顧問羅伯特·藍辛（Robert Lansing）的律師眼光。于是他草擬了一份堅定而直截了當的抗議書。也就是這份抗議書引起了一場月復一月、年復一年的爭斗，一次次的信件往來，一篇篇的訴訟摘要，一樁樁的判案實例，一輪輪的大使會談，一本本的文件匯集。

8月27日這一天，倫敦的《每日記事報》認為“確實存在危險”，在禁運品和搜查權問題上，英國將卷入和美國的爭執，該報知道搜查權是美國所“堅決反對的”。這個問題，愛德華·格雷爵士也曾認為需要小心處理的。一開始，總認為戰爭可望在短時期內結束，認為至要的問題是以最有力的方法迅速贏得勝利，所以，從時間上看，似乎沒有可能會和美國發生一場嚴重的爭端。在蒙斯戰役和沙勒魯瓦戰役的尸橫遍野后，長期戰爭的前景不可避免地擺在協約國面前。在長期戰爭中，它們就勢需依靠美國獲得糧食、武器和金錢（但尚無人想到在人力上也要依靠美國），勢需切斷德國獲得這些補給的來源。加強對敵人的封鎖和保持與這個強大的中立國的友誼這兩者同時都成為必要——然而又互不相容。在中立國跟德國的貿易上，每加上一道限制，在公海航行自由問題上就引起美國國務院又一陣聲色俱厲的咆哮。因此情況顯然是令人不快的，英國最終也許不得不在兩者之間權衡輕重作一選擇。在眼前，出于英國人不尚極端的本性，愛德華·格雷爵士對于一樁樁事件還能審慎處理，像舵手避開暗礁一樣回避了大的原則問題，小心地不讓雙方的討論發展成一場針鋒相對的爭端，使任何一方都不致擺出一副使自己無法下臺的架勢。他說，他日復一日的目的就是“在不與美國決裂的情況下，保證實施最大限度的封鎖”。

愛德華·格雷爵士碰到了一個難應付的對手，一個堅持原則的人。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刻板而拘謹地恪守中立，他力求采取并保持中立國的傳統權利。他與其說是為了這些權利本身，還不如說是因為中立國的權利乃是中立國的職責所在，而這個職責是威爾遜在一開始就狠狠抓住不放的。威爾遜上任伊始，就致力于罷黜那些在塔夫脫（Taft）總統巨大影響庇護下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團”和金元外交官們，并致力于在國內和拉丁美洲事務中爭取“新自由”。有鑒于戰爭會扼殺革新事業，他遂決心不使美國卷入一場會影響其改革計劃的國外冒險。此外，他還有一個更重要和宏大的理由。在這次戰爭中，他看到一個在世界舞臺上可以取得偉大地位的機會。8月3日他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首次發表了有關戰爭的談話，他說，他想要的是這樣的一種自豪感：美國“可以隨時援助世界其他國家”，并說他相信美國“這樣做”可以“獲得不朽的崇高榮譽”。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聲未響之前，便已設想好了美國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隨著事態的演變，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沖擊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這個角色的決心于是越來越大，甚至在美國終于卷進了這場戰爭漩渦之后，也從未死心。

對威爾遜來說，嚴守中立與孤立主義是對立的。他要美國置身于戰爭之外，目的是要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更大地發揮作用，而不是少發揮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榮譽”，這既是為了他自己，也為了他的國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國在這場爭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當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贏得這種榮譽。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講話中責成他的同胞們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實；公正不阿，言行一致”，并闡明中立的最終目的是使美國能“提出和平的忠言”，“起到公正調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后一篇講話中所說的那樣，他希望在歐洲沖突中，行使“道義上的仲裁”職責。他想“為人類服務”，想運用新世界的道義力量把舊世界從愚昧中拯救出來，并運用“正義和仁慈的準則”，“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人類的旗幟下”，通過調停使和平得以實現。

及至8月底，英國海軍已在實際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權，它跟美國在禁運品方面的爭執，不論是如何認真、如何曠日持久，又往往如何激烈，但還一直是幕后的爭執。對威爾遜來說，公海航行自由并不是壓倒一切的爭端，雖然在問題的爭執變得特別嚴重的時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認為他可能繼麥迪遜[[2]](#_2__Mai_Di_Xun__James_Madison_17)之后，成為第二個把國家引向戰爭的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但是他絕不希望把爭端推到1812年那樣的結局。總之，對協約國貿易的飛躍上升，綽綽有余地抵償了對德貿易下降的損失，從而緩和了勢必執行國家原則的逼人之勢。只要美國商品有人買進，美國便在8月20日樞密院令的肇始過程中逐漸地趨于沉默了。

自那時以后，由于公海被英國艦隊所控制，美國的貿易便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轉向協約國。美國和同盟國的貿易額從1914年的1.69億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100萬美元，而在同時期內美國和協約國的貿易額，則從8.24億美元上升到30億美元。為了滿足協約國的需要，美國的廠商生產了它們所需的商品。為了使協約國能償付美國供應的商品，還為它們安排了信貸。最后美國成為協約國的糧庫、軍火庫和銀行，并和協約國的勝利發生了直接的利害關系，使戰后的經濟決定論的鼓吹者們久久感到茫然。

哪里有長期建立起來的文化關系的基礎，哪里就有經濟關系的發展；哪里有天然的利益，哪里就有經濟的利益。美國對英法兩國的貿易一直大于對德奧兩國的貿易，封鎖的作用只是擴大了原有條件而不是制造了一個人為的條件。貿易不僅隨著國旗走，還隨著人心所向走。

“一個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國駐倫敦大使沃爾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說，“但人卻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個全心全意擁護協約國的人，在他看來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滿感情地向威爾遜談了，也充滿感情地向威爾遜寫去了生動而富有說服力的信。佩奇完全站在協約國一邊的直率講話，使威爾遜產生反感，乃至拋棄了這位最早支持他的人，然而就在威爾遜本人的思想深處，也不能像他要求別人那樣恪守中立。格雷于8月6日致函威爾遜，吊唁威爾遜夫人的逝世。威爾遜對格雷是欽佩的，并因格雷自己也已喪偶而對他尤感親切，所以在復函中寫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覺得共同的原則和目的把我們聯系在一起了。”而在德國政府中，威爾遜不會對任何一個人這樣說的。

威爾遜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學，跟美國生活中大多數有影響的人士一樣，可以追溯到英國的經驗和法國的革命。但他出于做世界和平締造者的雄心壯志，總是力圖抑制這些。威爾遜奮斗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說服手段，促使交戰國通過談判取得和平——一個“沒有勝利的和平”。威爾遜的努力有賴于他的嚴守中立，而這種中立態度是得到強有力的愛爾蘭人思潮或所謂反喬治三世的思潮的支持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學的胡戈·明斯特貝格[[3]](#_3__Hu_Ge__Ming_Si_Te_Bei_Ge__Hu)教授，下至密爾沃基城的酒吧間里大叫大嚷的親德團體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出于一個連威爾遜也為之無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來是可以成功的。這個因素，決定著美國人的思想感情，是協約國最大的本錢——不是英國的艦隊，而是德國的愚蠢。

8月4日戰爭爆發時，這位美國總統在給朋友的信中，對于遠隔重洋的沖突只表示了“全然譴責”，而根本不想在交戰國之間區分是非。8月30日，戰爭在比利時進行一個月之后，豪斯上校寫下這樣一段記載：總統“對盧萬的毀滅心情沉重……他對德國在這次戰爭中的所作所為的譴責甚至較我為甚，他竟允許他的反感廣及全體德國人民，而不僅限于德國領導人。……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如果德國獲勝，那就會改變我們的文明進程，使美國成為一個軍人國家”。幾天以后，斯普林―賴斯報道說，威爾遜曾向他“神情非常嚴肅地”指出：“如果德國的事業在目前的斗爭中獲得成功，美國就勢必要放棄它現在的理想而盡其全力于防務，這將意味著美國現行政體的結束。”

威爾遜總統雖持有這些觀點，然而他還是堅持到最后，直到中立政策猶如一艘在熊熊烈焰中燃燒的戰艦，而他便是站在一片火海的甲板上的那個卡薩比安卡[[4]](#_4__Qia_Sa_Bi_An_Qia__Casabianca)。但這是在法律基礎上的中立，而不是感情上的中立。他絕不會把協約國勝利的前景視為對美國立國原則的威脅，而德國勝利的前景，特別是比利時的遭遇澄清了這個問題后，就不可能有別的看法了。威爾遜比任何一個美國人都更感到中立政策關系至大，如果連他都對德國的行為感到反感，那普通的美國人就更不用說了。美國人因火燒盧萬所激起的情緒抑制了英國海上封鎖所引起的憤懣。英國對禁運品每搜查一次、沒收一次，或在禁運物品表上增添一個項目，都會激起美國一陣新的憤怒，而很快德國的一次恐怖行動便會輕而易舉地把注意力轉移開。正當藍辛對樞密院令的強烈指責即將釀成一場大論戰的時候，德國的齊柏林飛艇于8月25日轟炸了安特衛普居民區，殺傷了平民，王宮也險遭命中，比利時王后及其子女剛遷到那里。結果藍辛只得起草一篇對“這種為害人類的暴行”的抗議，而不是對“連續航行”的抗議了。

在一個痛感前景不妙的時刻，據威爾遜的姻親阿克森博士回憶，約在8月12日威爾遜夫人的葬禮舉行后不久的一天，威爾遜曾向他吐露，“我擔心在公海上會發生什么事情，會使我們無法置身于戰爭之外”。然而成為決定因素的并不是公海上發生的事情，而是公海上沒有發生事情。福爾摩斯要警官格雷戈里注意“狗在夜間發生的怪事”，不知所以的警官答道：“狗在夜間沒有干什么。”

福爾摩斯說：“這就是怪事。”

德國海軍就是夜間的那只狗。它沒有作戰，被保存實力的理論和德國會在陸上迅速取得勝利的信念鎖住而沒有讓它去冒險執行海軍的職責——保持本國海上貿易航路的暢通。雖然德國的工業依靠進口原料，德國的農業依靠進口飼料，而德國海軍并不企圖保護這些供應的源源而來。8月份僅有的一次海戰也是出于無心，其作用也只不過使德皇更加不愿讓他的“心肝寶貝”去冒險。

這是8月28日在黑爾戈蘭灣的戰役。英吉利海峽艦隊的潛水艇和驅逐艦隊，在戰列巡洋艦的支持下，駛入了黑爾戈蘭灣德國海軍的基地，其用意是想通過突然襲擊來轉移德國人對英國海軍陸戰隊在奧斯坦德登陸的注意力。德國猝不及防，只下令出動幾艘輕巡洋艦應戰，也沒有較重型的戰艦支援。這幾艘輕巡洋艦，用蒂爾皮茨的話說，“以初次上陣時的全部熱忱”，在一片迷霧和混亂中猛沖猛殺。在持續了一整天難解難分、東奔西逐、各自為戰的一連串的戰斗中，英國艦隊陷入了分不清敵我的混戰，只是叨天之幸才從丘吉爾委婉稱之為“難堪的困境”中擺脫出來。德國人未能下令出動整個艦隊應戰，所以在戰艦的數量和火力上都是以寡敵眾。這天是英國人占了便宜。德國三艘輕巡洋艦——“科隆”號，“美因茨”號和“阿里亞德納”號以及一艘驅逐艦被打得粉身碎骨，沉入海底，另有三艘受到重創，一千余名人員，包括一名海軍上將和一名海軍準將，在炮火下喪命或落水溺斃，另有二百余人，包括海軍大元帥的兒子沃爾夫·蒂爾皮茨，被從海上救起后成為俘虜。英國戰艦無損失，傷亡約75人。

如此巨創，使德皇喪膽，死心塌地不敢再跟英國較量了，于是下令不得再冒險行事，“務使軍艦免遭損失”，德國北海艦隊司令的主動權也就此進一步受到限制，事先如無德皇陛下批準，不得進行重大調動。

此后，當英國海軍在德國周圍筑起封鎖圍墻時，德國海軍只是消極地看著。竭力想擺脫束縛他手腳的鎖鏈的不幸的蒂爾皮茨，在9月中旬寫道：“我們可以取勝的最好戰機是在宣戰后的頭兩三個星期。”他預料“隨著時間的消逝，我們勝利的機會將是更少而不是更多”。是英國艦隊“發揮了‘存在的艦隊’的全部作用：對中立國施加了日益增加的巨大壓力，完全摧毀了德國的海運貿易，實行了最徹底的封鎖。”

德國海軍最后在不得不同它所聽任形成的局面較量的時候，采取了水下活動的政策，在突破封鎖的姍姍來遲的努力中使用了潛艇。在水面艦艇見缺的情況下大量出現的潛艇，終于在公海上造成了威爾遜在8月份戰爭頭幾天所曾瞥見的可怕情景。

注釋

[[1]](#_1_17) 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約1540—1596），英國海軍軍官，在對西班牙作戰中取得勝利。——譯注

[[2]](#_2_14) 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1836），美國第四任總統（1809—1817），在他任內對英宣戰，爆發了美英戰爭（1812—1814）。——譯注

[[3]](#_3_13) 胡戈·明斯特貝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德國哲學家和心理學家。1892年，他應哈佛大學的邀請來到美國，從此終身任該大學實驗心理學教授和心理學實驗室主任。在美國，他可能是德國政策的最明顯的支持者，因此遭到協約國及其朋友們的猛烈譴責；另一方面，對親德分子來說，他幾乎成了一尊偶像。——譯注

[[4]](#_4_7) 卡薩比安卡（Casabianca），其父是法艦“東方”號的艦長。在1798年的阿布吉爾對英一戰中，艦只被擊中起火，年僅十歲的卡薩比安卡拒絕離艦，隨戰艦爆炸而喪生。——譯注

僅本章使用的文獻：

Baker, Ray Stannard,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Vol. V, N.Y, Doubleday, Doran, 1935.

Consett, Rear-Admiral Montagu, The Triumph of the Unarmed Forces, 1914–18,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23.

Guichard, Lieut. Louis, The Naval Blockade, 1914–18, tr. N.Y, Appleton, 1930.

House, Edward M., The Intimate Papers, ed. Charles Seymour, Vol. 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6.

Page, Walter Hines, Life and Letters, Vol. I, ed. Burton J. Hendrick, London, Heinemann, 1923.

Parmelee, Maurice, Blockade and Sea Power, N.Y., Crowell, 1924.

Puleston, Captain William (USN), High Command in the World War, N.Y., Scribner's, 1934.

Salter, J. A. Allied Shipping Control, Oxford U.P., 1921.

Siney, Marion C., The Allied Blockade of Germany, 1914–16, Univ. of Michigan Press, 1957.

Spring-Rice, Sir Cecil,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ed. Stephen Gwyn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9.

“奢侈品艦隊”：Churchill, 103.

入侵英國是“辦不到的”：Fisher, Letters, II, 504. Report of the “Invasion Committee” of the CID in 1912: Churchill, 158.

“貿易被迫中斷”：qtd. Custance, 104. Trade and tonnage figures: Fayle, 6, 15.

“海上作戰的全部要旨”：Fisher, Memories, 197.

“德國的未來是在海上”：Kurenberg, 129.

海軍同盟會的口號：Wile, Men Around the Kaiser, 145–6.

“心理上極度緊張”等引文：Churchill, 276.

杰利科拆開標有“機密”字樣的電報：DNB, Jellicoe.

杰利科“將是個納爾遜”：Fisher, Letters, II, 416; III, 33.

“焦急萬分”：Jellicoe, 92. His chaps. IV and V; “Declaration of War” and “Submarine and Mine Menace in the North Sea” describe this anxiety feelingly on every page.

“已受影響的水域”：Corbett, 79.

“可能是一只海豹”：ibid., 67.

“也顯然超過德國的8艘”：Churchill, 261.

“德國人有著采取行動的最強烈的動力”：ibid., 276.

“敵人顯得出奇的安靜”：ibid., 278.

“海軍參謀部甚至對我也保密”：Tirpitz, II, 87.

德皇游艇的床頭小柜上放有《黃金時代》：Peter Green, Kenneth Grahame, N.Y., 1959, 291.

德皇閱讀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Kurenberg, 126.

“一支較強大的艦隊會使英國人大驚失色，從而使他們清醒過來”等語：Ludwig, 423.

《1900年德國海軍法案》序言中的話：Hurd, German Fleet, 183–4.

德皇的“心肝寶貝”：Bülow, I, 198.

蒂爾皮茨尖細的嗓音：Wetterlé, 218. Müller's characteristics: Ludwig, 465.

英格諾爾“堅主防御戰略”：Tirpitz, II, 91.

“我不需要總長”：Ludwig, 466.

“我命令公海艦隊現時采取守勢”：Ludwig, 465.

蒂爾皮茨請德皇將海軍控制權置于他一人手中、未提出辭職的理由、“我的處境如此糟糕”：Tirpitz, II, 118–20, 219–20, 223.

“橫渡大西洋的航道安全無阻”：Corbett, 54.

倫敦會議、馬漢和《倫敦宣言》：Halévy, 223; Puleston, 130; Siney, 11; Salter, 98–99.

美國要求各方遵守《倫敦宣言》及英方的答復：Secretary Bryan to Ambassador Page, U.S. For. Rel, 1914, 215–16, 218–20.

英帝國國防委員會建議“連續航行”原則應予“嚴格執行”：Siney, 12.

8月20日英內閣會議頒發的樞密院令：ibid., ff; Parmelee, 37; Guichard, 17.

斯普林―賴斯語：U.S. For Rel, 1914, 234.

“各種各樣的零碎事項”：Asquith, II, 33.

“不要用經濟問題來打擾我”：qtd. L. Farago, ed. Axis Grand Strategy, N.Y., 1942, 499.

“保證實施最大限度的封鎖”：Grey, II, 103.

美國“可以隨時援助世界其他國家”，“獲得不朽的崇高榮譽”：Baker, 2–3.

“保持中立，名副其實”及本段中的其他引語：ibid., 18, 24–5, 73.

美國貿易數據：Arthur S. Link, American Epoch, N.Y., 1955, 177. Footnote on hidden trade: Consett, passim, and figures in Encyc. Brit., 14th ed., article “Blockade.”

“一個政府能恪守中立”：Page, 361.

威爾遜給格雷的復函：Baker, 55–6.

“全然譴責”：ibid., 62; “Felt deeply the destruction of Louvain”: House, 293; “In the most solemn way”: Spring-Rice, 223.

“這種為害人類的暴行”：Lansing Papers, I, 29–30.

“我擔心在公海上會發生什么事情”：Baker, 74.

“以初次上陣時的全部熱忱”：Tirpitz, II, 91.

“難堪的困境”：Churchill, 331–35.

黑爾戈蘭灣戰役后德皇的命令：Tirpitz, II, 93.

蒂爾皮茨事后的記述：to Admiral von Pohl, Sept. 16 and Oct. 1, Tirpitz, II, 95–7.

## 第18章　撤退

邊境戰役之后，德軍右翼和中路的五個集團軍像一把揮舞著的鐮刀，從比利時割到法國。這支德國侵略軍，擁有百萬人馬，先頭部隊一路上殺人放火，于8月24日進入法境。至于洛林戰線，并沒有被突破，德軍左翼由魯普雷希特親王率領的兩個集團軍在那里繼續與頑強抵抗的德卡斯泰爾諾和迪巴伊的兩個集團軍進行著曠日持久的戰斗。

德軍的右翼沿著法國北部那些漫長的白色公路，左右殺開了一條75英里寬的地帶，在浩浩蕩蕩地向巴黎進軍；走在最右面的是克盧克集團軍，它企圖包圍協約國的戰線。霞飛的當務之急是使所部停止退卻，同時，把力量轉移到左翼，使那里具有足夠的兵力可以制止敵軍的包抄活動，并“能重新展開攻勢”，而后者是法軍總司令部慘遭失敗之后的主導思想。邊境戰役潰敗，霞飛既沒有拿出時間來研究法軍所受的官方所謂的這個“挫折”，也沒有根據可能出現的情況重新考慮作戰方略，而竟在敗北后不出二十四小時于8月25日頒布了一道新通令，即這次戰爭中的第二號通令。通令提出要在德軍右翼進軍的路上新建一個第六集團軍，兵員將從未被突破的洛林戰線調集，用火車運往英軍左方的亞眠，在那里同英國遠征軍和法軍第四、第五兩集團軍組成一支日后重新展開攻勢的大軍；在組織第六集團軍的同時，正在退卻之中的三支法國集團軍應盡力設法保持一條連續的戰線，由后衛部隊進行“短促而猛烈的反擊，阻擋或者至少阻滯敵人前進”。正如第二號通令所述，霞飛希望第六集團軍在9月2日——色當紀念日——之前進入陣地，并做好參加重新展開攻勢的準備。

9月2日，也是正在迫近的德軍所矚目的一天。德軍希望屆時能完成施利芬計劃的目標：在巴黎前面一舉圍殲法軍主力。在未來的十二天里，德法雙方心中都有著又一個色當戰役的念頭和影子。這十二天是世界歷史搖擺于兩種進程之間的十二天，是德軍勝利在望，可以在埃納河與馬恩河之間染指勝利果實的十二天。

在這些日子里，法軍各團耳際響徹的是“邊退邊戰，邊退邊戰”的三令五申。他們必須擋住敵人的追擊，爭取時間，以便重整隊伍，重建一條堅強的戰線。這給戰斗帶來了進攻戰中從未見有的緊迫感。這需要后衛戰，盡管這樣的后衛戰幾乎是飛蛾撲火，而德國軍隊之不能讓法軍贏得時間重新組織力量，也有同樣的緊迫感。

在撤退中，這些法軍打出了水平，并采用了在危難中吃一塹長一智得來的應急技能，而這在比利時的最初幾場戰役中是少見的。他們不再是在外國土地上神秘的叢林中進行范圍廣大而目的模糊的進攻戰了。他們已經回到本國國土在為保衛祖國而戰；他們經過的是他們所熟悉的土地，見到的是他們本國居民，那些田野、谷倉，那些村莊小道，無一不是他們自己的。他們現在的戰斗同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保衛摩澤爾河和大庫羅訥的戰斗是一樣的。他們在進攻中雖告失敗，但他們還沒有潰不成軍；他們的戰線雖被突破，但還沒有崩潰。左翼，在德軍主力前進的路上，從沙勒魯瓦和桑布爾河的慘敗中脫逃出來的第五集團軍，在撤退中還在努力將潰敗的兵力重新聚集起來。在中路，第三、第四集團軍背默茲河為陣，仍在色當到凡爾登一線上殊死作戰，抗擊德軍中路的兩個集團軍，使敵人的圍殲不能得逞，并像王儲怏然承認的那樣，“恢復了他們的行動自由”。盡管德軍人多勢眾，后衛戰終難阻止他們的挺進，但法軍雖退猶戰，雖節節敗退，但能守則守，能拖則拖。

德朗格勒將軍的第四集團軍的一營輕步兵渡過默茲河后，奉命于黃昏時分堅守某地一座未能炸毀的橋梁。他們度過了“痛苦而又恐懼”的一夜，眼看著對岸馮·豪森集團軍的薩克森士兵“就在我們眼皮底下殺人放火。到了早晨，村上火焰四起。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在街上奔跑，敵兵在后面追擊，還不時聽到槍聲……遠處，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騎兵，好像在尋找我們的陣地；在平原的更遠處，出現了黑壓壓的人群在前進”。這些人漸漸迫近了；不一會，順著蜿蜒的大道，一營德國步兵排成五路縱隊“昂首闊步地朝著我們開來。大道的那頭，直到目力所及之處，只見密密麻麻的部隊——有騎著馬的軍官作前導的步兵縱隊，有炮車隊，有運輸隊，有騎兵隊——將近一個師的人馬在秩序井然地前進”。

“瞄準！”狙擊兵隊伍在低聲地向后傳遞命令。士兵各就各位，鴉雀無聲。“齊射，先瞄準步兵，各自選定目標！”連長隨即指定了射程。“開火！”一聲令下，沿河一片槍聲。德軍隊伍頓時驚惶失措，暈頭轉向，亂作一團；士兵四逃，戰馬掙扎著，帶著挽具躍起前腿，車子翻倒了，路上尸橫遍地，數以百計。到8時45分，法軍彈藥消耗殆盡。突然間，從左后方射來一陣步槍子彈。原來敵人已經包圍了他們的翼側。“對準后方，上刺刀。”就在刺刀的沖殺下，德軍敗退，法軍奪路而出。

在法軍后撤中，后衛部隊打了幾百次這樣的戰斗，目的是在各集團軍之間保持一條連續的戰線和退到一道可以重新展開攻勢的戰線。老百姓跟著士兵一起走著，匯入南下的人流中；他們中間有步行的，也有乘坐車輛的；從闔家乘坐六匹馬拉的貨車到老年人乘坐的手推小車乃至嬰兒乘坐的童車，各式俱全。條條路上給擠得水泄不通，更增加了混亂。參謀人員的汽車無法通行，軍官們不時咒罵，信息傳遞不了。擠在行軍隊伍中的商用卡車和市內公共汽車在緩慢地開著。這些車輛是征用來的，常見的那些商業標志上面已漆上了軍隊標號，車上載著滿身血污、寂然無聲的傷員。他們中彈受傷，四肢殘缺，兩眼充滿痛楚和對死神來臨的恐懼。

每后撤一步，都充滿著進一步將法國國土拱手送給敵人的莫大痛苦。在有些地方，法國士兵走過自己的家門，他們明白，再過一天，德國人就要闖進去了。“我們是8月27日離開布洛姆貝（Blombay）的，”第五集團軍的一個騎兵上尉寫道，“十分鐘后，那地方就被德國槍騎兵占領了。”那些身經苦戰的部隊，步伐凌亂，無心唱歌，默默地走著。士兵們形容憔悴，既渴又餓，有的心懷怨恨；他們或喃喃不已，埋怨軍官，或竊竊私議，談著賣國賊的行徑。朗勒扎克的第十軍在桑布爾河折損5000人之眾，軍中傳說，法軍的各個陣地都被出賣給了德軍炮兵彈著觀察員。“士兵們吃力地走著，神色顯得疲憊不堪，”朗勒扎克部隊的一個步兵上尉寫道，“他們在一場猛烈的后衛戰之后，已走完了兩天的行程，62公里。”但他們在那天晚上睡了一覺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又“成了新人。幾小時的睡眠竟使他們的精力恢復過來，這真使人驚奇”。他們責問為什么要撤退，上尉以“冷靜而信心十足的語氣”作了一番嚴肅的講話，告訴他們還要繼續戰斗，“并且要讓德國人知道我們的厲害”。

那些騎兵，原來是靴子锃亮照人，軍服光彩奪目，而今則是泥濘滿身，血污斑斑，在馬鞍上搖搖晃晃，疲倦得頭昏目眩。“士兵們困乏得頭也抬不起來，”第九騎兵師的一個輕騎兵軍官寫道，“走向何處，他們似解非解，心中無數，他們茫茫然如在夢中。每當部隊停下，饑餓虛弱已極的馬匹甚至不等卸鞍就奔向草堆，貪婪地吞嚼起來。我們也不再睡覺了；黑夜行軍，白天殺敵。”他們知道德國人已在他們背后渡過默茲河，并在步步前進和放火焚燒沿途的村莊。“羅克魯瓦（Rocroi）是一片火海，附近燒著的谷倉又點燃了左近的森林。”黎明時，敵人的大炮又開始轟鳴，“德國人以實彈向日出鳴了禮炮”。在連續不斷的隆隆炮聲和炮彈爆炸聲中，法國人聽到他們自己的75毫米重炮雄壯的呼嘯。他們堅守著陣地，等待炮戰結束。一個通信員騎馬送來司令部的命令：撤退。他們又開拔了。“我凝視著綠色的田野和在吃草的羊群，心潮澎湃，不禁沉思：‘我們正在放棄的是多么巨大的財富啊！’我軍士兵已振作起來。他們發現了步兵挖掘的一個壕溝系統，大家懷著極大的好奇心仔細地揣摩著，好像這些壕溝是供游客們欣賞的名勝。”

8月25日，符騰堡公爵部下的德軍進入色當，炮擊巴澤耶（Bazeilles），1870年著名的彈盡援絕的一仗就是在這兒打的。法軍德朗格勒的第四集團軍進行了反擊，不讓德軍渡過默茲河。“一場激烈的炮戰打響了，”德國第八后備軍的一個軍官寫道，“這是一場可怕的大搏斗，打得地動山搖。所有年老的本土胡子兵都嚎叫著。”后來，他又參加了“在陡如屋脊、滿是樹木的斜坡上的一場可怕的戰斗，還進行了四次刺刀沖鋒。我們不得不跳過一堆堆我方戰士的尸體。我們向色當敗退了，傷亡慘重，并丟失了三面旗幟”。

那天晚上，法軍炸毀了附近地區所有的鐵路橋梁。要拖延敵人就必須炸毀鐵路橋梁，但一想到來日自己回過頭來反攻時，也許需要這些橋梁、鐵路，又不免感到棘手，不能兼顧，往往要挨到最后一刻才破壞；因此有時不免失之過晚。

但當時面臨的最大困難還是各個部隊的調度問題，因為自各軍而下直到各團都有自己的補給車隊、騎兵和炮兵的輔助隊，以及各自行駛的道路和交通線。一個軍需官就曾埋怨說：“步兵不僅不給運輸車輛讓路，還停在十字路口裹足不前。”當各隊敗退時，他們得按自己的番號把人員重新聚集起來編組，匯報傷亡情況，并領收從后方后備役兵站派來的補充官兵。單單為呂夫的第四集團軍一個軍，就派了8000名后備役兵員，為它逐連進行了補充，這個數字等于它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熱衷于沖動主義的軍官們，自將級以下的傷亡都很嚴重。根據第三集團軍參謀塔南（Tanant）上校的看法，潰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將領們不愿在后方應有的崗位上指揮戰斗，而是跑到前線帶頭沖鋒陷陣，結果，“他們只起了班長的作用，而未盡其指揮官的職責”。

不過，現在他們從慘痛的經驗中得到教訓，改進了戰術。他們開始挖掘戰壕了。有一個團的士兵，只穿著襯衫，整天在烈日底下鏟土，把壕溝挖得深深的，足可以站在里面射擊。另一個團則奉命進入戰壕，組織防守一塊樹林地帶。一夜過去，平靜無事，第二天清晨4時，繼續行軍，“沒有戰斗就走了，簡直叫人難受……因為這時候，我們對節節后退已經滿腔怒火”。

為了盡量少丟失土地，霞飛想在盡可能靠近瀕臨被突破的地方立足拒守。他在第二號通令中規定的戰線是在索姆河畔，在蒙斯運河和桑布爾河下游約50英里的地方。普恩加萊懷疑霞飛的樂觀主義中是不是隱藏著自欺欺人的想法；當然，也有一些人傾向于把戰線向后再退一些，好有時間鞏固防線。自從大敗之日起，巴黎的人們就認為巴黎將是前線，但霞飛的思想卻還沒有轉到首都上來，而國內也沒有一個人對霞飛提出異議。

政府中一片混亂。部長們，據普恩加萊的說法是“驚恐萬狀”，議員們，據梅西米說法，也是“驚慌失措，嚇得臉色鐵青”。與前線失卻直接聯系，又缺乏親眼目睹的真情實況，戰略措施更一無所知，所以只有依靠總司令部“寥寥數語、高深莫測”的公報以及謠傳、推測和相互矛盾的報道，他們在無權過問戰時軍事指揮問題的情況下，是最終需對國家和人民負責的人。不過，從霞飛精心修飾的報告的字里行間，普恩加萊還是可以琢磨出真實情況的明顯輪廓，看出是“一份招認遭到入侵、失敗和丟失阿爾薩斯的三重奏”。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將事實真相公諸全國人民，讓他們對即將面臨的“嚴峻考驗”有所準備。可是，他沒有意識到更為急迫的是必須為巴黎被圍做好準備。

那天一早，身為陸軍部長的梅西米知道了首都處于毫無防備的情況。早晨6時，工兵部隊的伊爾斯肖埃（Hirschauer）將軍前來拜訪，伊爾斯肖埃將軍負責防御工程并兼任巴黎軍事長官米歇爾將軍的參謀長。霞飛的電報雖是幾小時之后才到的，但是伊爾斯肖埃將軍已經私下得到在沙勒魯瓦慘敗的消息，他的注意力已經從邊境一步跨到首都。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梅西米，外圍的防御工事還沒有做好，還不能使用。雖然經過細致的研究并注意到一切必須注意之處，可是“防御工事還是一紙具文，從未動工”。防御工事交付使用的日期原訂為8月25日，但由于對攻勢滿懷信心，被推遲到9月15日。掃除火力障礙，挖掘戰壕，得砍伐樹木和拆除房屋，由于不愿損壞財產，政府對這些重要措施從未下達過明確的命令。火炮掩體和步兵哨所的構筑，鐵絲網的安置，以及建筑胸墻所需木料和軍火貯藏隱蔽所的建造準備工作，甚至連一半都還沒有完成。至于糧食等必需品的供應工作，則幾乎尚未著手進行。身為軍事長官并負責防御工作的米歇爾將軍，也許由于1911年他的防御計劃未被采納，心灰意懶，一蹶不振，缺乏熱忱，工作毫無成效。在他掌權期間，正值大戰爆發，他的工作很快就陷入了混亂和猶疑不決的狀態。梅西米在1911年對米歇爾就評價不高，而今則更是如此，所以在8月13日找來伊爾斯肖埃將軍，令他抓緊被耽誤下來的防御工事，并責成他在三星期內完成。伊爾斯肖埃將軍當場表示辦不到。

“廢話空話已成了家常便飯，”伊爾斯肖埃將軍說，“每天上午，我得浪費三個鐘頭在毫無結果的匯報和討論上。每決定一個問題都得付諸公斷，我雖說是軍事長官的參謀長，但簡直和旅長一樣，不能向負責各戰區的師長發布命令。”

梅西米像往常一樣，馬上召見加利埃尼；兩人正在商議時，霞飛的電報來了。電報的第一句就是把戰事失利歸咎于“我軍在戰場上沒有表現出期望于它的進攻素質”，梅西米一看之下，頓時沮喪萬分；而加利埃尼則希望能得到具體的事實、地名、和戰場究竟距巴黎多遠。

“一句話，”加利埃尼不動聲色地說，“你可以看到，不出十二天，德軍就會兵臨巴黎城下，巴黎有抵抗圍攻的準備嗎？”

梅西米不得不承認沒有；他隨即請加利埃尼過一會兒再來，他想在這時間內征得政府同意任命加利埃尼取代米歇爾任軍事長官。也就在這時，他從另一個來訪者，即總司令部駐陸軍部代表埃伯內將軍那里得到原來派定保衛巴黎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兩個后備師將被調走的消息，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霞飛已令這兩個師北上增援三個本土師；這三個師是地處英軍和海峽之間僅有的法軍；而這時，克盧克的右翼正在向海邊席卷而來。梅西米大發雷霆，堅決表示巴黎屬于后方地區而不是作戰地區；第六十一師和第六十二師屬他而不屬霞飛指揮，沒有他本人和總理或共和國總統的同意，不能任意調離巴黎衛戍區。但埃伯內答稱命令已經“執行”，接著又很尷尬地補充了一句，說他本人就將北上統率這兩個師。

梅西米立即趕往愛麗舍宮去見普恩加萊。普恩加萊聽了這消息也“暴跳如雷”，但同樣束手無策。他問梅西米還留下些什么部隊，梅西米只好回答說，有一個騎兵后備師、三個本土師，現役部隊除了軍區兵站的一些人員外，一支也沒有。在他們兩人看來，法國政府和首都已沒有任何守衛手段，并且也無法調動任何兵力。只有一條路可走——去找加利埃尼。

加利埃尼現在是再次被要求出來取代米歇爾了；在1911年，取代米歇爾當時職務的原本是他，而不是霞飛。加利埃尼二十一歲那年，在他從圣西爾軍官學校畢業后不久，曾以少尉軍階參加過色當戰役。被俘后，在德國待了一些時候，他的德語就是在那里學的。加利埃尼繼而選定到殖民地去繼續從事軍旅生涯，因為法國正在那里“培植軍人”。盡管參謀學院派認為在殖民地服役只不過是一種“旅游”，可是，加利埃尼征服馬達加斯加島的名聲，使他像在摩洛哥的利奧泰（Lyautey）一樣，得到最高軍階。他用德、英和意大利文寫了一本札記《我童年生活的回憶》。他好學不倦，不管是俄語，是重炮發展史，或是關于殖民主義國家的施政比較，他都學習。他戴著夾鼻眼鏡，留著濃濃的灰色須髭；這跟他文雅而高傲果斷的形象似乎不太相稱。他的舉止活像一個閱兵行進中的軍官。他那高瘦的個子，冷漠、不可捉摸而帶有幾分嚴肅的神態，使他跟當時的軍官完全沒有相似之處。普恩加萊形容加利埃尼給他的印象是：“瘦長、挺拔、昂首，鏡片后的兩眼犀利有光；他在我們眼里是儀表堂堂的偉人典范。”

他在六十五歲那年患了前列腺炎；經過兩次手術后，他在兩年后去世。就在上一個月，他因老妻過世，悲慟萬分，又因早在三年前就已辭去他在法軍中的最高職位，個人抱負已經置之度外，自忖行將就木，所以對軍中的政治活動，對政客們的鉤心斗角，感到厭煩。在戰前幾個月，在他4月份退休之前，軍隊中各個派系的明爭暗斗，在他周圍形成一股漩渦。有的要提名他為陸軍部長或是指派他代替霞飛擔任總司令；有的則要削減他的養老金或調走他的朋友。他的日記中充滿了對生活，對“卑鄙的政治行為”，對“野心勃勃的小集團”，對軍中一片松懈狀態的厭惡，以及對霞飛并不十分欽佩的心情。“今天我在樹林里騎馬經過他身旁，他像往日一樣在步行……他是多么肥胖而又笨重！看來三年也難挨過。”現在是法國自1870年以來最艱難的時刻，要他出來接這副爛攤子，手無一個集團軍的兵力去保衛巴黎。他認為為了精神上的影響，為了鐵路運輸、供應和工業生產能力，堅守巴黎是必要的。他很清楚，巴黎不同于要塞，不能從內部進行防御，而必須用一支軍隊作戰于環形防線之外；但這支軍隊得來自霞飛屬下，而霞飛則另有打算。

“他們并不想保衛巴黎，”加利埃尼在正式受邀出任軍事長官的那晚對梅西米說，“在我們的戰略家眼里，巴黎不過是個地理名稱——同其他任何城市并無不同。你叫我拿什么來保衛法國的心臟和神經中樞所在的這個廣大區域？就這么幾個本土師和一師從非洲來的精銳部隊。那僅不過是滄海一粟。倘要巴黎不遭受列日和那慕爾的命運，就得控制住周圍100公里的地方；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一個集團軍的兵力。給我一支有三個現役軍的集團軍，我就答應擔任巴黎軍事長官；這個條件是正式的，是毫不含糊的。具備了這樣的條件，你就可以相信我能守住巴黎。”

梅西米一再向他道謝，“連連跟我握手，甚至還吻了我”，這使加利埃尼深信，“從這種熱忱感激的表示可以想見，我將接手的工作肯定不是一個值得羨慕的差使”。

梅西米連怎樣能從霞飛手中抽調一個現役軍也心中無數，更不用說抽調三個軍了。他唯一可以動用的現役部隊就是加利埃尼所提及的那個非洲師。這支來自阿爾及爾的第四十五步兵師，不是按照正式動員令建成的，而是由陸軍部直接建立的，它剛在南方登陸。總司令部曾一再打電話來要這個師，可是，梅西米決定不惜任何代價把這個“新到的、赫赫有名”的師抓在手里。他還需要五個師。但是，為滿足加利埃尼的條件而強求霞飛調來五個師，那就意味著政府將和總司令之間在權限上發生直接沖突。梅西米感到焦慮。在那莊嚴而難忘的動員日，他曾暗自發誓，“絕不重蹈1870年陸軍部的覆轍”。那時的陸軍部奉皇后歐仁妮命令曾插手派麥克馬洪（MacMahon）將軍向色當進軍。梅西米過去曾經和普恩加萊仔細研究過劃定戰時權限的1913年法令；而后他十分熱情地主動告訴霞飛，他對法令的理解是戰時的政治指導工作交由政府負責，軍事指揮交由總司令負責，這是總司令“絕對和全面負責的范圍”。而且，這一法令，在他看來，還授予總司令在整個國家享有“廣泛的權力”；在軍區，不論在民政還是軍事方面，都享有“絕對”權力。最后他說，“你是東家，我們是為你辦伙食跑腿的。”霞飛一點也沒有感到驚奇，“未作任何商討”就表示同意了。普恩加萊和維維亞尼的新內閣也二話沒說地表示了同意。

而今，梅西米將從哪里找到自己已斷然放棄了的權限呢？為了尋找合法根據，他重新翻遍了法令，差不多一直查到深夜，他總算抓住了責成政府“對國家最大利益負責”這句話。不使首都落入敵人之手確是國家的最大利益，但是，給霞飛的命令將采取什么方式？陸軍部長在痛苦萬分、未曾合眼的下半夜，鼓足勇氣草擬給總司令的命令。從凌晨2時到6時，他苦思冥想了四小時，得出了名為“命令”的兩句話。“命令”指示霞飛，若“我軍不能獲勝而被迫退卻，則至少要派遣三個情況良好的現役軍前來巴黎筑壘營地。接到本令后請即見告”。命令用電報發出之后，于第二天，8月25日上午11時，又派專人送去一份，并隨同送去一封“以個人名義寫的友好的”信件。梅西米在信中還寫了一句：“這份命令的重要性，你是不會不了解的。”

這時，邊境戰事失利和繼續退卻的消息已經傳遍巴黎。部長們和議員們吵吵嚷嚷地要追究“責任”；他們還說公眾也會提出這個要求的。在愛麗舍宮的接待室里，可以聽到抱怨霞飛的竊竊私語：“……一個傻瓜……無能……當場開了他。”作為陸軍部長的梅西米也同樣被他們看中了；他的副官低聲說：“一些院外活動集團要剝你的皮。”在此危急關頭，成立所有政黨的“神圣同盟”并加強維維亞尼新組成的軟弱無力的內閣是必要的。于是，進行了多方面的接觸，邀請了法國政界的頭面人物參加政府。年事最高、最受人敬畏的“法國老虎”克列孟梭，盡管是普恩加萊的勁敵，顯然還是首選人物。維維亞尼發覺他“大為光火”，無意參加政府，他預料這個政府不出兩星期就將垮臺。

“不，不，別打我的主意，”克列孟梭說，“不出兩個星期，你就要垮了，我一點兒也不想插手。”這“一陣感情沖動”之后，他痛哭起來，并擁抱了維維亞尼；但還是一再拒絕加入政府。后來，由前總理白里安、戰前最卓越而經驗豐富的外交部長德爾卡塞（Delcassé）及前陸軍部長米勒蘭（Millerand）三巨頭結成一體，表示愿意作為一個集團參加政府，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讓德爾卡塞和米勒蘭擔任原職，解除現任外交部長杜梅格（Doumergue）和陸軍部長梅西米的職務。內閣于當天上午10時舉行會議，這時候這個令人不快的交易還只有普恩加萊知道，還懸而未決。部長們的腦海里響徹的是槍炮聲，隱現的是潰退的軍隊，是一群群頭戴尖頂帽盔的德軍在挺進南下；然而，他們為了力圖保持尊嚴和表示鎮靜，仍然照會議的常規程序就各部事務依次發言。在他們匯報關于銀行不能兌現、基層法院的法官應征服役是對司法活動的干擾，以及關于俄國人對君士坦丁堡的目的企圖等問題的時候，梅西米是越來越感到心焦。他原先是熱情到極點，現在則是接近絕望的深淵。伊爾斯肖埃披露的情況，耳邊不斷響著的加利埃尼關于德軍十二天就要迫近巴黎的警告，使他產生了“幾個小時等于幾個世紀，幾分鐘等于幾年”的迫切感。當討論轉到涉及巴爾干半島國家的外交問題和普恩加萊提出的阿爾巴尼亞問題時，他怎么也抑制不住而發作了。

“讓阿爾巴尼亞見鬼去吧！”他邊嚷邊狠命地拍了一下桌子。他指責佯作鎮靜是“不體面的蠢事”。普恩加萊力勸他控制住自己，他拒不聽從，并且說：“我不知道你對時間的看法；在我，時間太寶貴了，浪費不得。”說著，就怒沖沖地向他的同僚們宣布了加利埃尼預料德國人在9月5日前將到達巴黎城外的說法。頓時，議論紛紛，有人要求免去霞飛的職務，有人譴責梅西米由“一貫的樂觀主義一變而為危險的悲觀主義”。會議所取得的唯一積極成果是一致同意委派加利埃尼取代米歇爾。

可是就在梅西米回到圣多米尼克街第二次撤銷米歇爾職務的時候，他自己的職位也被米勒蘭、德爾卡塞和白里安搞掉了。他們聲稱他應對公報中虛假的樂觀主義負全部責任；而且，他“太緊張和神經質”，再說，他的位置得讓給米勒蘭。米勒蘭體格結實，習性沉默，態度辛辣，一度曾是社會黨人，確實是智勇雙全，而他的“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以及鎮定自若、臨危不亂”，普恩加萊認為正是當前所迫切需要的。普恩加萊并且認為梅西米“越來越悲觀”。鑒于“預期必將慘敗”的陸軍部長不是最理想的共事人，總統也就同意犧牲他了。不過，要部長一級下臺得搞得體面些：將請梅西米和杜梅格自行辭職，改任無實責的部長；至于米歇爾，將派他出使沙皇俄國。盡管如此，這些安慰性的安排，并沒有為他們企圖作為犧牲品的這些人所接受。

米歇爾在梅西米要他辭職的時候，大發雷霆、怒不可遏。他大聲抗議，拒不離職。梅西米也激動得火冒三丈了；朝著米歇爾叫嚷著，如果他再固執己見，拒不從命，他就得離開這間房間，但不是回到巴黎殘老軍人院中他自己的辦公室，而是將被押送到謝什―米迪（Cherche-Midi）的軍事監獄。就在他們大叫大喊的時候，維維亞尼來了。他勸阻了爭吵，并最后說服米歇爾讓步。

可是在第二天委派加利埃尼為“巴黎軍事長官兼巴黎部隊司令”的正式命令剛簽署不久，就輪到梅西米對普恩加萊和維維亞尼要他辭職而大發雷霆了。“我拒絕將職位讓給米勒蘭。我拒絕為討好你們而辭職。我拒絕當無實責的部長。”如果他們要在梅西米歷盡最近一個月的“繁重工作”之后，將他一腳踢開，整個政府就必須辭職；而且這樣，梅西米說：“在軍隊中，我有軍銜；在口袋中，我有動員令；我將上前線去。”一切說服工作都告無效。政府被迫辭職，第二天進行了改組。米勒蘭、德爾卡塞、白里安、亞歷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以及另兩位新任部長的社會黨人接替了包括梅西米在內的前政府五位成員的職務。梅西米作為陸軍少校加入了迪巴伊的集團軍。他在前線服役一直到1918年升為師長。

他在任內留給法國的遺產——加利埃尼，是手無一個集團軍的“巴黎部隊司令”。在以后十二天黯然無光、錯綜復雜、混亂不堪的日子里，三個現役軍好似一根紅線貫串其間，但它們不是從霞飛那兒唾手可得的。從梅西米的電報中，總司令立即覺察到“政府干預作戰指揮的威脅”。他正忙于抓住可能挖掘出來的每個旅去索姆河畔重啟戰幕，因此，要他為首都抽出三個“情況良好”的現役軍的意見，如同要他屈服于部長的命令一樣，對他是沒有什么作用的。既然不想照辦，他對陸軍部長的命令也就置之不理。

第二天，當加利埃尼派伊爾斯肖埃將軍前來聽取回音時，總司令的副手貝蘭將軍敲著保險箱說：“對，命令在里面，政府要求派三個軍去保衛巴黎是作繭自縛。這可能闖下大禍。巴黎有什么要緊？”這時，米勒蘭也來了。霞飛告訴他要保住巴黎，非野戰軍不行，而這些部隊目前連一兵一卒都是事關國家存亡的戰略和戰役所需。政府的憂心、巴黎所受的威脅，他完全無動于衷。他說，首都就是失守了，也并不意味著戰爭結束。

為了堵塞德軍右翼前面的曠地，霞飛的當務之急是調新成立的第六集團軍進入陣地。該集團軍的核心是洛林軍，是幾天以前才匆忙湊集起來的，并隨即在莫努里將軍統率下投入了邊境戰役。莫努里已退休，他是應召出任指揮的。他是一位身材修長、體弱而骨骼很小的六十七歲的老將，1870年身為中尉時曾負過傷，擔任過巴黎軍事長官和最高軍事委員會成員。霞飛對他的評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軍人”。洛林軍是由第七軍和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兩個后備師組成的。第七軍就是那支在不幸的博諾將軍率領下第一個沖進阿爾薩斯的部隊。第五十五和第五十六兩個后備師是從呂夫軍調來的；他們就像后備軍所一再表現的那樣發揮了可資倚重的英勇氣概。法國之所以能支持下去，這種氣概是因素之一。這兩個后備師接到霞飛命令往西轉移的那一天，還在英勇作戰，力阻王儲部隊向凡爾登和圖勒之間推進。這一戰證明他們在法軍撤退中立了一大功。正當他們的堅決抵抗支持著在重要的布里埃礦區進行反攻的呂夫部隊的翼側時，他們就被從戰場上抽出來了，去支持左翼節節敗退的陣線。

第六集團軍乘火車經巴黎去亞眠轉北上的鐵路，那里因英國遠征軍的軍運需要，已經擁擠不堪。法國的鐵路運輸，雖然沒有像德國參謀部的智囊搞得那樣臻于完善，但由于采取了可與德國的精確性媲美的D體制，調度上即使稱不上順當，也還非常迅速。D體制中的“D”代表“se débrouiller”，意思是“設法擺脫困境”或是“設法應付”。莫努里的軍隊已于8月26日在亞眠下車，但還不夠及時。前線的敗退后撤，快過這支新軍進入陣地；戰線的那一端，馮·克盧克的追擊部隊已經趕上了英軍。

如果那時候能有個觀察員從高空氣球上俯視從孚日山脈到里爾的法國整個邊界，他將會看到70個法國師的紅褲子構成的一道紅色邊緣，和在他們左端近處由四個英國師構成的一個小小的黃色楔子。8月24日，剛從英國來的第四師和第十九旅也到達這里，使英軍的總數達到五個半師。這時候，德軍右翼的包抄計謀已是明擺著的了。英國人發覺他們自己在這條戰線上所守的陣地要比第十七號計劃為他們所安排的更為險要。不過，他們所守的戰線這端并不是孤立無援的。霞飛已趕派索爾代的精疲力盡的騎兵軍去英軍和海峽之間的空隙地帶，增援這里的達馬德將軍率領的三個法國本土師。后來，他們又得到里爾的一師衛戍部隊的增援；里爾是8月24日被宣布為不設防城市并撤出駐軍的。（“如果他們遠及里爾，”德卡斯泰爾諾將軍在不久前說過，“對我方就越是有利。”）霞飛的計劃如想成功，英國遠征軍就必須守住朗勒扎克部隊和新成立的第六集團軍之間的空隙地帶。根據第二號通令，霞飛的意圖是要英國遠征軍服從撤退的統一部署，并在到達圣康坦的索姆河之后堅守不退。

然而，這并不是英國人目前的打算。約翰·弗倫奇爵士、默里和甚至曾一度熱情支持第十七號計劃的威爾遜，面對著這個沒有估計到的危急處境，都非常驚恐。奔向他們而來的德國軍隊，不是一個、兩個軍，而是四個軍；朗勒扎克集團軍在全線退卻，使他們的右翼失去掩護；法國的整個攻勢已告失敗。在同敵人初次交鋒之后，緊接著就遇到這些使人心驚膽戰的情況，約翰·弗倫奇爵士頓失信心，認定戰敗已成定局。那時，他的唯一念頭就是保全這支遠征軍，它幾乎是英國經過訓練的士兵和軍事人員的全部。他擔心遠征軍即將受到包圍，不是從它的左面，就是從它的右面，從它和朗勒扎克所部之間的那道缺口。于是他便以基欽納不讓軍隊作無謂犧牲的命令為由，不再考慮他之所以被派來法國的目的，一心只想使他的部隊脫離險境。就在他的部隊退向勒卡托時，這位總司令和他的司令部于8月25日又后撤26英里，退到索姆河畔的圣康坦。

對蒙斯一戰感到自豪的英國士兵，如今痛苦萬分，看到自己已經陷入不斷退卻的境地。他們的司令急于使他們脫離被馮·克盧克包圍的危險，不讓他們有片刻休息。士兵們沒吃好、沒睡好，在烈日下迷迷糊糊地拖著腳步走著，只要一停下來，馬上就站在那里睡著了。自從蒙斯撤退開始以來，史密斯―多林軍一直在打后衛戰；克盧克的追擊部隊雖一直把它置于猛烈炮火之下，但德國人終未能阻止英軍的行動。

德國士兵認為英國人“因有小型戰爭的經驗”而特別善戰，因此感到自己就像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英國兵在同伊桑·艾倫（Ethan Allen）率領的格林山兄弟會（Green Mountain Men）戰斗那樣，處于不利地位。他們拼命埋怨英國人“詭計多端”。第二天，他們就像在蒙斯那樣，“又不見了，無影無蹤”。

迫于形勢，有些英國士兵不能按原定的路線撤退。軍需司令“伍萊”·羅伯遜（“Wully” Robertson，即威廉·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將軍——一個從士兵步步上升而非科班出身的人物——為了讓他們弄到吃的，命令將物品卸在十字路口。有些東西沒有被他們揀到，德軍對這些食物的有關報道也就加深了統帥部關于敵人在潰退的看法。

8月25日傍晚英軍到達勒卡托時，朗勒扎克緊鄰英軍的那個軍，雖已退到同英軍平行的陣地，但并不比英軍退得更南一些。可是，約翰爵士認為自己被朗勒扎克“輕率”撤退所出賣，心情沉重，感到不能再和他同進退。在他看來，一切不順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朗勒扎克，而不在于敵人。所以他向基欽納匯報部下不愿撤退的情況時說：“我將對士兵們說明，我們的撤退是我們盟軍的行動造成的。”他下令第二天繼續后撤，退到圣康坦和努瓦永。在圣康坦，開始標有前往巴黎的路標，距首都70英里。

8月25日下午，史密斯―多林先于所部幾小時到達勒卡托。他去找約翰爵士時，這位總司令已經走了，只找到他的勤勉的參謀長阿奇博爾德·默里爵士。默里總是那么沉著、四平八穩、深思熟慮，和他的司令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他本該是約翰爵士肆無忌憚、不顧一切時的一個最好不過的輔佐，可以補其不足，但由于他生性謹慎悲觀，對約翰爵士的意氣消沉反而起了催化作用。如今，他焦慮、煩惱、勞累過度，預計黑格軍當夜將在勒卡托東12英里的朗德勒西（Landrecies）安營，但目前其情況不明，他也無法向史密斯―多林提供任何有關它的消息。

黑格部隊在進入朗德勒西途中遇到一支穿著法國軍裝的隊伍。查問口令時，這支隊伍的軍官也是口操法語回答的。可是，突然間這支剛剛來到的隊伍連“一聲招呼也不打，就放平刺刀，沖了過來”。原來這部分士兵是馮·克盧克第四軍的，他們跟英國人一樣，也定于那晚到朗德勒西安營。在接著發生的小沖突中，雙方都投入了約兩個團和一個炮兵連的兵力。黑格由于形勢緊張，又是黑夜漫漫，情況捉摸不定，遂認為自己遭到“嚴重襲擊”，于是打電話給司令部要求“派兵增援……”，并說“形勢十分危急”。

黑格一向冷靜沉著，因此，約翰·弗倫奇爵士和他的參謀人員從他那里聽到這消息，當然不會有別的想法，便相信第一軍處境極為危險。這時，也已經來到圣康坦英軍司令部的默里，一驚之下，垮下來了。在副官送電報來時，他還坐在桌旁察看地圖；但一會兒，另一個軍官發現他已經昏厥倒下。約翰爵士也同樣受到很大打擊。他這個很容易受人感染的搖擺不定的性格，是深受這位統率第一軍的頗能自持的模范軍官的影響的，而且由來已久。1899年，要不是黑格借給他2000英鎊讓他還了債，他早就離開了軍隊。如今，一收到黑格求援的電報，他立即想到被包圍了，甚至想到敵人已經深入第一軍和第二軍之間更糟的情況。英軍司令部作了從最壞處著想的打算，下令變更黑格第二天退卻的路線，不再往東南，而徑直朝南。結果，黑格軍便與史密斯―多林軍在瓦茲河不同岸行軍了。直接聯系就此中斷，一連七天沒有接上。

黑格關于在朗德勒西受到襲擊的這個一時沖動而又言過其實的估計，除使英國遠征軍分成兩部分之外，還造成了一個全不應有的后果：使他這位老朋友和易為人左右的司令更為驚惶失措，使他怎么都得把遠征軍解脫出來的想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堅決，并使他對又一次災難的來臨更為敏感。因為，此刻正值惱人的8月25日之夜已告魚白、行將破曉的時候，他又收到一個叫他心驚膽戰的消息。史密斯―多林送來消息說，第二軍被敵緊困，無法解脫，勢必在勒卡托停下來作戰。司令部人員大為吃驚，認為史密斯―多林大概完蛋了。

實際情況是，史密斯―多林翼側的騎兵師師長艾倫比將軍，晚上發現他準備占領來掩護第二天退卻的高地和山脊已被敵人捷足先登，因無法跟英軍總司令部取得聯系，便在凌晨2時去同史密斯―多林商量。艾倫比要史密斯―多林注意敵人已擺好天一亮就進攻的架勢，并說如果第二軍不能“乘黑夜馬上撤出”，那在白天出發之前將勢必被迫作戰。史密斯―多林把師長們叫來了，據他們報告，還有些士兵在陸續歸隊，很多人還在轉來轉去尋找自己的隊伍，士兵都疲乏已極，天亮以前無法轉移。他們還報告說，道路已為運輸車輛和難民阻塞，而且有些地方被暴雨沖垮了。小屋內頓時寂靜無聲；馬上撤走事不可能，留在原地作戰又有違命令。野戰司令部同總司令部沒有電話聯系設備，第二軍軍長只好自行決定了。史密斯―多林問艾倫比是否愿意服從他的命令，艾倫比答稱愿意。

“很好，各位，我們就打吧！”史密斯―多林宣布之后，又說還要請新開到的第四師斯諾（Snow）將軍也在他指揮下一同戰斗。作戰決定的報告是用摩托車送往英軍總司令部的。早晨5時，司令部里為之一片驚慌。

亨利·威爾遜，像易于激動的梅西米一樣，從滿腔熱情一下子跌到失敗主義的深淵。進攻計劃一失敗，他這位計劃的英方主要出謀者，也隨之泄了氣，至少在那一時刻是如此；并且對他的那位反應遲緩而在很大程度上能為他所左右的上司還產生了重大影響。盡管他樂觀、機智和談笑風生的本性是壓抑不了多久的，而且是日后幾天維持士氣的唯一因素，但此時此刻，他已深信不疑大難即將臨頭，而且對于這個大難或許也已感有責任。

通信員奉命乘摩托車去請史密斯―多林到他就近的地方聽電話。“如果你停在那里作戰，”威爾遜對史密斯―多林說，“就會重演色當之戰。”他在26英里以外的陣地上堅決認為情況還不至于危急到需要停下來作戰的地步。因為“攻打黑格的軍隊是不可能再打你的”。史密斯―多林再次耐心解釋了情況，并且告訴他，現在怎么也無法脫身，戰斗已經打響，而且在他說話的時候已能聽到槍炮聲。“那就祝你順利吧，”威爾遜回答說，“三天來，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像你這樣輕松愉快的聲音。”

8月26日，第二軍和斯諾將軍的一個半師在勒卡托一連打了十一個小時的后衛戰，法國軍隊這天也一樣在打后衛戰，他們在撤退中，每天都得打后衛戰。馮·克盧克已下令要在8月26日這天繼續“追擊潰敗之敵”。作為施利芬“袖拂海峽”箴言的最忠實的信徒，他繼續向西推進；同時，為了包抄英軍，他已命令他兩個右翼軍往西南方向強行軍。結果，這兩個軍這天根本沒有跟英軍接觸，倒是碰上了“強大的法敵部隊”，這就是達馬德的幾個本土師和索爾代的騎兵軍。史密斯―多林曾將他預料的情況通知他們，所以，他們在英軍翼側周圍擺開架勢，以佯動攔阻了德軍。這一行動對德軍所起的阻滯作用，史密斯―多林后來承認說，“還有那些本土軍所表現的英勇氣概，都極為重要，關系到我們的存亡；要不然，可以肯定在26日那天，還會另有一個軍前來攻打我們”。

在馮·克盧克左方，由于情報錯誤，或是由于調度不當，他的另一個軍未能趕上。因此，盡管他部署了一支優勢兵力，而在勒卡托一戰中，他實際上只是以三個步兵師對付史密斯―多林三個師的。不過，他還是調集了五個師的炮兵在黎明時進行炮擊。英國士兵從法國的老百姓——婦女也參加了——匆匆忙忙挖得不夠好的狹窄的戰壕中用來復槍急速而準確的射擊擊退了德國步兵的襲擊。然而，德國兵還是一浪接一浪地向他們猛撲過來，并且終于前進了。在一個地段，德國步兵圍住了一連阿蓋爾[[1]](#_1__A_Gai_Er__Argyll__Ying_Guo_S)團士兵。他們“不斷向這些英國兵發出‘停止射擊’的警告，并且用動作示意勸士兵投降，但是均歸無效”，這些人一直用步槍連續射擊，“打死了一個又一個的德國兵，還數著命中的數字”，直到最后，全連被沖垮覆滅。戰線上的其他地方也被打開了很多大缺口。脫離戰斗——這在戰場上是最困難的——一時還辦不到；不過到了清晨5時，史密斯―多林認為時機已到，是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的時刻。但由于防線上的缺口、士兵的傷亡以及敵軍在某些地方已經滲透進來，脫離戰線進行退卻的命令已無法同時送達各個隊伍。有的隊伍在陣地上又堅持了好幾小時，繼續沉著應戰，直到被俘或在黑夜逃脫。戈登高地人團的一個營則始終沒有接到命令。結果，這個營除少數幾個人得以逃生外，不復存在了。在勒卡托作戰的這三個半師，僅僅這一天就損失了8000多人和38門大炮，比在蒙斯戰役的損失多一倍以上，相當于法軍8月份傷亡率的20%。在失蹤的人中，有些人在德國的俘虜營里度過了以后四年的歲月。

由于黑夜，由于急行軍的疲勞，由于自身傷亡嚴重以及英國人具有在黑暗中“溜之大吉”的慣技，德國人并沒有隨即跟蹤追擊。克盧克下令停止前進，他預期右翼軍的包抄行動第二天就會奏效。但到了第二天，史密斯―多林毅然決定掉轉頭來同優勢敵人進行激戰，成功地阻止了敵人所計劃的包抄行動，并使英國遠征軍未遭覆滅之災。

史密斯―多林到達圣康坦時，發現英軍總司令部已在中午正當遠征軍還在進行生死存亡斗爭之際撤走，后退20英里遷到努瓦永。在圣康坦市里的部隊，看到首長們在北方還炮火連天的時候竟乘坐汽車向南揚長而去，不禁感到泄氣。一個老百姓提出了必然會有的那種看法：“26日那天，弗倫奇勛爵和他的參謀完全昏了頭，事實就是如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這時已經鎮靜下來。他問道：“除了從勒卡托方向傳來的槍炮聲之外，關于第二軍，我一無消息。第一軍能夠給它些什么幫助？”英軍總司令部已經驚呆，無法給他任何答復。黑格得不到司令部的回音，就設法跟史密斯―多林取得直接聯系。他說可以聽到戰場的聲音，但由于兩個軍分開了，“我們拿不定主意應該怎樣相助”。可是，他發這份電訊時，戰斗已告結束。這期間，英軍總司令部對第二軍已不存希望，認為已經完結。仍然擔任聯絡官的于蓋上校在晚上8時發給霞飛的電報中反映了英軍總司令部的這種情緒，他說：“英軍已敗，看來它已失去凝聚力。”

半夜1時，來到法國只六天而后四天一直在作戰的史密斯―多林到了努瓦永；看到英軍總司令部人人都已入睡。約翰·弗倫奇被從床上喚了起來，穿著睡衣出來相見。看到史密斯―多林來了，還活著，而且說第二軍并沒有完結而是保全了下來，他就申斥了一番，說史密斯―多林對形勢過于樂觀。約翰爵士對史密斯―多林的任命，從一開始就很為不滿，因他擠掉了他自己的人選；而今在飽受驚駭之后，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加按捺不住，大發雷霆。他認為此人甚至還不是一個騎兵，但竟自以為是地在勒卡托無視參謀部的命令。盡管約翰爵士不得不在公文[[2]](#_2__Gong_Wen_Bao_Cheng___8Yue_26)中承認史密斯―多林采取這一行動的結果是“拯救了左翼”，但他還是心有余悸，而沒有很快地平靜下來。在幾千名失蹤的士兵中，有的混在步履艱難的法國難民隊伍里跟著撤退了，有的通過德國防線跑到安特衛普轉到英國后又回到法國來了。在這些士兵最后重又歸隊之前，勒卡托一戰的損失看來似乎要比實際情況嚴重得多。英國遠征軍在戰爭頭五天中的傷亡，經查明總數接近15000名；這個數字增加了總司令的焦急不安，使他更急于把軍隊撤出戰線，擺脫危險，離開法國。

當勒卡托之役鏖戰正酣之際，霞飛在圣康坦召集了由約翰·弗倫奇爵士、朗勒扎克以及他們的參謀們參加的會議，解釋第二號通令的各項指示。他一開始，彬彬有禮地詢問了英國遠征軍的情況，不料這下子可引起了約翰爵士的長篇牢騷。他說，他一直在遭受著數量上占優勢的敵人的猛烈攻擊，他的左翼正面臨被包抄的威脅，他的右翼由于朗勒扎克的輕率撤退已失卻掩護；并說他的部隊疲乏已極，不堪重展攻勢。霞飛一向認為在參謀面前保持鎮靜是首要的，這時也不禁為這位陸軍元帥的“激動聲調”震驚不已。而朗勒扎克聽了亨利·威爾遜語氣比他的司令的談話較為緩和的翻譯之后，只是聳了聳肩。霞飛不能對英軍發布命令，只好表示希望英軍司令能按前天的新通令中的計劃行動。

約翰爵士一聽，神色驚訝，說他從沒有聽說有這樣一道通令；默里因上一夜嚇垮了，沒有出席討論會。這時，法國人感到驚奇、表示疑問的各種目光，都一齊投向威爾遜。威爾遜解釋說，命令是在夜間收到的，尚未進行“研究”。霞飛隨即說明了通令的各項規定，不過，他顯然已失卻信心。討論進行得斷斷續續，冷場的時間越來越長。這種場面叫人局促不安，以至難以忍受。會議只好就此結束，在聯合作戰問題上沒有得到英國人的同意。霞飛帶著左翼力量“薄弱”的印象回到法軍總司令部，但在那里等候他的又是各條戰線都告薄弱的消息，以及包括參謀人員在內的各級軍官的沮喪情緒；及至夜間，最后還來了于蓋那份說英軍已經“失去凝聚力”的灰溜溜的電報。

馮·克盧克對英軍也持同樣看法。他下令于27日“切斷在全面西逃的英軍”，并向德軍統帥部匯報說他即將全部圍住“所有的六個”英國師（事實上，只有五個在法國），“如果英軍在27日停下來抵抗，那么，兩面包抄也許還可以獲得巨大勝利”。德國統帥部鑒于在攻克那慕爾之后第二天送來的這個光輝燦爛的前景，跟比洛聲稱他的對手法軍第五集團軍已成“潰軍”的報告是吻合的，由此堅定了勝利在即的看法。8月27日，德軍統帥部正式公報宣布說：“德軍在連告大捷之后，已從康布雷（Cambrai）到孚日山脈一帶進入法國。”“敵軍已全線潰敗，在全面撤退……對于德軍的挺進已無法做任何有力的抵抗。”

在群情歡騰的氣氛中，馮·克盧克也如愿以償。正當他強烈反對馮·比洛要他圍攻莫伯日的命令，認為這是比洛的職責所在，并且要求告訴他是否仍然要聽命于比洛的時候，德軍統帥部于8月27日恢復了他的獨立自主權。統帥部將右翼三個集團軍置于一人領導下的嘗試，既已引起了不少摩擦，也就把它放棄了。在奔向勝利的道路上，余下的道路看來已是坦途的時刻，這個問題也就顯得不重要了。

馮·比洛卻非常惱火。他身居右翼中路，總是為兩支友鄰部隊拒絕跟他步調一致所苦。比洛早已警告過統帥部，說豪森的延誤已使第二集團軍與第三集團軍之間形成了一個“令人遺憾的缺口”。至于豪森，也同樣非常惱火；此公除了頂禮膜拜官銜之外，最熱衷的便是每天晚上要住得舒舒服服。8月27日是他進入法國的第一天；可是這一夜，他竟沒有找到一個可供他和陪同他前來的薩克森王儲住宿的大別墅。他們只好睡在一個專區區長家里，屋里凌亂不堪，“甚至連床都沒有鋪好”。第二夜情況更糟，他得忍氣吞聲住在一個肖邦先生家里，一個農民的家里！那兒，飯菜既差，住房又“不寬敞”，參謀機構得設在附近教區長的住宅里，教士已經上戰場去了，教士的老娘看起來活像個巫婆，轉來轉去“巴望我們都倒大霉”。這時候，天空中的道道紅光說明他的部隊剛路過的羅克魯瓦在遭受火劫。之后的一個夜晚總算幸運，他們是在一個富有的法國實業家布置得很講究的屋子里度過的。那晚，主人“不在家”。在這里，豪森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倚墻而長的梨樹雖然果實累累，但“很遺憾，梨兒還沒有熟透”。盡管如此，他還是很高興，能和明斯特爾伯爵、少校基爾曼塞格（Kilmansegg）伯爵、輕騎兵部隊的舍恩貝格―瓦爾登貝格（Schoenburg-Waldenburg）親王以及充當天主教教士的薩克森公爵馬克斯歡聚一堂，并向他們傳達了他剛在電話中接到他的姊妹馬蒂爾德（Mathilda）公主祝愿第三集團軍勝利的振奮人心的消息。

豪森抱怨說，他的薩克森兵在敵國行軍已經十天，天又熱，還得不時作戰。供應總是趕不上，缺少面包肉食，部隊得靠當地的家畜過活，馬匹的飼料又不足；然而，他還是設法做到平均每天行軍23公里。事實上，這是對德軍最起碼的要求。在這車輪形包圍圈外緣的克盧克軍，每天行軍30公里，甚至還多一些，而在強行軍時，每天達40公里。他之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只讓士兵沿路就宿，而不讓他們散到路兩邊的地方去宿營。這樣，一天就可多跑六七公里。但由于德軍運輸線拉得很長，部隊的前進又遠遠超過了運送軍用物資的鐵路線終點，食物往往供應不上。馬匹只好到田里去吃還未成熟的莊稼。士兵整天行軍也只吃些生胡蘿卜和卷心菜，別的什么也沒有。他們既熱又累，兩腳跟他們的敵人一樣疼痛難熬。他們越來越饑餓難忍，然而還是按日程表行軍不誤。

8月28日，馮·克盧克非常高興，在布魯塞爾去巴黎的半途上，接到德皇來電，對第一集團軍的“決定性勝利”“朕甚感激”，并對第一集團軍已經迫近“法國心臟”表示祝賀。當夜，借著野營的火光，軍樂隊奏起了《萬歲勝利者的桂冠》的凱旋曲。克盧克的一名軍官在日記中寫道：“樂聲被成千人的歌聲淹沒了。第二天早晨，我們繼續行軍，希望在巴黎慶祝色當戰役紀念日。”

同一天，馮·克盧克腦海里出現了一個扣人心弦的新主意；這個主意不出一個星期就將在歷史上留下它的痕跡。偵察到的情況說明，在比洛面前退卻的法國第五集團軍，現正在向西南方向移動，而且將穿過他的行軍路線。克盧克認為這是一個機會，可以“抓住該軍翼側……迫使該軍離開巴黎，然后對它翼側包圍”。攻擊這個目標，目前在他看來比切斷英軍去海濱的退路更為重要。他向比洛建議，他們兩軍應向“內線轉動”。但在還未作出任何決定之前，德國統帥部的一個軍官帶來了一份致所有七個集團軍的新通令。

據王儲的看法，德國統帥部深受“一片勝利感”的鼓舞，不過它還是注意到法軍從洛林轉移的情況，因而這時通令要求“迅速前進，防止敵軍有生力量的集結，并盡可能多地削弱法國可用以繼續戰斗的一切手段”。克盧克集團軍應向巴黎西南的塞納河推進；比洛集團軍應徑向巴黎移動；豪森、符騰堡公爵和王儲應率領他們各集團軍分別南下巴黎以東的馬恩河、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埃佩爾奈（Epernay）和維特里——勒弗朗索瓦。雖然命令對魯普雷希特親王統率的第六集團軍和第七集團軍突破法國堡壘線這一方面有點含糊，但“如果敵人退卻”，要他們越過圖勒和埃皮納勒之間的摩澤爾河則是肯定的。不讓法國有時間重新集結力量組織抵抗，“急需”的是速度。1870年的往事記憶猶新，德軍統帥部于是命令“對群眾采取嚴厲措施，盡快粉碎自由射手的任何抵抗”，并防止法國“全民性暴動”。預料敵人將先在埃納河進行頑抗，然后退向馬恩河，德國統帥部于是在此附和了克盧克的新主意，最后提出“這可能需要將進軍方向從西南轉向正南”。

除了這一建議外，8月28日的這道命令是按照原來的作戰計劃行事的。不過執行這道命令的德軍已不復是原計劃的數目。它們減少了五個軍，等于減少了整整一個野戰集團軍。克盧克留下兩個后備軍包圍安特衛普和守衛布魯塞爾以及比境的其他地方；比洛和豪森各少了一個軍，調到俄國戰線去了；還有相當于一個軍的幾個旅和師被留下來包圍日韋和莫伯日。為了能按照原計劃控制地盤和讓第一集團軍從巴黎西面通過，右翼軍力就勢必拉開得更為稀疏，要不就得讓所屬各部隊之間出現缺口。事實上，這種情況已經發生：8月28日，豪森部隊由于正在色當南面激戰的符騰堡公爵呼吁“立即援助”，已被拉向左面，因此右面不能接上比洛所部，反而要比洛掩護他的右側。本應該在這兩軍銜接處的那兩個軍，已首途去坦嫩貝格了。

德國統帥部于8月28日第一次感到放心不下的苦楚。毛奇、施泰因和塔彭焦慮地討論了是否要從魯普雷希特集團軍中抽調援軍去右翼的問題，但又不愿放棄一舉突破法國堡壘線的企圖。施利芬曾夢寐以求但終于放棄了的，以左翼突破洛林同時以右翼包圍巴黎的道地的坎尼戰役式的兩面包抄，眼前看來頗有成功可能。魯普雷希特在猛撲埃皮納勒；他的部隊已兵臨南錫城下，并在猛攻圖勒。自攻陷列日以后，正如塔彭上校所說，其他筑壘地帶已“威風掃地”，似乎每天都有可能為魯普雷希特所突破。比利時鐵路被破壞，一下子要調動幾師兵力是怎么也辦不到的，所以，德軍統帥部深信奪取圖勒和埃皮納勒之間的沙爾姆峽口是可取的；而且，用塔彭的話說，“可以大規模地包圍敵軍，若能獲勝，可以就此結束戰爭”。結果是魯普雷希特率領的左翼仍然全部保存了26個師的實力，而與右翼三個集團軍經削弱后的實力相仿。這絕不是施利芬心目中的比例，施利芬在臨終前猶喃喃叨念著“務使右翼強大”。

繼比利時的劇變之后，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視著布魯塞爾和巴黎之間的戰事；殊不知這些時日以來，洛林在進行著一場打得更猛、為期更長的爭奪法國東邊門戶的持久戰。沿著埃皮納勒到南錫長達80英里的戰線上，兩支德軍在大舉進攻德卡斯泰爾諾和迪巴伊的法軍。戰爭處于難分難解、勢均力敵狀態。

8月24日，魯普雷希特集結了400門大炮，還從梅斯兵工廠運來一些大炮，發動了一系列的兇猛攻勢。法軍這時將全部技能用在防御上了，他們挖了戰壕，并準備了多種多樣臨時性的、巧妙的防彈掩蔽體。魯普雷希特的進攻未能把福煦的第二十軍從南錫前面的陣地逐出去；不過，在更南面卻奪下了莫爾塔涅河（Mortagne）對岸的一塊突出陣地。莫爾塔涅河是沙爾姆峽口前的最后一條河流。法國人立即看到翼側攻擊的機會來了。這次他們準備了大炮，野戰炮連夜運來了。25日上午，在德卡斯泰爾諾“前進！全線出擊！拼啊！”的命令下，部隊發動了攻勢。第二十軍從大庫羅訥城內的小山頂上猛沖而下，一舉收復三個城鎮和十英里的國土。在右側，迪巴伊所部經過一天激戰，取得了同樣的進展。阿爾卑斯山地師師長莫迪伊將軍在作戰前檢閱部隊時讓士兵們合唱了勇敢無畏的《西迪卜拉欣》[[3]](#_3__Xi_Di_Bu_La_Xin__Sidi_Brahim)之歌。

前進，前進，向前進！

打擊法國的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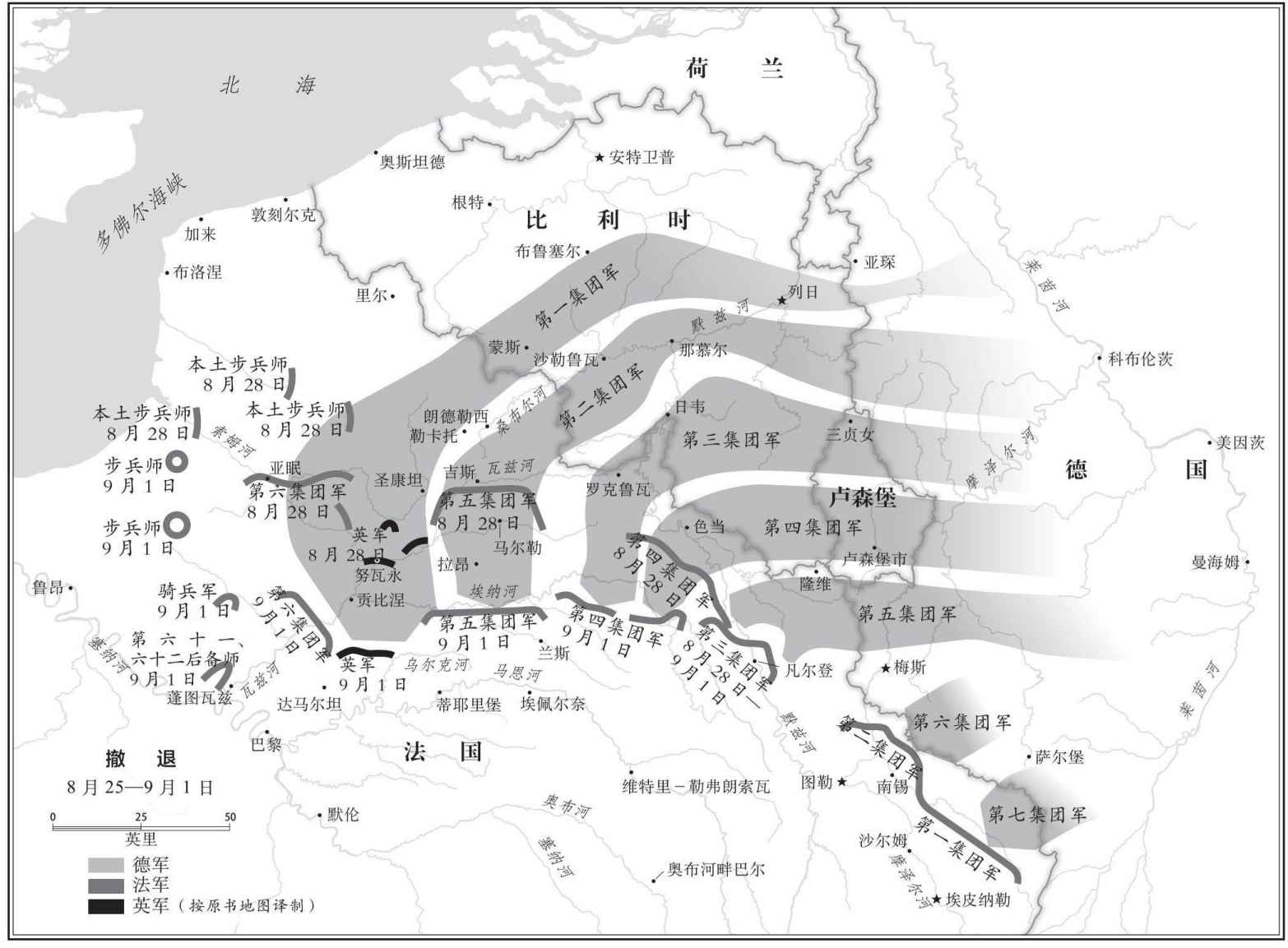
戰斗一天下來，許多零零落落失卻戰斗力的隊伍還不清楚他們是否已經攻下了既定目標克萊藏坦（Clezentaine）。莫迪伊將軍在馬背上看到一連面容憔悴、汗流浹背的士兵在尋找宿營地，就一面揮臂指著前面，一面向他們叫喊著：“騎兵們，就在你們占領的村子里睡吧！”

爭奪沙爾姆峽口和大庫羅訥的戰役激烈進行了三天，而于8月27日達到最高潮。那天，霞飛困于別處叫人憂郁和沮喪的情況，苦于沒有什么可資表揚的戰績，便向第一和第二兩集團軍“勇敢和不屈不撓的精神”表示了敬意。洛林戰役開始以來，他們已打了兩個星期而未曾稍事休息，他們抱定“必勝之心”，竭盡全力堅守著國門，抵住敵人攻城錘的猛撞猛打。他們懂得，如果這里讓敵人突破了，戰爭就完啦。他們不知道什么坎尼之戰，但卻深深懂得色當戰役和包圍是怎么一回事。

堅守堡壘線是勢在必行，是存亡所系，但霞飛左翼的情況則更危如累卵，使得他不得不從東面的軍隊中調來他們的砥柱——“必勝意志”的象征——福煦。霞飛現在需要他來穩定節節敗退的左翼。

第四、第五集團軍之間危險的缺口越來越大，這時已經擴大到30英里。這是在第四集團軍德朗格勒將軍不愿讓德軍不戰而越過默茲河，牢守色當南面的高岸，而于8月26日至8月28日激戰三天堵住符騰堡公爵所部時造成的。德朗格勒認為，他的部隊在默茲河一戰中建立的功績洗雪了在阿登山區敗北之恥；但第四集團軍之能堅守則是以失掉跟朗勒扎克部隊的聯系為代價換來的。朗勒扎克所部在繼續退卻，使自己靠第四集團軍一邊的翼側失去了掩護。霞飛就是為了要控制住這個空白地帶而召福煦來的。他命令福煦統率由他從第三、第四集團軍中抽調出來的三個軍組成的一支特種部隊[[4]](#_4__Zhe_Zhi_Bu_Dui_Zai_9Yue_5Ri)。福煦也就在接到命令那天得到噩耗：他的獨子熱爾曼·福煦（Germain Foch）中尉和女婿貝古（Bécourt）上尉都已在默茲河陣亡。

在再西面朗勒扎克所部和英軍所在地區，霞飛仍然希望能在索姆河畔穩下陣來，但是他們的陣地猶如沙灘上的城堡，一垮再垮。英軍總司令絕不會同意在這條戰線上堅持到底，他和朗勒扎克的合作已到了最低限度；至于朗勒扎克，霞飛對他已逐漸失去信心，看來也不復可以信賴。8月份霞飛雖然撤掉了一些將軍，但要下手免去朗勒扎克這樣有聲譽的人的職務，還是有所顧慮。參謀部繼續在尋找進攻失利的替罪羊。“已有三個將軍的烏紗在我公事包里。”一個參謀人員從前線出差回來匯報說。不過，對朗勒扎克絕不能草率從事。霞飛認為第五集團軍需要有一位更有自信心的領導，然而在撤退當中撤換司令可能會影響該軍士氣。他對一個副官說，這個問題已使他失眠兩夜——就所知情況來看，這是戰爭中僅有的一次把他搞得如此心神不寧。



在這期間，從巴黎前來應該參加新成立的第六集團軍的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后備師忽告失蹤。司令埃伯內將軍整日尋找，但誰也不知道他們的下落。霞飛擔心第六集團軍下車地區很快會被敵軍竄犯；因此，為了爭取時間讓他們進入陣地，遂不顧一切，命令第五集團軍掉轉頭來反攻。這就需要第五集團軍向西在圣康坦和吉斯之間發動攻勢。分工與第五集團軍聯系的霞飛的聯絡官亞歷山大上校口頭向朗勒扎克的司令部傳達了這道命令。那時，司令部已遷至圣康坦東約25英里的馬爾勒（Marle）。與此同時，為了盡力撫慰約翰·弗倫奇爵士的不滿情緒并鼓舞他的斗志，霞飛也向他發了電報，對英國戰友給法軍的英勇援助表示了深摯感謝。不過電報剛發出，霞飛就得到消息說，英軍已經撤出圣康坦，從而使朗勒扎克的左側失卻掩護，而這時算來正是朗勒扎克發動進攻的時刻。根據于蓋的另一份“喪報”，英國遠征軍“已經潰敗，無能為力”，五個師中有三個師不經充分休整，也就是說不“休息數天甚至數星期”，就不能重上戰場。鑒于約翰·弗倫奇爵士向基欽納的匯報不僅情況和于蓋的“喪報”相同，而且措辭也幾乎一樣，所以，于蓋的反映雖只是英國將領們的心情而不是部隊的情緒或事實真相，對他也就不能有所責難了。至于他報告中最關緊要的一條消息，則是亞歷山大上校說朗勒扎克在阻撓進攻命令的執行。

這道命令，朗勒扎克的很多軍官是熱情支持的，但朗勒扎克本人不僅認為“簡直是愚蠢之極”，并且還這么說了。要第五集團軍轉而向西進攻，無異于引敵上門前來進攻其沒有掩護的右翼。他認為，必須整個脫離接觸，進一步退到拉昂（Laon），才能建立一條牢固的陣線和發動可操勝算的進攻。如今倘按霞飛命令的方向進攻，他就得做一次復雜艱難的調度，須將處于半打亂狀態的部隊在半路上掉轉頭來，而這從他當時的處境和他右翼所受的威脅看來是危險之舉。他的作戰處長施奈德（Schneider）少校企圖向亞歷山大上校說明這些困難，而亞歷山大則表示驚訝不解。

“什么！”亞歷山大說，“哎，還有什么比這再簡單的！你現在面朝北方，我們只是要你面向西從圣康坦發動進攻。”他張開五個手指作為五個軍，在空中做了一個直角轉彎的手勢。

“別胡說啦，我的上校！”施奈德嚷著，非常氣憤。

“也罷，如果你什么也不愿干……”亞歷山大上校說，最后還蔑視地聳了聳肩膀，這下子可使在場的朗勒扎克忍不住發火了。他詳詳細細但不太策略地談了他對總司令部戰略的看法。事到如今，他對霞飛和總司令部的信心和他們對他的信心，已到了半斤八兩的地步。他的一側是一個拒絕聯合行動的獨立行事的外國將軍，另一側則是一無掩護（福煦特遣隊是過了兩天，到8月29日才開始組織的），而今卻要他反攻，他確實感到壓力很大。按他的性格，這是他受不了的。給他的任務，事關法國存亡，而他對霞飛的見解又毫無信心；他只好以發脾氣和冷嘲熱諷來消愁泄憤。大家也都了解，即使在和平時期，他也是這種脾氣。他還詳細解釋了他對他稱之為“坑道工兵”的霞飛其人所以不尊重的原委。

“我見到許多軍官圍著朗勒扎克，”前來看他的某軍的一個參謀說，“他看來非常不高興，粗聲粗氣地在發表意見；批評總司令部和我們協約國的時候，也沒有琢磨字眼，而是直著喉嚨說的；對總司令部和英國人，他尤其氣憤。他談的主要意見只是希望別人不要干預他，需要后撤多遠，他就后撤多遠，他會掌握時機的，到時候，他會把敵人一腳踢回到他們老家去的。”用朗勒扎克自己的話來說，“我憂慮已極，甚至對參謀部，我也不想掩飾”。在下級面前顯示出焦慮不安已經是夠糟糕的了，當眾指責總司令部和總司令，更是錯上加錯，因此朗勒扎克當司令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數了。

第二天，8月28日一早，霞飛親臨馬爾勒。他看到朗勒扎克形容枯槁，兩眼布滿血絲，反對反攻計劃，情態緊張。朗勒扎克再次堅決認為他全軍西去必將遇到敵人攻其右側的危險，霞飛勃然大怒，叫嚷著：“你難道不想當司令啦？必須出發！沒有商量余地。這一戰的成敗全在于你。”這個突然爆發的驚人怒吼，如雷轟鳴，響聲遠達巴黎，而且是越來越響，所以，第二天傳到普恩加萊總統時，在他日記中就出現了這樣的記載：霞飛威脅朗勒扎克，如果他再躊躇不決，或是違抗進攻命令，就把他槍斃。

朗勒扎克深信這份作戰計劃是錯誤的，表示沒有一紙書面命令就拒不行動。霞飛終于冷靜下來，同意了朗勒扎克的要求，向朗勒扎克的參謀長口授了命令，并簽了名。在霞飛看來，一個司令官只要懂得給他的命令、任務，就不會再有什么理由煩惱不安；而且，他還可能向朗勒扎克說了后來他命令貝當（Pétain）在有史以來最猛烈的彈雨之中堅守凡爾登時所說的那句話：“好，朋友，你現在很平靜了。”

說平靜，還差幾分；朗勒扎克接受了任務，但是堅稱不到第二天上午他不能準備就緒。整整一天，當第五集團軍各軍越過各自的陣線，進行錯綜復雜的轉向調動時，法軍總司令部接二連三地用電話催著“快點！快點！”，直到朗勒扎克盛怒之下命令部下不接電話為止。

同一天，英國的首長們也一直在催趕遠征軍向南轉移。他們急得甚至不讓士兵休息；拉開同敵人的距離固屬需要，但這些士兵更需要的則是休息。8月28日整整一天，馮·克盧克的各路縱隊并沒有騷擾他們；可是，約翰·弗倫奇爵士和威爾遜的急于趕快撤退，竟到了下令將運輸車輛上“所有軍火彈藥及其他凡屬非必需的輜重統統丟掉”以裝載士兵的地步。扔掉軍火彈藥就是說不想再打了。既然英國遠征軍不是在英國土地上作戰，其司令也就準備將部隊拉出戰線，而不顧撤走對盟軍的后果。法國軍隊已初戰失利，而今情況嚴重，甚至已陷入絕境。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失敗，每個師都肩負著重任。但是，法國既沒有被敵人沖垮，也沒有被敵人包圍，它在繼續奮戰。霞飛的意圖也無不表示要繼續戰斗下去。然而約翰·弗倫奇爵士困于當前的危險是致命的危險的想法，決心保存英國遠征軍，使其不為法國的失敗所殃及。

戰地的司令們并不贊同司令部的這種悲觀主義。在接到實質上是拒絕再作任何作戰打算的命令時，他們都吃了一驚。黑格的參謀長高夫將軍一怒之下，把命令撕了。一直認為自己的形勢“極好”，敵人“僅僅是小股小股的，而且還很有禮貌地保持在一定的距離之外”的史密斯―多林，把發給他的第三師和第五師的這道命令撤銷了。不過，他給第四師斯諾將軍的電訊到達時，已為時太遲。斯諾在接到“亨利給斯諾鮑爾（Snowball）”的直接命令要他“把你的跛腳鴨子裝起來快走”之后，已經遵辦，并對士兵造成了“大潑冷水的作用”，使他們認為自己的處境已危險到極點，把替換的衣服和靴子都丟了。

英軍在難以言狀的塵土飛揚、酷熱難當、沮喪和困乏之中繼續退卻。兩個營疲倦不堪的殘部拖著步子走過圣康坦市區，就停下來不走了。他們把武器堆在火車站上，人坐在車站廣場上，拒絕再走。他們告訴布里奇斯少校（布里奇斯少校的騎兵奉命負有在部隊全面撤離該城以前堵住德軍之責）說，他們的指揮官們為了不讓圣康坦再遭炮擊，已書面答應市長投降。布里奇斯不愿觸犯既是他的熟人、級別又高于他的那些營長，他竭力想搞一個樂隊來鼓舞那兩三百名亂躺在廣場上萎靡不振的士兵。“為啥不能這樣做呢？附近有一家玩具店可供應我和號手們一只蹩腳的笛子和一面鼓，于是我們就環繞著像死人一樣躺在噴泉四周的士兵們齊步前進，吹奏著英國擲彈兵進行曲和提珀雷里（Tipperary）進行曲，同時死命地打著鼓。”結果，那些士兵坐了起來，開始笑了，高興起來了；接著就一個一個站了起來，列成隊伍，“最后，我們在我們臨時湊成的樂隊的樂聲中從容開拔，進入夜幕。這時，我們的樂隊又增加了兩只口琴”。

約翰·弗倫奇爵士并沒有因短笛戰鼓而高興起來，他只看到自己的戰區；他認為德皇“在怨恨交加之中，確已不顧其他戰場虛弱的危險”，集中了龐大兵力來“消滅我們”。他要求基欽納將第六師給他派來，基欽納告訴他，第六師要等來自印度的部隊到英國接防之后，才能脫身。他認為這個拒絕“太令人失望且大為有害”。事實上，在蒙斯之驚后，基欽納曾一度考慮過派第六師在比利時德軍的翼側登陸。費希爾和伊舍一直鼓吹的要讓英國遠征軍在比利時獨立行事而不做法國戰線附屬品的那個老主意，英國人是始終縈繞于懷的。這個主意如今小規模地試了一試，兩個月后在安特衛普又試了一次，但都沒有得逞。一支英軍于8月27日和28日在奧斯坦德登陸，但不是第六師，而是三營英國海軍陸戰隊。此來的企圖是想引開克盧克部隊。六千比利時士兵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六千人是在那慕爾淪陷時隨法軍撤退，用英國船從海路運到奧斯坦德的；事實上，他們已經不堪再戰。這時候，法軍的節節敗退已把戰線撤得遠遠的了，英軍登陸吸引敵人的行動已失去意義，陸戰隊只好于8月31日重新上船回國。

在陸戰隊重新上船之前，約翰·弗倫奇爵士于8月28日撤走了他在亞眠的前進基地；因為，這地方已經受到馮·克盧克向西掃蕩的大軍的威脅。第二天，他又下令將英軍的主要基地由勒阿弗爾后移到諾曼底半島南面的圣納澤爾（St. Nazaire）。這一行動，跟拋棄軍火的那道命令系出自同一精神，是盤踞約翰·弗倫奇爵士心頭唯一的迫切愿望——離開法國——的反映。對于離開法國，亨利·威爾遜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有些羞于承認。他的一位袍澤描述：“（他）在房間里踱來踱去，滿面孔是他那種慣有的滑稽怪誕的神氣；一邊輕輕地拍手打著拍子，一邊哼著：‘我們永遠到不了那兒了，我們永遠到不了那兒了。’當他走過我身旁時，我說：‘哪兒呀，亨利？’他繼續哼著：‘海上，海上，海上。’”

注釋

[[1]](#_1_18) 阿蓋爾（Argyll），英國蘇格蘭地區的一個郡的名字。——譯注

[[2]](#_2_15) 公文報稱，“8月26日上午一戰，倘不是一位罕見的、冷靜異常的、堅韌不拔而富有毅力的指揮官親自指揮，是不可能拯救我所率領的部隊的左翼于危亡的”。這一報告顯然是約翰爵士在他那反復無常的性格極不穩定的時候寫的或簽署的。事后，他又像過去那樣厭惡他，而且不肯罷休，直到1915年把史密斯——多林召回國內，甚至在他戰后出版的著作中，還公開對史密斯——多林繼續進行惡意攻擊。

[[3]](#_3_14) 西迪卜拉欣（Sidi Brahim），阿爾及利亞地名，法國侵略阿爾及利亞史上的一次著名的戰斗在此附近發生。1845年9月23日，79名法國輕騎兵在奈穆爾（Nemours）去烏杰達（Oudjda）途中，即在易卜拉欣小清真寺附近，以寡敵眾，與阿爾及利亞反法斗爭領袖阿卜杜卡迪爾所部近3000名騎兵作戰了三天。此后，法國輕騎兵即以這幾天為傳統節日。——譯注

[[4]](#_4_8) 這支部隊在9月5日成為第九集團軍以前，一直被稱作福煦特遣隊。

第二號通令：AF, I, II, 21; Joffre, 189–90.

“痛苦而又恐懼”的一夜：Libermann, 37–50.

“我們是8月27日離開布洛姆貝的”及法軍后撤中其他士兵的日記：Hanotaux, V, 221–22; VII, 212, 268; VIII, 76–8.

“他們只起了班長的作用”：Tanant.

“沒有戰斗就走了，簡直叫人難受”：Hanotaux, VIII, 76.

部長們“驚恐萬狀”：Poincaré, III, 92; Messimy, 364. Events and discussions in Paris during August 25–27 and all direct quotations,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re from the following sources: Poincaré, III, 89–99 and 118; Gallieni's Mémoires, 20–21, supplemented by his Carnets, 17–22, 39–46; Hirschauer, 59–63; and above all from Messimy's helpfully outspoken if confusingly arranged Souvenirs, Part Three, Chap. IV, “Nomination de Gallieni comme Gouverneur Militaire de Paris,” 206–228; Chap. V, “Le Gouvernement et le G.Q.G.,” 229–265 and the last part of Chap. VII, “Le Ministère de la Guerre en Août 1914,” the paragraphs entitled, “La panique parlementaire,” “la journée du 25 Août” and “la journée du 26 Août,” pp. 364–375.

“培植軍人”：Hanotaux, IX, 41. “Le tourisme”: Monteil, 37.

“你是東家，我們是為你辦伙食跑腿的”：qtd. Renouvin, 83.

霞飛感到“政府干預作戰指揮的威脅”：Joffre, 193.

“詭計多端”等語：qtd. Edmonds, 115.

羅伯遜將軍將食品卸在十字路口，及德軍就此得出英軍潰退的判斷：Spears, 221.

朗勒扎克的“輕率”撤退及弗倫奇向基欽納的匯報：French, 84; Arthur, 38.

在朗德勒西發生的交火：Maurice, 101–02; Hamilton, 52–3.

“一聲招呼也不打”：Edmonds, 134.

“派兵增援……形勢十分危急”：Edmonds, 135.

默里昏厥倒下：Childs, 124; Macready, 206; Wilson, 169.

黑格借給弗倫奇2000英鎊：Blake, 37.

艾倫比的警告及在勒卡托作戰的決定：Smith-Dorrien, 400–01.

威爾遜與史密斯―多林的通話：ibid., 405; Wilson, 168–9.

克盧克下令“追擊潰敗之敵”：qtd. Edmonds, 169–70.

“強大的法敵部隊”：ibid., 211.

“那些本土軍所表現的英勇氣概”：Smith-Dorrien, 409.

勒卡托之戰：Edmonds’ account, which occupies three chapters and sixty pages, 152–211, has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but is too detailed to give a very clear impression. Smith-Dorrien, 400–410, Hamilton, 59–79, and Maurice, 113–14, are more readable.

勒卡托之戰的傷亡數據：Edmonds, 238.

“弗倫奇勛爵和他的參謀完全昏了頭”：J. W. Fortescue, Quarterly Review, October 1919, 356.

黑格試圖馳援第一軍：Edmonds, 291, n. 2.

于蓋的電報：Joffre, 197.

約翰·弗倫奇穿著睡衣出來相見：Smith-Dorrien, 411.

“拯救了左翼”：ibid., 412.

圣康坦的會議：Joffre, 195–97; Lanrezac, 209; Huguet, 67; Spears, 233–37.

克盧克和比洛報告敵人被擊潰：Bülow, 64.

德軍統帥部正式公報：qtd. Edmonds, 204.

德軍統帥間的摩擦：Bülow, 68–9, 78; Kluck, 51, 63.

豪森的住宿情況和他的抱怨：182, 197–99, 204–5, 215.

克盧克軍沿路就宿：Briey, evidence of Messimy, March 28.

德皇的來電：Kluck, 75.

“希望在巴黎慶祝色當戰役紀念日”：qtd. Maurice, 126–7.

克盧克建議“內線轉動”：Kluck, 76.

“一片勝利感”：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59. OHL General Order of August 28: qtd. Edmonds, 235.

德國統帥部的商議，及“結束戰爭”：Tappen, 105.

莫爾塔涅河戰役：Giraud, 538; AF, I, II, 305ff.

莫迪伊將軍：Hanotaux, VI, 274.

“勇敢和不屈不撓的精神”：Joffre, 203.

德朗格勒的默茲河一戰：De Langle, 20–21, 139; AF, I, II, 184–201.

福煦的特種部隊：Foch, 41–47.

“已有三個將軍的烏紗在我公事包里”：Percin, 131.

霞飛對一個副官說他已失眠兩夜：Mayer, 194.

第六十一和第六十二后備師忽告失蹤：Joffre, 209, 212; Spears, 270, n.

于蓋報告英國遠征軍“已經潰敗，無能為力”：Joffre, 203–4.

“簡直是愚蠢之極”：Spears, 256.

施奈德少校和亞歷山大上校：Lanrezac, 218–19; Spears, 256–7.

朗勒扎克稱霞飛為“坑道工兵”：Mayer, 176.

“我憂慮已極”：Lanrezac, 282.

霞飛在馬爾勒大怒：Lanrezac, 225–6; Joffre, 207.

霞飛命令貝當堅守凡爾登：qtd. Pierrefeu, GQG, 132.

下令將運輸車輛上“所有軍火彈藥及其他凡屬非必需的輜重統統丟掉”：text, Edmonds, Appendix 17; Wilson's version: Spears, 254; Gough tore it up: Charteris, 21; Smith-Dorrien countermanded it: Smith-Dorrien, 416–17; “Very damping effect”: ibid.

玩具笛子和鼓：Bridges, 87–8.

約翰·弗倫奇關于德皇的言論：Arthur, 37, 43. On Kitchener's refusal: ibid., 39.

在奧斯坦德的行動：Corbett, 99–100, Churchill, 334–35. Asquith in his diary for August 26 (II, 28–9) records a discussion with Kitchener, Churchill, and Grey about “an idea of Hankey's” (Sir Maurice Hankey, Secretary of the CID) to send 3,000 marines to Ostend which would “please the Belgians and annoy and harass the Germans who would certainly take it to be the pioneer of a larger force.” Winston was “full of ardour” about the plan. It was conceived in response to the shock of the news from Mons and the Allied debacle which Churchill received at 7:00 A.M. on August 24 when Kitchener appeared in his bedroom looking “distorted and discolored” as if his face “had been punched with a fist.” Saying “Bad news” in a hoarse voice, he handed Churchill Sir John French's telegram reporting the debacle and ending with the ominous proposal to defend Havre. It was hoped by the Ostend operation to draw back some of Kluck's forces to the coast, a move in which it only partially succeeded; but German nervousness about this threat, combined with rumors of Russian landings, contributed to the German decision to retreat at the Marne.

“海上，海上，海上”：MacReady, 206.

## 第19章　巴黎是前線

大馬路上空蕩蕩，商店門窗緊閉；公共汽車、電車、小汽車、出租馬車，不見蹤影，但見羊群被驅趕著通過協和廣場去東站運往前線。廣場和街道的景象，一掃車水馬龍的紛擾，顯示出當初設計的清凈本色。報紙大多已告停刊，報攤上稀稀拉拉地掛著幾份還在出版的單張報紙。各國旅客都已遠走高飛，麗思酒店闃無一人，默里斯酒店已改為醫院。在這8月里，巴黎有史以來第一次恢復了法蘭西的風貌，而且悄無聲息。陽光照耀，圓形廣場[[1]](#_1__Yuan_Xing_Guang_Chang__Rond)中的噴泉閃閃發光，樹木蔥郁，靜靜的塞納河像往日一樣流逝。簇簇鮮艷的協約國國旗，把這座淡灰色的、人間最美的城市裝點得格外絢麗。

在巴黎殘老軍人退休院的寬敞的屋子里，加利埃尼跟那些妨礙議事進行、遇事猶豫不決的官員們爭論不休，相持不下。他力爭采取必要的果斷措施，務使巴黎成為名副其實的“筑壘的兵營”。他設想的這個兵營，不是一個困守待圍的特洛伊城，而是個作戰基地。根據列日和那慕爾的經驗，他深知巴黎頂不住敵軍新型攻城重炮的轟擊，不過，他的戰略不是消極待圍，而是主動出擊——運用其尚未到手的部隊——作戰于環形防御工事之外。他研究了巴爾干戰爭和日俄戰爭，深信深而窄的壕溝——上面護以壘土圓木、兩側密布鐵絲網，和洞口寬廣、洞底豎有尖樁的“狼阱”這樣的系列工事，由訓練有素、堅韌不拔、配備機槍的軍隊據守，定將堅不可摧。這就是他試圖在炮兵陣地之間各個地段修筑的防御工事，不過他還沒有取得扼守這些工事的軍隊。

每天，他都給總司令部打電話，有時一天兩三次，聲嘶力竭地要求給他增援三個現役軍。他給霞飛打報告，或派專人前往，或向陸軍部長和總統大聲疾呼，一再提請他們注意：巴黎一無準備。幾經敦促，到8月29日，總算迎來了一旅海軍。當這支身穿白色制服、高奏尖音號笛的隊伍在街上整隊走過時，縱然加利埃尼并不為他們的出現感到高興，而老百姓卻為之歡欣鼓舞。

加利埃尼認為，當前任務有三：軍事防衛、精神準備和軍需給養。要完成其中無論哪項任務，都必須對民眾開誠布公。他對巴黎人民的崇敬，深如他對政客的鄙視。他認為人民是可以指望在危難時刻不致頭腦發昏、手足無措的。他認為普恩加萊和維維亞尼不愿將事實真相讓全國知道，懷疑他們在排演“啞劇”，愚弄人民。他竭力要求準予拆毀擋住炮臺射向的建筑，但官方因不愿驚動百姓而屢加阻撓。每破壞一處建筑，都必須由區長和工兵總監聯合簽署一紙公文，規定給業主的賠償金額，這是一種既引起無限麻煩又拖延時日的手續。每做一項決定，總要陷入更多的空洞無用的爭論中。這些人堅決主張，作為政府所在地，巴黎不能成為軍事上可保衛的“筑壘的兵營”。伊爾斯肖埃將軍厭惡地說，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爭論不休的大好園地”。他擔心，那些主張巴黎成為不設防城市的辯者們，不久還會振振有詞地證明，即便是軍事長官這個職位也是非法的。他說：“拿不出明文規定，你就不能說服這些法學家。”

加利埃尼畢竟拿出了一條明文規定。8月28日，軍區擴大，巴黎及其兩側直到塞納河一帶的地區都被包括在內，巴黎市政府已置于軍事長官管轄之下。當天上午10時，加利埃尼召集他的軍事和民政的領導班子，開了一個防務會議，這次會議是站著開的，到10點15分就告結束。加利埃尼要求與會者不必討論巴黎應否設防的問題，而只需確認一點：大敵當前，非建立一種“防御狀態”的體制不可。提供此項法律根據的文件早已擬就并擺在桌上，加利埃尼請他們各自簽上名字以后便宣布休會。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會議，也是最后的一次。

他毫不留情地執行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務；對那些持有異議或動搖不定的人，軟弱無能或辦事不力的人，他從不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或給以憐憫。像霞飛一樣，他清除一切不稱職的人員。上任第一天就撤了一名工兵部隊的將軍，兩天以后又撤了一名將軍。郊區的所有居民，“即便是最老邁無能的”，都被強迫拿起鎬鍬參加勞動。他下令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征集一萬把鏟鎬，傍晚時分便全部送到。他同時還曾下令采購一萬把長獵刀作為工具，軍需官提出異議，說是難以辦到，因為采購獵刀是不合法的。加利埃尼兩眼通過夾鼻眼鏡狠狠地盯著他答道：“那就越發有理由了。”于是，這些刀子也如數辦齊不誤。

8月29日，巴黎周圍方圓約20英里的一個地區，南到默倫（Melun），北至達馬爾坦（Dammartin）和蓬圖瓦茲（Pontoise），都劃歸加利埃尼管轄。炸毀這地區所有橋梁的各項工作均已準備就緒。對那些列為“藝術作品”或屬于“民族遺產”的橋梁，則部署了專門崗哨，確保這些橋梁不到最后關頭不得炸毀。所有通往市區的入口，即便是下水道，都設置了障礙。面包師傅、屠戶和菜農都已經組織起來，牲口則被趕入市區，在布洛涅森林中放牧。為了加速調集彈藥貯存，加利埃尼征用了“一切可資利用的”運輸工具，包括巴黎的出租汽車，這些汽車不久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受命擔任這塊筑壘兵營的炮兵參謀的，是一位已屬歷史知名人物的前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2]](#_2__De_Lei_Fu_Si__Alfred_Dreyfus)，他在五十五歲時重服兵役，現在是少校。

前方，洛林地區的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在魯普雷希特的炮火猛攻之下仍在殊死戰斗，堅守摩澤爾河防線。他們的陣腳已亂，防線凹凸不齊，有些地方甚至已被德軍楔入突破。但由于德軍兩側受到法軍反攻的牽制，這些楔子未能擴展成為大的缺口。戰斗在繼續進行，魯普雷希特的軍隊在試探法軍陣地的最薄弱地段；而迪巴伊和德卡斯泰爾諾，由于霞飛的要求向西抽調了部隊，兵力削弱，不知自己還能堅守多久，也不知能否守住。在德軍攻占的村子里，見之于比利時的事件又在重演。駐梅斯的德軍總督張貼告示宣稱，在南錫城外的諾梅尼村，“居民向我軍開槍，因此已飭令將該村全部焚毀以示懲罰。諾梅尼村現已成為一片焦土”。

在德卡斯泰爾諾左面，法軍戰線折向西方，呂夫的第三集團軍，由于莫努里的幾個師給調走了，已失去平衡，正在退向默茲河后面凡爾登的南方。緊靠它的第四集團軍，為了表示這次撤退不是潰敗而是出于“戰略”需要，8月28日在陣地上止步不動。使德朗格勒將軍惱火的是，又接到命令，要第四集團軍在8月29日繼續撤退。再往左，是法軍戰線最吃緊的地帶，朗勒扎克將軍正在調動他的第五集團軍轉向，為反攻圣康坦做好準備，這本非他所愿，而是出自霞飛的命令。在戰線左端，莫努里的第六集團軍正在進入陣地。約翰·弗倫奇爵士明知第二天即將進行一場戰斗，卻把位于莫努里和朗勒扎克之間的英國遠征軍撤走。

遠征軍的這次撤退，差點兒為一次迫切需要的英法合作行動所阻。黑格通知朗勒扎克說，他的部隊“已完全做好準備，隨時可以出擊。他希望與第五集團軍取得直接聯系，在其計劃發動的圣康坦戰斗中配合行動”。朗勒扎克的一名參謀立即趕去與黑格會晤，只見黑格宛如畫中人物，站在一座小山上，一名勤務兵為他牽著馬，一支旗桿矛豎立在他身旁，上面的白十字三角旗在迎風招展。黑格說，據他的空中偵察報告，敵軍正在圣康坦西南移動，“在前進中暴露了它的翼側”。

“趕快回去將這個情況報告你們將軍。……讓他立即行動。我很愿意在這次進攻中與他協力合作。”這一慨然相助的諾言，使朗勒扎克“興高采烈，心滿意足”，感動得“講起贊揚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好話來了”。為第二天早晨聯合作戰所做的部署已經同意，只待英軍總司令的最后批準。凌晨2點，英軍總司令部傳下話來，說是約翰·弗倫奇爵士拒不同意，理由是遠征軍已“不勝疲憊，至少必須休息一天”。事實上，即使第二軍確實有此需要，第一軍卻并非如此，其司令自稱可以配合，正在待命出擊。朗勒扎克不禁勃然大怒。“這是背叛！”他大聲嚷道，還加上了一位在場的人后來稱之為“對約翰·弗倫奇爵士和英國軍隊不堪入耳和不能寬恕的痛罵”。

盡管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前有馮·比洛步步進逼，后有霞飛親臨督戰，夾在中間的朗勒扎克再也沒有別路可走，只得發動進攻。可是，馮·比洛從俘獲的一名法國軍官身上繳獲的文件中，已得悉這次進攻，因此早已嚴陣以待，沒有為法國人所乘。霞飛對朗勒扎克的情緒不大放心，一早來到現為朗勒扎克司令部所在地的拉昂，以他自己那種臨危不懼、無限鎮定的精神給予支持。拉昂修筑在一塊高地上，俯瞰著廣及數十英里、綿延起伏猶如碧波海洋的一片田野。北面20英里外，第五集團軍朝著西北方向，以吉斯和圣康坦為目標，展開成一個巨大的半圓形陣式。在那矗立在拉昂城最高地點的教堂尖塔上，石刻的牛頭——不是通常所見的怪獸狀滴水嘴——以遲鈍呆澀的目光凝視著下面的景色。就在這些牛頭雕像之下，端坐著霞飛，以同樣肅穆安詳的神情觀察著朗勒扎克發號施令，指揮作戰。他足足待了三個小時，一言未發。對于朗勒扎克顯示的“權威和方略”感到滿意，于是放心離開這里前往駐地飯店好好吃了一頓午飯，然后乘上那輛由他的賽車司機駕駛的汽車辦下一項任務去了。

這一任務是去找約翰·弗倫奇爵士。霞飛疑心，此公雙眼盯著海峽沿岸，“也許要撤出我方戰線好長一段時間”。約翰爵士防守的那段戰線，地處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團軍和正在集結的莫努里的第六集團軍之間，是當前的要沖，但卻非霞飛管轄所及。對待陸軍元帥弗倫奇，他不能像對待朗勒扎克那樣發號施令，也不能坐在他背后默默監視，強他作戰。不管怎樣，他如能說服英國人固守原地就好了，他希望在亞眠―蘭斯（Rheims）―凡爾登一線穩住埃納河上的一段陣地，以便由此重新發動進攻。英軍總司令部在前一天又后撤一步，而今約翰爵士已在貢比涅安營駐扎，那里離巴黎40英里，對于疲憊的軍隊來說，約為三天路程。就在這天，正當緊靠它的法國第五集團軍在吉斯奮戰終日以解除敵軍壓力的時候，這支軍隊卻按兵不動，安然歇息。英軍是在前一天未經追擊而自行撤退的。他們經過八天酷熱中的行軍、掘壕和大大小小的交鋒，現在終于站定下來。英軍的第二軍在傍晚時分短途行軍，越過了瓦茲河；第一軍則在距朗勒扎克左翼只有五英里的圣戈班森林（Forest of St. Gobain）里享受了一整天的休息；而經過艱苦跋涉，連續戰斗了十四天的朗勒扎克部隊，雖然同樣困乏，卻還在繼續奮戰。

霞飛到達貢比涅后，懇切要求英軍司令堅守陣地，直到有可以重新發動進攻的有利時機為止。他的說服工作看來是徒費唇舌。他“看得一清二楚”，默里在暗中拉扯這位陸軍元帥的衣服，像是要阻止他聽從勸說。其實這種力氣是多花的，因為約翰·弗倫奇爵士本來就在接二連三地對霞飛說“不行，不行”。他堅稱自己的軍隊遭受重創，不宜作戰，必須有兩天休整。霞飛不能像對待法軍將領那樣把他當場撤職，甚至不能像他在馬爾勒對待朗勒扎克那樣發一通脾氣來達到目的。如果英國人從朗勒扎克和莫努里之間的那塊地方撤走，這兩支法軍就無一能守住現有防線，執行第二號通令的一切希望就勢必落空。霞飛離開時，用他自己的話說，“心情很不好”。

約翰·弗倫奇爵士的意圖甚至比他向霞飛透露的還要極端。他毫不考慮戰斗于失敗邊緣的盟軍，命令交通監察羅布（Robb）少將部署“經由巴黎東西兩側，朝正南方向，做明確的進一步的退卻”。如此部署，甚至有違基欽納指令的精神，不能由基欽納的指令來為它負責。基欽納的指令，表達他對亨利·威爾遜支持第十七號計劃的深為不滿，其用意所在，是約束過于肆無忌憚的約翰爵士，約束過于親法的威爾遜，以免使英軍在法國人所倡導的、有可能導致全軍覆滅或束手就擒的“殊死進攻”的計劃中遭受風險。指令的本意絕沒有要他們謹慎小心到如今那種臨陣脫逃的地步。然而一害怕就會冷汗直冒，控制不了，弗倫奇爵士現在是惶惶不可終日，害怕喪失他的軍隊，害怕自己的聲名隨之付諸東流。

實際上，他的軍隊并不像他所借口的那樣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堪再戰。根據遠征軍將士們自己所講，他們毫無氣餒怯戰之意。第三師參謀部的弗雷德里克·莫里斯（Frederick Maurice）中校說，盡管精疲力盡，兩腳酸痛，沒有時間舉炊進餐，但是，“一頓熱飯，一宿休息，再洗上一個澡，對于恢復精力，立見神效；要使我軍再次揮戈上陣……首先需要的就是這些”。第十一輕騎兵團的歐內斯特·漢密爾頓（Ernest Hamilton）上尉說，8月29日休息了一天以后，遠征軍“現在已經精神抖擻，隨時可以掉頭作戰”。遠征軍副總長麥克里迪（Macready）將軍聲稱：“他們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品，有了這些，他們就愿意并且切望”向德國人一顯身手。

盡管如此，約翰·弗倫奇爵士第二天給霞飛的最后正式通知卻說“再等十天”英軍也無法進入它在這條戰線上的陣地。如果他是在倫敦城下與敵人決一死戰時要求休息十天的話，他早就當不成司令了。事實是，約翰·弗倫奇爵士還繼續當了一年半的總司令。

那天下午，他急不可待地要將自己的軍隊從靠近敵人的地區撤走，同時也迫切希望朗勒扎克也停止戰斗，隨同他一并撤退。這并不是出于對朗勒扎克的關懷，要掩護他的翼側，而更多的是為了保全自己。為了取得一道叫第五集團軍停止戰斗向后撤退的命令，亨利·威爾遜打電話給法軍總司令部。他發現霞飛還沒有回來，便向貝特洛將軍匯報情況，但后者不愿承擔責任，而是安排他在晚上7時30分到蘭斯的金獅飯店去找霞飛，因為到了吃飯的時候霞飛的行蹤總是可以知道的。威爾遜找到霞飛后，進行了一番爭辯，但是徒勞無益。霞飛的回答就是這么一句話：“朗勒扎克必須堅持到實現最后目標。”至于他心目中的目標究竟是什么，卻未作具體說明。威爾遜把這個消息帶了回來，約翰爵士決定不再等待，隨即下令遠征軍第二天繼續撤退。

與此同時，朗勒扎克向圣康坦的進軍正面臨著困難。第十八軍的一個團奉命攻取途中的一個村子，士兵們冒著冰雹般迅猛襲來的彈片前進。一名幸存的中士寫道，炮彈“把道路炸得千瘡百孔，把樹枝削得大片橫飛”。

“臥倒是愚蠢的；還是繼續前進的好。……遍地都是倒下的人，有撲在地上的，有臉朝天的，都已一命嗚呼。倒在蘋果樹下的那一個，整個面孔已被削掉，頭部血肉模糊。在右方，戰鼓擂起了沖鋒令，接著是號角聲響。藍色的天空映襯出寒光閃爍的刺刀，我們的隊伍在前進。鼓聲咚咚，愈擂愈急。‘沖啊！’士兵們齊聲吶喊著，‘沖啊！’這是個驚心動魄的時刻。我的頭皮像觸了電似的，頭發根根直豎。戰鼓在怒吼，熾熱的風傳來號角聲聲，士兵們呼喊著——如癡似狂！……突然間，我們給止住了。要突破敵人堅固的防御，奪取800米外的一個村子，是荒唐的。命令下來了：‘臥倒，隱蔽！’”

對圣康坦的進攻已被擊退，不出朗勒扎克所料，敵人的強大壓力開始向他的右翼撲來。馮·比洛全力出擊，不讓法軍朝他推進，以便克盧克和豪森的軍隊襲擊其后方。比洛認為法軍這次行動只是敗軍的垂死掙扎，因而“對戰果滿懷信心”。在一段戰線上，法軍被逐回瓦茲河對岸，橋梁和小路一時擠塞不通，引起一片恐慌。此時的朗勒扎克，用一位對他最少好感的觀察者的話說，顯示了“最大的機智和敏慧”，他當機立斷，下令放棄圣康坦的戰斗，重新集結力量，挽救其右翼在吉斯的戰局。

第一軍軍長弗朗謝·德斯佩雷奉命將第三軍和第十軍調集到他左右兩側。這位曾在印度支那的北部灣（Tonkin）地區和摩洛哥受過烈日烤灼的個子矮小的將軍，是個熱心奮發、剛毅堅強，被普恩加萊稱為“不知沮喪為何物的人”。軍官們縱馬往返前線，軍樂又一次奏起快速明朗的《桑布爾河和默茲河進行曲》，就這樣，德斯佩雷到下午5時30分便重新部署了戰線。經過周密準備，炮兵部隊首先開火，法軍再次前進，大舉進攻。吉斯橋上，敵人尸體縱橫，堆砌成高高的人墻。在橋的那邊，抵抗已見凌亂；法國人可以覺察到，敵人的力量已在逐漸減弱。“德國人在逃跑了，”一個觀察者寫道，法國人“為這一新出現的、渴望已久的激動場面而精神振奮，欣喜若狂，形成一股蔚為壯觀的浪濤，乘勝前進！”

這天終了時，一個曾經參加進攻圣康坦一役的中士，回到他當天早晨離開的那個村子，遇到一位消息靈通的朋友。“他說，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們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敵人被趕回去了，我們是勝利者。上校被一枚炮彈擊中，在被人抬走時咽了氣。泰隆（Theron）少校胸部受傷。吉爾貝蒂（Gilberti）上尉身負重傷，恐怕活不成了。很多士兵，不死即傷。但是他重復說，這是美好的一天，因為全團將士可以在一個地方連睡兩夜了。”

比洛的精銳部隊禁衛軍的退卻，使它的友鄰部隊也都跟著后撤，因而給朗勒扎克贏得了一個戰術上的勝利，雖然這未在圣康坦贏得而是在吉斯贏得的。可是他現在是孤軍作戰，一無掩蔽，面對著北方。在他左右兩側的第四集團軍和英國遠征軍，本來都已比他先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現在還在繼續后撤，而每后撤一步，都進一步暴露了他的兩側。第五集團軍若要保全下來，就必須立即停止戰斗，趕上去同伙伴們會合。但是朗勒扎克無法取得霞飛的指示，因為他給總司令部打電話時，霞飛不在。

朗勒扎克向霞飛的副職貝蘭將軍請示：“第五集團軍是否該留在吉斯―圣康坦地區，冒束手就擒的危險？”

“讓你的軍隊束手就擒！這是什么意思？簡直荒謬！”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奉總司令的明確命令來到這里的。……我不能擅自把部隊撤回拉昂。得由總司令給我下退卻令。”這一回，朗勒扎克可不愿像他在沙勒魯瓦那樣代人受過了。

貝蘭不肯承擔責任，說是等霞飛一回來就向他匯報請示。霞飛終于回來了，盡管表面上依然從容不迫，信心十足，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遭到沖擊，甚至比邊境戰役潰敗時還要沉重，因為敵人現在已經如此深入到法國腹地。他也無從得知朗勒扎克的一仗已給比洛的軍隊以沉重的打擊，因為這一仗的戰果當時還沒有顯示出來。他只是認識到第五集團軍確實已被棄于危險的境地，英國遠征軍正在退出戰斗，他“不再指望我們的盟軍留在預期它守住的那條戰線上了”。還在集結之中的第六集團軍受到克盧克右翼兩個軍的猛攻；霞飛希望扼守的戰線已經分崩離析；勢必還會丟失更多的國土，也許一直要到馬恩河，甚至到塞納河。

正如后來一位負責調查工作的官員所說，這個時期是“整個法國史上最悲慘的”時期。但在這段時期，霞飛不像約翰·弗倫奇那樣驚惶失措，不像毛奇那樣動搖不定，不像黑格或魯登道夫那樣頓時氣餒，也不像普里特維茨那樣陷于悲觀失望。他毫無表情，不露聲色。如果說他的鎮定沉著是由于缺乏想象力，那倒是法國的幸運。克勞塞維茨寫過，普通人感到形勢危殆和責任重大時往往意氣消沉；倘若這種形勢能“促使人迅速增強判斷力，則此人必須具有不同尋常的偉大氣魄”。當前的危急情勢縱然未能使霞飛增強判斷能力，可確實喚起了他的氣魄或性格中的某種力量。在此四面被困、岌岌可危的時刻，他依然泰然自若，不動聲色，保持著福煦在8月29日見到他后所稱道的“驚人的沉著”，這種沉著使法軍在亟須堅定信心的時刻保持了萬眾一心。就在這些日子里，一天，亞歷山大上校從第五集團軍執行任務回來，神情憂郁，他表示歉意地說，這是因為“我帶來了壞消息”的緣故。

“怎么啦？”霞飛說，“難道你對法國喪失信心啦？去休息一下吧。你會看到——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8月29日夜晚10時，他令朗勒扎克撤退并炸毀他后面瓦茲河上的橋梁。達馬德將軍則奉命在亞眠炸毀索姆河上的橋梁，然后隨同莫努里所部一并撤退。右翼的第四集團軍奉命向蘭斯撤退，德朗格勒將軍曾要求讓他的部隊稍事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能否休息取決于敵人。8月29日夜晚，霞飛采取的最后一項痛苦的措施是，下令做好將“希望已經粉碎、幻想已經破滅的這個司令部”撤離維特里——勒弗朗索瓦的準備。法軍總司令部將后撤至塞納河東支流上的奧布河畔巴爾（Bar-sur-Aube）。霞飛不滿地注意到，這個消息在參謀部傳開時，加深了“普遍的緊張與不安”。

由于參謀部的失職，霞飛給第五集團軍的命令直到翌日清晨才送達朗勒扎克，害得他白白擔憂了一整夜。幸而馮·比洛沒有再次出擊，也沒有在朗勒扎克撤退時跟蹤追擊。這一仗結果如何，德國人和法國人都不清楚。馮·比洛的看法似乎混亂得出奇，他一面向德軍統帥部匯報說打了勝仗，同時又派一名上尉參謀去對馮·克盧克說，他的軍隊“給吉斯一仗搞得精疲力盡，已無力追擊”。可是法國人——霞飛也好，朗勒扎克也好——都不了解這一情況，他們一心只想使第五集團軍脫離接觸，在德國人從它左側進行包抄之前，使它脫離險境，從而跟法軍其他部隊會合。

其時，德軍右翼日益迫近，顯然構成對巴黎的威脅。霞飛打電報給加利埃尼，要他在巴黎東西兩側的馬恩河和塞納河的各座橋梁底下放置炸藥，并分別派駐工兵排，確保炸毀橋梁的命令得以切實執行。莫努里的軍隊退卻下來可以掩護巴黎，并就此作為加利埃尼所要的三個軍。不過，在霞飛和總司令部看來，巴黎仍然是個“地理概念”而已。為巴黎而保衛巴黎，以及為此而將莫努里的部隊撥歸加利埃尼調遣并聽從他的命令，并非霞飛的本意。在他眼里，巴黎的存亡安危，將取決于他打算進行的、由他親自指揮并出動全部野戰集團軍的這一仗的勝負。然而，對于巴黎市內的人們說來，首都的命運對他們更有直接的利害關系。

圣康坦和吉斯一仗的表面結果，加深了籠罩人們心頭的愁云慘霧。就在這一戰的上午，參議院副議長、北方的一名工業巨頭圖隆先生（M. Touron），“一陣旋風似的”沖進了普恩加萊的辦公室，叫嚷著政府“為總司令部所蒙騙”，我們的左翼已“被擊退，德國人已到了拉費爾（La Fère）”。普恩加萊把霞飛的堅決保證向他講了一遍：左翼將堅守陣地，一俟第六集團軍準備就緒，即將重新發動進攻；可是他內心深處卻在擔心圖隆先生或許言之有理。來路不明的消息不斷傳來，表明激戰正在進行。每小時他都接到互相矛盾的報告。傍晚時分，圖隆先生又闖了進來，情緒之激動為前所未有。他剛和他的同僚、埃納省的參議員塞利納先生（M. Seline）通過電話，這位參議員在圣康坦附近擁有一處房產，他曾在自己宅邸的屋頂上觀看這場戰斗。塞利納先生看到法軍朝前挺進，空中濃煙翻滾，炮彈呼嘯橫飛，接著他又看到德軍增援部隊來了，密密麻麻像灰螞蟻似的蜂擁而上。他眼看到法軍被殺退了。進攻未成，這一仗打輸了。說到這里，圖隆先生慟哭而去。

戰役的第二階段——吉斯一役——沒有為這位高踞屋頂的參議員所目睹。政府方面對此甚至比總司令部更是不甚了了。看來似乎只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霞飛為阻遏德軍右翼所作的努力已告失敗，巴黎已面臨圍困的危險，也許又要像它在四十年前那樣靠吃老鼠為生。首都會不會淪陷？政府要不要撤離？自邊境戰役以來一直隱藏在部長們心頭的這些問題，現在已公開而緊張地討論開了。總司令部和總統之間的聯絡官佩內隆（Penelon）上校，第二天一清早就來到巴黎。他那通常是喜笑顏開的臉色這回可顯得憂慮重重。他承認形勢“非常嚴重”。身為陸軍部長的米勒蘭立即提議撤離，以免政府與國內其他地區的聯系被切斷。加利埃尼也被匆匆召來征詢意見，他建議與霞飛電話聯系。霞飛也承認情勢不佳；第五集團軍雖然奮力作戰，但未能達到他的期望；英國人“一動也不動”；無法阻滯敵軍前進，因而巴黎“受到嚴重威脅”。他建議政府撤離，以免因為它繼續留在巴黎而吸引敵軍進攻首都。霞飛很清楚，德國人的目標是法國軍隊，而不是政府，但是由于戰場已接近巴黎，政府留在軍區勢必造成職權界限不清。一旦政府撤離，可以排除干擾的根源，從而使總司令部具有更大的權力。加利埃尼在電話中力圖使霞飛相信：巴黎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是作戰力量的中樞，保衛巴黎是必要的；同時，他再次要求給他一支軍隊，不待兵臨城下就主動出擊敵軍陣地。霞飛含糊其詞地答應派遣給他三個軍，不過兵員不足額，而且大都是由后備師組成的。他給加利埃尼的印象是，巴黎在他心目中是可以犧牲的，因此迄今不愿為它消耗自己的兵力。

法蘭西共和國的總統，雖然“冷靜沉著”如常，但卻顯得“心事重重，甚至垂頭喪氣”。他問加利埃尼：巴黎能守多久？政府是否應該撤離？加利埃尼的回答是：“巴黎無法堅守，你應盡快做好撤離的準備。”他想甩掉政府這個包袱的心情，并不亞于霞飛，因此對做出這樣的建議毫不內疚。普恩加萊請他過些時候再來向內閣闡明看法。在此期間，內閣召集會議，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辯，這在十天以前法軍發動進攻時，似乎是個不可想象的問題。

普恩加萊、里博和兩名社會黨人蓋德（Guesde）和桑巴（Sembat），都主張留在巴黎，至少也要等這場即將來臨的戰斗見個分曉。他們認為，如果政府撤離，在精神方面會產生絕望甚至引起革命的后果。米勒蘭力主撤離，他擔心會有一股德國槍騎兵竄入巴黎南面，切斷南去的鐵路，政府不能冒此風險，像1870年那樣被圍困在首都之內。這次法國是作為協約國的一員作戰的，政府的職責是既要同本國各地保持聯系，又要同它的盟國、同外部世界保持聯系。杜梅格的話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說：“被人看作懦夫而受眾人唾罵，比之冒生命危險需要更大的勇氣。”眾、參兩院的議長，曾多次感情激動地前來要求重新召集議會，于是，當前的緊急形勢是否有必要召集議會的問題便成了進一步激烈爭辯的課題。

在部長們爭論不休時，加利埃尼則在門外足足等了一個小時，他憂心如焚，急于回去執行自己的任務。終于他被叫了進去，他直接告訴他們：“留在首都已不能確保安全。”他那嚴峻的軍人儀態以及直抒己見時的“明確有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說明，如果沒有一支軍隊在外圍作戰，他就無法防御敵人攻城炮的襲擊。他警告他們：巴黎并不處于防御狀態，而且“無法使它處于防御狀態。……如果幾天內敵人就出現在我們外圍堡壘防線前，還認為這個筑壘營地能進行有效的抵抗，那是幻想”。組織一支擁有四個或至少三個軍的軍隊，在他指揮之下轉戰于巴黎城外，作為法軍戰線最左面的一翼，乃是“勢所必須”。至于在他被任命為軍事長官之前造成的防務工作的延誤情況，他認為應由那些主張宣布巴黎為不設防城市以免遭受摧毀的勢力集團負責。他們這樣做是得到總司令部的鼓勵的。

“不錯，”米勒蘭打斷了他的話說，“巴黎不設防，正是總司令部的意見。”

社會黨人蓋德，當了一輩子反對派之后第一次以部長身份發言，他激動地插話說：“你們以為向敵人敞開大門巴黎就不會遭劫了。可是，就在德國人打從我們街上走過的這一天，工人住宅區的任何一扇窗子里都可能射出一發子彈來。那么讓我奉告諸位，接著將會發生什么樣的情況：巴黎將被付之一炬，化為焦土！”

經過一場七嘴八舌的辯論之后，一致同意巴黎必須設防保衛，霞飛務必遵照辦理，否則不惜予以撤職處分。加利埃尼竭力反對在當前這個時期輕率撤換總司令的任何做法。至于政府究竟該遷該留，在這個問題上，內閣依然意見紛紜，爭執不下。

這些部長們，“感情沖動，猶豫不決，已弄得精疲力盡”。在加利埃尼心目中，這些人“永遠也做不出什么果斷的決策”，于是他便徑自走了。他穿過那些簇擁在巴黎殘老軍人院門口的人群，回到院里。這些焦慮不安的公民到這里來是為了申請離開這座城市的許可，帶走他們的汽車，關閉一些必要的企業，或是為了千百條其他原因。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甚于往日。那天下午，一架德國“鴿式”飛機首次轟炸巴黎。有三枚炸彈落在瓦爾米碼頭（Quai de Valmy），死兩人，傷數人；此外，這架飛機還散發了傳單，告訴巴黎人：德國人已兵臨城下，像1870年那樣，“你們已無路可走，只有投降！”

此后，每天總有一架或幾架敵機于傍晚6時準時前來騷擾，擲下兩三枚炸彈，偶或炸死個把行人，其目的也許是嚇唬嚇唬巴黎居民。膽怯的人逃往南方去了，至于那些在這個時期還留在巴黎的人們，誰也不知道明天一早醒來，會不會看到頭戴尖頂帽盔的敵人在長驅直入。“鴿式”飛機總是在飲開胃酒的時刻飛來，為人們提供和補償了政府禁飲艾酒所失去的刺激。它首次光臨的那晚，巴黎破題兒第一遭燈火熄滅。普恩加萊在日記中寫道，突破這一片黑暗的唯一的“一線微光”，來自東方。根據法國武官的電報，俄國軍隊正在“以柏林為目標展開攻勢”。事實上，俄國人已在坦嫩貝格一仗敗北，陷入重圍，也就在那天晚上，薩姆索諾夫將軍在森林中自殺了。

霞飛從在貝爾福截獲的一份德軍無線電報中獲得了更為準確的情報。這份電報述及殲滅俄國三個軍，俘獲兩個軍長和七萬名其他人員；電報還宣稱“俄國第二集團軍已不復存在”。在法國人的希望一再破滅的時刻傳來這一驚人噩耗，要不是接著又傳來另外一些表明俄國人并不是白白犧牲的消息，那么，即便是霞飛也不免會為之灰心喪氣。情報處的報告表明，至少有兩個德國軍已從西線調往東線。這個消息在第二天得到證實，據報道有32列軍用火車經由柏林東去。這就是霞飛的“一線微光”，也是法國對俄國施加全部壓力之后所得到的支援。即令如此，仍不足以抵消失去英軍可能造成的損失；英軍司令拒不與敵軍保持接觸，為后者包圍第五集團軍敞開了通道，何況第五集團軍還面臨著敵人通過福煦特遣隊駐守的兵力薄弱的地區，包抄其右翼的危險。

每當一個力量薄弱的戰區需要增援，另一個戰區就勢必遭到嚴重削弱。在8月30日這天，霞飛親自視察了第三集團軍和第四集團軍的陣地，想了解一下有沒有軍隊可調去支援福煦。途中，他碰上幾支在阿登山區和默茲省高地艱苦作戰后撤退下來的縱隊。紅色的褲子已變成了土灰色，上衣被扯得破破爛爛，鞋子粘滿了泥塊，士兵們形容枯槁，神色疲憊，兩眼深凹，胡須滿腮。二十天的戰斗似乎使他們一下子老了好幾歲。他們拖曳著沉重的雙腿，步履維艱，每行一步都可能跌倒似的。瘦得皮包骨頭的馬匹，給挽具磨破了的創口鮮血直流，往往挽著車轅就倒了下來。炮兵們趕忙卸下馬具，把它們拖到路邊以免妨礙通行。大炮看上去已陳舊不堪，創痕累累，積蓋著的塵土下面只露出幾塊一度是簇新的灰漆。

相形之下，其他部隊卻依然是生氣勃勃；二十天來的戰斗，使他們成了信心十足的戰士，為自己的能征善戰而自豪，并且殷切希望停止撤退。呂夫集團軍轄下的第四十二師贏得了最高的表彰。這支軍隊一直堅持后衛，并成功地脫離了戰斗。軍長薩拉伊將軍表揚將士們說：“你們確實勇敢。”霞飛命令將該師調撥給福煦時，呂夫將軍極力反對，理由是他預期敵人即將發動一場進攻。呂夫與第四集團軍的德朗格勒將軍不同，霞飛剛才看到后者鎮定自若，充滿信心，“完全能夠控制自己”，而這正是霞飛心目中一個司令所必具的素質；至于呂夫，則顯得神經質，易于激動，而且“想象力過于豐富”。正如他的作戰處長塔南上校所說，他非常聰明，想得出千百條主意，其中必有一條是了不起的，問題就在于不知道是哪一條。跟留在巴黎的那些議員一樣，霞飛需要為這次進攻的失敗找一替罪羊，呂夫的行為使他做出了決定；呂夫當天就被削去了第三集團軍的指揮權，由薩拉伊將軍接替。第二天，呂夫應邀與霞飛共進午餐，他把他在阿登一役的失敗歸咎于霞飛在最后關頭將兩個后備師抽調給了駐守洛林的軍隊。他說，要是那時這四萬名生力軍和第七騎兵師還在他手里，他本可以席卷敵軍的左翼，“我們的軍隊就會贏得多大的勝利啊！”霞飛用他特有的那種簡潔而又晦澀的語言答道：“噓，不要這樣說。”他說話時的語調如何已不復能聞，因此，也永遠沒法知道他的原意究竟是“你錯了，你不能這么說”，還是“你說得對，不過，我們不能承認這一點”。

就在8月30日這個星期天，即坦嫩貝格之戰的這一天，也就是法國政府接到警告，要它撤離巴黎的這一天，英國接到一則后來稱之為《亞眠通訊》的消息，大為震驚。這篇通訊出現在《泰晤士報》星期日特刊的第一版上。首先映入眼簾的是渲染逾實的標題《歷史上最激烈的戰斗》，這可引起了巨大反響。這一版，通常是刊登刻意安排的與新聞報道爭奪讀者注意力的分欄廣告的。大標題下面的副標題是：英軍損失慘重——蒙斯和康布雷之戰——戰局不利——亟須增援。最后這句是關鍵所在。雖然這篇通訊引起了官場風波，挑起了議會的激烈爭論，還挨了首相的一頓批評，指責它是報界保持的“出于愛國心的沉默”的一個“令人遺憾的例外”。然而，發表這樣一篇通訊，實際上是有其官方目的的。這篇稿子，新聞檢查官F. E. 史密斯（F. E. Smith，后被授予伯肯黑德勛爵）一看就認為它能起到宣傳征兵的作用，便立即通過，并敦促《泰晤士報》予以發表。該報作為一項愛國任務發表了這篇通訊，并且加了按語，述及“我們當前任務的極端嚴重性”。通訊是由記者阿瑟·穆爾（Arthur Moore）執筆的，他到達前線的時刻，正逢部隊從勒卡托撤退，英軍總司令部陷于一片混亂絕望之中。

他描述了“可稱為蒙斯之戰”的幾次交鋒之后的“一支撤退中的敗軍”；描述了法軍在翼側撤退，德軍“緊跟不舍，窮追猛趕”，而且是“勢不可當”；英軍各團“損失慘重”，但是“并無軍紀松弛，驚慌失措，或氣餒怯戰的跡象”。盡管歷盡千辛萬苦，士兵們依然“堅定樂觀”；然而迫于形勢，不得不“后退又后退”。他述及了“極其巨大的損失”，各團已潰不成軍，某些師的“軍官幾全部損折”。他顯然受到英軍總司令部情緒的影響，頗加渲染地描繪了德軍的右翼。他寫道：“據估計，他們在人數上遠遠超過我軍，勢如潮涌，無法阻遏。”他在文章結束時寫道，英國必須面對這一事實：“德軍的首次大舉進攻業已得手”，因而“已不能排除巴黎受圍的可能”。

他在概括增援的必要性時，談到英國遠征軍“首當其沖，頂住德軍攻勢”，為虛構的一套荒誕說法打下了基礎。在他筆下，法軍只是在周圍起個配角作用而已。事實上，德軍擁有三十多個軍之眾，而在第一個月里，英國遠征軍與之交鋒的，從未超過十分之一。然而，“首當其沖，頂住德軍攻勢”的說法，在以后迭次出現的英國人關于蒙斯之戰以及這次“光榮撤退”的報道中，則是一脈相承。其成功地在英國人的頭腦里扎下了根，使他們相信，英國遠征軍在其英勇奮戰、喋血沙場的第一個月里，拯救了法國，拯救了歐洲，拯救了西方文明，或者像一名英國作家面無赧色地吹噓的那樣：“蒙斯，這個名詞可以概括為全世界的解放。”

在交戰國中，英國的參戰，既沒有舉國努力的事先規劃，又沒有做到人人口袋里都有一份動員令。除了正規軍外，一切都是臨時湊合的。而且在頭幾個星期中，在《亞眠通訊》發表之前，舉國上下幾乎都沉浸在一片安度假日的氣氛之中。在那以前，德軍進犯的真相，用阿斯奎斯先生微妙的措辭來說，給一片“出于愛國心的沉默”掩蓋了。對于英國公眾——對于法國人也是如此——戰斗一直被描繪成德軍的不斷敗北。然而，無法解釋的是，敵人在敗退中卻從比利時向法國推進，而且，從地圖上看，一天一天地在前進。在整個英國，在8月30日這個星期天，人們在早餐桌上讀到《泰晤士報》時，全都不勝驚訝，為之目瞪口呆。布里特林先生認為：“這就像大衛向歌利亞甩出了石子——卻沒有打中！”

敵人正在節節勝利的消息來得如此突兀，人們在驚駭之余，在尋求希望之中，抓住了最近幾天偶然出現的一個傳說，而且繪影繪聲，使它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幻覺。8月27日，利物浦至倫敦一線的火車晚點十七小時，從而引起了謠傳，說什么這次晚點是由于輸送俄國軍隊所致。據說這些軍隊在蘇格蘭上岸，路過這里前往增援西線。這些俄國人被說成是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出發，橫渡北冰洋到挪威，然后乘普通輪船來到阿伯丁（Aberdeen）的，現在正用軍用火車把他們從那兒送往海峽港口。此后，誰乘坐的火車中途受阻晚點，誰就會自作聰明地說成是“俄國人”造成的。自從《亞眠通訊》大談德軍人數眾多，“勢如潮涌”，并大聲疾呼“士兵，士兵，更多的士兵”以來，人們陷于一片悲觀絕望之中，不知不覺地都把希望寄托在俄國擁有的無窮無盡的人力上去了。謠言越傳越開，而且有聲有色，言之鑿鑿，見之于蘇格蘭的俄軍幽靈逐漸形成了一支血肉之軀的部隊。

他們在月臺上跺著腳，抖掉靴子上的積雪——時在8月啊！一個愛丁堡的鐵路清潔工因清掃過這些殘雪而出了名。有人從開過的軍用列車里瞥見過“異國的軍服”。有的說他們將取道哈里奇（Harwich）去救援安特衛普，有的說他們將經由多佛爾去救援巴黎，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還有人深更半夜在倫敦看到一萬名俄國人在沿著泰晤士河的堤岸前往維多利亞車站。黑爾戈蘭這場海戰也被聰明人說成是牽制敵人，給運往比利時去的俄國人打掩護的。連最可信的人士也看到了這些俄國人——或者聽說有朋友看到過他們。一位牛津大學的教授就知道一位同事曾被召去給他們當翻譯。一位蘇格蘭軍官在愛丁堡就曾看到他們“身穿色彩鮮艷的長大衣，頭戴大皮帽”，手里拿的是弓箭而不是步槍。他們自備的馬匹，“跟蘇格蘭的矮種馬一個樣，就是骨骼稍大些”——這種描繪，活像一百年前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金屬版印刷品中所出現的那種哥薩克騎兵的模樣。居住在阿伯丁的斯圖爾特·科茨（Stuart Coats）爵士給他在美國的一位姻兄寫信說，有12.5萬名哥薩克在行軍途中曾穿過他在珀斯郡（Perthshire）的莊園。一位英國軍官對他的朋友言之鑿鑿地說，有7萬名俄國人已“極端秘密地”取道英格蘭前往西線。關于人數，起初說有50萬之眾，后來說是25萬，再后來又說是12.5萬，經逐次遞減，最后確定在7萬與8萬之間——正好與已開拔的英國遠征軍的人數相等。這種傳說完全是口頭輾轉相告的；由于新聞發布要經過官方檢查，報紙上并無只字提及。然而在美國就不是這樣了。那些回國的美國人，大多是在利物浦上船的，那里正沉浸于一片俄國熱之中，他們的報道，把這種狂熱的現象給子孫后代保留了下來。

其他一些中立國家也撿起了這些傳說。阿姆斯特丹的通訊報道說，一支龐大的俄國軍隊正在開往巴黎，加強防御。在巴黎，人們簇擁在火車站附近，盼望看到哥薩克的到來。這些俄國人的幽靈來到歐洲大陸后，成了一種軍事因素，因為德國人也風聞了這種謠傳。他們擔心7萬名俄國人可能在他們背后出現；這種擔心，在隨后的馬恩河戰役中，就像他們把7萬名士兵調往東線而未能臨陣一樣，對軍事造成了實際影響。直到9月15日馬恩河戰役之后，官方才在英國報上辟謠。

就在《亞眠通訊》把公眾嚇得喪魂落魄的這個星期天，約翰·弗倫奇爵士撰寫的一份報告，使基欽納勛爵更為震驚。當時的英軍總司令部設在巴黎以北40英里的貢比涅，英軍在前一天就擺脫了追擊，在法軍與敵人周旋的時刻得以安然休息。那天給遠征軍下達的作戰命令也是由約翰·弗倫奇爵士簽署的，命令說，敵軍壓力“已因法軍在我右翼大舉進攻而獲解除，法軍的進攻在吉斯附近已告大捷，德國禁衛軍和第十軍已被擊退至瓦茲河一線”。這份直截了當地承認事實的命令，跟約翰爵士給基欽納的那份報告的內容，互相矛盾，大有出入。我們只能設想，他是未加審閱就簽署命令的。

他在報告中告訴基欽納說，霞飛要求他堅守貢比涅以北地區，與敵人保持接觸；但是他聲稱自己“絕對不能留在前線”，打算撤退到“塞納河后面”，保持“與敵軍相當距離”。這次撤退約需八天行軍，“但不致使部隊疲勞”，撤退時將取道巴黎以西地區，以便接近自己的基地。“我不喜歡霞飛將軍的計劃，”約翰爵士繼續寫道，“我寧愿采取一種凌厲的攻勢。”——他所寧愿采取的，恰恰是前不久他在圣康坦所拒絕執行的，那時他不準黑格與朗勒扎克配合作戰。

接著，筆鋒一轉，約翰爵士在下一句話中立即推翻了自己的說法。他明確表示，經過十天戰斗，他認為法國人已一蹶不振，他準備棄之不管，徑自回國。他對法國人的信心，對他們是否有能力“將這場戰役進行到圓滿結束的信心，正在迅速消逝”。他接著又寫道：“我把英軍后撤到那么遠，其真實原因即在于此。”盡管他們“竭力要求我軍即便是在遭受重創的情況下亦須固守前線”，但他根據基欽納指令的“文字和精神”已“斷然拒絕”，并且堅決要求保留必要時“退守我軍基地”的獨立行動。

這份報告于8月31日到達，基欽納閱后不勝震驚，為之愕然。約翰·弗倫奇爵士擬撤離協約國的戰線，使英國人與法國人分離的這種意圖，看來就是要在緊急關頭拋棄法國人，基欽納認為，這無論在政治上或軍事上看來都是“災難性的”。這樣做會破壞協約國的精神，成為一個政策問題。于是，基欽納要求首相立即召開內閣會議。開會之前，他給約翰爵士發了一封措辭委婉的電報，對他退至塞納河后面的決定表示“意外”，并且巧妙地以提問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驚恐不安：“這樣做，對于你和法軍的關系，對于整個軍事形勢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你軍主動退卻，會不會在法軍戰線上造成缺口？會不會挫傷他們的士氣，從而使德軍有機可乘？”最后，他提示說，經過柏林開出的32列軍用火車，表明德國人正在從西線撤走軍隊。

基欽納向內閣宣讀了約翰爵士的信件，并做了說明。他說，向塞納河后面撤退可能意味著戰爭的失敗。頓時，整個內閣，就像阿斯奎斯先生慣有的含糊其詞的說法那樣，“為之惶惶不安”。基欽納受命通知約翰爵士，政府對他的撤退計劃感到不安，政府希望“你將盡力配合霞飛將軍的作戰計劃”。他還補充說，政府考慮到法國人的自尊心，“對你的軍隊和你本人抱有一切應有的信心”。

當初，德軍統帥部得知馮·普里特維茨將軍企圖退至維斯瓦河后面以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職務；而今約翰·弗倫奇爵士所擬放棄的不是一個省而是一個盟國，他卻沒有受到同樣的處理。追溯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軍方在北愛爾蘭問題上的爭吵留下了創傷，對由誰接替總司令的問題無法取得一致意見。政府方面可能認為，在當時情況下撤換總司令，會在公眾中引起過分巨大的震動。不管怎樣，懾于約翰爵士那種碰不得的神氣，任何人——無論是法國人還是英國人——與他周旋時總跟往常一樣非常注意策略，而實際上對他已幾乎不復有絲毫的信任。“霞飛跟他從來不是心連心的，”一年以后英國陸軍軍需司令威廉·羅伯遜爵士在給英王秘書的信中寫道，“他從來沒有真心誠意、老老實實地跟法國人協力合作過。他們認為他絕不是一個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個忠實的朋友，因此對他并不信任。”這種情況對協約國的共同作戰是不利的。至于基欽納本人，自布爾戰爭以來，與約翰爵士的關系也從不是特別友好的，8月31日以后，也不再信任他了。可是，直到1915年12月，在約翰爵士本人圖謀反對基欽納，而其方式又正如伯肯黑德勛爵后來所說“不正派，不謹慎，不忠誠”的情況下，英國政府才終于下決心把他黜免。

就在基欽納在倫敦焦急等待約翰爵士的回音時，霞飛在巴黎正致力于動員政府給予支持，設法叫英軍留在前線。霞飛此時已知道朗勒扎克至少有半仗——在吉斯的半仗——是打勝了。據報告，德國禁衛軍和第十軍已被“狠狠地揍了一頓”，比洛的軍隊也不追擊。再加上德軍撤向東線的消息，使他感到大為鼓舞。他對普恩加萊說，或許政府可以不必遷移了；他現在感到，在第五集團軍和第六集團軍重振旗鼓、奮起作戰的情況下，可望阻遏德軍前進。他寫信給英軍司令說，他已令第五集團軍和第六集團軍非在重大壓力之下不得放棄陣地。但是，如果兩軍之間出現缺口，那就無法指望它們繼續扼守，因此，他“懇切”要求陸軍元帥弗倫奇不要撤退，“至少留下若干后衛部隊，以免敵人清楚地看出是在撤退以及在第五集團軍和第六集團軍之間有著缺口”。

為了爭取一個有利的答復，霞飛要求普恩加萊以法國總統的身份施加影響。普恩加萊給英國大使打了電話，大使又給英軍總司令部打了電話，但是，所有這些電話聯系以及聯絡官員的登門求見，都無結果。事后，約翰爵士把他當時的回答簡括為一句話：“我拒絕了。”于是，霞飛那個短暫的，縱然是虛幻的希望，一下子全告破滅。

約翰爵士給本國政府的回音，是基欽納所迫切等待的。那天深夜，復電一到，他便立即叫譯電員每收到一個字即逐字念給他聽。電報說，他的主動退卻，“無疑地”會使法軍戰線出現一個缺口，但是，“法國人目前的戰略，實際上是在我左右兩側撤退，而且通常并不通知我方，同時又放棄采取進攻戰的一切想法……如果他們繼續這樣做，一切后果自應由他們自己負責。……我不了解為什么要我為了再次救援他們而不顧明擺著的災難去冒險”。這種肆無忌憚地歪曲事實的報告，正是在霞飛把與此相反的真實情況告訴他之后作出的，這就無怪乎在他的《1914年》一書問世后，他的同胞們除了用“謊言”這個詞外竟然找不到一個體面的詞兒來代替它，甚至連阿斯奎斯先生也有所感觸地用了“對事實的嘲弄”這樣的詞句。即使考慮到約翰爵士性格上的種種局限性，但是，這位英軍總司令，有著亨利·威爾遜這樣精通法語而又熟悉包括霞飛本人在內的法國高級將領的人才作為參謀，竟然會把法國人描繪成失敗主義者，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基欽納在深夜1時看完電報之后，立即決定，眼前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必須在破曉前行動。他必須親自前往法國。作為資歷最高的陸軍元帥，他是陸軍之首；既然如此，他認為自己有權給約翰·弗倫奇爵士就軍事問題發布命令；同時，以陸軍大臣的身份，他也有權就政策問題做出指示。他急忙趕到唐寧街，同阿斯奎斯以及大臣們交換意見，海軍大臣丘吉爾立即下令派一艘快速巡洋艦供他乘用，兩小時內在多佛爾待命出發。基欽納先發了一份電報，通知約翰爵士他即將前來。為了怕自己突然出現在司令部時會使這位總司令神經過敏，感到窘迫，所以還請他選擇會晤地點。半夜2時，愛德華·格雷爵士從睡夢中被基欽納的突然來臨所驚醒，基欽納走進他的臥室告訴他即將前往法國。2時30分，他從查令十字火車站乘專車出發，9月1日上午到達巴黎。

陸軍元帥弗倫奇顯得“情緒激動，氣勢洶洶，面紅耳赤，怒形于色”，在阿奇博爾德·默里爵士陪同下，來到了他選定的會晤地點——英國大使館。他選擇這個地方，意在表示這次會談并非軍事性質，他堅決認為基欽納只是軍隊的政治領導，其身份無非是一名文職的陸軍大臣而已。見到基欽納身穿軍服，他不禁怒火難遏，認為這是故意用軍階壓他。事實上，基欽納自從在陸軍部上任那天穿戴文官禮服禮帽以后，便已脫掉文官服裝，改穿起陸軍元帥的藍色軍便服了。約翰爵士卻一心以為這是有意使他難堪。對他說來，衣著是首要的，他一向喜歡用服飾來增添威儀；這種作風，他的袍澤們都覺得乖謬反常。他那“卡其軍裝上佩戴著星章”以及“渾身掛滿外國小玩意兒”的習慣，曾使英王喬治產生反感。亨利·威爾遜也常常這樣議論他：“在澡盆子里他還是個不錯的小伙子，一穿上衣服，你就不放心他了；你永遠也不知道他會穿戴些什么。”

英國大使館里的這場會談有弗朗西斯·伯蒂爵士、維維亞尼、米勒蘭以及代表霞飛的幾位法國官員在場。當會談發展到唇槍舌劍相持不下的時候，基欽納只好請約翰爵士同他退入另室密談。至于在那里究竟談了些什么，約翰爵士在基欽納死后發表的記述是不可信的，只有會談的結果才是公認屬實的。它體現在基欽納給政府的一份電報之中。電報說，“弗倫奇的部隊現在已部署在作戰線上，英軍將留在那里與法軍配合行動”，這就是說，應該向巴黎東面，而不是向巴黎西面退卻。基欽納在他給約翰爵士的電文副本上寫道，他確信這是他們兩人達成的協議，但無論如何，“請把它視為一項指令”。至于所謂“在作戰線上”，他說他的意思是指英軍的部署應跟法軍銜接一氣。接著，他又重回策略性語言，模棱兩可地加了一句：“當然，你將根據情況，對他們所處的位置做出判斷。”于是，這位總司令，絲毫沒有得到撫慰，離去時比早先更加悻悻不平。

也就在這一天和前一天，克盧克所部，為了要趕在法軍站穩腳跟之前予以圍殲，兼程進軍，越過了貢比涅，渡過了瓦茲河，迫使協約國軍隊節節后退。9月1日，該部在離巴黎30英里的地方，與法國第六集團軍的后衛部隊以及英國遠征軍進行了交鋒。為了給條頓人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做準備，德國人已經以他們令人敬佩的效率制作了銅制獎章，并分發給參謀部軍官，預備最終分發給各部士兵。獎章上自信地刻著“德國軍隊進入巴黎”的銘文，其下是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的圖案，以及集合了驕傲的回憶和期盼的日期：1871—1914。

注釋

[[1]](#_1_19) 圓形廣場（Rond Point），位于香榭麗舍大道上。——譯注

[[2]](#_2_16) 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即法國政治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的被告。1899年法國政府在輿論壓力下將其赦免；1906年，克列孟梭內閣重新審理此案，宣布德雷福斯無罪，得以復職。——譯注

羊群被驅趕著通過協和廣場：Guard, 17.

加利埃尼保衛巴黎的計劃：Carnets, 46; Gallieni parle, 36–42; Hirschauer, 59–63, 93–4, 101, 129. “Byzantine” arguments: ibid., 176.

巴黎市政府被置于軍事長官管轄之下：AF, I, II, 585.

加利埃尼的15分鐘防務會議：Hirschauer, 98–99.

防御工事、橋梁、路障，征用出租車：Gallieni, Mémoires, 33–36 and Gallieni parle, 52; Hirschauer, passim.

德雷福斯重新任職：Paléologue, Intimate Journal of the Dreyfus Case, 309.

“諾梅尼村現已成為一片焦土”：qtd. Poincaré, III, 108.

黑格通知朗勒扎克愿意配合，弗倫奇拒絕：Lanrezac, 229–31; Spears, 264–67. “Terrible, unpardonable” things: ibid., 266. “C'est une félonie!”: qtd. Lyon, Laurence, The Pomp of Power, N.Y., 1922, 37, n. 22.

霞飛在拉昂觀察朗勒扎克發號施令：Joffre, 212; Lanrezac, 239. Battle of St. Quentin-Guise: AG, I, II, 67–81.

“也許要撤出我方戰線好長一段時間”：Joffre, 213. Conference at Compiègne: ibid., 214; Edmonds, 241.

“做明確的進一步的退卻”：Edmonds, 241. Maurice quoted, 129; Hamilton quoted, 82–3; Macready quoted, 105. “Another ten days”: Edmonds, 245; Joffre, 217.

威爾遜在蘭斯與霞飛會面：Huguet, 75; Wilson, 172.

圣康坦戰役，法國中士的記敘：Sergeant André Vienot, qtd. Hanotaux, VIII, 111–12; Bülow “felt confident”: Bülow, 85; captured French orders: McEntee, 65. Lanrezac showed “greatest quickness and comprehension”: Spears, 276; Germans were “running away”: ibid., 279; Lanrezac-Belin conversation: Lanrezac, 241; Spears, 281–2.

“不再指望我們的盟軍留在預期它守住的那條戰線上了”：Joffre, 217.

“整個法國史上最悲慘的”時期：Engerand, Briey, Rapport. Clausewitz quoted: III, 89. “Wonderful calm”: Foch, 42. What Joffre said to Alexandre: Demazes, 65.

準備撤離維特里：Joffre, 217. “Broken hopes”: Muller, 27.

比洛的混亂報告：qtd. Edmonds, 251, n. 4; Kühl, qtd. AQ, April 1927, 157.

霞飛不想為巴黎而保衛巴黎：According to a lecture given at the Sorbonne in 1927 by Commandant Demazes, a member of Joffre's staff and his biographer, qtd. Messimy, 264.

圖隆先生：Poincaré, III, 111–12.

內閣討論撤離巴黎，佩內隆來到巴黎，霞飛的建議，霞飛與加利埃尼、加利埃尼與普恩加萊在電話中的討論，米勒蘭、杜梅格和加利埃尼給內閣的建議：Poincaré, III, 115–122; Joffre, 122; Gallieni, Mémoires, 37–39; Carnets, 48–49.

蓋德激動地插話：interview with Briand, Revue de Paris, Oct. 1, 1930, qtd. Carnets, 128, n. 1.

霞飛務必遵照辦理，否則不惜予以撤職處分：ibid. The phrase used by Briand was, “de lui fendre l'oreille.”

這些部長們“永遠也做不出什么果斷的決策”：Gallieni, Carnets, 49.

“鴿式”飛機的襲擾：Poincaré, III, 120; Gallieni, Mémoires, 40, and Carnets, 50; Gibbons, 159. Text of the German proclamation: AF, I, II, Annexe No. 1634.

法國截獲德軍關于坦嫩貝格戰況的電報，及32列軍用火車的情報：Joffre, 222.

“你們確實勇敢”：Hanotaux, VII, 250.

霞飛看到德朗格勒將軍鎮定自若，而呂夫顯得神經質：Joffre, 216, 221. Col. Tanant quoted: 22; Ruffey's conversation with Joffre: Engerand, Bataille, xv.

《亞眠通訊》：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IV, Part 1, 222–27. “Patriotic reticence”: in Parliament, August 31, qtd. Times, Sept. 1, p. 10. “Liberation of the world”: Corbett-Smith, 237.

俄軍幽靈：D. C. Somervell, Reign of George V, London, 1935, 106, 117–18, and R. H. Gretton,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880–1922, New York, 1930, 924–25, contain many of the stories current at the time. Other references in MacDonagh, 24, Gardiner, 99, Carton de Wiart, 226. Stories told by returning Americans: NYT, Sept. 4 (front page), 5 and 6. Sir Stuart Coats’ letter: NYT, Sept. 20, II, 6:3.

給遠征軍下達的作戰命令：Edmonds, Appendix 20.

弗倫奇給基欽納的報告：Arthur, 46–7.

基欽納閱后不勝震驚，及其復電：ibid., 50; Edmonds, 249.

內閣“為之惶惶不安”：Asquith, II, 30. “You will conform”: Arthur, 51–52. Robertson's letter: to Lord Stamfordham, June 23, 1915, Nicolson, George V, 266. This was at a time when Sir John French was supplying Northcliffe with information for a campaign to blame Kitchener for the munitions shortage. King George went to France to talk to army commanders whom he found, as he wrote to Stamfordham, Oct. 25, 1915, to have “entirely lost confidence” in Sir John French and who assured him the feeling “was universal that he must go.” Ibid., 267.

基欽納不再信任弗倫奇：Magnus, 292. Birkenhead quoted: 29.

霞飛“懇切”要求弗倫奇不要撤退，要求普恩加萊以法國總統的身份施加影響，弗倫奇：“我拒絕了”：Joffre, 223; Poincaré, III, 121–22; Edmonds, 249; French, 97.

弗倫奇給基欽納的復電：Arthur, 52–4. “A travesty of the facts”: Asquith qtd. in Living Age, July 12, 1919, 67.

基欽納認為自己有權給弗倫奇發布命令：Blake, 34.

基欽納同阿斯奎斯以及大臣們交換意見，驚醒格雷：Arthur, 54; Asquith, II, 30.

“情緒激動，氣勢洶洶”：Huguet, 84.

弗倫奇見到基欽納身穿軍服，不禁怒火難遏：French, 101. Kitchener wore it customarily: Esher, Tragedy, 66; Magnus, 281–2.

“卡其軍裝上佩戴著星章”、“在澡盆子里他還是個不錯的小伙子”：Sir Frederick Ponsonby, Recollections of Three Reigns, New York, 1952, 443–4.

英國大使館里的會談：Huguet, 84; French, 101–02.

基欽納給政府的電報及給弗倫奇的電文副本：Edmonds, 264. One of these medals, found by a French infantry officer in the captured luggage of a German staff officer at the Marne, is now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author through the courtesy of the nephew of the finder.

## 第20章　馮·克盧克的轉向

“一輛汽車開了過來。”阿爾貝·法布爾（Albert Fabre）先生這樣寫道。他那幢坐落在貢比涅北面12英里的拉西尼（Lassigny）的別墅在8月30日被德國人征用了。“車上走下一個趾高氣揚、神態威嚴的軍官。他獨自傲然闊步地向前走去，佇立在別墅前面三五成群的軍官們為他讓路。此人身材魁梧，威風凜凜，臉上帶有傷疤，胡須剃得精光，容貌嚴峻，目光可畏，右手拿著一支士兵用的步槍，左手按在一把左輪手槍的槍柄上。他頻頻環顧左右，用步槍的槍托敲擊著地面，然后，以舞臺上亮相的姿態站停下來。看樣子誰也不敢走近他，他確實有一種令人竦然的氣派。”法布爾先生敬畏地注視著這個出現在他面前的全副武裝的人物，不禁想起了入侵羅馬的匈人王阿提拉，他打聽到這位來客不是別人，正是“早已赫赫有名的馮·克盧克”。

馮·克盧克將軍是施利芬計劃中部署在“右翼末梢的人”，當時他正在考慮一個成敗攸關的決策。他感到自己在8月30日已接近關鍵時刻。他右翼邊緣的部隊已擊退莫努里的幾支分隊；這次勝利，他認為是決定性的。在中路，部隊的追擊雖未趕上英軍，但是沿途發現英軍倉皇撤退中丟棄的一堆堆軍裝、靴子和彈藥，使他更加深信對手確實已被擊敗。在他左方，是他在吉斯戰役中為了支援比洛借調給他的一個師，據該師報告，法國人已被打得抱頭鼠竄。克盧克于是狠下決心，不讓他們有絲毫的喘息機會。

從有關朗勒扎克撤退方向的那些報告看來，法軍戰線向西延伸得并不像預料的那么遠。克盧克認為，在巴黎北面就能席卷法軍，毋須向巴黎西面和南面延伸。這一改變，勢需變更他的進軍方向，必須從正南轉向東南，這樣做也有利于填補他與比洛之間的缺口。像別人一樣，他在開始這場戰役時，認為增援會從左翼源源而來。他此刻亟須增援部隊前來接替他必須留在安特衛普前面的一軍，接替他駐在布魯塞爾的那個旅，以及留守那條越拉越長的交通線的各支部隊，至于需要他們來補充他在戰斗中的傷亡損失，就更不用說了。可是，增援部隊并未到來。毛奇至今沒有從左翼派出一兵一卒。

毛奇顧慮重重。這位“憂郁的愷撒”，不以勝利之師的前進為喜，而以征途上的困難為憂，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按計劃，要求在第三十六天至第四十天之間戰勝法國，而今已是第三十天了。盡管他的右翼各集團軍司令不斷報稱法軍和英軍“已被打得一蹶不振”，并且對他們的退卻用上了“潰敗”、“逃竄”等字眼，毛奇仍感到忐忑不安。他注意到一種可疑的情況，那就是沒有出現通常所見的潰逃或無組織撤退的跡象：俘虜為何如此之少？他的老上司施利芬經常說：“如果戰場上的勝利未能取得突貫或合圍敵軍的戰果，那么這一勝利也就算不了什么。敵人雖然被打退，他們仍會在別處出現，重新開始他們暫時放棄的抗擊。戰斗將繼續下去……”

盡管憂心忡忡，毛奇卻沒有去親自調查研究，而是一直待在統帥部里發愁，依靠派遣人員的匯報。“令人痛心的是，”他在8月29日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形勢如此嚴重，德皇卻毫不擔心。他已陶醉于一種勝利的歡呼聲中！這種情緒是我所深惡痛絕的。”

8月30日，當德軍接近戰役的高峰時，統帥部從科布倫茨向前移到距法國國境十英里的盧森堡市。他們現在已進入了抱有敵意的國土，這種敵意縱然不是出于官方的態度，也是發自老百姓的真實感情。由于地理和感情上接近法國，這里成了協約國各種謠言的中心。人們竊竊私語，紛紛傳說有8萬名俄國人正在前來支援法國人和英國人。統帥部忙于綜合有關在海峽沿岸某處登陸的種種跡象。確實曾有3000名英國海軍陸戰隊在奧斯坦德登陸，這個消息傳到盧森堡時已被渲染成一支具有威懾力量的俄國大軍，使德國人的憂懼更其顯得有憑有據。

毛奇深感不安，除了可能出現在他背后的俄國人的幽靈外，還擔心德軍戰線上的幾處缺口，特別是右翼各集團軍之間的缺口。克盧克與比洛之間有一道寬達20英里的缺口，比洛與豪森之間又另有一道20英里寬的缺口，第三處缺口在豪森與符騰堡公爵之間，也有那么寬。毛奇不安地意識到，這些越來越薄弱的地區原應從左翼抽調力量予以填補，可是他已將左翼兵力全部投入摩澤爾河的戰斗。一想到施利芬的主張，他不免感到內疚。施利芬堅決主張，正確的方針該是以最少的兵力在左翼保持守勢，而將可供抽調的各個師全部派去支援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可是，突破法軍堡壘戰線的幻影仍然吸引著統帥部。毛奇舉棋不定，便在8月30日派炮兵專家鮑爾少校親自去魯普雷希特的陣地視察。

在魯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鮑爾發現“根本沒有一致行動的計劃”。他驅車來到各條前線時，司令們和軍官們又都各執一詞，看法互異。一些人認為敵軍各師撤離陣地已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對勝利在即滿懷信心。其余的人則抱怨圖勒以南摩澤爾河沿岸一帶“叢山密林，障礙重重”，而在那里展開的進攻又正陷于困境。他們認為，即使進攻獲勝，也將受到來自圖勒的翼側攻擊，供應線也將難以為繼，因為所有公路和鐵路都必須經過這個設防城市。因此，必須首先拿下圖勒。在后方的第六集團軍司令部里，魯普雷希特親王一度高漲的好戰熱情已冷卻下來，他意識到自己正在從事一項“艱巨而又不愉快的任務”。

在代表統帥部的鮑爾看來，法軍從這條戰線上撤走的消息是個不祥之兆，因為它意味著敵人正在把部隊撤出去增援他們面對德軍右翼的陣地。他回到統帥部后向毛奇匯報他所得出的結論時說：進攻南錫至圖勒一線以及摩澤爾防線“不是沒有獲勝希望”，但是這樣做需要持久的努力，就現時來看，這是“沒有理由的”。毛奇同意這個看法，但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他沒有勇氣取消這個已經付出偌大代價的進攻，何況德皇陛下一心想以勝利者的姿態策馬通過南錫。第六集團軍沒有得到任何改變戰略的命令，仍然全力以赴，以求突破摩澤爾防線。

在此關鍵時刻，正在向前推進的翼側竟沒有得到增援，克盧克很為不滿。但是，促使他采取內圈包抄行動的原因，與其說是出于縮短戰線的需要，還不如說是因為他確信法軍已被打敗，可以一舉殲滅。他不想袖拂海峽從外線包圍，而擬從內側掠過巴黎，直追朗勒扎克。在追擊時，他的翼側可能暴露而受到巴黎衛戍部隊的襲擊，也可能受到正在他前面朝巴黎退卻的莫努里部隊的襲擊；這種危險，他不是沒有想到，只是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他認為莫努里目前所集結的部隊無足輕重，他們獲得增援的可能也微乎其微，因為法國人慘遭失敗，踉蹌逃跑，必然潰不成軍，無法調遣增援。而且，他料想法國人所有可供調遣的有生力量，或被王儲的集團軍圍困在凡爾登周圍，或為魯普雷希特的各集團軍牽制在摩澤爾河一帶，在此巨大壓力之下，俱已動彈不得。當他的大軍在巴黎前面向東進軍時，只消在這個首都前面部署他自己的一個軍——那個掉在后面的第四后備軍——就足以掩護他的翼側。何況，德軍的歷次軍事演習都已證明，防御陣地內的衛戍部隊，不到遭受攻打時是不會冒險出擊的；所以他確信第四后備軍能夠牽制莫努里湊合起來的殘余部隊。在他從一封繳獲的信件中得知約翰·弗倫奇爵士打算撤出戰線退到塞納河后面之后，他便再也不把迄今為止一直是他直接對手的英國遠征軍放在心上了。

按照德國的軍事體制——它與法國的不同——作為戰地司令的克盧克，有權在最大的可能范圍內自行決策。一個德國將軍，他所接受的思想理論教育、圖上戰術作業以及軍事演習方面的訓練，都是為了使他能對任何特定的軍事問題得出正確的解決辦法；因此，在情況需要時，就要求他能夠自行拿出一個正確的辦法來。當前的情況，在克盧克看來，既然有可能在戰場上殲滅法軍而無須包圍巴黎，那么，撇開巴黎、緊追逃敵的計劃，雖然背離原定戰略，卻是一個“正確的”辦法。按照德國人的軍事理論，只有打垮敵人的機動部隊，才能攻其筑壘的兵營。機動部隊一經殲滅，其他勝利果實便唾手可得。巴黎的吸引力雖大，但克盧克決計不為它所惑，而放棄恰當的軍事行動的途徑。

8月30日晚6時30分，馮·比洛的來電更使他定下決心。電報要求他采取內圈包抄行動，助以一臂之力，打擊法國第五集團軍，“戰而勝之，奪取最大戰果”。至于比洛究竟是要求幫助他擴大圣康坦一役的戰果，還是挽回他在吉斯一仗的失敗，從他的措辭看來，并不明確。但不論是何情況，他的要求跟克盧克的意圖是合拍的。于是，克盧克毅然做出決定。第二天的進軍不復以正南方向為目標，而是徑趨東南，直指努瓦永和貢比涅，切斷法國第五集團軍的退路。他的這支部隊從列日出發以來，連續行軍十六天，從未歇息，士兵們艱苦跋涉，嘖有煩言，而他在8月31日下達的命令是：“我們必須再一次號召部隊兼程行軍。”

德軍統帥部得知第一集團軍將于翌日早晨開始采取內圈包抄行動后，立即表示同意。毛奇本來就為戰線上的幾處缺口感到不安，他擔心發動決定性進攻時，右翼的三個集團軍不能相互呼應支援。而且，兵員已減少到低于進攻所需要的密度。如果克盧克真要按席卷巴黎的原定計劃行事，戰線勢必還要再拉長50英里，甚至更長一些。因此，毛奇抓住克盧克的建議，認為是一個可取的辦法，當夜就電復批準。

目標在望，將在第三十九天按計劃如期擊敗法國，轉而抗擊俄國；德軍的訓練、計劃和組織工作將得到全面的檢驗；贏得勝利和主宰歐洲的目標將功成其半。余下的任務就是乘勝圍殲敗退的法軍，不讓他們重新集結力量，再事抵抗。任何情況，無論是戰線上的缺口、比洛大軍在吉斯的挫折、士兵的極度疲乏，或是臨陣的畏縮或差錯，絕不容許發生，以免妨礙奪取勝利的最后沖刺。克盧克急如星火地驅使著他的部隊前進。軍官們一路縱馬揮鞭來回逡巡，軍曹們粗聲粗氣地發號施令，那些飽經戰爭創傷的部隊，在8月31日早晨困乏不堪地組成縱隊，拖著沉重的腳步，開始了又一天沒有盡頭的艱難跋涉。由于對地圖或地名一無所知，士兵們沒有覺察到進軍的方向已經改變。巴黎這個具有魔力的名詞吸引著他們繼續前進，沒有人告訴他們：巴黎已不再是他們的目的地了。

饑餓使他們的處境更為悲慘。他們已超越了供應線所能及的范圍，由于比利時境內的橋梁和鐵路隧道遭到破壞，那些供應線已不能充分發揮作用。而修復工程又未能使供應軍需的鐵路線跟上軍隊的前進。舉例來說，那慕爾的中心橋梁直到9月30日才告修復。經過一天漫長的艱苦行軍而疲憊不堪的步兵，往往發現他們預期宿營的一些村子已為自己的騎兵部隊占據。騎兵按理應該駐在村外，可是他們總是非常關心自己的軍需列車和馬匹的飼料，為了獲得這些，據這位早先也是騎兵的王儲說，他們“經常把自己駐扎在”原來準備安頓步兵的地方。他還說：“每當前面開始出現險惡的情況時，他們總是止步不前，成為步兵的障礙。”王儲的這些話構成了一份意想不到的證詞。

9月1日，克盧克的軍隊在窮追猛趕英國人時，遭到一次難對付的突然襲擊。克盧克曾在他的公報中聲稱，英國人撤退時“旗靡轍亂，潰不成軍”，而今他們居然能夠掉頭反撲，給德國人以迎頭痛擊，誠屬不可思議。在貢比涅和維萊科特雷（Villers-Cotterets）的森林里及森林四周，經過一天殊死戰斗，英國遠征軍的后衛部隊頂住了敵軍，使主力部隊得以再次遠遁，因此克盧克大為惱火。他推遲了部隊“迫切需要的”休整，下令第二天繼續進軍，并把進軍方向重又略為西移，企圖包圍英軍。但是，英軍又一次成功地“及時”擺脫了他的追擊，并在9月3日渡過馬恩河。克盧克消滅他們的時機已失之交臂；既喪失了時間，增加了傷亡，又拉長了行軍路線，克盧克在絕非愉快的心情下重新開始他的內圈包抄行動，繼續跟蹤追擊法軍。

“我們的士兵已經精疲力盡，”克盧克的一名軍官在9月2日的日記中這樣寫道，“他們踉踉蹌蹌，滿面塵土，衣衫襤褸，瘦骨嶙峋，活像一具具會行走的稻草人。”在那彈坑累累，遍地都給炸倒的樹干阻塞得難以通行的道路上，以平均一天24英里的速度連續行軍了四天之后，“他們索性閉上眼睛，邊走邊唱著歌，這樣才可以不至于睡著。……使他們繼續前進的唯一動力是早日勝利和進入巴黎的信心。要是沒有這個，他們就會癱倒下來，就地入睡”。這篇日記還證實了德軍在行軍途中出現的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在更東面，在比洛和豪森的部隊行經香檳（Champagne）的途中，這個問題尤為突出。“他們縱酒無度，但酩酊的狀態使他們得以繼續前進。今天，將軍在視察之后，大發雷霆。他要制止這一普遍酗酒的現象，不過我們設法勸阻他不要發布嚴厲的命令。如果我們執法過嚴，軍隊就不能行軍了。必須有異乎尋常的興奮劑才能克服異乎尋常的疲勞。”這位軍官最后滿懷希望地寫道：“到了巴黎，這一切就會好了。”顯然，他也不知道這次行軍已變換方向。

德國人經過法國時，就像經過比利時一樣，沿途留下一片焦土廢墟。村子被焚毀，平民遭槍殺，住宅被洗劫糟蹋，戰馬闖過內室，炮車曳過庭園，普恩加萊在尼貝庫爾（Nubécourt）的家族墓地也被挖成廁所。9月2日，克盧克的第二軍經過距巴黎25英里的桑利斯（Senlis）時，槍殺了市長和六名平民人質。就在這個市鎮的郊外，在埋葬這些人的墓地邊上，一塊石碑上刻著他們的姓名：

歐仁·奧代納（Eugène Odène）市長

埃米爾·奧貝爾 （Emile Aubert）硝皮匠

讓·巴比埃（Jean Barbier）馬車夫

呂西安·科特羅（Lucien Cottreau）餐館侍者

皮埃爾·德韋爾特（Pierre Dewerdt）司機

J-B.埃利澤·波米埃（J-B. ElyséePommier） 面包師傅的助手

阿爾蒂爾·雷岡（Arthur Régant）石匠

對馮·豪森將軍來說，9月2日是個幸運的日子，他發現自己在埃納河畔的蒂尼（Thugny）宿營的地方原來是夏布里隆（Chabrillon）伯爵的一幢別墅。這位將軍占用著伯爵夫人的閨闥，他查看了她的名片，發現她本人是萊維―米爾普瓦（Lévy-Mirepois）女伯爵，滿心喜悅，睡在她的床上也感到格外心蕩神馳。他在晚餐時吃了一頓野雞，那是他的軍需官在別墅花園里打獵弄來的。飯后，豪森清點了伯爵夫人的銀餐具，并且開列了一份清單，交由村里的一個老人保管。

也就在這天晚上，毛奇經再次考慮，對于克盧克的內圈包抄行動使其翼側暴露于巴黎之前的情況，越來越感到不安，于是下了一道新的通令。如同他在處理左翼問題時一樣，這道通令顯示了他的舉棋不定。通令叫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偏離巴黎朝東南方向追逐法軍”，就此批準了克盧克的轉向。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可能遭受襲擊的危險，通令又要求克盧克的軍隊“列成梯隊，尾隨第二集團軍之后”，并“負責掩護兩軍的翼側”。

好一個列成梯隊！這對克盧克說來，是個莫大凌辱，比之統帥部早先要他聽命于比洛，更使他受不了。這位一手挎著步槍、一手握著左輪手槍，面容嚴峻的阿提拉王，德軍右翼的帶步人，是不會甘居人后的。他自己給第一集團軍發出了一道命令：“第二天（9月2日）繼續前進，跨過馬恩河，以便向東南方向追趕法軍。”至于掩護暴露于巴黎面前的翼側的任務，他認為只消留下他兩支最弱的部隊就足夠應付。這兩支部隊是第四后備師和第四騎兵師；前者實力不足，有一個旅留駐布魯塞爾，后者在9月1日與英國人的一仗中曾受重創。

8月31日，即克盧克轉變方向后的第一天，索爾代騎兵軍的一名軍官勒皮克（Lepic）上尉上午在貢比涅西北偵察時，發現不遠處有一支德軍騎兵縱隊，計有九個中隊；十五分鐘以后，跟著又來了一支步兵縱隊，其中有炮兵連、彈藥車隊和一個自行車連。他注意到他們不是朝南直趨巴黎，而是在沿著去貢比涅的道路前進。勒皮克上尉沒有意識到自己正是目擊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然轉向的第一個見證人。他津津有味地報告了德國槍騎兵如何丟掉他們與眾不同的鋼盔，換上布軍帽，以及“他們如何用拙劣的法語向當地居民問路，用德語連聲說著‘英國人、英國人’”。他的這份有關德國人進軍路線的情報，當時并沒有引起法軍總司令部的任何重視。人們認為，可能是貢比涅這個城市和城堡吸引著這些德國人，而且他們仍然可以取道貢比涅前往巴黎。況且，勒皮克上尉所看到的兩個縱隊，也不一定表明克盧克全軍的動向。

8月31日，法國人也注意到戰役正在進入高峰。他們的第二個計劃——擬將重心移至左翼以阻遏德軍右翼前進的8月25日的計劃——已告失敗。第六集團軍原應同英軍和第五集團軍一起在索姆河畔穩住陣腳，組織反擊，但這一使命也未能完成。霞飛承認，第六集團軍眼下的任務該是“掩護巴黎”。至于英軍，正如他私下所說那樣，“不愿前進”，而第五集團軍則由于克盧克正在從其側面進行追擊，仍然沒有擺脫被包圍的危險。果然，令人驚駭的消息傳來了，克盧克騎兵的先頭突擊部隊已突破第五集團軍與巴黎之間英軍撤退后留下的那道缺口。現在已很清楚，正如霞飛的作戰處長蓬（Pont）上校對他所說那樣，“要以足夠的兵力擋住德軍右翼，遏制它的包圍，看來已不復可能”。

勢必制訂一項新的計劃。保存實力是當務之急。在法軍總司令部里，霞飛和他的兩位副職——貝蘭和貝特洛，以及作戰處的高級軍官一起討論了對策。戰局急轉直下，迫使進攻派學說的“門徒”采取一個新的主張——“堅持抵抗”，直至法軍能夠穩住一條戰線，然后從那里重新發動攻勢。當時，大家都認識到，德軍由于前進將沿著一條從凡爾登到巴黎的巨大弧線疏開。這次計劃，不是阻擊德軍正在進犯的一翼，而是通過襲擊德軍的中路，切斷這一翼，也就是仍舊按照第十七號計劃的戰略行事。只不過這一回戰場是在法國的心臟。法軍一旦敗北，將不像當初在邊境那樣只是一時的挫折，而是定局了。

問題在于應在什么時候重新開始“前進行動”。最早的時機是不是在與巴黎成一直線的時候，從馬恩河流域開始？還是應該繼續后退40英里，一直退到塞納河后面的防線？繼續后退意味著把更多的國土拱手送給德國人；但是塞納河的天然屏障可給法軍提供一個喘息時機，使他們在沒有敵軍直接壓力的情況下得以重新集結力量。德國人的主要目標既然是摧毀法國的軍隊，因此我們的“主要目標”，按貝蘭的主張，就必須是“保存我們的有生力量”。采取“謹慎的”態度，在塞納河后面整編隊伍，這在當前既是國家的職責所在，也是挫敗敵人目標的上策。貝蘭力主此議，貝特洛則鏗鏘有力地予以支持，霞飛聽從了他們的建議，第二天就發出了第四號通令。

9月1日，色當戰役紀念日的前夕，法國的前景看來像當年一樣暗淡悲慘。來自法國武官的消息，正式證實了俄國人在坦嫩貝格的敗績。第四號通令與邊境潰敗后那號語氣堅定的通令顯然不同，它反映了總司令部在敵騎縱橫一周后樂觀心情的動搖。它飭令第三、第四、第五各集團軍“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繼續撤退，以撤至塞納河和奧布河為限，“但并不是說必須撤退到這個限度”。“一旦第五集團軍擺脫被圍的威脅”，各集團軍“當即重新發動攻勢”；但不像前令，它沒有指定具體時間或地點。雖然如此，在這號通令里，人們可以看到未來戰役的發軔，因為它談到要從南錫和埃皮納勒抽調增援部隊前來參與這次攻勢，并稱“巴黎筑壘兵營的機動部隊也可參加這次全面行動”。

支持霞飛的一派和支持加利埃尼的一派，后來在他們就馬恩河戰役的發端問題所展開的痛苦而長期的論戰中，對第四號通令，以及對該令下達后四天中的每一行動、每項命令，都有大量爭議。毫無疑問，霞飛雖然對交鋒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并不確定，但對總的戰役有個大體輪廓。他預見到這個戰役將發生在德軍五支追兵來到“巴黎與凡爾登兩犄角之間”，法軍在法國中部形成一個淺弧形或網狀陣線的時候。霞飛認為他有一周時間可以用來部署，所以當梅西米9月1日前來向他告別時，他說，他預期在9月8日重新發動攻勢，并預言這一戰將被稱為“布列訥堡之戰”（the battle of Brienne-leChâteau）。布列訥堡是馬恩河后面25英里的一個市鎮，到馬恩河和到塞納河的距離相仿。它曾是拿破侖戰勝普魯士的布呂歇爾元帥的戰場。這對霞飛說來，或許是個吉兆。在繼續強制退卻的一片愁云之中，在敵軍日益逼近的陰影籠罩之下，霞飛臨危不懼、泰然自若和滿懷信心的神態，再一次給梅西米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巴黎眼看塞納河各軍后撤，使自己失卻掩護，感到不是滋味。霞飛打電話給米勒蘭，毫無保留地告訴他當前戰局概況。他談了英軍“使勁的”撤退已使朗勒扎克的左翼暴露，以致各軍必須繼續撤退，直到朗勒扎克脫離戰斗為止。他已令莫努里朝巴黎方向撤退并與加利埃尼“保持聯系”，但他沒有提到將第六集團軍置于加利埃尼指揮之下。他說，敵軍各縱隊正在朝稍微偏離巴黎的方向前進，這可能提供一段“稍事喘息”的時間；盡管如此，他仍然認為政府應該“立即”離開巴黎，不在當晚，就在明天，事屬“至要，刻不容緩”。

加利埃尼得到驚惶失措的政府關于情況發展的通知之后，立即打電話給霞飛。霞飛避不與他說話，加利埃尼請人轉告：“我們無法抵抗。……霞飛將軍必須知道，如果莫努里不能堅守陣地，巴黎就無法抵御敵人。必須給這個筑壘的兵營增撥三個現役軍。”當天下午較晚時分，霞飛給加利埃尼回了電話，通知他說，正在把莫努里的軍隊調歸他指揮。這支軍隊將成為巴黎這個筑壘兵營的機動部隊。按照慣例，機動部隊不受野戰集團軍指揮，并且可由衛戍司令做主不參加一般的戰役。事實上，霞飛并無意放棄這支部隊。就在這一天，他以巧妙的手法要求陸軍部長將巴黎這個筑壘兵營及其所有軍隊全部歸他這位總司令統轄，“以便在情況需要時我能動用這支機動衛戍部隊作戰”。米勒蘭像梅西米一樣對霞飛衷心折服，9月2日便照此下了命令。

此時，加利埃尼終于有了一支集團軍。現在可由他調遣的莫努里的這支部隊，是由第七軍的一個現役師、一個摩洛哥旅，以及四個后備師組成。這四個后備師即：埃伯內將軍率領的，原來從巴黎抽調出去的第六十一師和第六十二師，以及曾在洛林英勇奮戰的第五十五師和第五十六師。霞飛還同意再增派精銳的阿爾及利亞輕步兵第四十五師；這支部隊反正不在他管轄之下，當時正在巴黎下火車。此外，他還同意增派野戰集團軍中的一個現役軍。像克盧克一樣，他挑了一個殘缺不全的軍，即曾在阿登山區遭受慘重損失的第三集團軍的第四軍。不過，這個軍正在得到補充，而且，把它從第三集團軍防守的凡爾登前線調來增援巴黎，在克盧克看來，這是法國人所做不到的。加利埃尼接到通知，第四軍將在9月3日和4日乘火車到達巴黎。

加利埃尼一接到霞飛將第六集團軍調撥給他的口頭通知之后，立即驅車北上跟他的新部隊聯系。沿途盡是從四面八方朝巴黎涌來的難民。他們競相逃離步步緊逼的德國人，滿臉“驚恐絕望之色”，看到這幅景象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為時已晚。在巴黎西北不遠，第六十一師和第六十二師正在開進蓬圖瓦茲；那里是一片驚惶混亂。部隊在撤退途中曾被迫苦戰，人困馬乏，血污斑斑。當地居民聽到轟鳴的炮聲和德國槍騎兵已在左近的消息，驚恐萬狀，手足無措。加利埃尼同埃伯內將軍交談之后，又趕到巴黎以北30英里瓦茲河畔的克雷伊（Creil）去找莫努里。他命令莫努里在退向巴黎時炸毀瓦茲河上的所有橋梁并設法阻滯敵軍前進，無論如何在他與首都之間不能讓德軍揳入。

在匆忙趕回巴黎途中，加利埃尼看到威武雄壯的阿爾及利亞輕步兵第四十五師列隊經過大街，前往他們的駐防地區。這一景象比他看到難民的情景時要寬慰得多。士兵們身穿鮮艷的上衣和肥大的燈籠褲，動人心弦，多少使巴黎人再次精神振奮起來。

然而，政府各部情緒低落。米勒蘭已把“令人痛心的”情況向總統做了匯報，他說：“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已破滅，我軍在前線全面撤退；莫努里的軍隊正在退向巴黎。……”作為陸軍部長，米勒蘭拒絕承擔讓政府于第二天（9月2日）傍晚以后在巴黎多逗留一個小時的責任。普恩加萊面臨著“我一生中最沉痛的事變”。于是經決定，全部政府機構必須作為一個整體遷往波爾多，一個也不留在巴黎，以免公眾對部長們作出容易引起惡感的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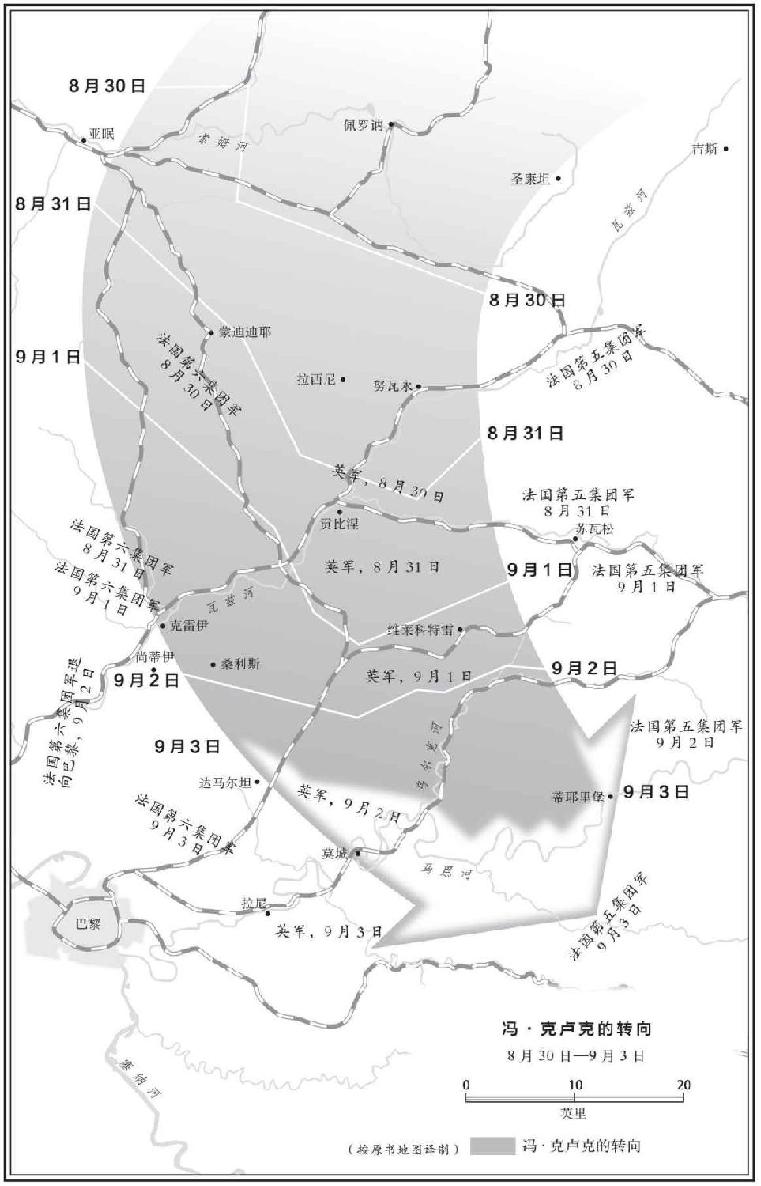
那天傍晚，加利埃尼一回到城里便從米勒蘭那里得到消息，歐洲這個最重要的城市，在它受圍期間的一切軍政大權全都由他一手掌管。如果沒有塞納省的省長和巴黎警察總監，“我將是光桿一個”。他發現他不得不倚為股肱的這位警察總監上任還只剛剛一小時。原來的警察總監埃尼翁先生（M. Hennion），一聽到政府將要遷移，便斷然拒絕留下。當接到命令要他留守崗位時，就以“健康為由”辭職不干了。對加利埃尼說來，政府遷離至少有一個好處，就此可以使主張巴黎成為不設防城市的人啞口無言；他們的法律根據已不復存在，加利埃尼從此可以放手把巴黎作為一個筑壘的兵營來保衛了。盡管他“寧愿沒有部長們在場”，不過他認為，“要是有一兩個留下來裝點一下門面也是好的”。這種看法，對于那些本來愿意留下來的部長們來說，是不太公平的，可是加利埃尼對政客的蔑視，一無例外。

加利埃尼預料兩天之內德軍可能兵臨城下，他和他的參謀徹夜不眠，進行“我的整個部署，準備在巴黎以北即蓬圖瓦茲至烏爾克河（Ourcg）一帶出擊”，也就是說，將在寬約45英里的一個地區作戰。烏爾克河是一條小河，在巴黎東面注入馬恩河。

那天深夜，總司令部得到一份大可以叫政府不必逃跑的情報。白天，一只手提包送到了第五集團軍的情報官法加爾德（Fagalde）上尉手中。這只手提包是在一名隸屬克盧克的騎兵軍官的尸體上發現的，這位軍官在乘坐汽車外出時被法國巡邏兵擊斃。包里的文件中有一張沾滿血跡的地圖，上面標明了克盧克各個軍進軍的路線以及這天各應到達的地點。全軍的進軍路線都標向東南，從瓦茲河出發直指烏爾克河。

總司令部對法加爾德上尉的發現做出了正確的判斷，認為克盧克意圖悄悄地穿過第六集團軍和第五集團軍之間地帶，繞過巴黎，席卷法軍主力陣地的左翼。即使他們也認識到這意味著克盧克將放棄進攻巴黎，他們卻沒有盡其最大努力使政府相信這種看法。當總司令部與總統之間的聯絡官佩內隆上校翌日上午前來向普恩加萊報告克盧克改變進軍方向的消息時，并沒有從霞飛那兒帶來政府可以不必遷移的任何建議。相反，霞飛卻要聯絡官告訴總統：政府必須遷離，克盧克的意圖無法捉摸，他的縱隊現已到達20英里外的桑利斯和尚蒂伊（Chantilly），巴黎可能很快就要遭到炮轟。至于普恩加萊和米勒蘭對于克盧克轉向的重大意義究竟有多少認識，那就很難說了，因為在戰爭時期和緊急關頭，任何事情都不能像事后那樣看得清楚或確有把握。當時是一片緊張氣氛，甚至是恐慌氣氛。既然經歷了一番痛苦做出了決定，政府覺得很難再貿然改變。不論情況如何，米勒蘭仍然堅持撤離，毫不動搖。

9月2日，色當紀念日那天，“令人痛恨的時刻終于來到”。當普恩加萊知道安排政府在半夜三更，而不是在白天眾所得見的情況下撤離時，更加感到“悲痛和羞辱”。內閣堅持，按照法律，總統必須坐鎮政府所在地。即便是普恩加萊夫人要求讓她留在巴黎繼續她的醫院工作，以安定人心，也未獲準。美國大使邁倫·赫里克前來送別時，則是“愁容”滿面，熱淚盈眶。



對于局勢，赫里克跟當時留在法國首都的人都持有同樣看法。他在給他兒子的信中寫道：“德國人攻勢兇猛，看來是抵抗不住的了。”他曾從德國人那兒接到警告，勸他離開首都避往外省，因為巴黎的“整個市區”可能被徹底摧毀。然而，他決心留下，并且答允普恩加萊，他將“代表全人類執行保管任務”，把巴黎的博物館和紀念碑置于美國國旗保護之下。他已胸有成竹，打算采取與此時此地所需的奮不顧身、仗義執言的崇高境界相稱的做法：“如果德國人來到城外并勒令巴黎投降，就挺身而出，找他們軍隊司令談判，如有可能，就找德皇本人。”赫里克既已應德方請求代為照管德國大使館，也就可以憑此要求他們會見。后來，每當那些曾在巴黎度過9月份頭幾個星期的朋友們夸耀自己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了不起的人物時，加利埃尼總是提醒他們：“別忘了，還有赫里克呢！”

7時，加利埃尼前來給米勒蘭送行。圣多米尼克街的陸軍部里是“一片悲傷、陰郁、凄寂”，院子里停滿了巨大的搬運篷車，正在裝載準備運往波爾多的卷宗檔案。留下的部分全都焚毀了。收拾包裝的過程產生了一股“陰郁”的氣氛。加利埃尼沿著沒有燈光的樓梯攀登而上，發現陸軍部長獨自一人在一間空蕩蕩的房間里。既然政府正在撤離，米勒蘭也就毫不遲疑地容許巴黎以及這里的每一個人進入炮火之下了。他給加利埃尼的命令是：“殊死”保衛巴黎。對加利埃尼來說，這根本是無須別人關照的。

“部長先生，你懂得‘殊死’這個詞的意義嗎？”加利埃尼問道，“這意味著破壞、毀滅、炸掉市中心的所有橋梁。”

“殊死，”米勒蘭重復了一遍。告別時，他注視著加利埃尼，似乎此后再也見不到他了。加利埃尼感到“自己也幾乎相信留下來是等死”。

幾小時后，部長們和國會議員們，在黑夜間，在使他們很多人感到羞愧的鬼鬼祟祟的氣氛中乘上了開往波爾多的火車，而以翌晨向公眾發表的一篇冠冕堂皇的聲明來掩飾這個不光彩的時刻。聲明說，當前的任務必須是“堅持到底，決一死戰”。法國將堅持到底，決一死戰；英國將在海上切斷敵人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系；俄國人將“繼續前進，直搗德意志帝國的心臟”！（這個時刻，透露俄國人戰敗的消息看來是不合時宜的。）為了使法國的抵抗具有最大的“沖勁和力量”，政府應軍方要求，已“暫時”遷移到一個它能與全國經常不斷保持聯系的地方。“同胞們，讓我們在當前這樣悲慘的情況下不愧為法國人。我們必將取得最后的勝利，我們有堅定的意志、持久的耐力、頑強的精神，總之，我們有不甘滅亡的決心。”

加利埃尼搞了一份言簡意賅的公告，頗為躊躇滿志。措辭是經過一番精心推敲的，意在消除關于巴黎已被宣布為不設防城市的謠言，讓人民對事態發展有所準備。他的公告第二天早晨出現在巴黎各處墻上：

巴黎守軍、巴黎市民：

為進一步推動全國防務，共和國政府人員已撤離巴黎。本長官兼司令業經受命負責抗擊入侵之敵，保衛巴黎。此項命令本長官兼司令將貫徹執行不渝。

1914年9月3日，巴黎

巴黎軍事長官、巴黎守軍司令

加利埃尼

這份公告在公眾中引起的震驚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因為總司令部發布的公報在此以前都是采取措辭極其含糊的方針，不使老百姓了解軍事情況的嚴重性。政府看來是毫無理由地逃亡了。它的宵遁留下了一個令人痛心的印象，盡管法國人民對波爾多抱有歷久彌堅的感情，但他們還是耿耿于懷。人們用雙關諧語來嘲弄政府，把政府官員們稱為“tournedos à la bordelaise”[[1]](#_1__Yi_Ji__Bo_Er_Duo_Shi_De_Niu)，那些跟著他們逃難涌向火車站的人群即興作了一首模仿《馬賽曲》的打油詩：

到火車站去，公民們！

登上車廂！

這對巴黎軍政府來說，是“極其痛苦的日子”。隨著各軍不斷向巴黎北面和東面撤退，巴黎要堅守多久以及何時炸毀巴黎大區內80座橋梁的問題，引起了越來越強烈的緊張和不安。各支軍隊的司令，在確保自己的隊伍安全通過后，都迫不及待地要炸毀他們后面的橋梁以切斷敵人的追擊。總司令部的命令是“不讓任何一座橋梁完好無損地落入敵人手中”，但這些橋梁卻又是反攻時所需要的。同時，在這個地區內，又有三個各自為政的司令部在發號施令：加利埃尼的、霞飛的，以及地點上處于他們兩者之間的約翰·弗倫奇爵士的，而這位爵士在基欽納前來視察以后主要關心的是顯示他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獨立性。于是，巴黎陣地上守衛橋梁的工兵部隊給一連串相互矛盾的命令搞得暈頭轉向，無所適從。一名工兵軍官向伊爾斯肖埃將軍報告說：“大難即將臨頭。”

英國人在9月2日夜幕降臨前到達馬恩河，第二天就過了河。走到貢比涅南面之后，士兵們發現行軍方向偏離了他們的地圖，才恍然醒悟這根本不是軍官們所說的一次“戰略撤退”。他們在布洛涅和勒阿弗爾的基地業已疏散一空，所有物資和人員都已遷往盧瓦爾河（Loire）河口的圣納澤爾。

第五集團軍落在英國人后面約一天的行軍路程，還沒有脫離被包圍的危險。在持續酷熱的天氣里，撤退與追擊繼續進行著，逃跑的和追逐的同樣疲憊不堪。自吉斯戰役以來，第五集團軍每天行軍18至20英里。撤退途中，三五成群的逃兵打家劫舍，使關于德軍暴行的種種故事在居民中傳播，制造了恐慌，于是槍決了一些逃兵。朗勒扎克認為，從來沒有一支軍隊經歷過像他的軍隊正在經歷的這種嚴峻考驗。這時，一名英國軍官在談到英國遠征軍時說道：“我絕難相信，士兵們在如此疲乏而又如此饑餓的情況下，居然能夠活下去。”在這些艱難的日子里，亨利·威爾遜想方設法找一些話來激勵人心，他向于蓋上校說：“德國人操之過急。他們這次追擊進行得太快了。一切都做過了頭。他們必然會鑄成大錯，到那時，你們的時機就來到了。”

直到這時，在法軍總司令部里，霞飛和他的顧問們對克盧克采取的內圈包抄行動雖然已有所覺察，但是并未從中看出這是攻其翼側的一個重要而又及早的機會。克盧克在9月2日轉向追擊英軍后，霞飛和他的顧問們吃不準他是否會掉轉頭來進攻巴黎。不論怎樣，他們所關心的不是巴黎，而是在他們重新建立起一條鞏固的防線之后準備在塞納河沿岸發動的一場會戰。在總司令部里經過進一步的緊張磋商之后，霞飛最后決定繼續撤退，退至各軍當時駐地后面“數天行程的地方”，以便爭取時間從他的右翼調集增援部隊。盡管存在著可能削弱原來已是勉強守住的摩澤爾防線的危險，他還是毅然決定從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分別抽調一個軍前來支援。

9月2日下達給各集團軍司令的機密指令，體現了霞飛的這一決定，指令中明確規定塞納河到奧布河一線是各集團軍撤退的極限。這樣部署的目的，霞飛解釋道，是要“把各集團軍從敵人的壓力下解脫出來，并使它們能夠重行編組”。在完成此項任務并將援軍從東面調來之后，“便是轉入攻勢的時刻”。英國軍隊將“被要求參加這次戰略行動”，巴黎衛戍部隊“將向莫城（Meaux）方向采取行動”，也就是說，攻打克盧克的翼側。不過霞飛還是沒有定出一個具體的日子，只是說他將“在數天之內”發出信號。司令們奉命對逃兵采取“最嚴厲的措施”，以確保有秩序的撤退。霞飛要求每個人都要了解當前的形勢并盡其最大的努力，他明確指出，這將是“國家安危所系的”一場戰役。

加利埃尼在巴黎接到命令后，對霞飛的戰略大為不滿，因為它拋棄了巴黎，而且“脫離實際”。他認為德軍追擊的速度不可能容許法軍有時間到達塞納河或在那里重行編組。他也接到關于克盧克朝東南方向進軍的一些片斷報道，但是沒有人告訴他法加爾德上尉發現的極其重要的證據。9月2日晚，他估計第二天就會遭到進攻，于是睡在司令部里。這時候他的司令部設在巴黎殘老軍人院馬路對面的維克托―迪律伊女子中學（the Lycée Victor-Duruy）里。這是一幢巨大的建筑，隱蔽在樹木的后面，與外界隔絕，出入口都較那座軍人院少一些，因此也比較容易守衛。各道門口都布置了崗哨，有軍用電話同這個筑壘兵營內所有師部保持聯系，為作戰參謀和情報參謀留出了辦公室，還安排了食堂和宿舍。于是，加利埃尼大為欣慰，他終于能夠搬進“一個正規的戰地司令部，就像在前線一樣”。

第二天，9月3日上午，他得到關于克盧克在繞過巴黎朝馬恩河方向移動的確切消息。巴黎衛戍部隊的飛行員瓦托（Watteau）中尉，在飛行偵察中發現敵軍縱隊在“從西向東”朝著烏爾克河流域移動。接著，從巴黎營地起飛的第二架飛機證實了這個報告。

在加利埃尼的第二處的參謀室中，激動緊張的心情在軍官們中間默默無語地交流著。前線負傷下來的吉羅東（Girodon）上校“認為自己還能做些參謀工作”，他躺在一架有輪子的躺椅上，兩眼盯著墻上的地圖，彩色大頭針在上面標出了德軍前進的方向。加利埃尼的參謀長克萊熱里（Clergerie）將軍走進來的時候，正好又送來一份英國飛行員的空中偵察報告。這些大頭針經再次移動之后，克盧克轉向的路線赫然無誤地在地圖上顯示出來，克萊熱里和吉羅東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他們把翼側送上門來了！他們把翼側送上門來了！”

注釋

[[1]](#_1_20) 意即“波爾多式的牛排”。但牛排一詞（tournedos）與逃跑（tourner le dos）發音近似，因此亦可作“逃往波爾多的家伙”的意思。——譯注

法布爾先生對克盧克的描述：Hanotaux, VIII, 158.

克盧克轉向東南的理由：Kluck, 77, 82–84.

毛奇的顧慮：Bauer, 52.

施利芬：“如果戰場上的勝利……”：qtd. Hanotaux, VII, 197.

“他已陶醉于一種勝利的歡呼聲中”：Moltke, Erinnerungen, 382.

在盧森堡流傳的俄軍在奧斯坦德登陸的謠言：Tappen, 115.

毛奇擔心右翼各集團軍之間的缺口：Tappen, 106.

鮑爾少校親自去魯普雷希特的陣地視察：Bauer, 53ff.; Rupprecht, 77–79.

克盧克估計的敵軍力量：Kluck, 91; captured British letter: Edmonds, 244.

比洛來電要求克盧克采取內圈包抄行動：Kluck, 83; Kluck's order of August 31 for forced march: Bloem, 112; Moltke's approval of inward wheel: Kluck, 83–4; Hausen, 195.

騎兵“總是止步不前”：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64.

“迫切需要的”休整及英軍“及時”擺脫追擊：Kluck, 90.

“我們的士兵已經精疲力盡”：qtd. Maurice, 150–51. General Maurice adds (152) that after the Battle of the Marne when the Germans were in retreat to the Aisne, “Whole parties of officers were captured because they were too intoxicated to move.”

普恩加萊的家族墓地被挖成廁所：Poincaré, III, 204.

克盧克的第二軍經過桑利斯時，槍殺了市長和六名平民人質：ibid.; Gallieni, Mémoires, 120. Names on the memorial stone were copied by the author on the site.

豪森將軍愉快的一晚：Hausen, 208–10.

毛奇9月2日下達的新通令：Kluck, 94.

克盧克下令跨過馬恩河：Kluck, 100.

勒皮克上尉關于德軍進軍路線的報告：AF, I, II, Annexe No. 1772.

第六集團軍“掩護巴黎”：ibid., Annexe No. 1783; Joffre, 225.

英軍“不愿前進”：Gallieni, Mémoires, 52.

蓬上校：“看來已不復可能”：Joffre, 218–19.

霞飛與貝蘭和貝特洛等高級軍官討論對策：ibid., 230–33.

第四號通令：AF, I, II, Annexe No. 1792.

“布列訥堡之戰”：Messimy, 379.

霞飛打電話給米勒蘭，“至要，刻不容緩”：Poincaré, III, 126; Joffre, 232.

加利埃尼給霞飛打電話：Gallieni, Carnets, 53.

莫努里的軍隊被調歸加利埃尼指揮，巴黎被劃歸霞飛管轄：Because these events were taking place at a time of great tension and also because of later efforts during the quarrel over credit for the Marne, to obscure the question of who was under whose orders, this issue is still not entirely clear. The relevant sources are Joffre, 226, 234–5, 239–42; Gallieni, Mémoires, 43, and Carnets, 53; Joffre's request to have Paris put under his command is Annexe No. 1785; the order putting Maunoury under Gallieni is Annexe No. 1806; Millerand's order complying with Joffre's request is Annexe No. 1958.

巴黎守軍的構成：AF, I, II, 772–4. The 55th and 56th Reserve Divisions who were now to fight for the capital had been withdrawn from Lorraine on August 25, causing General Ruffey, whose flank they were supporting in a counteroffensive in the Briey basin, to break off action. Briey, as Ruffey said in his postwar testimony, was thus “the ransom of Paris.” Fighting as a reserve officer with one of these divisions, the 55th, Charles Péguy was killed on September 7.

加利埃尼拜訪埃伯內和莫努里：Mémoires, 42, 48–9.

米勒蘭向總統匯報“令人痛心的”情況，政府決定撤出巴黎：Poincaré, III, 125–27.

加利埃尼和巴黎警察總監：Mémoires, 51–52; “preferred to be without ministers”: Parle, 38; “Made all my dispositions”: Mémoires, 57.

法加爾德上尉發現的德軍軍官的手提包：Spears, 331–32; his report: AF, I, II, Annexe No. 1848.

霞飛仍建議政府遷出巴黎：Poincaré, III, 131.

“令人痛恨的時刻終于來到”：ibid., 134.

美國大使赫里克的計劃：ibid., 131; Mott, 155–7, 160–63; Carnets, 61.

加利埃尼給米勒蘭送行：Mémoires, 59–64; Parle, 49.

加利埃尼的公告：Hanotaux, IX, 39; Carnets, 55.

模仿《馬賽曲》的打油詩：Marcellin, 41.

“極其痛苦的日子”：Hirschauer, 142.

第五集團軍處決逃兵：Lanrezac, 254–56.

“我絕難相信”：qtd. Edmonds, 283; Germans are “over-hasty”: Huguet, 70.

霞飛9月2日下達給各集團軍司令的機密指令：AF, I, II, 829 and Annexes Nos. 1967 and 1993. Order for reinforcements to be taken from Ist and IInd Armies is Annexe No. 1975.

加利埃尼認為這項密令“脫離實際”：Mémoires, 79; Parle, 50.

加利埃尼將司令部遷往維克托―迪律伊女子中學：Mémoires, 60–61.

瓦托中尉的報告：Pierrefeu, Plutarque, 102–3.

“他們把翼側送上門來了！”：Hirschauer, 180.

## 第21章　“先生們，讓我們在馬恩河戰斗吧”

加利埃尼當即看出巴黎守軍的機會來了。他毫不躊躇，便決定盡速對德軍右翼進行側擊，并說服霞飛停止向塞納河后撤，立即在全線恢復攻勢，支持他這一戰略行動。雖然以莫努里的第六集團軍為核心的巴黎守軍是由加利埃尼指揮的，但從前一天起，整個巴黎營地及其所有部隊均已劃歸霞飛統一指揮。因此，要第六集團軍發動進攻，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即霞飛的同意和第六集團軍的近鄰英國遠征軍的支持。這兩支軍隊當時都駐在巴黎和克盧克的翼側之間：莫努里在馬恩河北岸，英國遠征軍在馬恩河南岸。

加利埃尼召來參謀長克萊熱里將軍，舉行了一次克萊熱里稱之為“他為重大問題而召開的長時間會議之一——這些會議一般約開兩分鐘到五分鐘之久”。這時是9月3日下午8時30分。他們一致同意，如果次晨克盧克的前進路線不變，他們就使用一切壓力，促使霞飛立即發動一次聯合進攻。他們命令巴黎營地的飛行員一早就起飛偵察，并于上午10時前匯報情況，以便“據以做出重大決策”。

但側翼攻擊的成敗，正如伊爾斯肖埃將軍所告誡的那樣，“取決于先頭突擊部隊的突破能力”，而第六集團軍卻并不是加利埃尼所希望的那種強有力的精銳部隊。它在開到指定陣地時，已全都疲憊不堪，有的分隊在9月2日一晝夜就兼程行軍37英里。疲憊影響了士氣。加利埃尼和他的袍澤們一樣，認為后備師“作用平平”，而莫努里第六集團軍的大部分恰恰又是由后備師組成的。其第六十二后備師在節節退卻中，既無一日休整，也無一日停止過戰斗，軍官喪失了三分之二，現在只有中尉級后備軍官可資補充。第四軍則尚未到達。唯一差強人意的是巴黎居民——那些尚未南逃的居民——的“沉著和決心”。

9月3日傍晚，馮·克盧克抵達馬恩河，而他所追趕的朗勒扎克第五集團軍和在他外側的英國遠征軍已在當天早些時候渡過馬恩河。這兩支在倉促退卻、陷入疲憊和混亂之中的軍隊，雖曾一再接到炸毀橋梁的電令，或許正因為電令紛至沓來，但都未炸毀，或只是炸毀了橋的部分結構。克盧克占領了這些橋頭堡以后，不顧最高統帥部要他與比洛將軍保持齊頭并進的命令，準備立即于次晨渡河，繼續他追逐第五集團軍的內圈行動。他曾三次向最高統帥部電告他即將橫渡馬恩河的意圖，但與盧森堡的無線電通訊比與科布倫茨的通訊還要困難，這三份電報直到次日方才到達。德軍最高統帥部由于兩天來失去了與第一集團軍的聯系，對克盧克拒不執行9月2日命令一無所知，待至他們發覺時，克盧克的先頭部隊已經渡過馬恩河。

9月3日那天，德軍行軍25到28英里。據一位法國目擊者說，士兵們到達宿營地時，“倒在地上，疲憊不堪，只是迷迷糊糊地嘀咕著：‘40公里！40公里！’別的什么也說不出來了”。在隨后的戰斗中，不少德軍就由于累得寸步難行，在睡夢中被俘。當時酷暑可畏，這些德國兵，只憑“明天或后天”可到達巴黎的希望勉力前進。而軍官們也不敢拆穿對他們的蒙騙。在企圖一舉消滅法軍的狂熱中，克盧克既累垮了他的士兵，也遠遠地超越了他的給養車隊和重炮隊。在東普魯士作戰的他的同胞馮·弗朗索瓦將軍，作風就迥然不同了。弗朗索瓦將軍在全部大炮和彈藥車隊到達以前，絕不輕舉妄動。不過弗朗索瓦是在面對戰斗，而他只認為是在追擊、掃蕩殘敵，就此疏忽大意了。在他看來，法軍在十天節節敗退以后，絕無在一聲軍號之下，便可掉轉頭來進行反擊的士氣和能力。他也從不擔心他的翼側。“將軍對巴黎方面毫無顧慮，”一位軍官在9月4日寫道，“在我們摧毀法英聯軍殘部以后，他就可回師巴黎，讓第四后備軍享受領隊開進法國首都的榮譽。”

9月4日，克盧克一面向前挺進，一面直言不諱地告訴最高統帥部，他無法執行要他留在后面作為德軍先遣部隊的側衛的命令。要讓比洛趕上來，勢必停止進軍兩天，他認為這將削弱德軍的整個攻勢，給敵人以重振旗鼓、自由行動的時間。事實上，確實是由于他的部隊采取了“大膽的行動”，馬恩河才為其他德軍開放了渡口，所以，“現在所期望的是要盡量利用這一勝利帶來的有利條件”。克盧克越說越氣，要求了解究竟為何“其他”部隊——指比洛而言——在得到“決定性勝利”以后，總是要“吁求支援”。

比洛獲悉友鄰軍變“統帥部指定作為第二集團軍的后方梯隊為其前方梯隊”時，怒不可遏。像大多數德軍到達馬恩河時一樣，比洛所部也已疲憊不堪。第十后備軍的一個軍官寫道：“我們毫無辦法。士兵摔倒在溝渠里，躺在那兒喘息不止。……上馬命令來了，我就伏在馬背上，頭靠在馬頸上。我們又饑又渴。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支配著我們，這樣活著并沒有什么意思，死了也算不了什么。”豪森的部隊抱怨他們已經“連續五天沒有吃到過煮熟的東西”。在鄰近的第四集團軍里，一個軍官寫道：“我們整天在火辣辣的酷暑中行軍。士兵滿臉胡子，渾身塵土，活像是一群行走的面粉袋。”但是這種不惜士兵極端疲勞，不顧他們情緒低落的進軍情形，未能引起野戰指揮官們的警覺。他們都和克盧克一樣，深信法軍已無恢復戰斗的能力。9月3日，比洛報稱法國第五集團軍已被“決定性地擊敗”——這樣的報告在他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并且已經“潰不成軍，逃往馬恩河南岸去了”。

法國第五集團軍，盡管并未“潰不成軍”，但情況顯然不妙。朗勒扎克毫不掩飾他對霞飛已經失去信心，并和總司令部派來的聯絡官爭吵不休，對發來的命令挑剔不已，所有這一切都影響了他的參謀人員，而這些人員又是一半對一半地在相互鬧意見。上上下下都感到心煩意亂，憂心忡忡，加上在法軍節節退卻中長期作為殿后，更是積憤已久，神經緊張。離敵最近的第十八軍軍長馬斯·德拉特里（Mas de Latrie）將軍對所部的情況顯得“焦慮不安”。但是不管如何焦頭爛額，第五集團軍還是渡過了馬恩河，和敵人拉開了相當的距離，足可以說得上已和敵人脫離接觸，從而實現了霞飛重新發動攻勢的條件。

霞飛雖然想在“數日之內”發動反攻，并已向政府做了匯報，但是究竟如何反攻他說得并不具體，而法軍總司令部則更是沮喪，情緒沉重。每天從各軍返回的聯絡官，都是意氣消沉，有一個說，軍中在“吹著一股失敗主義之風”。總司令部又要后撤了，經安排再撤30英里，遷往塞納河畔沙蒂永（Châtillon-sur-Sèine），并于兩天以后即9月5日搬了家。十天以來，法國喪失了里爾、瓦朗謝訥、康布雷、阿拉斯（Arras）、亞眠、莫伯日、梅濟耶爾（Mézières）、圣康坦、拉昂、蘇瓦松等十個城市，喪失了一些煤礦、鐵礦、麥區和甜菜區，還喪失了六分之一的人口。9月3日，從克洛維（Clovis）到路易十六每個法國國王都在那里的大教堂舉行加冕典禮的蘭斯，作為不設防城市放棄給比洛的軍隊了，整個法國籠罩著一片烏云。兩星期后，德軍在從馬恩河敗退的余怒中，炮轟了這個不設防城市，終于使這里的大教堂，同遭到浩劫的盧萬圖書館一樣，對全世界來說，都成了德國人所作所為的象征。

霞飛仍是鎮定自若，穩如泰山，他一日三餐，照進不誤，夜晚10時就寢，從不破例。但在9月3日，他面臨著必須執行這個時期以來一直使他顯然不安的那個任務。他下定決心，朗勒扎克必須離開。他提出來的理由是朗勒扎克“體力衰退且精神不振”，以及現已眾所周知的與約翰·弗倫奇爵士“不愉快的個人關系”。由于即將反攻，而在這次反攻中，第五集團軍將起關鍵作用，英軍的參加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朗勒扎克必須撤換。盡管朗勒扎克堅定地指揮了吉斯戰役，但霞飛堅信在那次戰役以后，他“在精神上垮下來了”。此外，朗勒扎克對命令從沒有停止過批評和挑剔。這雖不足以證明精神狀態的低落，卻觸怒了這位總司令。

霞飛極少個人主見，善于聽取別人的建議，因此，他或多或少自覺地聽從了作戰處一伙教條主義權威們的意見。一位法國軍事評論家曾把這一伙描繪為“一所教堂，在它之外，人們是得不到拯救的，誰敢揭露它教義上的謬誤，誰就永世得不到它的寬恕”。朗勒扎克的罪孽就在于他是正確的，而且還大聲嚷嚷。戰爭一開始，朗勒扎克曾正確地指出，低估德軍右翼力量將是一個致命傷，結果正是由于犯了這個錯誤，大片法國領土淪于德軍鐵蹄之下。在沙勒魯瓦戰役中，當受到比洛和豪森兩軍兩面包抄的威脅時，朗勒扎克撤出戰斗的決定，拯救了法軍左翼，使它免于覆滅。正如馮·豪森將軍在戰后承認的那樣，朗勒扎克此舉打亂了以包抄法軍左翼為出發點的德軍全部作戰計劃，最后迫使克盧克不得不采取內圈行動，以圖席卷第五集團軍。至于朗勒扎克的決定撤離，是出于恐懼抑是出于明智，無關緊要，因為恐懼有時就是明智，而且這次的撤離實為今天霞飛所準備的反攻創造了條件。但所有這一切只是在時隔很久，法國政府作出為時已晚的抱歉姿態，授予朗勒扎克榮譽勛位勛章以后，才被人們所認識的。但在戰爭爆發一個月的慘敗中，朗勒扎克大不敬的行徑使自己成了法軍總司令部難以容忍的人物。因此，他率軍南渡馬恩河之日，就成為他被送往泰皮恩懸崖[[1]](#_1__Tai_Pi_En_Xuan_Ya__Tarpeian)之時。

朗勒扎克的情緒，在那次撤退以后，也確實并不十分穩定可靠。毫無疑問，他跟總司令部之間的互不信任（不管這是哪一方面的過錯），以及他跟約翰·弗倫奇爵士之間的互不信任，都使人感到讓他在緊急關頭擔任集團軍司令，是個風險。霞飛認為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防即將到來的進攻失敗于萬一，是必要的。因此，他在后兩天中又撤換了一些人，使他在戰爭開始后的五周內共撤掉了兩個集團軍司令、10個軍長和38個即占半數的師長。接替他們的是一批新的、大部分也是更優秀的人物，內中包括三位未來的元帥：福煦、貝當和弗朗謝·德斯佩雷。即使說在撤換中不乏有失公允之處，整個軍隊卻得到了改善。

霞飛乘車前往第五集團軍司令部那一天的所在地塞扎訥（Sézanne）。在約定地點，他會晤了第一軍軍長弗朗謝·德斯佩雷。天氣酷熱，這位軍長見霞飛時，頭上裹著浴巾。

“你覺得自己能統率一個集團軍嗎？”霞飛問道。

“不比誰差。”弗朗謝·德斯佩雷回答說。霞飛只是兩眼盯著他，他聳聳肩解釋說：“越是往上，越是容易干。幕僚多了，幫手也多了。”問題就這樣解決了，霞飛繼續前進。

到了塞扎訥，霞飛單獨同朗勒扎克退入一間房間，對他說：“我的朋友，你已精疲力盡，而又下不了決心，你得放棄第五集團軍的司令職務了。我不愿意告訴你這個，但我不得不這樣做。”當時的情況，照霞飛的說法，朗勒扎克思考了一下回答說：“將軍，你說得對。”然后他就像如釋重負一般。但照朗勒扎克自己的說法，他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并要求霞飛提供證據，而霞飛只是一再重復“猶疑不決，下不了決心”，并抱怨他經常對他的命令提“意見”。朗勒扎克反駁說，這不能用來作為反對他的理由，因為事實證明，他提的意見都是正確的，當然正因為它們是正確的，所以才招致了麻煩。但是顯而易見，霞飛聽也不聽，“面部露出對我極不耐煩的樣子，兩眼回避我的目光”。朗勒扎克終于放棄了抗爭。霞飛走出來的時候，據他的副官說，面露“極度緊張之色”，這在霞飛是罕見的。

這時，弗朗謝·德斯佩雷接到調令。他正在吃飯，剛喝上一大口湯，就站起身來，又喝了一杯酒，披上上衣，趕往塞扎訥。在一個十字路口，一批軍用物資正在不慌不忙地進行交接，他無法通過，于是跳下車來。他那壯健結實的體格、榴彈炮彈般的腦袋、平頂式的頭發、炯炯有光的黑眼珠和偏高而富有權威的嗓音，在部隊中是盡人皆知的，所以他一出現，所有的人馬車輛就像著了魔似的給他讓路。在以后的日子里，隨著形勢和他個人情緒的日趨緊張，他在各軍之間來回奔波，碰到道路阻塞時，他的辦法就是掏出左輪手槍從汽車里向窗外開槍。在英國部隊中，他后來以“拼命的弗朗謝”聞名。在他的袍澤們看來，他已從他們所熟知的一位興高采烈、友好卻也嚴格的司令變成了一個暴君。他變得兇殘、專橫、冷酷，對幕僚如同對士兵一樣，進行恐怖統治。當朗勒扎克在塞扎訥剛把機密卷宗移交給他從而交卸了集團軍司令職務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只聽見接電話的埃利·杜瓦塞爾在反復地說著“是，將軍；不，將軍，”并且越說越激動。

“是誰啊？”弗朗謝·德斯佩雷厲聲問道。回答說是第十八軍的馬斯·德拉特里將軍，他堅持他無法執行次日的任務，因為士兵太疲勞了。

“讓我來接。”這位新上任的司令說，“喂，我是德斯佩雷將軍。我已接任第五集團軍的司令。你得進軍；要么進軍，要么就倒下去死掉；這沒有什么可以多討論的。”說完，就把電話掛斷了。

9月4日來臨了，各地盡管相隔遙遠，但都有著高潮即將來到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大事臨頭的前夕有時會出現的一種超感官的預兆。在巴黎，加利埃尼感到這將是“決定性”的一天。在柏林，布呂歇爾公主在日記中寫道：“人們議論的盡是有關預料中的進占巴黎問題。”在布魯塞爾，已是葉黃枯落的時候，陣陣疾風把落葉吹滿街頭。人們感到秋意蕭索、寒氣襲人，如果戰火持續一冬，真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國公使館里，休·吉布森發覺德軍司令部里“氣氛越來越緊張”，已有四天沒有捷報了。“我肯定今天一定會發生大事。”

在盧森堡的德軍最高統帥部里，人們的緊張情緒，隨著德國歷史性的勝利時刻即將來到而達到了頂點。疲憊得不堪忍受的德軍將在馬恩河完成在薩多瓦[[2]](#_2__Sa_Duo_Wa__Sadowa__Cun_Zhuan)和色當開始的事業。德皇以勝利者的口吻向一位從柏林來的大臣說：“今天是戰爭的第35天，我們包圍了蘭斯，離巴黎只有30英里了……”

在前線，各路德軍并不把這場決戰看作一場戰斗，認為只不過是圍殲而已。“重要消息，”第五集團軍的一位軍官在日記中寫道，“法國人已向我們提出停戰要求，并愿償付170億的賠款。”不過，他還是冷冷地加上了一句：“我們拒絕了停戰。”

他們認為敵人已被擊敗，任何與此相反的跡象都是不受歡迎的。當克盧克的參謀長馮·庫爾將軍接到報告說，在蒂耶里堡附近有一支法軍隊伍在邊撤退邊引吭高歌時，他頓時產生了一種可怕的疑慮，但他卻忍住不言，“因為一切有關新行動的命令已經下達了”。除了極少數類此的事例外，德方從未警惕過敵人在準備反攻，或者說在其指揮決策中絲毫感知不到對此有何戒心。不過，事實上是有跡象可尋的，只是活動在敵區的德國情報機關未能搜集上報而已。9月4日，德軍最高統帥部的一個情報員來到王儲司令部說，整個前沿陣地形勢很好，并且說：“我軍各路在乘勝前進。”

但有一個人不以為然。毛奇和霞飛不同，他對自己的命運毫無信心，因此他也不會被自信蒙住眼睛，所以他看事物是看實質而不是看假象。在這點上，他跟朗勒扎克相似。9月4日那天，他顯得“嚴肅持重，悶悶不樂”。他對那位剛才與德皇談話的大臣黑爾費里希（Helfferich）說：“我們軍隊里的馬幾乎沒有一匹能再向前邁進一步了。”他沉思片刻后接著說：“我們不能欺騙自己。我們獲得了成功，但不是勝利。勝利意味著消滅敵人的抵抗力量。當成百萬軍隊在戰場上廝殺，勝利者必然有擄獲，但我們的俘虜在哪兒呢？在洛林有兩萬，其他地方合計起來，或許也只不過一兩萬人而已，再從繳獲的大炮數量較少的情況看來，我認為法軍正在做有計劃、有步驟的撤退。”毛奇道出了一般人所諱言的看法。

是日，德軍最高統帥部終于接到克盧克要橫渡馬恩河的電報，可是為時過晚，已無法制止。克盧克就這樣把側翼暴露在巴黎襲擊之下，使毛奇焦慮不安。報告相繼而來，說開往巴黎方向的火車絡繹不絕，這“顯然是軍隊的調動”。同一天，魯普雷希特又報稱，法軍從他的戰線上撤走了兩個軍。至此，敵人抵抗力量尚存的事實是再也不能回避的了。

正如塔彭上校指出的那樣，法軍的調動可能意味著要“從巴黎向我們右翼發動進攻，而我們的右翼卻無后備力量可資補充”。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令毛奇和野戰指揮官們頭疼不已。德軍在法軍后撤期間與其后衛部隊連續作戰所受的損失，不能像法軍那樣得到后備力量的補充。德軍的戰線始終存在著缺口，令大家惋惜那兩個軍要是不調往東普魯士就好了。毛奇現在打算從左翼調軍增援，盡管在那里的魯普雷希特剛于9月3日向摩澤爾河再次發動了進攻。但事有湊巧，就在毛奇這一建議送達魯普雷希特總部時，德皇剛好親臨該部視察。他深信最后這一擊定可摧毀南錫防線，因此對魯普雷希特和馮·克拉夫特的反對調走一兵一卒極力支持。其他將領或許會力爭不讓，但毛奇并沒有。自從8月1日那晚在精神上受到打擊以后，戰局的變幻莫測和艱難困苦不是增強而是減弱了他的意志。既然不能增援右翼，毛奇決定暫停右翼的前進。

他當晚草擬了命令，并于次日一早發給各集團軍。這道新令實際上公開承認了右翼的失敗，承認德國為取得勝利而不惜犧牲比利時中立地位的計劃宣告失敗。這道日期為9月4日，也即入侵比利時一月整的命令，對形勢做了正確的估計。它指出：“敵軍已擺脫我第一、第二兩集團軍的包抄進攻，一部分已與巴黎守軍會合。”敵軍正從摩澤爾河戰線撤走，朝西移動，“很可能是要在巴黎戰區集中優勢兵力，威脅我軍右翼”。因此，“第一、第二兩集團軍必須繼續面對巴黎東線……抗擊巴黎敵軍的一切行動”。第三集團軍應繼續朝南向塞納河挺進，其余各軍則按照9月2日前令行事。

在勝利唾手可得之際忽然停止右翼的進攻，這在不出兩周就將繼毛奇擔任德軍總司令的陸軍大臣馮·法爾肯海因將軍看來，簡直是神經錯亂。他在9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只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我們的總參謀部已完全昏了頭。施利芬的指示再也不管用了，毛奇智窮才盡了。”這倒不是毛奇的智窮才盡，而是德國人的時機不多了。毛奇從法軍的行動中，已正確地看到它們對德軍側翼構成的威脅，并采取了恰當和明智的對策。他的命令的唯一缺陷是為時太晚。雖然如此，如果不是加利埃尼加緊行動，他的命令可能還可以及時挽回危局。

9月4日拂曉，巴黎飛行員的偵察報告使加利埃尼看到“必須立即行動”的時機。克盧克向東南方向的迂回進軍，已使他的殿后部隊成了莫努里所部和英軍進攻的明顯目標，只需兩軍及時發動進攻。上午9時，在還未取得霞飛同意的情況下，加利埃尼就向莫努里發布預令：“我的意圖是派你軍會同英軍進攻德軍側翼。你必須立刻做好部署，準備今天下午出發，作為巴黎守軍向東全面運動的先驅。”莫努里本人則必須盡速親自來巴黎會商。

隨后，加利埃尼竭力設法從霞飛那里取得一項“迅速而果斷”的決定。他們兩人之間昔日曾是司令與部下的關系，其影響依然存在。兩人也都清楚，如果霞飛發生不測，加利埃尼將接任總司令之職。由于加利埃尼深知霞飛對他的影響力心懷不滿和抵制，因此對說服霞飛并不寄予期望，而是想迫他就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先與轉移至波爾多的普恩加萊通了電話，說他認為現在有一個立即重新發動攻勢的“好機會”。

9時45分，加利埃尼與法軍總司令部接通了電話，這是一系列電話交鋒的開端，所以他后來說：“真正的馬恩河戰役是在電話里打的。”這次是由克萊熱里將軍跟作戰處處長蓬上校通話的，因為加利埃尼不愿跟職位低于霞飛的官員通話，而霞飛又是一向不愿接電話的，他對電話素有反感，他總是推托說，他“不會使用電話”。其實，他的真正理由，像其他身居高位的人一樣是著眼于歷史記載，唯恐在電話中說的話給別人記下來，而他本人又無法控制這種記錄。

克萊熱里把發動第六集團軍和巴黎營地所有可投入作戰的部隊進攻克盧克翼側的計劃做了一番解釋；他說，最好是在馬恩河北岸發動進攻，這樣，9月6日就能交鋒；不然就在南岸進攻，但這需要推遲一天時間，好讓莫努里渡過馬恩河。但不論在哪邊進攻，克萊熱里要求總司令部都得發布一項命令，著第六集團軍當夜進軍。他強調了加利埃尼的信心，他說，加利埃尼認為全軍停止后撤，結合巴黎方面的行動轉入全面反攻的時刻已經到來。總司令部必須做出決定了。

總司令部是寧愿放棄首都的，加利埃尼則截然不同，他一開始就是從巴黎必須設防固守這一信念出發的。他是從巴黎的立場來觀察全線的，他并不直接了解野戰軍的情況。他決心要抓住克盧克迂回行軍給他提供的機會，他深信他的行動必然會促使發動全面反攻。這是一個大膽甚至是魯莽的計劃，因為在對其他部隊缺乏全面了解的情況下，他不可能正確判斷究有多大的勝利機會。加利埃尼認為他已無選擇余地。這也許是他具有一種偉大司令官對于時機到來的直覺，更大的可能是他感到法國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道路可走。

上午11時，莫努里趕到巴黎聽取指示，但霞飛那里仍無回話。中午，克萊熱里再次打電話請示。

在這期間，設在巴爾一所學校里的法軍總司令部里，作戰處的軍官們正聚集在作戰掛圖前面，熱烈議論著加利埃尼的聯合進攻計劃。一個月來，法國軍事方面的種種希望的慘遭破滅，雖使一些人產生了謹慎從事的心理，但另一些人，則始終是主張進攻的狂熱信徒，他們回擊了主張小心謹慎的每一意見。霞飛在旁傾聽了他們的爭論，并由他的副官米勒（Muller）上尉記錄。“部隊已經到了精疲力盡的地步嗎？這不成問題，他們是法蘭西人，對節節退卻已經受夠了，只要聽到一聲進軍號，他們就會忘掉疲勞的。福煦和德朗格勒兩集團軍之間有缺口嗎？這可由迪巴伊集團軍的第二十一軍前來填補。各集團軍還未做好進攻的準備嗎？這可以問一問各野戰指揮官，看他們怎么回答。至于英軍的配合嘛……啊，這倒是個更加棘手的問題。誰也不能給它的司令下命令，只能同他協商，而且時間又不多了。但是，現在重要的問題是必須抓住這個時機，否則稍縱即逝。克盧克如今還能補救他的錯誤，第六集團軍的行動勢必會引起他的注意，使他看到他所面臨的危險。”

霞飛沒有提供任何意見就走了，他跑到貝特洛將軍的辦公室去同他計議。貝特洛反對這個計劃，他的論點是，各集團軍不能貿然掉過頭來，它們必須按原定計劃撤到強有力的防線，并讓德軍更深入地投進羅網。而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來自洛林陣地的兩個軍進入陣地以后，才能取得必要的數量上的優勢。

霞飛一言不發地兩腳分開跨坐在有草墊子的椅子上，面對著貝特洛的作戰掛圖，考慮著問題。他的最后的反攻計劃，本來就包括使用第六集團軍進攻敵人右翼這個打算在內的。可是，加利埃尼現時卻逼他立即行事。霞飛希望再有一天時間，好讓增援部隊趕到，讓第五集團軍做好部署，讓他有較充裕的時間爭取英軍的配合作戰。所以克萊熱里第二次打電話來時，給他的答復是：總司令擇定在馬恩河南岸進攻；克萊熱里對拖延表示異議，給他的答復是：“推遲一天意味著可投入更多的兵力。”

此時此刻，霞飛必須做出一個更為重大的決策：是執行原定計劃向塞納河后撤，抑或現在就抓住時機冒險與敵決一勝敗。酷暑逼人，霞飛走出門外，坐在學校運動場上一棵垂柳的樹蔭里。他生就是個裁決者，他首先匯集各人的意見，加以分析整理，然后權衡這些人的個人權重，酌予調整，最后宣布他的決定。這些決定始終是他的決定，成功了，榮譽是他的；失敗了，責任也由他承擔。眼下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法蘭西生死存亡的問題。在過去三十天中，法軍為此做了三十年的準備，卻在過去三十天中接連失敗。現在是拯救法蘭西，再次考驗它不愧為1792年的法蘭西的最后時機。入侵者距霞飛僅40英里，而離最近的法軍還不到20英里。桑利斯和克雷伊這兩個城市在克盧克部隊過后一片火海，桑利斯的市長且已喪生。此刻，要是法蘭西在各集團軍尚未準備就緒就轉入反攻而失敗了的話，又將怎樣呢？

因此，必須立即查明各集團軍能否及時準備就緒。由于第五集團軍處于關鍵地位，霞飛發了一封電報給弗朗謝·德斯佩雷：“明日或后日由第五集團軍全軍會同英軍和巴黎的機動部隊攻打德國第一、第二兩集團軍，似屬有利。請告知你集團軍能否照此執行并有把握取勝，速復。”同樣的電報發給了福煦；福煦此時正與弗朗謝·德斯佩雷相鄰，面對著比洛所部。

霞飛依然坐在樹下思考著。大半個下午，這位身體臃腫的人物，穿著黑色的軍上裝、寬松下垂的紅褲子，和一雙不裝馬刺、不擺架勢、副官為之遺憾的軍靴，就這樣默默無言，巋然不動。

也就在這天下午，加利埃尼同莫努里于1時驅車離開巴黎前往英軍司令部，該部當時設在南面25英里位于塞納河畔的默倫。關于他請英軍給予支援的要求，于蓋上校已給了他否定的答復。于蓋說：約翰·弗倫奇爵士已“采納參謀長”阿奇博爾德·默里“慎重從事的意見”，將不參加進攻，除非法國人保證守住從英軍陣地到海邊這段塞納河下游的防線。這兩位法國將軍的車子從逃離巴黎南下的車隊旁開過，于3時到達英軍司令部。穿著蘇格蘭短裙的崗哨挺拔地行了舉槍禮；屋子里面的一些軍人正在忙于打字；而他們的元帥和他的要員卻連影子也找不到，看起來參謀部已被局勢“搞得暈頭轉向了”。找了很久，總算找到了默里。他說，約翰·弗倫奇爵士出去視察部隊了，何時可望回來，他說不上來。

加利埃尼力圖向這位參謀長說明他的進攻計劃，并說明為什么英軍的參加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他始終感到這位英國人“極不愿贊同我們的看法”。默里反復解釋說，英國遠征軍現時正在按照總司令的正式命令進行休整和等候援軍的到來，在總司令未回來之前，他無法采取任何行動。在約翰·弗倫奇爵士依然未見出現的兩個多小時內，經過一番口舌，加利埃尼好容易說服了默里將進攻計劃和要求英軍參加的建議扼要地記錄下來；但所有這一切，“看起來他并不甚了了”。告別時，他得到了默里的許諾，元帥一回來便通知他。

與此同時，在塞納河上游35英里的布賴（Bray）舉行了另一個英、法兩軍會議，約翰·弗倫奇爵士也未出席。弗朗謝·德斯佩雷力求修好朗勒扎克留下的緊張關系，跟這位元帥約定3時在布賴舉行會談。為此，他還佩戴了維多利亞高級爵士勛章的綬帶。他的汽車到達布賴時，給一名法國哨兵攔住。哨兵向他報告說，電報局里有一份緊急電報在等他啟閱。這就是霞飛詢問他關于發動進攻意見的電報。弗朗謝·德斯佩雷一面盤算著這份電報，一面在街上大踏步地走來走去，越來越焦急地盼望那位英國人的到來。一刻鐘后，一部勞斯萊斯汽車疾駛而來，坐在司機旁的是一個“體格魁偉的蘇格蘭高地軍人”，而從車子后座走出來的并不是那位面色紅潤、身材短小的元帥，卻是一個“其貌不揚，但有一副機智相的個子高大的家伙”。此人就是威爾遜，陪同他來的是英軍情報處長麥克多諾（Macdonogh）上校。他們在路上被耽誤了，因為遇見一位巴黎婦女在路旁遇到困難，威爾遜不惜花費時間，殷勤相助，給她的汽車加了油，并給她的司機送了幾張路線圖。

他們一伙走進市政廳三樓一個房間，那個蘇格蘭高地軍人留在室外警戒。麥克多諾揭開厚厚的臺布看看臺底下，打開通向隔壁臥室的一扇門，張望床底下，拍拍被褥子，又打開壁櫥，并用拳頭敲了敲墻壁。隨后，他在回答弗朗謝·德斯佩雷有關英軍部署的問題時，攤開一幅作戰圖，圖上用藍色箭頭標明他那條戰線上的敵人的確切位置。他還精辟地分析了德國第一、第二兩集團軍的動向，給弗朗謝·德斯佩雷留下深刻的印象。

“你們是我們的盟軍，我不對你們保密。”弗朗謝·德斯佩雷說道，隨即大聲宣讀了霞飛的計劃。對此計劃，“我將立即電復我部已做好進攻準備”，他用鋼鐵般的目光凝視著客人說道：“我希望你們是絕不會迫使我們單獨作戰的，你們將填補第五、第六兩集團軍之間的空隙，這是十分重要的。”接著，他把接到霞飛來電后短短一刻鐘內腦海里醞釀的確切作戰計劃，提綱挈領地說了一遍。這個作戰計劃，是根據他個人的設想，從莫努里部隊將于9月6日在馬恩河北岸發動進攻出發的。威爾遜就像他那次對待福煦一樣，又一次和一位精力充沛的法國將軍商議，滿口表示同意。兩軍的部署，兩軍各自于9月6日黎明必須到達的陣地，以及兩軍攻擊的方向，就此決定下來了。但威爾遜警告此事要得到約翰·弗倫奇爵士的贊同，特別是默里的贊同，是不容易的；不過他答應盡力爭取。他動身前往默倫去了，弗朗謝·德斯佩雷則把雙方商定的一致意見上報給霞飛。

在巴爾，霞飛從樹蔭下站了起來。他沒有等弗朗謝·德斯佩雷和福煦的回電，便打定了主意。他走進作戰處，要求立即草擬一道命令，“將巴黎守軍設想的局部行動擴大到協約國軍左翼的全面反攻”。戰斗決定于9月7日開始。激烈的討論停止了，作戰處頓時寂靜無聲。退卻終于結束，掉轉身來的時刻到來了。人人投入了草擬詳細作戰命令的工作。為了避免泄露風聲給敵人的危險，決定非到最后時刻，不發布命令。

其時正6時。6時30分，霞飛進入餐室，宴請兩位日本軍官。席間，有人輕聲低語對霞飛說：弗朗謝·德斯佩雷已說服英軍參與進攻；第五集團軍有重要文件送來。一日三餐，神圣不可侵犯，國際交往方面的禮節同樣神圣不可侵犯，何況現時協約國正在滿懷希望地進行磋商，爭取日本在歐洲方面提供軍事援助。霞飛不能中途離席，只好失禮地“匆匆用完”這頓飯。霞飛在看弗朗謝·德斯佩雷干脆的回電時，就像被推入水中非游不可似的。弗朗謝·德斯佩雷以并不比“要么進軍，要么就倒下死掉”婉轉多少的口吻定下了第五、第六兩集團軍和英軍三方面確切的作戰時間、地點和條件。戰斗可于9月6日開始；英軍愿“改變它的作戰方向”，但要以第六集團軍支援它的左翼為條件，所以第六集團軍必須于某時某刻開到烏爾克河的某線，“否則英軍將拒絕進軍”；第五集團軍將于次日繼續后撤到大莫蘭河（Grand Morin）南岸，并于后天進入陣地，從正面襲擊克盧克部隊，與此同時，英軍和莫努里則進攻其翼側。福煦部隊“大力參加”對德國第二集團軍的攻勢，是個必要條件。

弗朗謝·德斯佩雷最后說：“我部能于9月6日作戰，不過，部隊的情況并不十分良好。”這是一句不加掩飾的真話。隨后，當弗朗謝·德斯佩雷告訴第三軍阿什（Hache）將軍已決定于次晨開始進攻時，阿什“宛如挨了當頭一棒”。

“這太瘋狂啦！”阿什竭力反對，“全軍已經精疲力盡，睡不上，吃不上——已連續行軍和戰斗兩星期啦！我們缺少武器、彈藥和裝備。情況很糟。士氣低落。有兩名師長我不得不換掉。參謀處一文不值，毫無作用。要是我們有時間在塞納河后方休整一下……”

同加利埃尼一樣，德斯佩雷認為法國除此以外別無其他選擇；也同加利埃尼一樣，德斯佩雷直接而大膽的反應后來證明是個決定性因素，而這是他的前任未必能做到的。其他不可靠的司令也一概被清除掉了。那天，馬斯·德拉特里被撤職，由德卡斯泰爾諾部隊的沖勁十足的莫迪伊將軍接替。至此，第五集團軍已經完成了撤換司令的工作，五個軍長撤換了三個，十三個師長撤換了七個，并撤換了相當一部分的旅長。

在德斯佩雷“機智大膽”的答復的鼓舞下，霞飛通知作戰處改按德斯佩雷部署的地點草擬作戰命令，但9月7日的進攻日期保持不變。他從福煦那里接到了同樣肯定的答復。不過福煦只是簡練地說了一句他“準備出擊”。

可是，亨利·威爾遜回到英軍總司令部后，得到的則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默里甚至沒有等約翰·弗倫奇爵士回來，就發命令要英軍于當晚開始再向西南方向后撤10到15英里——“這簡直叫人痛心”。威爾遜也看到默里記錄的加利埃尼的作戰計劃，于是他立即致電巴黎，說明“元帥尚未回來”，同時也談了英軍的后撤計劃。不過，威爾遜當時似乎并沒有把后撤計劃通知德斯佩雷，這也許是他存有說服約翰·弗倫奇爵士撤銷這一計劃的希望的緣故。

約翰·弗倫奇一回來，就陷入了各種混亂的計劃和建議之中：有霞飛寫于那天所有事情發生以前建議英軍在塞納河作戰的來信，有加利埃尼向默里提出的計劃，有威爾遜與弗朗謝·德斯佩雷達成的協議，而默里本人又在他身旁竊語不休，竭力主張后撤。在這眾說紛紜之中，約翰·弗倫奇爵士茫然不知所措，孰是孰非，決斷不了，因此索性避不采取任何行動。對默里已經發出的后撤命令，他聽之任之；關于法國人提出的種種要求，他通知于蓋說：“鑒于情況不斷變化”，他要“對局勢再做一番研究，才能決定行動”。

大約也就在這個時刻，加利埃尼從默倫回到巴黎。他看到威爾遜的電報，也看到霞飛下午12時20分發來的電報。霞飛的電報重申了中午電話中所表示的意圖，即莫努里應于9月7日在馬恩河南岸發動進攻。這本不是什么新消息，但聯系到威爾遜的電報，看來它對加利埃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時間在消逝，克盧克在前進，加利埃尼眼看他的時機正在消失，于是下定決心，采取強制手段。這次，他親自掛電話給法軍總司令部。霞飛起初還想回避，想讓貝蘭接聽，但加利埃尼堅持非親自與總司令通話不可。根據霞飛的副官當時的電話記錄，加利埃尼說：“第六集團軍已做好準備在馬恩河北岸進攻，現在要改變既定的進軍方向，在他看來已不可能，他堅持應照原定時間和地點發動進攻，不做任何改變。”

霞飛在同他的老上司的通話中，也許是又一次受到加利埃尼這樣富有權威性格的人帶來的精神壓力，也許如他后來所說，由于擔心加利埃尼倉促促成的莫努里的行動會把法軍的整個策略暴露在敵人面前，他不得不“違背他的心愿”，把總攻的日期提前一天。這時候，他已從福煦和德斯佩雷得到保證，他們兩軍已經做好戰斗準備，并認為后者以其魔力已從英軍那里獲得了同樣的保證，當然他不知道這個保證已經變卦。不管怎樣，他“已如加利埃尼所愿”，批準或默認了讓第六集團軍從馬恩河北岸發動進攻，并且同意9月6日開始全面進攻。加利埃尼立即于傍晚8時30分向已在行動的莫努里重申了他早先給他的進軍令。在法軍總司令部里，參謀們根據提前作戰的需要，調整了進攻陣地。晚上10時，也就在毛奇簽署了要德軍右翼停止前進的命令后兩小時，霞飛簽署了第六號通令。

通令充分意識到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機，它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指出：“利用德國第一集團軍的冒進，集中協約國左翼的全部兵力進攻該軍的時刻已經來到。”接著，通令按照弗朗謝·德斯佩雷答復的內容，規定了第五集團軍、第六集團軍和英軍的行動計劃。參加總攻的命令也分別發給了第三、第四兩集團軍。

夜尚未闌。霞飛剛簽署通令，于蓋送來了消息，說約翰·弗倫奇爵士拒絕批準任何聯合作戰計劃并表示要對局勢“再作一番研究”。霞飛大吃一驚。重大決策業已定下，命令已在途中，拯救法蘭西的戰斗在三十六小時內就將打響。而這支盟軍的參戰計劃正如福煦所曾說過的，原來是以英軍的配合為基礎的，而它據守的陣地誠是命運作祟，正是整個戰線命運攸關的要沖，可如今它又要再次臨陣撤退了。由于電文譯成密碼和拍發都需要一定時間，各項命令按原來的打算要于次晨才能到達各集團軍。霞飛于是將第六號通令特制了一份副本，派專使送往英軍司令部，這是他所能想到的說服英軍的唯一辦法。可是當專使于凌晨3時抵達默倫時，英國遠征軍的三個軍業已遵照默里當天下午的命令，開始星夜撤軍了。

在敵人方面，也過早地于9月5日破曉就進軍了。克盧克在竭盡全力向前推進，企圖席卷法軍翼側。待到上午7時，他接到毛奇的無線電令，要他掉轉頭來對付其翼側將遭襲擊的危險時，他的部隊早已在途。隊伍展開長達三十多英里的四個軍，正在向大莫蘭河挺進。克盧克并未讓他們停止前進。對法軍在其翼側集結的警告，他并不置信，或者是并不重視。他不相信當各路德軍“正在整個前線全面乘勝前進”之際——德國人向有完全信任自己公報的習慣——敵人能有余力威脅其翼側。他也已開始注意到法軍的后撤也許并不是完全潰敗的種種跡象，但正因為如此，他認為就更不該放松壓力，給敵人以喘息機會，讓他們能夠“重整旗鼓，進行反撲”。因此，克盧克對毛奇的命令不屑一顧，率領全軍繼續前進，并把他的司令部前移25英里，駐在大、小莫蘭河之間的勒貝（Rebais）。傍晚，德國第一集團軍的各路部隊開到距英國遠征軍和弗朗謝·德斯佩雷部隊10英里到15英里的一條戰線，前哨相距不到5英里。這將是他們向前挺進的最后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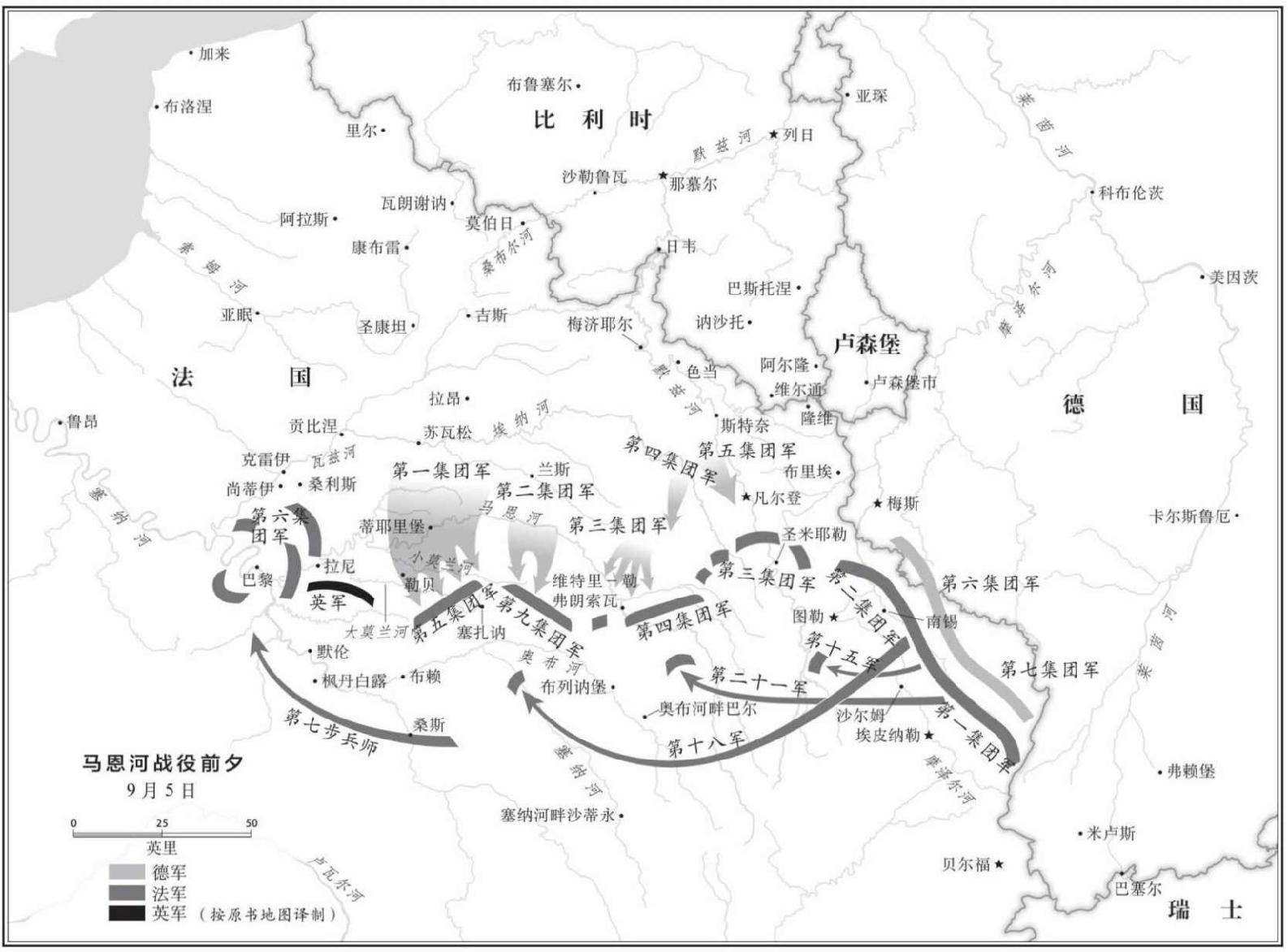
那天夜晚，德軍最高統帥部委派的一個全權代表來到克盧克的司令部。鑒于電訊聯系困難，加上克盧克生性暴躁，毛奇特地派了他的情報處長亨奇（Hentsch）上校從盧森堡驅車175英里，親自前來說明發布新命令的原委，并督促貫徹執行。克盧克及其參謀人員得悉魯普雷希特所部在法軍堡壘陣線前，就像王儲所部在凡爾登外圍一樣，已陷于僵局，“不禁大吃一驚”。亨奇上校敘述了法軍調動的種種跡象，以及最高統帥部根據這些跡象做出的“敵人的強大部隊”正在往西移動，威脅德軍翼側的推測。最高統帥部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決定做絕非得已的后撤。因此第一集團軍務須折回到馬恩河北岸。為了聊表慰藉，亨奇上校說：“后撤可以從容從事，沒有倉促的必要。”

同時，留在馬恩河北岸作為德軍翼側后衛的第四后備軍發來了令人不安的證實法軍行動的消息。消息說，它與一支配有重炮的至少有兩個半師的敵軍發生了遭遇戰。這里所說的敵軍當然就是正在向烏爾克河前進的莫努里部隊的一部分。盡管法軍的進攻已被“順利地擊退”，但第四后備軍軍長已下令一俟夜幕降臨就后撤。

克盧克屈服了。他在越過馬恩河之后兩天來驅軍前進的路程是多余的，現在不得不原路折返。他當即草擬了命令，規定于次日，即9月6日晨，首批撤回兩個軍，其余各軍將隨后撤退。在他從列日出發已經前進到巴黎一線以后，再要他后撤，在他確是個痛苦的時刻。如果他遵照統帥部的命令，始終作為比洛后方的梯隊，或者甚至在那天上午7時就停止前進，他現在是可以率領整個集團軍對付敵人對他翼側的威脅的。按照他的參謀長庫爾將軍的說法：“德軍最高統帥部和第一集團軍參謀部絲毫沒有料到法國全軍的一場大舉進攻已迫在眉睫……沒有一點兒跡象，沒有從俘虜口中供出一言一語，報紙上也沒有哪段消息提供過任何警告。”如果說克盧克在當時對前途還茫然無知，但有一點他是不可能不明白的，那就是在德國時間表上只剩下四天的時間，中止追擊，立即撤回，絕不是勝利的預兆。

9月5日，對協約國來說，看來是更為暗淡的一天。那天上午，它們的代表在節節敗退、迄未取勝的情況下在倫敦開會，簽訂一項相互約束的條約，“在這場戰爭過程中，不得單獨媾和”。

在巴黎，莫努里問加利埃尼：“萬一挫敗，我們的撤退路線是……？”加利埃尼兩眼不禁黯然，答道：“無路可撤。”作為萬一大難臨頭的打算，加利埃尼給巴黎守軍各區司令發布了一道密令，飭令他們上報本地區寧予破壞而不使落入敵手的一切資財，甚至像位于市中心的新橋（Pont Neuf）和亞歷山大橋（Pont Alexandre）也需炸毀。他對伊爾斯肖埃將軍說，萬一敵人突破，留給他們的只能是“一座空城”。



在法軍總司令部里，德卡斯泰爾諾發來的一份報告，似乎使人感到甚至在發動總攻以前就有遭到極大不幸的危險。德卡斯泰爾諾報告說，他感到壓力很大，也許要被迫撤離南錫。霞飛命令他再堅守二十四小時，以待做出決定；如果屆時情況不可避免，他同意撤退到德卡斯泰爾諾信中提出的第二道防線。

為了在這次進攻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數量上的優勢，霞飛冒著極大的風險從第三集團軍調出一個軍，從摩澤爾河前線調出兩個軍，但這些增援部隊尚未到達前線。因此，在必須將發動進攻的決定上報政府時，霞飛小心地為自己安上了萬一失敗時的遁詞。他電告總統和總理說：“由于加利埃尼過早地發動了進攻，我已下令停止退卻，接著我也轉入了進攻。”后來，在霞飛有計劃地企圖貶低加利埃尼在馬恩河一戰中的作用，甚至想把某些事實從記錄中抹掉時，這份電報被白里安發現了，并出示給加利埃尼看。他說：“這‘過早’二字值千金。”

9月5日上午，霞飛對英軍意圖仍捉摸不定，“極度焦慮”。他電懇米勒蘭以政府名義施加影響。他說迫在眉睫的戰斗，“會帶來決定性成果，如失敗，也會為國家帶來極嚴重的后果……我特請你提請元帥注意這次進攻的決定性的重要意義，不要再另有盤算。倘我對那里的英軍能像對法軍那樣發布命令，我就可立即轉入進攻”。

是日凌晨3時，亨利·威爾遜接到于蓋交來的霞飛第六號通令，但于蓋不準攜帶該令前來的德加爾貝（de Galbert）上尉會見任何英軍高級將領。在此期間，每發生一樁爭執，于蓋總是心懷惡意得出奇，一貫以中心人物出現。德加爾貝上尉眼看此事非由較高級的將領出面解決不可，于是立刻趕回法軍總司令部。上午7時，威爾遜將第六號通令交給了約翰·弗倫奇爵士，并在整個上午勸他與法軍合作。再說，德加爾貝上午9時30分回到法軍總司令部，什么確實消息也沒有帶來，只是說英國人對待進攻的態度“冷淡”。默倫市長告訴他，約翰·弗倫奇爵士的行李正在運回楓丹白露。

霞飛感到必須“不惜任何代價”要讓英軍參加戰斗，就是驅車115英里前往默倫也在所不計。他先用電話通知對方說他就來，隨即帶領一名副官和兩名參謀出發了。盡管途中遇到不少路障，還要為進餐而不可避免地停車，他的賽車司機終于在下午2時把他送到約翰·弗倫奇爵士駐節的城堡。

元帥站在桌旁等候霞飛到來，在他的兩邊是默里、威爾遜、于蓋以及參謀部的其他一些官員，于蓋“和往常一樣，看起來仿佛失去了最后一個朋友似的”。霞飛走上前去，這一次他與往常不同，首先發言，說話時也不像平常那樣簡練扼要，而是感情激動，滔滔不絕，且不時地助以手勢，“好像要把他的心掏出來，放到桌上似的”。他說，“決定性的時刻”已經到來，他的命令已經發出，不管發生什么情況，為了拯救法國，就是剩下最后一連法軍也要投入戰斗。“法國全體人民的生命，法國的國土，歐洲的未來”，全靠這次進攻了。“我不能相信英軍在此緊急關頭會推卸它的責任……對你們的不參加戰斗，歷史將做出嚴厲的審判。”

霞飛用拳猛擊了一下桌子：“元帥先生，英國的榮譽處在危急存亡之中！”

約翰·弗倫奇爵士一直在“心情激動地專心聆聽”，待聽到最后一句時，頓時面紅耳赤。在場的人陷入一片沉寂。這位英國元帥的淚水漸漸地涌上兩眼，流下雙頰。他竭力想用法語說些什么，但怎么也說不出來：“該死！我講不清楚。告訴他，我們愿意竭盡全力。”

霞飛以詢問的眼光看著威爾遜，后者翻譯說：“元帥說，‘同意’。”其實這是用不著說的，約翰·弗倫奇爵士的眼淚和語氣已說明問題。默里急忙插嘴說，英軍此刻已撤到通令指定陣地后面十英里的地方，因此要到上午9時才能發動進攻，而不能如霞飛的要求于上午6時出動。這話反映出來的小心謹慎，在爾后的日子里是能時時感到的。霞飛聳了聳肩說：“那也沒有辦法。不過我得到了元帥的諾言已足夠了。”接著，一齊吃了茶點。

就在霞飛離開期間，法軍總司令部按計劃在進攻前遷到塞納河畔沙蒂永。是日傍晚，約在亨奇上校警告馮·克盧克的同時，霞飛回到了司令部。他走進作戰室重申了早先的決定之后，對聚集在那里的軍官們說：“先生們，讓我們在馬恩河戰斗吧。”

他簽署了準備翌晨軍號一響就向部隊宣讀的命令。在通常情況下使用法語，尤其是在公告上的時候，需要花上一定的氣力，才能使人聽起來不那么華麗。但是這一次的措辭則很平淡，而且近乎陳腐，然而傳達的信息卻嚴肅堅定，毫不妥協：“現在，戰斗已經打響，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人人必須牢記，不能再后退了。必須全力進攻，擊退敵人。部隊如感到不能前進，則必須不惜代價堅守陣地，寧死不退。在當前形勢下，絕不容許失敗。”

僅此而已，華麗辭藻的日子已成過去。它沒有叫喊“前進！”或號召戰士們為榮耀而戰。1914年頭三十天的戰斗預示，前程絕少榮耀可言。

注釋

[[1]](#_1_21) 泰皮恩懸崖（Tarpeian Rock），古羅馬拋擲死刑犯人之處，這里指朗勒扎克將被撤職。——譯注

[[2]](#_2_17) 薩多瓦（Sadowa），村莊名，現屬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州。1866年普奧戰爭期間，普軍在此擊潰奧軍主力。——譯注

加利埃尼毫不躊躇，決定盡速出擊：Mémoires, 95–96; Clergerie, 6–7.

“他為重大問題而召開的長時間會議之一”：Clergerie, 127.

第六集團軍“作用平平”，巴黎居民的“沉著和決心”：Mémoires, 75, 76.

“40公里！”：qtd. Hanotaux, VIII, 222; German prisoners taken asleep: Briey, March 28, evidence of Messimy; “tomorrow or the day after”: qtd. Maurice, 152.

“將軍對巴黎方面毫無顧慮”：ibid., 153.

克盧克對統帥部直言不諱他無法執行命令：Kluck, 102.

比洛獲悉友鄰軍變“統帥部指定作為第二集團軍的后方梯隊為其前方梯隊”時，怒不可遏：Bülow, 103.

“我們毫無辦法”：qtd. Hanotaux, VIII, 223; “No cooked food”: ibid., 276; “Broiling heat”: ibid., 279.

“決定性地擊敗”、“潰不成軍”：Kuhl, 29; Kluck, 102.

霞飛想在“數日之內”發動反攻：Annexe No. 2152.

“吹著一股失敗主義之風”：Muller, 80.

霞飛認為朗勒扎克“體力衰退且精神不振”，及其他評價：Joffre, 236–7.

“一所教堂……”：Grouard, 114. As Hausen acknowledged: in Revue Militaire Suisse, Nov. 11, 1919, qtd. Engerand, Bataille, xxi.

霞飛在戰爭開始后的五周內撤換的高級將領：Allard, 15.

霞飛會晤弗朗謝·德斯佩雷：Grasset, 41; Joffre, 237.

霞飛在塞扎訥會見朗勒扎克：Lanrezac, 276–7; Joffre, 237–8; Muller, 104–5; Spears, 377–78. In his lively account Spears says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ls took place outdoors as they walked “up and down the courtyard whilst I watched with fascinated interest.” Although this obliging arrangement allowed Spears to write as an eyewitness, it does not fit with the probabilities, for Joffre would hardly have chosen to conduct what was to him the most distressing operation of the war so far, in full view of spectators. In fact he did not. “Lanrezac was in his office. I went in there and remained alone with him,” he says specifically.

弗朗謝·德斯佩雷：Grasset, passim; Spears, 398.

“要么進軍，要么就倒下去死掉”：Grasset, 45. The phrase he used was “Marcher ou crever.”

9月4日各地都有著高潮即將來到的感覺：Gallieni Parle, 53; Blücher, 23; in Brussels people felt a chill: Gibson, 191.

德皇：“今天是戰爭的第35天”：Helfferich, Der Weltkrieg, Berlin, 1919, Vol. II. 279.

“法國人已向我們提出停戰要求”：qtd. Hanotaux, VIII, 279.

庫爾將軍的疑慮：Kuhl, 19.

“我軍各路在乘勝前進”：Crown Prince, War Experiences, 69.

毛奇與黑爾費里希的對話：Helfferich, op. cit., 17–18.

德軍最高統帥部接到法軍調動的情報：Tappen, 115.

“從巴黎向我們右翼發動進攻”：ibid.

毛奇9月4日的命令：full text, Edmonds, 290–91.

法爾肯海因的日記：from Zwehl's life of Falkenhayn, qtd. AQ, April 1926, 148.

加利埃尼9月4日向莫努里發布的預令：Mémoires, 112.

“迅速而果斷”的決定：ibid., 107.

加利埃尼告訴普恩加萊現在有一個發動攻勢的“好機會”：The fact of this call was disclosed by Poincaré after the war in an interview with Le Matin, Sept. 6, 1920.

“真正的馬恩河戰役是在電話里打的”：Gallieni Parle, 53.

霞飛一向不愿接電話：Muller. “I have always disliked using the telephone myself,” Joffre, 250.

克萊熱里將軍與作戰處處長蓬上校的通話：Mémoires, 119; Joffre, 245.

法軍總司令部的討論：Muller, 85–6; Joffre, 243–4; Mayer, 41.

霞飛坐在一棵垂柳的樹蔭里：Muller, 87.

霞飛給福煦和弗朗謝·德斯佩雷的電報：ibid., 91–2; AF, I, II, Annexe No. 2327.

加利埃尼拜訪英軍司令部：Mémoires, 121–4; Parle, 55; Clergerie, 16.

德斯佩雷與威爾遜的會面：Grasset, 51–53; Spears, 400–01; Wilson, 174.

霞飛宴請兩位日本軍官：Joffre, 249.

德斯佩雷的回復：full text in Edmonds, 279.

阿什竭力反對：Grasset, 74.

“機智大膽”，福煦的回復：Joffre, 250.

默里的命令“簡直叫人痛心”：Wilson, 174.

“元帥尚未回來”：Gallieni, Mémoires, 128.

弗倫奇決定“對局勢再做一番研究”：Joffre, 252.

加利埃尼與霞飛的通話：Mémoires, 130; Joffre agreed “unwillingly” and “as Gallieni desired”: Joffre, 251.

第六號通令：AF, I, II, Annexe No. 2332.

霞飛收到于蓋送來的消息：Joffre, 252.

克盧克認為德軍“正在整個前線全面乘勝前進”：Kluck, 106. “Regain freedom of maneuver”: ibid.

亨奇上校拜訪克盧克司令部：Kluck, 107; report of Commander of IVth Reserve: ibid., 108; Kuhl, “Neither OHL nor the First Army”: qtd. Edmonds, 292, n. 2.

加利埃尼：“無路可撤”：Gallieni Parle, 57, n 1. His orders for destruction: AF, I, II, Annexe No. 2494; “A void”: Hirschauer, 228.

“加利埃尼過早地發動了進攻”：Gallieni Parle, 64; “That is worth gold”: Carnets, 78, n. 3. (To the present author it seems unnecessary to ascribe all credit for the Marne either to Gallieni as, for example, Captain Liddell-Hart does in Reputations Ten Years After, at the cost of making Joffre out a fool, or to Joffre as General Spears does at the cost of making Gallieni out a liar. As Poincaré said long ago, there was credit enough for both.)

霞飛對英軍意圖仍捉摸不定，“極度焦慮”：Joffre, 252; his telegram to Millerand: AF, I, II, Annexe No. 2468.

威爾遜接到霞飛的第六號通令：Wilson, 174. Huguet, de Galbert and British “lukewarm”: Joffre, 253; Mayor of Melun: Hirschauer, 179.

“不惜任何代價”：Joffre, 252.

英法兩軍將領在默倫的會談：Joffre, 254; Muller, 106; Wilson, 174; Spears, 415–18. The phrase “Threw his heart on the table” is Muller's, as is the description of Huguet which reads in the original, “qui semble, à son habitude, porter le diable en terre.” (Unfamiliar to most French friends queried, this phrase was variously translated for me as meaning that Huguet looked satanic, bored, or gloomy. I have adopted the last as proposed by the only person who seemed certain.)

Spears, in his vivid and dramatic account of the meeting, performs another historical sleight of hand. Unwilling to give the reader an impression of British reluctance to fight, he claims that Joffre made the trip to Melun—a six-to-seven-hour round trip by car just before the crucial battle—in order to “thank” Sir John French for his cooperation. Inexplicably, Spears then quotes Joffre as saying, “with an appeal so intense as to be irresistible, ‘Monsieur le Maréchal, c'est la France qui vous supplie.’” This does not sound compatible with thanks.

“先生們，讓我們在馬恩河戰斗吧。”：Poincaré, III, 136.

霞飛9月6日發出的命令：AF, I, II, Annexe No. 2641.

# 后記

全世界都知道，馬恩河戰役以德軍撤退而告終。在烏爾克河和大莫蘭河之間，德國人在他們的時間表剩下的四天時間里，失去了獲得“決定性勝利”的機會，從而也失去了贏得這場戰爭的機會。對法國，對協約國，以及最終對于整個世界，馬恩河的悲劇在于沒有獲得本來可以獲得的最大勝利。

莫努里對德軍翼側的進攻和馮·克盧克的轉身迎戰，使德國第一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之間敞開了一個缺口。因此這一戰役的關鍵，在于德軍能否在弗朗謝·德斯佩雷和英軍利用這一缺口突破德軍中路之前，擊潰法軍兩翼——莫努里和福煦。莫努里在行將被克盧克擊敗的時候，得到第四軍的增援，6000名士兵在巴黎一下火車，就由加利埃尼征用的市內出租汽車急速送到前線，從而守住了陣地。福煦在圣貢（St. Gond）的沼澤地區，在豪森的集團軍和比洛集團軍一部的強大壓力下，右翼節節敗退，左翼步步后撤。就在此千鈞一發之際，他發出了著名的命令：“勇往直前，進攻！德軍已成強弩之末……能堅持到底者勝！”弗朗謝·德斯佩雷擊退了比洛的右翼；英軍開進了缺口，但行動過于遲緩，過于躊躇；亨奇上校再度做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出場，建議后撤，因而德軍能及時撤退，避免了被突破的厄運。

當德國人的勝利唾手可得，法國人的災難迫在眉睫之際，全世界這些天來眼看德軍步步進逼，氣勢洶洶，協約國軍節節敗退，潰向巴黎，人人為之惶恐不安，不可終日。這一戰力挽狂瀾，轉敗為勝，因而被稱為“馬恩河的奇跡”。曾為法國提出“意志”的奧秘的亨利·柏格森，從中看到曾經拯救過法國的奇跡重又出現于眼前，他斷言“是圣女貞德贏得了馬恩河戰役”。仿佛突然被一堵一夜之間冒出來的石墻阻擋住，敵人也抱有同感。戰斗正酣的時候，毛奇曾傷心地寫信給妻子說：“法國的‘沖動’眼看行將消失，但頓又熊熊燃燒起來。”克盧克事后追述德國在馬恩河失敗的根本原因時也說道：“壓倒一切的原因在于法國士兵具有神速恢復元氣的非凡特質。士兵寧死不屈的精神是人所熟知的，是每一作戰計劃所依賴的；但已連續后撤十天，風餐露宿、疲憊不堪、徒具形骸的士兵竟能在一聲軍號下拿起武器，沖鋒陷陣，則是我們從未估計到的，這在我們的軍事學上也可能是從未研究過的。”

不管柏格森是怎么說的，決定馬恩河戰果的絕不是什么奇跡，而是最初一個月中固有的各種設想、錯誤和行動。也不管克盧克是怎么說的，德軍司令部在作戰中所犯的錯誤對于最終結局則和法國士兵的氣勢磅礴起了同樣的作用。如果德軍不抽調兩個軍東去抵御俄軍，那么其中一個就可部署在比洛右翼，填補他與克盧克之間的缺口；另一個就可與豪森共同作戰，可為他額外提供一支力量，挫敗福煦。俄國人忠于諾言發動的一場準備不周的進攻，將這兩支部隊拖走了。法國情報處長杜邦（Dupont）上校曾對此贊揚備至。他說：“讓我們向盟軍致敬，他們是受之無愧的，他們的失敗是我們得以取勝的一個因素。”

凡此種種“如果”，不勝枚舉。如果德軍未對它的左翼投入過多兵力，企圖進行兩面包抄，如果它的右翼未超越補給線過遠，也未使士兵過于疲乏，如果克盧克能跟比洛保持齊頭并進，甚至在最后一天，能揮師回到馬恩河北岸，而不是向大莫蘭河繼續挺進，那么，馬恩河一戰的結局也許會迥然不同，六個星期戰勝法國的時間表也許會如期完成。但是要有這樣的可能，必須具備一個首要的、決定性的條件，那就是六個星期的時間表絕不可建立在借道比利時的基礎上。把比利時增列為敵人，姑且不談引起英國參戰后對整個戰局的影響，不談對世界輿論的最終影響，就馬恩河一戰而言，這不僅減少了德軍到達馬恩河的兵力，同時卻又為協約國方面增加了英軍五個師的力量。

在馬恩河，協約國軍獲得了他們在邊境戰役中任何一處所未能獲得的數量上的優勢。這種優勢，部分是由于德軍調走了幾個師的兵力所致，但主要是由于法軍從第三集團軍和堅守陣地、毫不畏縮的德卡斯泰爾諾和迪巴伊兩集團軍中調來了幾個師的緣故。在整個后撤期間，當其他各集團軍棄陣而退的時候，這兩個集團軍始終堅守著法國的東大門。他們幾乎連續不停地作戰十八天，直到9月8日毛奇最后遲遲承認失敗，下令停止進攻法國堡壘防線時為止。如果法國的第一、第二兩集團軍在任何時候稍有退卻，如果他們在魯普雷希特9月3日最后一次大舉進攻時有所示弱，德國人就會贏得他們的坎尼之戰，法國人就不會有在馬恩河、塞納河或其他地區反攻的機會。如果說馬恩河之戰是個奇跡，那是由摩澤爾河之戰促成的。

要是沒有霞飛的掛帥，就不會有阻擋德軍進攻的協約國軍陣線。在十二天災難性的后撤期間，是霞飛堅定不移的信念挽救了法軍慘遭土崩瓦解的危險。一位比霞飛更具有卓見、英明果斷的司令，也許會避免戰爭初期所犯的根本性錯誤，但在節節敗退以后，法國所需要的正是霞飛所具有的那種氣質。很難想象有其他任何人能夠把法軍從一系列的后撤中挽救出來，并保持它的戰斗力。不過在反攻時機到來的時刻，僅霞飛一人是不夠的，他原來擬訂在塞納河停止撤退轉為反攻的計劃也許為時太晚。是加利埃尼看準時機，并在弗朗謝·德斯佩雷強有力的配合下，促成了提前反攻。是那個未被允許參加馬恩河戰役的朗勒扎克，把法國從那份愚蠢的第十七號計劃中拯救出來，從而使爾后的恢復成為可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在沙勒魯瓦做出的撤出戰斗的決定，和后來由弗朗謝·德斯佩雷接替他的職位，對反攻來說都是必要的。雖然如此，提供一支反攻的軍隊的，還是那位臨危不懼的霞飛。“1914年，如果我們沒有他，”霞飛的繼任者福煦說道，“我不知道我們的情況將會是什么樣子。”

全世界將永遠不會忘記出租車在這次戰役中的業績。當時，已有百把輛出租汽車在巴黎軍政府服役。克萊熱里將軍估計，如果再有500輛，每輛載5名士兵，到烏爾克河行程60公里，往返行駛兩次，就可運6000人到情況危急的前線。下午1時發布了征用命令，定于下午6時出發。警察通知了街上的出租車。司機們情緒激昂，立刻卸下乘客，并自豪地向乘客們做了解釋，說他們要去“打仗了”。他們把車子開回車站加好油，便按照命令開往指定地點；到規定時間，600輛汽車已整整齊齊地排成隊伍，集合好了。加利埃尼應邀到場檢閱。他平時是極少流露感情的，但此時此刻，則非常激動。他大聲說：“這是件多么不平凡的事啊！”夜幕降臨，這些出租汽車滿載著士兵，會同卡車、公共汽車和其他各種類型的機動車輛，浩浩蕩蕩地出發了——這是1914年的最后一次英勇進軍，舊世界的最后一次圣戰。

在馬恩河戰役未能取得全勝之后，接踵而來的是德軍向埃納河后撤，雙方為爭奪海峽港口向海岸的急進，安特衛普的陷落和伊普爾（Ypres）戰役。在伊普爾戰役中，英國遠征軍的全體官兵名副其實地發揮了一息尚存戰斗到底的精神，堅守了陣地，在佛蘭德地區擊敗德軍。英國人英勇戰斗的豐碑，不是建立在蒙斯或馬恩河，而是在伊普爾，最初一批英國遠征軍中有五分之四的官兵在這里犧牲。此后，隨著寒冬的來臨，戰爭逐步陷入殘酷的塹壕戰的對峙階段。這些戰壕，像一道滿生壞疽的傷口，從瑞士邊境橫貫法蘭西和比利時，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峽，使戰爭演變為陣地戰和消耗戰，成為殘酷的、泥濘的、瘋狂的大屠殺。這就是人所共知的歷時四年之久的西線戰事。

施利芬計劃失敗了，但它卻成功地使德國人占領了整個比利時和法蘭西北部直到埃納河為止的整片土地，正如克列孟梭執政時期的報刊月復一月、年復一年，不知疲倦地提醒讀者所說的那樣：“德國人仍然在努瓦永”。他們得以深入到法蘭西腹地，是第十七號計劃的過錯造成的。它讓敵人過于深入了，以致法軍后來在馬恩河重振旗鼓進行反攻時，欲趕走他們而不能。它使敵人得以突破，以致后來不得不付出慘重的生命代價，才把他們堵住和牽制住，而這種犧牲恰恰使1914—1918年的戰爭種下了1940年西線戰事的禍根。[[1]](#_1__Zai_Bei_Di_Er_Ci_Shi_Jie_Da)這是一個永遠彌補不了的錯誤。第十七號計劃的失敗與施利芬計劃的破產同樣是致命的，兩者合在一起導致了西線的僵持局面。西線的戰事，每天吞噬著5000人，有時甚至多達5萬人的生命，消耗著大量的軍火、能源、金錢、腦力以及許多訓練有素的人才，從而吸盡了協約國的戰爭資源，并使在敵后開辟新戰場，如進攻達達尼爾海峽這類本來可以縮短戰爭的努力，都以失敗而告終。這種由于第一個月的錯誤而造成的相持戰局，決定了以后戰爭的進程，因此也決定了和約的條款和兩次大戰間歇時期的世界形勢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情況。

人們如果不懷有某種希望，就不能忍受這樣一場規模巨大而痛苦的戰爭——他們希望這場戰爭的浩劫將保證這樣的戰爭今后永不再發生，他們希望在戰爭無論以何種方式結束的時候，它將為未來更美好的世界奠定基礎。猶如進入巴黎的誘人幻想，能使克盧克的士兵繼續前進一樣，在曾經郁郁蔥蔥的田野和隨風飄舞的白楊變為的彈痕累累的荒原和斷枝殘干之上，隱現著人們憧憬的美好世界的幻影。如果沒有這個美好的幻影，那么付出成千上萬的生命來奪取十米陣地或奪回一個潮濕的戰壕將顯得毫無意義。每當秋天來臨，人們總是說戰爭不會再打過冬天，到了春天仍看不到戰爭的結束。這時使士兵和各個國家繼續戰斗下去的，只是通過這場戰爭人類社會能得到某種改善的希望。

當戰爭終于結束時，它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幻想的破滅。D. H. 勞倫斯[[2]](#_2__Lao_Lun_Si__David_Herbert_La)為他的同代人寫了個言簡意賅的總結：“對這一代人說來，以前的一切豪言壯語都一筆勾銷了。”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像埃米爾·凡爾哈倫那樣，懷著痛惜的心情回憶著“我過去是個怎么樣的人”，那是因為他知道1914年以前的豪言壯語和偉大信念，都一去不復返了。

馬恩河戰役之后，戰爭不斷擴大和發展，直到把東西半球的國家都卷了進去，并使各國陷入任何一種和約都無法解決的世界沖突之中。馬恩河戰役之成為影響全世界的決定性戰役之一，并不是因為它決定了德國的最終失敗或協約國的最后勝利，而是因為它決定了戰爭還需繼續。霞飛在戰役打響前夕對戰士們說過，不能后退。后來，也確實沒有后退。各國被困在一個陷阱里，這是一個因戰爭頭三十天沒能決出勝負而形成的陷阱，這個陷阱過去沒有出路，現在仍然沒有出路。

注釋

[[1]](#_1_22) 在被第二次世界大戰毀壞以前的圣西爾軍官學校教堂里，有一塊為一戰中陣亡將士建立的紀念碑，上面只銘刻著一句話“1914屆學員”。內閣成員馬塞爾·桑巴（Marcel Sembat）的外甥安德列·瓦拉尼亞克（André Varagnac），以他的親身經歷對死亡率做了進一步的印證。他于1914年到達服役年齡，8月大戰爆發時因病免征入伍，到同年圣誕節時，他發現和他在公立中學同班的27個男同學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根據《法國軍隊》的記載，僅僅8月份一個月，160萬名在戰場上作戰的士兵中，包括死亡、受傷和失蹤在內的總傷亡，共達206515人。這一數字不包括軍官、衛戍部隊和本土軍的傷亡在內，因此傷亡總數估計接近3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在邊境戰役的四天里傷亡的。馬恩河戰役的傷亡數字沒有單獨發表過，但如把迄至9月11日的估計數字和8月份的數字加在一起，則戰爭頭30天全部傷亡人數，相當于30個蘇瓦松或貢比涅規模的城市的全部人口。確切數字無從獲悉，按照法軍最高司令部嚴格規定的政策，不得發表任何可能對敵有用的消息，因而傷亡名單也未發表。和其他參戰國的比較也付闕如，因為各參戰國的傷亡數字的統計，所包括的時期和統計口徑都不相同。但在大戰結束以后，我們知道各國傷亡數字占其人口的比例是：法國1:28，德國1:32，英國1:57，俄國1:107。

[[2]](#_2_18) 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國小說家，頹廢派文學的重要代表。——譯注

福煦的著名命令：Aston, Foch, 124.

“是圣女貞德贏得了馬恩河戰役”：Bergson said this on several occasions; Chevalier, 25, 135, 191, 249.

毛奇寫給妻子的信：Erinnerungen, 385–6.

克盧克事后追述德國在馬恩河失敗的原因：Interview given to a Swedish journalist in 1918, qtd. Hanotaux, IX, 103.

杜邦贊揚俄軍：Danilov, Grand Duke, 57; Dupont, 2.

數量上的優勢：In five armies present at the Marne, the Germans had about 900,000 men in 44 infantry and 7 cavalry divisions. In six armies the Allies had about 1,082,000 men in 56 infantry and 9 cavalry divisions. AF, I, III, 17–19.

“1914年，如果我們沒有他”：Aston, Foch, 125.

巴黎的出租車：Clergerie, 134–45; Gallieni parle, 56.

腳注：experience of André Varagnac from private information; casualty figures from AF, I, II, 825; AQ, October 1927, 58–63; Samuel Dumas and K. D. Vedel-Petersen, Losses of Life Caused by War, Oxford, 1923, Chap. 1.

“以前的一切豪言壯語都一筆勾銷了”：in Lady Chatterley.

本書由微信公眾號【Kindle圖書共享】（ID:DZSGX8）制作分享， 掃一掃下方二維碼關注我們，免費下載更多優質Kindle電子圖書。  與兩千萬書友一起，享受閱讀帶來的美好體驗。 （本書僅供個人學習之用，請勿用于商業用途。如果閱讀后覺得好，請購買正版書籍！）

# 譯名對照表

A

阿伯丁 Aberdeen

阿德爾貝 Adelbert

阿登山區 Ardennes

阿爾貝·法布爾 Albert Fabre

阿爾貝國王 Albert

阿爾蒂爾·雷岡 Arthur Régant

阿爾漢格爾斯克 Archangel

阿爾瑪 Alma

阿爾薩斯 Alsace

阿爾斯霍特小鎮 Aerschot

阿爾特基什 Altkirch

阿爾特席勒 Altschiller

阿爾托莫諾夫 Artomonov

阿爾文斯勒本 d'Alvensleben

阿耳赫西拉斯 Algeciras

阿方索，西班牙國王 Alfonso of Spain

阿蓋爾郡 Argyll

阿格尼絲·F. 彼得森 Agnes F. Peterson

阿加迪爾港 Agadir

阿拉斯 Arras

阿倫施泰因 Allenstein

阿納斯塔西婭 Anastasia

阿諾·多施 Arno Dosch

阿奇博爾德·默里 Archibald Murray

阿讓庫爾 Agincourt

阿瑟·穆爾 Arthur Moore

阿瑟·尼科爾森 Arthur Nicolson

阿瑟·齊默爾曼 Arthur Zimmermann

阿瑟·威爾遜 Arthur Wilson

阿什 Hache

阿斯奎斯 Asquith

阿提拉 Attila

阿圖瓦 Artois

埃伯內 Ebener

埃弗涅堡壘 d'Evegenée

埃克哈德斯泰因 Eckhardstein

埃里克·魯登道夫 Erich Ludendorff

埃利·杜瓦塞爾 Hély d'Oissel

埃米爾·奧貝爾 Emile Aubert

埃米爾·凡爾哈倫 Emile Verhaeren

埃米爾·加萊 Emile Galet

“埃姆登”號 Emden

埃納河 Aisne

埃尼翁先生 M. Hennion

埃佩爾奈 Epernay

埃皮納勒 Epinal

埃森 Essen

埃施 Esch

埃斯登 Eysden

埃韋灣 Loch Ewe

艾蒂安 Etienne

艾克斯拉沙佩勒 Aix-la-Chapelle

艾倫比 Allenby

艾申 Eyschen

愛德華·戈申 Edward Goschen

愛德華·格雷 Edward Grey

愛德華七世 Edward VII

安德列·瓦拉尼亞克 André Varagnac

安格拉普河 Angerapp River

昂代訥小鎮 Andenne

敖德薩 Odessa

奧布河畔巴爾 Bar-sur-Aube

奧爾勞 Orlau

奧古斯特·馮·馬肯森 August von Mackensen

奧克尼群島 Orkney Islands

奧蘭 Oran

奧蘭治王朝 House of Orange

奧佩爾斯多夫 Oppersdorf

奧斯塔公爵 Aosta

奧斯坦德 Ostend

奧斯特魯達 Osterode

奧托·馮·貝洛 Otto von Below

B

巴巴拉·史翠珊 Barbra Streisand

巴登 Baden

巴蒂斯村 Battice

巴爾雄堡壘 Fort Barchon

巴伐利亞 Bavaria

巴枯寧 Bakunin

巴拉諾維奇 Baranovichi

巴勒迪克 Bar-le-Duc

巴斯托涅 Bastogne

巴松皮埃爾 de Bassompierre

巴滕施泰因 Bartenstein

巴澤耶 Bazeilles

白里安 Briand

柏格森 Bergson

拜恩斯 Beyens

保羅·康邦 Paul Cambon

鮑爾 Bauer

北部灣地區 Tonkin

貝當 Pétain

貝爾福 Belfort

貝爾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貝古 Bécourt

貝蘭 Belin

貝特洛 Berthelot

貝特曼―霍爾韋格 Bethmann-Hollweg

本土師 Territorials

比徹姆 Beauchamp

比爾·“穆斯”·斯考倫 Bill “Moose” Skowren

比爾蓋人 Belgae

比弗布魯克 Beaverbrook

比利牛斯山區 Pyrénées

比洛 Karl Ulrich von Bülow，卡爾·烏爾里希·馮·比洛

比塞大 Bizerte

比紹夫斯堡 Bischofsburg

比亞里茨 Biarritz

比約克島 Björkö

俾斯麥 Bismarck

畢盛 Pichon

邊境戰役 Battle of the Frontiers

波 Pau

波爾多 Bordeaux

波尼港 Bône

波森 Posen，即波茲南

波特蘭港 Portland

波托夫斯基 Potovsky

伯克 Burke

伯克利·米爾恩 Berkeley Milne

伯肯黑德 Birkenhead

勃艮第勇士查爾斯 Charles the Bold of Burgundy

勃拉戈維斯欽斯基 Blagovestchensky

博埃 Boë

博杜安 Baudouin

“博加迪爾”號 Bogadir

博里納日 Borinage

博諾 Bonneau

“不倦”號 Indefatigable

“不屈”號 Inflexible

布爾戰爭 Boer War

布萊里奧 Louis Blériot

“布雷斯勞”號 Breslau

布蘭德·惠特洛克 Brand Whitlock

布朗熱 Georges Ernest Boulanger

布賴 Bray

布雷卡爾 Brécard

布里埃 Briey

布列訥堡 Brienne-le-Château

布里特林 Britling

布林迪西 Brindisi

布洛姆貝 Blombay

布洛涅 Boulogne

布呂歇爾 Blücher

布韋·德拉佩雷爾 Boué de Lapeyrère

C

參孫傾覆神室 Samson's temple

查爾斯·道格拉斯 Charles Douglas

查納克要塞 Chanak

“查塔姆”號 Chatham

措爾納 Zollner

D

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達馬德 d'Amade

達馬爾坦 Dammartin

達尼洛親王 Danilo

達維尼翁 Davignon

大貝爾塔大炮 Big Berthas

大庫羅訥 Grand Couronné

大莫蘭河 Grand Morin

丹吉爾 Tangier

丹尼洛夫 Danilov

丹寧·米勒 Denning Miller

道格拉斯·黑格 Douglas Haig

德貝克爾 de Becker

德比 Derby

德爾卡塞 Delcassé

德蓋菲耶 de Gaiffier

德格雷蒙 D'Eggremont

德加爾貝 de Galbert

德卡斯泰爾諾 de Castelnau

德朗格勒·德卡里 de Langle de Cary

德雷福斯 Alfred Dreyfus

德雷克 Sir Francis Drake

德里納 Drina

德維特 de Witte

迪巴伊 Dubail

迪登霍芬 Diedenhofen，即蒂永維爾（Thionville）

迪里克·布茨 Dierik Bouts

迪律伊 Duruy

迪南 Dinant

迪斯累里 Disraeli

“帝國領土” Reichsland

蒂爾加滕 Tiergarten

蒂爾皮茨 Tirpitz

蒂勒蒙大街 Tirlemont

蒂尼 Thugny

蒂耶里堡 Château-Thierry

杜邦 Dupont

杜梅格 Doumergue

對馬海峽 Tsushima

敦刻爾克 Dunkirk

多佛爾 Dover

多梅斯 Dommes

E

恩維爾貝伊 Enver Bey

F

F. E. 史密斯 F. E. Smith

法爾肯海因 Falkenhayn

法加爾德 Fagalde

法蘭克福 Frankfurt

法利埃 Fallières

法紹達 Fashoda，現名科多克（Kodok）

凡爾登 Verdun

菲利普維爾港 Philippeville

斐迪南大公 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費奧多西亞 Feodosia

費迪南·福煦 Ferdinand Foch

費迪南德，保加利亞國王 King Ferdinand of Bulgaria

費爾德曼 Feldmann

費利克斯·菲韋 Felix Fivet

費希特 Fichte

馮·埃米希 von Emmich

馮·波爾 von Pohl

馮·弗朗索瓦 von François

馮·漢納佩爾 von Hannapel

馮·豪森 von Hausen

馮·黑林根 von Heeringen

馮·克雷斯 von Kress

馮·克盧克 von Kluck

馮·庫爾 von Kuhl

馮·呂特維茨 von Luttwitz

馮·馬維茨 von Marwitz

馮·米勒 von Müller

馮·莫根 von Morgen

馮·普里特維茨·加夫龍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

馮·舍恩 von Schoen

馮·施佩 von Spee

馮·施塔布 von Staab

馮·施泰因 von Stein

馮·武索 von Wussow

馮·英格諾爾 von Ingenohl

“瘋子毛拉” Mad Mullah

佛蘭德平原 Flanders

佛蘭芒人 Flemings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 Vladimir Alexandrovich

弗萊歇先生 M. Flechet

弗蘭克瑙 Frankenau

弗朗茨·約瑟夫 Franz Josef

弗朗西斯·伯蒂 Francis Bertie

弗朗謝·德斯佩雷 Franchet d'Esperey

弗勒根瑙村 Frögenau

弗勒龍堡壘 Fleron

弗雷德里克·莫里斯 Frederick Maurice

弗雷德里克，丹麥國王 King Frederic of Denmark

弗里德里希·馮·伯恩哈迪 Friedrich von Bernhardi

伏見親王 Fushimi

孚日高地 Vosges

符拉迪沃斯托克 Vladivostok，海參崴

符騰堡 Württemberg

福斯泰夫 Falstaff

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富尼耶 Fournier

G

蓋德 Guesde

蓋默尼希 Gemmenich

甘必大 Gambetta

高夫 Gough

高乃依 Corneille

戈爾茨 von der Goltz

戈爾科 Gourko

戈捷 Gauthier

戈烏達普 Goldap

“格本”號 Goeben

格哈特·霍普特曼 Gerhart Hauptmann

格萊斯頓 Gladstone

格朗邁松 Grandmaison

格里爾森 Grierson

格林山兄弟會 Green Mountain Men

格魯阿爾 Grouard

“格洛斯特”號 Gloucester

格呂納特 Grünert

“格奈澤瑙”號 Gneisenau

根特 Ghent

貢比涅 Compiegne

貢賓嫩 Gumbinnen，現名古謝夫（Gusev）

古奇科夫 Guchkov

國民后備役 National Reserve

H

哈康，挪威國王 King Haakon of Norway

哈里·漢森 Harry Hansen

哈里奇 Harwich

哈倫 Haelen

哈納克 Harnack

海法 Haifa

海神尼普頓 Neptune

漢諾威 Hanover

漢斯·德爾布呂克 Hans Delbrück

荷爾斯泰因 Holstein

赫爾·馮·貝洛―扎萊斯克 Herr von Below-Saleske

赫爾穆特 Helmuth

赫里沃德·韋克 Hereward Wake

黑爾貝斯塔爾 Herbesthal

黑爾費里希 Helfferich

黑爾戈蘭島 Heligoland

黑森 Hesse

黑斯廷斯 Hastings

亨麗埃塔 Henrietta

亨利·布里阿爾蒙 Henri Brialmont

亨利·坎貝爾―班納曼 Henry Campbell-Bannerman

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亨利·薩克斯 Henry Sachs

亨利·威爾遜 Henry Wilson

亨利親王 Henry

亨奇 Hentsch

洪佩爾丁克 Humperdinck

胡戈·明斯特貝格 Hugo Münsterberg

懷德納圖書館 Widener Library

霍恩比 Hornby

霍赫貝格 Hochberg

霍亨索倫 Hohenzollern

霍華德·凱利 Howard Kelly

霍勒斯·史密斯―多林 Horace Smith-Dorrien

霍雷修斯 Horatius

J

J-B. 埃利澤·波米埃 J-B. Elysée Pommier

基爾·哈迪 Keir Hardie

基爾曼塞格 Kilmansegg

基爾運河 Kiel Canal

基欽納 Kitchener

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

吉爾貝蒂 Gilberti

吉羅東 Girodon

吉斯 Guise

加來 Calais

加利埃尼 Gallieni

加利波利 Gallipoli

加利西亞 Galicia

加斯東·卡爾梅特 Gaston Calmette

加斯東―卡蘭 Gaston-Carlin

加斯科涅 Gascony

簡·方達 Jane Fonda

降神會 séances

杰勒德 Gerard

杰利科 Jellicoe

杰馬勒帕夏 Djemal Pasha

杰西卡 Jessica

金伯利城 Kimberley

金角灣 Golden Horn

K

卡爾親王 Carl

卡爾斯巴德 Carlsbad

卡爾斯魯厄 Karlsruhe

卡爾韋爾 Callwell

卡利古拉 Caligula

卡薩比安卡 Casabianca

卡約 Caillaux

坎寧 Canning

康布雷 Cambrai

康德拉托維奇 Kondratovitch

康拉德·馮·赫岑多夫 Conrad von Hötzendorf

康拉德·豪斯曼 Conrad Haussmann

康諾特公爵 Duke of Connaught

柯尼斯堡 Königsberg，今加里寧格勒

科布倫茨 Coblenz

科茨布 Kotzebue

科爾馬爾 Colmar

科科夫佐夫 Kokovtsov

克拉兵變 Curragh Mutiny

克拉夫特·馮·德爾門辛根 Krafft von Dellmensingen

克萊藏坦 Clezentaine

克萊熱里 Clergerie

克勞塞維茨 Clausewitz

克雷伊 Creil

克里奧爾人 Creole

克利夫頓·法迪曼 Clifton Fadiman

克列孟梭 Clemenceau

克虜伯公司 Krupp

克魯 Crewe

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克羅默 Cromer

克洛維 Clovis

克斯滕 Kersten

肯尼迪總統 Kennedy

肯尼思·格雷厄姆 Kenneth Grahame

孔代運河 Condé Canal

骷髏頭輕騎兵 the Death's Head Hussars

庫羅帕特金 Kuropatkin

庫默斯道夫 Kummersdorf

L

拉昂 Laon

拉費爾 La Fère

拉費納爾 Raffenel

拉姆齊·麥克唐納 Ramsay MacDonald

拉斯普京 Rasputin

拉西尼 Lassigny

拉辛 Racine

萊昂·布盧姆 Léon Blum

萊寧坎普 Rennenkampf

萊斯特·塔奇曼 Lester Tuchman

萊維―米爾普瓦 Lévy-Mirepois

賴特 Wright

賴因博特 Reinbot

蘭德韋爾師 Landwehr division

蘭斯 Rheims

朗德勒西 Landrecies

朗勒扎克 Lanrezac

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

勞倫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勒阿弗爾 Le Havre

勒巴 Lebas

勒包 Löbau

勒貝 Rebais

勒卡托 Le Cateau

勒芒 Leman

勒內·維維亞尼總理 René Viviani

勒泰勒 Rethel

雷平頓 Repington

雷維爾 Reval，現名塔林

里爾 Lille

里克爾 Ryckel

里夏德·瓦格納 Richard Wagner

理查德·哈丁·戴維斯 Richard Harding Davis

理查德·霍爾丹 Richard Haldane

利奧波德二世 Leopold Ⅱ

利奧泰 Lyautey

利摩日 Limoges

利希諾夫斯基親王 Lichnowsky

列日 Liège

列文 Levin

“列沙吉耶”號 Reshadieh

劉易斯·哈考特 Lewis Harcourt

龍多內 Rondoney

隆森堡壘 Fort Loncin

隆維 Longwy

盧瓦爾河 Loire

盧萬 Louvain，又譯魯汶

魯昂 Rouen

魯伯特·布魯克 Rupert Brooke

魯普雷希特王儲 Rupprecht

路易斯·奈澤 Louis Nizer

路易斯親王 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

倫貝格 Lemberg，現名利沃夫（Lviv）

倫琴 Roentgen

羅伯茨 Roberts

羅伯特·藍辛 Robert Lansing

羅伯特·馬西 Robert K. Massie

羅伯遜 Robertson

羅布 Robb

羅克魯瓦 Rocroi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羅明滕森林 Rominten

羅斯唐 Edmond Rostand

羅西尼奧爾 Rossignol

洛拉·蒙特茲 Lola Montez

洛林 Lorraine

呂夫 Ruffey

呂西安·科特羅 Lucien Cottreau

綠臺毯程序 green baize routine

M

馬蒂爾德公主 Mathilda

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 Matthias Erzberger

馬恩河 Marne

馬爾基·德拉吉什 Marquis de Laguiche

馬爾勒 Marle

馬爾普拉凱 Malplaquet

馬爾尚 Marchand

馬爾斯 Mars，戰神

馬爾托斯 Martos

馬爾維 Malvy

馬格拉博瓦鎮 Marggrabowa

馬格里特 Margueritte

馬漢 Mahan

馬基雅維里 Machiavelli

馬克斯·霍夫曼 Max Hoffmann

馬萊阿角 Cape Malea

馬里埃特 Mariette

馬林巴德 Marienbad

馬林堡 Marienburg

馬略卡島 Majorca

馬恰戈夫斯基 Machagovsky

馬塞爾·桑巴 Marcel Sembat

馬斯·德拉特里 Mas de Latrie

馬斯拉圖爾 Mars-la-Tour

馬塔潘角 Cape Matapan

馬祖里湖泊地帶 Masurian Lakes

邁倫·赫里克 Myron Herrick

麥迪遜總統 James Madison

麥克多諾 Macdonogh

麥克里迪 Macready

麥克馬洪 MacMahon

麥克米倫 Macmillan

麥克納 Mckenna

曼努埃爾 Manuel of Portugal

芒讓 Mangin

梅赫倫 Malines

梅濟耶爾 Mézières

梅克倫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

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 Mecklenburg-Strelitz

梅洛特 Melotte

梅斯 Metz

梅泰 Mettet

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梅特涅 Metternich

梅西米 Messimy

美因茨 Mainz

蒙克 Monk

蒙梅迪 Montmédy

蒙斯 Mons

蒙托福 Montovo

“米迪利”號 Midilli

米哈伊爾大公 Michael

米勒 Muller

米勒蘭 Millerand

米莉姹 Militza

米盧斯 Mulhouse

米歇爾 Michel

米亞索耶捷夫 Myasoedev

明斯特爾親王 Münster

摩根 Morgan

摩澤爾河 Moselle

莫伯日 Maubeuge

莫城 Meaux

莫爾伯勒 Marlborough

莫爾塔涅河 Mortagne

莫朗日 Morhange

莫努里 Maunoury

墨西拿 Messina

默倫 Melun

默茲河 Meuse

N

那慕爾 Namur

納爾遜 Nelson

奈登堡 Neidenburg

奈穆爾 Nemours

南錫 Nancy

訥沙托 Neufchâteau

尼貝庫爾 Nubécourt

尼基塔 Nikita

尼祿 Nero

尼米橋 bridge at Nimy

努瓦永 Noyon

諾克斯 Knox

諾曼·安吉爾 Norman Angell

諾曼底 Normandy

諾梅尼鎮 Nomeny

諾思克利夫 Northcliffe

諾伊德克 Neudeck

O

歐內斯特·漢密爾頓 Ernest Hamilton

歐內斯特·特魯布里奇 Ernest Troubridge

歐仁·奧代納 Eugène Odène

歐仁妮皇后 Eugénie

歐文·科布 Irwin Cobb

P

帕萊奧洛格 Paléologue

帕默斯頓 Palmerston

龐德扎克 Pendezac

佩內隆 Penelon

蓬 Pont

蓬蒂斯堡壘 Fort Pontisse

蓬圖瓦茲 Pontoise

皮埃爾·德韋爾特 Pierre Dewerdt

皮爾斯 Spears

皮克 Lepic

皮特 Pitt

珀斯郡 Perthshire

普恩加萊總統 Poincaré

普拉 Pola

普萊斯親王 Prince of Pless

普列文防御戰 Siege of Plevna

普塔萊斯 Pourtalès

Q

齊柏林飛艇 Zeppelins

槍騎兵 Uhlans

喬治 George

喬治·布約 Georges Bouillot

喬治·克拉克 George Clarke

喬治國王 King George of the Hellenes

切爾寧 Czernin

R

R. E. B. 庫姆 R. E. B. Coombe

讓·巴比埃 Jean Barbier

讓·饒勒斯 Jean Jaurès

熱爾曼·福煦 Germain Foch

熱馬普 Jemappes

熱特河 Gette

日林斯基 Jilinsky

日韋 Givet

容克 Junker

S

薩多瓦村 Sadowa

薩爾堡 Sarrebourg

薩爾拉布律耶爾 Sars-la-Bruyère

薩克森 Saxony

薩拉伊 Sarrail

薩蘭堡 Château Salins

薩洛尼卡 Salonika

薩姆索諾夫 Samsonov

薩佐諾夫 Sazonov

塞爾奈 Cernay

塞勒斯坦·當布隆 Célestin Demblon

塞利納先生 M. Seline

塞利耶·德莫朗維爾 de Selliers de Moranville

塞莫皮萊 Thermopylae，一譯溫泉關

塞納河畔沙蒂永 Châtillon-sur-Sèine

塞瓦斯托波爾 Sevastopol

塞西爾·斯科特 Cecil Scott

塞西爾·斯普林―賴斯 Cecil Spring-Rice

塞耶 Seilles

塞扎訥 Sézanne

三貞女 Trois Vierges

桑巴 Sembat

桑利斯 Senlis

色當 Sedan

森斯堡 Sensburg

“沙恩霍斯特”號戰艦 Scharnhorst

沙爾姆峽口 Trouée de Charmes

沙勒魯瓦 Charleroi

尚蒂伊 Chantilly

舍恩貝格―瓦爾登貝格親王 Schoenburg-Waldenburg

“生命的沖動” élan vital

圣阿沃爾德 Saint-Avold

圣伯多祿教堂 Church of St. Pierre

圣福瓦路 Rue Sainte-Foi

圣戈班森林 Forest of St. Gobain

圣貢 St. Gond

圣赫勒拿島 St. Helena

圣康坦 St. Quentin

圣納澤爾 St. Nazaire

圣熱納維埃夫 Ste. Geneviève

獅心王理查 Richard the Lionhearted

施利芬 von Schlieffen

施奈德 Schneider

施塔盧珀楠 Stalluponen

施圖姆 Stumm

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 Schleswig-Holstein

士麥那 Smyrna

“殊死進攻” offensive à outrance

朔爾茨 Scholtz

斯蒂芬·麥克納 Stephen McKenna

斯海爾德河 Scheldt

斯卡帕灣 Scapa Flow

斯拉夫魅力 le charme slav

斯諾 Snow

斯諾鮑爾 Snowball

斯泰巴爾克 Stebark

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斯特林圖書館 Sterling Library

斯特奈 Stenay

斯圖爾特·科茨 Stuart Coats

斯托雷平 Stolypin

斯威利灣 Loch Swilly

蘇德曼 Sudermann

蘇霍姆利諾夫 Sukhomlinov

蘇瓦尼 Soignies

蘇瓦松 Soissons

索爾代 Sordet

索爾茲伯里 Salisbury

索姆河 Somme

T

塔夫脫總統 Taft

塔拉特貝伊 Talaat Bey

塔蘭托 Taranto

塔列朗 Talleyrand-Périgord

塔明 Tamines

塔南 Tanant

塔彭 Tappen

泰恩河 Tyne

泰隆 Theron

泰皮恩懸崖 Tarpeian Rock

坦蒂尼 Tintigny

坦恩 Thann

坦嫩貝格 Tannenberg

坦塔羅斯 Tantalus

湯姆·布里奇斯 Tom Bridges

特別后備役 Special Reserve

特拉法爾加角 Trafalgar

特拉克嫩 Trakehnen

特賴奇克 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e

特里爾 Trier

特內多斯 Tenedos

提諾斯島 Denusa

提珀雷里 Tipperary

廷巴克圖 Timbuktu

統一與進步委員會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圖勒 Toul

圖隆先生 M. Touron

圖瓦松多爾大街 Toison d'Or

頹廢氣氛 fin de siècle

托馬斯·曼 Thomas Mann

W

瓦德西 Waldersee

瓦爾代克―皮爾蒙特 Waldeck-Pyrmont

瓦爾米碼頭 Quai de Valmy

瓦爾特·布勒姆 Walter Bloem

瓦弗 Wavre

瓦朗謝訥 Valenciennes

瓦隆人 Walloons

瓦薩格 Warsage

瓦托 Watteau

瓦西里·費多羅維奇 Vasilii Fedorovitch，即德皇

瓦茲河 Oise

萬尼亞舅舅 Uncle Vanya

旺根海姆 Wangenhaim

“韋茅斯”號 Weymouth

威爾·歐文 Will Irwin

威爾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威廉·L. 夏伊勒 William L. Shirer

威廉·羅伯遜 William Robertson，即“伍萊”·羅伯遜（“Wully” Robertson）

威廉·蘇雄 Wilhelm Souchon

威廉二世 William Ⅱ

威靈頓 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

維爾紐斯 Vilna

維爾通 Virton

維克托―迪律伊女子中學 the Lycée Victor-Duruy

維萊科特雷 Villers-Cotterets

維倫貝格 Willenburg

維塞 Visé

維斯瓦河 Vistula River

維特 Witte

維特爾斯巴赫 Wittelsbach

維特里 Vitry

維特里―勒弗朗索瓦 Vitry-le-François

溫斯頓·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溫特費爾德 Winterfeld

翁埃耶 Onhaye

沃爾科維斯克 Volkovisk

沃爾特·海因斯·佩奇 Walter Hines Page

沃特海姆 Maurice Wertheim

“無敵”號 Indomitable

烏爾弗林根小鎮 Ulflingen

烏爾克河 Ourcg

烏杰達 Oudjda

烏斯道 Usdau

伍德羅·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X

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西迪卜拉欣 Sidi Brahim

西拉諾 Cyrano de Bergerac

西列柳斯 Sirelius

希邁 Chimay

希耶河 Chiers

錫格馬林根 Sigmaringen

霞飛 Joseph-Jacques-Césaire Joffre，約瑟夫―雅克―塞澤爾·霞飛

夏布里隆 Chabrillon

夏爾·貝璣 Charles Péguy

夏爾·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香檳 Champagne

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

謝什―米迪 Cherche-Midi

新橋 Pont Neuf

興登堡 Paul von Beneckendorff und Hindenburg，保羅·馮·貝內肯多夫·興登堡

匈人 Huns

休·吉布森 Hugh Gibson

Y

“雅武斯”號 Jawus

雅戈 Jagow

亞琛 Aachen

亞歷山大·里博 Alexandre Ribot

亞歷山大橋 Pont Alexandre

亞歷山大三世沙皇 Alexander Ⅲ

亞歷山德拉王后 Queen Alexandra

亞眠 Amiens

亞努什克維奇 Yanushkevich

伊恩·漢密爾頓 Ian Hamilton

伊爾斯肖埃 Hirschauer

伊爾松 Hirson

伊夫林·伍德 Evelyn Wood

伊普爾 Ypres

伊桑·艾倫 Ethan Allen

伊舍 Esher

伊茲沃利斯基 Isvolsky

因斯特堡峽口 Insterburg Gap

優素福王子 Yussuf

憂郁的愷撒 der traurige Julius

于蓋 Huguet

于伊 Huy

圓形廣場 Rond Point

約翰·T. 麥卡琴 John T. McCutcheon

約翰·伯恩斯 John Burns

約翰·費希爾 John Fisher

約翰·弗倫奇 John French

約翰·格倫 John Glenn

約翰·凱利 John Kelly

約翰·西利 John Seely

約翰·西蒙 John Simon

約瑟夫·張伯倫 Joseph Chamberlain

約維努斯 Jovinus

Z

扎本 Zabern

扎金索斯島 Zante

詹姆斯·M. 加文 James M. Gavin

正規軍 Regular Army

知識階層 intelligentsia

朱爾·康邦 Jules Cambon

佐爾道 Soldau

# 譯者說明

本書作者巴巴拉·W. 塔奇曼，美國人，1933年畢業于拉德克利夫學院，以后在耶魯、哥倫比亞等大學學習，得文學博士學位，系美國有名的作家之一。她的著述頗多，其中本書（1962年）和《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1971年）兩書，曾分別于1963年和1972年獲“普利策獎”。

《八月炮火》是一部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1914年8月開戰的，本書就是敘述大戰危機的形成、爆發以及大戰初期的戰役。它以1910年英王愛德華的葬禮為引子，敘述了德皇威廉的野心，以及和英法等國的矛盾。接著分“計劃”、“爆發”和“激戰”三部分，生動地展開了對這場大戰的描畫。由于作者有高度的文學修養，對英、法、俄、比等國的歷史、民族性和當時的社會情況又有較深刻的了解，在寫作時又參考了大量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文獻和著作，并實地訪問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因而文筆生動，所述事件、人物栩栩如生，對事實的分析、人物的刻畫和評價也較客觀。據作者自述，“書中有關氣候狀況、思想感情，以及公眾輿情、個人見解，都有所本”。作者運用了夾敘夾議的筆法，在敘述分析初期戰役交戰雙方在戰略和戰術上的錯誤，協約國之間的矛盾，以及德軍的殘暴、人心的向背等等時，必然引申出這些情況對戰爭的進程所起的深遠影響，預示了大戰的結局。因而本書雖非一部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它通過這段歷史時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以及一些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互為因果，反映了這個歷史時期的概貌，使人讀后并無片斷、孤立的感覺。

原書于1962年出版后，在美國引起了學術界和政界的重視。《第三帝國的興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一書的作者威廉·L. 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譽之為“當代最佳書籍之一……全書從頭到尾都吸引著我”。美國總統肯尼迪，曾以此書贈給來美訪問的英國首相麥克米倫和回國述職的美國駐法大使詹姆斯·M. 加文（James M. Gavin），并曾向多人推薦。

由于本書史料豐富、文筆生動，并反映了美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的研究情況，特譯出供我國學術界參考。

本書原書在書末有各章注釋1050多條，均為書中所寫某事或所引某文的出處，考慮到它們對中文讀者的參考作用不大，故未譯出。

